拉康研讨班 · 第一期

弗洛伊德技术著作

Les écrits techniques de Freud

1953—1954

雅克 · 拉康 著
拉康中文开放翻译计划 译

中文阅读版
2026-10-30

版本说明

本册收录第一期研讨班《弗洛伊德技术著作》（Les écrits techniques de Freud，1953—1954）共23课的现有中文译文，依据拉康中文开放翻译计划本地源文件整理。版本日期：2026-10-30。

保留正文、正文图示和段下注释；移除建言、独立阅读笔记及其入口。相关知识卡链接保留在对应段落下，联网后可打开在线卡片。电子书正文、图示与公式可离线阅读。

译文覆盖已完成，翻译校订与注释仍在进行。本册为版本快照；后续修订以项目在线版为准。

作者：Jacques Lacan（雅克·拉康）
中文译文及编辑：拉康中文开放翻译计划贡献者
在线阅读：KotobaRin 言林
项目来源：Lacan Chinese Translation Project

文本来源与对照版本

项目整理和翻译的研讨班原始文本主要来自 Staferla。翻译校订与注释以法语文本见证为主，并按册次和疑难段落参照下列主要版本：

- **法语底本**：Staferla：Les écrits techniques de Freud；本项目整理、分段与法中对齐所用的主要法语原始文本
- **英语书目参照**：Cormac Gallagher, On Psychoanalytic Technique；Lacan in Ireland 研讨班英译页面；本次用于核对册次、课年和英文题名；未据此逐段改写

这些版本用于核对疑难句、术语、引文和异文，不取代法语底本；并非每一册或每一段都使用全部版本，具体取舍以段下注释为准。

联系与交流

预约精神分析工作可以添加 分析师工作微信：Yanlin_Char

翻译项目交流qq群：700300644

分析师bilibili账号 言林_Char

项目贡献者创作的中文译文、译注等采用 CC BY 4.0。法文原始材料与第三方图像不因收录而自动纳入此授权。范围以项目 NOTICE 为准。本册仅作内容筛选、链接转换和排版，未改写译文。

目录

第1课 · 1953年11月18日 6
第2课 · 1954年1月13日 10
第3课 · 1954年1月20日 33
第4课 · 1954年1月27日 66
第5课 · 1954年2月3日 99
第6课 · 1954年2月10日 137
第7课 · 1954年2月17日 172
第8课 · 1954年2月24日 222
第9课 · 1954年3月10日 254
第10课 · 1954年3月17日 287
第11课 · 1954年3月24日 310
第12课 · 1954年3月31日 386
第13课 · 1954年4月7日 422
第14课 · 1954年5月5日 466
第15课 · 1954年5月12日 493
第16课 · 1954年5月19日 515
第17课 · 1954年5月26日 539
第18课 · 1954年6月2日 568
第19课 · 1954年6月9日 594
第20课 · 1954年6月16日 624

第21课 · 1954年6月23日 651
第22课 · 1954年6月30日 720
第23课 · 1954年7月7日 746

第1课 · 1953年11月18日

[1953 年 11 月与 12 月的各次课程没有可用的速记稿]

文本研读及其教学的意义

对意义的探寻早已有过实践，例如某些佛教大师运用的禅宗方法。大师会用随便什么东西打破沉默：一句讥讽、一脚踢打。学生必须亲自在文本研读中寻找自己问题的答案；大师并不以教席权威的口吻（ex cathedra）讲授一套现成的知识，而是在学生即将找到答案时把它带来。这种教学拒绝一切体系；它揭示的是一种正在运动的思想，却又准备好进入体系，因为它不得不呈现某种教条性的面貌。

弗洛伊德的思想始终最为开放，随时接受修订。把它归结为“无意识”“超我”等用旧了的词，是一个错误。每个概念在那里都有自身的生命，这恰恰就是所谓的辩证法：它有自己的对立面，等等。然而，其中某些概念在某一时刻对弗洛伊德是必需的：它们为一个用先前术语提出的问题带来了回答。

仅仅以“思想史”的意义书写历史，说弗洛伊德出现于一个科学主义的世纪，并不够。《梦的解析》重新引入了某种本质不同、具有具体心理密度的东西，也就是意义。从科学主义的观点看，弗洛伊德在这里仿佛重新接上了最古老的思想：从梦中读出某种东西。此后，弗洛伊德又回到因果解释。然而，当我们解释一个梦时，我们完全置身于意义之中，置身于主体某种根本性的东西之中：他的主体性、欲望，以及他与周围环境、与他人、乃至与生命本身的关系。

我们的任务，是重新引入“意义”这一域；而这个域本身又必须被重新整合到它固有的层次中。布吕克、路德维希、亥姆霍兹和杜布瓦-雷蒙曾结成一种誓约般的信条：

“一切都可以归结为物理力，即吸引力与排斥力。”

一旦给自己设定这些前提，就没有任何理由走出它们。弗洛伊德之所以走了出来，是因为他给自己设定了另一些前提：他敢于重视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例如童年生活中的种种二律背反、自己的神经症困扰和自己的梦。正是在这里，弗洛伊德是一个置身于一切最具人性的偶然事件之中的人——死亡、女人、父亲；对我们所有人而言，他也始终是这样一个人。

这构成了一种返本溯源，甚至几乎不配拥有科学之名。它就像一位好厨师，懂得怎样剖切动物，并沿着关节以最小的阻力把它分开〔柏拉图：《斐德罗篇》，265e〕。对每一种结构，我们都承认有一种属于它自身的概念化方式。不过，这样一来就会走上复杂化的道路，人们于是更愿意回到用一种较为简单的一元论观念演绎整个世界。但必须看清：我们进行剖析所用的不是刀，而是概念；概念拥有自身独特的现实秩序。概念并不是从人的经验中涌现出来的，否则它们本来就会被制作得很好。最初的命名以“词语”为材料；这些命名是用来勾勒“事物”轮廓的工具。因此，一切科学都会长期停留在黑暗之中，纠缠于语言。

例如，拉瓦锡在带来他的“燃素”的同时，也带来了正确的概念：“氧”。首先存在着一套已经为我们成形的人类语言，而我们把它当作一种非常糟糕的工具来使用。间或会发生一些翻转：从“燃素”翻转到“氧”。

我们总得借助日常语言引入数学符号或其他符号，总得解释接下来要做什么。这时，我们处在某种人际交流的层面，也就是治疗者所在的层面；尽管弗洛伊德否认这一点，他仍处在这里。正如琼斯所表明的，弗洛伊德最初给自己施加了一项克己的纪律：不让自己倾泻到思辨领域中去，尽管他的天性强烈地把他引向那里；他服从事实与实验室的纪律，远离了那种糟糕的语言。但请看主体这个概念：一旦把它引入，也就把自己引了进来；正在对你说话的人同其他人一样也是一个人，他使用的正是那种糟糕的语言。

弗洛伊德从一开始就知道：只有分析自己，他才能在神经症分析中取得进展。反转移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意味着人们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分析之中有两个人。这不仅仅是现象学意义上的“两个人”，而是一种结构；唯有通过这项结构，某些现象才可以被分离、被区分出来。正是主体性的结构，使人产生了这样一种观念：他们对于自己是可以理解的。

相关知识卡 分析家的无意识、电话听筒与反移情

患有神经症可以帮助一个人成为优秀的精神分析家：起初，这一点曾帮助弗洛伊德。正如茹尔丹先生不自知地说着散文一样，我们也在不自知地造出“意义”“误义”与“无意义”。但还必须从中找出结构的线条。

荣格也惊叹着重新发现：在梦的符号和宗教符号中，存在着人类物种所特有的某些原型；这同样是一种结构。弗洛伊德引入了另一种东西，即这个结构层次自身的决定论。由此便产生了他全部著作中随处可见的歧义，例如：梦是欲望，还是对欲望的承认？

或者再举一例：“自我”（ego）一方面像一枚空心的卵，在同知觉世界接触时，其表面发生了分化；另一方面，每当我们遇见它时，它又是那个说“不”、或说“我，我……”的东西。也正是这个自我说“人们……”，谈论其他人，并在这些不同的语域中表达自己。

我们将遵循一门“对话艺术”的技术：像那位好厨师一样，我们知道会遇到哪些关节、哪些阻抗。超我也是一条没有意义的法则，却同语言问题有关。如果我说：“你要向右走”，那是为了让他把自己的语言同我的语言协调起来；我想到的是，在我对他说话的那一刻，他头脑中正在发生什么。这种协调的努力，正是语言所特有的沟通。

这个“你”如此根本，以至于它在意识之前就已经介入。例如，审查具有意向性；它在意识之前运作，并且始终保持警觉。“你”不是一个信号，而是对“他者”的指涉；它既是命令，也是爱。同样，“自我理想”也是一种由自我维持的防御组织，用来延长主体的满足。它同时还是最具抑郁作用的功能——这里取这个词的精神病学意义。

“本我”（id）不能被还原为一种纯粹客观的给定，也不能被还原为主体的各种驱力：从来没有哪一次分析最终得出了某个攻击性或性欲的比率。它是分析进展的辩证法中的某一个点，是存在性承认的极点：“你就是这个。”这是分析终结时永远无法达到的理想。

这个理想也不是完全掌控自己，不是毫无激情：理想在于使主体能够维持分析对话，既不说得太早，也不说得太晚；训练分析所瞄准的正是这一点。把一种决定作用的秩序引入人的存在、引入意义的领域，这就叫作理性。

弗洛伊德的发现，就是在一片荒芜的土地上重新发现理性。

第2课 · 1954年1月13日

新年伊始，我先向你们致以良好祝愿；我也很愿意用这样一个主题来开启新的一年，大致可以说："玩笑到此为止！"上个季度，你们在这里几乎只须听我讲。现在我郑重宣布：在这个刚开始的季度里，我打算、我希望、我敢于希望，我也能稍微听到你们的声音。我觉得这绝对必不可少。首先，这是研讨班本身的规则与传统：参加者带来的不能只有个人努力，他们还要通过实际报告作出协作。

当然，这只能来自那些同这些研讨班关系最直接的人——也就是这些文本研讨班对其具有完整意义、以不同程度和不同身份投身于我们实践的人。当然，这并不排除你们从我这里得到我力所能及的回答。这个季度里，如果各位都能量力而行，为这个研讨班进入我所谓的"新阶段""新的运作阶段"付出你们的"最大努力"，我会格外欣慰。

所谓你们的"最大努力"，就是当我点到某个人，请他承担我们共同任务中某个明确部分时，不要一脸厌烦地回答说，偏偏这星期负担特别重，或者给出你们都很熟悉的其他回答。我至少是在对属于我们在这里所代表之团体的人说话。我希望你们充分意识到：这个团体之所以作为一个自主团体建立起来，并且以这样的方式独立出来，正是为了完成一项同我们所有团体成员都有关的任务；这项任务对我们每个人而言所涉及的，不亚于我们的未来，以及我们在余生中正在做、还将继续去做的一切事情的意义。

如果你们来到这个团体时没有带着这种完整意义，没有真正把自己的全部活动置于问题之中，我就看不出我们为什么要以这种形式组织起

来。直说吧：如果有人在自己身上感受不到这项任务的意义，我看不出他为什么还要留在我们的团体里，而不去加入其他任何一种官僚机构。

依我看，就在我们即将进入通常所谓“弗洛伊德的技术著作”之际，这些思考尤其切题。这个名称已经由某种传统固定下来。弗洛伊德在世时，按照作品被整理、出版的方式，人们已经见到一册题为《1893—1906年神经症学说小文集》（Sammlung kleiner Schriften zur Neurosenlehre aus den Jahren 1893-1906）[注1]的书，即关于神经症的短篇著作集——究竟是复数“神经症”还是单数“神经症”，我记不清了。那是一册小八开本，从弗洛伊德的作品中单独编选了一批1904年至1919年的文章；其标题、编排与内容总体上都表明了精神分析方法是什么。

> [注1]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1893—1906年神经症学说小文集》。

这种编选形式之所以有其动机与依据，是因为必须提醒任何想贸然投身其中的无经验实践者：在实践以及方法本质方面，有若干混淆必须避免。与此同时，为了理解“分析治疗的作用方式”，一些基本概念也以逐渐得到阐发的形式出现。尤其是，这些文章中有若干极为重要的

段落，可以帮助我们理解1904年至1919年间，弗洛伊德的实践与理论阐发在以下方面经历了怎样的加工、取得了怎样的进展：

- “阻抗”概念，
- “转移”的功能，
- 在“转移”中发生作用和进行介入的方式，
- 最后，甚至在某一点上，还包括“转移神经症”的本质功能这一概念。

不必再告诉你们，这一小组文章具有格外重要的意义。不过，至少乍看之下，这种编组并不完全令人满意。真正赋予它统一性的，也许并不是“技术著作”这个名称。因为它确实代表着弗洛伊德作品和思想中的一个统一体，可以说，是他思想中的一个阶段所构成的统一体。我们将从这个角度加以研究。

它确实是一个中间阶段，介于我们所谓某种东西的第一次发展与后来阶段之间；有人曾把这种东西称为——

一位文笔并不总处于最佳状态的分析家，

但他这一次找到了一个相当贴切、甚至很漂亮的说法——

——弗洛伊德的“萌芽经验”[注2]。

> [注2] 保罗·伯格曼：《弗洛伊德的萌芽细胞……》（The Germinal Cell of Freud's...），第265—278页，Psychoanalytic Quarterly（1950）；Psychiatry，第12卷，1949年，第19期，第446—447页。另参让-皮埃尔·马科斯：《责任的分析形态》，载 Essaim 第15期，2005年第2辑。

事实上，我们可以把直到大约1904年、甚至1906年的时期区分出来。1904年发表了那篇论精神分析方法的文章；有人说，“精神分析”一词正是在那里首次出现——这完全错误，因为弗洛伊德早在此前就已使用这个词。不过，“精神分析”一词在这里确实得到了正式使用，并且直接进入了文章标题。那么，我们姑且把界限放在1904年或1906年。

1909年：克拉克大学的讲座。弗洛伊德在他的“儿子”陪同下前往美国[注3]。

> [注3] 1909年，弗洛伊德应克拉克大学校长格兰维尔·斯坦利·霍尔邀请，前往美国马萨诸塞州伍斯特市访问并发表演讲；同行者有卡尔·古斯塔夫·荣格——一度被视为他的“精神之子”——以及欧内斯特·琼斯和桑多尔·费伦齐。照片中霍尔位于中央。



我们可以把1904年至1906年之间的这个位置或标志点，选作这项萌芽经验第一次发展的代表。如果从另一端回看，到了1920年，我们会看到弗洛伊德经验的心理机构理论、结构理论，或者用弗洛伊德自己的名称说，“元心理学”理论得到阐发。那是另一端：他把自己经验与发现的另一种发展留给了我们。

你们可以看到，“技术著作”恰好分布并坐落在这两端之间。正是这一点赋予它们意义；否则，如果我们仅仅因为弗洛伊德在其中谈论技术，就说“技术著作”构成一个统一体，那将是一种完全错误的理解。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弗洛伊德从未停止谈论技术。我无须在你们面前重提《癔症研究》（Studien über Hysterie）；这部书从头到尾无非是对分析技术发现过程的长篇说明。我们在那里看到这项技术正在形成，这也正是这些研究的价值所在。我要说，如果真想完整、系统地说明弗洛伊德的技术如何发展，就必须从这里开始；我们只能不断参照并提起这部书。

我没有选用《癔症研究》，原因很简单：它不容易获得；你们并非人人都读德文，甚至也不是人人都读英文。“神经与精神疾病专著丛书”中有一个可以买到的版本[注4]，但要你们所有人都作出这种努力，并不是一件特别容易的事。另一方面，我选择这些“技术著作”，还有一些并非出于便利考虑的理由。

> [注4] Selected Papers on Hysteria and Other Psychoneuroses，1909年，纽约“神经与精神疾病专著丛书”第4号；或约瑟夫·布洛伊尔博士与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博士合著的 Studies in Hysteria，A. A. 布里尔作序并经授权翻译，纽约、华盛顿：Nervous and Mental Disease Publishing Company，1936年，“神经与精神疾病专著丛书”第61号。

不过，继续说下去：即使在《梦的解析》中，所谈的也始终是技术。可以说，除了——

弗洛伊德谈论、书写神话学或民族志阐发的主题，也就是严格意义上的文化主题时——

——弗洛伊德几乎没有哪部作品不为我们带来某种技术上的东西。

为了进一步强调我的意思，无须特别指出：大约1934年发表、收入《论文选集》第五卷的《有终结的分析与无终结的分析》，正是技术方面最重要的文章之一。

实际上，对于今年、这个季度应当以怎样的精神继续评论这些“技术著作”，我认为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必须从今天起确定下来。因此，我才把正在向你们讲的这几句话看得很重要，并把它们称为“弗洛伊德技术著作评论导论”。

看待事情确实有好几种方式。如果我们以为，自己来到这里就是为了满怀赞叹地俯身研读弗洛伊德的文本并为之惊叹，那么我们当然会十分满足。这些文章具有一种清新和活力，总会产生弗洛伊德其他著作带来的同样效果。他的个性有时会以如此直接的方式在其中显露出来，使人不可能认不出他，就像我们在已经评注过的文本里那些最精彩的时刻所见的一样。他给出的梦，其缘由和动机都很简明，加上语调坦率，这本身就已经是一堂课。他以从容自如的方式处理所有应当遵守的实践规则；回到这些段落绝不会有坏处，因为它们让我们看见：对弗洛伊德而言，这里所涉及的是一件工具，正如人们说把锤子稳稳握在手中。他说：

“对我来说，它在手里很顺；但我之所以这样告诉你们，是因为我惯常就是这样握它。别人也许更喜欢一件稍有不同、更加称手的工具。”

你们会看到一些说得非常清楚的段落，甚至比我用这种比喻形式讲得还要清楚。形式化技术规则这个问题，在这些文章中得到了一种自由的处理；仅此一点无疑就构成了一项教导，甚至已经足够，并且使人初读“技术著作”便能得到收获与回报。直接阅读这些文章，是最有益、最能使人摆脱束缚的事情：若干完全具有工具性质的实践规则第一次在其中被提出；而最能表明问题其实在别处的，也正是这一点。

不过，弗洛伊德思想之真理所经由的道路，如果可以这样说，并不只以这种方式传给我们。还可以加上它的另一个面向；这个面向显现在若干或许退居其次、却非常醒目的段落中：

- 那就是这个人格所带有的“痛苦”性质，以及他对权威之必要性的感受；这无疑伴随着一种根本性的低估，即低估一个有所传授、有所教导的人能够从追随者和听众那里期待什么。

- 在许多地方，都显出他对事物会怎样被运用、被理解的一种深刻不信任。你们甚至会看到，我认为并不难从中找到他对当时世界提供给他的那份人类材料所怀有的一种格外强烈的贬抑。

这当然也让我们得以瞥见：为什么弗洛伊德会在自己的写作风格之外，以具体而实际的方式运用其权威的分量；面对实际出现的各类偏离，他为何会如此强硬地加以排斥；同时，对于围绕他而组织起来的这项教导之传递方式，他又为何采取命令性的态度。

这只是阅读能够向我们揭示之物的一瞥。问题在于：我们是否只考察这些，只考察弗洛伊德在技术传递问题上的行动和在场所具有的历史面向，并仅限于此？不！我认为这不可能。尽管这种考察毕竟有趣，能够激发人，也令人愉快、放松，但若仅止于此，终究不会产生多少作用。

你们知道，我始终是根据当下问题、根据〔……〕可能具有的意义来进行评注，也就是追问：

“当我们进行分析时，我们究竟在做什么？”

直到现在，我正是这样带来对弗洛伊德的评注；我看不出为什么我们不能以同样的方式和精神，围绕这一小组文章继续考察。

现在，让我们从技术的当前状况出发，从人们关于分析技术所说、所写、所做的事情出发。我不知道你们大多数人——至少有一部分人，我希望如此——是否已经清楚意识到这一点：眼下世界各地的分析实践者——我说的是现在，是刚刚到来的全新一年1954年——对于自己的技术究竟怎样思考、怎样表达、怎样构想，情况已经到了称为“最根本的混乱”也毫不夸张的地步。

事实上，我断定：在当今的分析家中——而且只算那些会思考的分析家，这已经缩小了范围——归根到底，可能没有任何一个人对于我们做什么、瞄准什么、获得什么、问题究竟是什么，同他随便哪位同时代人或邻近同行抱有完全相同的看法。米歇尔·卡昂，您不同意吗？

这种情况甚至到了这样的程度：我们不妨玩个小游戏，把表述出来的各种构想中最极端的那些放到一起；这样便会看见，它们最终形成了

严格相互矛盾的表述，而且根本不必到远处去寻找。我们不会去找那些以悖论为乐的人——一般来说，这种人也没有那么多。问题足够重大、足够严肃，各位理论家在处理它时，并没有追求奇想的愿望。

一般而言，这类围绕治疗结果、结果形式、治疗程序及取得结果之途径所作的苦心论述，也全无幽默可言。每个人都紧抓弗洛伊德本人某一部分理论阐发的栏杆、这道“护栏”。正是它保证每个人还同自己的同行和同事保持联系。借助这种中介，借助弗洛伊德式语言的中介，实践者之间的沟通才得以维持；这些实践者显然对于自身治疗行动抱有颇为不同的构想，甚至对于精神分析这种人际关系的一般形式也看法各异。

我说“人际关系”时，你们已经看到，我把问题放到了它目前抵达的位置。显然，为了重新找到一个支点、一个符合具体经验的阐发层面，现代学说已经踏上了考察“分析家”与“被分析者”关系这条道路。自弗洛伊德去世以来，各种发展所进入的方向中，这无疑是最富成果的一条。

例如，巴林特先生把这称为创造一种“双体心理学”（two bodies psychology）。不过这个名称并非出自他本人，而是从已故的里克曼那里借来的；自弗洛伊德去世以后，在分析界里，里克曼是少数具有一点理论原创性的人之一。

相关知识卡 **里克曼与“两人心理学”**

我们必须考虑这种表述问题的方式。你们可以看到，围绕它很容易把有关“客体关系”、反转移重要性的全部研究，以及若干相关术语组织

起来；其中居于首位的是“幻想”的作用，也就是被分析者与分析家之间想象性的相互反应。

这是否意味着，我们由此走上了一条真正能够正确定位问题的道路？一方面，是；另一方面，不是。推进这种研究大有益处，因为它明确标出了我们所处理的东西相对于“单体心理学”、相对于通常那种建构式心理学的独特性。

一开始就必须以某种方式标明：凡是我们能够在分析表达中阐发的东西，都在别处构成，也就是在某种特定关系中构成。只说这里涉及两个个体之间的关系，够不够？我认为，问题中尚未得到充分深究的一部分正藏在这里。我们也正是在这里，可以看出当前对技术的理论表述陷入了哪些死路。

眼下我还不能多说。不过，在座各位若熟悉这个研讨班，应该已经听懂了：如果不让第三个要素介入，就不存在“双体心理学”。关于这个第三要素，我已经用“言说本身的象征关系”这一形式，向你们展示过它的一个阶段；这里要把言说本身当作中心点，用以组织分析经验的各种透视、观点与统觉。也就是说，分析经验只有在一种三方关系中——而不是二人关系中——才能得到完整、充分的表述。

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在另一种域中表达它的片段、部分或重要侧面，尤其是在一个标示出〔……〕的域中表达。但我想把以下判断作为我们展开讨论的前提：要理解并定位各种“分析关系”表述会遭遇何种困难，这里正有一个最重要、最有待澄清的点。那些表述本来就各不相同，原因也不难理解。

如果“分析关系”的基础确实可以被我们表象为三元结构，那么，在这个“三元组”的三个要素中就会有好几种选择方式。人们可以分别强调三元组内部建立起来的三种关系。你们会看到，这将成为一种非常实用的方式，用来归类关于分析技术的若干理论阐发。目前这一切也许显得有些抽象；今天我无法再做得更多、更好。

无论如何，为了把你们引入这场讨论，我现在想说得更具体些、更贴近实践现场些。刚才我谈到弗洛伊德那里的“萌芽经验”。我会在这里快速重提这项经验，因为它归根到底曾是我们上季度最后几课的部分主题；当时的全部讨论都围绕一个观念组织并集中起来：对主体历史的完整重建，是分析进展的本质性、构成性和结构性要素。

我想，我已经向你们表明，弗洛伊德正是从这里出发；每当他把握一个独特个案时，问题都在这里——

正是这一点构成分析的价值，构成五大精神分析个案各自的价值；

我们已经一起阅读、阐发、研究过其中三个，它们都向你们证明了这一点——

——真正的本质、弗洛伊德的进展与发现，就在于以个案的独特性来把握它。

那么，以个案的独特性来把握它，是什么意思？其本质含义是：对弗洛伊德而言，分析的关切、本质、基础和固有维度，在于“主体重新整合自己的历史”，一直达到这段历史最远的可感界限；

也就是说，一直抵达“远远超出个体界限的某种东西”。这一点可以由弗洛伊德文本中成千上万的地方奠定、推导和证明；过去几年里，我

们一直在共同做这件事。如果你们愿意，这一点首先以若干特征呈现出来：弗洛伊德在某些要点上加以强调，而技术必须征服这些要点。我暂且把它们称为“历史的处境”；但在最初表象中，它会显得像是把重音放在过去。当然，我已经向你们表明，事情并不简单：历史并不是过去；历史是在当下被历史化的过去，而它之所以在当下被历史化，是因为它曾在过去被经历。

我想指出：在技术中，通达主体历史之重新整合和复原的道路与手段，会采取一种寻求复原过去的形式。人们把这项复原当作瞄准点、实质结果和研究重心，并通过“若干技术路径”加以追求。非常重要的是，要看见——而你们也会看见——

我要说，你们会看到这一点贯穿弗洛伊德全部著作，也就是我曾向你们指出其中技术性提示的那些著作，

尤其贯穿我刚才谈到的“技术著作”——

——你们会看到，对弗洛伊德而言，这一点始终处于、直至最后都处于他关切的最前列。

正因为把重音放在这种“过去的复原”上，一系列严格说来由弗洛伊德的发现开启的问题才围绕它提出。这些问题不亚于那些至今一直遭到回避、没有在分析内部得到处理的问题，也就是“时间的各种功能如何参与人的主体之实现”。

我们越是返回弗洛伊德经验的“起源”——我说“起源”，不是指历史起点，而是指源头——就越能意识到：尽管人们为分析披上了极不相同的外衣，始终让分析保持生命的正是这一点。同时我们也越能看见：

必须提出这个问题——这种过去的复原对于人的主体意味着什么？这里，我是在分析经验那种偏重过去的意义上，强调“过去”；而弗洛伊德一再把重音放在这种过去的复原上。

即使弗洛伊德借助三种心理机构——你们会看到，甚至可以说是四种——大幅发展了结构观点，即使他由此推动分析走向某种取向，使技术越来越倾向于探测当下的现实关系，探测分析会谈自身内部的关系——无论把它看作一次单独的会谈，还是反复进行的会谈——并探测分析四壁之内构成治疗过程的一连串“经验”；即便如此，过去的复原仍未离开他的关注中心。

为了支持我正在向你们说明的判断——弗洛伊德始终保持着对分析经验的这一强调和取向——我只须提起他大约在1937年发表的一篇文章，即《分析中的建构》[注5]；那里仍然、始终谈的是重建主体的历史。

> [注5]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分析中的建构》，载《结果、观念、问题》第二卷，法国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69页。

再没有什么例子能更鲜明地显示，这个核心的枢轴观点从头到尾持续贯穿弗洛伊德的著作。弗洛伊德在这篇文章中对这个主题的坚持，几乎构成了最后一次“重新坚持”。这篇文章可以被视为一部像《狼人》这样居于核心位置的著作所始终置于问题中的东西之摘录、尖端与最后一句话，也就是：“从主体过去重建出来的东西，价值何在？”到了这个时刻，可以说弗洛伊德抵达了一个观念——在他的作品中许多其他地方，我们也能非常清楚地感觉到这一点；这个观念已经在我们上季度最后几次讨论中浮现出来，大致如下：归根到底，弗洛伊德告诉

我们，主体以这个词的直观意义“重新经历、重新记起”那些塑造其存在的事件，这件事本身并没有那么重要。他有一些极为醒目的表述：

“毕竟，”弗洛伊德写道，“Träume，梦，ist auch erinnern，也还是一种回忆方式。”〔“毕竟，做梦也是一种记忆，尽管是在夜间与梦形成的条件下。”《狼人》，第6节〕

但这里说的是梦本身。关于这个问题，他还写过许多其他话。他甚至说：毕竟，“屏幕记忆”本身就是我们所处理之物的一种完全令人满意的代表。这不是说，它们作为记忆并以其显在形式出现时已经是令人满意的代表；而是说，经过充分阐发，它们会给出我们所寻找之物的完全等价物。

你们看到我们在这里抵达哪一点了吗？在弗洛伊德本人的思想和构想中，我们归根到底抵达了这样一个观念：问题在于对一份“密码文”作合格而有经验的阅读。这份密码文，就是主体当前在意识中拥有的东西——我正要说，是关于他自己的！不，不只关于他自己，而是关于他自己和一切；也就是说，问题在于他的整个系统得到“恰当翻译”。

这正是我们在主体完整性的这种复原中所读到的东西；我刚才说过，它在起初呈现为一种“过去的恢复”，而后来我们意识到：弗洛伊德虽然从未失去“重建”这一理想——

——因为直到最后，他使用的仍是这个词——但重音更多落在“重建”这个面向，而不是落在重新经历、重新鲜活起来的面向。人们通常习惯用“情感性的”来指称后一个面向：在一种可被视为重新整合理想的状态中，主体记起某段经验，认为它确实属于自己，确实由自己经历过；主体重新与它沟通，并接纳它。

无论如何，弗洛伊德的文本最明确地承认：后者并不是本质。你们可以看到，这里有某种非常值得注意的东西；如果我们至少没有察觉它在我试图让你们理解并加以推进的这个域中可能取得的意义，它就会显得悖谬。这个域对理解我们的经验至关重要，就是“言说本身”的域。归根到底，问题与其说是重新记起历史，不如说是“重新书写”历史。

我此刻正在向你们讲的是弗洛伊德文本中存在的东西。哪怕只为了区分不同事物，这一点也非常重要。这不意味着他就是对的；但可以确定的是，这条线索始终作为底层经纬，持续贯穿他思想的发展。他从未放弃某种只能用我刚才所说的方式来表述的东西，那是一个公式：“重新书写”历史。这个公式使我们能够判断、定位他针对那些在他看来只是分析细节的问题所提出的各种表述。你们知道，我可以把完全不同的分析经验构想拿来同它对照。为此根本不必寻找极端主义者。

例如，有人把分析变成一种可以说是“顺势疗法式的释放”：在当前经验内部、分析场域之中，也就是在分析家的办公室、会客室或诊室里，对某种在幻想层面把握世界的方式作小剂量释放；而这种方式应当在这场“当前的”“实际的”经验中逐渐减弱、转化、取得平衡，进而同“现实”建立某种关系。你们很清楚，在这里，重音被放在了完全不同的地方。

这里的重音，是从一种幻想关系转向一种不再深究、只加引号称作“现实”的关系。我可以给你们举出成千上万的书面例子；它们出自我已经在这里提过的一个人，此人曾写过分析技术，并就此作出表述。那些表述当然不只是僵硬、封闭；它们确有层次，尽力容纳表达的多样性和复数性，可归根到底仍然归结到这里。

这还会造成一些奇特后果；评注这些文本时，我们有机会再提到它们，而且还不只这些后果。事实上，在我们将要尝试的把握过程中，有一个问题会不断作为根本问题出现：弗洛伊德留给我们的那项分析实践之根本制度，如何由于某种偏向、某个斜坡，最终变成了一门技术，变成了按照我刚才所说的方向对分析家—被分析者关系进行的某种操控。

我们将会看到，有一个概念在这项转变中绝对居于中心：那就是弗洛伊德在“技术著作”之后紧接着的时期里引入的各项概念，后来怎样被理解、接受、采纳和运用。这里确切指“三种心理机构”，尤其是三者中从此取得首要地位的那一个——不是别的，正是“自我”（ego）。此后，分析技术的全部发展实际上都围绕自我概念旋转；而这种实践发展给理论阐发造成的所有困难，也都围绕它而定位。

在那个宛如洞穴的地方，病人对我们说话，我们也偶尔对他说话；我们在那里实际所做的事情，同我们为它提供的理论阐发之间，确实隔着一个世界。即使在弗洛伊德那里，这道距离已经小得多，我们仍然感到二者之间有一道间隔。

当然，并不只有我提出过这个问题：弗洛伊德实际上做了什么？别人不仅问过这个问题——这样说还远远不够——而且还把自己正在提问这件事写了下来。像贝格勒这样的人就在白纸黑字上提出问题，并且说，归根到底，我们对此知道得不多；所知的一切，来自弗洛伊德把自己若干经验的成果也白纸黑字写下时让我们看到的东西，尤其来自他的“五大精神分析个案”。在那里，我们得到了一扇最好的窗口，可以瞥见弗洛伊德怎样行事。

确实，弗洛伊德经验的特征，严格说来似乎无法在其具体实况中复制。理由很简单，而且我已经强调过：同弗洛伊德一起进行的经验具有独特性，因为弗洛伊德——这是整个处境中绝对关键的一点，也是这场经验的本质维度——确实就是开启这条经验道路的人。单是这一点，便赋予了它一种绝对特殊的视角。从病人与弗洛伊德的对话中可以看出这一点：一方面，病人眼中的弗洛伊德处在一个特殊位置；尤其重要的是，弗洛伊德本人对待病人的方式也处在一个特殊位置。归根到底，我们始终能感觉到：对弗洛伊德而言，病人只是在他独自前进的道路上提供的一种支撑、一个问题，有时也是一次检验。

仅此一点，便赋予这场经验一种绝对“戏剧性的”面貌——取这个词的严格意义，而且无论你们把“戏剧性”一词推得多远都不为过，因为事情总会一直抵达人类戏剧所产生的东西，也就是每一个个案中的失败——

——弗洛伊德为我们带来的每一个个案都是如此。

对于那些处在追随这些道路之位置的人，问题则完全不同；这些道路是弗洛伊德在贯穿一生的经验中开辟出来的，一直通到某种可以称为“应许之地”的入口。但不能说他已经走了进去。只须阅读真正可以视为他遗嘱的《有终结的分析与无终结的分析》，就会看见：如果弗洛伊德清楚意识到某件事，那就是他并未进入这片“应许之地”。我要说，这篇文章并不适合推荐给随便哪个识字的人——幸好真正会读的人并没有那么多。不过，对那些会读的人而言，只要碰巧还是一名“分析家”，这篇文章就很难消化；如果不是分析家，他根本不会在乎！

因此我要说，对于那些正在追随弗洛伊德道路的人，处境完全不同。我们能够对分析技术提出的一切批评，都只能确切地集中在这个问题上：这些道路怎样被走上、被采纳、被重新理解、被重新思考。换句话说，一项技术中最小的部分、乃至整套技术，只有根据采用它的某位分析家究竟怎样理解根本问题，并且只在这种理解的限度内，才具有或可能具有价值。

换句话说，当我们听见有人把“自我”（ego）说成分析家的“盟友”，而且不仅是盟友，还是“唯一来源”时——人们常常写道：“我们只认识自我”……

- 安娜·弗洛伊德小姐这样写过；在她那里，这句话具有一种不同于她旁边那位作者的意义；
- 费尼切尔先生和〔……〕女士也这样写过；事实上，1920年以来几乎所有关于分析的著述都这样说：
- 我们只同“自我”（moi）说话，
- 我们只同“自我”进行沟通，
- 一切都必须经过“自我”。

可在另一方面，围绕这套“自我心理学”提出的全部发展，大致可以概括成一句话：“自我完全像一个症状那样被结构化。”也就是说，在主体内部，自我只不过是一个享有特权的“症状”；它是最典型的人的“症状”，是人的精神疾病。我认为，用这种迅速、简略的方式来转述分析

中的“自我”，最能概括直接阅读安娜・弗洛伊德《自我与防御机制》最终得到的东西。

相关知识卡 安娜・弗洛伊德

你们不可能不被这一点触动：“自我”在整个主体中完全像一个“症状”那样被建构、被定位，没有任何东西把它同症状区分开来。人们无法对这项格外耀眼的论证提出任何“反对”。同样耀眼的是，事情已经混乱到这种程度：构成自我这一特殊位置的“防御机制”被排成一份又一份清单，而这份“目录”是人们所能设想的最异质的清单之一。安娜・弗洛伊德本人已经强调这一点，而且说得很清楚：

“把压抑同本能反转而对准其对象、或者同本能目的的倒转等概念放在一起，就是把彼此完全不具同质性的要素并列起来。”[注]

> [注] 本项目底本及可核对的其他法文转录均作 contre son objet（“对准其对象”）；这一表述不同于通常所说的 retournement sur la personne propre / contre soi-même（转向自身）。译文保留底本，不依术语惯例静默改写。

必须承认，处在目前这一步，我们也许无法做得更好；这只是一个插话。重要的是看见分析家对“自我”（ego）抱有的这种深刻歧义：

- “自我”是我们所能抵达的一切，
- “自我”又是一种绊脚石、一项“失误行为”、一次“口误”。

费尼切尔在论分析解释的各章开头，像所有人一样谈到“自我”（ego），并且觉得有必要说：自我具有这样一种本质功能——“主体”经由它学习词语的意义。也就是说，他从第一行起就把自我放在主体的核心。问题全在这里！关键在于：ego 这一称谓的意义是否超出法语

moi，还是说，学习词义确实是 ego 的一种功能。如果这是 ego 的功能，那么费尼切尔随后给出的全部发展就完全无法理解。不过，他并没有坚持这句话。

我说这是一次“口误”，因为它没有得到展开，而他展开的一切都在说相反的东西，最终甚至告诉我们：归根到底，“本我”（Ça）与“自我”（ego）完全是同一回事。这当然“不会让”整个问题“变得更清楚”。但我要再说一遍：要么后续发展根本无法思考，要么那句话并不是真的。

我们必须弄清：“自我”是什么？“主体”被卷入什么？这除了词语的意义，还包括完全不同的东西：语言在主体历史中所发挥的根本塑造作用。由此，我们不得不告诉自己：围绕弗洛伊德的“技术著作”，我们必须提出一系列影响深远的问题。当然，前提首先是从我们每个人自己的经验出发，同时也从我们尝试彼此沟通所借助的东西出发——

——从理论与技术的当前状态出发，追问：弗洛伊德当时带来的东西里，已经包含、已经暗含了什么？

什么已经朝向我们在实践中抵达的那些公式？我们今天看待事物的方式中，是否发生了某种收窄？或者相反，此后究竟出现了什么、实现了什么，使我们走向一种更严密、更符合现实的系统化，走向一种扩展？我们的评论只有在这个域中——恰恰只能在这个域中——才能取得意义。

为了让你们更确切地了解我设想怎样进行这项考察，我要告诉你们：在我上季度最后几课的结尾，你们已经见到我所提示的一种开端，即某种东西开始变得可读；这东西可以称为“精神分析神话”。这种可读

性与其说通向一场批判，不如说是为了衡量它所面对的现实究竟有多广阔——因为在它无法不作回答的整个范围内，它只能给出一种“神话式的”回答。

也就是说，我们要作一种更广阔、尽可能广阔的把握，从正面衡量精神分析面对这个 x 所取得的“理论征服”。这个 x 根本没有被给定为一个〔……〕的 x，也没有被给定为一个封闭的 x；它完全可以是一个开放的 x，其名称就是“人”。可是，当问题涉及技术时，对我们而言就更有限，也许有所不同，并且远为紧迫。因为我要说，我们对一切属于自身技术秩序之物所能进行、也必须进行的考察，恰恰要接受我们自身分析纪律的审查。我的意思是：

- 主体的行为举止，同他围绕这些行为带到会谈中告诉我们的东西，相距多远；

- 我们在分析会谈中的具体行为，同我们为这些行为提供的理论阐发，也相距同样远。

不过，我刚才所说的距离只是一项初步真理；它的意义、价值和效力，都取决于它能否翻转过来，同时意味着：“二者也同样接近。”也就是说：

- 正如主体的具体行动之所以能够成为具体的、可感的行动——让我们把话说得更尖锐些：人际行为根本上的荒谬之所以能够得到理解——只能借助这个“系统”；梅兰妮·克莱因女士照例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却很幸运地这样称呼了它。这个“系统”就是人的“自我”，

也就是最终为主体定向、支配主体的这一整套防御、否认、阻隔、抑制和根本幻想；

- 完全以同样的方式，我们对自身技术的理论构想即使不同自己面对病人时的实际所为完全重合，也依然会深刻构造并推动我们对这些病人作出的每一个最细微的介入。

事情的严重性正在这里。当然，仅仅“知道”并不够：并不是说我们只要抱有某种“自我”观念，我们自己的“自我”就会像犀牛闯进瓷器店一样介入我们同病人的关系；事情没有这么简单。但我们以某种方式构想病人在分析中的自我功能，同我们实际上以一种反向方式允许自己的自我介入分析，二者之间仍存在某种关系——我这里只提出问题，解决它要靠我们的工作与考察。我们当然是在“允许”自己的自我介入；而且正如分析向我们揭示的，我们允许自己做许多事情时，都是“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然而，我们确实允许自己的自我介入分析。这一点终究值得关注，因为分析如此强调对现实的重新适应，我们毕竟必须弄清：难道是分析家的自我尺度，给出了现实的尺度？

技术理论的问题同样很有意思。无论分析家怎样处理我们每个人的整套世界系统，他的行动都会同它有关。我说的是那套具体的系统：它无须经过我们事先表述便已存在；它不属于无意识的秩序，却在我们日常表达自己的每一种细微方式中、在我们话语每一点自发性中发挥作用。这套系统究竟会不会在分析中充当尺度？

我想，今天已经把问题充分打开，使你们现在能够看见我们共同工作的意义。

我希望你们中有几个人——曼诺尼，您别走——愿意同邻座结成一组，例如同安齐厄一起，研究你们能够找到的弗洛伊德著作中的“阻抗”概念。

请研究法国大学出版社以《精神分析技术》为题结集的“技术著作”，也不要忽略以《精神分析引论》为题出版的后续讲座。

另外两位——佩里耶与格拉诺夫——也愿意围绕同一主题组成一组吗？

我们会看看怎样进行；就让经验本身引导我们。

第3课 · 1954年1月20日

曼诺尼　安齐厄

拉康

谁研究了“阻抗”概念——既考察它怎样包含在弗洛伊德“技术著作”这一组文章中，也考察后来的著作？谁先发言？

奥克塔夫·曼诺尼

我想是我。我只能通过电话同安齐厄合作。我们讨论过是否应由他先讲，因为他会从开头讲起，也就是从《癔症研究》讲起；还是由我先讲更好，因为我做的更像一幅地理图。

我把这项工作说成“考察阻抗之国”。这样一来，我们先看地理面貌，再看历史发展。我主要研究了1904年至1918年的文本，其中包括结集于《精神分析技术》的文章，也包括《精神分析引论》第十九讲。这一讲明确以阻抗为主题。那些文章虽不专门讨论阻抗，却始终涉及它，其中有大约六十处重要引文。

弗洛伊德最初把治疗构想为建立在基本规则之上；阻抗就是他在这种治疗中遇到的障碍。阻抗的这一面向，在分析关系中呈现为一种人际现象；这个观点此后从未被放弃。

拉康

来吧，格拉诺夫，到这里来作笔记；如果有哪里不同意，您随后再讲。

奥克塔夫·曼诺尼

弗洛伊德最先提到的是人际面向：阻抗出现在两个人之间，构成沟通的障碍。紧接着又出现了其他特殊面向。他发现，阻抗不只是障碍，也是分析研究的对象，可以就其本身加以研究；神经症的秘密就在其中。从1904年到1918年，对阻抗的分析构成技术关切的中心。可以说，这里启动了一项极为重要的发展，因为二十年以后，这种阻抗分析将变成“对自我的分析”。

我会在1910年停下来，但也要指出：1920年出现了卡尔·亚伯拉罕的重要贡献；到了弗洛伊德写作的末期，1935年又有《有终结的分析与无终结的分析》，还有《论文选集》倒数第二篇未完成的文章《自我裂分》。当时弗洛伊德尚未说出决定性结论，但已经即将得出它们。

我把这称为一项“发展”，因为1938年出现的一切，甚至弗洛伊德在1938年以后留下的遗产，都已在1904年、或许更早的时候得到清楚指示，以萌芽形式呈现出来。从临床观点看，阻抗被构想为两个人之间的障碍。弗洛伊德把一切妨碍治疗的东西都认作阻抗。

这一点见第119页。先说明一下，《精神分析技术》[注1]共有140页。《精神分析引论》第十九讲从第310页开始。前面标出的页码指向这第十九讲：从临床面向看，阻抗是主体与分析家之间的障碍。

> [注1]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技术》，法国大学出版社，1953年。

“主体利用每一个机会逃开分析家。这些机会揭示了主体自己没有认识到的一项意图。分析家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同这项意图斗争。”

我想，安齐厄对此有些话要说。弗洛伊德最初的态度，是让主体同阻抗展开斗争。弗洛伊德知道，是分析家引发了阻抗：“基本规则的第一个效果，就是使主体哑口无言……”不过，他也强调：这样做只是让潜在阻抗显现出来。由此，人们便可能把各种阻抗构想成一种结构。

拉康——您说得对。您确切参照的是哪篇文本?

奥克塔夫·曼诺尼

第46页和第314页。我们会觉得，弗洛伊德面对阻抗时的态度必定颇具挑衅性，而且兴致勃勃地寻找阻抗。我认为，我们今天的态度虽然表面上不同，显然还是一样；本质并未改变。分析家即使克制而沉默，他的在场也会立刻召来阻抗——或许不会立刻造成同一种沉默，却会使阻抗显现。

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让工作成为可能，也必须克服阻抗；而且必须分析阻抗，理由有二：这是克服它的最佳手段，而且其中包含神经症的秘密。早在1904年，他就写道（第15页）：

“唯有阻抗现象，才使主体的行为得到理解。”

这段引言以后，我准备换一种方式来呈现问题；不过我要谨慎说明：我会暂时撇开一个重要面向，即转移。转移已经包含在临床面向中，但我准备另行讨论。若先不考虑转移，情况如下：乍看之下，“阻抗”观念同“压抑”观念重合。第4页一开始就说：

“压抑从根本上属于局部论层面。治疗的目标，是把遭压抑之物从一个地点运送到另一个地点——从无意识运送到意识——而各种阻抗妨碍这项运送。人们本可以认为，避开这个障碍较为有利。我以前就是这样做的；但这种方法失败了，因为实施压抑的力量只是暂时转向，却仍然存在，所以必须把它们当作障碍来处理。”

于是，我们离开局部论层面，同弗洛伊德一起进入动力层面。他同时劝病人（第111页），不要再把自己的疾病看作某种可鄙之物，而要把它视为同自己相称的对手，视为一处源泉，从中可以找到对日后生活具有珍贵价值的材料。

“他承认，阻抗值得关注，而且是珍贵信息的来源。”

要这样看待问题，他并不需要一套新理论：

“压抑是对抗力量作用的结果；分析阻抗，会让我们了解这些力量、因而也了解主体的状态。”

我想在这里开启一条线索。我想指出：在对身患疾病、亦即带有阻抗的对手所怀的这份尊重中，转移的特征以隐蔽方式在场，甚至涉及反转移。不过，以这种形式出现时，转移面向仍然在理论之外，仍然只是临床性的。我们将会看到，试图标明它们时会发生什么。

如果我敢于离开自己的主题，投身于这个问题，这里还可以展开一整套论述：有一种无法抵抗的努力或诱惑，总想把个人性的东西重新引入非个人性的层面。下列作者正是这样做的：

- 亚伯拉罕提出“内摄观念”，
- 荣格提出“意象”（imago），
- 梅兰妮·克莱因此后也会这样做。不过我继续讲……

这个动力阶段通向一个结构阶段。结构状态曾长期停留在草图和潜在状态。1894年，弗洛伊德把“症状”称为“防御性神经精神病”；他认为，症状由主体意识中的断裂引发，并以主体自身没有认识到的意图这一假设来解释这些断裂。

当时，催眠被用来压抑这些“未被认识的意图”，也就是压抑这些阻抗。我想，安齐厄会向你们讲这个面向。

我刚才所说的内容，可以在《论文选集》第一卷关于“防御性神经精神病”的首篇文章，以及弗洛伊德倒数第二篇关于“自我裂分”的文章中找到。弗洛伊德始终忠于这些分隔。

“然而，不分析阻抗的分析本身，也在帮助压抑阻抗。”

但其中有一条连续性（第13页）：

“分析一项阻抗，始终仍然意味着消除它、把它从道路上移开；即使人们把阻抗当作对象……”

阻抗似乎始终带着不受欢迎的性质。我认为，围绕这一点也可以作些评论。现在回到那些能够把我们引向结构构想的东西。1918年，他写道：

“神经症者带给我们的，是一个被各种阻抗撕碎、割裂的心理装置。”

我们很难设想，在各个心理机构之间、在“自我”的不同层面之间会有撕裂和裂缝。他接着写道（第134页）：

“当我们消除阻抗时，就会看见这个心理装置协调起来，而我们称为自我的那个巨大统一体，则把一切本能性冲动聚合到自身。”

“本能性冲动”这个说法，标示出一项从“本我”那里收复领地的工作，也就是“须德海”式的围垦工作[注]。〔参见：“Wo Es war, soll Ich werden。”〕我们不得不从“当前自我”的观点来看待这项工作和这些裂缝；即使不这样，至少也必须从“潜在自我”的观点来考察——这个潜在自我将把本我的碎片、也就是那些未来的自我聚合到自身，由此逐渐形成。这里已经萌生出后来巴林特所谓“自我诸核心”的观念，也萌生出弗洛伊德几乎未加论证便提出的阻抗概念；结构构想随后将占据的正是这个位置。在安娜·弗洛伊德的书中，自我的各种防御始终都是针对本我的。

> [注] “须德海工程”通过筑坝和围垦从海中取得陆地。这里以围垦比喻自我从本我处取得领域，并同弗洛伊德的命题 Wo Es war, soll Ich werden 相呼应。

相关知识卡 Wo Es war，soll Ich werden 的译法与伦理读法

如果阅读《有终结的分析与无终结的分析》中涉及这些问题的段落，开头是：

“这些并不是把自我的一部分同自我的其他部分隔开的障碍。”

然而，远在我们能够说出——我自己都不敢说——“阻抗就是自我”以前，而且我也不知道我们的老师会怎样看这句话，弗洛伊德已经说过：

“阻抗就是转移。”

重新引入转移概念时，我觉得自己仿佛把它重新带进了元心理学的“瓷器店”。我们必须向后退，回到临床考察的人际场域。问题可以这样提出：如果是作为“自然人”——过去人们这样说——的病人在阻抗分析家，如果他以自己的意图为名，并且可以说动用一切手段——

就像面对墨涅拉俄斯的普罗透斯一样，时而假装痊愈，时而假装彻底愚钝——

——分析家似乎只能在两种策略之间选择：

- 或者像墨涅拉俄斯那样，遵从那位宁芙的建议，也就是：牢牢抓住！弗洛伊德（第97页）主张采用这个办法：“接受挑战、坚持到底”，不断确认这是一项阻抗，并为自己打气。

- 另一种办法，是让主体用“善意”替代这项“阻抗”，也就是——人们也许会这样理解——利用正转移。

这种善意非常有用，以至于弗洛伊德建议：只要转移尚未变成阻抗，就永远不要去触动它（第99页）：

“转移必然会转变成阻抗，而最令人畏惧的阻抗，正是由转移提供的。”

但不要以为，转移只有变成负转移时才会成为阻抗；我们知道，正转移也可能延误分析的结束。弗洛伊德的天才似乎主要在临床领域得到发展。

这是一个他无法直接探索的领域。他必须一边前进，一边锻造自己的理论工具：

“没有元心理学的思辨，我们一步也走不了。”他又补上一句：“我几乎要说，没有元心理学的幻想，我们一步也走不了。”

他正是这样做的：他建构了一套理论，解释转移怎样就是阻抗。我不准备进入所有细节。我会撇开经济论面向；在那里，力比多分成两部分，发生冲突又形成妥协，随后像分娩一样从转移这一端显现出来；主体之所以采纳它，是因为它满足阻抗。我只取其核心：在行为中发挥作用的是重复式转移，而分析的目标则是唤起记忆，“不越出心理范围”。我认为他的意思是：不要越出自我中同另一部分相对立的那一部分；另一部分或许根本不是自我的一部分，而是行为和行动。应当这样理解。

我不能确定，弗洛伊德是否已经放弃分析最初的目标：战胜阻抗、战胜癔症。转移是这些阻抗之一。因此，在这样一套理论中，转移——作为阻抗的转移——可以说是原初阻抗的一项次生效应。这种转移是一种追忆，却不是人们期待病人给出的那种记忆，因为记忆会治愈症状：

“如果它没有转变成记忆，它就会作为阻抗存在。因为它在从无意识通往意识的道路上停了下来。”

于是，弗洛伊德又回到了他那幸福的元心理学。障碍再次位于“较少意识”与“较多意识”之间。他便可以在那里安置“安培小人”[注]：由这个小人决定是否为遭压抑的表象开门。弗洛伊德又说：

> [注] “安培小人”原是电磁学中用拟人姿势判断电流与磁场方向的助记形象。这里把它借作在意识与无意识之间开关门户的拟人化守门者；译文保留讲者的比喻。

“这只是一项虚构。”他马上又补充：“但它对事物的实际状态给出了非常近似的观念。”

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解释清楚了，或者是否应当重新说明以下转变是怎样发生的：

- 从一个临床事实，也就是“两个人之间”的转移，
- 转向一种元心理学的转移；在那里不再有人，只有“安培小人”，而他解释着人际事件与事实。阻抗则变成了压抑这一机制的一种阀门。

不过在我看来，元心理学中支配未来发展的重大发现，正在于“转移就是阻抗”——不是负转移才是阻抗；这才是关键发现。

如果考察事情怎样发展，就会看见有某种压力施加作用，促使人们去考虑真正的人，而不是安培小人。归根到底，我刚才借亚伯拉罕、荣格和梅兰妮・克莱因所暗指的，正是把“人的因素”重新引入。

但这已经在弗洛伊德那里萌芽：在第27至314页之间，弗洛伊德会在一段阐发中突然停下来，说："阻抗——可这就是父亲！"这句话进入元心理学，就像来自另一颗行星的东西，像另一块临床材料。你们可以看见，局部论与阻抗动力学之间曾经存在一条非常真实的元心理学连续线：结构性的面向——防御……

但只要重新引入具体人物，或者让自己受到亚伯拉罕、梅兰妮·克莱因、甚至弗洛伊德的影响，在这些非个人性概念中间，人们就会忍不住谈论〔……〕；这便"不大协调"。我想，这里有一个〔……〕的点。

这份报告并不按年代顺序展开……

- "同一些概念"会在"不同时期"重新出现，
- "临床"面向并不先于"对自我的分析"；后者从一开始就已萌芽，但其中仍有一种年代顺序……
- 它不是弗洛伊德各项发现的年代顺序，
- 而更像他的教学被接受的年代顺序，也就是评论者和弟子以不同方式理解弗洛伊德的年代顺序；弗洛伊德自己也知道这一点。

《论文选集》倒数第二篇文章题为《自我裂分》（第五卷），开头有一句很不寻常的话。

拉康——这篇文章是在弗洛伊德去世后发表的。

奥克塔夫·曼诺尼

“今天我发现自己处在一个有趣的情形中：我不知道自己要说的东西，应当被看作不言自明、早已为人熟悉，还是相反，应被视为某种全新而令人困惑的东西。”

〔英文原文：I find myself for a moment in the interesting position of not knowing whether what I have to say should be regarded as something long familiar and obvious or as something entirely new and puzzling. 《论文选集》，霍加斯出版社，1957年，第372页。〕

我确实认为，“自我裂分”已经萌芽于1894年的构想中，当时它表现为主体意识内部缺乏自由、表现为一种“内部阻抗”。然而到了1938年，这个表达仍然可能显得完全新颖。

我想冒昧说一下自己的个人印象：

- 无论怎样处理，“阻抗终究仍然”是人际语境中“沟通的障碍”；
- 归根到底，它最终也正是在同一语境中得到理解，也就是说被沟通出来；这正如人们所说的那样限制了它。

可是，从第一种处境——阻抗是障碍——通向第二种处境——阻抗得到认识并转变成沟通——需要经过一条辩证的迂回；这条迂回使“阻抗”成为“自我结构之重复”的辩证机制。于是便出现一项“无意义”：我们很容易理解，主体不愿或不能服从规则；但我们无法理解，他既愿意服从却又不能服从。全部元心理学工作都进入这个空隙之中，以便阐发这项“无意义”。

换句话说，令我有些不安的是：弗洛伊德始终努力用一套人际理论包裹个人关系；但在我看来，这套人际理论本身又被包裹在一种人际辩证法中，而这项辩证法就是弗洛伊德为我们开启的现象学。弗洛伊德死在倒数第二篇文章的写作途中；恰恰在那里，我们感觉他即将把这件事说出来。对我而言，现象学更像一个临床命题，而不是元心理学命题。

拉康

你的倾向显然是现象学的。我想，我们确实应当非常热烈地感谢曼诺尼：在研讨班重新展开对话之际，他作了一个再恰当不过的开场。他刚才所说的内容非常丰富，而且整体上定位得很好。我认为，到最后，他提出的正是我们在评注《技术著作》时必须面对的问题。

我得马上说明，我不认为解决办法完全是他让我们瞥见的那种形式。他自己也相当清楚地感觉到了这一点。至少我并不这样认为。我想，我会给你们一个更复杂的表述；它将使我们更深入地触及当下这个问题的核心，也就是分析技术的取向和分析的意义。

不过，他以这种方式提出问题是很好的：总的说来，就是从一种个人内部机制转向一种人际机制。虽然在这里使用“机制”一词并不算不贴切，但人际机制还不是问题的全部；它要从我们目前所处的位置才获得意义。既然我们着手讨论它，就必须看看怎样才能把它表述出来。

你们两人既然有所合作——不论这种配合多么有限——我不想打断这项配合可能带来的展开。我希望安齐厄也谈谈他这一周的研究把他引向了什么。

迪迪埃·安齐厄

我从阻抗概念的源头去寻找它；我认为这个源头就是《癔症研究》。本来还应当仔细阅读在此之前发表的全部材料。这个问题暂且悬而未决。

提纲：

- 引言：《癔症研究》以前
- 报告主体：《癔症研究》

引言

十九世纪末，催眠让人们认识到了什么？催眠的积极方面又是什么——也就是到当时为止，人们唯一着眼的方面？

1）遗忘可以在催眠状态下得到填补。这是夏尔科的发现。

2）在进行这项工作时，症状会消失。这是布洛伊尔的发现。

3）为什么遗忘一经填补，症状就会消失？因为主体意识到了自己的倾向，也意识到了自己曾怎样激烈地对抗自身的性冲动。这才真正是弗洛伊德的发现。它并不只是补全从夏尔科开始、由布洛伊尔继续的系列；弗洛伊德的根本发现，是催眠的一个消极方面。

这里发生了一种辩证的逆转，它将使人从催眠过渡到精神分析。这个发现就是：催眠固然很好，但有些人不能被催眠。我们由此回到了最具体的现实。

弗洛伊德说：“在这个病例中……它进行得非常顺利，可我从来没有遇到过一个以这种方式奏效的病例。”

他还专门撰文讨论是否应当区分“催眠性滞留癔症”和“防御性癔症”。有些患者不能被催眠。弗洛伊德把这个人所共知、却一直被搁置的事实，同另一个同样为人所知、也同样被视为无关紧要的事实联系起来：另一些患者原本能够被催眠，却不愿意被催眠。我来读一下弗洛伊德的原文：

“于是我想到，这两种情况可能是同一回事，并且在两种情况下，它都只能意味着一种反向意愿。凡是对催眠抱有怀疑的人都无法被催眠；至于他是否把自己的反对表达出来，并无任何区别。至于我能否坚定地认同这一看法，目前还没有完全弄清楚。”

这就是弗洛伊德的第一个直觉，其面貌极其鲜活：不能与不愿意完全是一回事；无论一个人知道还是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不愿意，也完全是一回事。不过，为什么它们是一回事，此时仍十分含混。

以这个直觉为模型，并循着它的结果，弗洛伊德将发现第二个直觉。可是，为此他要做什么？他将贯彻第一个直觉的结论，放弃使用催眠。他转而以宣泄法对待患者，也就是不催眠他们，而是请他们说出：当他们想到自己的症状及其最初起源时，脑海里出现了哪些记忆。于是便有了下面的发现：

“无论使用还是不使用催眠，得到的结果完全相同。”

因此，促成夏尔科和布洛伊尔所揭示的疗效的，并不是催眠本身，而是催眠的使用方式。我再回到弗洛伊德的原文；他将在那里向我们阐明自己的第二个直觉：

“通过这类经验，我形成了这样一种印象：仅仅通过坚持要求……”

他说，只要对主体坚持要求，他们最终总能找到有关的记忆。

“……而不使用催眠，确实可以使一系列致病观念显露出来。但由于这种坚持要求我付出很大努力，它便向我表明，我克服了某种阻抗。于是，我把整个事情表述为如下理论命题：通过我的心理工作，我克服了一种心理力量；在患者身上，正是这种力量阻止致病观念进入意识——

也就是说，阻止它被回忆起来。”

这就是弗洛伊德的第二个直觉：

- 如果我不得不对患者坚持要求，才让他把这段其实近在咫尺的记忆告诉我，
- 如果我不得不坚持，并因此疲惫不堪，
- 如果这对我来说确实是一项艰苦的工作……那么，正是他在阻抗我。链条一经打开，第三个直觉便在同一时刻立刻出现：

“我还没有清楚地认识到它，却想到：这必定正是同一种心理力量——它在起初曾针对癔症症状起作用，而此刻又阻止致病观念进入意识。”

因此，不能被催眠的人和不愿意被催眠的人是同一回事；同样，起初造成症状的力量，也正是在这一关系的此时此地阻止致病观念被回忆起来的力量。至此，直觉的部分已经讲完，下面转向解释。

弗洛伊德问：这种曾经起作用、仍在继续起作用、又被我重新激活的力量究竟是什么？我们可以根据那些被遗忘、被压制的致病观念的性质，来判断这种力量的性质；恰恰借助我的方法，我才得以让这些观念显露出来。观念的性质会让我们认识这种力量的性质。这些观念总是令人痛苦的，并且同责难、精神痛苦和个人所受的伤害等情感相联系。它们具有这样的性质：人宁可没有经历过它们，也更愿意把它们忘掉。

弗洛伊德说：“这一切都通向‘防御’概念，仿佛它是自然而然地浮现在我脑海里……”

随后他解释说，它并非自然而然地来到他脑海里，因为就他所掌握的心理学知识而言，这是一个广为人知的概念。不过，为了说明自己身处其中的这一经验，他又重新找到了它、重新发明了它。因此，主体起初经历了一次痛苦的经验。这一经验的痛苦性质引发了自我的反应——因为正是在这里，而且只到这里，文本中才出现“自我”这个词——也就是自我针对这一痛苦印象进行防御的反应。

弗洛伊德说：“让我们继续作出解释——针对痛苦印象进行防御，还不足以防止它再次出现。”

为了防止这一印象再次出现，主体将建构一个系统，这就是症状的形成：防御获得了一种新的形式，它叫作压抑。弗洛伊德起初对使用“压

抑”一词还有所犹豫。他使用的是排斥、驱逐这些词：排斥、驱逐，或者压抑。只是在后文中，“压抑”这个词才得到最终采用。

现在，医生力图使主体重新记起这个痛苦观念——它先引起自我的防御，继而引起压抑，并被竖立为症状——同一种力量便再次开始运作；但对于作为实验者的我而言，它显现为阻抗。因此，同一个现实可以有三个名称：

- 当这种力量作出反应、同本能冲动斗争时，它就是防御；
- 当它取消对这一冲动的记忆时，它就是压抑；
- 当它反对回忆时，它就是阻抗。

我们发现，曼诺尼刚才预先指出的三个层面，已经铭刻在贝格曼所说的这个“胚芽细胞”之中：

- 结构层面；
- 作为背景的动力层面；
- 现实化的、引人注目的层面，也就是向我显现的阻抗之局部论层面。

这就是第一点：阻抗的发现。第二点：阻抗的处理。十分耐人寻味的是，在《癔症研究》的这段文字中，处理阻抗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得到明确承认、受到推荐的方式；另一种则是仅获半公开承认的方式。

明确的处理方式，是坚持要求主体克服阻抗。而坚持要求又可以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向主体作出保证。主体说：

- “我不知道我的症状起源于什么。”
- “不，你知道，把它说出来吧！”或者采用更为温和的说法：
- “你知道的，它会浮现在你的脑海里，等等看。”

弗洛伊德使用了一个比喻，它见于英文词 struggle（斗争）。遗憾的是，我一直没有多少机会查阅德文原文；不过我认为，所有这些引文都应当重新核对。

拉康

麻烦在于，就安娜·O.的病例而言，我们没有德文原文。安娜·O.的文本竟然只能从美国版中读到，这简直荒唐透顶！

安齐厄

如果在战斗、斗争这个比喻中向主体作出的保证还不够，弗洛伊德就会采用一种技术：把手压在主体的额头上。这是什么意思?

拉康——正是如此！这就是催眠与对话之间的中间阶段，不是吗?

安齐厄

从历史上看，弄清楚这是一个中间阶段，还是他先采用保证、只有在保证不起作用时才……会相当重要。

拉康

他在露西·R.的病例中解释过这一点。正是在只能获得不完全催眠的情况下，他才不再为此烦恼，不再追问究竟是还是不是……他甚至不再按经典方法让主体回答“您睡着了吗？”这个问题，因为令他不快的是，他总会听到这样的回答：“没有，我根本没睡。”

这使他本人陷入极其尴尬的处境。他以一种天真而迷人的方式加以说明，也让实践中的种种歧义显露出来：他不得不说服主体——

- 这不是主体在回答时所说的那种睡眠；
- 他毕竟还是有一点睡着了。

在这种极端含混的边缘，弗洛伊德十分明确地说，这一切令他极为尴尬；直到他不再为此操心的那一天，他才摆脱困境。不过，他保留了用双手施压的做法：或者压在患者额头上，或者压在头部两侧。他向患者说明，要把注意力集中到那个观念上，集中到症状的原因上。当时，症状是逐一得到处理的；每个症状都被直接面对，被当作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

在弗洛伊德双手施压之下，患者得到保证：毫无疑问，接下来浮现的思想和对主体处境中各项因素的记忆，正是问题所在；患者只须相信它们。弗洛伊德还补充了一个技术细节：当他抬起双手时，仿佛以动作演示障碍的解除，患者便会完全清醒；只要抓住脑海里浮现的东西，就可以确信自己已经握住了正确的线头。

仍然颇为引人注目的是，对于弗洛伊德向我们报告的那些病例，这种方法竟被证明完全有效。露西·R.的病例如此精彩——也许他恰好有机会，为什么不呢？用一种简略的方式把它讲给我们——这个病例得到了彻底解决，而且显得轻松自如，具有早期大师作品般的美。

每发现一个新的病例，都会有某种幸运的偶然和诸神的幸运会合，使圆满解决成为可能；这是一个得天独厚的病例。在安娜·O.这样的病例中，我们看到的是漫长的 working through（修通），是对病例的工作，是对各个主题的不断触及。正是这些主题使安娜·O.的病例在某些方面已向我们呈现出……最现代的分析病例所具有的全部生动性和厚度，尽管当时采用的是那种方法：整个事件系列、整段历史都被反复重历和重新阐发。我们看到，这是一项影响深远的工作，而且持续了将近一年。

在露西·R.的病例中，事情进展得快得多。这个病例带有一种优雅，因而成为某种根本的、扣人心弦的东西。甚至可以说，事情被压缩得太紧，以至于我们无法真正看清其中的推动机制；不过，它仍然完全可以供我们使用。

这个女人曾出现嗅幻觉——我们可以这样称呼它——也就是癔症症状；弗洛伊德极其顺利地辨明了这些症状的意义，以及相关的地点和日期。就此，他向我们提供了自己操作方式的全部细节。

〔对安齐厄〕请继续。

迪迪埃·安齐厄

我认为，第一种技术，也就是作出保证，是一种强力的技术；而双手施压的技术，则是一种机巧的技术。弗洛伊德本人是这样解释的：

“我把双手放在主体的额头上，借此把他的注意力吸引到这个动作上；这样一来，阻抗便从它原本所阻抗的东西转移到这个动作上，于是，原来压在下面的记忆就能够显露出来。”

因此，我认为，他先作出保证，然后才把手压在额头上，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对于主体的阻抗，他的第一个反应是施加强力、成为较强的一方；而第二个反应则是……

拉康——你的依据是哪段文本？

迪迪埃·安齐厄

这是一种解释。《癔症研究》论心理治疗的那一章里说：

“先作出保证；如果不起作用，就用双手施压。”

拉康——这是一种叙述方法，还得重新核对。

迪迪埃·安齐厄

即使这不是时间上的先后顺序，他的第一个反应是成为更强的一方、强行突破阻抗，而第二个反应是施展机巧、使阻抗转向、同它周旋，这一点仍然很重要。至于他的第三个反应，他只在用了好几页描述各种阻抗形式以后才提到：在某些情况下，最终克服阻抗的最好办法，是找出患者的秘密，把它告诉患者，使他不得不放弃阻抗。

因此，我们这一次在这里抵达了某种典型的分析性做法：解释。这不是对阻抗的解释，而是对内容的解释；它是解除阻抗最彻底的手段。从强力到机巧，再从机巧到解释，这里发生了长足的进展。他还说明，重要的是让主体一同认识心理过程的奇妙世界：

“我们由此获得他的合作，并引导他以科学观察者的客观兴趣，亲自考察自己的病例……”

这样，我们也使阻抗向后退却。我会把这一点同弗洛伊德在提出其理论的同时所发现的东西联系起来……

拉康

当我强调这一点时——请原谅我打断一下——我曾在给你们作的报告中，有时着重指出弗洛伊德所治疗的那些病例具有完全特殊的地位。这是由弗洛伊德技术的独特性质造成的。我已经向你们指出过这一点。对于这种技术，我们只能根据他留给我们的若干规则作出推测；这些规则后来得到了忠实执行。可是，即使是最优秀的作者，即使是那些身处源头、认识弗洛伊德的人，也承认仍然无法形成充分的认识——到时候我会把有关文本拿给你们看。

我们现有的材料不足以使我们了解弗洛伊德怎样运用技术、他的技术究竟是什么。我之所以强调这一点，是因为弗洛伊德所推进的研究带有一种绝非寻常的风格，也不同于其他科学研究。这里涉及主体真理的领域：真理这一维度被置于突出并切身在场的位置，使这项研究不能完全还原为通常科学方法那种客观的、乃至客体化的研究。这里所涉及的，是主体真理的实现；它是一个特有的维度，相对于现实概念

本身，能够而且必须在其独特性中被分离出来。过去几课我一直强调这一点；那些课既是对前几年工作的总结，也是今年工作的引论。

当时，弗洛伊德也走在探求真理的这条道路上；这项探求如此彻底地牵涉到他本人，直至他的整个人格，因而也牵涉到他面对患者时的在场，以及姑且说来他的治疗活动——不过，仅用治疗活动来界定弗洛伊德的态度，是完全不够的。依照弗洛伊德本人的说法，这一点必然使他同患者的关系具有一种绝对独特的性质。

可以说，这是一种被提升到平方的独特性，是分析治疗的最大独特性：这项治疗是由分析的发现者本人实施的。我已经对你们说过，我们必须认为，分析始终以经验实现的这种独特性质为基础。分析作为一门科学，是关于个别者的科学。每一次分析的实现永远都是一个独特病例；不过，自从分析家不止一人以来，这些独特病例仍然容许形成某种一般性。

弗洛伊德的经验则把这种独特性推到了极致，因为弗洛伊德当时正在建构并检验分析本身。换言之，在我们必须赋予弗洛伊德本人那些经验的位置中，绝对不能从这一情境中排除该经验的独特性。我们不能抹去这个真实事实：那是人们第一次进行分析。

我不会说，当时是在应用这种方法；方法是从中推导出来的，它才是留给其他人的方法。倘若我们忽略弗洛伊德这一步骤绝对唯一、开创性的性质，就会犯下严重错误，并造成种种晦暗。以后我们会看到，这绝非无关紧要。

我强调这一点，并不只是为了突出这个问题，而是因为，要理解我们随后必须谈论的一切，要理解分析技术的问题怎样被提出，我们目前

还不能……我注意到，眼下我正费些力气让你们把它牢牢记住，因为人总得有一个时刻把注意力停留在某件事上，才能赋予它全部价值。

我坚持请你们把下面这点作为问题向自己提出：它是不是某种必须始终维持在你们注意之中的根本东西？我向你们保证，确实如此！尤其是，当你们已经按照我所教的方式，把分析视为它本来所是的那种经验，也就是个别者的经验时；在最初那个独一无二的个别者那里，某种东西获得了更大的价值，也获得了更为特殊的价值。

如果我们不强调这一切同后来继起的一切之间的差别……

对后来那些人来说，他们关心的与其说是这个真理本身，不如说是通达这个真理的道路怎样构成。

……你们便永远无法看清：弗洛伊德著作中的某些句子、某些文本，应当赋予怎样不同的重音和意义；这些句子和文本到了其他语境中会获得完全不同的价值，尽管人们可能以为后者只是照着前者描摹出来的。

评注弗洛伊德文本的意义就在于，它使我们能在每一个问题点上看清那些问题的细节。你们会看到——今天其实已经看到了——这些问题极其重要，而且数量众多、悄然潜伏。严格地说，它们恰恰是每个人都会为之操心、却又由于人类心智的自然倾向而竭力回避的问题。人们宁愿信赖一句反复吟唱的套话，信赖一个给出某种图式化、缩略化、形象化说明的公式，并安歇其上。安歇总比重新质疑容易。

迪迪埃·安齐厄

……另一种必要做法，是扮演解释者、教师和告解神父，在告解之后强行给予赦免。

最后，第四个要素是情感方面的影响，也就是个人影响；转移和反转移由此发端。以上就是第二点。其实还有第三点，但我准备跳过去：各种阻抗形式的初步勾勒。

拉康——这一点非常重要。

迪迪埃·安齐厄

关于阻抗的不同形式，弗洛伊德列出了四五种：

- 患者说：“我原以为会有一个念头浮现出来，我信任您，可我现在只有焦虑，什么也想不起来……”
- 或者，违反基本规则：他脑海中本来出现了某个东西，却因为觉得它无关紧要或令人不快而没有说出来；
- 或者，他用一个托词来掩盖阻抗：“隔壁房间的钢琴声使我分心，我只能想着它。”
- 或者，他开始长篇大论，却毫无情感，言说方式也十分做作。还有一种最微妙、也可以说最难处理的阻抗：患者确实重新记起了那段

著名的致病记忆，却又否认它：“不是我自己想起来的，仿佛是您——医生——在替我说……”

- 或者：“您预期我会说出它，而我之所以说，是因为您有这种预期。您肯定早已想到我会想到它。”

- 再或者是最后一种、也就是极端的阻抗；弗洛伊德在另一段文字中指出，这段记忆根本没有被认作记忆。它只是一种模糊、弥散、不明确的印象，无法同某个场景联系起来；这是阻抗的最大程度。

由此不难理解，弗洛伊德为何总是试图在阻抗最微妙之处把它重建出来。

我的报告最后一点仍然沿着《癔症研究》的文本展开，也就是阻抗的理论解释。为从理论上解释阻抗，弗洛伊德采用了他当时在动力神经学学派所受训练中的概念模型。他提出，可以设想致病核心周围存在三重分层；致病的、创伤性的经验就记录在这个中央核心里。这里有三种排列：

- 线性排列；

- 同心排列；

- 以及锯齿形的动力排列。

我只谈第二种排列：相似的记忆被组合成不同层次，弗洛伊德把它们比作档案库里成捆的文件。

拉康

引人注目的是，我们在这里完全摆脱了当时恰好被调用的那种伪解剖学比喻——那些或多或少沿着神经传导通路游走的言语意象。此处的意象却恰好唤起你所说的东西：一捆文件。

迪迪埃·安齐厄——英文文本中写的是：“目录，整理有序的档案……”

拉康

“多谱表的乐谱”……所有这些比喻都不可抗拒地趋向言说的物质化。这里不是神经学家的神话式物质化，而是具体的物质形式，言说在其中流注到手写或印刷的纸页上。这里有某种不能不令人震动的东西。甚至空白页和重写羊皮纸的比喻也相继出现，并曾来到不止一位分析家的笔端。

在你提到的那段文字里，有若干纵向层次，也就是说，有若干条话语之线。文本把它们具体化为“束”的形式，我们因而真能把它们想象出来；而人们谈论这束东西时，也把它当作某种在字面上具体的存在。一束，也就是数股平行的言说之流；它们在某个时刻扩展开来，围绕那个著名的致病核心——这个核心本身也是一段历史——它们为了把它纳入其中而彼此分离，随后又在稍远处重新汇合。

阻抗现象在字面上由文本所说的如下情形构成：那里有两个方向，一个纵向，另一个径向。阻抗正是在径向上发挥作用。当人试图靠近处在束流中央的那些线时，阻抗便随之产生；当人试图从外围层次转向中心时，压抑核心会向外施加一股明确的排斥力。向最邻近核心的那些话语之线深入时，人就在这种努力中感受到阻抗。

他甚至还这样写道——这不在《癔症研究》中，而是在后来一篇归入《元心理学》的文本里。他说：

“阻抗力量的大小，同一个人距压抑核心的距离成反比……”

我认为这并不是原句，之后我会找出引文。它非常引人注目，完全体现了阻抗在经验中第一次被把握时的这种物质化。它同时又是某种彻底临床性的东西，正如曼诺尼刚才所说。用曼诺尼的说法，当我们要指称主体在这种临床经验层面上的话语时，这里采用了一种尽可能把问题形象化的方式，使用了一个最不能令神经生理学家满意的比喻。

至于这一切发生在哪里、它的物质性和生物学载体在哪里，弗洛伊德径直把话语本身当作现实，把它当作一个就在那里的现实。他用一种让人想到一捆文件、想到另一种比喻中所谓“一束证据”的方式来表达它。“一束证据”毕竟也是这样：彼此并置的话语相互重叠、前后相续，形成某个维度、某种厚度，也就是一份卷宗的体量。

由于他当时还没有孤立言说之物质载体这个概念……若在今天，他本可以把构成主体一部分话语的音素序列当作比喻的一个要素：主体的话语越接近某种最终而正确的话语形式，遇到的阻抗就越大；可是，主体又绝对拒绝这种话语。

我还认为，在你们共同努力进行的综合中——你们这样做是对的——也许有一些概念没有得到突出。其中未被置于首位的概念，归根结底就是无意识

与意识之间的关系。

在我们必须就阻抗提出的问题中，这个关系处在首要位置。因为，在更准确地知道阻抗究竟代表什么——无论是在主体内部，还是在主体同分析家的关系中——以前，问题在于：阻抗归根结底是什么意思？它意味着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 阻抗是在分析中发生的现象吗？
- 阻抗只存在于分析中吗？
- 还是说，即使主体在分析之外生活，甚至同分析毫无关系——无论是在进入分析之前，还是离开分析之后——我们也可以在任何时候径直谈论阻抗？
- 阻抗究竟是什么？
- 在分析之外，阻抗对主体是否仍然保有其意义？

这是提出曼诺尼刚才恰当地开启的那个问题的另一种方式——这种方式会带出许多难题。他的主题大体上体现了他理解这个问题的方式，但还有其他问题需要提出。今天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凡是反对重新夺回无意识的东西，是否确实都叫作阻抗？而“无意识”这个词刚才还没有被说出来。

迪迪埃·安齐厄——还没有说出来……

拉康

是的。不过，曼诺尼采用了另一些文本。尤其是，《梦的解析》中有一段极其重要的阻抗文本，你们两人谁都没有援引。你们各自提出的某些问题，正是在那里得到充分展开。

问题恰恰在于，无意识的不可及性是否是某种……这里所采取的视角，你们已经看到，并不只是分析的当下视角，而是我们今天通过曼诺尼和安齐厄的报告所看到的元心理学视角。

下面这一点也许算不上发现，却能使思路明确起来：阻抗概念极其古老。早在最初、在精神分析诞生之际、在弗洛伊德最早的研究中，阻抗概念就已经十分早地同自我概念联系起来。

可是，当我们在《癔症研究》的文本中读到某些格外醒目的句子时，情形又有所不同。他谈的不只是自我——正如你指出的，自我在文本中以其本身的名义出现——他还把自我说成某种“观念团块”的代表。他写的是观念团块、内容、团块；德文原文究竟怎样，我眼下记不起来。因此，自我在当时已经被隐约把握为某种东西；它十分接近、并使我们预感到自我概念如今向我们提出的全部问题。

我几乎会说，这些概念具有追溯性效应。根据围绕自我问题为我们展开的全部发展来阅读这些最初的材料，或许可以发现：最新的表述非但没有凸显它们，反而把它们遮蔽了。

例如，在“观念团块”这个表述中，你们不可能看不到某种东西格外接近我曾经给你们的一个公式。它涉及反转移的一个要素，而这个要素恰恰无非就是分析家之自我的各种功能所发挥的功能，也就是我所谓“分析家偏见的总和”。在患者那里，自我同样代表由确信、信念、坐

标和参照构成的整套组织；严格地说，这正是弗洛伊德从一开始就称作“观念系统”的东西，我们可以在这里把它简称为“系统”。

阻抗是否只从这里产生？还是说，它另有来源？我在这里最近的一课中曾经说过……

严格地说，我曾经向你们呈现过某个言说领域的边界，而这个领域恰恰就是

我们正在谈论的“观念团块”，也就是主体的自我。

……那里是否存在我在论述转折处称作“沉默之总和”的这种结构化？在这沉默之后，另一种言说重新出现；在无意识领域中，所要重新夺回的恰恰就是这种言说。它是主体的一个部分，是其历史中被分隔出来的部分；有某种东西把主体同自己的历史隔开。

这个东西是否仅仅就是自我的组织？是否纯粹而简单地正是自我的组织本身构成阻抗，并造成径向进入的困难——这里借用

弗洛伊德本人使用的词——也就是我们接近意识现象、意识内容时所涉及的那种困难？

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甚至过于简单的问题；就其本身而言，它无法解决。所幸，从弗洛伊德到他的学生，分析理论取得了进展。我们届时会看到，这一进展完全同本世纪最初三十年里的种种变迁相关；在那段时期，分析技术经历了足够多的实验阶段，使这些问题得以彼此区分。按照分析本身向我们展示的那个恰当图式，我们可以通过转绕来展示它，正如分析就是为了通达无意识而采取的一条迂回道路。

不过，你们已经看到，这又把我们带回我所说的研究模型：我们要在分析经验本身的变迁、比喻及演进阶段中，寻找某种能让我们认识它自身性质的东西。分析经验本身也是一种人类经验，而它的这种性质又被它自己遮蔽了。

这就是把神经症向我们提出的问题提升到第二层级。它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不容回避；我现在只是在这里断言这一点，随着我们的考察，你们会看到它得到证明。我显然是从分析当下抵达的这条真正的思想与实践死胡同中，得出了这个结论。你们可以看到，我的表述走得相当远。

重要的恰恰是把这个操作图式本身提交给分析。我可以说，分析本身教会了我们：应当尝试从分析的理论—技术建构的不同阶段中进行阅读，从而更深入地读出这里所涉及的真实现实，也就是主体对无意识的重新夺回。

你们将看到，这种方法会使我们得到远超于一份操作程序或概念范畴目录之形式领域的精确说明。重新把分析置于一场本身也是分析性的考察之中——你们会看到，这一进路将在我们的工作中显出它的丰饶，正如它在我们初次接近弗洛伊德的临床文本时已经显露出来；它尤其会在技术问题上显出成效。

今天我就讲到这里。我要祝贺曼诺尼和安齐厄所做的工作。下一次，我会尝试从一种新方式、一个新侧面、另一扇进入问题的门着手。我认为，如果直接从他们的工作出发，我们未必能作出最富成效的阐述。

在此过程中，我当然会强调他们各自报告中富有成效的贡献，也会说明我们下一次已经可以怎样回应。〔下一次研讨课的〕标题已经传达并公布：

“阻抗与诸种防御——在分析经验中，阻抗的意义与防御的功能。”

我先向你们作一个预告：我们会考察阻抗概念同防御概念之间的关系；防御概念起初表现为“防御性神经精神病”（1894），最后又同症状相关。弗洛伊德说，必须回到防御概念。

我们会看到某些东西，它们将使我们再向前迈出一步。

第4课 · 1954年1月27日

拉康——我们把发言权重新交给安齐厄；上一次，我似乎多少有些贬低他的报告……

迪迪埃·安齐厄

我当时正谈到《癔症研究》的最后一段；那里讨论的是阻抗，是对前几页所描述、所发现的阻抗进行理论解释的尝试。我已经开始说明弗洛伊德围绕一个记忆的中央核心——也就是必须抵达的致病核心——所描述的心理材料三重分层；拉康博士随后沿着这个方向继续讲了下去。

一方面，有一种线性的、按年代排列的方式，其中相似的记忆形成不同层次并彼此联系；另一方面，又有一种锯齿形的动力进路，它顺着思想内容从表层抵达中心。从阻抗的角度看，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对相似记忆分层的描述。

弗洛伊德把这些记忆设想成围绕致病核心作同心式分层。那么，这些同心层由什么决定？由它们同核心相距的程度决定。他说，它们是阻抗程度相等的层次。我很想——这完全是我个人的想法——从弗洛伊德这个表述中，看出一种当时开始变得重要的思维方式所产生的影响，也就是用场来思考：电场、磁场，某种动力场。正如越接近一个场的中心、一个场的焦点，力线就变得越强；弗洛伊德很可能按照同一个模型来构想记忆的层叠。

因此，我认为，正如曼诺尼指出的，人们谈到“安培小人”并非偶然。弗洛伊德把“安培小人”说成挡住无意识与意识之间通路的小人。这里出现电学比喻并非偶然，而是因为电学和磁学关系介入了阻抗概念的理论化。

奥克塔夫·曼诺尼——他本来应该采用“麦克斯韦妖”，因为“安培小人”根本什么也不做。

拉康

是的，我原本不想进入电学理论；不过，“安培小人”确实没有权力决定打开还是关闭……

奥克塔夫·曼诺尼——这个角色属于“麦克斯韦妖”。

让·伊波利特

可是，“麦克斯韦妖”无法获知一个分子正在通过。发出信号这件事是不可能的；一个分子通过时，“麦克斯韦妖”无法得到消息。

拉康

我们由此进入了一种相当棘手的歧义，因为“阻抗”恰好就是这里的表述。提出所有这些问题正合时宜，因为精神分析文本显然充斥着这类有步骤的不当用法。确实，这些主题很难得到处理和言语表达，因为我们很难不给动词安上一个主语。

我们总是听到这样的说法：“自我发出焦虑信号”，操纵“生本能”和“死本能”。到最后，人们已经不知道中央控制者、扳道工和道岔究竟在哪

里。由于很难谨慎而严格地构想这一切，我们最终总能在分析文本中看到一个个“麦克斯韦妖”现身；它们何等有远见，又何等聪明！麻烦在于，我们对分析中这些妖的性质还没有足够精确的认识。

迪迪埃·安齐厄

我认为，在这一点上显然还应当回到电学和磁学的历史。我不太清楚，当时是否已经发现神经冲动具有电学性质。在弗洛伊德早年的一项工作中，他恰好运用了……的心理学方法，又加以若干改进，从而成功发现了某种构成神经的细胞连续性。当时人们争论的是：神经究竟是什么？

拉康——弗洛伊德的神经学工作处在神经元理论的起源处。

迪迪埃·安齐厄

确实……他的一项研究所得出的结论，已经来到这套理论被发现的边缘。颇为耐人寻味的是，弗洛伊德总是停留在各种理论发现的边缘，最后却把自己投向了精神分析。

让·伊波利特——他是不是认为自己在电学方面失败了？我好像在什么地方读到过。

迪迪埃·安齐厄——是在动物学方面。

奥克塔夫·曼诺尼

是的。在电疗临床方面，他经历了一次痛苦的尝试之后，放弃了把电气装置应用于神经症患者。

让·伊波利特——正是如此。这是对他认为属于失败的事情所作的补偿。

迪迪埃·安齐厄——是的，确实如此。他曾在私人诊疗中尝试电疗。

拉康

伊波利特所指的是：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时期以前的工作中，他的解剖学研究可以视为成功之作，而且也得到了这样的认可。当他开始在生理学层面操作时，似乎表现出某种兴味索然；事实上，这似乎也是他没有把可卡因发现的意义贯彻到底的原因之一。即使在那里，他的生理学研究也很松懈。他已经十分接近把可卡因用于镇痛的治疗用途，却把更加严格明确的东西——可卡因的麻醉价值——搁在一旁。这无疑是因为他缺少生理学家的好奇心！

不过，我们在这里触及的是弗洛伊德人格的一项特征。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也许正如安齐厄所说，他把自己留给了一个更好的命运。这个问题是可以提出的。他后来确实回到过某些自己似乎多少有所偏好的领域！

可是，若进一步把它称作补偿，我认为就有些过头了。毕竟，只要阅读以《精神分析的诞生》为题发表的那些材料，就会看到：其中最早被发现的那份关于心理装置理论的手稿，确实走在当时理论建构的道路上，研究的是神经装置的机械论运作——这一点也得到所有人的承认和强调。

因此，电学比喻混入其中，就更不值得惊讶。也不要忘记，电学本身最初也出自生理学实验，随后又被归还给神经冲动。电流第一次得到实验，正是在神经传导领域。人们尚且不知道它会具有怎样的意义。

迪迪埃·安齐厄

我认为，这里重要的首先是一项概念问题。弗洛伊德的神经学训练来自若干生理学家；他们为这个领域带来了一种全新的构想，而人们后来还找到了他们所立的那份誓言。

拉康——心理生理学的三位伟大密谋者。

迪迪埃·安齐厄

这份誓言说的是什么？除了类似物理—化学力的力量以外，不存在其他力量。没有宏大、隐秘而神秘的力量，一切力量都可以还原为吸引与排斥。回到1840年这份誓言的文本、回到由此形成的这个学派，是很有意义的。因此，这套模型来自天文学。

听到您把自我说成观念团块时，我甚至以为您是在暗指这一点。布伦塔诺曾把斯图亚特·穆勒全集中载有这些经验主义心理学材料的那一卷交给弗洛伊德。荣格在提出观念联想定律时试图做什么？他说，观念彼此吸引。这是在重新采用牛顿于物理学中发现的伟大定律：物体彼此吸引。心理世界的伟大定律同物理世界的定律相似。力量概念由此凸显出来，而电学则是其中一个受到特别青睐的模型。

它无疑将取代古代力学以“杠杆”为模型的方式。现在，人们用吸引与排斥概念来解释根本现象。弗洛伊德从反转移中把它经验为阻抗，并

将借助这些力量概念把它理论化。而力量预设有某种东西反对这股力量。力量总是相对于某种阻抗而言的力量：这些都是电学中的根本概念。

我认为，弗洛伊德着重采用它，首先是把它当作概念模型。这确实属于反转移："他在阻抗，而这使我怒不可遏。"我认为，从临床角度看，阻抗概念的确代表了一种经验：在我们的实践中，几乎面对每一位患者，我们迟早都会有这种经验。

拉康——什么？什么经验？

迪迪埃·安齐厄

就是这种极其令人不快的经验。我们会对自己说："他已经来到关口；他本可以自己找到。他知道，却不知道自己知道。他只须费点力气仔细看看，可这个该死的蠢货、这个白痴"——我们脑海里会出现所有这些攻击性和敌意的字眼——"他偏偏就是不做。"于是，我们便产生了强迫他、逼迫他的诱惑……

拉康——别在这一点上撩拨得太过〔原文如此〕……

让·伊波利特

分析家只有在阻抗使被分析者显得像个白痴时，才有机会显得聪明。这会给人一种高度的自我意识。

拉康

不过，反转移的陷阱——既然必须这样称呼它——毕竟比这个表层更加悄然潜伏。

迪迪埃·安齐厄

我认为，这正是它最突出的面貌。这一点打动了弗洛伊德。后来，当他努力对此作出说明时，他并没有隔太久才根据自己脑海中已有的构想和先前的工作，把它以“反转移”的形式阐发出来。

于是，我们抵达了您本人曾经勾勒的表象：致病核心不是被动的核心，而是一个极为活跃的核心。从这个致病核心出发，有一整片渗透通过分支朝整个心理装置蔓延。相反，阻抗则是某种来自主体自我的东西——另一片与之对称的渗透——它力图在致病渗透的分支试图通向越来越表浅的层次时，把它们截住。

拉康——你这里依据的是哪段文本？

迪迪埃·安齐厄——仍然是《癔症研究》中的文本。

拉康

你刚才说，阻抗被刻画成——你终究没有把那个词说出来，我不知道你是怎样设法避开的……——总之，被刻画成自我针对致病核心渗透的防御。你的文本依据是什么？

迪迪埃·安齐厄

《癔症研究》，就在三种图式、三种线性、同心和动力排列的说明之后。您要我找出页码吗？

“致病组织并不像一个异物那样行动，而更像是一种渗透……”

这里有一个我不明白其意义的词：“渗透物”（infiltrate）。

拉康——也就是渗入其中的东西：渗透物。

迪迪埃·安齐厄——“……在这个比喻中，应当把渗透物看作阻抗。”

拉康——这并不意味着它是自我的反应；这里没有把阻抗理解为反应形成的意思。

迪迪埃·安齐厄——的确如此。

拉康

也就是说，你不由自主地已经在借助后来的文本，以便把阻抗等同于某种东西；这却是以牺牲《癔症研究》中已经得到命名的东西为代价的。不过，《癔症研究》中所说的这个自我——构成其中自我的这个观念团块、这项观念内容——仍然有待考察……

这样说吧……我来帮你一下，谈谈自己的看法。我们在这里，就是为了考察自我概念在弗洛伊德整部著作中从头至尾被唤起时意味着什么。倘若把一切都淹没在对心理某个侧面的一种总体把握中，就完全不可能理解心理学里的自我概念，不可能理解它怎样随着1920年的群体心理学研究、随着《自我与本我》开始涌现。

在弗洛伊德的著作中，情况完全不是这样。自我具有一种功能性作用，同某些技术上的必要性相联系。为了立刻说清我的意思，可以举眼前的例子：纽约有一个正在运作的三人集团——哈特曼、勒文斯坦

和克里斯。他们目前试图阐发一种自我心理学；只要查阅他们的文本，就会看到他们始终围绕着这个问题：“弗洛伊德最后的自我理论究竟是什么意思？”“截至目前，我们是否真的从中引出了它在技术上的含义？”

原文就是这样写的，我并没有翻译！我只是复述哈特曼最近两三篇文章中的内容；那些文章就在你们可以查阅的这本书里。例如，《精神分析季刊》1951年刊载了勒文斯坦、克里斯和哈特曼关于这个问题的三篇文章，结集在这里，很值得一读。当然，不能说它们已经抵达完全令人满意的表述；但它们显然是在这个方向上探索，提出了一些肯定具有重大技术应用的理论原则和更精确的说明。

而他们得出的表述是，这些技术含义还没有得到充分引申。这并不意味着人们完全没有从中作出引申。哈特曼说：问题就在这里。看到这项工作的真正问题怎样通过一系列连续多年的文章——尤其是战后以来的文章——逐渐得到阐发，颇为耐人寻味。我认为，这非常明显地呈现出一种失败，而这种失败富有意义，应当给我们以启发。无论如何，在下列两者之间显然已经隔开了整段距离、整个世界：

- 起点，也就是《癔症研究》中所谈的自我；
- 以及对我们仍然构成问题的“最后自我理论”，也就是弗洛伊德本人从1920年起锻造的理论。
- 两者之间还有某种东西：我们正在研究的这个中心领域。

归根到底，这套自我理论究竟怎样显露出来？它目前以一种彻底成问题的面貌出现：一方面，它是弗洛伊德理论建构的最前沿，是一种前

所未见的弗洛伊德理论；即使不说前所未见，它至少也格外原创而崭新。另一方面，在哈特曼笔下，它又以一种竭尽全力重新汇入古典心理学潮流的东西呈现出来。

这两点都是真的。克里斯也写道：“精神分析进入普通心理学。”可是与此同时，自我理论中又出现了某种完全新颖、崭新而原创的东西；如果没有1910年至1920年间的全部建构，它甚至不可设想。这里存在某种悖论；无论接下来怎样，我们都将不得不在这里凸显它：

- 或者，我们会借助这些《技术著作》一直推进到假期；
- 或者，以施雷伯的著作为入口，用另一种方式处理同一个问题。因此，保持绝对谨慎非常重要；你不由自主地把文本中没有的东西悄悄放了进去。

〔对安齐厄〕请继续。

迪迪埃·安齐厄

最后，我还需要就刚才指出的全部内容作出若干评论。首先，正如我刚才所说，阻抗概念是在弗洛伊德的一次亲身经验中出现并得到发现的。这次亲身经验就是——如他在《癔症研究》中所说——一个巨大的惊讶：当人们要求

主体放任自己进行自由联想时，会发现主体内在的一切都井然有序：记忆排列得井井有条，他内在的一切都秩序井然。

如果我们成功通达这个整体，就会找到它。换言之，症状与癔症的病因就在主体自身之中；它已经整齐排列，只等有人前去寻找。既然它

就在主体之内而且井然有序，主体理应能够看见它、亲自找到它。可是，阻抗在这里介入了。因此，主体本可以知道，却不愿意知道；这恰好就像那些原本可以被催眠、催眠会给他们带来最大益处，却又不愿意接受催眠的主体。

因此，阻抗诞生于心理治疗师的这种反应——因为当时还没有谈论精神分析——一种针对主体拒绝接受自身内部的明证、拒绝痊愈的反应、反向反应，甚至暴怒反应〔原文如此〕。主体明明在自身内部具备痊愈的全部可能，最终却拒绝痊愈。心理治疗师最初的反应，因而就是强迫主体：或者公开强迫，或者通过不断坚持，以隐蔽方式强迫。

因此，弗洛伊德将会看到，阻抗中存在一种现象——我在这里回到曼诺尼的结论——一种两人关系中的、个体之间的现象。

拉康

到1896年，人们已经谈到精神分析了。“精神分析”（psychoanalyse）一词已经出现在《神经学杂志》的一篇文章中。那篇文章以法文写成，任何人都可以找到。甚至可能正是在这篇法文文章中，“精神分析”一词第一次出现。

迪迪埃·安齐厄

弗洛伊德没有看到阻抗就是转移、分析家的阻抗就是反转移，而是把阻抗归回主体，并且说：主体之所以阻抗分析家，是因为患者在阻抗自己；在他历史中的某个时刻，某次经验激活了他内在的驱力，而他

曾经防御这些驱力。阻抗由此被归回主体，也就是被归入弗洛伊德试图分类的三种形式：阻抗、压抑和防御。

拉康——弗洛伊德在哪里试图对它们进行分类？

迪迪埃·安齐厄

他试图依照时间顺序对它们进行分类，因为：

- 自我的防御，是自我针对性冲动作出了反应；
- 压抑，是它取消了有关记忆；
- 阻抗，则是主体对当前回忆所提出的反对；正是在当前回忆中，他把自己暴露于这一概念的发现。

拉康

这是我们自己对这些概念所作的总结。这些概念并不是……它们在思想发展的过程中悄然滑动，逐渐获得越来越分化的含义，后来当然又重新会合。问题确实涉及这些东西；不过，阻抗、防御、压抑这套和谐分类，从来没有以这种方式出现在弗洛伊德本人的笔下。

迪迪埃·安齐厄

大致说来，它确实出现在《癔症研究》中。对于主体这种“对反应的反应”，本来还应当把弗洛伊德的个人因素引入讨论；但这会把我们带得很远。不过，根据弗洛伊德在《梦的解析》中所说的内容——伯恩菲尔德重新发现了这种统一性——我们知道，他有极强的支配倾向，因

为他曾认同马塞纳和汉尼拔。后来，他曾考虑学习法律、从事政治，也就是对人施展权力；而他把自己投身医学研究的使命和取向，归因于后来听到的一场关于歌德的讲座，讲座谈的是歌德的一篇自然论文本。这似乎可以作如下解释：弗洛伊德以科学赋予人对自然的那种更间接、更可接受的权力运用，取代了对人的直接权力。到了最终形式，这种权力又被还原为理解自然并由此使自然服从自己；我们在这里重新看到理智化机制，也看到决定论本身的经典公式。这一切都同弗洛伊德的权威性格相呼应；这种性格贯穿其全部历史，尤其体现在他同异端者以及弟子的关系中。

拉康——不过我得说，即使我也沿这个方向谈过，却没有进一步把它变成弗洛伊德发现的钥匙。

迪迪埃·安齐厄

我也不想把它当作钥匙，只是把它当作一个值得凸显的因素。在这项阻抗中，弗洛伊德对主体阻抗的

过度敏感，并非同他自己的性格毫无关系。

拉康——你凭什么谈论弗洛伊德的“过度敏感”？

迪迪埃·安齐厄

因为发现阻抗的是他，而不是布洛伊尔、夏尔科或其他人。这件事毕竟落在他身上，因为他的感受更为强烈，而且他阐明了自己所感受到的东西。

拉康

是的，可是你认为……我们能否这样凸显一种功能：阻抗意味着主体对阻抗自己的东西格外敏感？还是相反，恰恰是因为弗洛伊德懂得支配这份敏感，走向完全不同的地方、远远超出它，才得以把阻抗变成一个能够客体化、调动、命名和处理的因素，使它成为治疗的一个推动机制？

而且，你认为弗洛伊德比夏尔科更具权威性吗？弗洛伊德尽可能放弃暗示，恰恰是为了让主体把自己因种种阻抗而与之分离的东西重新整合起来。换言之，在把握主体时，是那些没有认识到阻抗的人表现出更多还是更少的权威主义？

我倒更倾向于认为，一个想方设法在催眠中把主体变成自己的对象、自己的物件的人，一个寻找像手套般柔软的主体，以便任意塑造他、从他那里取出任何可以取出的东西的人，仍然比弗洛伊德更受支配欲和行使权力的需要驱使。在这里，弗洛伊德显得细致地尊重着人们通常也从这个角度所说的东西：对象或材料的阻力。

迪迪埃·安齐厄——当然。

拉康

对于你刚才所说的内容，我认为必须极为谨慎地处理。我们不能如此轻易地操弄自己的整套技术。我之所以向你们谈论对弗洛伊德著作的分析，恰恰是为了以分析所要求的全部谨慎来进行，而不是把一项性格特征变成恒定的人格特质，更不能把它变成主体的特征。我甚至认为，琼斯笔下有一些十分冒失的说法；不过，我想那些说法终究比你刚才所说的更有分寸。

如果认为弗洛伊德的事业是对权力欲、甚至对其明确自大狂的一种补偿——他的言谈中确实还留有一些有待解释的痕迹——我认为这……弗洛伊德最初发现自己道路时所经历的戏剧，是某种不能以这种方式概括的东西；我们不能把他在接触主体时带来的一切，都刻画成权力欲的延续！

我们毕竟已经从分析中充分认识到人格中的革命、乃至转变，因此不必非得把两个弗洛伊德等同起来：一个梦想借权力意志和发号施令来支配世界，另一个则开创了一项新的真理。在我看来，它们不属于同一种 cupido（欲求），即使属于同一种 libido（力比多）。

让·伊波利特

可以让我说一句吗？即使不完全接受安齐厄的表述及其结论，在我看来，夏尔科通过催眠实施的支配，所涉及的毕竟是对一个被化约为对象的人的支配……

拉康——我们也许走得有些远了；无论如何，关于这种化约……

让·伊波利特

这是对一个不再支配自己的人的占有。相反，弗洛伊德式的支配，是战胜一个仍有自我意识的主体、一个人。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战胜阻抗的支配，比干脆消除阻抗包含着更强的支配……当然，我并不想由此得出弗洛伊德想支配世界的结论。

拉康——是的，如果确实存在你所说的……那么会有这种情况。

让·伊波利特——夏尔科的支配是一种轻而易举的支配。

拉康

问题在于，弗洛伊德的做法是否根本就是一种支配。根据我们从他所报告的临床病例中看到的操作方式来看——关于那些没有在其操作说明中呈现出来的内容，我始终有所保留——总的说来，我们当然看到了一些令我们惊讶的东西；但这些东西之所以令我们惊讶，是因为它们有别于我们赋予重要地位的某些技术原则，也因为他的干预主义令我们惊讶。

在某种意义上，这些做法也许远不如总把全部重音放在阻抗上的现代技术那样，是伊波利特所说的对主体意识的一种胜利。完全不是这样。在弗洛伊德那里，我们看到一种态度；不能说它更复杂，也许它只是分化程度更低，也就是说，更具人性。

他并不总是区分如今所谓“对防御的解释”和对内容的解释；这种不作区分的做法也许并不总是最好……不过归根到底，情况更加微妙：我们会发现两者其实是同一回事，只是需要稍微敏锐一些才能看出来。我们看到，最终在弗洛伊德那里，对内容的解释发挥着对防御进行解释的作用。

它当然不是你有理由唤起其阴影的那种技术，因为归根到底，那种技术才是……我会试着向你们说明，分析家的干预所带来的这种强制主体的危险，究竟从哪个侧面呈现出来。它更多地出现在所谓“现代”技术之中——人们谈分析时这样说“现代”，就像谈国际象棋时一样——其现实程度，远胜于它在弗洛伊德那里曾有过的任何表现。

我不认为，阻抗概念在理论上的出现，可以成为我们对弗洛伊德提出这类指控的借口；这种指控同他全部著作和治疗行动显然具有的解放

效果正好背道而驰。我并不是在指控你心怀某种意图；这只是你在报告结论中表现出来的一种倾向，而我认为，它只能促使我们以批判形式看待问题。即使面对原创性著作，也必须保持审查和批判精神；不过，采用这种形式只会使奥秘变得更加厚重，完全不能把它揭示出来。

迪迪埃·安齐厄

最后还有一点，涉及精神分析运动怎样处理它曾努力解释的同一个特殊经验。弗洛伊德发现了三个概念：防御、阻抗、压抑。经过短暂摇摆后，他在同一年尝试进行综合，把防御概念扩展到癔症以外，扩展到强迫性神经症和偏执狂，并寻找这些其他神经症中发挥作用的特殊防御类型。

随后，弗洛伊德先把精神分析心理学集中于压抑概念，后来又集中于阻抗概念。到了1920年，他会回到在这里已经得到勾勒的防御概念。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认为我们确实面对着弗洛伊德思想的这个“胚芽细胞”；在历史进程中，他将依次展开其中按年代先后成为根本要素的各个面向。

拉康——你说“胚芽细胞”时，指的是谁？

迪迪埃·安齐厄——贝格曼：“germinal cell”。

拉康

无论如何，在我记得很清楚、却一时忘记作者姓名的那篇文章中，从头至尾被称作分析观察之“胚芽细胞”的，是“重新找回”与“复原过去”这

两个概念。强调这一点尤其重要，因为它确实触及弗洛伊德发现的意义问题：文章表明，我们的经验正是从这里出发的。

文章援引了弗洛伊德同布洛伊尔的工作——《癔症研究》——并且表明，直到弗洛伊德著作的末期、直到其思想的最后表述，“复原过去”这个概念始终处于首要位置；它采取过千百种形式，最终又采取重建的形式。那篇文章讨论的是这个问题，重音根本没有落在诸如围绕阻抗这项根本经验进行编组上。首先是……

迪迪埃·安齐厄

我刚才没有谈胚芽细胞；我只是努力把阻抗的发展同这整个发展过程联系起来。

拉康

我还是想对你们说几句话。我认为，曼诺尼和安齐厄所作报告的意义，在于向你们展示整件事情中那些炙手可热的侧面。他们的报告中有……

这也符合这样的心智状态：他们无疑受过训练，却相对较晚才接触分析——即使不是刚开始应用分析，至少也是刚接触其实践和技术。

……某种相当尖锐、甚至带有论战色彩的东西；用它来引出问题的鲜活性，始终是有意义的。

我认为，这里确实存在一个非常微妙的问题。它之所以更加微妙，是因为正如我在插话中指出的，它对我们中某些人来说完全是一个当下问题。刚才的责难暗中把某种东西说成弗洛伊德方法从开端就具有的

性质；这十分悖谬。因为，分析治疗倘若有什么原创之处，恰恰在于它从一开始便立刻觉察到主体身上的某种独特之物：这个东西使主体同自己形成一种真正成问题的关系，也使治愈主体绝非易事；而分析把它同那个发现本身、同我在今年开头向你们阐述过的发现结合起来，也就是症状的意义。

对这一意义的拒绝，会提出一个问题。这一意义不能仅仅被揭示，还必须得到主体接受；正是这种必要性，使精神分析首先归入那些把人的人格置于首位的技术之中——这里的人格，是我们今天所理解、也已经认识到其价值的那种人格。精神分析不仅尊重它，而且就在这个维度中运作，除此以外不可能以别的方式运作。

如果把“主体的阻抗在原则上受到技术强迫”放到首要位置，仍然会十分悖谬。在我看来，这是显而易见的。不过，这并不意味着问题不存在。就分析技术的介入风格而言，今天确实有这样或那样的分析家：在治疗中每走一步，他都会教导学生提出这个问题：“他又发明了什么防御？”这里真正涉及的并不是警察式观念——若说警察式，是因为要寻找某种隐藏之物；这个词更适合分析早期阶段中那些可疑的时期——而是审讯式阶段，两者颇为不同。分析家要弄清主体究竟采取了什么姿势、什么态度，发明了什么办法，才把自己置于这样一个位置：无论我们对他说什么，都不起作用。

概括地说，这种……把某种分析技术的风格称作“自欺”（mauvaise foi）并不准确，因为自欺同认识秩序中的种种含义联系得太紧密；而这些含义同这里的心态全然无关，那样说还是过于微妙。这里毕竟仍有某种“根本性坏意愿”（mauvaise volonté fondamentale）的观念，包

含着一种真正的意志主义预设：主体不仅什么也不愿知道，而且还有能力……//……

〔速记稿第22页缺失〕

……//……一半的时间，甚至“人的一生”那么长。到了最后，如果你再次见到他，发现他在同一个词中放进了完全不同的态度、思想或内容，也不应太过惊讶。在这段期间，他们可能已经结婚、生儿育女；仅仅这一点，就足以使一场对话获得完全相反的意义，尽管旅程终点的对话，可能被视为逐字重复了出发时初露端倪的那场对话。

由于人已经彻底不同，词语也会获得新的意义。我只想……

进入主题以前，我先举一个例子。安妮·赖希有一篇讨论反转移的文章，发表于1951年第1期[注1][注]。

> [注1] 安妮·赖希：《论反转移》，《国际精神分析杂志》第32卷，1951年，第25—31页。

> [注] 底本及原注把下述广播病例归于安妮·赖希；但该病例实际见于玛格丽特·利特尔同卷紧随其后的《反转移与患者对它的反应》（第32—40页）。译文保留拉康课上及底本的归属，同时标明书目差异。

这篇文章的价值和坐标，来自一种在特定学派——姑且说英国学派的某个部分——中走得很远的技术取向。

你们知道，人们由此甚至宣称，全部分析都应当发生在“此时此地”（hic et nunc）。换言之，一切最终都发生在一种始终处于当下的拥抱之中，拥抱着主体此时此刻在课次中的意图。毫无疑问，我们会透过这些意图瞥见主体过去的一些残片、片段和草图，它们或多或少得到

准确的讲述；但归根到底，人们认为，分析的全部活动就在治疗内部的这种考验——我几乎要说“心理角力”——之中。

毕竟，问题恰好就在这里：分析的活动。分析怎样起作用？是什么发挥效力？对于这里所谈的人——对于安妮·赖希——唯一重要的，是主体在此时此地认识到其话语的意图。而这些意图只有在此时此地的作用范围内、在当下的对话中才具有价值。

当主体同杂货商或理发师在一起时，实际上，他含蓄地是在训斥自己面对的那个人。在某种程度上，每个人都知道这一点；只须对婚姻生活有哪怕最少的经验，就会对这些事情变得敏感：配偶中的一方向另一方讲述一天里的事情时，之所以偏偏讲令自己不快的事而不是相反的事，其中总含有一部分隐而未明的诉求。不过，有时毕竟也存在另一种东西：认真把一个有必要知道的重要事件告诉对方。这两方面都是真的。问题在于，我们把光线投向哪一点，又把什么视为重要。

有时，事情还会走得更远。安妮·赖希报告了一位分析家的如下处境；我们能感觉到，她把某些特征处理得模糊不清。一切都使人想到，这终究很可能是某种训练分析——至少，是对一个关系十分亲近、其活动领域也同精神分析非常接近的人进行的分析。这个主体——我指被分析者——受邀在广播中就一个分析家本人也极感兴趣的主题作一次报告。这种事情确实会发生！

这次广播恰好发生在被分析的主体刚刚失去母亲的时候。一切都表明，这位母亲在所谓患者的固着、甚至主体性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丧亲之痛在节目播出前几天袭来；他当然深受影响。然而，他仍然以格外出色的方式履行了承诺。下一次课时，主体到来时陷入某种

近乎意识混乱的木僵状态：不仅无法从他那里引出任何东西，就算引出一些东西，其杂乱无章也令人惊讶。分析家大胆地解释说：

“你之所以处在这种状态，是因为你认为我非常恼恨你前几天在广播中取得的成功；你知道，那个主题首先也是我本人极感兴趣的。”

好吧……其余细节我就略过。后续观察表明，主体足足花了一年才从这项震撼式解释中恢复神志；它当时确实产生了某种效果，因为他立刻清醒过来。分析家作出如此直接的介入后，主体从一团混乱、一片迷雾中脱离，绝对不能证明这项介入具有严格意义上的治疗效力和结构化效力，也就是说，不能证明它在分析中是真的。不能！这项介入只是把主体带回其自我统一性的感觉。他原本处于混乱之中，却突然摆脱出来，并对自己说：“这里有人提醒我，确实，一切都是狼对狼。我们身处生活之中。”

于是他重新出发、重新启动，效果立竿见影。可是，在分析中，从来不能因为主体改变了言说风格，就把它当作解释正确的证据。我有充分理由认为，只有当主体带来确认性材料时，它才证明解释正确——即使如此，也仍须加以限定。一年之后，这个主体发现，自己当时的意识混乱状态同哀悼反应的反冲有关；他只有从字面上把这些反应颠倒过来，才能克服它们。

这显然要求我们进入哀悼心理学。有些人相当熟悉它的抑郁面向，因而可以设想：这次广播报告在言说中同主体形成了一种十分特殊的关系，它面向——

- 一大群看不见的听众；
- 而且，这种不可见性甚至可以说，并不必然只使主体在想象中含蓄地面向那些正在收听的人，它同样面向所有人：生者与死者。

主体显然同这个事实处在极其冲突的关系中：一方面，他会遗憾母亲无法见证自己的成功；另一方面，在他面向不可见听众的这篇话语中，也许有某种东西正是说给母亲听的。

无论如何，主体态度中这种明显颠倒的类躁狂性质，以及它同近期丧母之间的紧密关系——母亲的死亡对他而言代表着爱之联系中一个特殊对象的丧失——显然正是他下一次课时、也就是在那次壮举之后立刻陷入危机状态的推动因素：尽管处境不利，他仍然出色完成了承诺之事。不过，重要的并不是这一点。

重要的是，即使在一个远非对某种介入风格持批判态度的作者笔下，下面这点也表现得极其清楚：如果解释以当前课时中话语行为的意向性意义为基础，那么，只要分析家的自我可能介入情境，这种解释就会受到其中全部相对性的支配。

相关知识卡 分析家的无意识、电话听筒与反移情

概括地说，重要的并不是分析家本人出了错。甚至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可以把后来治疗进程明显驳回的这项解释，归罪于反转移本身。

分析家本人很可能确实体验到了那些情感，而他又认为被分析者使作为分析家的他产生了这些情感；这一点不仅

可以得到承认，而且极有可能。

他在作出解释时受到这些感受的引导，这件事本身甚至完全不能被视为危险。作为进行分析的唯一主体，分析家体验到这些情感，这正是他自己的事务；他必须懂得在适当时机把它们考虑在内，把它们当作技术中的另一根指针来照亮自己。从来没有人说，分析家绝不应当对患者产生情感。我们应当说的是：他不仅必须懂得把这些情感放到恰当位置，不向它们屈服，还必须以技术上定位得当的方式运用它们。

相关知识卡 分析家的无意识、电话听筒与反移情

正因为他认为必须首先从“此时此地”寻找患者某种态度的原因，才认为必须从当时确实存在于两个人物之主体间场域的某种东西中找到它。他很适合认识这一点，因为他确实感觉到：自己对患者的成功怀有敌意，或者至少感到恼怒。

严重之处在于，他认为某种技术授权他从一开始便直接运用这份感受。我这是什么意思？我在反对什么？现在我会试着向你们指出。我说，他自以为有权作出一种我称之为“自我对自我”的解释，或者请允许我玩一个文字游戏——一种“平起平坐”的解释。问题正在这里。换言之，这种解释的基础和机制，同投射机制没有任何可以区分之处。我说“投射”时，并不是说“错误的投射”。

请听清我正在对你们说的内容。在成为分析家以前，我凭借自己薄弱的心理学天赋，曾把一个公式放在一枚小罗盘的底部，用它来衡量某

些处境。我常常对自己说：“情感总是相互的。”不论表面怎样，这绝对是真的。

只要你们把两个主体——我说的是两个，而不是三个——放在同一个场域中，情感就总是相互的。因此，分析家完全有理由认为：既然自己怀有这些情感，对方便有可能被唤起相应的情感。证据恰恰是，患者完全接受了这些情感。当有人对他说：“你怀有敌意，因为你以为我在生你的气。”只须把这句话告诉他，这种情感就会被确立。因此，这种情感已经有效地在那里了，因为只须擦出一粒小火花，它就会存在。

因此，重要的是：主体接受这项解释，完全有其根据。理由很简单，在被分析者与分析家之间如此亲密的关系中，他显然对分析家的情感已有足够觉察，因而会被引向某种对称的东西。问题在于，对防御的某种理解方式，会不会把我们带向一套几乎必然产生某类错误的技术——而这种错误又不是错误。我的意思是，它处在真与假以前；它如此必然地正确而真实，以至于我们无法判断它是否回应了某项真理：无论如何，它都会得到验证。

因此，问题在于这种危险为什么存在。我想，我可以告诉你们原因。对于这种我称作“自我对自我”的防御解释，无论它可能具有怎样的价值，都应当避免。在这类防御解释中，必须始终至少有一个第三项——而“至少”意味着这还不够。实际上还需要更多项，我希望以后能向你们证明这一点。不过今天我只是用几个重要的词开启这个问题，也就是主体之间自我的这些相互功能。

时间已经很晚，不能让我们像我原本希望的那样，深入讨论阻抗与防御之间的关系。不过，我仍想朝这个方向给你们一些提示。在向你们展示某种防御分析技术所包含的问题和危险之后，也在曼诺尼与安齐厄的报告之后，我认为有必要确立若干原则。

有一点非常清楚，值得把它当作起点，以便根据分析对阻抗概念作出完全协调的界定。我认为，弗洛伊德在《梦的解析》中给出了第一个定义。能够阅读德文、手头又有 Imago 版和英文版文本的人，可以在第521页找到它。我要提醒你们，它位于第七章“梦过程的心理学”中，第一节讨论“梦的遗忘”。那里有一个决定性的句子：

“Was immer die Fortsetzung der Arbeit stört, ist ein Widerstand.”〔《梦的解析》：第七章A节〕

它的意思是：

“一切能够破坏、中断、改变工作之继续（Fortsetzung）的东西……”

这里所说的是分析工作。在我们目前所在的梦的分析中，问题不是症状，而是处理，是 Behandlung；就像我们说处理一个对象、处理某种经过若干过程的东西那样。

“一切中断、破坏（stört）工作之继续的东西，都是阻抗。”

遗憾的是，这句话在法文中被译成：“一切解释的障碍都来自心理阻抗。”我向你们指出这一点，是因为对于只能依靠勇敢的梅耶松先生那份颇为友善的译本的人来说，它显然会使生活变得不太容易。这应当

使你们对弗洛伊德的若干译本产生一种有益的警惕。前面的整段文字都是以这种风格翻译的。

德文版紧接在后面的页下注还立刻讨论："如果患者的父亲去世，我们是否也要把它称作阻抗？"——我不告诉你们弗洛伊德怎样作出结论；不过，你们已经看到，阻抗问题在这里以何等广阔的幅度被提出——这则注释在法文版中被删掉了。

〔脚注〕"这里以如此断然的方式提出的命题——'一切干扰工作继续进行的东西都是阻抗'——很容易受到误解。当然，它只具有一条技术规则的意义，是给分析家的一项提醒。我们并不否认，在分析期间可能发生各种事件，而这些事件不能归咎于被分析者的意图。患者的父亲可能去世，却并不是患者杀死了他；也可能爆发一场战争，使分析就此终止。不过，在这项命题显而易见的夸张背后，仍然隐藏着一种崭新而恰当的意义。即使干扰性事件是真实的，而且独立于患者，允许它产生多大干扰效果，往往仍然只取决于患者本人；只要患者欣然且过度地利用这类机会，阻抗就会明确无误地显现出来。"

确实，问题就在这里：

"一切中断、破坏治疗连续性的东西，都是阻抗。"

我认为，我们必须从这类文本出发，先把它们悬置在心中，仔细筛滤，看看会得到什么。归根到底，问题涉及什么？涉及治疗和工作的继续。为了把话说得明明白白，弗洛伊德这里并没有写 Behandlung——那个词可能让人译成"治愈"——不，他说的是"工作"，Arbeit。这项工作由若干事情构成：可以根据其形式、根据其中发生的事情来界

定它，也就是由一项规则决定的言语联想；他刚才已经谈到这项规则，即自由联想的基本规则。

这一切把我们带到那个著名问题：这项工作毕竟存在，而且问题所涉及的就只有它。因为我们正处在梦的分析中，在梦的阐发层面，问题显然是无意识的揭示，绝非其他东西。我们目前所在的位置，就是无意识的揭示。

这已经使我们能够提出若干问题，尤其是安齐厄刚才提到的这个问题：这项阻抗究竟来自哪里？这里有很多话可说。它来自哪里？我们已经看到，《癔症研究》中没有任何文本允许我们认为，阻抗本身来自自我。另一方面，《梦的解析》中的建构也完全没有表明，它以任何方式来自所谓次级过程，更不用说完全来自次级过程了；而次级过程是弗洛伊德思想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阶段。

即使来到1916年前后，弗洛伊德发表了第一篇严格意义上的元心理学文章——die Entfernung——情形仍是如此[注]。我们看到压抑开始显露：第一个指示已经存在——“Der Widerstand（阻抗）……”也就是说，在那个时刻，阻抗确实被构想为发生在意识一侧的某种东西；可是，它的特性从根本上由它同原初遭压抑之物的距离（Entfernung）来调节。因此，阻抗同无意识内容本身的联系，在这里仍然极为明显。我认为，这已经处在一个相当晚的时期；之后我会找出确切日期。这是后来归入《元心理学》著作的第一项研究，属于这套理论演进的中间时期。

> [注] 底本在此写 die Entfernung，并称“1916年前后”。弗洛伊德的原刊书目显示，论文题名为 Die Verdrängung（《压抑》），发表于1915年；Entfernung 是本段随后使用的“距离”一词。译文保留底本说法，并在此标明书目差异。

归根到底，原初遭压抑的是什么？在这个阶段，直到我称作中间时期的这段时间，它仍然始终是过去。这个过去必须得到复原；如果我们想从某种坚实基础出发，构想、提出并界定弗洛伊德所谓“阻抗”，就不能不再次唤起过去就其定义、性质和功能向我们提出的问题与歧义。

可以说，在这个时期发生的一切——可以用《狼人》的时期来刻画它——都围绕着弗洛伊德提出“创伤是什么”这个问题的时刻；对他来说，全部问题都同下面的发现相关：

- 创伤是一个极其含混的概念；
- 创伤的事件性概念无论如何不容置疑，因为所有临床明证都表明，创伤的幻想面远为重要；因此，在主体性参照的秩序中，事件退居次要位置；
- 但另一方面，创伤的日期却是必须死死守住的东西——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问题也正在这里。

听过我关于《狼人》教导的人应当知道，《狼人》中所谈的只有这个问题。毕竟，谁会知道他究竟看到了什么？可是可以确定的是，关于我们不知道的事——他到底看到还是没有看到——即使他确实看到，也只能是在那个特定日期看到，甚至不可能晚一年看到。问题只在这里。我认为自己没有背叛弗洛伊德的思想。只须懂得阅读他；白纸黑字写得很清楚：重要之物只有在历史与承认的视角中才能得到界定。

对于不熟悉我曾经充分展开的整套辩证法的人，我还想努力给出若干概念。我们必须始终从字母表的水平讲起；如果有人觉得这只是重复，我向他们道歉。为了让你们充分理解，我来举一个例子：

- 承认问题提出了什么，又提出哪些问题；
- 以及为什么不能把它淹没在记忆、回忆这类含混概念中：在德文里，Erlebnis（亲历经验）也许还能具有一种意义；而法文 souvenir（回忆）这个概念，无论是否亲历，都容许产生所有歧义。

我给你们讲一个小故事：清晨，我像塞米拉米斯一样在帷幕中醒来。我睁开眼睛……

那是一幅我并非每天都能看到的帘子，因为它挂在我的乡间住所；

我每隔八天或十五天才看到一次。

……我再次从帘子边缘形成的纹路中看见某种面孔的侧影——我说“再次”，因为过去我只有一次以这种方式看见它。那张脸既尖锐、夸张，又显得苍老；对我而言，它依稀代表十八世纪侯爵肖像的风格。我这样说，只是为了呈现心智在刚醒来时任由自己编造的种种傻气幻想。

正是由于这种东西——用今天的话说，这种格式塔式结晶、对一张仿佛早已熟悉的面孔的认出；即使它是墙上的一块污渍，情形也会完全一样——我才能说，那幅帘子一丝一毫也没有移动，因为恰好八天以前，我醒来时看见过同一个东西。当然，我已经把它彻底忘掉了；但正因如此，我才知道帘子没有移动。它始终在那里，恰好位于同一个位置。这是一个寓言，发生在想象层面；不过，要进一步说明也并不困难……而且围绕着这一切的全部象征坐标

都代表着一些傻气的东西——十八世纪侯爵等等——但它们仍然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因为，如果我对那张侧影所代表的东西没有

若干幻想，我也不可能从帘子的边缘认出它。不过，先把这一点放下……

这件事在承认层面所包含的内容——也就是八天以前确实如此——同当下的一次认出现象联系在一起。弗洛伊德在《癔症研究》中采用的恰恰就是这一点。我说“采用”，是因为他提到当时已有一些记忆研究，并援引了其中关于被唤起的回忆与承认的内容；正是承认这股当下在场的力量，赋予回忆的未必是重量和密度，而干脆是它得以可能的条件。弗洛伊德就是这样做的：当他为了获得主体的重建而走投无路时，他总会一边用双手压住患者额头，一边逐一枚举所有年份、月份、星期，甚至每一天：“星期二17日，星期三18日，等等。”

也就是说，他对后来有关下列问题的分析所界定的东西抱有充分信任：

- 什么是记忆；
- 什么是所谓“社会化时间”；
- 主体怎样受到这种社会化时间的内在结构化；……因此，他认为，当时钟指针通过他所作的这种象征化，实际抵达主体的关键时刻时，主体就会说：“啊，对，正是那一天，我想起了一件事。”

我并不是在确认这种办法是否成功。弗洛伊德告诉我们，它确实成功。你们是否充分把握了我正在说的内容所具有的意义？换言之，分

析技术从一开始就预设了主体的重心。从这一点来看，没有理由证明它最终遭到驳斥，因为说实话，事情若不是这样，就完全看不出分析究竟带来了什么新东西：主体的重心，正是过去在当下的这种综合，也就是所谓历史。

当我们要推动工作前进时，所信任的正是这一点。这是事情的第一阶段。它足够吗？不，当然不够。主体的阻抗就在这个层面发挥作用。不过你们将看到，这项阻抗以一种奇特方式表现出来，值得通过绝对个别的病例得到界定和探索。我来向你们提一个病例。弗洛伊德已经掌握了完整历史，是患者的母亲告诉他的。于是他把这段历史告诉主体，对她说："事情就是这样发生的。别人就是这样对待你的。"每一次，这位癔症女患者都会以一场小型癔症发作来回答，也就是再现那场具有特征性的发作。她倾听，然后以自己的回答方式作出回应，也就是以

症状作出回应。如果我们把这称作"阻抗"，它就会提出几个不小的问题。这是我今天要开启的一个问题。

我只想以这样一个问题结束：在《癔症研究》结尾，弗洛伊德把阻抗界定为话语逐渐接近致病核心时出现的这种弯折；也就是说，有某种东西既带来人们寻找的东西，又把话语推开，是话语所逃避的某种东西——它究竟是什么？

可以肯定，只有深入探究这篇话语的意义，我们才能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已经说过，它是一篇历史性话语。不过，我们尚未解决的是：其中的联系究竟是什么？不要忘记，这项技术的起点是一种催眠技术。在催眠中，主体说出整篇话语，甚至以一种格外扣人心弦、近乎戏剧

化的方式说出；这包含听者的在场，而听者的在场是根本性的。可是，主体脱离催眠之后，便不再记得这篇话语。

不过，技术正是从这里入门，因为人们当时发现：创伤的再现本身具有直接治疗作用，即使这种作用并不持久。因此，这篇话语曾经以这种方式被一个能够说“我”的人说出，而没有得到进一步反思；这一点同主体息息相关。我们至少可以说——你们绝不会没有看见——在癔症第二状态阶段，创伤表面上被亲历、被重新亲历；这种说法完全含混。因为，事情被戏剧化、以充满激情的面貌呈现，并不足以使“重新亲历”这个词本身令我们满意。

主体承担自己的亲历经验，这究竟是什么意思？我之所以把问题推到最为含混之处，也就是主体催眠的第二状态，是因为在那里，问题显然会被提出。而在分析经验的所有层面上，事情都完全一样，因为始终存在这个问题：一篇话语意味着什么？

我们强迫主体把这篇话语置于一个特定括号中，也就是基本规则的括号中。这项规则归根到底对他说：“你的话语并不重要。”它所包含的甚至更多：主体一旦投入这项练习，就已经只对自己的话语半信半疑，因为他知道，自己随时都处在我们解释的交叉火力之下。

所以，他对解释有所预期。问题恰恰是：话语的主体是什么？下一次，我们将从这里继续，并尝试针对这些根本问题，讨论阻抗的意义及其作用范围。

第5课 · 1954年2月3日

上一次，我们最终抵达了这样一个问题：阻抗的性质是什么？今天，我想作几点评论，引导你们以某种方式把握经验层面上的一个现象。你们将会看到，这同我们处理多面向词汇的某种方式有关——多面向并不意味着含混。我想从一个特定角度让你们看到：在朝向分析的经验中，显现为阻抗的东西，可以在其源头处从哪里被认出来。

我们接近这个可称为阻抗的现象时，不只面对复杂性；你们也已经充分感受到其中的含混。根据弗洛伊德的若干见证和若干表述，阻抗似乎发自有待揭示的东西，换一种说法，就是所谓遭压抑之物——das Verdrängte——或者遭压制之物——das Unterdrückte。

最早的译者把 unterdrückt 译成"被闷住的"（étouffé），这个词实在太软弱了。verdrängt 与 unterdrückt 是同一回事吗？我们暂且不进入这些细节。只有当我们开始把握这些现象，并看见它们之间的视角与区分建立起来时，才会讨论这一点。

今天，我想把你们带到一个东西面前。在我们评注过的文本、也就是这些短小的《技术著作》中，它似乎正是让视角得以建立的一个关键点。和往常一样，在操弄词汇以前，我们必须先努力理解，先站到一个使事物能够排列成序的位置。

在周五的病人访谈演示中，我曾向你们预告一件事，现在会努力兑现承诺。你们看，这本文集正中间有一篇文章，题为《转移的动力学》[注1]。同文集中所有译文一样，我们不能说这篇文章的翻译足以令我

们完全满意。其中有些奇特的不准确之处，甚至接近用词不当的边缘；有些令人吃惊，却全都朝着同一个方向：磨平文本的棱角。对于懂德文的人，我再怎样建议他们回到德文原文也不为过。他们会在这篇讨论转移动力学的文章中看到很多东西。

> [注1]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转移的动力学》（Zur Dynamik der Übertragung），载《精神分析技术》，法国大学出版社，1953年，第50页。

就翻译而言，有很多话可说；尤其是倒数第二行的一处断开，一个句号把一句极短的话孤立出来，使它看起来莫名其妙地突然出现在那里：

“最后，让我们记住：无人能够在其缺席（in absentia）或其替身形象（in effigie）中被杀死。”

而德文原文写的是：

“……因为必须记住：无人能够在其缺席（in absentia）或其替身形象（in effigie）中被杀死。”

〔德文原句〕“不可否认，制服转移现象给精神分析家造成了最大的困难；不过，我们不应忘记，恰恰是这些现象为我们提供了无法估量的帮助，使患者那些隐蔽而被遗忘的爱欲冲动成为当下的、显明的东西；因为归根到底，无人能够在其缺席或其替身形象中被杀死。”

它同前一句连在一起。这句话一旦被孤立，就显得无法理解；而弗洛伊德的句子本来衔接得十分严密。我曾向你们预告，这段话格外富有意义，现在我要把它读给你们听。它似乎直接接续了我试图引导你们理解的内容：我曾提醒你们注意《癔症研究》论心理治疗那篇文章中

的重要段落。那里谈到主体话语以弗洛伊德所谓“径向”逐渐接近深层核心——也就是他所谓致病核心——时所遭遇的阻抗。

不得不用法文读它，实在令人苦恼。

“让我们考察一个致病情结；它有时表现得十分明显，有时则几乎难以察觉……”〔德文原句开头意为：沿着一个致病情结，从它或以症状显眼、或完全不显眼的……〕

如果知道德文原文，勉强可以把它译成“它的表现”；不过，德文中“有时十分明显，有时……”这部分放在括号里。

……“或者，它作为症状显现出来；或者，它完全无法被把握，完全不显现。”

问题涉及情结怎样表现；当人们说它明显或难以察觉时，所谈的正是情结的这种表现方式。若说情结本身如何……那就不是同一回事了。这里发生了一处置换，已经足以造成某种摇摆不定。

“从它在意识中的表现，一直追溯到它在无意识中的根源，我们很快便抵达一个区域；在那里，阻抗变得

如此鲜明可感，以至于接着出现的联想带上了这项阻抗的印记，并向我们显现为一种妥协，

它调和着阻抗的要求与研究工作的要求。”

〔德文原句〕“若从它在意识中的表征朝向其无意识根源追踪，很快便会进入一个区域；在那里，阻抗如此清楚地发挥作用，以至于接下来

出现的念头必须顾及阻抗，并显现为阻抗要求与研究工作要求之间的妥协。”

这里并不完全是“涌现出来的联想”，而是 der nächste Einfall，也就是最邻近的、接下来出现的联想。不过，意义总算保留下来了。

> “经验——关键点就在这里——表明，转移正是在这里出现。当情结材料中的某个东西、
>
> 情结内容中的某个东西，适合转到医生身上时，转移便形成，提供接下来出现的观念，并以
>
> 阻抗的形式表现出来，例如联想的停顿。这类经验告诉我们，转移观念之所以优先于所有其他可能的联想，成功潜入意识，
>
> 恰恰是因为它满足了阻抗。”

〔德文原句〕“根据经验，转移正是在这里出现。倘若情结材料——也就是情结内容——中的某个东西适合转移到医生本人身上，这项转移便会形成，产生接下来出现的念头，并通过阻抗的迹象——例如一处停顿——表明自己。我们从这项经验得出结论：这个转移观念之所以先于所有其他可能的念头进入意识，是因为它也满足了阻抗。”

这一点在弗洛伊德原文中以斜体标出。

“这类过程会在一次分析中重复无数次。每当人们接近一个致病情结，情结中能够形成转移的部分总会首先被推入意识，而患者则极其顽固地坚持防守它。”

〔德文原句〕“这类过程会在一次分析的进程中重复无数次。每当人们接近一个致病情结，情结中能够转移的部分总是最先被推入意识，并以最大的顽固性得到防守。”

因此，这一段需要凸显的要素如下：

- “我们很快便抵达一个区域；在那里，阻抗变得鲜明可感。”

所以，我们处在这样一个层面：这项特有的阻抗发自过程本身，也就是可以说，发自话语逐渐接近核心的过程。

- 第二，“经验表明，转移正是在这里出现。”

- 第三，转移之所以产生，“恰恰是因为它满足了阻抗”。

- 第四，“这类过程会在一次精神分析中重复无数次”。

这确实是分析中一个可以观察、可以感知的现象。情结中以转移形式显现的这个部分，在当时被“推向意识”，而“患者极其顽固地坚持防守它”。

这里接有一则注释，它将凸显我们讨论的现象。这个现象确实可以观察到，有时甚至显得格外纯粹。实践所建议的干预顺序、我们可能得到传授的指示和办法，无疑也向我们标出了它；这些内容直接来自弗洛伊德的另一篇文本〔法国大学出版社版，第52页〕：

“当患者沉默时，他的话语之所以枯竭，很可能是因为某个同分析家有关的思想。”

在一种并不少见的技术处理方式中，这句话常常被转化成下面的问题；不过，我们已经教会学生对它加以衡量和克制：

“你大概有某个或多或少同我有关的念头，或者有某个相去不远的东西吧？”

〔脚注〕“不过，不能因此笼统地推断：为了形成转移阻抗而被选中的要素，具有特殊的致病意义。如果一场战役为了争夺某座小教堂或一所孤零零的农舍而打得格外激烈，并不需要因此认为这座教堂是民族圣地，或这所房子里藏着军队的财宝。这些对象的价值可能纯属战术性，甚至只在这一场战役中才发挥作用。”

在某些情况下，这种引导确实会使患者的话语凝结成若干涉及分析家的装束、相貌、家具，或分析家当天接待患者的方式等评论。当然，这并非毫无根据；当时确实可能有这一类东西占据患者的心智。通过鼓励患者引导联想进程、把联想聚焦到某个方向，我们可以从中提取出许多不同的关系；这里已经存在很大的多样性。

不过，在这“无数次”之中，有时会观察到某种远为纯粹的东西：当主体看起来即将表现出来、即将表述某个比主体真理进程中曾经抵达的一切都更切近、更真实、更灼热的东西时，他中断了自己；在某些情况下，他甚至能够把它说成如下话语：

他在那一刻突然说：“我意识到了您的在场这个事实。”

在我的经验中，这种事情发生过不止一次；我想，分析家也很容易为类似现象提供见证。这里有某种东西，同阻抗可感而具体的显现建立

起联系；在所有这些事实之中，阻抗正是在我们经验的纹理层面，根据转移而介入。

这个东西因而获得了一种特别受到选择的价值，因为主体本人把它感受到为话语的一次突然转折。正因为这个现象对他而言具有主观上的特殊面貌，他无法为它提供见证；然而与此同时，他又把这项见证显现为另一种东西的表达，显现为一次突然转向——它使主体从话语的一个坡面转到另一个坡面，甚至几乎可以说，使他从言说功能的一种重音转到另一种重音。

我重新来说。刚才，我只是想立刻把这个现象以充分居中、聚焦的方式摆在你们面前；我认为，它能够照亮我们今天的讨论，也是让我们重新出发、提出若干问题的关键点。继续这一步骤以前，我想再次停在弗洛伊德的文本上，让你们充分看清：弗洛伊德本人标出这个现象时，他所谈的与我刚才所谈的是同一件事。我想让你们暂时摆脱一种观念：仿佛阻抗同下面这整套建构相一致——在某个特定时刻、对某个特定主体而言，无意识是被装在里面、并且如人们所说“遭到压抑”的东西。

无论我们后来把“阻抗”一词扩展到多大范围、怎样把它同全部防御相联系，弗洛伊德在这里都把它定位、聚焦为分析经验中的一个现象。因此，我将补入阅读的这则短注十分重要〔法国大学出版社版，第55页〕。弗洛伊德在那里把话说得十分明确：

“不过，不应由此推断它具有致病重要性……”

这正是我刚才在说的：这里所涉及的，并不是我们在事后所构想的那种主体内部的重要东西，也就是曾在深层意义上推动其发展各阶段的东西。

……“不能推断为了形成转移阻抗而被选中的要素，具有格外重大的致病意义。一场战役中，战士们若为了占领一座小钟楼或一所农舍而激烈争夺，我们不会由此推断那座教堂是民族圣地，或农舍里藏有军队的财宝。地点的价值可能只是战术性的，而且只存在于这一场战斗中。”

〔德文脚注〕“不过，不能因此笼统地推断：为了形成转移阻抗而被选中的要素，具有特殊的致病意义。如果一场战役为了争夺某座小教堂或一所孤零零的农舍而打得格外激烈，并不需要因此认为这座教堂是民族圣地，或这所房子里藏着军队的财宝。这些对象的价值可能纯属战术性，甚至只在这一场战役中才发挥作用。”

你们已经看清这里所涉及的现象：它同主体逐渐吐露自己的运动有关。弗洛伊德告诉我们，在这个运动中会出现某种作为阻抗的东西。当这项阻抗变得过强时，转移就在此刻出现。这是一个事实；弗洛伊德并没有说“现象”，他的文本十分精确。倘若他写的是“出现了一项转移现象”，就会把“现象”写出来；可这里没有。证明他本会写出这个词的是：在文章结尾的最后一句，也就是法文中以如下话语开头的句子里——

> “让我们承认，在分析中，没有什么比……更困难”——法文译成：“比战胜阻抗更困难”；

而德文原文写的是：

“die Bezwingung der Übertragungsphänomene：制服转移现象。”

〔德文原句〕“不可否认，制服转移现象给精神分析家造成了最大的困难；不过，我们不应忘记，恰恰是这些现象为我们提供了无法估量的帮助，使患者那些隐蔽而被遗忘的爱欲冲动成为当下的、显明的东西；因为归根到底，无人能够在其缺席或其替身形象中被杀死。”

我不知道人们为什么把“转移现象”译成“阻抗”。我引用这段话，是为了让你们看到，Übertragungsphänomene（转移现象）属于弗洛伊德的词汇。为什么要把它译成阻抗？这既不是博学的标志，也不是充分理解的标志。

弗洛伊德写的是，转移恰恰在这里出现；他没有说出现的是“转移现象”——他毕竟应当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也就是说，这里存在某种同转移有根本关系的东西。至于文章其余部分，从头到尾讨论的都是转移的动力学。这确实是文章所提出全部问题的中心点。我不会把那些问题完整拿来，因为它们全都涉及分析中转移功能的特殊性：转移在分析中存在，却不是以它在其他任何地方存在的方式存在；它在分析中发挥着完全特殊的功能。这就是文章的核心和枢纽，我建议你们阅读它。

我引入这篇文章，是为了支持一个围绕阻抗的核心问题。不过你们将看到，文章的枢纽仍然是它真正讨论的东西，也就是转移的动力学。这能让我们对阻抗的性质认识到什么？也许正是某种可以决定我们上一次讨论走向的东西。

从某个时刻开始：是谁在说话？重新夺回无意识、重新找回无意识，这是什么意思？我们已经提出了这些问题：记忆、回忆、回忆的技术

分别意味着什么？自由联想让我们沿一条特定道路通达某种对主体历史的表述，它又意味着什么？可是，主体变成了什么？在这一进程中，所涉及的始终是同一个主体吗？现在，我们面对一个现象；在那里，我们把握到某种结、某种连接，把握到一种可以说是原初的压力，或者更严格地说，把握到这一进程中的一项阻抗。

我们看到，在这项阻抗的某一点上，产生了某种弗洛伊德称作“转移”的东西，也就是分析家本人在某种意义上的当下化。我刚才从自身经验中提取出一个东西告诉你们：在这个现象最敏感、在我看来也最具意义的点上，主体把它感受为对某种不易界定之物的突然察觉——一种亲历的现象，也就是在场感。

坦率地说，我们并非始终拥有这种在场感。我们受到各种在场的影响；我们的世界之所以真正具有一致性、密度和亲历的稳定性，是因为我们以某种方式把这些在场考虑在内。然而，要真切体认这些在场之为在场——你们很容易感觉到——却是我们倾向于不断从生活中抹去的东西。倘若我们每时每刻都感受到在场及其包含的一切，尤其感受到它最深处包含的奥秘，生活甚至不会容易维持。我们更倾向于把这个奥秘排除在外；概括地说，我们已经习惯了它。

我认为，我们无论在这一点上停留多久都不算过分；下面将尝试从其他端点把握并认出它。弗洛伊德恰恰教给我们这样一种良好的分析方法：在各种亲历形式中、偶尔在行为中，以及分析关系内部发生的一切之中，始终重新找出同一个关联、同一种关系、可以说同一个图式——换言之，在所谓“不同层面”上重新找到它。

以这个点为依据，我们要努力建立所谓的透视，也就是对若干平面彼此分离之深度的一种知觉。我们已经习惯通过某些操作、某些概念——我们的“标签”——以整体而严格的方式安置一些东西；例如，概括地说，本我与自我。可是，它们也许并不只是同一组彼此对照的二元项吧？

从这个方向看，某种东西存在着；我们看到一种更为复杂的立体层次逐渐展开。对于一年半以前听过我评注《狼人》——如今似乎已经十分遥远——的人，我想提醒你们注意文本中某些格外醒目的东西。

当我们抵达弗洛伊德讨论这个主体的阉割情结之时——它在病例观察的不同位置涌现、显露，但显然在这个主体的结构化中具有极其特殊的功能关系——弗洛伊德开始向自己、也向我们提出若干问题。

尤其是下面这个问题：当这个主体在某个时刻涉及对阉割的恐惧时，我们看到出现了——

- 一整系列症状，它们位于我们通常所谓肛门层面上；
- 各种肠道表现；……归根到底，他最后提出的问题是：我们把所有这些症状都放在所谓肛门式性关系构想的层面上进行解释，而这属于幼儿性欲理论的一个特定阶段。

这是怎么回事？因为阉割已经在此刻进入作用，主体也就提升到了生殖器结构的层面。这是他自己的性欲理论。弗洛伊德接着向我们解释了某个显然十分奇特的东西。

他的解释如下：主体借助不同因素——其中首先是成熟——抵达第一次幼儿成熟，或者说幼儿早熟；通过若干阶段，主体已经成熟到可以至少部分实现一种更为明确的生殖器式结构，把握父母之间的人际关系。这时，弗洛伊德告诉我们：为了使这个主体拒绝自己在这项关系中占据的同性恋位置、拒绝对俄狄浦斯处境的这项实现，有一些机制开始作用——这就是观察所得。主体拒绝、拒斥了这个层面的一切，恰恰拒斥了生殖器实现层面的一切；德文动词是 verwirft。

他退回到自己对这份情感关系的早先理解，退守到肛门式性欲理论的位置。换言之，这里所涉及的甚至不是压抑，并不是某个东西已经在一个特定层面实现，随后又被推回去。

弗洛伊德说，压抑是另一回事：

> “Eine Verdrängung ist etwas anderes als eine Verwerfung.”——“压抑与拒斥是两回事。”

而在我们手头的法文译本中……

译者同弗洛伊德的亲近，本来或许应当给她们更多启发；然而，曾经携带一位杰出人物的圣物，

显然还不足以使人有权自任为这件圣物的守护者。

……它被译成：

> “压抑不同于一种作出排斥与选择的判断。”

为什么要把 Verwerfung（拒斥）译成“判断”？我承认，这个词很难翻译；不过法语终究还是……

伊波利特——拒斥。

拉康

是的：拒斥，或者视情况译成拒绝。为什么要突然把判断引进来？这就是判断理论吗？至于我们差不多正在这里涉及的真理问题，突然把“判断”引入一个根本没有 Urteil（判断）痕迹的层面，算什么呢？这一段完全没有这样的东西！弗洛伊德这一段里根本没有！这里只有 Verwerfung（拒斥）。

再往后，三页以后，在阐发这套结构的种种后果之后，他于第11行重新整理问题并得出结论，告诉我们：“kein Urteil über”——这是 Urteil（判断）第一次出现，是为了收束论述。可这里当然根本没有！对于阉割问题是否存在，没有作出任何判断。

“Aber es war so：不过事情已经如此；als ob sie nicht existierte：仿佛它并不存在。”〔完整德文句意：“严格地说，这并未对它是否存在作出判断；不过，事情就像它不存在一样。”〕

根据我们正在提出的问题——阻抗是什么、压抑是什么——这个重要的衔接向我们表明：要使压抑本身成为可能，必定有某种最终的东西存在于它的起源处，也就是另一个东西，甚至某种超越这段历史的东西。在那里，早在起源处便已有某种东西原初地构成起来——我只知道弗洛伊德所说的内容——它不仅不吐露自己，而且因为没有得到表

述，便在字面上“仿佛并不存在”；然而，在某种意义上，它仍然位于某处。

因为弗洛伊德到处告诉我们：最初这枚压抑核心构成一个吸引中心，把后来所有压抑吸引到自身。即使这不是在阻抗问题上直接说出的，它也以各种形式得到表达。我甚至会说，这正是他的发现的本质：归根到底，不必诉诸某种先天倾向——尽管他偶尔把它承认为一个宏观的一般框架——但在原则上，他从不借此解释某种特定类型的压抑怎样发生，不论是癔症式还是强迫症式的压抑。

请阅读1898年的《神经症论札记》第二篇，也就是讨论防御性神经症的文章[注2]。如果压抑有时采取某些特定形式，是因为最初压抑核心发挥着吸引力；而在那个时刻，这个核心来自某项弗洛伊德所谓“原初创伤经验”的经验。

> [注2]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关于防御性神经精神病的进一步说明》（Weitere Bemerkungen über die Abwehr-Neuropsychosen），《神经学中央杂志》，1896年第10期；亦见《神经症学说小文集》，1922年，第111页。正文保留讲者所说“1898年”。

这是以后还要重新提出的问题：“创伤”是什么意思？我们必须以一种特殊方式使它相对化，也必须提出想象的问题……这一切都很有意义。

不过，这个原初核心位于压抑各阶段、各种变迁之外的其他地方；它在某种意义上是压抑的背景和支撑。我暂时悬置《狼人》这个主题——稍后还会回到这里——因为在《狼人》所发生之事的结构中，这个极其独特的拒斥时刻，也就是对经验作为生殖器经验的拒斥，具有

一种十分特殊的命运；弗洛伊德本人也在后文中把它同所有其他机制区分开来。

奇特的是，这个东西在某种意义上被排除在主体的全部历史之外，也被排除在主体能够说出的一切之外；归根到底，这正是这项病例观察的一个推动机制。必须有弗洛伊德的强制介入，必须真正运用那套技术，才能最终处理它：反复出现的童年梦由此获得意义，并且不通过重新亲历，而是直接重建这个主体的历史。我们会看到，主体的历史中是否出现过某个东西，如果出现，那又是什么。我暂时把它悬置起来。

让我们从另一端着手，从弗洛伊德教会我们看见的东西着手。我们拿起《梦的解析》，翻到关于梦过程（Traumvorgänge）的部分〔第七章〕开头。在第一部分，弗洛伊德同意把他在这部根本著作中全部阐发所得的内容讲述出来；这一章以如下精彩句子开头：

“要通过描述中的前后相继来呈现一个复杂过程的同时性——”因为他再次回到并重新阐发关于梦已经说明的一切——“同时又让每一次新的陈述看似不带任何预设，这实在十分困难。”〔参见第七章第五部分开头：法国大学出版社1950年版第480页、1967年版第500页、2003年版第643页。〕

〔德文原句〕“要通过描述中的前后相继来再现如此复杂关联的同时性，同时又在每项陈述中显得不带预设，这超出了我的能力。”

这句话所代表的，正是我在这里也面对的困难：这个问题始终存在于我们的经验中，我不得不一次次回到它，以不同形式、从每次都显得崭新而孤立的角度把它重新建立起来。在梦过程研究的第一部分，也

就是这一章讨论遗忘现象之处，弗洛伊德告诉我们什么[注3]？必须阅读这些文本，每一次都必须重新成为一个毫无成见的人。这一章确实发生了某种推进；在那里，我们仿佛能亲手触及一个格外奇特的东西。

> [注3]　参见《梦的解析》第七章第一部分：法国大学出版社1950年版第423页、1967年版第436页、2003年版第564页。

谈到梦的遗忘及其意义时，他通过所有可以针对梦之记忆的有效性提出的异议来接近这个现象：

“这个梦究竟是什么？主体对它的重构准确吗？我们无法保证，其中没有混入某种可称作事后言语化的东西。每个梦难道不都是某种瞬间之物，而主体的言说又为它重新建立起整段历史吗？”

他把这一切以及更多东西排除在外。他通过表明这些异议没有根据、表明问题不在这里，而把它们全部排除。与此同时，他越来越清楚地展示出一件格外奇特的事：归根到底，主体交给我们的文本越不确定，它就越富有意义。主体对梦的某些部分所怀的怀疑，恰恰会使那位等待并倾听主体、在那里揭示其意义的人看出：重要部分正在那里；正因为主体怀疑它，所以必须确信这一点。不过，随着这一章推进，这套办法被削减到这样一个地步：到了极限，几乎可以说，最有意义的梦会是一个被彻底遗忘、主体对此无话可说的梦。问题走得如此之远，因为归根到底，弗洛伊德差不多正是这样说的：

“分析往往能够重新找回被遗忘所丢失的一切。在一系列病例中，只须一些残片，便能重新找回——不是那个并不重要的梦，而是作为其基础的思想。”

“一些残片”——正如我对你们所说，梦本身已经什么都不剩了。不过，弗洛伊德感兴趣的是什么？我们显然会在这里碰到这些“作为梦之基础的思想”。每当谈到“思想”这个词时，对于学过心理学的人来说，没有什么比它更难操弄。因为按照我们学到的心理学，这些思想会变成某种我们这些惯于思考的人不断在脑中翻滚的东西。

可是，也许整部《梦的解析》已经给了我们足够启示，使我们看见：这些“作为梦之基础的思想”，同人们研究思想现象学时所谓“无意象思想”或“有意象思想”等东西并不完全相同，也不同于我们通常称作思想的东西，因为这里始终涉及的是一个欲望。

天知道，在这项探究的进程中，我们已经学会看到，这个欲望就像一只奇特的雪貂，在某种障眼法中反复消失又重新出现。归根到底，我们并不总能确定它是在无意识一侧，还是在意识一侧；关于退行的那一章将会讨论这个问题。

这个欲望想必还藏着若干问题，甚至某种奥秘；因为仔细考察这里所说的欲望，它所提出的恰恰就是上次课末尾提出的问题：这是谁的欲望？尤其是，它出自何种缺失？不过，重要的是我们在这里看到的东西。接下来，一个例子立刻对它作出说明。我只采用这个手边的例子；弗洛伊德在《讲演录》也就是《精神分析引论》的一则短注中提取了它。

他谈到一位对弗洛伊德既怀疑又很感兴趣的女患者。她作了一个相当长的梦；弗洛伊德说，梦中有几个人向她谈起我那本讨论 Witz（诙谐）的书，而且称赞它。这一切——你们看到，它在这里多么显而易见——似乎并没有带来特别丰富的东西。接着又涉及某个东西，而梦

留下的全部内容只有“水道”（canal）这个词。也许是另一本书，那里有“水道”这个词；或者是某个涉及水道的东西。她不知道，一切都十分晦暗。弗洛伊德把它当作梦分析的例子。只剩下“水道”，人们不知道它指什么，从哪里来，又通向哪里；也许来自一本书，或其他某个东西，但没有人知道究竟是什么。

弗洛伊德说：“最有意思的正是这个东西。”我们面对的，不只是一小段残片，而是一丁点被不确定光晕围绕的残片。它会带来什么？下面我要说的并不是最有意思之处，不过，它带出了完整故事。

第二天——而不是当天——她说，自己想到了一件与此有关的事；它恰好是一则诙谐：从多佛横渡到加来时，一位英国人与一位法国人交谈，英国人引用了一句名言：

“从崇高到可笑，只有一步（pas）之遥。”那位彬彬有礼的法国人回答：“是的，加来的一步（le pas de Calais）。”

这对他的谈话对象可真是“格外客气”。而加来海峡（le pas de Calais）正是英吉利海峡（le canal de la Manche）的一部分。于是，“水道”又被找到了；与此同时，还找到了什么？必须看清，它所发挥的功能同阻抗时刻的那次涌现完全相同。

问题显然在这里：这位怀疑的女患者先前曾经长篇讨论弗洛伊德在诙谐问题上的长处。讨论过后，当她的确信、她的话语开始犹豫，因而不知道应当走向哪里时，同一个现象恰好出现。正如曼诺尼前几天用一个令我觉得十分恰当的产科比喻所说：“阻抗以转移的一端先露出来。”

“从崇高到可笑，只有一步之遥”，这就是梦同听者挂接的点；这里的听者是弗洛伊德。“水道”显然算不上很多；不过经过联想，它就在那里，并且可以说无可争议。

这个小例子之后，我还想采用另一些例子。不得不说，如果扩大考察范围，我们会在那里看见非常奇特的东西，尤其会看见贯穿这一整章的紧密联系；天知道，弗洛伊德在组织事实时何其敏锐。

事物在某些章节中聚集起来，并非偶然。例如，在梦获得某种取向的这个时刻，梦中会发生一些格外属于语言秩序的现象：主体犯下一个语言错误，而且主体完全意识到它是语言错误；梦中另一个人物介入，纠正并向他指出错误。这样一来，它恰好同这个时刻保持一致、彼此呼应：话语在某个关键点适应某个东西；这种适应不仅实现得很糟，还在我们眼前分裂成两重。

我们暂且把它放在一边。再取一个例子——今天早上我多少随机选中的——也就是弗洛伊德早在1898年就发表的著名材料。在《日常生活的精神病理学》第一章中，弗洛伊德谈到名字遗忘时，提起自己有一次旅行中同人交谈，却怎么也想不起奥尔维耶托大教堂那幅著名湿壁画作者的名字。你们知道，那是一组宏大的画面，表现世界末日时预期发生的现象，以及围绕敌基督显现的一切。

他试图找回的湿壁画作者是西尼奥雷利，却怎样都想不起来。另一些名字接连出现：是这个吗？不是这个。他想到波提切利、博尔特拉菲奥，却始终找不回西尼奥雷利。

后来，他借助一种分析程序重新找到了它；再后来，他又把它当作研究实例。下面就是所得结果。这个小现象并非凭空涌现，而是嵌在一篇文本、嵌在如下情境中：

- 他正同一位先生交往；
- 他正在说话；……而此前发生的事情非常值得注意。

当时，他们正从拉古萨前往达尔马提亚内陆，差不多来到奥地利帝国的边界，也就是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谈到若干轶事时，波斯尼亚这个词出现了，黑塞哥维那也是如此。

随后，他们谈到当地某些穆斯林患者面对一种原始前景时所表现的格外可亲态度。这些人已经完全融入伊斯兰文化的风格；医生宣布一个极坏的消息、告诉他们疾病无法治愈时，他们的表现格外端庄。弗洛伊德的谈话对象似乎是一位在当地行医的医生。这些人丝毫没有向医生表现出敌意，而是立刻对他说：

“先生（Herr）！如果还有什么可做，您肯定已经有能力把它做到。”

于是，面对某种不得不接受的东西，他们仍然对医生保持一种十分客气、克制而尊重的态度，以德文“Herr”（先生）称呼医生。所有这些形成了背景；对话的后续似乎已在这个背景上初步建立，而那次富有意义的遗忘将为它加上标点，并向弗洛伊德提出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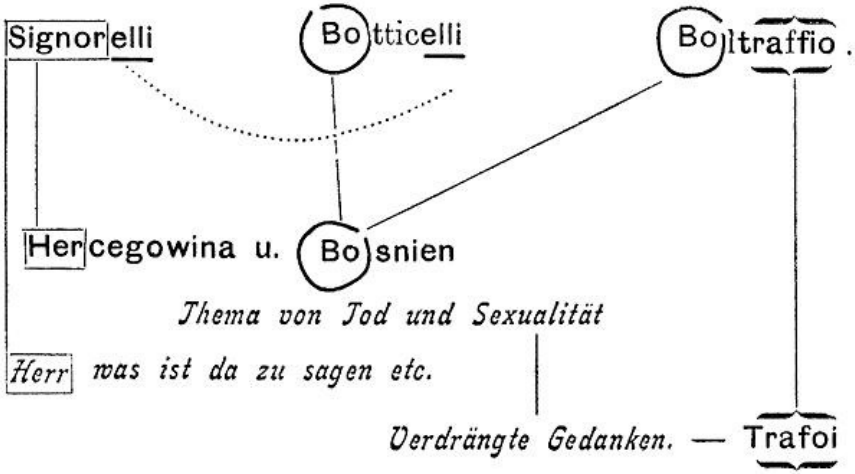
弗洛伊德向我们表明，他本人开始参与这部分谈话。事实是，他说，从某个时刻起，即使自己还在讲述那个故事，注意力也已经完全转到别处；他一边讲，一边想着另一件事。这另一件事由那个医疗故事、

由那些如此可亲的患者所采取的态度带到他脑海中，并使他想起两个主题：

- 一方面，他知道这些患者——尤其是穆斯林患者——多么重视一切有关性功能的事情。他曾亲耳听一位因性能力障碍前来求诊的患者说：“如果连那个都没有了，生活也就不值得继续。”

- 另一方面，他想起，自己曾在一个逗留过的地方得知一位长期治疗的患者去世。弗洛伊德告诉我们，这类消息总会带来某种震动。

他没有把这些事情说出来，因为他不太确定谈话对象怎样评价性过程；另一方面，他也不愿把思绪停留在那位患者的死亡上。他说，自己把全部注意力从正在说的事情上撤走了。弗洛伊德画了一张小表；你们可以回到那篇文本，Imago 版里有一张十分精巧的小图。



他把波提切利、博尔特拉菲奥、黑塞哥维那、西尼奥雷利这些名字全部写出来，下面则写上“遭压抑的思想”、Herr　这个音和有关问题。结果，在某种意义上，下面这些东西留了下来：

- “Signor”由“Herr”召来；那些人说话时把这个称呼用得如此恰当；
- “Traffio”则由他在那里收到患者噩耗时所受的震动召来。

于是，当弗洛伊德在话语中试图找回奥尔维耶托湿壁画作者时，能够重新找到的，在某种意义上正是仍然可以利用的东西；因为若干词根性的要素已经被他所谓“遭压抑之物”召走：

- 关于穆斯林性事的观念；
- 以及死亡主题。

这是什么意思？“遭压抑之物并没有那么遭压抑”，因为弗洛伊德立刻在自己的话语中把它交代出来，只是没有对旅伴谈起。不过，归根到底，事情确实仿佛是这样发生的：这些词——我们完全可以说是词，即使它们只是词的一部分；这些语词构成词，因为它们各自过着词的生活——这些词就是弗洛伊德真正必须说出的那部分话语。从此以后，他也明确告诉我们：“这就是我没有说的东西。”

可是，他没有说的东西，仍然是他本人实际上已经开始说的东西；那才是他感兴趣的，也正是他准备对谈话对象说的。由于没有把它说给对方听，在此后同一个谈话对象的联系中还剩下什么？只剩下这番言说的残骸、碎片和落下物——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

你们是否看到了，现实层面发生的现象同梦的层面所发生的现象是何等互补？也就是说，我们眼前所见的一切，都是相对于一番真实的言说而言的；天知道这番真实的言说能够激起多么深远的回响。因为归根结底，它所关涉的，不正是它谈论的那个绝对者吗——也就是在场于此的死亡；而弗洛伊德告诉我们，他本人宁愿不去过多地面对它，这并不只是由于他的谈话对象。

天也知道，医生如何把死亡问题亲历为一个掌控的问题：毕竟在这件事上，他输了。我们总是这样感受患者的离世，尤其是当我们已经为他治疗了很长时间的时候。那么，恰恰是这一点“砍掉了”SIGNORELLI的头，因为一切都集中在这个名字的第一部分及其全部语义回响周围：

- 正是由于这番言说没有被说出，它才得以揭示弗洛伊德之存在的最深秘密；

- 正是由于它没有被说出，他此后才只能凭借这番言说的落下物来抓住他者。原先存在着某种东西，如今只剩下它的残骸。

遗忘现象由此显现于某种东西之中，这东西从字面上说，就是言说在其与他者的关系中的降格。我想通过所有这些例子引向的，正是这种含混的含义——你们将会看到，“含混”一词在这里是恰当的：正是由于主体那里对存在的坦承未能抵达终点，才会产生某种东西，使言说从字面上整个滑向它抓住他者的那一侧。

我说它是含混的，因为言说抓住他者，当然并不外在于它的言说本质——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言说恰恰就是这个：它是中介；而这尤其是我迄今一直教给你们的——它是主体与他者之间的中介。当然，

这种中介本身就包含着他者的实现；也就是说，言说能够把我们同他者联结起来，乃是他者的这一实现的一个本质要素。我一直强调的正是这一面，因为我们始终都在其中移动。

但是另一方面，这种言说……

我要强调：从弗洛伊德的视角出发，我们不能把它称作“表达”。今年夏天，我撰写了关于《言说与语言的功能与场》的一切文字，却没有使用“表达”一词——这是有意为之。

我们不可能看不到，弗洛伊德的全部著作都是朝着揭示、而不是朝着表达的方向展开的。

无意识并不被“表达”，除非是通过变形、通过 Entstellung、通过扭曲、通过换位。

弗洛伊德发现的全部旨趣都表明：这里存在着某种有待“揭示”的东西。

……言说的另一面就是揭示，也是我们在分析经验中所寻找之物的“最后动力”。恰恰在某个被我们称作阻抗的东西出现之际——我们今天所要追问的正是它本身的含义——事情发生在言说没有被说出的限度内……

又或者，正如施特尔巴在一篇文章[注4]结尾处以十分奇特的方式写道——那篇文章既是最糟糕的东西之一，却又如此天真、坦率——文章题为《命运，das Schicksal》，把全部分析经验都围绕着自我的二分来组织：其中一半前来帮助我们，对抗朝相反方向而去的另一半。到了

结尾，他再也无法从中脱身。一切都在那里：什么进入言说，什么被推向言说。

> [注4] 理查德·施特尔巴：《治疗过程中的自我命运》（Das Schicksal des Ichs im therapeutischen Verfahren），载《国际精神分析杂志》（Internationale Zeitschrift für Psychoanalyse），1934年，第20卷，第66—73页。

言说的这一到来，就某种东西也许使它在根本上成为不可能而言，正是关键点，是分析中的本质枢纽：在这里，言说可以说整个倒向它与他者发生关系的功能，而一切都处于这种抓住他者发生的层面。

必须被某些理论化、教条化以及在分析技术中列队站班的方式愚弄到某种程度，才会说出这种话——仿佛一个人凭借此前的全部训练，就能比另一个人更善于重视主体与分析家的这种存在关系——有人曾经告诉我们，分析治疗的先决条件之一，是主体须对作为他者的他者有某种实现。当然，真是高明！可问题只在于：这个他者是在什么层面、以何种方式、在何种功能中、在主体性的哪个圈层里被实现的；这个他者处于怎样的距离。我们知道，在分析经验的过程中，这一距离不断变化；若硬要把它看作主体的某个阶段、某个步骤……

正是同一种思路，才让皮亚杰先生谈起儿童所谓的自我中心式世界观，好像成人在这件事上有资格教训孩子似的！我倒很想知道，在永恒者的天平上，哪一种对他者的把握更有分量：

- 是皮亚杰先生凭其教授身份和他的年纪所能具有的对他者的把握，
- 还是一个孩子所具有的把握？我们看到，这个孩子以何等惊人的方式向成人带给他的全部世界意义敞开。

就这个孩子而言，人们可曾思考过：从这一视角来看，这种对他者的感受意味着什么？孩子对一切神话、传说、童话和故事有着惊人的渗透性，仿佛任由它们从字面上侵入自己。人们难道以为，这同那些积木小游戏是相容的吗——皮亚杰先生正借助这些游戏向我们展示儿童通达了一种彻底哥白尼式的世界知识？问题就在这里。

问题在于弄清楚：在这个时刻，某种可以概括为最神秘、最根本的在场感的东西，如何朝向这个他者显露出来。它也可以被纳入弗洛伊德在全文中向我们讲述的东西，即不仅爱欲生活，而且主体之世界组织的一切既有结构。言说最初的曲折——当主体真理的全部实现沿其曲线发生转折时，它的第一次再度曲折——若要由我划分若干步骤、若干层面，那么他者从此被捕获并承担其功能的这个环节，我会用一个公式来把握。这个公式来自在座的一位接受我督导的人。

我问他：“总而言之，这一周里，你的主体对你处在怎样的位置？”

他给了我一个说法；我发现它恰好与我试图放置在这一曲折处的表述相吻合：

“他把我当作见证人。”

事实上，请人作证正是这种言说最高、但已经偏折了的功能之一。

再往前一点，就是诱惑；再往前一步，则是试图把他者捕获到一场游戏之中。在这场游戏里，言说甚至转入了另一种功能：在那里，它不再具有象征性[注]，而成为一种更深的本能满足——分析经验已经清楚地向我们显示了这一点。更不用说最后一项：言说功能在转移现象中

的彻底解体；弗洛伊德把这一点看作主体完全解脱出来、得以恰好随心所欲行事的情形。

> [注] 底本写 elle est plus symbolique；在口语中省略否定词 ne 时，plus 可表示“不再”。现存数种法文转录均保留这一写法；结合紧随其后的“更深的本能满足”及“言说功能的彻底解体”，此处按“不再具有象征性”译出，同时保留这一转录歧义。

归根结底，这番思考把我们带回的，不正是我一开始在方才提到的那篇关于《言说的功能……》的“报告”中所说的东西吗？也就是“充实言说”与“空洞言说”之间的对立，以及介于两者之间的全部实现层次：

相关知识卡 拉康“罗马报告”：言语与语言的功能及领域 · 空洞言说与充实言说

- 言说，就它实现主体的真理而言；
- 言说，就主体反而迷失于我们可以称作语言系统的种种机巧之中、迷失于文化状态赋予他的全部参照系统之中而言——他或多或少参与了这种文化状态，而这一切同他此时此地必须和分析家一道去做的事情相对。

因此，我今天在这一现象的停顿点上直接引入的问题，恰好把我们带到这里：我们所讨论的这种“阻抗”，当然以其产物、以其结果投射到谁的系统、什么的系统上？投射到我们称为自我系统的系统上；而所谓自我系统，一旦离开所谓的他者系统，甚至根本无法设想。这个自我恰恰以他者为参照，它相对于他者而构成；二者恰好彼此相关。主体在哪一个层面上亲历他者，就恰好规定了自我从字面上在哪一个层面上为主体而存在。

的确，阻抗体现于这个自我与他者的系统之中。它在分析的某个时刻实现于其中，却可以说是从别处出发的，即出自主体无法在实现其真理的领域中走到底。由于一个特定主体的性格与结构上的固着，这种无能无疑已经以不同程度得到界定；言说行动每时每刻都投射到某一层面上，投射到自我与他者之间的某种关系之中，投射到某一层次、某一种同他者发生关系的风格之中。

这是什么意思？你们看，悖论是什么？请看分析家位置的悖论：总而言之，正当主体的言说最为充实时，我这个分析家才可以介入。但是，我要介入什么？介入他的话语！他的言说越属于他自己，我就越把注意力集中于他的话语。反过来也同样成立：他的话语越空洞，我也越被引向抓住它；也就是说，我被引向去做那种著名的“阻抗分析”一直在做的事，去寻找：

- 主体话语的那个彼岸；
- 那个彼岸——请仔细想想——它无处存在；
- 那个并不在场的彼岸；
- 那个有待主体实现、却恰恰尚未被他实现的彼岸……也就是说，归根结底，那个彼岸是由我自己的投射构成的，而这些投射恰好处于主体得以实现的同一层面。

上次我已经向你们指出，作出这类意图性解释或归责会有怎样的危险：无论它们是否得到验证、是否能够得到验证，我都要说，它们并不比任何投射系统更加可以验证；而它们总是多少参与了这样的系统。

这恰恰是分析的困难所在：当我们说自己正在进行阻抗解释时，我们面对的正是这一困难：

- 如何在言说关系密度较低的某个层面上进行操作？
- 如何在这种自我与另一个自我的相互心理学中进行操作——言说过程本身的降格把我们置于其中？

换言之，一方面是言说的某种介入功能——直称其名，就是解释；另一方面是自我层面——这一层面始终同时牵涉被分析者与分析家。二者之间可能存在怎样的关系？

问题就在这里。从某个时刻、甚至某个层面开始，言说的功能已经如此彻底地倒向他者一边，以致它不再是中介，而仅仅是：

- 隐含的暴力；
- 把他者还原为其相对于主体之自我的功能……那么，在分析经验中，我们还能够怎样有效地运用言说？

你们感受得到，这个问题具有绝对的摆动性；它又在何种程度上把我们带回如下这些归根结底的问题：

- 对人来说，这种从他者那里取得支撑意味着什么？
- 为什么主体越是排他地从他者那里取得这种支撑，他者就越不是真正的他者？

分析所要摆脱的，正是这个恶性循环。可是，为什么技术史越是强调这个问题——也就是越突出阻抗的自我性一面——我们就越加深陷其中？

同一个问题还以另一种形式表述出来：

- 为什么主体越是把自己确认为自我，就越是异化自身？

于是，我们回到上一次课的问题：

- 究竟是谁在自我彼岸寻求得到承认？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Zur Dynamik der Übertragung（《转移的动力学》）（1912）课程目录

“转移”这个难以穷尽的主题，最近已由W. 施特克尔在本《中央杂志》上以描述方式作过处理〔脚注：《转移的不同形式》，《精神分析中央杂志》，第2卷，第27页〕。我现在想补充几点评论，以便让人理解：转移如何在精神分析治疗过程中必然形成，以及它如何获得治疗期间为人熟知的那种作用。

我们应当弄清楚：每个人都通过先天禀赋与童年时期所受影响的共同作用，获得了一种实行爱欲生活的特定方式，也就是他提出怎样的爱欲条件、在其中满足哪些驱力、为自己设定哪些目标〔脚注：我们在此必须反对一种会引起误解的指责，仿佛我们突出童年印象的意义，就是否认先天的、体质性因素的意义。这种指责源自人类因果需求的狭隘：与现实通常的构成方式相反，这种需求只愿满足于一个单一的致因。精神分析谈论了许多病因学上的偶然因素，却很少谈体质性因

素；但这只是因为它能够对前者提出一些新东西，而对于后者，起初所知并不比一般人更多。我们拒绝在这两类病因学因素之间确立原则性的对立；相反，我们认为，两者总是共同作用，才产生所观察到的效果。Δαίμων καὶ Τύχη〔禀赋与偶然〕决定一个人的命运；很少、也许从来不是其中一种力量独自决定。只有逐人、逐项考察，才能划分两者的病因效力。两个因素以变动比例构成的系列，肯定也会有其极端情形。依照我们的知识状况，我们会在个别案例中以不同方式评估体质或亲历经验的份额；随着认识改变，我们也有权修正判断。此外，我们甚至可以大胆地把体质本身理解为偶然影响在无穷漫长的祖先系列中留下的沉淀〕。这可以说形成了一种版型——或数种版型；在外部环境和可接近的爱欲对象的性质许可的限度内，它会在一生中定期重复、重新印制，当然也并非完全不受近期印象改变。我们的经验表明，在这些决定爱欲生活的冲动中，只有一部分经历了完整的心理发展；这一部分朝向现实，供有意识的人格支配，并构成其一部分。力比多冲动的另一部分在发展中受到阻滞；它被挡在有意识的人格与现实之外，或者只获准在幻想中展开，或者完全留在无意识中，因而不为人格的意识所知。一个人的爱欲需要若不能由现实彻底满足，他就不得不以力比多的期待表象朝向每一个新出现的人；而他的力比多的两个部分——能够进入意识的部分与无意识的部分——极有可能都参与这种定向。

因此，一个未获完全满足的人所准备好的、充满期待的力比多投注也转向医生本人，这是完全正常且可以理解的。根据我们的假设，这一投注将会遵循若干范型，衔接于当事人已经具有的某一种版型；或者也可以说，它会把医生纳入患者迄今形成的某个心理“系列”之中。若在这一归类中起决定作用的是父亲意象——借用荣格贴切的说法〔脚

注：《力比多的转化与象征》，1911年，第164页〕——这同患者和医生的现实关系相符。不过，转移并不受这一范型束缚，它也可以依照母亲意象、兄弟意象等发生。转向医生的转移具有一些特殊性，超出了冷静、理性的理由所能说明的程度与方式；只要想到，形成这一转移的不仅是有意识的期待表象，还有那些被扣留或无意识的期待表象，这些特殊性就可以得到理解。

倘若这里没有留下两个无法解释、而又令精神分析家尤其感兴趣的问题，我们对于转移的这种表现就没有什么可再说或推敲的了。第一，我们不明白，为什么神经症者在分析中的转移，会比其他未接受分析者的转移强烈得多；第二，仍然令人费解的是，为什么在分析中，转移作为对治疗的最强阻抗与我们相遇，而在分析之外，我们却不得不承认它是治疗作用的承载者，是取得良好成效的条件。下面这项经验可以得到任意多次的证实：当患者的自由联想失灵时〔脚注：我是说联想确实不再出现，而不是患者仅仅由于一种寻常的不快感把它隐瞒下来〕，只要告诉他，此刻他正受某个念头支配，而该念头涉及医生本人或某种与医生有关的东西，停顿每次都可以被消除。一旦作出这一说明，停顿便被消除；或者说，我们已经把联想失灵的情境，转变成了隐瞒念头的情境。

乍看之下，这似乎是精神分析在方法上的一个巨大缺点：转移原本是成效最强有力的杠杆，在精神分析中却变成了阻抗最强有力的手段。不过，细看之下，两个问题中的第一个至少可以排除。说转移在精神分析期间比在分析之外表现得更强烈、更不受约束，这是不正确的。在不以分析方式治疗神经症者的疗养机构中，人们也会观察到强度最高、形式最不堪的转移，直至发展为屈从；其中也会出现最为明确的色情色彩。在几乎还不存在精神分析的年代，加布里埃勒·罗伊特这

样一位敏锐的观察者，已经在一本不同寻常的书中描绘了这一点；总体而言，该书对神经症的本质与发生显示出极为出色的洞见〔脚注：Aus guter Familie（《良家出身》），1895年〕。因此，转移的这些特征不能记在精神分析账上，而应归于神经症本身。第二个问题暂且原封未动。

现在，我们必须进一步接近这个问题：为什么转移在精神分析中作为阻抗与我们相遇？让我们呈现治疗的心理情境。罹患任何一种精神神经症的一个恒常而不可或缺的前提，是荣格贴切地称为力比多内倾的过程〔脚注：尽管荣格有些说法给人的印象是，他把这种内倾看作早发性痴呆所特有的东西，认为它在其他神经症中并不同样重要〕。这意味着：能够进入意识、朝向现实的力比多份额减少了；背离现实、属于无意识而至多仍可滋养此人幻想的那一份力比多，则相应增加了。力比多已经全部或部分进入退行，并重新激活了幼儿期的诸意象〔脚注：若说力比多重新投注了幼儿期的“情结”，会很方便，但并不正确；唯一可以成立的说法是：它重新投注了这些情结的无意识部分。——本文所处理的主题极其错综复杂，很容易诱使人转而讨论一系列棘手问题；其实，只有先澄清这些问题，才可能以明确的语言谈论这里有待描述的心理过程。这些问题包括：内倾与退行之间的界限、如何把情结学说纳入力比多理论、幻想活动与意识和无意识以及现实之间的关系，等等。我在这里抵挡住这些诱惑，无须为此致歉〕。分析治疗于是追随力比多进入那里，试图找到它，使它重新能够为意识所及，并最终让它为现实服务。当分析研究遇到已经退入藏身处的力比多时，一场斗争必然爆发；造成力比多退行的全部力量都会作为反对分析工作的“阻抗”而起，力图保存这一新状态。事实上，倘若力比多的内倾或退行不是由某种与外部世界的特定关系所促成

——最一般地说，就是满足受挫——并且至少在当时具有合目的性，它就根本不可能发生。然而，来自这一源头的阻抗既不是唯一的，甚至也不是最强的。可供人格支配的力比多始终处在无意识情结——更准确地说，情结中属于无意识的那些部分——的吸引之下；它之所以进入退行，是因为现实的吸引已经减弱。为了使力比多得到释放，就必须克服无意识的这一吸引，也就是说，必须解除此后在个体中形成的、对无意识驱力及其产物的压抑。由此产生了阻抗中远为庞大的份额；即使背离现实已经失去其暂时性的理由，这种阻抗也常常使疾病继续存在。分析必须同来自这两个源头的阻抗斗争。阻抗伴随治疗的每一步；被治疗者的每一个念头、每一个行动都必须顾及阻抗，并表现为朝向康复的力量与前述反对康复的力量之间的妥协。

若从一个致病情结在意识中的表征——它可能以症状的形式十分显眼，也可能完全不显眼——朝向其无意识根源追踪，人们很快便会进入一个区域；在那里，阻抗如此清楚地发挥作用，以至于接下来出现的念头必须顾及阻抗，并显现为阻抗要求与研究工作要求之间的妥协。根据经验，转移正是在这里出现。倘若情结材料——也就是情结内容——中的某个东西适合转移到医生本人身上，这项转移便会形成，产生接下来出现的念头，并通过阻抗的迹象——例如一处停顿——表明自己。我们从这项经验得出结论：这个转移观念之所以先于所有其他可能的念头进入意识，是因为它也满足了阻抗。这类过程会在一次分析的进程中重复无数次。每当人们接近一个致病情结，情结中能够转移的部分总是最先被推入意识，并以最大的顽固性得到防守〔脚注：不过，不能因此笼统地推断：为了形成转移阻抗而被选中的要素，具有特殊的致病意义。如果一场战役为了争夺某座小教堂或一所孤零零的农舍而打得格外激烈，并不需要因此认为这座教堂是民族

圣地，或这所房子里藏着军队的财宝。这些对象的价值可能纯属战术性，甚至只在这一场战役中才发挥作用〕。

一旦克服了这个部分，处理情结中的其他组成部分便不再十分困难。一次分析治疗持续得越久，患者越是清楚地认识到，单凭歪曲致病材料并不能防止材料被揭露，他就越是始终如一地利用某一种显然给他带来最大好处的歪曲，即通过转移进行歪曲。这些关系朝着这样一种情境发展：最终，所有冲突都必须在转移的场域中得到解决。

因此，在分析治疗中，转移起初总是只作为阻抗最强有力的武器向我们显现；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转移的强度与持久性是阻抗的作用和表现。转移的机制固然可以通过把它追溯到仍然持有幼儿期诸意象的力比多准备状态而得到说明；但是，只有考察转移与阻抗的关系，才能阐明它在治疗中的作用。

为什么转移特别适合成为阻抗的手段？人们也许会以为，这个答案不难给出。显然，如果必须向某个正是这一冲动所指向的人坦白，那么承认任何一种遭禁斥的欲望冲动，都会变得格外困难。这种不得不如此的约束，会产生一些在现实中几乎不可能实行的情境。而当被分析者使其情感冲动的对象与医生重合时，他恰恰想要达到这一点。不过，进一步思考便会发现，这种表面上的收益无法解决问题。另一方面，一种温柔而全心投入的依恋，也完全能够帮助人跨越坦白的一切困难。在类似的现实关系中，人们通常会说：“在你面前，我不感到羞耻；我什么都可以告诉你。”因此，对医生的转移同样可以使坦白变得容易；这样一来，我们就不明白，它为什么反而造成困难。

这个在此反复提出的问题，不能通过进一步思考获得答案；答案来自在治疗中考察各项转移阻抗时所得的经验。人们最终发现，只要仍旧笼统地设想“转移”，就不可能理解如何利用转移来形成阻抗。我们必须把“正”转移与“负”转移区分开来，把温柔情感的转移与敌对情感的转移区分开来，并分别处理转向医生的这两类转移。正转移随后还要进一步分为：那些能够进入意识的友善或温柔情感的转移，以及这些情感在无意识中延续部分的转移。分析表明，后者总是可以追溯到色情源头；因此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在生活中可以利用的全部情感关系——同情、友谊、信任等等——在发生上都同性欲相连，并且都是由纯粹的性欲望通过削弱性目标发展而来的，无论它们在我们有意识的自我知觉中显得多么纯洁、多么不具感官性。最初，我们只知道性对象；精神分析向我们表明，我们现实中那些仅仅受到珍重或尊敬的人，对于我们之中的无意识来说，仍然可能是性对象。

因此，谜底就在于：对医生的转移之所以适合在治疗中形成阻抗，只因为它是负转移，或者是源自遭压抑的色情冲动的正转移。当我们通过使转移进入意识而“取消”它时，我们只是把情感行动中的这两个组成部分同医生本人分离；另一个能够进入意识、不会引起反感的组成部分仍然存在，并且在精神分析中与在其他治疗方法中完全一样，是成效的承载者。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乐于承认，精神分析的成果以暗示为基础；只不过，暗示必须被理解为我们与费伦齐（1909）共同在其中发现的东西：借助一个人所能形成的转移现象来影响这个人。我们把暗示用于促使患者完成一项心理工作，而这项工作必然带来其心理状况的持久改善；我们借此保证患者最终获得独立。

还可以追问，为什么转移的阻抗现象只在精神分析中，而不在无差别的治疗中——例如疗养机构里——显露出来？答案是：它们在那里同

样显露，只是必须把它们看作这样的现象。负转移在疗养机构中爆发，甚至相当常见。患者一旦落入负转移的支配，便会离开机构，病情毫无改变或重新发作。色情转移在疗养机构中并没有那么强的阻碍作用，因为它在那里如同在生活中一样受到美化，而不是得到揭露；不过，它很明确地表现为对康复的阻抗：这倒不是因为它把患者逐出机构——恰恰相反，它使患者留在机构里——而是因为它使患者远离生活。就康复而言，患者是否在疗养机构中克服了这个或那个焦虑、这项或那项抑制，其实相当无关紧要；真正重要的是，他在自己的现实生活中也摆脱了它们。

负转移理应得到详尽的评价，但本文的篇幅无法做到这一点。在可以治愈的精神神经症形式中，负转移与温柔转移并存，而且常常同时指向同一个人；布洛伊勒为这一事实创用了一个贴切的名称：矛盾情感〔脚注：E. 布洛伊勒（1911）。——1910年在伯尔尼所作的矛盾情感讲演，摘要载于《精神分析中央杂志》第1卷，第266页。——对于同一类现象，W. 施特克尔曾提出“两极性”这一名称〕。情感上的这种矛盾性在某种程度上似乎是正常的；但是，高度的情感矛盾性无疑是神经症者的一个突出特征。在强迫神经症中，“对立项的分离”似乎很早便成为驱力生活的特征，也是其体质性条件之一。情感方向的矛盾性最能向我们解释，神经症者为何能够让自己的转移为阻抗服务。当转移能力已经从根本上转为负面时——例如偏执症者的情形——影响与治愈的可能性也就终止了。

不过，迄今为止，所有这些讨论只评价了转移现象的一个方面；我们还必须把注意力转向同一件事的另一个面向。被分析者一旦受一种充分发展的转移阻抗支配，就会被抛出他同医生的现实关系；随后，他擅自忽视精神分析的基本规则——不加批判地说出脑海中出现的一

切；他忘记自己进入治疗时所作的打算；就在不久以前还给他留下最深印象的逻辑联系和结论，如今也变得无关紧要。凡是正确把握了这一情形的人，都会感到有必要从前述因素以外的另一些因素来解释这种印象；这些因素其实并不遥远，它们同样产生于治疗把被分析者置于其中的心理情境。

在追踪已经从意识中失落的力比多时，人们进入了无意识领域。由此引发的反应，会把无意识过程的若干特征带到光下；我们已经通过对梦的研究认识了这些特征。无意识冲动并不愿像治疗所要求的那样被回忆，而是竭力使自身得到再现，这同无意识的无时间性和产生幻觉的能力相一致。患者如同在梦中一样，赋予其无意识冲动被唤醒之后的结果以当下性和现实性；他想把自己的激情付诸行动，而不顾现实情境。医生则想迫使他把这些情感冲动纳入治疗的脉络及其生活史的脉络，使它们从属于思想性的考察，并依照其心理价值来认识它们。医生与患者、智力与驱力生活、认识与付诸行动的欲望之间的这场斗争，几乎完全在转移现象中展开。胜利必须在这个场域中取得；持久治愈神经症就是这场胜利的表现。不可否认，制服转移现象给精神分析家造成了最大的困难；不过，我们不应忘记，恰恰是这些现象为我们提供了无法估量的帮助，使患者那些隐蔽而被遗忘的爱欲冲动成为当下的、显明的东西；因为归根到底，无人能够在其缺席（in absentia）或其替身形象（in effigie）中被杀死。

第6课 · 1954年2月10日

伊波利特

拉康

上次在场的人已经听到，我继续阐发了弗洛伊德《转移的动力学》中那一核心段落。我要向上次也许不在场的人重申：我的全部阐发都在向你们表明，转移的主要现象是某种从我可以称作阻抗运动的根底处出发的东西。

也就是说，在这个时刻，那种在分析理论中被它的全部形式和路径遮蔽的东西——即处于其最根本底层的阻抗——通过一种运动显现出来；我把它称为“言说向在场的翻转”，也就是向作为听者和见证人的分析家之在场翻转。我们仿佛在纯粹状态下把握到它：主体中断言说，而我们知道，这往往发生在他朝向真理最具决定意义的时刻；主体在那里感受到分析家的在场，这种感受又经常带有焦虑色彩。

我还向你们表明，或者至少指出：分析家的那个提问——由于弗洛伊德提到过，它在某些人那里几乎变成了自动反应：“你是否正在想某件同我这个分析家有关的事？”——不过是一种现成的行动主义。它的确很容易使话语凝结成更加朝向分析家的形式；但这只会显出一个事实：只要话语尚未抵达那种充实言说，也就是主体无意识根底应当在其中得到揭示的言说，话语本身就已经朝向分析家、牵涉分析家，并以引起分析家兴趣为目的；总而言之，它显现于存在的异化形式之中，而这个形式同所谓主体的自我完全相同。

换言之，自我与他者的关系，也就是主体同这个本身作为他者、同这个主体最初相对于它而形成的相似者之间的关系，构成人的构成中一种本质结构；它无疑就是想象功能，我们可以由此理解、设想并解释分析中的自我是什么。

我说的不是心理学中的“自我是什么”——即作为综合功能的自我，尽管我们当然能够在它的全部形式中追踪它、看到它显现——而是自我在分析中的动力功能：自我就其在此表现为防御、表现为拒绝而言；它仿佛铭刻了主体对整合某些东西所表现的一切接连不断的反对，而那些东西只是到了后来才在理论中显现为所谓主体最深、最不为其所知的“倾向”和“驱力”。

换言之，在弗洛伊德标示得如此清楚的那些时刻，我们把握到分析经验自身的运动如何同自我的根本误认功能汇合。于是，我们来到了这项推进、这番论证的终点；我已经向你们表明，它的动力与敏感点也存在于弗洛伊德在各种其他层面上的探究中。

我曾借弗洛伊德所谓梦分析的本质本身向你们说明这一点，并且以一种几乎带有悖论的形式使你们把握到：对弗洛伊德而言，梦的分析从字面上说，是对某种在其探究中发挥言说功能的东西所作的分析。下面这个事实证明了这一点：他所把握到的一个已经消散之梦的最后痕迹，恰恰出现于梦整个转向他、转向弗洛伊德的时刻；正是在这一点上，梦只剩下一道痕迹、一块残骸。我们在那里重新找到转移的尖端；梦由此依照一种相同的运动而成形，而这种运动正是在别处表现为分析课次某一时刻之转折点的那次富有意义的中断。

我也向你们表明了未说出的言说同一次口误事实中言说自身重量之间的关系具有怎样的意义。言说之所以没有说出，是因为被拒绝、被主体 verworfen，严格说来就是被拒斥；而这里更确切地说，并非一般口误，而是一个词的遗忘，例子取自《日常生活的精神病理学》。主体的言说原本应当表述什么，又剩下什么用来朝向他者，这一机制在此同样清楚可感：在本例中，所剩下的是一个缺失，是从 SIGNORELLI 这个词中减去了“Herr”。就在下一刻，弗洛伊德再也无法向谈话对象唤起这个名字；而在这个谈话对象面前，“Herr”一词原本潜在地带着它的完整含义受到召唤。

由此，我们被带到这个揭示性时刻的周围，也就是阻抗同分析经验运动的动力学之根本关系的周围；我们因而被带到一个可以在自我与言说这两项之间形成两极的问题周围。

这项关系本应成为我们的根本探究对象，却似乎研究得如此不充分，以至于我们会在费尼切尔先生笔下的某处读到这样的话：

“词的意义无疑是经由自我来到主体那里的”——这仿佛被视为既定事实、理所当然。

然而，要发现这种说法至少值得质疑，难道还非得是分析家不可吗？即使承认自我确如人们所说，支配着我们的运动表现，因而也支配着那些称作词的语词从口中发出，我们还能说，在这项行动中，自我主宰着词语所蕴含的一切吗？

这个盘根错节、彼此交叉的象征系统，不是以一种 Verschlungenheit ——也就是一种除“交织的性质”以外无法翻译的东西——为标记吗？而《技术著作》的译者……

我刚才向你们介绍的那篇文章中就有 Verschlungenheit 一词：〔德文原句〕“本文所处理的主题极其交织，使人很容易受到诱惑，转而讨论一系列棘手问题；其实，只有先澄清这些问题，才可能用明确的语言谈论这里有待描述的心理过程。”

……却把它译成“复杂性”；这个词实在太弱了。

相反，Verschlungenheit 是用来指语言的交织性：任何一个容易被单独抽取出来的语言符号，不仅同整体彼此连带，而且还相互交叉，通过一整套汇流与对立性多重决定构成自身，使它同时处在多个语域之中。总而言之，我们的话语在其中移动的这个语言系统，不正是某种无限超出我们当下能够放入其中的全部意图的东西吗？

分析经验恰恰作用于共鸣、含混、沟通以及已经包含在象征系统中的丰富性功能；这个象征系统由传统构成，我们作为个体嵌入其中的程度，远远超过我们逐字拼读和学习它的程度。从这个角度看，语言正是分析经验借以运作的东西，因为这种经验每时每刻所做的，都是向主体表明：他说出的东西比自以为说出的更多。如果从发生学角度来考察，我们就会被带向儿童如何学习语言的整个问题；随后，我们又会被卷入一个心理学探究问题，而它在方法上将把我们带得如此之远，以至于我们甚至无法在这里触及它。

不过，似乎无可争辩的是：我们不能根据儿童表现出的运动掌控，也不能根据最初词语的出现，来确切判断儿童对语言的获得。观察者喜欢记录这些无疑很有意思的指认和词汇目录，借此了解某个孩子最先出现的是哪些词，并从中提取严格含义；但它们并没有解决下面这个问题：在运动表象中实际涌现的东西，在何种程度上应当被看作恰恰

从对整个象征系统本身的最初把握中涌现；正是这一把握赋予最初的这些显现以一种完全偶然的含义——临床也确实如此显示。

因为人人都知道，儿童言语中显露的这些最初语言碎片会以何等不同的方式出现；尤其令人惊讶的是，孩子会在说出一个实体词、说出哪怕最简单的对象名称以前，先说出副词、语助词以及“也许”“还没有”之类的话。这里显然涉及一种对问题的预先定位；若要放置任何有效的观察，它似乎都不可或缺。换言之，如果我们不能正确把握并理解象征功能在人之实现中的根本作用与自主性，就绝不可能径直从事实出发而不立刻犯下最粗暴的理解错误。

这里不是普通心理学课程；我无疑也不会有机会重新讨论儿童语言获得所提出的问题。今天，我想自己只能引入自我与言说这个根本问题；当然，要从它在我们的经验中显露自身的方式出发，而且只能在问题的表述已经抵达的地方提出它。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假装自我理论不存在——弗洛伊德有一天在自我与本我的对立中表述了这套理论；它向我们提出全部这些问题，并渗透了我们理论观念以及随之而来的技术观念中的一整个部分……

因此，今天我想请你们注意一篇题为 Verneinung（《否定》）[注1] 的文本。Verneinung，换言之——正如伊波利特先生刚才提醒我的——法语应作 dénégation（否认式否定），而不是那种译得很不充分的négation（一般否定）。每逢有机会，我在讲解、研讨班或讲演中也始终这样称呼它。这篇文章写于1925年，晚于那些相对于我们正在研究的《技术著作》时期而言处在边界上的文章，即讨论自我心理学及其关系……以及《自我与本我》（Das Ich und das Es）的文章。因此，

它重新处理了弗洛伊德始终保持在场和活力的一项关系：自我同主体在课次中的言说表现之间的关系。就此而言，它极富意义。

> [注1]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否定》（Die Verneinung），载《意象》（Imago），1925年，第11卷第3期，第217—221页；另见《弗洛伊德全集》（Gesammelte Werke）第14卷，第11—15页。

相关知识卡 弗洛伊德《否定》：判断、肯定与否定

伊波利特先生莅临这里，以他的在场乃至他的发言参与我们的工作，给了我们莫大的荣幸。出于你们稍后会看到的理由，我想到他可以为我提供很大帮助，建立一场对话——对话期间，不能说我在休息，但我至少不再以运动方式表现自己。他可以凭借反思本身对我们所熟知的他以往全部工作的批判性阐发，向我们提供一份见证；他可以阐发一个问题，而你们将会看到，这个问题所牵涉的，纵然不是整个认识理论，也至少是整个判断理论。

正因如此，我曾颇为坚持地请求他，不仅替我讲解，而且把只有他才能以其严谨性带给这类文本的东西带来，也就是你们即将看到的关于否认式否定的文本。我认为这里存在若干困难……而且除了一个在哲学学科中受过训练的心灵，恐怕确实难以处理；我们所承担的职能不能缺少这些学科。我们的职能并不是某种含混的情感摩擦：仿佛我们应当在一项混乱经验中，诱发主体产生某些多少转瞬即逝的经验回返，而这就是精神分析的全部魔法。

我们所做的事情是在触及人类活动最敏感部分的经验中展开的，也就是推理智能的活动。单凭我们处理的是话语这一事实就足以表明：倘若我们的工作只是近似性的，它便没有任何资格被称作精神分析。因

此，在你们即将看到的这类文本上，倾听一位惯于进行语言批判和把握理论的合格者的意见，完全属于我们的职责。

你们将会看到，弗洛伊德的这篇文本再一次显出其作者的一种根本价值：弗洛伊德文本中的任何细微时刻，都能使我们获得严谨的技术把握；每一个词都值得我们衡量它的确切影响、重音和独特转折，值得被纳入最严格的逻辑分析。它因此不同于弟子们多少含混地聚集起来的同样术语；可以说，这些弟子对于问题的把握得自二手，而且终究从未得到充分阐发。由此产生了某种降格，我们不断看到分析理论的发展在其中通过迟疑显现出来。

在把发言权交给伊波利特先生以前，我只想请你们注意他曾经作出的一次发言。那次发言同一场讨论相连，而讨论由某种关于弗洛伊德、以及他对患者的意图的表述方式引起。伊波利特先生曾向安齐厄提供帮助……

让·伊波利特——暂时的帮助。

拉康

对，是给安齐厄的一项暂时帮助。问题在于弄清楚，弗洛伊德试图以言说进行的阻抗分析——我们正处在主题中心——来取代暗示或催眠所造成的那种征服、捕获以及对主体本人言说的取代时，他对患者所持的根本意向性态度是什么。对于这里是否显现出弗洛伊德的好斗性乃至支配欲，是否显现出我们可能从其青年时代看见的野心勃勃风格的残余，我曾表示非常保留。我认为下面这篇文本相当具有决定性：它谈到暗示；我今天之所以引入它，正因为它也处在我们问题的中心。

这段话出自 《群体心理学与自我分析》。因此，正是在群体心理学、也就是同他者之关系的问题上，作为自主功能的自我第一次被引入弗洛伊德著作。今天我只标出这一点，因为它相当明显，并通过它同他者的关系，为我向你们引入它的角度提供了理由。在这篇文章第四章《暗示与力比多》中，有下面这段文字：

> “这样一来，我们便准备承认：暗示是一种现象、一项根本事实……//……贝恩海姆也是这样认为的；我曾在1889年亲眼见识他那些非凡绝技。不过我还记得，自己当时已经对这种暗示暴政感到一种隐约的反抗。当人们对一名不肯顺从的患者说：‘喂，你在做什么？你在对自己作反暗示！’……我不禁想到，这是一种暴力。这个人当然有权……//……后来，我的看法采取了反抗这种思维方式的形式……//……于是我引用了那则老笑话：‘如果圣克里斯托弗托着基督，而基督托着世界，那么，圣克里斯托弗究竟把脚放在何处？’”

〔德文原句〕“这样一来，人们便准备接受这样一种说法：暗示——更准确地说，可暗示性——是一种无法继续还原的原初现象，是人类心理生活的一项根本事实。贝恩海姆也是这样认为的；我曾在1889年亲眼见识他那些令人惊叹的技艺。不过我还清楚记得，自己当时已经对这种暗示暴政感到一种隐约的反对。当人们冲着一名不肯顺从的患者喊道：‘你到底在做什么？Vous vous contre-suggestionnez!（你在对自己作反暗示！）’我便对自己说，这是显然的不公和暴力。如果有人试图通过暗示征服一个人，他当然有权作出反暗示。后来，我的阻抗转向了对这种观点的反抗：暗示解释一切，自身却无须得到解释。针对它，我反复援引那则古老的戏谑问题：克里斯托弗托着基督，基督托着整个世界；那么请说，当时克里斯托弗把脚放在何处？”

〔完整法译〕“这样一来，人们便准备承认：暗示——或更准确地说，可暗示性——是一种原始而不可还原的现象，是人类心理生活的一项根本事实。贝恩海姆也持这种看法；我曾在1889年亲眼见识他那些非凡绝技。不过我还记得，自己当时已经对这种暗示暴政感到一种隐约的反抗。当有人冲着一名不肯顺从的患者喊道：‘你在做什么？你在对自己作反暗示！’我不禁想到，人们正在对他施加一种不公和暴力。如果有人企图通过暗示使一个人屈服，他当然有权作出反暗示。后来，我的反对采取了反抗这样一种思维方式的形式：暗示解释一切，自身却不需要任何解释。为此，我不止一次引用那则老笑话：‘如果圣克里斯托弗托着基督，而基督托着世界，请告诉我：圣克里斯托弗究竟把脚放在何处？’”（Christophorus Christum, sed Christus sustulit orbem. Constiterit pedibus dic ubi Christophorus?；孔拉德·里希特：《德国的圣克里斯托弗》，柏林，1896年，《日耳曼学报》第5卷第1期。）

弗洛伊德面对这种可能包含在言说中的暴力时，的确感到一场真正的反抗。我们难道还看不见，阻抗分析正潜在地倾向于安齐厄前些天指出的方向吗？我们在这里所要向你们表明的，恰恰就是在实践中应当避免的东西。

可以这样说，这就是实践所谓“阻抗分析”时必须避免的误义。眼前这个时刻恰好嵌在这一论旨之中；你们将会看到，我们在这番评注中作出澄清之后，由此取得的进展也将嵌入其中。我认为这篇文本自有其价值，值得援引。

我要再次感谢伊波利特先生愿意给予我们的合作；根据我听到的情况，他已经愿意在这篇文本上投入长时间的注意。因此，我请他直接向我们谈谈自己对此的看法。

让·伊波利特：Die Verneinung（《否定》）

让·伊波利特

首先，我必须感谢拉康博士如此坚持，因为这给了我一个通宵工作的机会，让我得以把这一夜的孩子带到你们面前。我不知道它价值如何。拉康博士不仅把法文文本寄给了我，也把德文文本一并寄来。他做得很对，因为我想，要是没有德文文本，我对法文文本恐怕根本什么也理解不了。

我原先不知道这篇文章；它的结构绝对不同寻常，而且归根到底极其费解。它根本不是教授式的结构；我不想说它是"辩证的"——这个词已经被滥用了——但文本的构造极其精微。因此，我不得不把德文文本和法文文本放在一起——法译并不是十分……总之，同别的译文相比，它还算诚实——作出一次真正的解释。我现在要给你们的，就是这项解释。我认为它成立，但它并非唯一的解释，也无疑值得讨论。

弗洛伊德先给出题目"Die Verneinung"。我发现——是在拉康博士之后才发现的——与其译作 négation（一般否定），不如译作 dénégation（否认式否定）。同样，你们会看到文中使用 Urteil verneinen；这不是"判断的否定"，而是一种"取消判断"（déjugement）。我认为，必须区分：

- 判断内部的否定；
- 以及否定的态度……因为如果不作出这一区分，这篇文章在我看来便无法理解。

法文文本没有凸显：

- 弗洛伊德的分析是何等具体，甚至几乎令人莞尔；
- 也没有凸显，他怎样通过一些例子来分析。这些例子本身包含一种投射，我们完全可以把它放进这里所作的分析中。例如，患者——或者说被分析者——对他的分析家说：

“您大概以为我会对您说些冒犯的话，可根本没有这回事。”

“我们明白，”弗洛伊德说，“通过投射来拒绝承认这样一种想法——也就是自发地把这项思想归给精神分析家——恰恰就是对它的坦白。”

我发现，在日常生活中，人们非常经常说：“我接下来要说的话当然不是想冒犯您。”这句话应当译成：“我想冒犯您。”这种意愿可一点也不缺。弗洛伊德继续推进，直至作出一项大胆的概括；它将使他提出否定也许正是智能之起源的问题。我就是这样理解这篇具有一定哲学密度的文章。他又讲了另一个例子，有人说：

“我在梦里看见一个人，但那当然不是我的母亲。”

应当把它译成：“那当然就是她。”接着，他提到一种精神分析家可以采用、任何其他人也可以采用的程序：

“请告诉我，在你的处境中，你认为哪一件事最难以置信、最不可能？”

患者、邻居或谈话对象都会找出一件最难以置信的事；可必须相信的，恰恰就是这件事。这是一项从具体案例出发的分析，并被概括到这样一种方式：以不是自身的方式来呈现自身。根本点正在这里：

“我要告诉你们我不是什么。请注意，那恰恰就是我。”

不过，弗洛伊德在这里指出了这种否认式否定在某种意义上所具有的功能。他用了一个我感到熟悉的词：Aufhebung（扬弃）。你们知道，这个词经历过各种各样的命运；这倒不该由我来说。

拉康——不，恰恰应该由您来说。

让·伊波利特

这是黑格尔的“辩证法”用语，同时意味着否定、取消、保存，归根到底还意味着提起。人们可以 aufheben 一块石头，也可以 aufheben 我对一份报纸的订阅，也就是取消订阅。

“否认式否定，”弗洛伊德告诉我们，“是对压抑的一次扬弃（Aufhebung），却不是接受。”

弗洛伊德的分析中由此出现了某种真正不同寻常的东西：我们原本大可以把这些具体例子仅仅当作具体例子，但现在，一种惊人的哲学意涵从中显露出来；我稍后会试着加以概括。以“不是自身”的方式呈现自己的存在，确实就是这样：它是对压抑的一次扬弃，却不是接受。换言之，一个人说“这就是我不是什么”时，压抑已经不再存在于那里，因为压抑意味着无意识，而这项内容如今是有意识的。否认式否

定让无意识中的东西进入意识，一切都成为有意识的；可是，压抑始终以不接受的形式继续存在。

弗洛伊德的这种哲学精微性在这里继续展开。他说："在此，智性功能同情感过程分离。"其中确实存在一种深刻发现。若要分析"智性方面"，我们就会看到——把我的假设再推进一步，我会说，问题不在于"智性功能怎样同情感过程分离"，而在于智性方面本身如何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这样一种悬置；用一种略显粗野的语言来说，也许会称它为"升华"，但又不完全是这样。无论如何，"智性功能同情感过程分离"；思想本身也许正是由此诞生：它是一个受到否认式否定作用的内容。

再援引一篇哲学文本——我再次为此致歉，不过拉康博士也一样……在黑格尔某一章的末尾，问题在于用一种真正的否定性，取代那种攫住欲望、与其说是心理学的不如说带有深刻神秘性质的毁灭欲。毁灭欲攫住欲望，于是当两个斗争者彼此对峙时，很快便再也没有任何人能够见证他们的胜利或失败；需要取代它的，正是一种观念性的否定。

弗洛伊德在这里谈到的否认式否定，恰恰是一种观念性的否定性；正因如此，它才把一种观念性的否定引入"智性方面"。因为我们马上会看到一种发生过程；在那里，弗洛伊德将谈到某些……该怎么说……"精神病化者"的"否定性"？

拉康——精神病者。

让·伊波利特

他将表明，从神话角度说，这种否定性在根本上如何有所不同。若要理解本文，我认为必须承认一个并不立刻可见的东西，才能把握这里所谈的严格意义上的否认式否定之发生。同样，我们还必须承认一种不对称：弗洛伊德文本以两个时刻来表达它，法译却把两者译成同一种方式……也就是从爱到肯定的过渡中存在的一种不对称。智能发生的真正作用属于否认式否定；否认式否定正是思想的位置本身。

不过，我们还是慢一些推进。我们已经看到弗洛伊德说：

“智性功能同情感过程分离……”〔德文：Man sieht, wie sich hier die intellektuelle Funktion vom affektiven Vorgang scheidet.〕

随后，他又加上分析所带来的另一项改变：“对遭压抑之物的接受。”〔德文原句意为：否认式否定是使人认识遭压抑之物的一种方式；严格说来，它已经是对压抑的一次扬弃，但当然不是对遭压抑之物的接受。〕

相关知识卡 弗洛伊德《否定》：判断、肯定与否定

然而，压抑并没有被取消。让我们试着呈现这一情境：

- 第一种情境：“这就是我不是什么”；人们由此推断出“我是什么”。压抑始终以否认式否定的观念形式存在。
- 第二，精神分析家迫使我接受方才还在否定的东西。

而弗洛伊德又补充道——文本中用了省略号，他并未为此向我们作出解释：

“……可是，压抑本身仍未消失。”

这在我看来非常深刻：即使被分析者接受了，即使他撤回自己的否认式否定，压抑却仍在那里！我由此推断，必须给它一个哲学名称——一个弗洛伊德没有给出的名称：这就是否定之否定。从字面上说，在这里出现的是智性上的肯定，但仅仅是智性上的肯定，因为它是否定之否定。弗洛伊德没有使用这个词，但总而言之，我认为我们可以沿这个形式继续推进他的论述；这正是那句话的意思。

于是，弗洛伊德在这个时刻告诉我们——文本的困难就在这里：

“既然我们已经把智性方面同情感过程分开，现在就能够表述判断的一种发生；归根到底，也就是思想的一种发生。”

〔德文原句〕“智性判断功能的任务，是肯定或否定思想内容；上述评论因而把我们引向了这一功能的心理起源。”

我向在场的心理学家致歉，但我不太喜欢实证心理学本身。人们可能会把这里的发生当成实证心理学；可在我看来，它更为深刻，像是一段既发生性的、又神话性的历史。我认为，这种原初情感过程将以某种方式在弗洛伊德那里产生智能；正如拉康博士所说，我们在心理学上称为情感性的初级形式，本身就是一种人的形式。它之所以能够产生智能，是因为它从一开始就已包含一种根本历史性；并不是一边有纯粹情感性，另一边另有纯粹智性。

我在这项发生中看到一种宏大神话；在弗洛伊德文本的实证外观背后，仿佛存在一则宏大的神话。它是什么？肯定的背后是什么？那里有 Vereinigung（结合），也就是厄洛斯。否认式否定（Verneinung）的背后——请注意，智性上的否认式否定还会比这个更多——则是一个根本上不对称的符号的出现。原初肯定无非就是肯定；可是，否定

比想要毁灭更多。这个过程被误译作“拒斥”；若是拒斥，原本应当使用 Verwerfung，而这里写的却是 Ausstoßung，意思是驱逐。因此，我们仿佛有两种最初形式：驱逐之力与吸引之力。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篇文本中，两者在我看来都处于快乐的支配之下。

相关知识卡 Ablehnung、Verwerfung 与 Versagung ・ 弗洛伊德《否定》：判断、肯定与否定

所以，判断具有一段历史。弗洛伊德在这里向我们表明，判断有两种类型——这是人人都知道的，就连最初级的哲学也知道：一种是属性判断，另一种是存在判断。前者说一件事物“是或不是某种东西”，后者则说一件事物“存在或不存在”。〔德文原句〕“判断功能实质上必须作出两种决定：它应当赋予或不赋予一件事物某种属性，也应当承认或否认一个表象在现实中的存在。”

接着，弗洛伊德表明属性判断背后和存在判断背后各有什么。在我看来，若要理解这篇文章，就必须把属性判断的否定和存在判断的否定看成尚且不是它们后来作为符号所显出的那种否定。归根到底，在这一发生过程中还没有判断；这里只有关于“外部”与“内部”形成的第一则神话——整个问题就在这里。你们看，这则关于外部与内部形成的神话何其重要；两个项之间的异化被翻译成二者的对立，但它终究仍是异化，也是二者之间的敌意。

正如你们看到的，这三页之所以如此密集，是因为一切都在其中受到追问；那些具体评论表面如此细小，却在概括中如此深刻，而我们从它们走向了某种对整个哲学和思想结构提出质疑的东西。

属性判断的背后是什么？是“我要把这个占为己有、把它内摄进来”，或者“我要把它驱逐出去”。〔德文：das will ich in mich einführen und

das aus mir ausschließen。〕弗洛伊德似乎在说，起初……但“起初”并没有任何实在含义，这就像一则神话中的“从前”：在这段故事里，“从前有一个自我”、一个主体；对它而言，还没有任何异己之物。异己之物与主体自身之间的区分来自一项操作，也就是一次驱逐；这使一段突然出现、看似有些矛盾的文字变得可以理解：

〔德文〕Das Schlechte, das dem Ich Fremde, das Außenbefindliche, ist ihm zunächst identisch.

- Das Schlechte：坏的东西；
- das dem Ich Fremde：对自我而言异己的东西；
- das Außenbefindliche：位于外部的东西；
- ist ihm zunächst identisch：最初对它来说是同一的。

可是，就在前面，弗洛伊德刚说过人们进行驱逐，也就是说有一项驱逐操作，另有一项内摄操作。这种形式是后来属性判断的原初形式。至于存在判断的起源，则在于表象与——这一点非常困难——知觉之间的关系。弗洛伊德在此深入探讨表象与知觉之间的关系。

重要的是，最初知道“有”还是“没有”同样无关紧要：有。主体把自己的事物表象同自己曾有过的原初知觉相对照。问题在于，当主体说某物存在时，这项再生产是否仍在现实中保存着它的存在，从而使主体能够再次找到或无法再次找到它；这就是表象同再次找回其对象的可能性之间的关系。对象必须被重新找到。

这始终证明，弗洛伊德在一个比荣格更深的维度中移动，也就是某种记忆的维度；因此，他没有丢失自己分析的线索。不过，这一切如此困难而细密，我担心反而使你们丢失这条线索。

属性判断所涉及的是驱逐或内摄。存在判断所涉及的，则是把一个表象归给自我——或者更确切地说，归给主体，这样更为一般——也就是用一个表象来界定内部；现在已经不再有对象同这个表象相对应，不过回溯过去，曾经有一个对象与它对应。

这里受到追问的是"内部与外部"的发生。弗洛伊德告诉我们：

"因此，我们看到了判断从初级驱力中诞生。"〔德文原句〕"对判断的研究，也许第一次使我们洞见一种智性功能如何从初级驱力冲动的相互作用中产生。"

因此，内摄与驱逐在这里仿佛经历了一种有其终点的演化；二者都由快乐原则调节。

弗洛伊德告诉我们："Die Bejahung——肯定——不过是……als Ersatz der Vereinigung, gehört dem Eros an——作为结合的替代物，属于厄洛斯……"

我们所谓肯定的源头是"厄洛斯"；以属性判断为例，也就是内摄、占为己有，而不是驱逐到外部。至于否定，弗洛伊德没有使用 Ersatz（替代物），而用了 Nachfolge（后继）；译者却在法文中把它译得同 Ersatz 完全一样。

德文原文是：

“Die Bejahung – als Ersatz der Vereinigung – gehört dem Eros an, die Verneinung – Nachfolge der Ausstoßung – dem Destruktionstrieb.”

“肯定作为结合的替代物，属于厄洛斯；否定作为驱逐的后继，属于毁灭驱力。”

相关知识卡 弗洛伊德《否定》：判断、肯定与否定

肯定是 Vereinigung（结合）的 Ersatz（替代物），而否定则是驱逐——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毁灭本能——的 Nachfolge（后继）。因此，这完全进入了神话层面：有两种本能可以说交织在这则承载主体的神话之中：

- 一种是结合本能；
- 另一种是毁灭本能。

你们看到了一则宏大神话，它还重复着其他神话。不过，其中有一个细微差别：

- 肯定仿佛只是径直取代结合；
- 而否定在很久以后才由此产生；在我看来，只有这一点能够解释下一句话——那里仅仅涉及否定性，也就是毁灭本能。

于是，确实可能存在一种否定的快乐，也可能存在一种单纯由力比多成分受到压制而产生的否定主义；也就是说，在这种否定的快乐中消失的——消失也就是遭压抑的——正是力比多成分。这样说来，毁灭

本能同样从属于快乐吗？我认为，这一点在技术上极其重要、至关紧要。

不过，弗洛伊德告诉我们——肯定与否定之间的不对称正是在这里显现：

“判断的运作……”

——这一次使用的词是 Urteil（判断）；此前我们还处在先于判断的初级界限上——

“……只有通过否定符号的创造才成为可能。”

〔德文原句〕“判断功能的运作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否定符号的创造，使思想获得了最初程度的独立，摆脱压抑的结果，因而也摆脱快乐原则的强制。”

相关知识卡 弗洛伊德《否定》：判断、肯定与否定

弗洛伊德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判断的运作因肯定而成为可能”？为什么否定在这里所起的作用，不是作为毁灭倾向，也不是作为判断形式内部的一项否定，而是作为象征性与明示性的一种根本态度？

“……否定符号的创造，使思想不再依赖压抑的结果，因而也不再依赖快乐原则。”

若非我已经把毁灭倾向同快乐原则联系起来，弗洛伊德这句话对我来说便没有意义。

这里存在某种困难。那么，肯定与否定之间的不对称是什么意思？它意味着，一切遭压抑之物都能在某种悬置中重新得到接纳和利用；主体不再受吸引本能与驱逐本能支配，而能够在思想和存在中开辟出一片余地，以“不是”的形式出现。这片余地随着否认式否定出现，也随着同具体否定态度相连的否认式否定之符号本身出现。

如果接受那项在我看来有些奇怪的结论，就必须这样理解文本：

“同这种对否定的理解十分吻合的是：在分析中，人们找不到任何来自无意识的‘不’。”〔德文：Zu dieser Auffassung stimmt es sehr gut, daß man in der Analyse kein „Nein“ aus dem Unbewußten auffindet…〕

可人们在无意识中确实找得到毁灭。因此，必须绝对区分“毁灭本能”与“毁灭的形式”，否则就无法理解弗洛伊德是什么意思。必须把否认式否定看作否定这一明示符号之起源处的一种具体态度；只有这个明示符号，才使某种仿佛对无意识的利用成为可能，同时又维持着压抑。在我看来，这就是文本的含义：

“……而自我一方对无意识的承认，则以否定形式表达出来。”〔德文：…und daß die Anerkennung des Unbewußten von seiten des Ichs sich in einer negativen Form ausdrückt.〕

这就是概括：在分析中，人们找不到任何来自无意识的“不”；可是，在自我一方，我们所找到的对无意识的承认——而自我即使在认识中也始终是误认——总是采取一种否定形式，使自我能够一面持有无意识，一面又拒绝它。

“倘若被分析者以这样一句话作出反应：‘这个我没有想到’，甚至‘这个我从来没有想到过’，那么再没有比这更有力的证据，能够证明对无意识的揭露已经成功。”

〔德文〕Kein stärkerer Beweis für die gelungene Aufdeckung des Unbewußten, als wenn der Analysierte mit dem Satze: Das habe ich nicht gedacht, oder: Daran habe ich nicht (nie) gedacht, darauf reagiert.

因此，在弗洛伊德这篇三页的文本里——请原谅，我自己也是费了很大力气，才找到我认为贯穿其中的线索——有如下两方面：

- 一方面，是直接从对否认式否定的观察中得出的这种具体态度，以及由此把智性方面同情感方面分离的可能性；
- 另一方面，是上述一切在初级过程中的发生，因而也是判断本身与思想本身经由否认式否定而发生的起源——这里说的是思想作为思想本身的形式；因为思想此前已经存在于初级过程之中，却还没有作为思想而存在。

拉康

伊波利特先生通过一种与弗洛伊德思想共同伸展的运动，使我们得以立即抵达某种东西；我认为，他极其出色地把它放置在真正超出实证心理学的位置。为此，我们怎样感谢他都不为过。

顺便请你们注意：我们在这些研讨班里始终坚持精神分析场域的跨心理学性质；我认为，这只是重新找回我们实践中的显明事实，而为我们打开这扇门的那个人，其思想本身也在每一篇最细小的文本中不断

显出这一点。对这篇文本的思考大有可为。既然格南绍小姐好心为它作了笔记，我想不妨给它一次优先，让它尽快油印出来发给你们。

伊波利特先生刚才为我们作的这堂过于短暂的课，至少值得立即得到特别处理。我认为，他极度凝练，又带来了十分精确的坐标；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无疑……也许比我本人以自己的风格、怀着某些意图向你们表达的东西更具教学性。我会把它油印出来，供来这里的人使用。

为了区分全部这些层面、批判全部这些概念——我正努力把你们引入其中，以避免某些混淆——我认为再没有比这更好的序言。

例如，我认为伊波利特先生刚才对弗洛伊德文本所作的阐发，已经显示出 Bejahung、肯定与否定性之间的层次差异；而否定性归根到底在某一个更早的层面——我是有意采用这些笨拙得多的说法——奠定了主客关系的构成。

我认为，弗洛伊德这篇表面上如此短小的文本，立刻把我们引到这里；它由此无疑同哲学思考中某些最当代的阐发汇合。

与此同时，我认为这使我们首先得以批判那种始终围绕著名的“智性—情感”对立而维持的含混：仿佛情感性是一种色彩、一种可以说不可言说的质，应当就其自身、独立于某种“被掏空的皮囊”而得到寻找；而这副皮囊仿佛就是主体关系纯粹智性上的实现。

我认为，正是这种根本误解产生了如下观念：情感性把分析推向一些悖谬而奇异的道路；仿佛分析的成功带有某种轰动性的标志，只要主

体在严格意义上的课次文本中说出一丝具有独特、甚至陌生性质的感受，就算获得了这种成功。这个观念严格说来十分幼稚。

情感方面并不是某种智性阐发所缺少的特殊密度，也不是符号生产的另一个层面。主体向象征创造的敞开，可以说处在我们开头所说的那个……神话性语域之中，并且先于话语性表述。你们听清了吗？只有这一点才能使我们——我不是说立刻予以定位，而是说加以讨论、加以把握——理解我所称的言说的充实实现由什么构成。

我们还剩一点时间。我想立刻试着用例子把问题具体化；更确切地说，是试着用例子标出问题如何提出。我会从两个侧面向你们说明。首先，从一种所谓精神病理学现象的侧面……可以说，精神病理学思想对这一现象的阐发带来了头等重要的新事物，彻底更新了视角；这就是幻觉现象。

直到某个时期，幻觉严格说来一直被视为某种临界现象；意识的辨别价值问题围绕它提出。产生幻觉的不能是意识，而必定是其他某种东西。事实上，只要进入梅洛-庞蒂先生著作中呈现的新《知觉现象学》，就会看到，幻觉反而被纳入主体的意向性，成为其本质部分。

对于这种幻觉，我们若只满足于用若干主题和语域——例如快乐原则——来解释它的产生，把它看作某种根本性的东西、看作主体满足秩序中的最初运动，那是不够的。我们不能满足于如此简单的东西。请回想上次我从《狼人》中引给你们的例子。这个主体的分析推进，以

及我们借以追踪他如何阐发自己在人类世界中处境的那些痕迹所呈现的矛盾，都指明了这项 Verwerfung（拒斥）：

- 正是这个东西，使严格意义上的生殖器层面对他来说，从字面上始终仿佛并不存在；
- 正是这个东西，使我们被引向把它十分确切地放在我所谓“非肯定”（non-Bejahung）的层面；
- 正是这个东西——你们看——绝对不能同否认式否定放在同一层面。

真正令人注目的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我说过会向你们指出，今天便重新谈起——也就是从中浮现出来的某种直接关系；借助今天围绕弗洛伊德这篇文本向你们作出的解释，这项关系已经变得容易理解得多。

尽管在象征层面没有任何东西显现——因为某种东西要想存在，条件似乎恰恰就是发生这项 Bejahung（肯定）；而这种肯定并不是某种否定之否定的肯定，它是另一回事——可是，当这项肯定没有发生时，会怎么样？

主体的生殖器层面未能在这个象征层面得到实现；我们拥有的唯一痕迹，就是一个小小幻觉的涌现。它丝毫不在主体的历史中，而是真正在外部世界中涌现。向主体显现的是外部世界；而恰恰从未为他存在过的阉割，则采取了他想象中“自己割伤了小手指”的形式——割得如此之深，只剩下一小片皮肤还连着它。

他被一种无法言说的灾难感淹没，甚至不敢向身边的人提起。他不敢谈论的，恰恰是这个身边的人——他立刻把自己的全部情绪都关联于此人——在那个时刻仿佛从字面上被取消了。不再有他者。

仿佛存在一个直接的外部世界，其中的显现是在一种原初的实在、一种未被象征化的实在中被知觉的，尽管这个现象按照“象征”一词的通常含义采取了象征形式。我们可以从中看见：未被承认的东西被看见了。

请听清楚：我认为这有助于阐明的不是精神病。因为发生这次幻觉时，他根本不是精神病者；后来他可能成为精神病者，但在这个时刻不是。这个亲历完全局限，却又是一个结点；它同他的童年亲历格格不入，完全未被整合。没有任何东西允许我们在他童年时期把他归为精神分裂症者。

所以，请你们听清楚，我们谈的是精神病的一种“现象”。请理解这里的相关与摆动：在起点与源头处，一项完全原初的经验通过符号的可能性，使主体向某种世界关系敞开；而未被承认的东西，则以所见之物的形式闯入意识。

如果你们充分深入这种特殊的两极化，就会更容易处理那个被称为“似曾相识”的含混现象；它恰好处在“被承认”与“被看见”这两种关系模式之间。

外部世界中的某种东西原本可以交流、可以在整合话语的措辞中被思考，如同日常生活一样；可是出于某些理由，它仍被带到边界层面，或者被认作处在某种带有特殊预先含义的涌现之边界。它伴随回溯性幻觉被移入似曾相识的领域，也就是被移入那种带有原初性质的所见

之物。归根到底，这正是弗洛伊德谈到外部世界检验时告诉我们的：对外部世界的一切检验，都隐含地参照某种过去已经被知觉过的东西。

但这可以无限应用：在某种意义上，任何一种所见之物都需要参照这一视角。因此，我们在这里被带回想象界本身的层面，带回意象这个原初形式的模型；它使我们在不同于已经被象征化、被语言化的承认的另一种意义上，重新遭遇柏拉图理论所提出的问题——不是回忆，而是回忆说。

我还预告了另一个例子，供你们就此思考。我采用的例子，恰好属于所谓“现代分析方式”这个多少并不恰当的名目。人们想象那些“现代派”……然而，你们会看到，这些原则早已在弗洛伊德1925年的这篇文章中提出……他们很看重这样一个事实：如人们所说，我们“首先分析表层”；这被视为最精妙的做法，能让主体以某种方式推进，不致受分析重新唤起的内容所发生的那种所谓“智性化的无效化”任意摆布。我选取克里斯在一篇文章中给出的例子：他接手分析的一名主体，此前已经接受过一次分析，分析材料无疑也已经使用得相当深入。

这个主体在职业上受到严重妨碍；那是一种智性职业，从病例材料透露的内容看，似乎同我们的关注相当接近。主体在所谓产出方面遇到各种困难。实际上，为了拿出某种可以发表的东西，他必须作出种种努力，生活本身也仿佛因此受阻；还有另一个障碍——简而言之，只是他总有一种感觉，认为自己正在剽窃身边一个同他十分亲近的人。那个人是一位才华出众的 scholar，可以说比学生更高一些；他同主体一起工作，两人不断交换想法。主体总觉得自己受到诱惑，想要拿走

自己提供给谈话对象的那些想法；这对他想发表的一切构成持续不断的阻碍。

相关知识卡 克里斯的“新鲜脑子”病例：剽窃与行动化

克里斯解释了分析中的这些问题。

不过，主体在某个时刻终于写出了一篇文本。一天，他几乎得意扬扬地前来宣告：自己刚刚建构成论文的一切，早已存在于图书馆里的一本书、一篇已经发表的文章中，那里已经呈现了这些论点的核心内容。这一回，他成了不由自主的剽窃者。克里斯向我们提出的所谓“表层解释”将怎样进行？

大概是这样：克里斯确实关心发生了什么、那本书里究竟有什么；而某种分析方式也许会使初学者避开这种做法。进一步查看以后——我猜他参照了文本本身——克里斯发现，那本书里绝对没有任何内容呈现主体所提出论点的核心。

书中当然触及了一些提出问题的内容，却没有任何主体提出的新论点已经在那里；换言之，结果表明这篇论文确实完全原创。克里斯正是从这里出发——他说，而这不知为什么被他称作“从表层把握事物”，如果把这理解为考虑主体带来的东西有何含义的话——彻底颠倒主体带来的立场，向他指出：他的全部需要都显现在这种受阻而悖谬的行为中，并归属于他同父亲的某种关系。具体来说，他的父亲始终无法产出任何东西，因为这个父亲在“grand-père”一词的各种意义上都受到祖父的压制；祖父却是一个极富建树、成果丰硕的人物。

克里斯说，主体的行为归根到底无非代表一种需要：把某种东西归给父亲，在父亲身上找到一位“伟大的父亲”——这一次是在 grand père 的

另一种意义上——一位能够有所创造的父亲。为了满足这一需要，他为自己塑造出各种支柱、各种比自己更伟大的人；他通过某种随后又加以自责、并借以毁掉自己的剽窃行为，使自己从属于这些人。这样做时，他只是在显现那个曾折磨其童年、并因而支配其历史的需要。

这项解释无疑成立；重要的是看主体如何对它作出反应。他怎样反应？克里斯会把什么视为自己这项影响深远的介入得到证实？后来，整个历史继续展开：主体对现实、创造性而强大的父亲之需要，通过童年时期的各种游戏——例如钓鱼游戏、父亲钓到一条大小如何的鱼，等等——完成了严格意义上阴茎性的全部象征化。不过，主体的即时反应是：他保持沉默。到了下一次课，他才说：

“上次离开以后，我去了某某街——事情发生在纽约——那条街上有一些异国餐厅，供应口味稍重的东西。我想找一家能够吃到我格外喜欢的菜的地方：新鲜脑子。”

相关知识卡 克里斯的“新鲜脑子”病例：剽窃与行动化

我认为，你们在这里看到了回应意味着什么：解释正确时，它所唤起的言说，其意义处在某个既悖谬又充实的层面。这里的解释为什么正确？因为它处理的是某种多少更靠近表层的东西吗？这是什么意思？

相关知识卡 克里斯的“新鲜脑子”病例：剽窃与行动化

这无非意味着：克里斯经过一条细致考察的迂回道路——而他终究本来完全可以预见其终点——确切发现了这一点：在这种材料上，主体以智性表现这一特殊形式显现，也就是生产组织化的话语；而这一表现从根本上受所谓否认式否定的过程支配。也就是说，主体的根本关系恰好以倒置形式出现……

……它同某种东西之间的关系；在后续阐发中，我们还将把这项关系作为问题重新提出……

……在本例中，也就是它同所谓主体理想自我的关系；这项关系只能以一种十分确切的倒置形式，反映在主体的话语和他的自我整合之中。

换言之，只要主体的原初欲望倾向于在同他者的关系中显现，这项关系本身就始终包含否认式否定这一原初的根本要素；因为欲望必须在同他者的关系中显现它，而这个要素在此采取倒置的形式。

你们看，这只是把我们引向新的问题；换言之，它为一个始终向我们敞开的问题提供入口和出发点：话语性层面——也就是否定被引入其中的话语层面——同他者关系之间，存在怎样的层次关系？

不过，若要正确提出它，就必须先定位并确立这些根本关系，确立象征界本身、象征可能性以及人向符号的敞开，同它结晶为组织化话语之间的层次差异；这种话语在本质上、根本上包含矛盾。

我认为，伊波利特先生的评注今天已经出色地向你们表明了这一点。我希望你们把其中的装置与运用方式掌握在手中，作为可以始终回返的坐标；在我们后续讲述的若干难点、动力点和十字路口上，你们都可以参照它。正因为如此，我要感谢伊波利特先生以他的高度专业能力把它带给我们。

Die Verneinung（《否定》）

I M A G O

ZEITSCHRIFT FÜR ANWENDUNG DER PSYCHO-ANALYSE AUF DIE GEISTESWISSENSCHAFTEN

XI. Band 1925 Heft 3

Die Verneinung

Von

Sigm. Freud

Die Art, wie unsere Patienten ihre Einfälle während der analytischen Arbeit vorbringen, gibt uns Anlaß zu einigen interessanten Beobachtungen. „Sie werden jetzt denken, ich will etwas Beleidigendes sagen, aber ich habe wirklich nicht diese Absicht.“ Wir verstehen, das ist die Abweisung eines eben auftauchenden Einfalles durch Projektion. Oder: „Sie fragen, wer diese Person im Traume sein kann. Die Mutter ist es nicht.“ Wir berichtigen: Also ist es die Mutter. Wir nehmen uns die Freiheit, bei der Deutung von der Verneinung abzusehen und den reinen Inhalt des Einfalls herauszugreifen. Es ist so, als ob der Patient gesagt hätte: „Mir ist zwar die Mutter zu dieser Person eingefallen, aber ich habe keine Lust, diesen Einfall gelten zu lassen.“

Gelegentlich kann man sich eine gesuchte Aufklärung über das unbewußte Verdrängte auf eine sehr bequeme Weise verschaffen. Man fragt: Was halten Sie wohl für das Allerunwahrscheinlichste in jener Situation? Was, meinen Sie, ist Ihnen damals am fernsten gelegen? Geht der Patient in die Falle und nennt das, woran er am wenigsten glauben kann, so hat er damit fast immer das Richtige zugestanden. Ein hübsches Gegenstück zu diesem Versuch stellt

sich oft beim Zwangsneurotiker her, der bereits in das Verständnis seiner Symptome eingeführt worden ist. „Ich habe eine neue Zwangsvorstellung bekommen. Mir ist sofort dazu eingefallen, sie könnte dies Bestimmte bedeuten. Aber nein, das kann ja nicht wahr sein, sonst hätte es mir nicht einfallen können." Was er mit dieser der Kur abgelauschten Begründung verwirft, ist natürlich der richtige Sinn der neuen Zwangsvorstellung.

Ein verdrängter Vorstellungs- oder Gedankeninhalt kann also zum Bewußtsein durchdringen, unter der Bedingung, daß er sich verneinen läßt. Die Verneinung ist eine Art, das Verdrängte zur Kenntnis zu nehmen, eigentlich schon eine Aufhebung der Verdrängung, aber freilich keine Annahme des Verdrängten. Man sieht, wie sich hier die intellektuelle Funktion vom affektiven Vorgang scheidet. Mit Hilfe der Verneinung wird nur die eine Folge des Verdrängungsvorganges rückgängig gemacht, daß dessen Vorstellungsinhalt nicht zum Bewußtsein gelangt. Es resultiert daraus eine Art von intellektueller Annahme des Verdrängten bei Fortbestand des Wesentlichen an der Verdrängung.[1] Im Verlauf der analytischen Arbeit schaffen wir oft eine andere, sehr wichtige und ziemlich befremdende Abänderung derselben Situation. Es gelingt uns, auch die Verneinung zu besiegen und die volle intellektuelle Annahme des Verdrängten durchzusetzen, — der Verdrängungsvorgang selbst ist damit noch nicht aufgehoben.

Da es die Aufgabe der intellektuellen Urteilsfunktion ist, Gedankeninhalte zu bejahen oder zu verneinen, haben uns die vorstehenden Bemerkungen zum psychologischen Ursprung dieser Funktion geführt. Etwas im Urteil verneinen, heißt im Grunde: das ist etwas, was ich am liebsten verdrängen möchte. Die Verurteilung ist der intellektuelle Ersatz der Verdrängung, ihr Nein

1) Derselbe Vorgang liegt dem bekannten Vorgang des „Berufens" zugrunde. „Wie schön, daß ich meine Migräne so lange nicht gehabt habe!" Das ist aber die erste Ankündigung des Anfalls, dessen Herannahen man bereits verspürt, aber noch nicht glauben will.

ein Merkzeichen derselben, ein Ursprungszertifikat etwa wie das ‚made in Germany'. Vermittels des Verneinungssymbols macht sich das Denken von den Einschränkungen der Verdrängung frei und bereichert sich um Inhalte, deren es für seine Leistung nicht entbehren kann.

Die Urteilsfunktion hat im wesentlichen zwei Entscheidungen zu treffen. Sie soll einem Ding eine Eigenschaft zu- oder absprechen, und sie soll einer Vorstellung die Existenz in der Realität zugestehen oder bestreiten. Die Eigenschaft, über die entschieden werden soll, könnte ursprünglich gut oder schlecht, nützlich oder schädlich gewesen sein. In der Sprache der ältesten, oralen Triebregungen ausgedrückt: das will ich essen oder will es ausspucken, und in weitergehender Übertragung: das will ich in mich einführen und das aus mir ausschließen. Also: es soll in mir oder außer mir sein. Das ursprüngliche Lust-Ich will, wie ich an anderer Stelle ausgeführt habe, alles Gute sich introjizieren, alles Schlechte von sich werfen. Das Schlechte, das dem Ich Fremde, das außen Befindliche ist ihm zunächst identisch.[1]

Die andere der Entscheidungen der Urteilsfunktion, die über die reale Existenz eines vorgestellten Dinges, ist ein Interesse des endgültigen Real-Ichs, das sich aus dem anfänglichen Lust-Ich entwickelt. (Realitätsprüfung.) Nun handelt es sich nicht mehr darum, ob etwas Wahrgenommenes (ein Ding) ins Ich aufgenommen werden soll oder nicht, sondern ob etwas im Ich als Vorstellung Vorhandenes auch in der Wahrnehmung (Realität) wiedergefunden werden kann. Es ist, wie man sieht, wieder eine Frage des Außen und Innen. Das nicht Reale, bloß Vorgestellte, Subjektive, ist nur innen, das andere, Reale, auch im Draußen vorhanden. In dieser Entwicklung ist die Rücksicht auf das Lustprinzip beiseite gesetzt worden. Die Erfahrung hat gelehrt, es ist nur nicht wichtig, ob ein Ding (Befriedigungsobjekt) die „gute" Eigenschaft besitzt,

1) Vgl. hiezu die Ausführungen in „Triebe und Triebschicksale". (Ges. Schriften V.)

also die Aufnahme ins Ich verdient, sondern auch, ob es in der Außenwelt da ist, so daß man sich seiner nach Bedürfnis bemächtigen kann. Um diesen Fortschritt zu verstehen, muß man sich daran erinnern, daß alle Vorstellungen von Wahrnehmungen stammen, Wiederholungen derselben sind. Ursprünglich ist also schon die Existenz der Vorstellung eine Bürgschaft für die Realität des Vorgestellten. Der Gegensatz zwischen Subjektivem und Objektivem besteht nicht von Anfang an. Er stellt sich erst dadurch her, daß das Denken die Fähigkeit besitzt, etwas einmal Wahrgenommenes durch Reproduktion in der Vorstellung wieder gegenwärtig zu machen, während das Objekt draußen nicht mehr vorhanden zu sein braucht. Der erste und nächste Zweck der Realitätsprüfung ist also nicht, ein dem Vorgestellten entsprechendes Objekt in der realen Wahrnehmung zu finden, sondern es wiederzufinden, sich zu überzeugen, daß es noch vorhanden ist. Ein weiterer Beitrag zur Entfremdung zwischen dem Subjektiven und dem Objektiven rührt von einer andern Fähigkeit des Denkvermögens her. Die Reproduktion der Wahrnehmung in der Vorstellung ist nicht immer deren getreue Wiederholung; sie kann durch Weglassungen modifiziert, durch Verschmelzungen verschiedener Elemente verändert sein. Die Realitätsprüfung hat dann zu kontrollieren, wie weit diese Entstellungen reichen. Man erkennt aber als Bedingung für die Einsetzung der Realitätsprüfung, daß Objekte verloren gegangen sind, die einst reale Befriedigung gebracht hatten.

Das Urteilen ist die intellektuelle Aktion, die über die Wahl der motorischen Aktion entscheidet, dem Denkaufschub ein Ende setzt und vom Denken zum Handeln überleitet. Auch über den Denkaufschub habe ich bereits an anderer Stelle gehandelt. Er ist als eine Probeaktion zu betrachten, ein motorisches Tasten mit geringen Abfuhraufwänden. Besinnen wir uns: wo hatte das Ich ein solches Tasten vorher geübt, an welcher Stelle die Technik erlernt,

die es jetzt bei den Denkvorgängen anwendet? Dies geschah am sensorischen Ende des seelischen Apparats, bei den Sinneswahrnehmungen. Nach unserer Annahme ist ja die Wahrnehmung kein rein passiver Vorgang, sondern das Ich schickt periodisch kleine Besetzungsmengen in das Wahrnehmungssystem, mittels deren es die äußeren Reize verkostet, um sich nach jedem solchen tastenden Vorstoß wieder zurückzuziehen.

Das Studium des Urteils eröffnet uns vielleicht zum erstenmal die Einsicht in die Entstehung einer intellektuellen Funktion aus dem Spiel der primären Triebregungen. Das Urteilen ist die zweckmäßige Fortentwicklung der ursprünglich nach dem Lustprinzip erfolgten Einbeziehung ins Ich oder Ausstoßung aus dem Ich. Seine Polarität scheint der Gegensätzlichkeit der beiden von uns angenommenen Triebgruppen zu entsprechen. Die Bejahung — als Ersatz der Vereinigung — gehört dem Eros an, die Verneinung — Nachfolge der Ausstoßung — dem Destruktionstrieb. Die allgemeine Verneinungslust, der Negativismus, mancher Psychotiker ist wahrscheinlich als Anzeichen der Triebentmischung durch Abzug der libidinösen Komponenten zu verstehen. Die Leistung der Urteilsfunktion wird aber erst dadurch ermöglicht, daß die Schöpfung des Verneinungssymbols dem Denken einen ersten Grad von Unabhängigkeit von den Erfolgen der Verdrängung und somit auch vom Zwang des Lustprinzips gestattet hat.

Zu dieser Auffassung der Verneinung stimmt es sehr gut, daß man in der Analyse kein „Nein" aus dem Unbewußten auffindet und daß die Anerkennung des Unbewußten von seiten des Ichs sich in einer negativen Formel ausdrückt. Kein stärkerer Beweis für die gelungene Aufdeckung des Unbewußten, als wenn der Analysierte mit dem Satze: Das habe ich nicht gedacht, oder: Daran habe ich nicht (nie) gedacht, darauf reagiert.

第7课 · 1954年2月17日

玛丽-塞西尔·热利尼耶

拉康

为了从上次停下的地方继续，今天我打算开始把你们带进这样一片区域：可以说，上次的论述已经划出了它的边界；但更确切地说，从我们开始评注《技术著作》以来，一直都在这片区域里推进。这片区域处在：

- 符号的形成；
- 与自我的话语之间。

我为今天这场将由我们共同继续的研讨班拟了一个题目：《话语分析与自我分析》。我不能说一堂课就能完成这样一个雄心勃勃的题目；它更像是为你们打开若干问题和视角的一种方式。

我要说，把这两项对立起来，就取代了通常所谓材料分析与阻抗分析的经典对立。事实上，我们可以援引伊波利特先生上次着重提出的一个词：弗洛伊德《否定》文本中使用的 Aufhebung（扬弃）。他曾好意为我们评注这个词，并提醒你们，它具有一种非常特别、非常复杂而又便于运用的含义；因为在德文中，这个词同时意味着“否定”“取消”，也意味着“在取消中保存”和“提起”。

这显然给出了一个概念的范例；若要思考我们在这场对话中所做的事，怎样深入它都不为过——精神分析家近来已经注意到这一点。当然，我们面对主体的自我及其全部限制、防御和整个性格。可以说，全部分析著述仿佛都苦于无法确切界定：在我们所从事的这项操作和推进中，这个与我们打交道的自我究竟以怎样的关系模式、怎样的行动模式发挥怎样的功能；分析情境要求我们引导它、使它前进。

可以肯定的是，近期围绕自我功能展开的全部讨论和阐发——那些把被分析者的自我说成分析事业中应当充当坚实支点和分析家盟友的论述——始终在内容和推进中显出一些奇特的矛盾。

因为，正如我在许多场合、许多转折点都特意强调过的，若不走向某种不仅是自我"两极性"或双重运作，而且严格说来是 splitting（分裂）、是两个自我之间的彻底区分，就很难理解：分析中的这个自我如何像某种宏大的哲学传统所说的那样，既表现为错误的主人、幻象的所在地、它自身所特有的激情之场所，又从根本上趋向误认。

安娜·弗洛伊德在《自我与防御机制》中使用的语言，有时会因其物化式的性质而令人有些困惑。我向你们保证，她的书里有些段落会同时使人感到：

- 她谈论自我时，采用的是我们在这里努力保持的理解氛围与风格；
- 可另一方面，她仿佛又在谈人之中的一个小人：它在主体内部过着某种自主的主体性生活，守在那里自我防卫，对抗一切可能从外部或内部袭来的东西："父王，当心右边；父王，当心左边。"[注1]

[注1] 这句话据称由法国国王约翰二世之子"勇敢者"菲利普，于1356年9月19日普瓦捷战役中说出。

但是另一方面，如果从道德箴言家的描述角度来看，她无疑又把自我说成若干激情的所在地……这种风格并不逊于拉罗什富科随时都可能谈到并指出的“自爱的诡计”。

因此，严格说来，自我在分析对话中的动力功能仍然……

——而每当我们处理技术原则时，这一点都会显得更加清楚——

……由于缺乏严谨的定位，迄今似乎仍然深陷矛盾。

我想，你们许多人都读过安娜·弗洛伊德那本颇为流行的《自我与防御机制》。它极富启发性。

这本书相当严谨，因而我们当然可以从中标出一些点：恰恰由于它具有一定严谨性，它的论述本身会在那里显出论证的裂缝。当我们考察她试图给出的例子时，这些裂缝变得更加明显。例如，她试图告诉我们自我具有怎样的功能时，有一些十分关键的段落。她确实告诉我们：

“在分析中，自我只通过它的防御显现……”

也就是说，自我在严格意义上反对分析工作。可是，这是否意味着一切反对分析工作的东西都是自我的防御？她在其他地方承认，这个说法无法维持；她承认，除了自我的防御，还有其他阻抗要素。我正是沿着我们评读弗洛伊德《技术著作》所采取的进路，以这种侧面同你们一起开始处理问题。因此，如果愿意拿着笔、严谨地思考这篇文本——它仿佛一份传承完好的遗产，传递着弗洛伊德最后围绕“自我”所作的阐发——这里便有许多问题需要处理……

我们学会里一位同我们关系密切的人〔亨利·埃？〕有一次谈到安娜·弗洛伊德时用了一个词——不知道为什么，这位亲爱的同事忽然产生了诗意冲动——在1950年的大会上称她为“精神分析的铅垂线”。然而，一条铅垂线不足以完成建筑，还需要若干其他工具，例如水平仪。不过……“铅垂线”这个说法不坏，它让我们能够确定某些问题的垂直方向。这将成为你们马上要看到的内容的导言。

现在，我想依照研讨班的传统继续。我认为，先这样引入我要请热利尼耶小姐向你们介绍的、处在我们问题中心的一篇文章，并没有什么不好。这篇文章由梅兰妮·克莱因所作，题为《自我发展中符号形成的重要性》[注2]。为了引入热利尼耶小姐的发言，我想可以先向你们提供安娜·弗洛伊德的一段文本；它涉及她如何理解儿童分析，尤其涉及一个分析技术实例中的自我防御。

> [注2] 梅兰妮·克莱因：《自我发展中符号形成的重要性》（1930），载《精神分析论文集》，巴黎：帕约出版社，1968年，第263页。

例如，她向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小例子。她说，案例涉及“一位因严重焦虑状态而接受分析的年轻女患者；焦虑扰乱了她的生活与学业……”；她之所以接受分析，是为了服从母亲：

> “尽管如此，”她说，“她对我的态度仍然友善而坦率；不过，我注意到，她在讲述中小心避免对自己的症状作出哪怕最轻微的暗示，也对两次课之间经历的焦虑发作只字不提。每当我坚持要把症状纳入分析，或者解释联想中某些材料所显露的焦虑时，患者的友善态度便立刻改变。她每次都会向我倾泻一连串讽刺言辞与嘲弄。我试图把患者的这种态度同她对母亲的态度联系起来，却彻底失败。这个女孩同母亲的有意识及无意识关系呈现出完全不

同的图景。她不断重复的讽刺与挖苦使分析家不知所措，也使治疗在一段时间内无法继续。然而，后来的进一步分析表明，讥讽和嘲弄严格说来并不构成转移反应，也绝不与分析情境相连。每当温柔、欲望或焦虑的感受即将进入意识，患者就会使用这种朝向自身的手段。情感推动越强，女孩就越激烈、越尖刻地嘲笑自己。分析家之所以只是次级地招致这些防御反应，是因为她鼓励患者的焦虑感进入意识。即使患者的其他陈述足以使焦虑内容得到准确解释，对这一内容的认识仍然不起作用；因为任何接近情感的尝试都只会强化防御。只有成功使这种通过讽刺性贬低来防御情感的方式回升至意识、并由此失去作用以后，分析才可能使焦虑内容成为有意识的；此前，这项过程会在患者生活的全部情境中自动发生。从历史角度看，我们这位患者以嘲弄和讽刺进行防御的程序，可以由她对亡父的认同来解释；父亲曾想教会女儿自我控制，每当她流露感情时就嘲笑她。因此，这种防御情感的方法在这里固定了对一位深受爱戴的父亲的记忆。本例中必须采用的技术，是首先分析患者对情感的防御，随后才得以研究她在转移中的阻抗。只有到了这个时刻，才可能真正分析焦虑及其前史。”

在这段短文中，我们看到分析自我防御的这种必要性和需要；你们不觉得这里所涉及的，无非是一个与错误相伴的对应物吗？文本清楚表明：安娜·弗洛伊德一开始就从二元关系的角度，也就是她本人同患者之间的关系来把握问题。安娜·弗洛伊德自己也承认，她把患者的这项防御当作了防御显现出来的形式——也就是针对她本人的讽刺，甚至攻击。更确切地说，她在安娜·弗洛伊德自己的自我层面感受并知觉到它——你们可以看到，这一点如何同我方才询问你们的那场讲

演中所阐发、评注并指出的内容相连。她把这些表现——称作自我防御十分准确——放进同安娜·弗洛伊德本人的二元关系中加以理解；于是，她立刻试图依照那个不完整、却经常被提出以至于几乎成为经典的公式，把它们当作一次转移表现，即某种情境的再现，却没有进一步说明这一情境如何得到结构化。

换言之，她立刻开始朝这个方向作出解释：依照二元关系的原型，也就是主体同母亲的关系来理解分析关系。结果，她面对的是一个不仅原地踏步，而且完全无效的立场。

相关知识卡 **安娜·弗洛伊德**

那么，她所称的“已经分析了对情感的防御”是什么意思？从这篇文本来看，我们似乎只能把它理解为安娜·弗洛伊德本人认识到，自己无法沿这条路推进。换言之，我们再次面对那个问题；我认为，下面这项区分最能标出它的独特重音：

- 一种二元解释；分析家在其中同被分析者陷入自我对自我的竞争；
- 另一种确实取得某种进展的解释。它朝什么方向推进？朝向主体的象征结构化；这处在主体当前自我结构的彼岸。

换句话说，我们回到这个问题：分析的推进所涉及的是哪一种Bejahung（肯定），哪一种由自我作出的承担，哪一个“是”？我们必须获得怎样的肯定，它才会构成分析推进所不可或缺的揭示与显露？弗洛伊德在一篇并未超出我们讨论范围的著作中——他本人把其中相关部分称为“论精神分析技术”，即《精神分析纲要》[注3]——这样告诉我们：“有一项契约得到订立……”这项契约界定了进入分析情境；也

就是说，他用“被分析者与分析家之间订立一项契约”的方式来呈现事情。

[注3]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纲要》（Abriß der Psychoanalyse，1938），法国大学出版社1970年版，第七章，第39页。

> “一项契约得到订立。患者患病的自我向我们承诺彻底坦率，也就是任由我们支配其自我知觉交付给它的全部材料。我们则向它保证最严格的保密，并把自己解释受无意识影响之材料的经验供它使用。我们的知识补偿它的无知，使自我能够重新取得并治理其心理生活中已经失去的领域。整个分析情境正是由这项契约构成。”

〔德文原句〕“我们彼此订立一项契约。患病的自我向我们承诺最彻底的坦率，也就是把它的自我知觉提供给它的全部材料交由我们处置；我们向它保证最严格的保密，并把我们在解释受无意识影响的材料方面的经验供它使用。我们的知识应当补偿它的无知，应当把对心理生活中已经失去的领域的统治交还给它的自我。分析情境正是由这项契约构成。”

那么，我在上一次讲演中或多或少明确表述、或隐含提出的问题是：我们的知识无疑会援助主体的无知，但还有我们的无知。我们的无知不只是对情境的无知——我是说，面对我们的这个主体在其象征决定语域中的情境——当然也包括我们在定位这些不同象征情境时的某一部分无知，也就是对其结构定位的无知；为什么不会有呢？

这种原初性质在主体的无意识中规定了某种象征星丛；我们必须始终把这片星丛设想成具有结构，依照某种复杂秩序得到组织。“情结”一

词浮现到分析理论表面，并非毫无缘由……可以说，它仿佛出自某种内在力量；因为你们知道，发明这个词的并不是弗洛伊德本人，而是荣格……这个词已经自行充分表明：当我们发现无意识时，所遇到的是一些具有结构、有组织而复杂的情境。

弗洛伊德以俄狄浦斯情结的形式，向我们给出了可以称为第一模型、标尺的东西……我想，你们知道——至少长期追随这场研讨班的人已经看见——在评注那些最少受到质疑、因为由弗洛伊德本人描画得最为丰富的病例，也就是五大精神分析中的两例乃至三例时，随着我们深入俄狄浦斯情结的关系，它会提出何等多的问题和含混。

我要说，分析的全部发展归根到底都由这个三角形中每一种张力相继得到凸显而构成；这迫使我们看见的，绝不只是那个被概括为对母亲的性吸引和同父亲竞争的、大而整块的三角形。你们知道，在俄狄浦斯情结之中，而且从一开始，这些把主体同时同父亲和母亲联系起来的二元关系，在结构上就具有深刻的对称性。

尤其是：一方面是同父亲的自恋性或想象性关系，另一方面是同父亲的象征关系，此外还有某种相对于这座建筑而言必须称作实在的或残余的关系。对我们在分析中真正触及并关切的这座建筑来说，这些关系之间的区分已经从一个侧面充分显示了结构的复杂性。总而言之，完全可以设想，另一种研究方向会使我们进一步阐发迄今得到表述的俄狄浦斯神话。

此外，尽管所谓材料已经十分丰富，被处理并纳入这项俄狄浦斯关系，我们却几乎没有真正超出弗洛伊德本人给出的图式。

完全可以设想，我们将会——而且我想随着时间推进，我会向你们表明——在当然保留其本质的同时，对俄狄浦斯情结作出进一步表述；因为它——你们将会看到为什么——确实具有根本性。

它不仅对理解主体具有根本性，而且对主体以象征方式实现那个作为本我、作为无意识的自身，也具有根本性；无意识并不只是一系列未经组织的驱力……

——尽管弗洛伊德理论阐发的一部分可能使人这样认为，甚至表述为：在心理中，只有自我具有组织，而且始终、本质上如此……

……相反，无意识是把主体确立在某种复杂关系中的言说。

上次我们借弗洛伊德着重指出的两个步骤看到了分析的推进：遭压抑之物在被否认之物中出现，以及即使消解这一否定，我们仍未因此从主体那里得到某种东西——什么东西？恰恰就是肯定。

必须在这里仔细考察：为了获得一种格外令人满意的肯定，我们要求哪些标准——而且我们同主体也就这些标准达成一致？你们将会看到，问题实际上何其复杂。也可以从主体如何认证弗洛伊德本人所谓分析性重建的角度重新处理它：明证的源头在哪里？记忆必须借助哪些空缺而被“重新亲历”？

这是什么意思？我们很清楚，“重新亲历”具有一种特殊性质，它使所谓“现实感”的全部含义受到追问。总而言之，弗洛伊德提醒我们，归根到底绝不能完全信赖记忆；这完全正确。

那么，当主体告诉我们，事情确实已经抵达某个触发点——如费尼切尔在某处所写——主体在那里感到一种真实的……我们要求的是什么，或者更确切地说，什么会使我们感到满意？那是什么？这无疑把我们带到现实感问题的中心。

你们看到，前些天围绕伊波利特先生的评注，我沿这个方向提出了《狼人》中一个极富意义的例子。某种东西在那里大致以下述形式显现，几乎显得过于透明、过于具体，并以一种近似代数的形式变得可以感知：归根到底，实在……

——或者说，被知觉为实在的东西；如果你们记得我就《狼人》的幻觉发生向你们指出的内容——

……归根到底，实在是某种绝对抵抗象征化的东西。所谓实在感在其灼热显现中达到最高程度时，也就是在这种非现实的幻觉性现实中——你们马上会看到，这个词在梅兰妮·克莱因的文本里重新出现——再没有什么比实在给予实在、同实在相对应的时候，更能显出所谓实在感。

最令人震撼之处，确实同《狼人》生命中的一个阶段相对应：正如我已经指出的，对生殖器层面意义的象征化与实现遭到了拒斥（verworfen）。因此，我们不必惊讶：某些所谓“内容解释”不但完全没有被主体实现，也既未被实现、又未被象征化；因为这些解释恰好出现在一个阶段，在那里，它们不可能在任何程度上给主体带来唯一可能的揭示，使他看见自己在那个禁区——他的无意识——中的处境。

只要这项揭示尚不完整，解释就不可能把它交给主体。恰恰因为我们仍然处在否定层面，或者处在否定之否定层面；可是，有某种东西尚未跨过，它恰好处在话语彼岸，需要话语中的某种跃迁。这也正是因为此时只有对压抑的“扬弃”（Aufhebung），而压抑本身并未消失。

为了收束我要借安娜·弗洛伊德文本说明的东西，我再说一次：她所谓“对情感防御的分析”，只是她理解自己理解方式的阶段；她由此发现自己走错了路。起初，她从这样的感受出发，把主体对情感的防御视作针对她本人的防御；她自己也在那里扩张……以至于取代主体的母亲。等她意识到自己走错了路以后，才使患者明白这是一种态度；当她说自己已经“分析了转移”时，所说的就是这一点。

只有当她放弃第一阶段时，她才真正能够分析转移阻抗。这把她引向什么？引向一个不在场的人、一个第三者；她并未向我们提供更多说明，但从一般结构看，它必定非常近似于朵拉的位置。

相关知识卡 **安娜·弗洛伊德**

也就是说，主体确实认同于自己的父亲；她的自我在这项认同中以某种方式得到结构化。自我的这项结构化在这里被称作防御；它确实是这项认同的一部分，是其中最为表层的部分，而借助这项认同，我们又抵达主体在象征秩序中承认其处境的最深层面。也就是说，她在一种象征关系秩序中承担自己的位置；这个秩序覆盖人类关系的全部场域，其最初细胞——如果你们愿意这样说——就是俄狄浦斯情结。主体正是被放在其中；在本例中，她所处的位置也许使她同自己的性别发生冲突。

我把发言权交给热利尼耶小姐。她将向你们表明一种与安娜·弗洛伊德形成对照的进路。安娜·弗洛伊德总是首先处理自我，仿佛自我就是安娜·弗洛伊德本人：一个手持铅垂线的人。她本人也强调，自我首先是一个居中的位置，是尽可能理性的位置——也就是我们前些天评注弗洛伊德文本之后所理解的那种位置；可以说，它本质上是唯智论的位置。她曾在某处说过：分析中的一切都必须从自我这个居中、适度的位置加以引导。

一切首先从某种对自我的教育、劝服与接近出发，并且最终必须回到那里。我们将看到梅兰妮·克莱因的位置怎样同安娜·弗洛伊德形成对照。这两位女士彼此有相似之处，却展开了墨洛温王朝式的争斗，她们之间的对立并非毫无缘由；因为你们马上会看到，梅兰妮·克莱因从哪里出发，以怎样的视角处理一位格外困难的主体所提出的问题。人们不禁要问：

- 安娜·弗洛伊德如何能够对他使用这种预先再教育一个所谓强或弱的自我的位置？可是在分析中，“强自我”“弱自我”究竟是什么意思？

- 梅兰妮·克莱因又怎样处理这个问题？……由此也可以判断，哪一位更处在弗洛伊德发现的轴线上。

玛丽-塞西尔·热利尼耶

这篇文章写于1930年，题为《自我形成中符号形成的重要性》。我觉得很难概括它，不得不把一些我很难彼此衔接的观念并置起来。我不会完全重复文章的结构；先介绍这个孩子的案例——一名四岁男孩——让所提出的问题显得更为具体。

然后，我会按照该章导言，讲述克莱因通常怎样设想从某一阶段到另一阶段的过渡；随后再说明她如何应用这些思考，如何借此理解这个孩子的案例、她向我们提供的治疗开端，以及她对治疗的理解。最后，我会谈谈自己对此有何反应。

这是一名四岁男孩，具有如下特征：

- 她说，他的一般发展水平相当于十五至十八个月；
- 词汇极其有限，而且不只是有限，还使用不正确：大多数时候，他会歪曲词语并误用；可在另一些时刻，又能看出他知道这些词的含义。

她强调最引人注目的事实：这个孩子没有让别人理解自己的欲望，也不寻求沟通。她认为，他完全无法适应现实，也没有任何情感关系；在日常生活的所有情境中，他都仿佛不具情感：无论母亲或保姆在场还是缺席，他都没有反应；他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表现焦虑，也不玩耍。他仅有的、多少算作游戏的活动，就是发出声音，沉浸于一些没有含义、也无法赋予含义的声音和噪音中。他对身体疼痛完全不敏感；弄伤自己时也毫无反应。

对于母亲、父亲、保姆这些成人，他轮流采取两种态度。克莱因从词汇使用上说明这一点：他或者系统地反对，例如别人要他复述词语时，他要么不复述，要么加以歪曲；或者，即使正确说出词语，也仿佛抽空了它们的含义，只把它们反复碾磨，以刻板方式一再重复。词语虽然正确，却不再有任何意思。此外，他从不寻求亲近者和父母的爱抚。

最后，她以强调他的身体笨拙来结束描述。这里有两点：一方面，他总体上动作笨拙，更确切地说，是协调不良；他无法握持剪刀和刀子，可在餐桌上却能很好地使用勺子。

下面是这个孩子的病史材料。他出生时，母亲的乳汁不足，乳汁的质量也不好；然而，她坚持喂养了七周，而他在这七周里不断衰弱。七周后，人们为他找了乳母，但他拒绝吸乳；随后给他奶瓶，他也拒绝。到了可以吃固体食物的年纪，他同样加以拒绝：他不愿咬食物。

他从一开始就有严重的消化障碍，稍后又出现痔疮与直肠脱垂。这个孩子一直严重厌食，而且始终如此；这是治疗中最难消退的症状。她还说，这个孩子从未真正被爱包围。母亲焦虑，缺乏母性；父亲和保姆都十分冷漠。两岁时，他获得了一项正面的情感补给：来了一位有爱心、感情温暖的新保姆，还有一位同他建立了接触的祖母。从那时起，孩子能够保持清洁，控制自己的排泄；看来，他愿意为保姆这样做，想使她高兴。

他作出了梅兰妮·克莱因所谓的适应尝试。他取得了部分进展，学会了一些词，词汇量突然增加，却继续机械地使用这些词。他对保姆的某些禁令变得敏感；其中只有一项与手淫有关：保姆称他为“坏孩子”，此后他便不再——至少别人不再看见他——手淫。因此，出现了某种改善：词汇量增加，并尝试适应对象。

可是，厌食仍在继续，他握持刀子和剪刀的能力仍未改善，而且拒绝摄入液体或糊状食物以外的任何食物。梅兰妮·克莱因结束这番描述时强调：尽管保姆的在场带来了这些进展，他同保姆之间却没有任何情感接触。那只是一些表层进步，真正的情感接触并未因此存在。

梅兰妮·克莱因接手这个孩子的治疗时，提出的问题很简单：为什么他同人、同事物之间如此缺乏接触？发生了什么？应当如何描述这样的处境？

现在，请你们暂时放下这个名叫迪克的孩子的临床病例，回到构成该章开头、实际上也用来引入本案例的理论思考。我很难概括这些思考。对我来说，困难在于：克莱因在文中不断从内容层面——即孩子说了什么——转到结构层面，却不说明自己已经转换了层面。因此，读者总是迷失在两者之间。

她把这些理论思考集中在如下问题上：一个孩子、一个人如何能够从口腔—施虐阶段——我会详细说明——进入下一个阶段，也就是象征作用阶段？她主要通过内容、通过你们都知道的东西来描述口腔—施虐阶段——困难恰恰就在这里：

- 孩子如何想要占有母亲的身体和母亲身体内部的内容；
- 他如何在母亲身体的内容与排泄物、可能存在的孩子、母亲身体中的父亲阴茎之间建立等同；
- 孩子如何在内摄这一切之后，又被坏东西侵入；他只能把它们驱逐出去，随后再次内摄。

她描述了一个由内摄与驱逐构成的恶性循环；人们看不出它实际上如何可能被打破，而我也不明白她把孩子本人放在哪里。我们只看得见循环，却看不见主体本人。

拉康——问题恰恰就在这里。

玛丽-塞西尔·热利尼耶

于是，她提出下一个问题：主体、孩子在为什么而焦虑？他为了自己感受到并向母亲、母亲身体、母亲身体内容及其等同物表现出的施虐性而焦虑。他既担心摧毁母亲，也担心自己随之遭到摧毁，因为他内摄了母亲，因而也内摄了自己的施虐性。他既担心摧毁爱欲对象，也担心摧毁自己。

X——这一切可真复杂。

玛丽-塞西尔·热利尼耶

是的，非常复杂。于是，克莱因认为，这种焦虑会触发第一种可以描述的防御方式；她说，这种防御方式同后来那些抑郁机制在根本上有所不同。

拉康

她依据弗洛伊德的一篇文本，说起源处必定存在某种不同于我们能够围绕自我概念纳入结构的一切东西。这当然如此，因为我们还处在自我形成以前。

玛丽-塞西尔·热利尼耶

这些压制机制有两类：一类是驱逐，即把自身的施虐性排到外部；另一类是摧毁这个危险对象。但我无法理解的是：这些防御机制并未走出恶性循环，因为它们只是在复制这个循环。我不明白，她自己如何在其中找到出路？问题在于：孩子如何能够走出这种引起焦虑的处境……

拉康——致焦虑的……

玛丽-塞西尔·热利尼耶

……走出这种由自身施虐性产生的致焦虑处境？她在这里引入象征作用概念，并援引费伦齐和琼斯；对他们来说，象征作用是一切升华和一切作用于外部世界的行动之基础。这几乎是全文最重要的部分。我希望自己已经正确理解她如何把握象征作用概念。

对她而言，象征作用意味着主体建立一条等式，把其身体性的自身——他的身体、他的整个自己或身体部分——以及母亲的身体、阴茎、阴道、孩子、排泄物，同外部对象等同起来。对她而言，象征作用就是在自身身体与外部对象之间建立等同。于是她认为，正是通过实现大量这样的等式……

拉康

其实，“等式”一词也见于弗洛伊德；他在一篇文章中说明肛门结构中的等同，并在那里展示一幅得到绘制和客观呈现的大图式，表明如下等同：孩子 = 菲勒斯 = 排泄物，等等。

玛丽-塞西尔·热利尼耶

因此，她认为——这一点必须特别强调——孩子建立的这类等式越多，就越能摆脱焦虑。由此形成如下情形：为了缓解焦虑，孩子把焦虑投射并分布到外部世界、分布到各种对象上。

拉康——您确定文本里有这个意思吗？

玛丽-塞西尔·热利尼耶

是的。她说，这些多重等式构成同现实以及一般外部世界发生关系的基础。她又补充说，后来自我将能够……但她没有说明如何能够……

拉康——对，这一点是准确的。

玛丽-塞西尔·热利尼耶

……使真正的现实从这项现实之下浮现出来——可后者并不是现实，因为它只是投射出去的焦虑；至于“真正的现实”，她同样没有作出说明。她最后说，为了使自我得到良好发展、使口腔期施虐性的焦虑被克服，必须有某个最低焦虑量；否则主体就不会把焦虑分布到外部世界。但焦虑又不能过多：问题全在于一个最优量；自我必须能够容忍它，才能掌控它。她对这种掌控同样没有作出说明。

现在，她围绕四岁男孩迪克的案例重新讨论这些一般思考。她认为迪克的自我在体质上具有容忍焦虑的能力——这一点她完全没有论证。随后她又认为——后文给出了某种我无法理解的论证——严格意义上的生殖器驱力在迪克那里格外早熟；这些生殖器驱力使他对施虐驱力的容忍更低，也使针对施虐驱力的防御增强。

于是，她说，迪克未能……

——因为他的生殖器发展过早，过分害怕自己的施虐性，也很难承受它——

……未能把焦虑这样分布到外部世界的对象上，而只分布到了她提到的两三个对象——它们构成迪克仅有的游戏活动：对火车、车站与门这三类他会操弄的东西感兴趣。

拉康

不过我觉得，如果您坚持自己对临床病例所作的描述，那么您在这里也许省略了某项重要内容。还有另一样东西，也就是迪克在梅兰妮·克莱因那里所表现的行为。

玛丽-塞西尔·热利尼耶——我之后会讲到。

拉康

因为您方才谈到的门、车站和火车，主要是在梅兰妮·克莱因那里才出现的。

玛丽-塞西尔·热利尼耶

这是她此前所说的。她认为，就迪克的焦虑而言，仅有的外部分布落在火车、车站和门上；这三个对象在象征上分别代表：火车代表阴茎，车站代表母亲，而门把手代表……她认为，焦虑向对象的分布停在了这里。焦虑停止向外部世界分布，便造成迪克缺乏接触；他不与任何东西接触，因为没有把焦虑分布到外部。她接着说，对自身施虐性的恐惧及其针对施虐性的防御，同样使他无法作出任何攻击性行动，例如咬东西或操弄剪刀和刀子；同一种防御也阻止他把自己亲历的一切、把自己同母亲身体的施虐关系转化为幻想。

随后，她极为简略地讲述了最初几次分析课，以及迪克在这些课次中的态度：他走进房间，毫无情绪地离开保姆，在治疗室里漫无目的地徘徊；他不对任何对象感兴趣，只作出完全不协调、杂乱而没有含义的动作，面部表情僵硬，眼神完全迷失而缺席。她说：

“仿佛我只是一件家具；他的任何态度都不朝向我。”

她强调，迪克对她表现出的行为和态度，不同于她通常治疗的重度神经症者。她描述那些神经症最严重的人：他们会缩在一个角落里，或者躲起来。她强调：“他仿佛身处虚空。”她知道迪克对火车和车站感兴趣，也知道这是他对对象仅有的焦虑性投注，于是拿出一列大火车，放在一列小火车旁边。

拉康——您确定她当时知道这件事吗？她根本不知道这种情况；她直接把火车塞到了他手里。

X——不！她认识他，事先就知道。

拉康——不过，这并没有改变多少事情。

玛丽-塞西尔·热利尼耶

他把大火车称作“爸爸火车”，把小火车称作“迪克火车”。他拿起小小的迪克火车，让它一直开到窗下。克莱因已经开始为此赋予言词：“车站就是妈妈。迪克进入妈妈。”这时，孩子丢下火车，全速跑进两扇门之间的昏暗空间，也就是诊室的双重门道中。她走过去，而他说：“黑。”她为此赋予言词：“妈妈里面是黑的。”这时，孩子第一次以

有含义的声音问道：“保姆？”他在找自己的保姆，而此前从不这样做。她回答：“保姆很快会回来。”

相关知识卡 梅兰妮·克莱因

孩子以一种明白的方式重复这些词；它们具有同情境相应的含义。梅兰妮·克莱因指出，她认为从那一天起，他学会了这些词，记住了它们，后来也再次正确使用。下一次课，他仍以完全相同的方式走进治疗室，但这一回走到昏暗角落，把迪克火车放进去，希望它留在那里。他又问：“保姆会来吗？”第三次，他同样走到五斗橱后的昏暗角落；在那里，他十分焦虑，并第一次把分析家叫到自己身边。

分析家指出，他开始投注更多对象——除了火车，还有五斗橱和门边的昏暗角落——这同他对保姆及分析家本人的依赖感相对应，因为他要求她们在场；也同第一次得到表达和显现的焦虑相对应，即呼唤保姆。到了第四次课，他指着一节小煤车说：“cut！”也就是“切”。分析家给他一把剪刀。他试图破坏小煤车里的东西，却做不到。分析家自己拿起剪刀，也把施虐性承担到自己身上，亲手把煤车里的东西肢解开。做完以后，孩子把一切拿起来，扔进抽屉，并说：“没了！”于是她为此赋予言词：“迪克想把母亲身体里的排泄物拿掉、切掉。”

下一次，他再次看见同一节煤车，焦虑地把它藏到其他玩具下面。她向他重复指出他的焦虑。他又把煤车拿出来。她告诉他，他曾经想拿走并切开母亲身体里的东西。这时，孩子再次跑进两个房间之间的昏暗空间；梅兰妮·克莱因说，他清楚表明，两个房间之间的昏暗空间同样代表母亲的身体。因为当我告诉他“他想攻击母亲身体的内部”时，他用指甲抓挠，也就是重复同一件事：破坏母亲身体的内部。她所提供的内容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只有这些相同的施虐性游戏不断

继续。孩子把焦虑分布到越来越多的对象上；洗手池、其他玩具和餐具柜随后也加入进来。

下面是她如何评注自己提供的这些简短分析材料，以及如何理解迪克的案例。她再次说，他之所以比其他人更强烈地防御自身施虐性，是因为生殖器发展过早。她以如下现象作为生殖器发展过早的标志：例如，孩子刚刚想吃掉一个代表父亲阴茎的小玩具人物以后，便会对这个受到伤害的人物显露怜悯，为它感到难过，并想归还自己方才试图从它那里夺取和占有的东西。

他过早具有同情能力，能够感受他者的感受；克莱因把这看作生殖器发展过早的标志。由于这一点，他从整个外部身体——身体、阴茎等——撤回了兴趣；这一切都变得危险、具有攻击性。他切断了自己同现实的联系，幻想的发展也停了下来。在我看来，这十分不同寻常。他躲进唯一一个幻想：母亲身体空洞、昏暗而漆黑的幻想；并且从那些代表母亲身体内容的外部对象上撤回自己的意向。

她以如下方式理解分析对迪克的作用。她认为，自己给出的解释……她还强调了一个技术要点：通常，她从不依据如此单一的材料作出解释，而会等待材料积累；可是这里既然只有一种材料，她便立刻行动。她认为，解决或触及无意识问题使焦虑得到缓解；焦虑的松弛又使新的焦虑流入成为可能。于是，每一次新的解释都会使焦虑在解释之后降低；随后，这些焦虑便像她起初描述的那样分布到外部对象上。治疗和日常生活都清楚表明这一点，因为孩子接触并感兴趣的人与事物数量不断增加。

她描述了他的一般进步：

- 他能够表现得更具攻击性；
- 他对越来越多的对象产生兴趣；
- 他对她的转移更强；
- 他的词汇量增加：她说他学会了新词，也记起了更多词；
- 他对母亲和父亲变得更亲昵。她没有具体说明，不过他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他似乎正在进入一个俄狄浦斯期。

她对这一切的理论理解作了某种总结，再次指出：能够更好地掌控焦虑，就是能够把焦虑分布到更多的对象和兴趣上；由此，焦虑的量得到调节，自我也就能够耐受并掌控它们。概括起来，可以说：

- 孩子从一个由内摄和驱逐机制占主导地位的初始阶段出发，那是一个泛化认同的阶段；
- 他必须进入符号形成的阶段，而认同是这个阶段的一种先驱形式。

象征性认同将构成后来一切升华和活动的基础。象征作用阶段的确立将使想象活动与幻想得以自由展开；这两个阶段之间的过渡，是通过焦虑的分布完成的：焦虑投注于越来越多的外部世界对象。我略去了这一章最后关于诊断的部分。

拉康——这一点您做得很好。因为就今天而言，已经够了。

玛丽-塞西尔·热利尼耶

我来谈谈自己对这篇文章的个人反应。我把注意力集中在象征作用这一概念上，因为它在我看来至关重要，全文的问题都在这里提出。不过首先必须说，这篇文章几乎每一段都可以提出一些意见；正是这些地方使我难以理解它。例如，其中始终有些在我看来彼此矛盾的东西，我举出一两点。

拉康——好……那就开始吧。

玛丽-塞西尔·热利尼耶

比如，她说孩子从外部世界和对象那里撤回兴趣，因为外部世界过于危险，所以他否认这个世界。接着她又说："因此，不存在关系。"这在我看来是矛盾的。如果他否认某种东西，那正是因为他在否认一种关系；也就是说，这种关系、因而这些对象，已经投注了某种他试图否认的东西。如果他有所否认，就说明那里存在某种东西。在我看来，我们不能满足于她开头的临床描述，不能简单说迪克同任何东西都没有关系。我觉得，关系是存在的，只是他否认它们，因为这些关系很危险。还有一段，她说他躲进了母亲空洞而漆黑的身体这一幻想；她写道：

> "他从那些本会代表这一身体之内容——孩子、排泄物、阴茎——的对象上撤回兴趣……"

我无法理解一个幻想怎么能这样被切割开来，也无法理解孩子怎么会因处在身体内部而得到安心，同时这个身体内部又不牵涉其余一切；孩子总得处在某个地方。难道可以只取某种东西的一小块吗？这一点我无法理解。

第三件让我觉得十分奇怪的事，是她如何理解迪克重新获得词汇这一事实。她似乎认为，从开始治疗起，他才学会一些词，仿佛他这时才开始具有记忆，也才开始想要学习。这一点触动了我，因为我曾有机会对一个孩子作过考察：

- 他与迪克同龄，五岁；
- 他的临床表现与迪克完全相同；
- 没有任何特别的差别，关于词汇的情形也都相似。

而从他开始说话的那一刻起，事情就非常清楚了：在这个病例中，他并不是在学习词语；他早已知道这些词，只是不再否认自己知道它们。换句话说，他已经掌握了一整套句法和词汇，却一直加以否认，就像他否认自己同外部对象的关系一样。可是她却认为，他这才开始学习词语。最后，我回到她的象征作用概念，并对这一概念作些批评。如果我理解得不错，那么在她那里，象征作用似乎是一种非常简单、单线推进而没有上下层次的过程，即身体——整体或局部——与外部世界对象之间的等式。这样就会产生一些问题。在描述这一点时，她非常准确地指出——并且反复强调——象征作用的出现与自我的增强在时间上存在相关：孩子增强自我的时候，也就是象征作用出现的时候。但她没有解释二者的联系，没有使这种联系变得可理解。她只是表明两者大致同时发生；至于自我的功能，则既没有得到具体说明，甚至根本没有触及。

她似乎把象征作用视为诸多适应机制中的一种。当然，她说它具有根本意义，没有它，一切都无法继续，因为迪克没有获得这种机制，所以发展停滞了。但对她而言，这仍只是诸多机制中的一种；它并不改

变主体整体的结构，只是让自我掌控焦虑和适应环境这项任务变得更容易、更可行。

最后，她完全没有说明：焦虑向对象的这种分布，究竟怎样使人从幻想世界过渡到同一个真正的实在、一个“实在的实在”发生关系。她说，更强的自我能够做到这一点。但怎样做到？这个实在又是什么？她完全没有说。所以，为了使这些问题在我看来彼此连贯，我会这样表述：先考察她所从之出发的第一个阶段，即口腔—施虐期；她主要描述了这个阶段的内容。如果特别从结构、从组织方式上考察这个阶段，或许可以说，其中的一切同时既是幻想性的又是实在的；因为没有任何东西将二者区分开来，所以这时既没有实在本身，也没有真正的幻想性。这是一种前实在和前幻想状态。

拉康——况且她自己这样说过，这样表述过：“unreal　reality（非现实的现实）”。

玛丽-塞西尔·热利尼耶

这个阶段似乎以整体的未分化为特征；主体在其中无非是内摄与驱逐这两种运动构成的恶性循环，其每一个环节都令人焦虑，无论是内摄的时刻还是驱逐的时刻：内摄施虐性，并驱逐好的东西。

拉康——如果您愿意，也可以这样说。不过被驱逐的更多是坏的东西。

玛丽-塞西尔·热利尼耶

是的，但他同时把一切都驱逐出去。我得说，一种新结构的预示，总是首先以否定性的形式出现，随后才转入另一种形式。在这个案例中，否定性就是施虐性。不过，只要这种否定性仍停留在实在与幻想彼此混同的未分化语域里，他又是在怎样的自我中感受到那种近乎实在的东西呢？我们始终没有走出恶性循环，因为这种否定性无法抵达它的终点；只有到了那里，它才会具有结构化作用，才会使主体进入另一个分化阶段，使幻想与实在的分化得以实现。

在迪克的案例中，这一过渡似乎是通过分析家的介入完成的。分析家在这里作为第三项介入；她理解幻想，赋予它效力，并允许施虐性出现，因为她通过赋予言词把象征的东西同实在区分开来：她使母亲的身体象征化，也使施虐性象征化。

拉康

她以最粗暴的方式把象征作用硬塞给他。她一上来就把重大的解释砸给他，把他猛然塞进一种绝对粗暴的言语化中；其内容之于我们，几乎像之于任何读者一样令人反感：这就是俄狄浦斯神话——“你就是小火车，你想操你母亲。”这就是她的方法！显然，这会引出各种各样的理论讨论，而这些讨论不能同病例诊断分开。不过可以肯定，这次介入之后确实发生了某种事情；关键全在这里！

玛丽-塞西尔·热利尼耶——她似乎认为，之所以发生某种事情，是因为她已经……

拉康

您所解释的这种缺乏接触，就是自我的缺陷。严格说来，这个主体的自我尚未形成。她根据这个主体起初表现出的深度冷漠、无动于衷和缺席状态，把他同其他神经症者区分开、明确划开；这一点本身已经相当有意义。

但完全清楚的是什么？归根结底，正是我已经告诉你们的东西：凡未被象征化的，就是任何符号形成之前的现实。可以说，这正是对这个年轻主体构成限制的东西。他整个处在纯粹的、尚未构成的现实之中，也就是处在未分化之中。

她向我们展示的是：对彼此有别的对象产生兴趣，让它们作为人类兴趣的对象、作为数量众多且彼此等值的对象出现；正是这个无限对象世界的发展，构成了一个人的世界。她为我们指出了这一点。她的文章之所以珍贵，正因为她可以说是一位治疗者、一位富有经验的女性；她感受到这些事情，只是表达得不好，这一点不能苛责她。

不过说到底，自我理论的确不完整；也许她并没有打算把它完整提出，而缺失的恰恰就是这一点。

但她把下面这一点解释得非常好……

今天我不得不加快速度；下一次我会重新讨论这一点

……她所表明的是：人的世界中的对象之所以不断增殖和发展，具有那种构成这一世界独特性的丰富性，是因为发生了某种驱逐过程。这个过程同原始的毁灭本能相连。为方便今天的讨论，我们暂且把这些对象的最初意义称作“情感性的”——因为我们已经多少为这个词驱过魔，也明白它指什么：这里涉及的，是一种扎根于存在最根本的本能

根基的原始关系。正是在这些对象通过驱逐和毁灭的过程被创造出来、显现出来时，也正是在这些东西相对于原始主体的世界被逐一排出时——这个世界尚未组织进严格说来属于人的、可以交流的现实语域——每一次都会涌现出什么呢？一种可以说是无法承受的认同模式。

焦虑并不是主体为了构成对象而需要分配的一种能量——况且，严格说来，原文里没有任何句式表达过这种意思。焦虑始终被界定为“涌现出来”，即 arising。每一种客体关系都对应一种认同模式，而焦虑严格说来就是它的信号。

每当主体同任何东西认同时，焦虑都会涌现。这里所说的认同，还先于严格说来属于自我层面的认同；即使自我层面的认同已经完成，主体每一次新的再认同仍会使焦虑涌现。这里的“焦虑”意味着诱惑、眩晕，意味着主体再次丧失自己，而后在这些极其原始的层面上重新找到自己。

焦虑强烈到使那种游戏实际上无法发生——在这种游戏中，主体会随着每一个焦虑对象而介入；不过，这还只是一种附带标记。焦虑是一种信号。弗洛伊德每次接近焦虑概念时，总是非常清楚地感到并表述过：焦虑是一种信号、一种性质、一层主体性的色彩。可这里的焦虑恰恰没有发生，因为主体甚至无法达到那种已经可以成为象征作用雏

形的认同。无论多么悖谬，这个主体始终面对现实，生活在现实之中：

- 他身处梅兰妮·克莱因的诊室；
- 对他而言，没有他者；
- 对他而言，也没有他自己；
- 只有一种纯粹而简单的现实：两扇门之间的间隔就是他母亲的身体。

火车以及随之而来的一切，固然都是某种东西，但在梅兰妮·克莱因敢于开口之前，它们既无法命名，也未被命名。她具有某种东西，某种近乎粗蛮的本能；正是它使她凿穿了这座此前坚不可破的知识大全。她敢于同他讲话，敢于对着一个存在者讲话；此前，这个存在者带给她的一切观察都只可能使她认为：就这个词的象征意义而言，这是一个不作回应的存在者。他待在那里：

- 仿佛她并不存在；
- 仿佛她只是一件家具。

她对他说话，也就是说，她真正把名称赋予那个毕竟参与符号的“某种东西”——因为它能够立刻被命名——但在此之前，对主体而言，它严格说来只是一种纯粹而简单的现实。她所使用的“过早成熟”一词，其意义正在这里：她说，这个主体在某种意义上已经达到生殖器阶段；这确实如此，因为生殖器阶段是在整个幻想象征化阶段之后到来的。主体的各种认同往返运动把这一过程连接起来：当主体刚刚勾勒出一

种认同，便又把它撤回，随后以旁边的其他对象重新建立认同，从而为其原始认同的主要对象提供一系列等值物。这些等值物使他的世界成倍扩展，并通过想象界为那个发展程度更高、更为复杂的实在——人的实在——提供框架。

正因为主体无法完成这些往返运动，而是直接处在一种只在其自身现实层面上进行意指的现实中，所以这种现实是彻底非人的：

- 因为没有发展，起初也就没有那一系列往返运动，以一系列对象彼此替代；
- 因为每一次，焦虑都会阻断认同的最终形成，阻断现实的固定。

可以说，这是一种已经得到象征化的现实，因为我们能够赋予它意义；但它先于任何往来运动。这是一种提前发生的、原初而凝固的象征化，是唯一的一次原初认同，是某种具有名称的东西："空洞"和"漆黑"。在主体自身的结构中，这正与人之为人在起源处的状态相对应；而这种状态正如我已经指出的那样，本质上是敞裂的。主体没有充分建立接触；自然而然地，在这道裂隙面前和这道裂隙之中，只有数量极少的现实对象算数，而他甚至无法命名它们。

这意味着什么？您已经看得很清楚：在某个层面上，他不能命名这些对象，因为尽管他已经对词语有所领会，却还没有对这些词语作出Bejahung（肯定），没有承担它们。悖谬之处恰恰在于：在这个层面上，他具有一种看起来远超常态的共情可能性；梅兰妮·克莱因似乎就是这样指出的，因为他同现实的关系如此贴切［……］虽然少见，却是以一种保持距离、不引发焦虑的方式发生的。

当梅兰妮·克莱因身上沾着铅笔的细小刨屑时——那是尚未成形之物的碎裂；不要忘记，正是在开始拆毁时，那个小小的［……］才被说出来，机制也随之启动——当他看见梅兰妮·克莱因上衣上的铅笔刨屑时，他说道："Poor Melanie Klein（可怜的梅兰妮·克莱因）。"你们看出问题是朝哪个方向提出的了吗?

下一次我会回到这里。届时，我们将进入象征作用与实在之关系这一问题的核心，从它最困难的角度、从它发生的起点来考察。你们也能看见，这同我们前几天在伊波利特先生的评注中划定的区域有什么联系：毁灭主义在人的现实构成中的功能。

梅兰妮·克莱因：The importance of symbol-formation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go（《自我发展中符号形成的重要性》，1930）。

[返回正文] 课程目录

我在本文中的论证建立在这样一个假设之上：精神发展的早期有一个阶段，施虐性会在力比多快感的各种来源上全部活跃起来。[1]根据我的经验，施虐性在这个阶段达到顶峰。这个阶段由口腔—施虐性吞食母亲乳房（或母亲本人）的欲望开启，并随着早期肛门阶段结束。在我所说的这一时期，主体占有母亲身体内容物并用施虐性所能调动的一切武器摧毁她，是其占主导地位的目标。与此同时，这个阶段构成俄狄浦斯冲突的开端。生殖器倾向此时开始产生影响，但尚不明显，因为前生殖器冲动仍占据主导。我的整个论证取决于这样一个事实：俄狄浦斯冲突开始于施虐性占主导地位的时期。

孩子预期在母亲体内发现：（a）父亲的阴茎，（b）排泄物，以及（c）孩子；并把这些东西等同于可食用的物质。按照孩子有关父母性

交的最早幻想（或“性理论”），父亲的阴茎（或他的整个身体）会在性交过程中被纳入母亲体内。因此，孩子的施虐性攻击同时以父亲和母亲为对象；在幻想中，他们被咬碎、撕裂、切开或踩成碎片。这些攻击引发一种焦虑：主体害怕受到联合起来的父母的惩罚。由于对这些对象的口腔—施虐性内摄，这种焦虑也被内化，因而已经指向早期超我。我发现，精神发展早期阶段的这些焦虑处境最为深刻，也最具压倒性。

根据我的经验，在幻想中对母亲身体发动的攻击里，尿道施虐性与肛门施虐性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它们很快便加入到口腔施虐性和肌肉施虐性之中。在幻想里，排泄物转化成危险的武器：排尿被视为切割、刺穿、焚烧和溺淹，而粪块则被等同于武器和投射物。[1]〔脚注：参见我的《俄狄浦斯冲突的早期阶段》，第208页。〕

到了我所描述阶段的后期，这些暴烈的攻击方式让位于施虐性所能设计出的最精巧手段所实施的隐蔽攻击，而排泄物也被等同于有毒物质。过量的施虐性引发焦虑，并启动自我最早的防御方式。弗洛伊德写道：[1]“很可能，在自我与本我尚未清楚分化、超我尚未发展出来以前，心理装置所采用的防御方式与达到这些组织层次之后所采用的不同。”根据我在分析中的发现，自我建立的最早防御涉及两个危险来源：主体自身的施虐性，以及遭受攻击的对象。这种防御与施虐性的程度相应，具有暴烈的性质，并且同后来出现的压抑机制有根本区别。

就主体自身的施虐性而言，防御意味着驱逐；就遭受攻击的对象而言，防御则意味着摧毁。施虐性之所以成为危险来源，一方面是因为它为焦虑的释放提供了机会，另一方面是因为主体感到，用来摧毁对

象的武器也同样对准了自己。遭受攻击的对象之所以成为危险来源，是因为主体害怕它会发动同样的报复性攻击。于是，尚未得到任何发展的自我面临一项在这个阶段完全超出其能力的任务——掌控最为剧烈的焦虑。费伦齐认为，认同是象征作用的先驱，它源于婴儿试图在每一个对象中重新发现自己的器官及其功能。按照琼斯的看法，快乐原则之所以能使两个截然不同的东西彼此等同，是因为它们具有一种由快感或兴趣标示出来的相似性。几年前，我以这些概念为基础写过一篇文章，并在其中得出结论：象征作用是一切升华和一切才能的基础；因为正是通过象征等式，事物、活动和兴趣才成为力比多幻想的内容。

现在，我可以在当时所说的内容上再作补充[2]，并指出：除了力比多兴趣之外，在我所描述的阶段中涌现的焦虑也会启动认同机制。由于孩子想要摧毁那些代表对象的器官——阴茎、阴道、乳房——他便对这些对象产生恐惧。这种焦虑促使他把上述器官同其他东西等同起来；由于这种等同，后面这些东西继而也成为焦虑对象，于是他不得不不断建立另一些新的等式。正是这些等式构成了他对新对象产生兴趣的基础，也构成了象征作用的基础。[1]〔脚注：《抑制、症状与焦虑》，《国际精神分析文库》第28号。〕

[2]〔脚注：《儿童分析》，第87页。〕

这样一来，象征作用不仅成为一切幻想与升华的基础；更进一步，主体同外部世界及一般现实的关系，也建立在象征作用之上。我曾指出，达到顶峰的施虐性，以及与施虐性同时涌现的求知冲动，都以母亲的身体及其幻想中的内容物为对象。指向母亲身体内部的施虐性幻想，构成了主体同外部世界及现实之间最初、最基本的关系。

主体在多大程度上成功度过这个阶段，将决定他后来能在多大程度上获得一个同现实相应的外部世界。由此可见，孩子最早的现实完全是幻想性的；他被焦虑对象包围。在这一点上，排泄物、器官、对象、有生命和无生命的事物，起初都彼此等值。随着自我发展，一种真正的现实关系逐渐从这种非现实的现实中建立起来。因此，自我的发展以及同现实的关系，都取决于自我在极早时期耐受最早焦虑处境所施压力的能力。

并且像往常一样，问题在于相关因素之间某种最优的平衡。充足的焦虑量，是大量符号形成和幻想得以出现的必要基础；而自我必须具有足够的焦虑耐受能力，焦虑才能得到令人满意的修通，这个基础阶段才能获得有利结果，自我的发展才能成功。我是从一般分析经验中得出这些结论的；不过，有一个自我发展受到异常抑制的病例，以格外鲜明的方式证实了这些结论。

下面我要提供这个病例的一些细节。患者是一个四岁男孩；就词汇的贫乏和智力成就而言，他只相当于十五至十八个月大的孩子。他几乎完全不能适应现实，也几乎没有同周围环境建立情感关系。这个名叫迪克的孩子基本没有情感；母亲或保姆在不在场，他都无动于衷。从出生之初起，他就很少表现出焦虑，即使有，程度也异常轻微。除了一个稍后会谈到的特殊兴趣外，他几乎没有任何兴趣；他不玩耍，也不同周围环境接触。

大多数时候，他只是毫无意义地把声音串在一起，并不断重复某些声响。他即使开口说话，通常也会错误地使用自己那点贫乏的

词汇。但问题不仅在于他无法让别人理解自己；他根本没有让人理解的愿望。不仅如此，迪克的母亲有时还能清楚感觉到，男孩怀有一种强烈的否定态度，其表现就是他经常做出同别人期待恰好相反的事。例如，如果她设法让他跟着自己说出不同的词，他往往会把词完全改掉；可在其他时候，他又能把同样的词发得十分准确。

还有些时候，他会正确地重复词语，却又以一种不间断的机械方式一直重复下去，直到周围所有人都厌烦透顶。这两种行为方式都不同于神经症儿童的行为。神经症儿童以反抗形式表达对立，或者表现出顺从时——即便这种顺从伴随着过量焦虑——都会带着某种理解，并同相关的事物或人发生某种联系。

但迪克的对立和顺从既没有情感，也没有理解。此外，他受伤时对疼痛显得极其迟钝，也完全没有幼儿普遍具有的那种渴望安慰和爱抚的愿望。他身体动作的笨拙同样十分显著。他抓不住刀或剪刀，但值得注意的是，他却能相当正常地使用吃饭的勺子。第一次来访给我留下的印象是：他的行为同我们在神经症儿童身上观察到的完全不同。他让保姆离开，没有显露任何情绪；随后又怀着全然的冷漠跟我走进房间。

进屋以后，他漫无目的、毫无目标地来回奔跑；他还数次绕着我跑，就仿佛我是一件家具，但对房间里的任何物件都没有表现出兴趣。他来回跑动时，动作似乎毫不协调。他的目光和面部表情固定而遥远，毫无兴趣。再把这种情形同患有严重神经症的儿童比较一下。我想到的是这样一些孩子：第一次来见我时，他们虽然并未真正发生焦虑发作，却会害羞而僵硬地缩进角落，或者一动不动地坐在摆有玩具的小

桌前；又或者，他们不去玩耍，只拿起这个或那个物件，随即又放下。

在所有这些行为方式中，巨大的潜伏焦虑都清晰可辨。角落或小桌是他们躲避我的避难所。但迪克的行为既没有含义，也没有目的；没有任何情感或焦虑同它联系在一起。

现在，我来提供一些他既往经历的细节。哺乳期的生活异常不顺、充满扰动：他的母亲连续几周徒劳地试图亲自哺乳，孩子几乎因此饿死，随后只得改用人工喂养。他七周大时终于找到一位乳母，但到这时，母乳喂养已经不能使他茁壮成长。他患有消化紊乱、直肠脱垂（prolapsus ani），后来又患上痔疮。他虽然得到各种照料，却没有得到真正倾注于他的爱；母亲从一开始就对他过分焦虑，这或许影响了他的发展。

此外，父亲和保姆也都没有向他表现出多少亲昵，所以迪克在一个相当缺乏爱的环境中长大。两岁时，他换了一位能干而亲昵的保姆；不久以后，他又同非常疼爱他的祖母生活了相当长一段时间。这些变化对他的影响可以从其发展中看出来。他大约在正常年龄学会走路，但训练他控制排泄功能却很困难。在新保姆的影响下，他更容易地养成了一些清洁习惯。

大约三岁时，他已经掌握了这些习惯，并且在这件事上确实表现出某种好胜心和忧惧。到了第四年，他还在另一个方面表现出对责备的敏感。保姆发现他自慰，便告诉他这样做“很坏”，不许再做。这项禁令显然引起了忧惧和罪疚感。此外，在第四年里，迪克总体上确实作出

了更多适应努力，但主要只针对外在事物，尤其表现为机械地学习若干新词。

从出生之初，喂养问题就异常困难。有乳母时，他完全没有吮吸的欲望，这种抗拒一直持续。接着，他又拒绝用奶瓶喝奶。到了该吃更坚实食物的时候，他拒绝咀嚼，并且绝对排斥一切不像糊状食物那样绵软的东西；就连糊状食物也几乎必须强迫他才肯吃。新保姆还带来一个好影响：迪克进食的意愿有所改善，但即便如此，主要困难仍然存在。[2]因此，这位亲切的保姆虽然在某些方面改变了他的发展，根本缺陷却仍未触及。[1]〔脚注：到他第一年末，母亲已经觉得这个孩子不正常；这种感觉或许影响了她对待他的态度。〕[2]〔脚注：此外，直至目前，这个症状仍是迪克的分析中最难克服的症状。〕

迪克同她之间也像同其他所有人一样，始终未能建立情感接触。因此，无论是她的温柔还是祖母的温柔，都未能启动那种尚且缺失的客体关系。

通过对迪克的分析，我发现，他的发展之所以受到异常抑制，是因为未能完成我在本文开头谈到的那些最初步骤。在迪克这里，自我完全没有耐受焦虑的能力；这种无能看起来是体质性的。生殖器因素很早就开始发挥作用；这导致他过早且过度地同遭受攻击的对象认同，并促成了同样过早的针对施虐性的防御。

自我停止发展幻想生活，也停止建立同现实的关系。这个孩子的符号形成在一个微弱的开端之后便陷于停滞。早期尝试只在某一种兴趣中留下痕迹；这种兴趣孤立存在，同现实没有联系，不能构成进一步升华的基础。孩子对周围大多数对象和玩具都无动于衷，甚至不能领会

它们的用途或含义。不过，他对火车和车站感兴趣，也对门把手、门以及开门关门的动作感兴趣。

对这些事物和动作的兴趣具有一个共同来源：它真正涉及的是阴茎进入母亲身体。门和锁代表进出她身体的通道，门把手则代表父亲和他自己的阴茎。因此，使符号形成陷于停滞的，是他在进入母亲身体以后害怕自己会遭受的事情——尤其害怕父亲阴茎会对他做的事情。此外，他针对自身毁灭性冲动的防御，被证明是其发展的根本障碍。他绝对不能作出任何攻击行为；这种无能的基础，很早就清楚显现在他拒绝咀嚼食物这件事上。四岁时，他无法握住剪刀、刀或工具，而且所有动作都格外笨拙。针对那些指向母亲身体及其内容物的施虐冲动——即同性交幻想相连的冲动——所形成的防御，使幻想活动停止，也使符号形成停滞。迪克后来的发展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他不能在幻想中展开同母亲身体的施虐性关系。

我在分析中不得不应对的异常困难，并不在于他的言语能力有缺陷。游戏技术顺着孩子的象征性表征推进，使我们能够进入他的焦虑和罪疚感；借助这种技术，我们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不依赖言语联想。但这种技术并不限于分析孩子的游戏。我们的材料也可以来自孩子一般行为细节中显露出的象征作用——对于游戏受到抑制的孩子，材料也必须以这种方式取得。[1]

可是迪克的象征作用尚未得到发展。这部分是因为他同周围事物没有任何情感关系，而对它们几乎全然漠不关心。他事实上没有同特定对象建立任何特殊关系；即使在受到严重抑制的儿童身上，我们通常也能发现这种关系。由于他心中不存在同这些对象的情感关系或象征关系，他对它们偶然作出的任何动作都没有染上幻想的色彩，因而不可

能把这些动作视为具有象征性表征的性质。根据他的行为同其他儿童有所不同的若干地方，我能够看出：他对周围环境缺乏兴趣，难以同他的心灵建立接触，这些都只是他缺少同事物的象征关系所产生的结果。因此，分析必须从这里开始，即从同他建立接触的根本障碍开始。

正如我此前所说，迪克第一次来见我时，保姆把他交给我，他没有表现出任何情感。我把预先准备好的玩具给他看，他看着它们，却连一丁点兴趣都没有。我拿起一列大火车放到一列较小的火车旁边，把它们分别称作“爸爸火车”和“迪克火车”。这时，他拿起那列被我称作“迪克”的火车，让它驶向窗边，并说：“车站。”

我解释道：“车站就是妈妈；迪克正在进入妈妈。”他丢下火车，跑进房间外门和内门之间的空间，把自己关在里面，说了一声“黑”，随即又跑出来。他把这个过程重复了好几次。我向他解释：“妈妈里面是黑的。迪克在漆黑的妈妈里面。”与此同时，他再次拿起火车，但很快又跑回两扇门之间的空间。当我说他正在进入漆黑的妈妈时，他用提问的语气说了两遍：“保姆？”我回答：“保姆很快会来。”他把这句话重复了一遍，此后也能完全正确地使用并记住它。下一次来时，他的行为同前一次完全一样。但这一回，他径直跑出房间，进入昏暗的门厅。他也把“迪克”火车放在那里，坚持让它留在那里。他一再问：“保姆会来吗？”[1]〔脚注：这只适用于分析的起始阶段，以及分析中其他有限的片段。一旦已经进入无意识，而焦虑的程度

有所降低，游戏活动、言语联想以及其他一切表征方式就会开始出现；分析工作使自我发展成为可能，而这些表征方式也会同自我发展一道出现。〕

在第三次分析课中，他的行为依旧相同，不过除了跑进门厅和两扇门之间以外，他还跑到五斗橱后面。在那里，他突然被焦虑攫住，并第一次把我叫到身边。他反复询问保姆，这时忧惧已经清楚可见；分析课结束时，他以一种极不寻常的欣喜迎接她。由此可见，在焦虑出现的同时，一种依赖感也涌现出来——先是对我，随后是对保姆。与此同时，他开始对“保姆很快会来”这句安慰话产生兴趣；同平时的行为相反，他重复并记住了这句话。

不过在第三次课中，他还第一次带着兴趣看那些玩具，其中显露出一种攻击倾向。他指着一节小煤车说：“切。”我给他一把剪刀；他试图刮划那些代表煤块的黑色小木片，却握不住剪刀。

他看了我一眼，我便顺着这个眼神把木片从煤车中剪出来；随后，他把损坏的煤车及其内容物扔进抽屉，说：“没了。”我告诉他，这意味着迪克正在从母亲身体里切除粪便。接着，他跑进两扇门之间的空间，用指甲在门上轻轻抓划；由此表明，他把这个空间同煤车认同，又把二者都同自己正在攻击的母亲身体认同。

他立刻从两扇门之间跑回来，找到餐具柜并钻了进去。下一次分析课开始时，保姆离开，他哭了起来——这对他而言很不寻常，不过很快便平静下来。这一次，他避开两扇门之间的空间、餐具柜和角落，转而摆弄玩具，更仔细地查看它们，并显然开始萌生好奇心。做这些事情时，他碰到了上次来访时损坏的煤车和车中之物。他迅速把两者推开，再用其他玩具遮住。我解释说，损坏的煤车代表他的母亲；随后，他又取出煤车和那些小煤块，把它们带进两扇门之间的空间。

随着分析推进，情况逐渐明朗：他这样把它们扔出房间，表示对受损对象和自身施虐性（或施虐性所使用的手段）的双重驱逐；通过这种方式，二者都被投射到外部世界。迪克还发现洗手池可以象征母亲的身体，并对被水弄湿表现出异常强烈的恐惧。他焦虑地擦掉自己手上的水，也擦掉我的手——他把我的手同自己的手一起浸入水中；紧接着，他排尿时也表现出同样的焦虑。在他看来，尿液和粪便代表有害而危险的物质。[1]

情况逐渐清楚：在迪克的幻想中，粪便、尿液和阴茎都代表着用来攻击母亲身体的东西，因而他也感到它们会成为伤害自身的来源。这些幻想加剧了他对母亲身体内容物的恐惧，尤其是对父亲阴茎的恐惧——他幻想父亲的阴茎位于母亲的子宫内。我们在许多形式中看到了这个幻想中的阴茎，也看到针对它的攻击感日益增强，其中尤以吃掉并摧毁它的欲望最为突出。例如，有一次，迪克把一个玩具小人举到嘴边，咬牙说道："Tea　daddy。"他想说的是："Eat　daddy（吃掉爸爸）。"

接着，他要了一杯水。事实表明，对父亲阴茎的内摄同两方面的恐惧相连：一方面，他把父亲阴茎当作一个原始的、造成伤害的超我而害怕它；另一方面，他又害怕受到被这样掠夺的母亲惩罚。也就是说，他既害怕外部对象，也害怕内摄的对象。这时，我已经提到过、并且对他的发展具有决定作用的事实变得突出起来：生殖器阶段在迪克身上过早地活跃起来。其表现是，我方才谈到的那些表征出现之后，随之而来的不仅是焦虑，还有懊悔、怜悯，以及必须作出补偿的感觉。因此，他会接着把玩具小人放到我的膝上或手里，把所有东西放回抽屉，等等。源于生殖器层面的反应过早开始运作，是自我过早发展的结果；但自我后来的发展又恰恰受到它的抑制。

这种过早的对象认同还不能同现实建立联系。例如，有一次，迪克看见我膝上的一些铅笔刨屑，便说："可怜的克莱因太太。"可在另一个相似场合，他又以完全相同的方式说："可怜的窗帘。"除了不能耐受焦虑之外，这种过早出现的共情也成为一个决定性因素，使他防御一切毁灭性冲动。

迪克切断了[1]〔脚注：我在这里找到了迪克母亲曾经观察到的一种特殊忧惧的解释。这种忧惧在他大约五个月时出现，后来又不时出现。孩子排便和排尿时，脸上会显出强烈焦虑。由于粪便并不坚硬，他所患的直肠脱垂（prolapsus ani）和痔疮似乎不足以解释这种忧惧，尤其因为他排尿时也以完全相同的方式表现出来。在分析课中，这种焦虑达到了极高程度：迪克说自己想排尿或排便以后，无论是哪一种，都要长时间犹豫，显出深切焦虑的一切征象，眼里还含着泪，最后才会进行。在我们分析了这种焦虑以后，他对这两种身体功能的态度已经完全不同，如今几乎恢复正常。〕

自己同现实的联系，并躲进母亲身体昏暗、空洞的幻想中，由此使他的幻想生活陷于停滞。这样，他也成功地从外部世界中代表母亲身体内容物的各种对象——父亲的阴茎、粪便、孩子——那里撤回了注意。作为施虐性器官的自身阴茎，以及他自己的排泄物，都必须被清除掉（或予以否认），因为它们被视为危险而具有攻击性。在迪克的分析中，我能够通过接触他所显露的幻想生活和符号形成的些许萌芽，进入他的无意识。

由此产生的结果，是他的潜伏焦虑有所减轻，从而使一定数量的焦虑能够显现出来。但这也意味着，对焦虑的修通已经通过建立同事物和对象的象征关系而开始；与此同时，他的求知冲动与攻击冲动也被发

动起来。每一次进展之后，都会释放出新的焦虑量，并使他在一定程度上避开那些已经同他建立情感关系、因而也已成为焦虑对象的事物。在避开这些事物的同时，他又转向新对象；他的攻击冲动与求知冲动继而指向这些新的情感关系。例如，有一段时间，迪克完全避开餐具柜，却彻底探查洗手池和电暖器；他检查每个细节，并再次表现出针对这些对象的毁灭冲动。随后，他又把兴趣从它们转移到新的事物上；有时，也会转向那些他早已熟悉、但先前已经放弃的事物。

他再次摆弄餐具柜，但这一回，对它的兴趣伴随着远为活跃的行动、更强烈的好奇心，以及更强的各类攻击倾向。他用勺子敲打它，用刀刮划、砍凿它，还往上面洒水。他兴致勃勃地查看柜门的铰链、开合方式、锁具等等；又爬进柜子，询问不同部件叫什么。

因此，随着兴趣得到发展，他的词汇量也同时扩大了；因为现在，他不仅对事物本身越来越感兴趣，也开始对事物的名称感兴趣。那些他以前听见却置之不理的词，如今能够记住并正确使用。随着兴趣的这种发展，以及对我的转移日益增强，此前一直缺失的客体关系也已经出现。

这几个月里，他对母亲和保姆的态度变得亲昵而正常。现在，他希望她们在场，希望她们注意自己；她们离开时，他会感到痛苦。他同父亲的关系也越来越多地显露出正常俄狄浦斯态度的迹象；总体而言，他同对象的关系也日益稳固。此前缺失的、让别人理解自己的愿望，如今已经充分发挥作用。迪克试着利用自己仍然贫乏但不断增长的词汇让人理解，并勤奋地努力扩大词汇量。此外，还有许多迹象表明，他正在开始建立同现实的关系。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用了六个月分析他；在这段时期里，他在所有根本要点上都已经开始发展，因此可以作出良好预后。他的病例中出现的若干特殊问题，已经证明可以解决。我们能够只借助很少几个词同他建立接触；能够在一个完全没有兴趣和情感的孩子身上激活焦虑；还能够逐渐化解并调节释放出来的焦虑。我要强调，在迪克的病例中，我修改了自己通常使用的技术。一般而言，在材料尚未通过多种表征得到表达以前，我不会加以解释。

可是在这个病例中，表达材料的能力几乎完全缺失；迪克行为中的表征相对含混，所以我不得不依据自己的一般知识作出解释。通过这种方式进入他的无意识以后，我成功激活了焦虑和其他情感。

随后，表征变得更加充实，我很快获得了更稳固的分析基础，从而能够逐渐转向自己通常用来分析幼儿的技术。我已经说明，自己如何通过减轻潜伏状态中的焦虑，使焦虑得以显现。焦虑显现以后，我能够通过解释化解其中一部分。不过与此同时，焦虑也可以用一种更好的方式得到修通，即把它分布到新的事物和兴趣上；这样，焦虑就得到一定缓和，变得可以为自我所耐受。如果以这种方式调节焦虑量，自我能否变得足以耐受并修通正常的焦虑量，只有后续治疗过程能够表明。因此，在迪克的病例中，问题在于借助分析改变其发展中的一个根本因素。

分析这个既无法让人理解自己、自我又不接受影响的孩子，唯一可能的做法就是设法进入他的无意识；通过减轻无意识中的困难，为自我的发展开辟一条道路。

当然，在迪克的病例中，就像在其他所有病例中一样，进入无意识必须以自我为途径。事实证明，即使这个发展得极不完善的自我，也足以建立同无意识的联系。从理论上看，我认为有一点值得注意：即使在这样一个自我发展严重缺损的极端病例中，也只有通过分析无意识冲突，才可能使自我和力比多都得到发展，而无须对自我施加任何教育性影响。

有一点看来十分清楚：一个完全没有现实关系的孩子，即使其自我发展得并不完善，也能在分析的帮助下耐受压抑的解除而不被本我淹没；既然如此，我们就无须担心，在神经症儿童那里——也就是远没有这么极端的病例中——自我会屈服于本我。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周围人此前对迪克施加的教育性影响总是从他身上滑过，没有产生任何效果；如今，分析使他的自我得到发展，他也越来越能够接受这种影响。教育性影响可以跟上分析所调动的本能冲动，并且完全足以加以处理。现在还剩下诊断问题。福赛思医生把这个病例诊断为早发性痴呆（dementia praecox），并认为值得尝试分析。这个诊断似乎得到一个事实的支持：其临床图景在许多重要方面同成人晚期早发性痴呆的图景一致。再次概括，它具有以下特征：情感和焦虑几乎完全缺失；在很大程度上撤离现实，无法接近；缺乏情感联系；违拗行为同自动服从的迹象交替出现；对疼痛无动于衷；以及持续现象（perseveration）——这些都是早发性痴呆的特征性症状。

此外，还有两个事实进一步支持这个诊断。第一，可以确切排除任何器质性疾病，因为福赛思医生的检查没有发现这类疾病；第二，这个病例已经证明能够接受心理治疗。分析向我表明，可以明确排除精神神经症这一判断。不支持早发性痴呆诊断的事实则是：迪克病例的根本特征是发展受到抑制，而非发生退行。并且，早发性痴呆在幼儿期

极为罕见，以致许多精神科医生认为它在这一时期根本不会发生。从临床精神病学的角度看，我不会在诊断问题上作出定论；不过，分析儿童的一般经验使我能够对儿童期精神病提出一些总体观察。我逐渐确信，精神分裂症在儿童期远比通常设想的常见。

下面，我列举人们通常没有识别出这一点的若干原因：

1）父母——尤其是较贫困阶层的父母——大多只有在情况已经令人绝望，也就是他们自己已经完全无法应对孩子时，才会咨询精神科医生。因此，相当多的病例从未进入医学观察。

2）即使医生见到了患儿，也往往不可能通过一次仓促的检查确认精神分裂症是否存在。因此，许多这类病例被归入一些含混的名目，例如“发育停滞”“智力缺陷”“精神病态状态”“非社会性倾向”等等。3）最重要的是，精神分裂症在儿童身上不像在成人身上那样明显、醒目。

这种疾病的特征在儿童身上不那么引人注意，因为在程度较轻时，它们也是正常儿童发展中的自然现象。例如，明显脱离现实、缺乏情感联系、无法专注于任何活动、行为愚蠢、胡言乱语，这些现象出现在儿童身上时，不会让我们感到特别异常；我们也不会像它们出现在成人身上时那样加以判断。过度活动和刻板动作在儿童中相当常见，同精神分裂症的运动亢进与刻板行为只有程度上的差别。自动服从必须表现得极为显著，父母才会把它看成“听话”以外的东西。违拗行为通常被视作“淘气”，而解离这种现象在儿童身上往往完全逃过观察。儿童的恐惧性焦虑经常包含具有偏执性质的迫害观念[1]以及疑病性恐惧；这一事实需要极其细致的观察，而且往往只有通过分析才能揭示。

4）我们在儿童身上遇到的精神病性特征，比精神病本身更为常见；在不利情形下，这些特征会在日后的生活中发展成疾病。

因此，在我看来，充分发展的精神分裂症比通常设想的更常见；尤其是精神分裂性特征在儿童期的出现，更是一种远为普遍的现象。我已经得出一个结论——充分的理由必须另找地方陈述——即必须扩展儿童期精神分裂症这一概念，尤其要扩展儿童期精神病这一一般概念；我认为，儿童分析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发现并治疗儿童期精神病。由此获得的理论知识，无疑会为我们理解精神病的结构作出宝贵贡献，也会帮助我们在各种疾病之间作出更准确的鉴别诊断。[1]〔脚注：参见我的《儿童游戏中的人格化》，第215页。〕

如果像我提议的那样扩大这个术语的使用范围，我认为，我们便有理由把迪克的疾病归入精神分裂症。的确，他的情形不同于典型的儿童精神分裂症：他的问题是发展受到抑制，而大多数这类病例都是在某个发展阶段已经成功达到以后才发生退行。[1]此外，病例的严重程度也使其临床图景更显异常。尽管如此，我仍有理由认为，即便这样的病例也不是孤例，因为最近我已经接触到两个相似病例，患儿年龄都同迪克相仿。

所以我们不免会推测：如果以更具穿透力的眼光进行观察，或许还会发现更多这样的病例。现在，我来概括自己的理论结论。这些结论并非只从迪克的病例得出，也来自其他较不极端的儿童精神分裂症病例——患儿年龄在五岁至十三岁之间——以及我的一般分析经验。俄狄浦斯冲突的早期阶段由施虐性支配。它们发生在这样一个发展阶段：这一阶段由口腔施虐性开启，尿道、肌肉和肛门施虐性也同它结合起来；而当肛门施虐性的支配地位结束时，这个阶段也随之终结。

只有到了俄狄浦斯冲突的后期阶段，针对力比多冲动的防御才会出现；在早期阶段，防御所针对的是伴随力比多冲动而来的毁灭性冲动。自我建立的最早防御，指向主体自身的施虐性以及遭受攻击的对象；二者都被视作危险来源。这种防御具有暴烈的性质，不同于压抑机制。在男孩身上，这种强烈防御也指向他的阴茎，因为阴茎是其施虐性的执行器官；这是各种性能力障碍最深层的根源之一。以上是我关于正常人与神经症者之发展的假设；现在，我们转向精神病的发生。[1]〔脚注：不过，分析能够同迪克的心灵建立接触，并在相当短的时间内带来一些进展；这一事实提示，

除了外在显露的那一点发展之外，或许已经存在某种潜在发展。但即使作出这种假设，他的整体发展仍然贫乏得异乎寻常，以致从某个已经成功达到的阶段发生退行这一假设，很难符合这个病例。〕

施虐性达到顶峰的阶段，其前半部分把攻击设想为通过暴力实施；我已经认识到，这是早发性痴呆的固着点。在这个阶段的后半部分，攻击被想象成通过下毒实施，尿道—施虐冲动和肛门—施虐冲动占据主导。我认为，这是妄想症的固着点。[1]

我可以提醒各位，亚伯拉罕主张，在妄想症中，力比多会退行到较早的肛门阶段。我的结论同弗洛伊德的假设一致：早发性痴呆和妄想症的固着点应当在自恋阶段中寻找，而早发性痴呆的固着点先于妄想症的固着点。

自我针对施虐性的过度而过早的防御，阻碍了现实关系的建立和幻想生活的发展。对母亲身体以及外部世界——广义上的母亲身体——所作的进一步施虐性占有和探索陷于停滞。这使主体同那些代表母亲身

体内容物的事物和对象之间的象征关系或多或少完全中止，并由此中止了主体同周围环境及现实的关系。

这种撤离成为情感和焦虑缺失的基础，而后者是早发性痴呆的症状之一。因此，在这种疾病中，退行会一直退回到发展的早期阶段；在那里，主体在幻想中所设想的、对母亲身体内部的施虐性占有和摧毁，以及同现实关系的建立，都由于焦虑而受到阻止或抑制。[1]〔脚注：我将在其他地方援引这一观点所依据的材料，并提供更详尽的论证。（参见我的《儿童精神分析》。）〕

第8课 · 1954年2月24日

我今天要同你们谈的这几句话，预告的题目是：想象界的局部论。显然，这样一个广阔的题目，只有放在我们这里不断推进的工作链条中，才能得到构想和理解。我们的工作，就是始终从弗洛伊德的《技术著作》出发，为分析技术投下一些光；或者更确切地说，从我们能够形成的理解出发，去把握分析经验中结晶在这些《技术著作》里的东西。

因此——你们当然想得到——我不会把这样一个足以占据多年教学的庞大题目完整讲给你们。只是因为，在我们这里的论述进程中，出现了若干涉及想象界在结构中所处位置的问题，这次谈话才可以采用这个题目。

事实上，你们当然明白，我上次那样引导你们，并非没有一个预先构想的计划；我希望，这个计划的整体会向你们显明

它的严密性。当时，我借热利尼耶小姐对一个病例所作的评注来引导你们；这个病例在我看来尤其

具有意义，因为它以一种格外精简、简单的方式，展示了我们已经有机会郑重讨论过的三个大项之间的相互作用：想象界、象征界与实在。

随着这些考察在这里展开，我将能够让你们看到：没有这三个参照系统，就完全不可能理解分析技术和弗洛伊德经验中的任何东西。由此产生的许多困难也会得到说明。举一个例子：热利尼耶小姐前几天面

对梅兰妮·克莱因的文本时所标出的那些不理解之处，实际上是比任何东西都更重要的要素；一旦引入这些区分，它们一方面会显示出自身的根据，另一方面也会得到照明。

我说，这些要素比任何东西都更重要，因为真正重要的是：

- 当我们试图阐发一种经验时，重要的并不那么在于我们理解了什么；
- 而在于我们没有理解什么。

热利尼耶小姐上次报告的可贵之处，正是突出了这篇文本中那些无法理解的地方。文本评注方法的丰饶性就在这里显现出来。我们评注一篇文本时，就像进行一次分析。我多少次向那些接受我督导的人指出过这一点！他们会说：“我以为自己理解了，他想说的是这个、那个……”这恰恰是我们最应当警惕的事情之一：

- 理解得太多；
- 理解得超过主体话语中实际存在的东西。

作出解释，同想象自己已经理解，完全不是一回事，甚至恰好彼此相反。我还要进一步说，正是在某种拒绝理解的基础上，我们才推开分析性理解的大门。一篇由某某人、某某人或梅兰妮·克莱因写的文本，仅仅看起来能够自圆其说，并不足够。当然，它可以嵌进我们已经习惯的那些反复套话：本能成熟、原始攻击本能、口腔施虐性、肛门施虐性。但在她所调动的语域里，仍然显出若干彼此对照之处；我要逐一重新讨论，因为我们在这里还有上次所说内容的另一面。

你们会看到，热利尼耶小姐所凸显的一切奇特、悖谬、矛盾之处，都围绕着自我的功能转动：这个自我一方面发展得过度，并因此阻断了一切发展；另一方面，它的发展却又重新打开了通向现实的大门。

可是，这个自我的发展究竟如何重新打开现实之门？它的严密逻辑、作用环节和具体过程，恰恰没有向我们得到论证。克莱因式解释本身究竟由什么构成，又具有什么独特功能？这种解释确实带有侵入和硬贴到主体身上的性质——上次那堂课稍稍延长，至少留到最后的人听到了我的强调。以上都是我们今天必须重新触及的问题。

先作一个引入。毕竟，你们现在应当已经注意到：在这个年轻主体的病例中，实在、想象界与象征界之间的关系相当……这三者全都浮在表面，清晰可感。我们会逐一重新考察。总之，你们已经感觉到，我们正在处理的东西必定真正处在这个问题的核心。

我已经教你们把象征界同语言等同起来。很清楚，正是在梅兰妮·克莱因开口说话的限度内，某种事情发生了。另一方面，想象界的功能处在主体的核心，这一点也由整份观察从头到尾向我们表明。首先，我们所谈的正是对象如何构成这个概念。

梅兰妮·克莱因告诉我们，对象由一整套游戏构成：投射、内摄、驱逐坏对象、重新内摄这些对象，以及对象之间的游戏。主体的施虐性被投射出去以后，又从这些对象那里返回到主体身上；主体因而被某种焦虑性的恐惧阻断、停住。你们可以感觉到，我们身处想象界的领域；整个问题就在于：象征作用与想象界如何在实在的构成中接合起来。

为了试着把事情为你们说明得更清楚一些，我构想了一个小模型、一个例子，一种镜像阶段的小小替代品。我经常强调，镜像阶段并不只是一件历史事件，不只是发展或发生过程中的一个点；它还有一种示范功能，因为它展示了主体同什么的某些关系呢？恰恰是同自身图像的关系，并且是同这个作为自我之 Urbild（原型）的图像的关系。

这个无从否认的镜像阶段，归根结底已经具有某种光学呈现。这一点无法否认。难道这是偶然的吗？其实并没有那么偶然！显然，各门科学，尤其像我们这门科学一样仍在孕育中的科学，经常从其他不同科学那里借用模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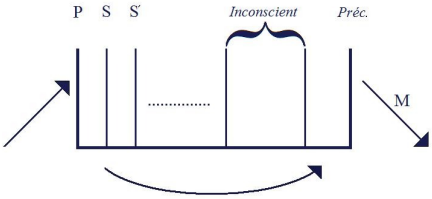
我可怜的朋友们，你们想象不到自己欠地质学多少！假如没有地质学，没有岩层、移动的岩层，以及当岩层再也接合不上时发生的断裂，也就不会有相邻两片地域之间不同的岩层层级；正是借助这些层级，我们才会在几乎相同的高度上，从一层较新的岩层过渡到一层早得多的岩层。我说的这些并非杜撰！你们只要读一读 M. 先生笔下的文字，就会看到他为了说明存在一些混沌处境——它们不全由分析造成，也来自主体的演化——怎样一笔把事情勾勒过去……

显然，就此而言，每个分析家买一本地质学小册子也不坏。过去甚至有过一位兼为地质学家的分析家，勒巴[注1]。他写过一本不错的地质学小书，我再怎样建议你们去读也不为过；它会使你们从若干东西中解脱出来。因为把事情看得更清楚时，就能让每样东西各归其位。

> [注1] 原注为空。

光学同样可以出来说一句话。事实上，我马上就要让它发言，而这样做并不会使我偏离大师的优良传统。我想，你们当中不止一人已经注

意到，在《梦的解析》（Traumdeutung）“梦过程的心理学”一章中，弗洛伊德在你们知道的那个地方向我们展示了著名图式；他要把无意识的整个过程置入其中：



这边是知觉［P］，那边是运动功能［M］；在二者之间，他放入从知觉层面——即瞬时印象——分化出来的不同层次，表现为一系列不同印象：S、S′ 、S″ ……它们同时意味着图像和记忆，使我们能够把那些已经记录、随后又遭压抑进入无意识的痕迹定位在某一层面。这是一幅非常漂亮的图式；我们还会重新使用，它将对我们有所帮助。不过，我想请你们注意一点：它附有一段极有意义的评注。这段话似乎从未真正吸引过谁的注意，尽管弗洛伊德在近乎最后一部著作《纲要》（Abriss）中以另一种形式重新写过。我从《梦的解析》中为你们读出来[注2]：

> [注2]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梦的解析》第七章；法国大学出版社1967年版第455页、2000年版第589页。

“由此提供给我们的观念，是一个心理地点的观念……

这恰好就是这里的问题所在：在知觉与自我的运动功能之间发生的一切，也就是心理现实的场域。

……让我们立即撇开解剖定位的观念，留在心理学的地基上。我们只尝试把服务于心理产出的工具设想成某种复杂的显微镜、摄影装置等

等。心理地点将对应于装置中形成图像的某一点。大家知道，在显微镜和望远镜中，这些都是观念性的点，装置中没有任何可以触摸的部件同它们对应。我的比喻难免不完善，我认为无须为此致歉。它只是为了把如此复杂的过程分解开来，从而使人更容易理解……//……我认为这里没有任何风险；只要保持冷静，不把脚手架当成建筑本身，我们完全可以让自己的假设自由展开。为了接近一个未知事实，我们只需要一些辅助性表象；越简单、越可触及的表象越好。*”

［德文原文：

> Die Idee, die uns so zur Verfügung gestellt wird, ist die einer psychischen Lokalität. Wir wollen ganz beiseite lassen, daß der seelische Apparat, um den es sich hier handelt, uns auch als anatomisches Präparat bekannt ist, und wollen der Versuchung sorgfältig aus dem Wege gehen, die psychische Lokalität etwa anatomisch zu bestimmen. Wir bleiben’ auf psychologischem Boden und gedenken nur der Aufforderung zu folgen, daß wir uns das Instrument, welches den Seelenleistungen dient, vorstellen wie etwa ein zusammengesetztes Mikroskop, einen photographischen Apparat u. dgl. Die psychische Lokalität entspricht dann einem Orte innerhalb eines solchen Apparats, an dem eine der Vorstufen des Bildes zustande kommt. Beim Mikroskop und Fernrohr sind dies bekanntlich zum Teil ideelle Örtlichkeiten, Gegenden, in denen kein greifbarer Bestandteil des Apparats gelegen ist. Für die Unvollkommenheiten dieser und aller ähnlichen Bilder Entschuldigung zu erbitten, halte ich für überflüssig. Diese Gleichnisse sollen uns nur bei einem Versuch unterstützen, der es unternimmt, uns die Komplikation der

psychischen Leistung verständlich zu machen, indem wir diese Leistung zerlegen, und die Einzelleistung den einzelnen Bestandteilen des Apparats zuweisen. Der Versuch, die Zusammensetzung des seelischen Instruments aus solcher Zerlegung zu erraten, ist meines Wissens noch nicht gewagt worden. Er scheint mir harmlos.

中文："由此供我们使用的观念，是一个心理地点的观念。我们要完全撇开这样一个事实：这里所说的心理装置也可以作为解剖标本为我们所知；我们还要谨慎避开一种诱惑，不从解剖学上规定心理地点。我们留在心理学的地基上，只遵循这样一项要求：把服务于心理活动的工具设想成某种复合显微镜、摄影装置之类。于是，心理地点对应于这类装置内部的一个位置，图像的某个前期阶段在那里形成。大家知道，在显微镜和望远镜中，这些地点部分是观念性的；这些区域内并没有装置的任何可触部件。我认为，无须为这个比喻以及一切类似图像的不完善请求原谅。这些比喻只用来支持一种尝试：把心理活动分解开来，把单项活动分别归给装置的不同部件，从而使心理活动的复杂性变得可以理解。据我所知，还从未有人尝试依据这种分解推测心理工具的构成。在我看来，这项尝试并无危险。"（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梦的解析》第七章第二节"退行"，1925年版，第455—456页。）]

不用我告诉你们：既然建议就是用来让人不遵守的，此后我们当然不免多少把"脚手架当成了建筑本身"。另一方面，他也准许我们采用"辅助性表象来接近未知事实，其中越简单、越可触及的表象越好"；这项准许促使我也表现出几分随意，画出一幅图式。

一个比复杂显微镜简单得多的光学装置……

倒不是说继续展开这个比喻没有趣味，只是那会把我们带得有些远

……今天将有某种简单得多、几乎像儿童玩具一样的东西为我们服务。

顺便说一句，我再怎样建议你们思考光学也不为过。有一件奇怪的事：人们曾经以几何学和力学为基础，建立起一整套形而上学体系，并在其中寻找各种理解模型。可是直到现在，人们似乎仍没有充分利用光学所能提供的一切。光学本来很适合引发一些梦——即便不引发一些思考！

这整门科学确实颇为奇特：它的目的和功能，是借助装置再现一种东西；其他一切科学都会对自然作出某种切割、解剖和分析，唯独它借助装置努力产生那个名为“图像”的奇特事物。

请听清楚：我这样说，并不是要让你们把膀胱误作灯笼，把光学图像误作我们所关心的图像。不过，它们具有同一个名称并非毫无缘由。并且，光学图像本身还显出若干奇特而极具启发性的差异：

- 有些是纯粹主观的图像，也就是所谓的虚像；
- 另一些则是实像，也就是说，它们在某些方面的行为完全就像对象，可以被当作对象。还有更奇特的事情：我们能够再次把这些作为对象的实像加以摄取，为它们形成虚像。在这种情形下，作为实像的对象完全有理由被称作虚对象。这一切都相当奇特。

事实上，还有一件更令人惊讶的事：光学的理论基础完全建立在一种数学理论之上；没有它，就绝对不可能为光学赋予结构：

- 对全部问题作进一步探究，必须从一个基本假设出发；没有这个假设，就根本不会有光学；

- 光学若要成为可能，就必须能够表征现实空间中任一给定的点。这个点可以对应于另一个空间——想象空间——中的一个、而且仅有一个点。这就是根本的结构假设。

这看起来简单得过了头，但若不从这里出发，我们就绝对无法写出哪怕一个方程，也无法用符号表示任何东西；换言之，光学根本不可能成立。甚至那些不知道这一假设构成光学基础的人，如果这个假设不存在，也绝对无法在光学中做任何事情。在这里，想象空间与现实空间同样彼此重合；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必须把二者思考成不同的空间。

光学为我们提供了许多深入探究的机会，使人能够通过操练若干区分看出：象征机制在一个现象的显现和结构中何等重要。另一方面，光学还涉及一系列在相当大程度上可以说完全真实的现象，因为在这个领域里，引导我们的毕竟是实验；可与此同时，全部主体性又时时刻刻介入其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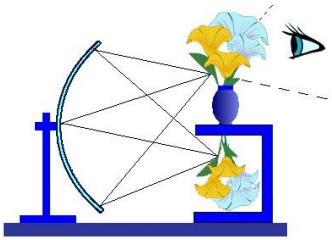
例如，请听清楚这一点：当你看见一道彩虹时，你看见的是某种完全主观的东西。你在一定距离上看见它叠映在景观之上，但它并不在那里。这是一个主观现象；可你却可以借助摄影装置，完全客观地把它记录下来。那么，它究竟是什么？难道我们已经不再清楚主观之物在哪里、客观之物又在哪里？还是说，我们已经习惯在自己的小脑袋里安放一个客观与主观之间的区分？又或者，摄影装置终究更像是一种

主观装置？也就是说，它整个由小小的 x 和小小的 y 构成，而这些符号栖居在主体生活的领域，也就是语言领域。

我暂且把这些问题留在那里，直接进入这个小例子。我先试着把它放进你们脑中，然后再放到黑板上。因为没有什么比画在黑板上的东西更危险了——它总是有些扁平！请在我所在的位置放上一口巨大的锅；有些日子里，它作为共鸣箱，或许会比我更好地取代我。它应当尽可能接近一个半球，内壁打磨得十分光滑。简言之：一面球面镜。

假如它大致放在那里，一直伸到这张桌子附近，你们不会在里面看见自己……不要以为会看见；那种不时在我和学生之间发生的海市蜃楼现象，即使我变成了一口锅也不会发生。尽管如此，你们知道，球面镜会产生某种东西，也就是所谓的实像。因为从放在一定距离处——最好位于球心所在平面——的对象上任意一点发出的每一束光线，都会在同一个平面中对应另一个发光点：光线在球面上反射后会聚于此，从而形成这个对象的实像。当然，这里的说法都只是近似。

结果会是这样——这是一个实验。很遗憾，我今天没能把那口锅带来，也没有带来实验装置；你们可以在脑中把它们想出来。



假定这是一个盒子，这一侧是空的；它放在球心位置，不过实际装置并不完全是这样。这里是半球，这里是带底座的盒子。在物理学还很

有趣、人们还会真正做实验的年代，这个经典实验是怎么做的呢？我们也一样，眼下仍处在真正进行精神分析的时刻：越接近精神分析还很有趣的年代，它就越是真正的精神分析。后来，一切都会运转得十分熟练，只由近似说法和小窍门构成：人们会彻底不明白自己在做什么。同样，制造显微镜并不要求懂得任何光学。不过，让我们高兴一点：即便在做今天这些事情时，我们仍然在进行精神分析。

在盒子上面放一个花瓶——这里是花瓶的截面——一个真实的花瓶。下面这里放一束花。那么，会发生什么？我把锅画得更大一些；半球必须非常巨大，这面球面镜必须具有相当大的开口。发生的事情是：由于球面镜的特性，这里会形成任意一个发光点

花束在这里反射到球面上，随后抵达对称的发光点。请明白，凭借球面的特性，所有光线都以同样方式运行：从一个给定点发出的所有光线都会返回同一点；由此形成一个实像［花束的实像形成在花瓶颈“里面”］。在我的图式里，光线没有完全准确地交叉；但现实中也是这样，所有光学仪器也都如此——得到的从来只是近似。

这些光线继续前进，再次发散；也就是说，对处在这里的一只眼睛而言，它们是会聚的。以会聚形式射入眼睛的光线，其特点就是产生所谓的实像。它们朝眼睛而来时是发散的，离开眼睛时却是会聚的。若情形相反，光线以相反方向射入眼睛，就会形成一个虚像。你们在镜子里看见图像时，发生的正是这种情况：你在它并不存在的地方看见它；而在这里［实像］，你是在它实际存在的地方看见它。不过只有一个条件：你的眼睛必须处在那些已经于相应点——也就是这里——交叉过的光线所构成的视域内。

也就是说，在这个时刻，你们会看到这里出现……

你们看不见藏在下面的花束；不过，如果处在正确的视域内——大约就是这边的所有人——

……就会看见一束非常奇特的想象花束显现出来。为了看见它，眼睛必须对它进行调焦，因为这个图像恰好在那个位置形成，同对象——花瓶——处在完全相同的平面上；正因为眼睛必须在同一平面上以相同方式调焦，你们会得到所谓的“现实印象”。不过，你们仍会感觉到某种东西，使自己忍不住这样移动一下；恰恰因为光线交叉得并不十分准确，图像会显得有些奇怪、有些模糊。但距离越远，也就是说，所谓视差——眼睛横向移动时发生的微小调节——越小，幻觉就越完整。

抱歉，我用了这么长时间向你们讲述这个小故事；不过，这则譬喻将能为我们提供很大帮助。我们在这里得到的东西，当然并不声称触及我们在所谓真实的或客观的关系以及想象关系领域中处理的任何本质性、实体性的内容。

它只是一种图解，却能让我们以格外简单的方式指出：在心理经济中，想象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并置和紧密交织会产生什么结果。你们马上就会看到。这个小实验使我会心一笑，并非毫无缘由。它完全出乎自然，并非我的发明；很久以来，人们就以“倒置花束实验”[注3]称呼它。实验本身天真无邪，发明者并无先入之见，也不是特意为我们制

造它；即便那些偶然的细节——花瓶与花束——也使它在我们看来格外诱人。

> [注3] 参见亨利·布阿斯：《倒置花束实验》，载《所谓几何光学与光度学》，巴黎：德拉格拉夫出版社，1934年，第86—87页。

相关知识卡 倒置花束实验与拉康的光学图式

事实上，若要在这种原初想象界的辩证法底部放置某种东西……

它同对自身身体图像的把握有关；更深一层，则同 Ur-Ich（原自我）或 Lust-Ich（快乐自我）的关系有关；

同整个原初自我概念有关：这个自我将在同外部世界的某种分裂和区分中构成；

也同被纳入内部之物与被排除之物之间的关系有关；后一项通过所有这些排除过程，

即 Ausstossung（驱逐）、投射，以及对自我自身领域的划界而实现

……那么，在有关自我形成的这个原初发生阶段，我们全部构想置于最前景的，恰恰就是容器与内容物。在这个意义上，花瓶同其所盛花朵的关系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极其珍贵的隐喻。

谈到镜像阶段理论时，我反复强调：同功能发展使主体整合自身运动功能的时刻相比，把身体作为总体加以意识的过程是以一种过早的方式完成的，尽管二者彼此相关。

我曾多次以精确形式强调，这一点的价值归根结底来自如下事实：主体看见人体的完整形式，从而在虚拟层面把握一种想象性掌控——无

论他看见的是自己的图像，还是某个相似者给予他的图像——这项把握在他的经验中已经从成熟过程本身分离、释放出来，并不同这一过程混在一起。换言之，主体作为主体，预先占有了这种在生理上完成的掌控；等到运动掌控实际形成以后，这种预期又会为它后来的一切运用打上印记，赋予独特风格。

这无非是人所经历的那场原初历险；在其中，他第一次体验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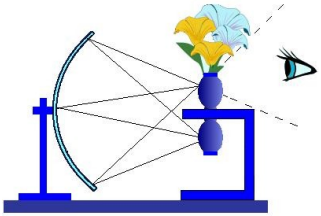
- 他看见自己；
- 他映照出自己；
- 他把自己构想成不同于自身所是的另一个人。这是人的一个绝对根本的维度，并且在其整个幻想生活中始终具有结构性。

因此，事情仿佛是这样发生的：在某一时刻，盛装花束的想象花瓶同花束松开、分离；主体正是相对于这个花瓶，在我们假定处于起源处的所有 Id、所有 Ça（它）之中完成最初的把握。我们在那里就是对象、本能、欲望和倾向。

在某种意义上，一切都是“它”：纯粹而简单的现实。现实尚未以任何方式划定，也还不可能成为任何定义的对象——无论是好或坏这种性质定义，像弗洛伊德前几天在《否定》（Die Verneinung）中谈到的那一系列判断；还是它存在或不存在这种存在定义。此时，现实在某种意义上既混沌又绝对，处在起源状态。在这个“它”的内部，在这项最初把握中，身体图像也赋予主体第一种形式，使他能够定位什么属于自我，什么不属于自我。你们当然能感觉到，我正在把事情图式化；但任何隐喻、任何思考装置的展开，都要求首先让人明白它有什么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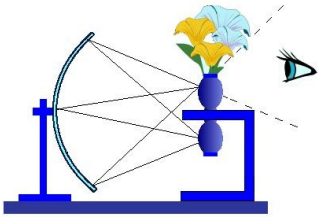
途、意味着什么。你们会看到，这个装置具有可操作性，使我们能够摆弄我在这里假定为想象的容器所发生的各种相互运动。

把实验条件颠倒过来；因为完全可以让罐子［花瓶］放在下面，花朵放在上面。



我把图式倒转了。只要保留符号关系：＋－＋或－＋－，我们便可以随意使真实的东西成为想象的东西。只要这一关系得到保存，我们面对的就是一个隐藏的真实之物、一个再现它的想象之物，以及一个同这个想象之物连接起来的真实之物。［关于＋－＋或－＋－，参见《失窃的信》研讨班。］

那么，主体中所涉及的一切——也就是自我诞生以前主体中的一切——最初的纳入与排除游戏，都将相对于这个最初的想象自我得到定位。我们所使用的这幅图式、这幅图解、这则譬喻还向我们表明了什么？它表明：为了让幻觉产生，也就是为了给观看之眼构成一个世界——在其中，想象界能够纳入并同时形成实在，实在也能够纳入并同时定位想象界——仍须满足一个条件。正如我已经告诉你们的，眼睛必须处在某个位置，必须位于这个圆锥内部。



如果眼睛处在这里，也就是这个圆锥外部，它就不再看见想象的东西。理由很简单：这个发射圆锥中的任何光线都不会射到它那里。它只会看见事物赤裸裸的真实状态，也就是装置的内部：

- 一个可怜的空罐子［布阿斯实验：花束藏在下面］；
- 或者，视实验而定，一束孤零零的花［拉康修改后的布阿斯实验：花瓶藏在下面］。

这意味着什么？你们会对我说：我们又不是一只眼睛。那么，这只四处移动的眼睛究竟是什么？这一切到底有没有含义？

这个东西——盒子——意味着你们自己的身体；这里的花束，则意味着本能与欲望，或者四处活动的欲望对象。那么，那口锅是什么？它大可以是大脑皮层。为什么不呢？如果它就是大脑皮层，那会很有趣。我们改天再谈。

在这一切当中，你的眼睛并不会四处移动；它固定在这里，恰恰是我们大脑皮层某种受到刺激的小小附属物！那么，为什么要告诉我们这只眼睛正在移动？为什么有时装置奏效，有时却不奏效？当然！像在许多其他地方一样，眼睛是主体的符号；整个科学都建立在把主体化

约为一只眼睛这件事上。正因如此，全部科学才以这种方式投射在你们面前，也就是得到客观化。我会向你们解释这一点。

有一年，谈到本能理论时，有人提出过一个非常漂亮的建构；那是我听人说出过的最漂亮的悖谬建构：它把本能设想成某种得到实体化的东西。到了最后，没有任何一项本能还能站得住。就此而言，那是一次值得作出的有益论证。

不过，为了让我们在自己的眼睛里暂时待上一会儿，恰恰必须使自己处于科学家的位置，由他断言：这不是真的。他可以断言自己只不过是一只眼睛，并在门口挂上一块牌子：“请勿打扰实验者。”当然，生活中的事情完全不同，恰恰因为我们并不是一只眼睛。那么，这里的眼睛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在这个比喻中能怎样使用它？

在这个比喻中，它无非意味着：想象界与实在的关系，以及由此产生的世界构成，完全取决于主体的处境。而主体的处境——天哪，自从我一次次向你们重复以来，你们应当已经知道——其根本特征就是主体在象征世界中的位置；换言之，也就是在言说世界中的位置。事情恰恰从这个位置出发，我不再多说。

如果你们理解了我到目前为止讲的东西，它会包含许多方面：同他者的关系，等等。不过请注意，在成为同他者的关系以前，首先是主体在象征世界中的位置。对不对？也就是说，他是否有可能、是否获准把自己叫作佩德罗。具体情形取决于：他叫不叫佩德罗；也正是依此，他处在圆锥视域内，或者不在其中。

你们必须把这一点放进脑中，作为出发点。即使它在理解下面的一切时显得有些生硬，尤其在理解梅兰妮·克莱因的这篇文本时也是如

此，我们仍必须把这篇文本当作其本身所是的东西，也就是一种经验。事实上，事情大致就是这样呈现的。这个病例向我们展示了什么？

热利尼耶小姐已经向我们叙述并概括过。为什么不直接采用她的文本呢？我重新看过，它确实十分忠实；当然，这并不妨碍我们参照梅兰妮·克莱因的原文。这里有一个男孩，据说大约四岁，一般发展水平相当于所谓十五至十八个月。这个说法取决于定义；在这类情形中，我们从来不清楚人们究竟想表达什么。

用的是什么测量工具？人们经常忘记说明。所谓十五至十八个月的情感发展，比我刚才实验中一朵花的图像还要模糊。他的词汇量非常有限；不只是有限，而且使用得不正确：

“他大多数时候会歪曲词语，用得牛头不对马嘴；可在另一些时候，人们又能看出他知道这些词的含义。”“她强调最醒目的事实：这个孩子没有让人理解自己的愿望，并不试图交流；他唯一多少带有游戏性质的活动，就是发出声音，沉浸于没有含义的声音和响动之中。”

换言之，我们面对的是什么？

- 奇怪的是，我们面对一个掌握了某些语言成分的孩子。这一点很清楚：如果他没有语言，梅兰妮·克莱因就不可能让他听懂。
- 因此，一方面，象征装置的某些要素似乎已经存在。
- 另一方面，他的态度显然格外醒目。

从同孩子第一次接触起——而这次接触如此重要——梅兰妮·克莱因就用冷漠和无动于衷来刻画他的状态。尽管如此，他并非完全没有以某种方式定向。他给人的印象绝不是一个白痴，远非如此！他就这样待在梅兰妮·克莱因面前；克莱因把他的态度同此前见过的所有神经症儿童区分开来。

她注意到，他没有表现出任何种类的明显焦虑，甚至没有神经症者那里以掩盖、遮蔽形式出现的焦虑，于是把这个病例同神经症病例区分开来。神经症者的焦虑当然并不总以爆发形式显现；有时只是表现为退缩、僵硬和羞怯的态度。人们能看出，其中容纳、隐藏着某种东西；对于像这位治疗者一样富有经验的人，这一点不会逃过观察。迪克却相反，他待在那里，仿佛没有任何事情能影响他。他看梅兰妮·克莱因，就像看一件家具。

我特别强调这些方面，因为我已经凸显：从某个角度看，现实对他具有一种绝对均一、毫无起伏的性质；在某种意义上，一切都同样真实，也同样无关紧要。梅兰妮·克莱因告诉我们什么？热利尼耶小姐的困惑正是从这里开始。

梅兰妮·克莱因告诉我们：

> “孩子的世界从一个容器——也就是母亲的身体——以及这个母亲身体的内容物出发而产生。”

在同这个特权对象的本能关系逐步推进时，孩子会建立一系列想象性并入关系。他可以咬噬、吞入母亲的身体，而这种并入的风格是一种摧毁的风格。孩子把并入把握为毁灭性的并入。他还把握到，自己将在母亲体内遇见若干对象；这些对象虽然被包含其中，却各自具有某

种统一性，并且可能对他构成危险。理由恰好同他对它们构成危险一样：在对最初对象的这项初次把握中，他感到自己携带着某种摧毁能力，因而也把同样的能力——可以说，恰恰是“镜像式的”能力——赋予这些对象。

因此，相对于自我或其存在最初形成的边界，他会突出这些对象的外在性：把它们当作坏的、危险的、“便便”对象驱逐出去。这些对象一旦被外在化，从第一个普遍容器、从第一个宏大总体——也就是母亲身体的幻想图像，以及此时儿童最初现实的全部疆域——中分离出来，便仍然带着标记其最初关系的那种恶意色彩而向他显现。

正因如此，他会再次把它们内摄，并把兴趣转向危险较小的其他对象；例如，他会建立所谓“粪便 = 尿液”的等式，以及同外部世界中其他不同对象的等式：

- 这些对象在某种意义上变得较为中性；
- 它们成为前一批对象的等值物；
- 并通过一种——我要强调——想象性等式同最初的对象联系起来。

这里很清楚：我们后来在不同对象之间重新发现的象征等式，在其起源、诞生和涌现之时，所涉及的是主体交替进行的驱逐与重新内摄、投射与重新吸收机制。确切地说，这就是我试图在这里为你们加以符号化的想象游戏：把真实对象想象性地纳入其中；或者反过来，把想象对象摄取到一个真实的围域以内。

你们跟得上吗？大致可以？那么这时，我们清楚看见，外部世界出现了某种初步的想象化——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它在这里简直已经准备浮到表面，但还只不过处在准备状态。

主体摆弄容器和内容物。他已经在某些对象——例如“小火车”——中把若干个体化、倾向乃至人物的可能性实体化了：他自己自然是“小火车”，相对于作为“大火车”的父亲。

此外，令人惊讶的是，对他具有意义的对象数量极少，只限于能够表达如下关系的最低限度符号：内部与外部、内容物与容器；他立刻把昏暗空间等同于母亲身体的内部，并躲进其中。但没有发生的，是不同的想象对象形式与真实对象形式之间的自由游戏和联结。正因如此，令热利尼耶小姐大感惊讶的是，当他转身躲进母亲身体空洞、漆黑的内部时，那些对象并不在那里。

理由很简单：在他的病例中，花束与花瓶不能同时在那里。这就是关键所在。换言之，热利尼耶小姐之所以惊讶，根源在于梅兰妮·克莱因的解释：对她而言，一切都处在同一个具有同等现实性的平面上，即她自己所说的 unreal reality（非现实的现实）。这样一来，确实无法设想这里所涉及的各“组”原始对象如何彼此分离。为什么？

因为她没有想象界理论，也没有自我理论。但如果我们引入这一概念：当这部分现实是想象的，另一部分便是真实的；而反过来，当其中一部分成为现实时，另一部分就成为想象的；那么，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起初这些不同部分——我称作不同“组”——之间的联结游戏永远无法完成。

换一种说法，这一点可以表述如下：这里，我们完全处在镜像关系的角度之下，也就是通常所谓投射的平面。我没有说内摄——这个词选得非常糟糕。我们应当找到另一个词，作为投射的对应项，用来命名我们在分析中所谓内摄关系的全部内容。实际上，内摄这个词总是在下面这种时候使用……

你们可以留意这一点；当问题涉及象征性内摄时，它会为你们照亮事情

……内摄一词总是伴随着某种象征性命名。内摄始终是对他者之言说的内摄。

而这引入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维度。围绕这项区分，你们可以划开两者：一边是自我功能，另一边是最初二元语域的秩序与超我功能。分析理论区分二者并非毫无缘由；它承认真正而本真的超我，相对于理想自我的功能，是一种次级内摄，也同样并非毫无缘由。这些只是旁支意见。现在回到我的病例，也就是梅兰妮·克莱因所描述的病例。

除了我正在为你们图像化、勾勒出来的不同参照以外，我们还能怎样思考呢？看看正在发生的事情：孩子待在那里，具有若干有意义的语域。其中一个处在想象界领域；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跟随梅兰妮·克莱因，因为她反复强调其极端狭窄。可能发生的想象性换位游戏十分贫乏；而只有在这种游戏中并通过这种游戏，对象才可能在通常所谓“情感”平面上逐步获得价值。各种想象等式成倍增加并像扇面一样展开，使人类在动物当中成为拥有近乎无限对象的那一种存在；也就是说，这些对象在他的 Umwelt（周围世界）中被赋予 Gestalt（格式塔）价值，并作为形式分离出来。

梅兰妮·克莱因同时为我们标出了这一点——想象世界的贫乏——以及由此造成的结果：这个孩子无法同作为结构的对象建立实际关系。这是其中的重要关联。如果只从这个孩子对事物和对象的态度入手，哪个点最具有意义？把梅兰妮·克莱因对孩子态度的全部描述概括起来，具有意义的点无非是：这个孩子没有发出任何呼唤。

请你们记住这个概念，因为后来你们会看到，我们还必须让它重新出现。你们会想："当然！他借呼唤重新带回了自己的语言。"但我已经告诉过你们，他已经拥有自己的语言系统，而且拥有得相当充分。证据是，他会拿它来玩。他甚至把语言用于一件格外特别的事情：以对立游戏来应对这些成年人的侵入企图。

例如——这一点众所周知——他会以原文所谓"否定主义的"方式行动：母亲对他说出、给他一个名称时，他完全能够正确重复，却偏偏会把它说得无法理解、歪曲变形，弄得"牛头不对马嘴"，也就是让这个词毫无用途。

我们在这里重新遇见了否定主义与否认式否定之间的区别。伊波利特先生向我们展示这一区别的方式，不仅证明他学识渊博，也证明他确实见过患者，知道否定主义和否认式否定对他们而言各是什么。二者完全不是一回事。这个孩子正是以严格说来否定主义的方式使用语言。

因此，我向你们引入呼唤时，并不是重新引入语言。我还要进一步说：呼唤不仅不是语言，也不是一种高于语言的层次。

如果一定要谈层次，我甚至要说，它低于语言。你们只要观察一只家养动物，就能看到：一个没有语言的存在者完全能够向你发出呼唤；

在一定程度上，还能借助各种吸引你注意的动作，把这些呼唤指向它恰好在某一时刻有所缺失的东西。

这里所说的呼唤，即人的呼唤，保留着后来获得更丰富发展的可能性，恰恰因为它发生在一个已经获得语言层次的存在者内部。它是一种超出语言的现象，但相对于语言，它作为一种接合、或者说作为第二个时刻而获得价值。

让我们把事情图式化。有一位卡尔·比勒先生提出过一种语言理论。它既不是唯一的理论，也不是最完整的理论，但其中有一个东西：语言中的三个阶段。遗憾的是，他把它们放进一些并不特别容易接近或理解的语域。三个阶段如下：

- 陈述本身。这个层次本身具有价值，几乎就像一种自然给定的层次。例如，两个人之间，我正在说最简单的事情——一道命令——这时我们就考察陈述。在陈述层面，我们能够认出一切涉及主体性质的东西。显然，一个男人、一名军官、一位教授发出命令时，风格和语言不会同另一个人、一名工人或工头相同。在陈述层面，我们了解到的全是主体的性质；它显现在主体的风格本身，甚至显现在语调中。这个平面可以被分离出来。

- 任何命令中还有另一个平面，恰恰就是呼唤：发出这道命令时采用的口气。它同样十分重要，因为相同文本、相同陈述可以具有完全不同的价值。“停下！”这句简单陈述在不同情境中可以具有完全不同的呼唤价值，而且还会随具体所指而改变。

- 第三种价值严格说来是交流：正在谈论的事情，以及它同整个情境的参照关系。我们在这里处于呼唤层面。呼唤在已经获得的语言系

> 统内部具有自身价值；这里的问题恰恰是，这个孩子没有发出任何呼唤。主体借以在语言中、在言说层面定位自身的系统，正是在这里中断；而语言和言说并不是一回事。

严格说来，直到某个时刻、某个层次，这个孩子都是语言的主人。这一点十分清楚。但他不说话；正如我上次告诉你们的，这是一个待在那里、真正“不作回应”的主体。言说尚未来临。发生了什么？梅兰妮·克莱因的整篇文本已经从头到尾、反复而清楚地说出了这一点。她在那里放弃了一切技术，手中只有最低限度的材料。她甚至没有游戏材料，因为这个孩子并不玩耍。即使他稍稍拿起小火车，也不是在玩；他只是任由动作穿过周围空气。倒不是他自己像隐形人，而是在某种意义上，一切东西对他而言都是不可见的。

她做了什么？我们应该重读梅兰妮·克莱因的句子和说法，才能凸显这里的要点。她本人十分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没有作出任何一种解释。她说：

“我从自己已经知道并预先形成的观念出发，来判断这个阶段是什么、发生了什么。于是我就径直去做，告诉他‘迪克火车’，而大火车是‘爸爸火车’。”

随后，孩子开始摆弄自己的小火车，并说出“车站”这个词。语言由此初步粘接到这个想象系统上。这个语域极其狭窄，只由火车、给一处昏暗地点赋予价值的可能性、门把手等组成；他的能力——不是交流能力，而是表达能力——只限于此。对他而言，想象的东西与真实的东西全都彼此等值。这时，她对他说了什么？梅兰妮·克莱因告诉他：“车站就是妈妈。迪克进妈妈。”

一切都从这里触发。她此后只会给他作这种解释，不会作别的；孩子也非常、非常快地加以尝试。这是一个事实，恰恰就是这项经验的对象，如同桌上的花束一样。还有另一个语域；你们看出它涉及什么了吗？这里同样存在内部与外部。一切将从这里出发。当然，它随后会变得更加丰富；但克莱因除了带来赋予言词、带来对一种实际关系的象征化以外，什么也没有做——也就是一个得到命名的存在者同另一个存在者之间的关系。

由此出发，孩子进行了一次最初的仪式：躲进昏暗空间，以某种方式重新同容器发生接触。这是从梅兰妮·克莱因硬贴到情境上的那种赋予言词和象征化开始的——确切地说，是把情境组织成一则神话。克莱因十分准确地记录了新事物如何从这里醒来：孩子也开始赋予言词，发出一次呼唤，而且是一次用言语说出的呼唤。

此前，在我们通常所谓心理接触的层面上，没有出现过任何呼唤；如今，在言说层面上，第一次呼唤出现了。孩子立刻询问保姆；他同这位保姆一起进来，却任由她离开，仿佛什么也没有发生——他根本没有显出受到分离的冲击。

而现在，他第一次产生呼唤反应。它不只是情感性呼唤，不只是由整个身体模仿出来的东西；在其最初形式中，它已经是一种言语化的呼唤，其中包含回应，也包含严格而技术意义上的第一次交流。随后，梅兰妮·克莱因沿着这项经验的整条路线继续推进。你们知道，事情接下来发展到这样的程度：她让一个已经组织起来、远为丰富的情境中的所有其他要素都介入，甚至让父亲本人也来扮演他的角色。梅兰妮·克莱因还告诉我们，在外部情境中：

“这些关系在俄狄浦斯层面上的发展确凿无疑。”

他从梅兰妮·克莱因给予的这枚最初核心、这枚象征作用的微小搏动细胞出发，在这里“实现”周围现实，“把现实象征化”。这一切究竟是什么？随后，梅兰妮·克莱因会把它称作“打开了他的无意识之门”。我甚至不要求你们在这里思考：“梅兰妮·克莱因究竟做了什么，足以显明、足以意指她把握到主体内部某个不知怎样的 recessus（隐秘深处），并把它称作他的无意识？”她只是出于习惯，一开始便这样假定。

我只希望你们所有人都重读这份观察。梅兰妮·克莱因的这部著作并不难找到；你们会在那里看见我始终向你们提出的那个极具冲击力的公式：“无意识是他者的话语。”这个病例使它表现得一清二楚：主体内部没有任何一种无意识。

相关知识卡 梅兰妮·克莱因

可以说，正是梅兰妮·克莱因的话语，把她最初那些绝对粗暴的象征化嫁接到孩子这种自我性惰性的处境上。这些有关俄狄浦斯情境的象征化，有时在我们看来相当任意；克莱因面对自己的主体时，总会或多或少隐含地这样操作。在这个格外戏剧性的病例中，主体尚未进入

人的现实——他没有发出任何呼唤——而正是这些象征化产生并决定了一个位置；相对于这个位置，他将能够：

相关知识卡 梅兰妮·克莱因

- 真正去赢得——这里所涉及的正是赢得——一系列发展，一系列等值关系，以及一套对象替代系统；

- 实现整套等式。借助这些等式，他能够以最清楚可见的方式，从两扇门之间的间隔——他曾躲进这个总体容器的绝对黑暗中——过渡到逐步用来替代它的一系列对象：例如洗手池；他围绕这些对象展开、接合自己的整个世界，又从洗手池转向不知哪一台电暖器。对象变得越来越精细、越来越丰富；它所能容纳的内容越来越富于褶层，界定“有所容纳”与“无所容纳”的可能性也同样如此。

那么，在这个病例中谈论自我发展，意味着什么？这建立在分析中显露出的最后一批含混之上：人们始终把自我与主体混为一谈。主体被整合进象征系统，在其中进行操练，并通过真正言说的运用在其中确认自己——你们会注意到，这种言说甚至不必是他本人的言说。治疗者与主体暂时形成一个对子，虽然其中的情感程度最低，但真正的言说仍可以被带到这里、带到这个对子内部。当然，并非任何言说都可以；正是在这里，我们看见所谓俄狄浦斯象征情境的效力，它真正就是钥匙。

这把钥匙十分简约。我已经向你们指出，那里很可能还有一整串钥匙。或许有一天，我会就一则原始神话在这方面提供的东西作一场讲演。我不会说那些人是“较低等的原始人”，因为他们既不低等……知道的也比我们多得多。当我们考察一套神话时……

也许很快会出版的、有关某个苏丹族群的神话

……就会看到，对他们而言，俄狄浦斯情结只是一场单薄的小玩笑，只是一则巨大无比的神话中的极小细节。那则神话能够汇集主体之间一整套相互关系，其丰富性与复杂性使俄狄浦斯显得只是一种过度删节的版本；到了最后，甚至可以说，它并非总能使用。

不过这并不重要！到目前为止，我们分析家一直满足于它。人们确实试图稍稍加以阐发，但仍十分胆怯；并且由于没有充分区分想象界、象征界与实在，始终感到纠缠不清。孩子进入俄狄浦斯图式，主体由此得到定位。这时，已经构成的想象关系相当复杂；而他同外部世界的关系却极其有限、极端贫乏。这些关系使他能够把某种东西引入我们所谓的现实世界：那个对我们而言真正不可言说的原初实在，即孩子的世界。当孩子完全不向我们说任何东西时，除了通过象征性外推，我们没有任何办法进入这个世界。

梅兰妮·克莱因式体系的全部含混也正在这里：她告诉我们，孩子处在身体内部的这个帝国之中，身边有所有兄弟，更不用说父亲的阴茎。对于这个世界，我已经在想象界与实在之间的第一阶段结构化中展示了它的运动，以及应当如何理解这项运动：也就是我们所谓一系列相继的投注。它们将划分出各种不同对象，包括人的对象——也就是可以加总的对象。这一切从我所谓的第一幅壁画出发；严格说来，它是一种具有意义的言说，因为它表述了言说法则中使人成为人的那项最初根本结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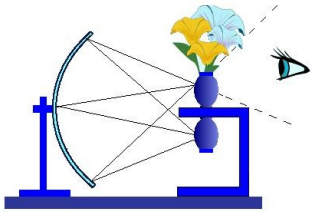
还能怎样换一种方式向你们说明，并为后续展开起一个头呢？呼唤本身在其中呼唤什么？言说内部的呼唤场域代表什么？代表拒绝的可能

性！我说的是拒绝的“可能性”；呼唤并不蕴含拒绝，也不蕴含任何二分或一分为二。不过你们可以看到，正是在呼唤发生的时刻，依赖关系明显地在主体那里建立起来。从这一刻起，他会张开双臂迎接保姆；他还会有意躲到门后，向梅兰妮·克莱因显出一种需要：在自己短暂占据的那个狭小角落里，突然需要有一个同伴。依赖随后才建立起来。

因此，你们在这份观察中看到，儿童身上一系列语言“之前”与语言“之后”的关系，即前言语关系和后言语关系，各自独立发挥作用。你们也恰恰会注意到，外部世界……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现实世界；它无非是一个得到人化、得到象征化的世界，只由符号引入原初现实的超越性构成

……只有当一系列相遇、一系列位置在正确的地方发生时，才可能构成。这些位置同图式中的位置属于同一秩序：眼睛不能随意处在任何地方，情境才能以某种方式获得结构。



我还会再次使用这个图式。这里我只引入了一束花，但也可以引入其他者、他者。不过，在讨论他者以及同他者的认同以前，我今天只想简要谈谈［……］实在、想象界与象征界之间的这些关系，并向你们展示这份具有意义的观察。

一个主体可能已经在某种意义上具备全部要素：语言，以及进行一定数量想象性位移、从而为自身世界赋予结构的若干可能性；但他并没有［……］进入实在，并没有［……］，唯一的原因就是事情没有按照某种秩序发生，整个图形受到了扰乱。

他无法使这个整体获得哪怕一丁点发展——在这种场合，人们把它称作“自我发展”。这里的说法具有一种更技术性的含义。

重新拿起热利尼耶小姐的文本，我们就会看到这一点达到何种程度……在梅兰妮·克莱因的文本里看得更加清楚：她一方面说，自我已经过早发展，表现为孩子同现实具有一种过于真实的关系——当然只是在某种意义上过于真实，因为想象的东西无法介入；可在同一句话的后半部分，她又使用自我一词，说正是自我阻断了发展。这无非意味着：在某个位置上，自我无法作为一种装置，有效用于构造这个外部世界。理由很简单：由于眼睛的位置不对，它纯粹而简单地、真正地没有显现。

假定花瓶是虚拟的，那么花瓶不会显现，主体就停留在一种缩减了的现实中，只携带同样缩减了的想象资源。这份观察的关键在于，你们必须理解它以格外鲜明的方式说出的东西：言说的效力、言说行动的效力。言说作为一种象征功能，同一个已经建立、具有典型性和意义的完整象征系统相互协调；而处在实在、想象与象征系统发展基础上的，正是言说的功能。

我想，这一点或许值得：

- 请你们提出问题；
- 请你们重读这篇文本；
- 也请你们亲自操作这个小图式；
- 请你们亲自看看，在现实中它能怎样为你们所用。

我今天提供的内容，是紧贴文本、围绕热利尼耶小姐上次提出的问题所作的一次理论阐发。你们会看到，它将在什么地方为我们所用——不是下周三，而是再下一个周三：

“必须在不同层面上研究的转移。”

转移还有另一个更为人熟知的面向，即想象界中的转移。你们会看到，今天提出的这些考察将在何处为我们所用。

第9课 ・ 1954年3月10日

罗西娜・勒福尔

拉康

通过我们的对话，你们已经能够看出：我们评注并尝试重新思考、不断加深理解分析经验的奠基文本时，是什么在主导这项工作。你们也已经熟悉一个观念；它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我们深入探究的灵魂：一项经验中总是那些保持一定距离的东西，反而被看得最清楚。

所以，现在、在这里、在我们的交谈中，为了理解分析经验，我们从其最直接的材料似乎已经包含的东西重新出发，也就不足为奇。这就是象征功能；在我们这里的用语中，它同言说功能完全是一回事。分析经验的这个核心领域，在弗洛伊德著作中处处得到指示；它从未被直接命名，却在每一步都得到指示。

我认为下面的说法并不牵强：把弗洛伊德任何一篇文本中可以立即转译到这个语域里的内容，几乎以代数方式在页边转写出来，许多时候就已经能够为文本所显露的二律背反提供至少相当重要的一部分解答。弗洛伊德文本具有一种开放与诚实；因此，它始终是一篇开放的文本，从不封闭、闭合，仿佛整个体系已经完整摆在那里。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现在先向你们提出一个愿望——你们会看到，它如何嵌入我们的推进：我非常希望下次有人负责评注一篇文本。它不仅能够示范我刚才表达的东西，而且正是《技术著作》所界定时期——1908至1920年——的根本理论对应物。它的位置恰好处在你们这部

《技术著作》中译作《回忆、重复与修通》、德文题为《Erinnern, Wiederholen und Durcharbeiten》的文章，同《对转移之爱的观察》之间；也就是说，它处在这本文集中最重要的两篇文本之间。它的题目是《Zur Einführung des Narzißmus》，即《论自恋：一篇导论》。

这是一篇我们无法不纳入自身推进的文本；理由很简单：你们马上会看到，现在讨论的正是这个问题。我们一直依据分析"对话"的情境而推进——你们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也知道"情境"与"对话"这两个词各自包含的不同阶段和延伸；这里的"对话"还带着引号——并试图在其自身场域中界定所谓"阻抗"。

随后，我们又能够为这项经验提出一种完全一般而根本的定义，即转移。不过，你们清楚感觉到、也清楚看到，下面二者之间存在距离：

- 一边，是某种把主体同分析期待他给出的充实言说分隔开的东西；
- 另一边，是我们恰恰显明为阻抗的东西。我们曾指出，它是某种致焦虑偏折的函数；在最根本的形态中，它严格说来就是象征交换层面上的转移现象。

你们清楚看出，这一切同我们通常所说、在那个概念中所处理的东西仍有距离——同所有这些表现、这些现象背后的一个根本现象仍有距离。我们将要为它命名；它正是分析技术所处理的东西，并且如弗洛伊德本人所说，在我们看来是分析中转移的根本能量机制。

换言之，这就是弗洛伊德在我刚才谈到的那篇文本——《对转移之爱的观察》——中毫不犹豫地用一个名称来称呼的转移："爱"。阅读这篇文章时，你们会看到——我想，你们其实都已经读过——弗洛伊德

在多么小的程度上区分转移与爱，又多么不回避具体意义上的爱情现象和激情现象；他甚至说：

“从根本上说，转移同我们在生活中所知道、所称作的爱之间，并不存在真正本质性的区别。作为人为现象的转移，其结构同我们所谓爱的自发现象——更确切地说，同心理层面的激情之爱——彼此等同。”

弗洛伊德在这里没有任何回避，也没有试图把这个棘手的现象消解进某种东西里，例如按通常词义、按“虚幻”这种日常词义所说的“象征作用”——仿佛象征作用就意味着非现实。他丝毫没有回避这个现象。

这个现象正是通常所谓的爱。为了结束对《技术著作》的研究，接下来的讨论将围绕它展开——我希望，不至于完全赶在复活节假期前完成，但也不愿拖延太久。我们会把注意力放在这种转移之爱的性质上，而且是在最精确、最具情感性的意义上考察转移之爱；在这里，我们可以采用这个词，并完全按照这个层面来把握它。这会把我们带入我正试图引入的另一个概念的核心：想象界的功能。没有这个概念，同样不可能恰当地划分我们在经验中处理的各种东西。

不要以为，想象界的功能不见于弗洛伊德文本，就像象征功能其实并不缺席一样。只不过，他没有把它放到前景，也没有在它出现的每个地方凸显出来。研究《论自恋：一篇导论》时，你们会看到，为了指明早发性痴呆、精神分裂症、精神病同神经症之间的差异——这或许会使你们中的一些人感到惊讶——弗洛伊德本人在文本中找不到比下面这个定义更合适的说法。他告诉我们：

“癔症或强迫神经症患者，就其疾病影响所及，也像精神病患者一样放弃了同现实的关系……但分析表明，他绝没有因此切断同人和事物的

一切爱欲关系；他仍在幻想中支撑、维持并保留这些关系……一方面，他以建立在自身记忆上的想象对象替代真实对象，或者把二者混合起来——请记住我们上次的图式——另一方面，他不再把自己的运动活动指向同真实对象相连的目标。只有对这种力比多状态，我们才可以正当地使用荣格不加区分所使用的'力比多内倾'一语。[注]妄想痴呆患者（paraphrénique）的情形则不同。他看起来确实从外部世界的人和事物上撤回了力比多，却没有在幻想中用其他对象加以替代。后来即使发生这种替代——也就是后来重新创造这个想象世界时——他的想象能力似乎也属于次级过程，是一种试图重建的努力，其目标是重新把力比多导向对象。"

> [注] 本段法文转录写作 introjection de la libido（力比多内摄），但紧随其后的德文原文写作 Introversion der Libido（力比多内倾）。译文依据同页德文保留"内倾"，并记录这一底本差异。

[德文原文：

> Auch der Hysteriker und Zwangsneurotiker hat, soweit seine Krankheit reicht, die Beziehung zur Realität aufgegeben. Die Analyse zeigt aber, daß er die erotische Beziehung zu Personen und Dingen keineswegs aufgehoben hat. Er hält sie noch in der Phantasie fest, das heißt, er hat einerseits die realen Objekte durch imaginäre seiner Erinnerung ersetzt oder sie mit ihnen vermengt, anderseits darauf verzichtet, die motorischen Aktionen zur Erreichung seiner Ziele an diesen Objekten einzuleiten. Für diesen Zustand der Libido sollte man allein den von Jung ohne Unterscheidung gebrauchten Ausdruck: Introversion der Libido gelten lassen. Anders der Paraphreniker. Dieser scheint seine Libido von den Personen und Dingen der

> Außenwelt wirklich zurückgezogen zu haben, ohne diese durch andere in seiner Phantasie zu ersetzen. Wo dies dann geschieht, scheint es sekundär zu sein und einem Heilungsversuch anzugehören, welcher die Libido zum Objekt zurückführen will...

中文："癔症患者和强迫神经症患者，就其疾病影响所及，也放弃了同现实的关系。但分析表明，他绝没有取消同人和事物的爱欲关系。他仍把这些关系固定在幻想中；也就是说，一方面，他以记忆中的想象对象替代真实对象，或者把二者混合起来；另一方面，他放弃发动旨在通过这些对象达到自身目标的运动活动。只有对这种力比多状态，才应当采用荣格不加区分使用的'力比多内倾'一语。妄想痴呆患者的情形则不同。他看起来确实从外部世界的人和事物上撤回了力比多，却没有在幻想中以其他对象取而代之。后来即使发生这种替代，它似乎也属于次级过程，属于一种试图治愈的努力，其目标是使力比多重新回到对象……"]

我们由此进入施雷伯病例分析的整个领域——我希望能在今年结束以前开始讨论。它将使我们深入探究想象界在神经症与精神病中的运作所具有的根本差异。尽管如此，这一区分从现在起就必须成为我下次要讲内容的背景和底色[注]；我已经预告，其总标题是"转移在想象界中的功能"。

> [注] 底本校勘说明：本项目所据 Staferla 转录在此作 Ceci néanmoins, ne peut pas être placé dès maintenant en arrière plan...，其中 ne peut pas 字面是"不能"，与本句现译"必须成为……背景和底色"相反；但这种字面读法同下文预告下一课"想象界中的转移"的衔接不顺。米勒整理、John Forrester 英译本第 91 页省略了这个可疑句子，直接转入把发言交给罗西娜·勒福尔。现译据上下文作校勘性处理，并非对 ne peut pas 的字面翻译。外部出处：Staferla S1 Word 底本，米勒整理、Forrester 英译本第 91 页。

因此，昨晚得知下面这件事时，我觉得十分幸运、十分有利：在我们的儿童精神分析小组里，坐在我右边、也是我的学生的罗西娜·勒福尔，报告了一份她很久以前就同我谈起、因而我已经有所了解的观察。患儿处在一种极其特殊的情境中；像大多数这类严重儿童病例的观察一样，从诊断学和疾病分类学角度看，它无疑使我们感到极其为难、极其含混。

不过，无论怎样，她都以极大的深度看见了其中的问题；你们马上就能确认这一点。两次课以前，我们曾从梅兰妮·克莱因的观察出发，把它作为一个入口，使我能够在下一次课中向你们表达许多东西。今天，我们同样会采用这种交替节奏，把发言交给罗西娜·勒福尔。她既会向你们介绍一个在想象界对于儿童形成的功能方面格外具有启发性的病例，也会在时间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打开这些问题；这样，下次我就能把可能提出的回答纳入自己将在“想象界中的转移”这一标题下阐述的整体内容。

亲爱的罗西娜，我把发言交给您。请向我们介绍罗贝尔的病例，以及那些已经使我们能够

- 像昨晚那样加以阐发、
- 提出来、
- 并让其中一些暂时悬而未决的问题。

罗西娜·勒福尔

罗贝尔是一个小男孩，生于1948年3月4日。他的经历很难重建；我们主要依靠分析课中带来的材料，才得知他曾经遭受的创伤。父亲身份不明，母亲目前因妄想症被收治。母亲一直把他带在身边到五个月大，辗转流离于一所又一所妇幼之家。

她忽略了最基本的照料，甚至会忘记喂他；人们必须不断提醒这个女人照顾自己的孩子，尤其提醒她喂奶。孩子遭到严重忽视，真正挨过饿。五个月大时，他因严重的生长不良和营养不良而不得不住院。刚刚住院，他就出现双侧中耳炎，需要接受双侧乳突切除术。随后，他被送往“保罗·帕尔凯”[注1]；大家都知道，那里采取严格的预防隔离措施。

> [注1] 保罗·帕尔凯基金会：位于塞纳河畔讷伊的一所兼具卫生与社会服务性质的儿童之家。

他被隔离起来，看不见其他儿童；又因厌食而通过导管喂养。随后，他被强行交还母亲两个月；我们对他这段时间的生活一无所知。十一个月大时，母亲把他留在公共救济机构的收容站；几个月以后，由于母亲再也没有来看过，他被正式登记为受助儿童。从这时——十一个月大——一直到三岁九个月，孩子经历了二十五次住所变更，在儿童机构或医院之间不断转移；由于他的状况，从未真正得到寄养安置。

这些住院有的是由于儿童疾病，有的是为了接受腺样体切除术或神经学检查，包括脑室造影和脑电图；检查结果均属正常。卫生与医学评估记录了深重的躯体紊乱；躯体状况改善以后，又出现心理恶化。三岁半时，丹费尔的最后一次评估建议把他送入只能成为永久收治的机构，状态被标作尚未明确界定的类精神病性状态。格塞尔测验的发展

商数为43。因此，三岁九个月时，他来到丹费尔收容站下属的这所机构，我也在那里开始治疗他。

这时，他呈现如下状况：

- 从身高和体重来看，状况很好，只是患有慢性双侧耳漏。
- 从运动方面看，他走路时身体来回摆动，动作严重失调，始终处于过度激动状态。
- 从语言方面看，完全没有协调的言说，经常尖叫，发出喉音式而不和谐的笑声。他只会喊出两个词：“女士”和“狼”。他整天反复喊“狼”，所以我给他起了个绰号叫“狼孩”；这确实就是他对自己的表象。
- 从行为方面看，他过度活跃，始终作出突然、杂乱而没有目的的动作。抓取活动缺乏协调：他会突然把手臂向前伸去拿一个对象；如果没有够到，就无法调整，只能从头重新作出整个动作。他还有各种睡眠障碍。

在这个持续不变的背景上，每逢日常生活的固定场景出现，他都会发生痉挛样激动，却没有真正抽搐；脸部涨红，发出撕心裂肺的嚎叫。这些场景包括坐便盆——尤其是倒空便盆——脱衣、进食，以及他无法忍受的敞开房门、黑暗和其他孩子的叫喊；还包括我们稍后会看到的房间变更。

较少见的是与此截然相反的发作：他会完全瘫倒，毫无目标地望着某处，呈现抑郁样状态。同成人相处时，他过度激动，无法作出区分，

也没有真正接触。同儿童相处时，他似乎完全无视他们；可其中任何一个孩子尖叫或哭泣，都会使他进入痉挛样发作。

在这类发作中，他会变得危险而力气极大，甚至掐住其他孩子的脖子；因此，夜间和进餐时都不得不把他同其他孩子分开。那时，人们感觉不到他表现出任何焦虑，也感觉不到他体验到任何情绪。诊断方面，我们稍后还会再谈，因为当时并不很清楚该把他归入哪个类别。尽管一直怀疑能否取得任何结果，我们还是尝试了治疗。

我要向你们讲述治疗的第一年；此后，治疗中断了一年。这一年可以分成几个部分。先是一个预备阶段，他表现出同日常生活中一样的行为：发出喉音式叫喊；冲进房间以后不停奔跑、嚎叫，跳到空中又蹲着落下；双手抱头；反复开门关门、开灯关灯。面对对象，他不是拿起来，就是丢开，或者把它们全都堆到我身上。下颌前突十分明显。

不过，从最初几次课中，我只能看出一件事：他不敢走近桌上的奶瓶；只有桌子空无一物时，他才敢靠近，但这时也不会触碰，只会对着奶瓶吹气。他还对水盆表现出另一种兴趣；水盆装满水时，似乎会触发真正的惊恐发作。

这个预备阶段临近结束时，有一次分析课中，他在高度激动状态下把所有东西堆到我身上，随后冲了出去。我听见他站在楼梯顶端——他还不会独自下楼——面对空无一物之处，以一种哀切的语调、一种很低而完全不像他平时的声音，说道：“妈妈。”预备阶段以治疗外的一件事告终：一天晚上睡下以后，他站在床上，当着惊恐的小女孩们，用一把塑料剪刀试图剪断自己的阴茎。

进入第二部分以后，他开始显露“狼”对他而言是什么。他总在喊这个词，而我一直不能清楚想象它对他意味着什么。有一天，他首先试图掐死另一个由我治疗的小女孩。人们不得不把二人分开，并把他送到另一个房间。他反应激烈，表现为强烈的激动。我只得过来，把他带回平时生活的房间。他一进去就高喊“狼！”，把房间里的所有东西——那是餐厅里的食物和盘子——四处乱扔。

接下来几天，每次经过自己曾被送进去的房间，他都会高喊“狼！”这个主题使我印象极深，也照亮了他对房门的行为：他无法忍受房门敞开。分析课中，他不断把门打开，好让我重新关上，同时高喊“狼！”回想他的经历就会明白，地点变更和房间变更对他而言都是一种摧毁，因为他曾不断更换地点和照料他的成人。

这在他那里变成了一项真正的摧毁原则，深深标记了他生命中摄入与排泄这些原初表现的基础。他主要通过两个场景表达它：一个围绕奶瓶，另一个围绕便盆。

到后来，他终于能够拿起奶瓶。有一天，他走过去打开门，把奶瓶递给一个想象中的人；因为即使独自同一名成人待在房间里，他也会继续表现得仿佛周围还有其他孩子。他把奶瓶递出去，回来时扯掉奶嘴，又让我把奶嘴装回去；接着再次把奶瓶递到门外，任由门敞开，背对着我喝下两口奶。随后，他面对着我扯下奶嘴，把头向后仰，让牛奶浇遍自己，又把剩下的奶倒到我身上；接着陷入惊恐，失去意识、什么也看不见地冲了出去。我不得不在楼梯上把他抱起来，因为他已经开始往下滚。我的感觉是，在门敞开、牛奶又同门联系起来的这个时刻，他把摧毁吞进了身体。

随后发生的便盆场景，也带有同一种摧毁性质。治疗之初，他以为自己必须在分析课中排便；仿佛只要给我某种东西，就能把我留住。他只有紧贴着我才能做到：坐在便盆上，一只手抓住我的围裙，另一只手抓着奶瓶或铅笔，处在强烈恐惧中。他会在排便之后进食，尤其会在排便之前进食；要排尿时，则会喝水。情感强度表明他极为恐惧。这类场景中的最后一次，照亮了排便同各种变更所造成的摧毁在他那里具有怎样的关系。

在这次场景中，他先坐在我身边排便。粪便放在一旁，他开始翻一本书，一页页翻过去。随后，他听见外面有响动，吓得发狂，冲出房间，拿起便盆，放到刚刚走进隔壁房间的那个人门前。接着，他回到我所在的房间，整个人紧贴在门上，高喊：“狼！狼！”我的感觉是，这是一种禳解仪式。

他无法把这份粪便给我；他在一定程度上知道，我并不要求他这样做。他把便盆放到外面，明知粪便会被扔掉，也就是被摧毁。我向他解释了这一点。随后，他出去取回便盆，把它重新放进房间，放在我身旁，又用一张纸盖住，仿佛这样就不必把它交出来。

接着，他开始攻击我。仿佛我允许他通过这份可以由自己处置的粪便来占有自己，也就使他有可能表现攻击性。显然，在此以前，他既然不能占有，也就没有攻击性的感受，只有自我摧毁；这也解释了他对其他孩子的行为。

从那一天起，他不再觉得自己必须在分析课中排便，而开始使用象征性替代物：沙子。他显露出自己对自身具有多么混乱的表象。在日常

生活中，他的焦虑和激动变得越来越强，已经无法管束。在分析课中，我自己也面对一阵阵真正的旋风，很难从中作出介入。

那一天，他喝下一点牛奶以后，先把一些奶洒到地上；接着把沙子扔进水盆，用沙子和水灌满奶瓶；又在便盆里排尿，并往里面加沙子。随后，他拾起混有沙子和水的牛奶，把一切都加进便盆，再把橡胶娃娃和奶瓶放在最上面，将整盆东西托付给我。这时，他走过去打开门；回来时，面孔因恐惧而痉挛。他重新拿起便盆里的奶瓶，把它打碎，并不断猛击，直到奶瓶碎成细小碎屑；接着又仔细拾起碎屑，埋进便盆的沙子里。他的状态已经严重到我不得不把他带下楼，因为我感到自己再也无法为他做任何事情。他把这个便盆带走了。

一粒沙子掉在地上，在他那里触发了难以置信的惊恐。他必须捡起每一丁点沙子，就仿佛那是自己的一部分，同时高喊：“狼！狼！”他无法忍受继续待在集体中，也无法容忍任何其他孩子靠近。人们不得不让他在高度紧张状态下躺下；直到发生一次猛烈的腹泻，他的紧张才以引人注目的方式缓解。他用双手把腹泻排泄物涂得到处都是，床上和墙上全都沾满。整个场景如此哀切，伴随如此强烈的焦虑，我深感不安，也开始领会他具有怎样的自我观念。

第二天，他把这件事表现得更加明确。当时我不得不使他受到挫折；他跑到窗边把窗户打开，高喊“狼！”他看见玻璃中的自身图像，便一面击打，一面高喊：“狼！狼！”罗贝尔正是这样表象自己：他就是狼，也就是那项摧毁原则；他在自己的图像中击打它，或者以如此强烈的紧张把它召唤出来。那个便盆里放入了进入和离开他身体的东西——尿液和粪便——随后又放入一个人的图像，即娃娃，以及奶瓶碎

片；它确实构成了他自身的一个图像，同狼的图像相似。一点沙子掉到地上就引起惊恐，正好为此作证。

他既依次又同时是自己放进便盆的所有这些要素。打碎奶瓶以后留下的碎片，是他把打碎奶瓶这项行动同房门、外部和各种变更联系起来之后，最后形成的自身图像。他无非是一系列对象；他通过它们同日常生活发生接触，而这些对象又是其身体内容物的符号：

- 沙子是粪便的符号；
- 水是尿液的符号；
- 牛奶则是进入他身体之物的符号。

不过，便盆场景表明，他几乎不能区分这一切。对他而言，所有内容物都统一在身体持续遭受摧毁的同一种感受中；同这些内容物相对，身体代表容器，而罗贝尔用打碎的奶瓶象征了它。在下一个阶段，他开始驱除那匹狼。之所以说是驱除，是因为这个孩子给我的印象就像受到附体；而借助我的持续在场，他能够凭着自己喝下的一点牛奶，驱除日常生活中那些使他如此痛苦的场景。

这时，我的解释主要试图从情感方面区分他的身体内容物：牛奶是人所接受的东西；粪便是人所给予的东西，其价值取决于此前接受的牛奶；尿液则具有攻击性。经过许多次课以后，有一次他在便盆里排尿，随后十分难过地告诉我：“不是便便，是尿尿。”

我安慰他，告诉他：他接受得太少，因此还不能在给予某种东西的同时不使自己遭到摧毁。这使他得到安慰；他随后能够去厕所倒空便

盆。倒空便盆伴随着许多保护仪式。起初，他把尿液倒进厕所的洗手池，同时让水龙头一直流水，以便用清水替代尿液。他又把便盆装满，让水大量溢出；仿佛容器只有凭借其内容物才能存在，并且还必须满溢出来，才能反过来容纳这个容器。

这里存在一种关于存在者在时间中的混融看法：存在者既是容器，又同时是内容物，就像子宫内生活那样。他在这里重新遇见自己对于自身的混乱图像。他把尿液倒掉，又试图追回，确信离去的正是他自己。他高喊“狼！”；对他而言，便盆只有在装满时才具有现实性。我的整个态度都在向他表明：便盆倒空尿液以后仍然真实存在；就像他——罗贝尔——排尿以后仍然存在；也像水龙头不会随流出的水一起被冲走，无论水流不流，它始终在那里。

通过这些解释和我的持续在场，罗贝尔逐渐在倒空与再次装满之间引入一段延迟，直到有一天，他把一个空便盆夹在臂弯里，得意扬扬地回来。显然，他已经获得了自身身体恒存的观念。与此同时，他还在对自己的身体进行另一项经验：衣服对他而言就是容器，一旦脱去，死亡便必定发生。脱衣场景会使他真正陷入发作。最后一次持续了三个小时；工作人员形容他像“受到附体”。他高喊“狼！”，从一间卧室跑到另一间，把便盆中找到的粪便涂到其他孩子身上；最后只有把他捆住，才能使他平静下来。

这个场景发生后的第二天，他来到分析课中，在高度焦虑的状态下开始脱衣，随后全身赤裸地爬上床。经过三次课，他才终于能够赤裸地躺在床上喝下一点牛奶。他指着窗户和房门，击打自己的图像，高喊：“狼！”

与此同时，日常生活中的脱衣变得容易，却会随之出现深重抑郁：晚上，他会毫无原因地抽泣，并下楼找女管理员安慰，最后在她怀里睡着。这个阶段结束时，他同我一起驱除了倒空便盆和脱衣场景；这是通过我的持续在场完成的，而这种在场已经使牛奶成为一个具有建构作用的要素。不过，罗贝尔受到建立最低限度结构的必要性推动，没有触及过去；他只依靠日常生活的当下，仿佛没有记忆。

在下一个阶段，我变成了狼。他利用已经完成的那一点建构，把自己曾经喝下的全部坏东西投射到我身上，并以某种方式由此重新找到记忆。他将能够逐渐变得具有攻击性。

事情将变得悲剧性。过去推动着他，使他不得不攻击我；与此同时，在当下，我又是他所需要的人。我必须通过解释安慰他，同他谈论那个迫使他具有攻击性的过去；这种攻击不会导致我消失，也不会导致他换地方——而他过去一直把换地方当作惩罚。

由于已经攻击我，他又试图摧毁自己。他用一个没有打碎的奶瓶来表象自己，并试图把它打碎。我从他手里拿走奶瓶，因为他当时还无法耐受打碎它。随后，他继续分析课，也继续攻击我。

这时，他让我扮演使他挨饿的母亲，迫使我坐到一把放着他那杯牛奶的椅子上，好让我把牛奶打翻，由此剥夺他的好食物。接着，他开始高喊“狼！”，又拿起摇篮和婴儿，把它们从窗口扔出去；他狂怒地控诉着我。

随后，他转而攻击我，以极大的暴力强迫我喝下脏水，同时高喊：“狼！狼！”这个奶瓶代表坏食物；在一位剥夺他食物的坏母亲之后，分离和不断变更又使食物变坏。与此同时，他还让我承担坏母亲

的另一个面向：那个会离开的母亲。一天晚上，他看见我离开机构，第二天便作出反应。此前他也见过我离开，但还无法表达自己可能由此感到的情绪。

那一天，他在强烈攻击性和焦虑中尿到我身上。这个场景只是最后一幕的序曲；最后一幕使我彻底承担他遭受的一切坏东西，并把"狼"投射到我身上。因此，我已经喝下装有脏水的奶瓶；又因为自己会离开，接住了他攻击性的尿液。我于是成了狼。有一次分析课中，他把我锁在厕所里，自己返回分析室，独自爬上空床，开始呻吟；由此，他同狼分离开来。

他无法呼唤我；不过既然我是那个持续在场的人，我终究必须回来。我回去时，罗贝尔躺在那里，神情哀切，拇指停在距离嘴边两厘米的位置。分析课中，他第一次向我伸出双臂，让我安慰自己。从这次课起，他在日常生活中的行为完全改变了。这个曾经攻击其他孩子、掐他们的脖子、用牙齿撕咬他们的孩子，变成了最温柔不过的人；他保护年幼的孩子，安慰他们，喂他们吃饭。

我的感觉是，他已经驱除了那匹狼。从这一刻起，他再也不谈狼，随后也能够进入下一个阶段：向身体的退行，也就是建构他从未能够建构的 ego-body（自我—身体）。沿用他一贯采用的内容物—容器辩证法，罗贝尔若要建构自己，就必须成为我的内容物；但他也必须确认自己占有我，也就是确认我作为他未来的容器。他以一只装满水的水桶开始这个时期；桶把是一根绳子。他绝对无法忍受绳子的两端都系在桶上，必须让其中一端垂下来。

有一件事使我印象深刻：当我为了提起水桶而不得不重新把绳子系紧时，他会陷入一种近乎身体疼痛的状态。直到有一天，他在一个场景中把装满水的桶放在两腿之间，拿起绳子，把它系在自己的肚脐上。这时，我感觉水桶就是我；而他通过一根绳子、一条脐带重新把自己连接到我身上。

随后，他把桶里的水倒出来，脱光衣服，蜷缩成胎儿姿势躺进水里。他不时伸展身体，甚至会张开嘴，又在液体上合拢；就像最近的美国实验所表明的那样，胎儿会饮用羊水。

所有这些活动显然都是胎儿活动的复写；我的感觉是，他正在借此建构自己。起初，他极度激动，后来逐渐意识到某种快感现实；最后，整个过程通向两个关键场景。他以异常的凝神状态把它们付诸行动，并显出一种考虑到其年龄和状况便格外惊人的充盈状态。

在第一个场景中，罗贝尔全身赤裸，面对着我，双手合拢捧起水，举到肩膀的高度，再让水沿身体流下。他这样重复了许多次，随后轻声对我说："罗贝尔，罗贝尔。"他正在意识到自己的身体。这次水的洗礼——考虑到他投入其中的凝神状态，那确实是一场洗礼——之后，又发生了牛奶的洗礼。

一开始，他以更多快感、较少凝神的方式在水中玩耍。随后，他拿起一杯牛奶喝下，又把奶嘴装回奶瓶，开始让牛奶从奶瓶中沿身体流下。牛奶流得不够快，他便拿掉奶嘴重新开始，让奶流过胸口、腹部并顺着阴茎流下，体验到强烈快感。接着，他转向我，手里握着阴茎、神情欣喜地把它展示给我看。

随后，他喝下牛奶，使牛奶既在身体外部又进入身体内部；内容物由此既被容纳，又成为容器，重新找到他此前用水表演的那个场景。

在后续阶段中，他将进入口腔建构阶段。这个阶段异常困难，也十分复杂。首先，他已经四岁，却在经历最原始的阶段；其次，我当时在这所机构治疗的其他孩子都是女孩，这对他构成一个问题；最后，罗贝尔的行为 patterns（模式）并没有完全消失，每逢受到挫折便有再次出现的倾向。

在水与牛奶的洗礼之后几次分析课中，罗贝尔首先开始经历那种作为原始母婴关系特征的共生。不过，儿童真正经历这种共生时，通常并不存在性别问题——至少从新生儿指向母亲的方向上如此——可这里确实存在一个问题。

罗贝尔要么必须同一个菲勒斯式母亲共生——他已经准备好接受这样的母亲——要么必须同一个女性母亲共生；后一种情形会提出阉割问题。关键是让他能够接受食物而不因此遭受阉割。起初，他以简单形式经历这种共生：坐在我膝上吃东西。随后，他会取下我的戒指和手表戴到自己身上；或者从我的罩衣里拿出一支铅笔，用牙齿咬断。

于是，我向他作出解释。同阉割性的菲勒斯式母亲的这种认同，此后留在过去层面，并伴随一种反应性攻击；这种攻击的动机逐渐发生变化。他此后只会为了惩罚自己的这份攻击性，才把铅笔芯咬断。再后来，他可以躺在我怀里用奶瓶喝奶，但奶瓶仍由他自己拿着；又过了一段时间，他才终于能够直接接受牛奶，由我拿着奶瓶。仿佛整个过去都禁止他通过我，把如此根本的对象之内容物接进自己身体。他对

共生的欲望仍同我们刚才看到的东西发生冲突，所以采取一条迂回道路：由他自己给自己喂奶瓶。

不过，罗贝尔通过其他食物——例如糊状食物和糕点——逐渐体验到：自己在这种共生中从我这里接受食物，并不会使他同我认同到变成女孩的程度。于是，他能够从我这里接受食物了。

起初，他试图通过同我分享来区分自己和我。他给我东西吃，一面摸自己一面说："罗贝尔。"接着又摸我，说："不是罗贝尔。"我在解释中大量使用这一点，帮助他迅速作出区分。情境不再只发生在我和他之间，他开始让其他接受我治疗的小女孩介入。这是一个阉割问题，因为他知道，在他之前和之后，都会有一个小女孩同我上楼进行分析课。按照情感逻辑，他应当让自己变成女孩，因为正是一个女孩中断了他所需要的同我的共生。

这个情境充满冲突。他以不同方式把它表演出来：有时坐在便盆上排尿，有时站着排尿，表现出真正的攻击性。此时，罗贝尔已经能够接受，也能够给予；于是，他把自己的粪便给我，不再害怕这项给予会使自己遭到阉割。

由此，我们抵达治疗中的一个台阶，可以概括如下：他身体的内容物不再具有摧毁性，不再是坏的；他能够通过站立排尿来表达攻击性，而容器——也就是身体——的存在与完整性不会因此受到质疑。

格塞尔测验的发展商数由43上升到80；在特曼—梅里尔测验中，他的智商为75。临床图景发生了改变：运动障碍消失，下颌前突也消失了。他对其他儿童变得友好，可以开始融入集体活动。只有语言仍然

十分初步：他从不造句，只使用最根本的词。随后，我离开去度假，缺席了两个月。

我回来以后，他表演了一个有趣场景，显示过去的行为模式与当下已经完成的建构如何在他身上共存。我缺席期间，他的行为保持着此前的样子；也就是说，他仍以旧有方式表达分离对自己意味着什么，以及他害怕失去我，但由于已经获得新的东西，这种表达变得格外丰富。

我回来时，他把牛奶、尿液和粪便全都倒掉，仿佛要摧毁它们；接着又脱下围裙，扔进水中。我的缺席造成创伤，使他重新遇见旧有内容物和旧有容器；于是，他以这种方式把二者摧毁了。第二天，罗贝尔被自己的心理反应淹没，开始在躯体层面表达：大量腹泻、呕吐、晕厥。他彻底倒空了自身过去的图像。只有我的持续在场，才能把它同一个新的自身图像连接起来，如同一次新生。

这时，他获得了这个新的自身图像。我们看到，他开始在分析课中重新表演那些我们原本不知道的旧创伤。其中一个尤其突出：罗贝尔喝过奶瓶以后，把奶嘴塞进耳朵；随后又喝了一些，再在极度暴烈的状态下打碎奶瓶。他能够这样做，而身体完整性并未因此受损。他已经同作为自身符号的奶瓶分离开来，能够借助作为对象的奶瓶来表达自己。

这次分析课如此醒目，他还重复了两次；于是，我作了一番调查，想知道他五个月大时接受的鼓窦切开术究竟如何进行。后来我们才得知：在为他动手术的耳鼻喉科里，他没有接受麻醉；这场痛苦的手术进行时，人们一直把一只装着糖水的奶瓶按在他嘴里。

这项创伤经历照亮了罗贝尔建构出的图像：先是一位使他挨饿、患有妄想症、十分危险而且无疑曾攻击他的母亲；随后是分离；一只被强行按住的奶瓶，使他把自己的叫喊和别人施加的痛苦吞咽下去；再后来是导管强饲，以及接连二十五次变更。

罗贝尔不可能形成另一种自身图像。我的感觉是，罗贝尔的悲剧在于：他可能具有的一切口腔—施虐性幻想，都被这些生存条件实现了；这些幻想变成了现实。最近，我不得不使他同一个现实相遇。我曾缺席一年，回来时已经怀孕八个月；他看见了怀孕的我，随即开始表演摧毁这个孩子的幻想。我又因分娩而消失；我缺席期间，丈夫接手治疗，他继续表演对这个孩子的摧毁。

我回来时，他看见我的腹部已经平坦，孩子也不在身边。由于仍停留在这个阶段，他确信自己的幻想已经变成现实：他杀死了这个孩子，所以我也会杀死他。最近十五天里，他一直极度激动，直到终于能够把这件事向我［说出来？］。这时，我使他同现实正面相遇：我把女儿带给他看，使他现在能够作出切分。他的激动状态立即消退；第二天重新开始分析课时，他终于开始向我表达一种嫉妒感。他依附的是某种活着的东西，而不再是死亡。

这个孩子一直停留在幻想就是现实的阶段。现实曾把他的幻想强加给他。借助子宫内建构的幻想——它们在治疗中成为现实——他才能完成这项令人惊异的建构。如果他已经越过这个阶段，我反而无法使他完成这种自身建构。

正如我昨天所说，我的感觉是，这个孩子已经沉没在实在之下；治疗之初，他那里没有任何象征功能，更谈不上想象功能。

拉康——尽管如此，他还是有两个词。

让·伊波利特

我想就“狼”这个词提一个问题。“狼”是从哪里来的？

罗西娜·勒福尔

在儿童机构里，经常能看到护士用狼来吓唬孩子。在我治疗他的那所机构里，有一天，孩子们实在无法管束，人们把他们关进幼儿园；一名护士走到外面，模仿狼叫，好让他们听话。他把这件事赋予了后来具体化的那个形式。

让·伊波利特

还需要解释的是：为什么狼的这个故事会使恐惧固定在他身上，就像固定在那么多其他孩子身上一样。

罗西娜·勒福尔——狼显然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吞噬性的母亲。

让·伊波利特——您认为，狼总是吞噬性的母亲吗？

罗西娜·勒福尔

儿童故事总是说狼要吃人。在口腔—施虐阶段，孩子想吃掉自己的母亲，于是便认为母亲也会吃掉他；人们用来威胁他的那匹狼会吃掉他，所以母亲会吃掉他，母亲也就变成了狼。我认为，这大概就是它的发生过程；但我不能确定。

这个孩子的经历中还有许多我无法知道的事情。我认为，正是借助这些事情，他才形成狼的图像。直到不久以前，他想攻击我时，还不会四肢着地，也不会像狗一样叫；现在，他会这样做了。现在，他知道自己是人，但仍不时需要像十八个月大的孩子一样，同一只动物认同。他想表达攻击性时，就四肢着地，发出“呜，呜”的叫声，却没有一丁点焦虑；接着又重新站起来，继续分析课。目前，他仍只能在这个阶段表达自己的攻击性。

让·伊波利特

是的，他以这种方式克服了……这正是 zwingen（强迫）与 bezwingen（克服、制服）之间的区别：一个词带有强制，另一个词则不带有强制。Zwang（强迫）就是那匹使他产生焦虑的狼；Bezwingung（制服、克服）则是焦虑得到克服、他开始扮演狼的时刻。

罗西娜·勒福尔——是的，我完全同意。

拉康

“狼”自然会提出象征作用的全部问题，而且这一问题根本无法受到局部限制；你们已经看见，我们不得不在一种普遍象征化中寻找它的起源。为什么是狼？至少在我们这些地方，它已经不是一个特别熟悉的角色。偏偏由狼产生这些效果，这一事实把我们直接连接到一种更广泛的功能：在神话、民俗和原始宗教层面，我们都能看到狼发挥某种作用。

它还由此联系到整条谱系，把我们带向秘密会社及其中带有启蒙性质的活动：或者采用一个图腾，或者更具体地按照这种共同体风格进行组织，也就是同某个角色认同。

面对如此基本的现象，我们无法作出这些平面区分。不过，这个超我……我想提醒你们注意一个问题。你们会看到，它以后还会向我们提出：下面两者彼此具有怎样的功能关系，又有何区别：

- 在压抑的决定作用中，应当把什么称作超我；
- 又应当把什么称作自我理想。

我不知道你们是否已经注意到：这里存在两种构想。一旦把它们引入任何一种解释患者行为的辩证法，它们似乎恰好指向彼此相反的方向：

- 超我只是起强制作用；
- 自我理想则起振奋作用。

人们往往抹去这些区别，因为从一项转到另一项时，仿佛两个术语是同义词。当我们考察同分析家的转移关系、寻找所谓治疗作用的基础时，这个问题值得提出。人们会说，主体把分析家同自己的自我理想认同，或者相反，同自己的超我认同；随后又会在同一篇文本中，随着论证逐点推进而让两者彼此替换，却不把差别解释清楚。

我以后肯定会考察这个问题：在我们所区分的不同语域中，超我究竟是什么，又应当怎样看待它。我之所以没有更早这样做，是因为我想把讨论限制在我们正在研究的文本平面，而超我概念尚未得到阐发。

先行一步，我要说：如果只是以完全神话式的方式，把超我当作一个关键词、一个强力词，当作一种只供使用而不作深究的神话式建构、一尊新偶像，那么当然完全不可能为它定位。如果我们不满足于盲目使用这个术语，不满足于在神话式理论平面上使用它，而要设法理解超我是什么、它有哪些根本要素，那么可以肯定：同自我理想不同，超我根本而本质地位于言说的象征平面。

超我是一道命令。超—我——常识和实际用法已经表明这一点——同法则的语域和概念相一致，也就是同整个语言系统相一致；语言系统界定的是人之为人的处境，而不只是生物个体的处境。

另一方面，我们还可以强调超我经常得到指出和阐发的另一项性质：它恰恰荒谬、盲目，只是一道纯粹命令、一种单纯暴政。这向我们指明，可以朝哪个方向综合这些概念。很清楚，我会说，超我：

- 一方面同法则具有某种关系；
- 另一方面又同法则具有恰好相反的关系：它是一条荒谬的法则，甚至缩减成对法则本身的误认。

我们所谓超我在神经症者那里总是以这种方式运作。分析之所以必须阐发这个概念，正因为神经症者的这种道德是一种荒谬、毁灭、纯粹压迫性的道德；同法则的语域相比，它所介入的功能真正近乎反法则。

超我既是法则，也是法则的摧毁和否定。超我本质上就是言说本身，就是法则的命令，因为最终只剩下法则的根。法则整个缩减成某种甚至无法表达的东西，例如“你必须”；这无非是一个失去全部含义的言

说。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超我最终同主体过早而原始的经验中最具破坏力、最能攫住人的东西认同；最终同我所谓的“凶猛形象”认同，也同那些能够以或直接或间接的方式联系到儿童所遭受的各种原始创伤的形象认同。

而我们在这里看见的，可以说正是这种语言功能以一个特权化、具身化的病例呈现；我们在它最缩减的形式中直接触及它。最终，某种东西缩减成一个词；连我们自己都无法为孩子界定这个词的含义与作用范围，它却仍然把孩子同人的共同体连接起来。

正如您准确指出的，这并不只是一个生活在纯粹野蛮状态中的狼孩；毕竟，这是一个会说话的孩子。但正是借助这匹狼，您从一开始便有可能建立对话。这份观察的惊人之处，在于“狼”这个词的用法在哪个时刻消失——就在您所描述的那个场景之后；又在于，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的转折如何围绕语言的这个枢轴发生，如何围绕他同“狼”这个词的关系发生。对他而言，这个词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条法则的缩影。

随后，一项非同寻常的阐发开始了；其终点就是那场令人震动的自我洗礼，并最终说出他自己的名字。我们无法不在这里直接触及某种格外动人的东西：人同语言之间最根本的关系，以其最缩减的形式呈现出来。

您还有什么问题要提出？

罗西娜·勒福尔——只剩下诊断问题。

拉康

诊断方面，嗯……已经有人对此表明立场了。朗医生？有人告诉我，您昨晚谈过这个问题；您的说法在我看来很有意思。我认为，您作出的只是一项类比诊断。如果要把它放进已经存在、我们所知的疾病分类图景中，如果能把它定位到某处，您说出的名称是……？

朗医生

幻觉性妄想。面对精神分裂症这团多少没有定形的混合物，人们总是可以设法从中寻找类比，用来说明儿童相当深重的行为紊乱。这样做会使我们感到满意，因为我们在成人那里认识这种情况。人们不太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时，往往就会谈论儿童精神分裂症。不过，精神分裂症的一个根本要素在这里缺失了：解离。这里没有解离，因为几乎还没有任何建构。在我看来，它更像某些幻觉性妄想的组织形式。昨晚我作了很大保留，因为从对这个年龄儿童的直接观察，到我们所熟悉的通常疾病分类之间，还有一步必须跨越；这个病例中还有许多东西需要明确说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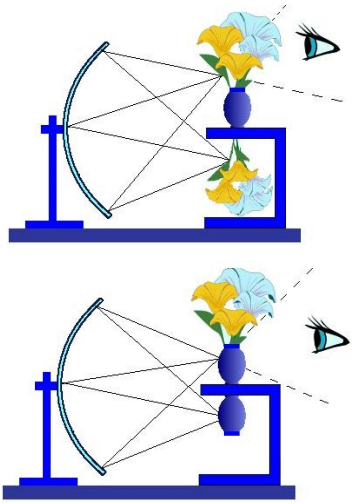
拉康

是的。别人向我转述时，我显然也是这样理解的。因为按照您所说的慢性幻觉性精神病意义来看，一种幻觉性妄想同这个主体身上发生的事情只有一个共同点：勒福尔夫人敏锐注意到的那个维度，即这个孩子只活在实在中。

只有在“幻觉”一词确实意味着某种东西的限度内，才可以这样说：它指一种现实感；这种现实感超出并脱离一切解释，某种东西真正被患者承担为实在。我们可以在这里说出类似的话。你们知道，即便在幻觉性精神病中，这一点仍然多么成问题。成人的慢性幻觉性精神病包

含想象界与实在的某种综合；精神病的全部问题正在这里。那里存在一种次级的想象性阐发；勒福尔夫人在这里凸显的，正是它真正的“并非不存在”，只是尚处于萌生状态。我已经很久没有重新看过这份观察了。

上次见面时，我为你们画了花瓶与花朵的大图式：或者花朵是想象的、虚拟的、幻觉性的，而花瓶是真实的；或者反过来，因为可以把装置朝相反方向安排。



真实花瓶与想象花朵的实像　　真实花朵与想象花瓶的实像

借这个机会，我不能不请你们注意这类关系模型何等切合被容纳的花朵与起容纳作用的花瓶。我已经把容器—内容物系统置于自己赋予镜

像阶段的意义之前景；可以肯定，我们在这里看到它毫无遮蔽地充分运作。我们真正看见：

- 孩子带着一种多少具有神话性质的功能行动；看他把什么东西塞进内部，又从内部拿出什么；看他怎样对待这个容器；也看见勒福尔夫人指出的最终结果：他能够耐受容器处于空的状态，也就是严格说来作为容器而存在；

- 这只花瓶本身第一次被认同为一个实体、一个严格说来属于人的对象，也就是一个工具性对象：工具从自身功能中分离出来；而在此以前，他只能在“功能—虚无”的状态下承受它。

这同样格外富于表现力，极有意义地显露出人的世界如何构成：人的世界里不仅有“有用之物”，还有“工具”；也就是说，有各种器具，有独立并以其本身而存在的事物。

伊波利特——普遍性的事物。

朗医生

从狼的直立姿势转到水平姿势很有意思，我们曾经谈过。在我看来，起初那匹狼恰恰是被直接活出来的。

拉康——起初，它既不是他，也不是别人。

朗医生——它就是现实。

拉康

不，我认为，它本质上是被削减到残干状态的言说——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既不是他，也不是别人。只要他说出这个言说，他显然就是狼；但任何人都可以是狼，任何能够被命名的东西都可以是狼。你们在这里看到的是处于结点状态的言说。这里有一个完全混沌的自我。言说停住了，但他仍将从这里出发取得自己的位置，建构自己。

巴尔格医生

我曾经指出，有一个时刻发生了变化：孩子先摆弄自己的排泄物，后来又装入和取用沙子与水。我谈的更多是想象界；他的确开始建构并显露想象界。他同对象的距离也已经可以变得更大：起初是自己的排泄物，随后越来越远。我认为，还不能按您所说的意义谈论符号。可昨天，我的印象是勒福尔夫人反而是在符号的意义上谈论它。

罗西娜·勒福尔——我还没有充分深入研究这个问题。

拉康

这是一个困难的问题，也正是我们在这里反复操练的问题；因为它可能是理解所谓自我的钥匙。自我是什么？构成它的并不是一组同质的心理机构。有些成分是现实，有些则是图像和想象功能；自我本身就是一种想象功能。在结束以前，我还想谈到这一点。我们不能遗漏您开头告诉我们的东西：这个孩子的运动行为。您起初的描述十分扣人心弦。他的各套器官似乎都没有任何损伤。现在，他的运动行为是什么性质？抓取动作怎样？

罗西娜·勒福尔——已经不同于起初了。

拉康

您曾这样描绘他起初的状态：在感觉—运动适应层面，他想触及一个对象时，只能用一次动作抓取；如果没有抓到，就必须从头重新开始。这已经预设许多概念：他能够控制视觉适应；它甚至还预设距离概念受到扰动。这里显出一些有意思的事情：某些功能在理论上本来可以只放在感觉与运动器官完整性这一初级平面上，仿佛动物层面的完整性已经足够；但这些功能实际上存在依存关系。

这个野孩子仍然可以像一只组织良好的小动物一样，抓住所欲望的东西。按照您的描述，他的动作会发生过失或失误，而他只有把整个动作从头重来，才能加以纠正。无论我们怎样理解，至少可以大体说：这个孩子似乎不存在涉及锥体系统的缺损或发育迟缓。

我们所面对的这些表现，可以说是自我综合功能中的裂口——至少按照分析理论通常理解自我的意义而言。还有一件事：您注意到他无法集中注意；又用一个生动形象的描写，呈现孩子起初那种没有接合的激动。这里所涉及的同样无可争议地是自我功能。把它同睡眠功能的分析理论联系起来，也很有意思，因为这种理论在某些方面甚至把睡眠当作自我的一种功能。

罗西娜·勒福尔

有一件很有意思的事：这个孩子过去既不睡觉，也不做梦。从他把我锁起来的那个著名日子起，运动障碍逐渐减轻；他开始在夜里做梦，并在梦中呼唤母亲，而此前根本谈不上做梦。

拉康

我正想谈到这里。我会把所谓睡眠的非典型性直接联系到他发展中绝对异常的性质，联系到他的发育迟缓；这项迟缓恰恰位于想象界层面，而这份观察也正是在这个层面上展开对自我作为想象功能的考察。

在这个语域中，这份观察格外具有意义，因为它使我们能够标出某些依存关系：想象发展中的某一点一旦迟缓，便会产生远远超出所谓想象功能的结果。我们若愿意，可以把想象功能称作一种上层结构；然而，某些看似更低级的功能，真正只有在这项上层结构得到某种主体性实现的限度内才能得到定位。换言之，严格的感觉—运动功能、发展和成熟，同主体的想象性掌控功能之间具有怎样的关系——这就是这份观察大体上最重要的意义。整个问题在于：精神分裂症在多大程度上涉及这种接合。

只要这个问题仍然悬而未决，我们就永远无法作出定论；归根结底，这向我们表明精神分裂症的理性阐发处在怎样的状态。事实上，依照我们各自的倾向，以及每个人对精神分裂症、对其根本机制和作用环节所持的观念，我们既可以把这个病例放入精神分裂性疾病的框架，也可以不这样做。可以肯定，它并不是作为一种状态的精神分裂症；恰恰因为这个状态不但尚未确立，而且您还向我们展示了它的意义与变动。不过，它的确呈现一种表象、一种结构、一种同世界建立精神分裂式关系的图像。严格到极点，我们还可以把一整套紧张症系列的现象拿来同它比较，归入同一类别；但很清楚，严格说来，其中没有任何相应症状。因此，除了像朗医生那样只借助某种参照定位以外，我们无法把它放进这种框架。

如果假定在这个层面、这个年龄存在某些缺陷、某些缺失的人类适应，我们就为后来通过类比呈现为精神分裂症的东西打开了一条道路。尽管如此，我认为，精神分裂症这个框架虽然在某些方面含混，仍是可以从疾病分类学上安放类似病例的框架。我确实认为，除此之外不能再多说什么；只能说，这就是我们所谓的示范病例。毕竟，我们没有理由认为疾病分类框架从亘古以来便在那里等着我们。正如佩吉所说："小螺丝总能拧进小孔。"可是有些非典型、异常的情形，小螺丝再也对不上小孔。我毫不怀疑，这里涉及某种精神病性秩序，更确切地说，我们面对的现象可能以精神病告终；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精神病都具有类似开端。

勒克莱尔，下次我特别请您从下面的文本中为我们整理出一些东西：

- 《论自恋：一篇导论》；它收在 Collected Papers（《论文集》）第四卷；

- 或见《全集》第十卷，Zur Einführung des Narzißmus。

你们会看到，其中只涉及我们正在这里考察的这个语域——想象界——所提出的问题。它把两个主题连接起来：一边是精神病，另一边是爱，尤其是同转移有关的爱。这是一道弧线，把两个看起来彼此对立到极点的端点连接起来；而它们实际上由想象功能联结。简言之，要以充实方式理解弗洛伊德在这个思想阶段如何理解和阐发分析技术，就绝对不能缺少这一切；也就是说，不能缺少这项自恋功能——它同样以这一阶段的形式包含在这篇文本中，我们无法绕开。

第10课 · 1954年3月17日

[速记稿有缺漏]

对于上次没有到场的人，我现在先说明一下，把《论自恋：一篇导论》这篇文章引入这里，问题何在、又有何用处。你们知道，在关于技术的讲述中，在对技术基础的考察中，我们已经推进到了某个关节点。

由于我们的朋友利布许茨［勒克莱尔］今天缺席，我不得不稍稍改变这次谈话原定的次序；因此，我或许会把某些观念略作短接——这也未必是坏事。平常我总要向你们反复讲，几乎讲得不厌其烦，目的就是让它们进入你们的范畴，更好的是进入你们的思维习惯。

我们怎样概括自己已经推进到的位置？这个星期我注意到——不能说这没有让我满意——你们当中已有一些人开始真正不安起来，因为一段时间以来，我一直建议你们系统运用一种根本参照：象征界与实在界这两个范畴。

你们知道，我一直坚持这个象征界的观念，并告诉你们：若要理解我们在分析中所作介入的整个积极部分，就必须始终严格从这里出发，从象征界这一范畴出发；还要始终追问，我们介入中的某个要素意味着什么、处在何种位置。我再说一遍，这尤其涉及积极介入，也就是解释。

因此，我们已经着重讨论了阻抗的这一面：它恰恰处在言说发出的层面，只要言说能够表达主体的存在，只要它抵达那里——而我们能说它确实抵达了吗？在某种程度上，它永远抵达不了。我们现在所处的时刻，是要提出这个问题：相对于沟通的这个根本要素，即言说，那一切情感、一切参照——现在就直呼其名吧——即想象性的参照，究竟是什么、又处在什么位置？每当人们提起、试图界定分析经验中转移的心理间作用时，通常唤起的恰恰就是这些东西。你们已经清楚感觉到，这并不是不证自明的。［……］

这里涉及言说的给予：一旦言说被给予，在充实言说中——也就是在这样一种言说中：它瞄准并形成一种真理，而这种真理是在双方相互承认中确立的——两个主体，即说话者与受话者，如果你们愿意这样说的话，［……］其中一个主体在之后已经不同于其在之前的样子。充分的意义使言说成为真正的行动。［……］作为本质言说，它不可能从分析经验中被排除。［……］我们不能把整个分析经验想成某种游戏、诱饵、虚幻的诡计，归根到底就是人们所谓的暗示。

相关知识卡 空洞言说与充实言说

如果分析确实是一项经验，并且实现了真正的进展，那么它的最终项就必须立足于这个层面。［……］相对于这个最终项，我要说，整个分析都停留在它的此岸。甚至整个［……］极端点的问题，仍然是推动分析全部运动的东西。

从这一点一经确立起，你们已经能够察觉，许多东西由此得到定向和澄清，同时也显现出许多悖论与矛盾。这种构想的重要性，恰恰在于使这些悖论和矛盾显现出来；但这并不意味着晦涩和遮蔽。相反，看上去过于和谐、过于容易理解的东西，往往在自身之中藏有某种晦

暗；反倒是在二律背反、裂隙与困难中，我们才有机会获得透明性。我们的整个方法都奠基于这个观点，我希望我们在这里的进展也是如此。

当然，首先显现的矛盾是：如果我们认为分析方法旨在抵达充实言说，那么它采取的进路看起来——确实只能这样说——竟是一条最大限度的绕路，因为它仿佛从严格相反的道路出发；这无疑很奇特。

也就是说，分析给予主体的规则，是以一种尽可能摆脱任何责任预设的言说为目标；它甚至免除了主体对真实性的一切要求，告诉他必须说出脑中闪过的一切。至少可以肯定地说，正因如此，分析从各个方面便利了主体退回到这样一条道路：它通向言说中低于承认层面的东西，也就是非常明确地涉及第三项、涉及对象的东西。

你们已经明白，我们正是在这些层面上安置了言说的承认功能。这是什么意思？

这意味着，我们由此辨认出人类言说交换得以展开的两个层面：

- 一是对言说的承认这一层面：言说以某种契约把主体彼此联结起来，主体自身由此得到转变，被确立为人类主体、能够沟通的主体；

- 另一是被传达内容的秩序：它自身可以处在各种层面，从呼唤、严格说来的讨论，到知识，乃至信息；归根结底，它趋向于实现某种就对象达成的共识。

你们感觉得到，共识一词依然在这里；但重要的是要知道，重音在何种程度上落在一个对象上，也就是落在某个被视为外在于言说行动的东西上——总之，言说指称它，甚至最终把它表达出来。

当然，这里的“对象”一词——我们只在它同言说的参照关系中考察它——已经部分地由各种假设预先给定，而这些假设并不全都符合现实。在这个客体性或客观性的系统中，还纳入了构成一个文化共同体的全部偏见，直至包括心理学的各种假设乃至偏见：从科学工作所形成的最精细者，一直到最天真、最自发者。后者无疑同严格说来的科学参照有着广泛交流，甚至渗入其中。

于是，规则所开启的道路恰恰邀请主体彻底放任自己，把自己交给这个系统，也就是交给他所掌握、所拥有的一切：既包括他能够想象为科学系统的东西，处在他对于自身状况、问题与处境所获得的知识层面；也包括最天真的偏见——他的种种幻象，包括神经症幻象，正是建立在这些偏见之上，因为这构成了神经症构成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部分。

说实话，这里仿佛只能作两种判断——整个问题正在这里：要么这条道路选错了；要么出于某种理由，无法另选一条道路，但我们又看不出，这一言说行动中的进展如何能够建立起来，除非诉诸一种智性确信，而它可能来自分析家严格说来具有教育性质、也就是居高临下并施予教导的介入。归根到底，人们谈到分析曾有一个初始状态、一个称作“智性主义阶段”的第一阶段时，瞄准的正是这个东西。至少，人们是这样想象它的。

你们自然可以想到，这个阶段从未存在过；它或许只存在于分析当时对自身所形成的不充分构想中。但这并不意味着，人们在分析之初实际从事的是智性主义的分析，因为真正发挥作用的力量从一开始就已经在那里。况且，假如这些力量当时并不在那里，分析就不会有机会证明自己，也不会作为一种显而易见的心理治疗介入方法而得到引进。

不过，这样解释非常重要，因为你们会看到，在这里所谓的“智性化”，完全不同于仅仅把某物标作智性事物。这个“智性的东西”存在于后来我们所能形成的全部分析构想之中；归根到底，问题始终只在于理论，只在于理解分析中发生的事情。我们对其中所涉的各种问题理解得越好、分析得越好，就越能区分必须区分的东西、联结必须联结的东西，我们的技术也就越有效。这正是我们试图做的事。

所以，问题必定就在这个间隔中：一边，是这种本质性言说行动的理想瞄准点；另一边，是我们实际经过的道路。必定有某种东西，能够以不同于“灌输”的方式解释分析介入的效力。这一点我们都知道；它是我们今天并不［……］的某种东西，也恰恰是经验已经证明在转移作用中特别有效的东西。

然而，晦暗正是从这里开始。因为归根到底，这种转移是什么？你们看到，这里的问题性质已经不同。我们已经理解，就其实质而言，这里所说的有效转移，无非就是言说行动。每当一个人以真实而充实的方式对另一个人说话时，就发生了某种转移；在这个意义上，在场的两个存在者的性质确实发生了改变。

这里说的是另一种转移：这种功能起初不仅作为问题，而且还作为分析中的障碍出现；也就是说，有某种东西发生在想象层面，人们为此构造了你们所熟知的全部说法：

- 旧有情境的重复；
- 无意识的重复；
- 一种行动被付诸实施；它可以被视为历史的重新整合、主体历史的重新整合……但方向恰好相反，即发生在想象层面：过去的情境在当下被经历，而主体对此并不知情，因为历史维度遭到否定——严格说来，也就是被误认。请注意，我没有说它是无意识的，而是说它被主体误认。

不过，这些都是解释，是为了界定处境、界定我们所观察到的东西而提出的说明。它们具有可靠经验观察的全部价值，却仍未由此揭示其理由、功能及其在实在中的意义。为什么会是这样？

你们或许会说，我的要求未免太高，尤其显露出一种追求理论满足的胃口；有些粗暴头脑或许想在这里给我们划出一道界限。首先，分析传统在这一点上——个中必有理由——并不特别缺乏雄心；除此之外，无论是否有理，无论是否受到弗洛伊德榜样的带动，很难说会有哪位精神分析家不曾在某个时刻碰上心智演化问题。

这种元心理学式的事业，事实上全然不可能；其理由稍后会逐渐显露出来。然而，哪怕只实践一秒钟精神分析，却不以元心理学术语思考，也同样是不可能的；这恰如茹尔丹先生，只要开口表达，无论愿不愿意，都不得不说散文。话虽如此，即使不存在我们活动的这个真

正结构性事实，也已经再清楚不过：我们随时都会以最实际的方式重新面对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把转移看作什么。

上一次，我曾提到弗洛伊德那篇收入《技术著作》的《转移之爱》。弗洛伊德的著作极其精省；在一段几乎仅仅同人的生命相称的学术生涯中，他真正处理过的题目，无一不是绝对紧迫而不可或缺的——尤其想到他是在具体的、生物意义上的人生何时才开始这段教学生涯。因此，我们不能不看到，真正最重要的关节点之一，正在于认识这些转移纽带同所谓正面和负面的特征——有时是正面的——之间有什么关系，也就是同严格说来的爱恋关系之间有什么关系；这仍是一件奇特的事。它就这种爱恋关系提出了问题；我也没有向你们掩饰，在弗洛伊德那里，这牵动了爱恋关系的整个问题。

临床经验，同时也是理论史，以及围绕所谓治疗效力的动力而在内部展开的讨论——这大体上是自1920年代以来一直摆上议程的题目：先是柏林大会，然后是萨尔茨堡大会、马里昂巴德大会——所做的始终无非是提出这个问题：当然，我们已经运用了它的力量；那么，在我们对患者主体性的处理之中，转移功能究竟有什么用处？

我们也已经认识到，甚至有某种东西被称作的，不仅是作为疾病分类标签、用来标示患者所患疾病的“转移神经症”，而且是一种可以说是人为形成的次级神经症：它是在转移中把这种转移神经症当下化；也就是“转移神经症”一词的第二种含义——神经症以其丝线，把分析家的想象性人格编结了进去。

这些我们都知道。然而，真正发挥作用的动力究竟是什么——不是我们有时借以行动的道路，而是治疗效力的根本来源——这个问题直到我现在对你们讲话的时期，仍然相当晦暗；至少可以这样说。

关于这个题目，整部分析文献展示出极为纷杂的意见。若要回溯早期讨论，你们只须参看费尼切尔那本小书的最后一章。我很少建议你们读费尼切尔，但在这个场合，就这些历史材料而言，他是一位非常有启发性的见证人。你们会在那里看到各种意见的分歧：萨克斯、拉多、亚历山大——这是萨尔茨堡大会讨论这个问题时的情形。

尤其引人注目的是，你们会看到一种近乎预告的东西：例如那位叫拉多的人宣布，他打算沿什么方向推进理论化，阐述严格说来构成分析效力的东西；奇怪的是，随后却没有履行。他曾承诺作出阐述，把他自认为能解决这些问题的方向白纸黑字地写下来，却从未真正这样做。

某种神秘的阻抗仿佛确实在起作用，使这一问题一直处于相对阴影之中；这似乎不能仅仅归因于题目本身的晦暗，因为在某位研究者或思考者所指出的方向上，有时会突然闪现出耀眼的光亮。

人们确实感觉到，有某种东西已经得到尽可能切近的逼近；它同在场的各种作用中真正有效的东西有关。然而，当人们要阐述那些有时已被看得如此清楚的东西、把它们化为概念时，却仿佛有什么东西在发挥作用，似乎禁止主体触及某种东西；对此，我们可以提出不同假设。

可以肯定的是，心智有时确实会悬停在某些问题之上；而且，也许正是在这里，甚于其他地方，某种仓促、某种过早成熟所带来的危险

——至少是理论的完成，甚至仅仅是理论的推进——可能被感受为一种危险。这一点不能排除。它无疑是最有利的假设。

这里所涉及的东西，也就是我们在这些关于转移中所确立的想象位置之性质的讨论与理论之后续发展中看到显现的东西，同客体关系的观念有着最紧密的关系。你们知道，正是这个观念如今完全走到前景，成为分析观念之富有成效的阐述所面对的当务之急。

你们也知道，理论在这一点上何等犹疑；而且，如果从事情目前抵达的位置来把握它们，要想弄清楚极其困难。例如，读一读詹姆斯·斯特雷奇发表在《国际精神分析杂志》上的一篇文章[注1]。它讨论的正是治疗效力的动力，是一篇奠基性文章，也是阐述得最充分的文章之一；它把全部重音都放在超我的作用上。

> [注1] 詹姆斯·斯特雷奇：《精神分析治疗作用的性质》（The Nature of the Therapeutic Action of Psycho-Analysis），《国际精神分析杂志》第15卷，1934年，第127—159页。德译为《精神分析治疗作用的基础》（Die Grundlagen der therapeutischen Wirkung der Psychoanalyse），载《精神分析国际杂志》第21卷第4期，1935年，第485页。C. 大卫的法译《精神分析治疗作用的性质》，载《解释I：一种变异过程》，法国精神分析杂志专著，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3—64页。

相关知识卡 斯特雷奇的致变性解释

你们会看到，这种构想会带来何种困难；为了围绕这个根本标杆支撑它，使它能够维持并行得通，这位作者——斯特雷奇——不得不引入多少补充假设。例如，他把分析家相对于主体所占据的超我功能，同一种进一步的限定区分开来：这里涉及的是一个寄生性超我。事实上，如果我们承认分析家应当纯粹而简单地充当超我功能的支撑——这个功能原本就已存在于主体那里，而且恰恰是神经症最具决定性的

动力之一——这种构想就绝对站不住脚。如果不引入这个补充观念，我们就看不出如何走出这个循环；但要引入它，又不得不走得太远。

相关知识卡 斯特雷奇的致变性解释

这在斯特雷奇的文章中可以看得很清楚。也就是说，要使这个超我成为一个寄生性超我，在被分析主体与分析家主体之间，就必须已经发生过一系列交换、内摄与投射；它们尤其把我们带到“好客体与坏客体”的构成机制这一层面。梅兰妮·克莱因在英国学派的实践中已经处理过这些机制，而它们自身也并非没有一种危险：让这套过程永无休止地重新生成。

分析者与分析家之间关系的整个问题，处在完全不同的层面；也就是说，它不在超我层面，而在自我与非我的层面，因而非常根本地处于主体自恋经济的层面。与此同时，转移之爱意味着什么这个问题，从来都同对爱本身这一观念的整个分析性阐述过于紧密地联结在一起。

这里所说的爱，并不是作为ἔρως［爱欲］的爱，并不是那种普遍的在场、主体之间的联结力量；它在某种意义上潜藏于分析活动所处的全部现实之下。这里说的是激情之爱：主体实际而具体地把它体验为心理领域中的某种灾变。你们知道，这提出的是全然不同的问题——我在这里先行一步，因为你们还要加以确认——尤其是，这种激情之爱如何、又在哪一点上，就其根基而言同样联结于分析关系。

我已经说过费尼切尔那本书的一些好话，现在也必须说几句坏话。顺便看到费尼切尔先生对于两位作者的评论显出某种反抗，甚至近乎造反，这既有趣又引人注目。那两位作者在分析爱与转移的关系时格外中肯；他们以最大限度强调了想象性爱恋关系的这种自恋性特征：被

爱对象的品质、属性，以及它在心理经济中的作用，有整整一个侧面都同主体的自我理想相混同。

在这里，人们奇怪地看到，费尼切尔先生思想中那种普遍的折衷混合、他所采取的某种中间道路，同他在悖论面前的某种厌恶结合起来；他对于这一类想象性爱恋存在一种真正近乎恐惧症的反应，因为这种爱归根到底、当然就其根基而言，属于某种本质上的幻象。

人们看到，费尼切尔先生在这里几乎怀着某种恐惧停下脚步，甚至常常仿佛贬低了爱这个功能本身；然而，问题恰恰正在这里：这种爱是什么？当它作为一种想象性动力出现在分析中时，它是什么？这件事标示出同此人之主体结构的一种深刻关联。

所涉及的正是这一点：在下列三者之间，我们能够定位出怎样的观念、范畴、力线和结构：

- 我们在分析理论中所运用的自恋关系；
- 最一般意义上的爱之功能；
- 以及在实践效力中的转移。

为了就此说出一些能让你们在每个岔路口反复出现的歧义之间辨明方向的话，我想，只要你们稍稍接触过分析理论文献，就已经注意到，这种歧义每一步都会重新出现。

方法不止一种。［……］我想以这种方式教给你们：引入某个新范畴，便能作出一些本质区分；这些区分不是外在的、经院式的区分，不是在外延上用某个领域反对另一个领域，也不是把二分法无限增

殖。这样的推进方式永远是可行的，也就是不断引入补充假设；但我们所要的反而是在内涵上推进，即彰显那些简单而既存的观念所蕴含的东西。

把“转移”观念无限分解并无益处，尽管人们可以这样做，而且有一项极其出色的工作已经这样处理过转移观念。相反，保留这个观念完整的经验总体才有益；但同时也要理解，它具有多个侧面，具有多重效价，同时在多个语域中发挥作用，也就是在象征界、想象界与实在界所引入的东西中发挥作用。它们并不是三个领域。

我已经向你们举过几个具体例子，甚至在动物界中，你们也已经看到：正是在同样的行动、同样的行为上，我们才能区分出想象界、象征界和实在界的功能。之所以能够作出这种区分，是因为这里所涉及的并不只是某种可以化身为行为的东西；这些功能并不处在同一种关系秩序中。

引入这个观念的方式不止一种。它同任何教条式讲述一样具有自身限度；它的用处则在于具有批判性，也就是在研究者具体的经验性努力遭遇既有理论的运用困难之处介入。正因如此，沿着文本评注这条道路推进才显得有趣。

如果我们亲爱的利布许茨［勒克莱尔］愿意——他本来应当带来自己的小稿——只须考虑到：即使他还没有把自己原来……以为今天必须做的工作完全阐发出来，只要把现有内容交给我们，我们就更容易围绕他对开头几页的初读作出回应。比如说，至少出于这一点、这一项用处：不要由我来读这篇文本——麻烦在于，不可能每个人都已经读过；大多数人没有读——您愿不愿意读一读这篇自恋文章的开头几

页，读出那些在您看来突显了弗洛伊德思想之一个环节的关节点或转折处？

塞尔日·勒克莱尔

我只读了前十页。需要把它放回它所处的时代，但这对我很困难。在开头这几页中，自恋观念经历了几种不同表述。他首先排除了把自恋看作倒错的观念，也就是把它界定为对自身身体的爱，爱它的方式同爱另一个人的身体一样。他就是这样界定的——至少，他这样引述，却没有说出名字。

拉康——他这样做，是为了把它排除掉。

塞尔日·勒克莱尔

为了把它排除掉，我说的正是这个。也就是要认为，自恋还作为力比多的一种形式存在于许多其他行为中。在我看来，我们很快就抵达了下面这个自恋定义——我稍后或许会再谈促使他这样界定自恋的理由：自恋就是从外部世界撤回、再转投到自我之上的力比多。我的印象是，这就是这篇自恋文章的基本定义。

拉康——您为什么说“从外部世界”？

塞尔日·勒克莱尔——“Außenwelt［外部世界］。”

拉康——您所说的 Außenwelt，是在他采用伪足与原生质这个类比的时候……

塞尔日·勒克莱尔——是在稍前一点。

拉康——那个类比把它引了出来。

塞尔日·勒克莱尔

不完全是。归根到底，如果我对第一遍阅读理解得不错，那么推动他提出并表述一种自恋理论的，是人们已经不得不考察：怎样才能把对早发性痴呆和精神分裂症的研究纳入力比多理论。

事实上，正是这一点使他觉得自恋理论的阐述变得紧迫。我认为，他正是从这些临床考量出发，首先把这些精神病患者的行为，同神经症患者——主要是癔症患者——的行为区分开来。由此，他恰恰抵达下面这个表述：在神经症患者那里，从对象撤回的力比多，似乎投注于、或者仍然可以自由地投向想象性对象，至少是投向某些对象……是的，想象性对象。

这就是他所谓的妄想痴呆患者的情况。他说，精神分裂症患者却不是这样：后者仿佛已经从外部世界的人和事物那里撤回全部力比多，却没有把它投注于幻想、投注于幻想性对象。正是在这之后，他才抵达自恋的这个定义：力比多从外部世界的对象和事物撤回，转投到自我之上。由此，我们恰好抵达他认为根本的区分：客体力比多与自我力比多；不过他也说，这只是一项假设。

当然，在他看来，这项假设以其研究神经症患者的临床经验结果为根据。我的阅读主要停在这里，因为我要提出下面这个问题。

拉康——就是这样，提一个问题吧，今天已经够了。

塞尔日·勒克莱尔

我想依据他的文本把问题表述出来，不愿意脱离文本来提问。总之，经过这些考量，他把一种性能量——即力比多——同一种自我能量区分开来。不过，在继续推进以前，他恰恰提出了两个问题，至少想要触及两个问题。第一个是："自体性欲中的自恋会变成什么？"此前他把自体性欲描述为力比多极为原始、原初的一种行为或表现。这是他提出的第一个问题，非常重要。他稍后会作出回答。

第二个问题在我看来也非常重要："难道不能限制这一区分吗？"我不想讨论第二个问题，因为他回答的是第一个。第一个问题是："自体性欲中的自恋会变成什么？"他的回答是，他认为有必要在个体中辨出一个不同的统一体；至少它必然有所不同，因为自我必须是某种发展过程的结果，因而在他看来，自我已经是某种次级之物。相反，自体性欲驱力……

拉康

请允许我打断一下？我要引出您没有引用的内容。您刚才说的完全正确。利布许茨［勒克莱尔］正在向你们说明的问题是：某个发生在力比多层面的东西——某个 x——同那种外部世界投注的撤回之间存在关系；后者正是各种早发性痴呆形式的特征。这里所取的含义可以像你们所能设想的一样宽泛。

问题在这里变得最尖锐，因为用这些术语提出问题，会给当时已经存在、已经构成的分析理论造成极端困难。这关联到《性学三论》，原初自体性欲这一观念正是以它为参照。力比多仿佛通过某种逃逸、延伸、伸出伪足，从这种自体性欲中分配开来；主体发出其力比多投注，这种力比多由此形成自体性欲的兴趣对象。主体的本能进展，将

依照其自身的本能结构，并经由某种对世界的阐发，在不同形式与阶段中构成。

这一切看起来不言而喻；在这个阶段，弗洛伊德已经为力比多给出自己的定义，把一切可能属于严格的力比多语域以外其他语域的东西都留在力比多机制之外。他界定并安置的，是作为欲望本身的欲望；它仿佛是所有具体表现为性之物的延伸，又像动物存在同 Umwelt［周围世界］之间一种绝对根本的二元关系。

在这种构想中，一切都被两极化。弗洛伊德始终非常清楚地感觉到，如果以任何方式中和这个观念，把它过度泛化，这种构想就行不通。可以肯定，如果把它看成同雅内先生所谓的“现实功能”大致相同的东西，那么对于神经症事实的阐述，什么也没有得到解释，什么本质性的东西也没有被带入。

在现实的或实现性的关系内部，在同欲望功能毫无关系的一整套功能内部——也就是涉及自我同外部世界的全部关系，涉及性语域以外其他本能语域的一切，例如整个营养、同化和饥饿领域，只要这些功能服务于个体本身的保存——力比多关系和力比多，正是处在由这些非常现实的关系构成的更广阔、更一般的背景之中。

如果不把力比多从个体保存功能的总体中分离出来，它就会失去一切意义。

恰恰是因为精神分裂症中发生了某种东西，彻底扰乱了主体同现实的关系，并且可以说把背景与形式淹没在一起，才会突然提出这个问题：力比多撤回理论所抵达的地方，是否远远超出那个围绕严格说来

的性关系组织起来的核心——最初正是从这个中央的组织核心出发，力比多才得到界定。

问题正是从这里开始提出。它提出得如此鲜明，以至在历史上，这一步其实已经迈出。等我们分析施雷伯主席个案的评注时，我会向你们说明这一点。弗洛伊德在评注施雷伯这篇书面文本的过程中，不得不意识到精神病中力比多投注问题所造成的困难。他在那里使用了一些颇为含混的观念，以至荣格能够说：弗洛伊德已经放弃其本能发展理论之根本功能所严格具有的力比多性质和性性质——也就是一种被称作“力比多”、本质上具有性性质的单一力量。

荣格迈出了这一步，引入了内倾观念；在他那里——正如弗洛伊德所说，这是弗洛伊德对他的批评——它表现为一个 ohne Unterscheidung，即毫无区分的观念，最终抵达了含混而一般的“心理兴趣”概念。你们看到，它把真正属于个体朝向其对象的性两极化之秩序的东西，同个体对自身的某种关系，一并淹没在单一语域中。后者属于力比多秩序；弗洛伊德说，它完全围绕着个体作为拥有生殖功能者的实现而得到集中和组织。

正因如此，我说这个问题在历史上已经提出，它由荣格的内倾观念引入。你们可以看到，当时的精神分析理论怎样向这种对问题的中和敞开：一方面，人们极力肯定这里涉及的是力比多；另一方面，却又说这只涉及某种属于心灵的东西，因为心灵会创造自身的周遭与世界。

而且，这一点同分析理论极难区分，因为归根到底，在当时，除去刚才那个指征，从自体性欲出发逐渐构成全部对象的观念，在弗洛伊德思想的这个阶段，就其结构而言几乎等同于荣格的理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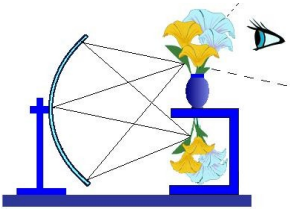
正是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这也是文章的理由之一——弗洛伊德重新强调，必须严格区分属于自我性力比多的东西与属于性力比多的东西，并维持这一区分。这个问题对他来说极难解决，因为他一面维持区分，整篇文章却又始终围绕二者的等价性打转。

二者怎样才能既得到如此紧密而严格的区分，同时我们又能保留它们之间某种能量等价性的观念？正是因为力比多从对象撤回，它才返回并转投到 ego［自我］之中。这就是整篇文章所提出、展开的问题；文章在一切可能从持续进行的经验中找到判准的层面上，把它推进到具体阐述的程度。让我们先确立利布许茨［勒克莱尔］刚才引入的这一点：弗洛伊德由此不得不把自恋构想为一个次级过程，并强调某种可以同自我相比的统一体并非原初就存在，nicht von Anfang［并非从一开始］，在个体中并非自始就在场。Ich［自我］必须发展起来，entwickelt werden。

相反，自体性欲的倾向与驱力从一开始就在那里。Urbild［原型］。他借助自我之 Urbild 究竟可能是什么这个观念引入了这一点，却没有真正加以解决。稍微熟悉我通过镜像阶段带给你们的东西的人，应当能够理解它同“一个统一体”这个观念之间的类比。弗洛伊德已经把这一点表述出来。

这证实了我借助镜像阶段教给你们的这类构想有其用处：在一个得到明确规定的时刻，这个可以同自我相比的统一体才构成；它将成为那个 Urbild［原型］，自我从它出发开始构成自身功能。从此以后，人类自我由某种关系构成，也就是这种想象关系、这种想象功能。我希望，在接下来的两三次讲座中，你们能够看到关于它的若干进一步说明，明白我们必须怎样以既有限定又彼此区分的精确方式运用它；你

们还会看到，它具有复数性。前几天，我先从围绕实像——即花束——给你们画出的图式开始，初步指示了这种想象功能是什么，至少说明它怎样充当个体亲历之复数性的容器。



但事情并不限于此，你们会看到为什么：恰恰因为必须区分精神病与神经症。在镜像阶段中牵涉到两个语域。这一点我还没有教给你们；在弗洛伊德这篇文章的光照下，你们会看到为什么这一点必不可少，也会看到它如何能够得到运用，而且得到单纯、切实的运用。

他把自我的这种想象功能界定为必须具有 eine neue psychische Gestalt［一种新的心理格式塔］。我们也可以说，这恰好顺着我向你们说明的方向，即 Gestalt 的功能、形式构成的功能，以及想象性构成的功能。neue psychische Gestalt 所指的，正是在发展中的某个时刻、在心理的发展中出现的某种新东西。若不诉诸自我功能的这种想象性起源，又有什么能够赋予自恋以形式？

你们会在这篇文本的进程中看到由此抵达的全部死路。因此，问题正是在这个层面提出。这篇文本开头的重要之处在于：弗洛伊德很难捍卫精神分析动力学的独创性，使之抵御一种东西；我甚至不把它称为泛化，而称之为“荣格式的问题消解”。

我恰恰要指出：一旦采用“心理兴趣”这个一般图式——兴趣来来去去，出而复入，为事物着色——问题归根到底便依照一种极其传统的

思想视角而被化约。它抹去了正统分析思想的差异，重新落入传统思想，把荣格关于世界构成的全部阐发之底层岩浆淹没在某种普遍幻象中。剩下的无非是一种交替的照明：随着主体之心理活动的脉动，它可以来去，可以投向现实，也可以从现实撤回。这是一个漂亮的隐喻，实际上却什么也没有照亮。正如弗洛伊德所强调的，它尤其无法说明：遁世者能够达到的那种对世界兴趣的撤回，同我们在精神分裂症患者那里看到的结果之间究竟有什么差别；后者在结构上全然不同，它并非得到引导、撤回或升华，反而完全胶着其中。

可以肯定，荣格式探索在临床上带来了许多东西；它以自身的生动色彩和风格显得有趣，例如把某种心智或宗教苦修的产物，同精神分裂症患者的产物相互比照。这或许具有一项好处，能够让研究者的兴趣获得色彩和生气；但在机制层面，它无疑什么也没有阐明。弗洛伊德在行文中也不忘相当尖刻地强调这一点。

对弗洛伊德而言，问题在于让人把握下列二者之间存在的不同区分：

- 我们在一种特殊形式和结构中，也就是在神经症中观察到的这种“从现实撤回”；
- 以及我们在精神病中观察到的另一种撤回。

出人意料的是——至少对于那些没有特别紧盯这些问题、没有同这些问题搏斗过的人来说是如此——弗洛伊德告诉我们，一个主要而根本的区分在于：在神经症患者对现实的这种误认、拒绝和阻挡中，我们观察到某种他本人界定为诉诸 Phantasie［幻想］的东西。

这里有一种功能：在他的词汇中，它不可能不被归入一切属于想象语域之物的秩序。我们一旦知道，神经症患者周围的人和事物怎样相对于某种功能而被完全赋予价值，自然立刻就会回到这一点。没有什么妨碍我们最直接地［把它称作］……不必另找一套关于这个词在语言中意味着什么的更精细理论……“想象的”；它完全可以被称作想象的，取“意象”一词所具有的含义：

- 第一，它同那些构成主体的认同之间的关系；这就是“意象”一词的充分含义；

- 第二，相对于实在而言，这种幻象性特征正是想象功能最常受到突出的一面。

然而，真正引人注目的是——无论正确与否，此刻对我们并不重要——弗洛伊德强调，精神病中没有任何类似的东西。那么，这个失去了对实在之实现的主体，也就是精神病者，究竟意味着什么？弗洛伊德告诉我们——这无疑正是他所强调的——精神病者没有找到任何想象界的替代物；这就是精神病者有别于神经症患者之处。

初看之下，这可能显得不可思议。你们清楚感觉到，要跟上弗洛伊德的思想，仍须在概念化上迈出一步。因为我们通常把什么称作一个陷入妄想的精神病主体？最流行的构想之一，正是认为精神病主体在做梦，完全沉浸在想象界中。因此，在弗洛伊德的构想中，想象功能必定不只是非现实功能的同义词；二者完全不同。否则，我们就看不出他为什么会拒绝精神病者通达想象界。

而且，弗洛伊德先生通常知道自己在说什么，我们至少应当尝试阐发、理解并深入探究他在这一点上想说的东西。你们会看到，正是这

一点将把我们引向一种最为连贯的构想，以把握想象界与象征界最根本的关系。

因为我可以说，他最有力地承载这种结构差异的地方之一，就在这里：在精神病者所特有的这种“世界重建的需要”中，首先得到投注的会是什么？你们将看到，这把我们带上一条多么出人意料的道路——我想，对你们许多人都是如此——首先得到投注的将是词语。到了这里，你们不可能认不出象征界这个范畴。

这样，我们就会得到下面这个结果。我们能够进一步推进这项批判已经起头的东西：精神病者的特有结构，会处在一种非现实的象征界中，或者说处在一种带有非现实印记的象征界中；而想象功能则位于全然不同的地方。

由此，你们开始看到，在把握精神病的位置时，荣格先生与弗洛伊德先生之间存在怎样的差异。因为对于荣格先生来说，象征界和想象界这两个领域完全混同；而弗洛伊德这篇文章让我们首先突显出来的环节之一，恰恰是二者的严格区分。你们会看到，这篇文章还包含更多其他东西。

今天只是给这些问题起一个头。不过，面对如此重要的事情，起头再慢也不为过。因此，如果今天我只是为你们“引入”了若干从未得到提出的问题——正如文章题名本身所表达的：Einführung［导论、引入］——这会给你们时间，让你们在下次以前慢慢酝酿，稍作思考。

下次，我希望得到我们的朋友勒克莱尔尽可能有效的协作。我也很愿意让格拉诺夫参与进来；他似乎有一种特殊倾向，对弗洛伊德那篇

《转移之爱》格外感兴趣，仿佛受到了它的触动。［对格拉诺夫说］这可以成为您发言的机会，由您专门引入这篇文章。

还有第三篇文章，我想找个人在以后某次负责；它属于同一时期的元心理学，同我们的对象关系密切。它就是《梦学说的元心理学补充》——法文把它译作《梦的学说》。我想把它交给任何愿意承担的人，例如我们亲爱的佩里耶；这也会给他机会就精神分裂症患者这个题目发言。你们可以提前读一读这篇文章；它的题名所标示的起点，通向我们今天才刚刚引入的全部问题。

第11课 · 1954年3月24日

勒克莱尔

塞尔日·勒克莱尔

您曾问我，这篇文本［《论自恋：一篇导论》］是否让我感兴趣。是否感兴趣？是的。不过，要把它重新放回其思想视野、放回它的时代和弗洛伊德其余著作之中，我感到为难。我同佩里耶读了一些，也同安德烈·莱曼读了一些；我想，大家都感到为难。其中有些观点和表述看起来已经过时，读到那里会停下来。而且，本来还应当把其他一切能够同它联系起来的此前与此后文本重读一遍。

上一次，我确实尝试概括了开头三四页；在我看来，它们很重要。谈论这篇文本有不同方式：可以逐步跟随，也可以作自由评注。但我认为，作自由评注不是我的职责，所以我会逐步跟随文本。

拉康——好。

塞尔日·勒克莱尔

考虑到它的构造，这并不那么容易。文本分成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恰恰引入我们上次提出的东西，即一种性能量与一种自我能量之间的根本区分。我认为，正是围绕这一区分，他不得不展开关于自恋的讨论。

弗洛伊德告诉我们，他在另一处被引向了这个结论、这个假设：在下列二者之间作出根本区分：

- 一种性能量：力比多；
- 以及一种自我驱力能量。

我说“自我驱力能量”，因为他就是这样命名的；但他立刻又说，从对象投注发生的阶段或时刻出发，这两种能量并不能得到区分。因此，在自恋状态中，这两种能量不可分离。正是由于这一区分，他被引向了对自恋的研究。人们曾经把自恋看作一种倒错，但他在本文中的第一个定义是：这里涉及利己主义的一个力比多要素，而这种利己主义是［……］所固有的；他又把［……］连接到［……］原初自恋。

围绕这篇文本，他反复提出的恰恰是性能量与自我能量之间的这个根本区分。他试图安置自恋，并以这些术语来安置它：这里涉及的是对自我的力比多投注。那么，这种对自我的力比多投注从何而来？“对自我的力比多投注”这个词本身——而且依他看来——已经会提出若干问题，因为它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由于投注和自我的存在，在这里进行投注的究竟是哪一种能量？

显然，这个问题［……］，因为这种投注从何而来？它可以来自对对象的力比多投注之撤回。而且，他最终正停在这个表述上，给出次级自恋的定义；他面对的事实，恰好就是一种通过撤回对对象的力比多投注而发生的次级投注：力比多从对象撤回，转移到自我之上。然而，他还向我们谈到另一种构想，即对自我的原初力比多投注。

依据对儿童行为的观察，他在那里看到——同时马上又告诉我们：事情正是从这里复杂起来——这种对自我的原初力比多投注，就是后来转投到对象之上的东西。经过这些不同追问，我们又抵达了性能量——即力比多——同自我驱力能量之间的根本区分。到这里，不能说这是一段严密的推演。而且，我们上次提出的两个问题，在这里仿佛以插入语形式出现，却极为重要：它们涉及原初自体性欲与自恋之间的关系。

我们上次提出的问题，正是我曾经强调的这个关节点，也就是下面这句话：

“必须存在一个预先存在的统一体，一个先于自我的统一体，因为自体性欲是一个完全原始的事实……”

[Zur ersten Frage bemerke ich: Es ist eine notwendige Annahme, daß eine dem Ich vergleichbare Einheit nicht von Anfang an im Individuum vorhanden ist; das Ich muß entwickelt werden. Die autoerotischen Triebe sind aber uranfänglich; es muß also irgend etwas zum Autoerotismus hinzukommen, eine neue psychische Aktion, um den Narzißmus zu gestalten.]

[关于第一个问题，我要指出：必须作出这样的假设，即个体中从一开始并不存在一个可与自我相比的统一体；自我必须发展起来。不过，自体性欲驱力自始便已存在；因此，必须有某种东西加入自体性欲，即一种新的心理行动，才能塑造自恋。] [注]

> [注] 第16段中勒克莱尔的法文概括说“必须存在一个先于自我的统一体”，而本段紧随其后的德文原文说“从一开始并不存在一个可与自我相比的统一体”。译文分别保留二者，没有用德文原句反向改写发言者的概括。

弗洛伊德说，这一区分来自对神经症患者的观察；但把性驱力与自我驱力分开的构想，并不是严密论证的产物，而是一项假设。他还强调，理论只具有完全相对的价值。

拉康——他怎样为它辩护？

塞尔日·勒克莱尔

他提出了几个论据。他说，这项理论能够得到确认，这种根本区分的理论能够在某些论据中得到确认。例如，通俗说法中饥饿与爱的区分。也可以在某些生物学观念中，以及个体同时在生物学层面与个体层面上的双重发展中找到根据。这里我只是概括……

拉康

不，不。不要概括！恰恰这一点很有意思。如果你们还记得我上次怎样介入，那正是为了指出这一点。您谈到了这篇文章的历史处境。我曾告诉您，这篇文章同这个时期的大多数、几乎全部文章一样，写在1914年战争开始之际。想到弗洛伊德当时仍在继续这整套阐发，确实相当动人。《论自恋：一篇导论》发表于1914年；此后的一切，尤其整个元心理学——也就是我们归入这个标题下的全部作品——将在1914至1918年间展开。它紧接着荣格1912年著作的问世；法文把那部著作译作《力比多的变形与象征》。

他在这里提到了战争，因为他使用了荣格推行的“内倾”一词，把它概括地用于整个精神疾病谱系……你们知道，荣格处理这些疾病的进路同弗洛伊德全然不同：荣格的经验以精神分裂症谱系的研究为主要重心，而弗洛伊德的经验则以神经症患者为中心。

荣格在这时提出一种宏大的心理能量统一构想；无论就灵感还是就定义而言，它同弗洛伊德以力比多一词阐发的观念都有根本差异。然而，当时的理论差异还难以划清，以至弗洛伊德不得不同某些困难搏斗；整篇文章恰好反映了这一点。

这是一种尝试：要把力比多观念维持在一种界定清楚、用今天的话说具有"操作性"的用法中；还要维持这样一个理论观念。后者因弗洛伊德发现的突出地位而形成，而这项发现归根到底以如下把握为基础——这就是根本把握：神经症患者的症状中，实行着一种迂回形式的性满足。

弗洛伊德曾就神经症患者的症状说出这一点，并以一系列等价关系作出具体证明；最后一项等价关系就是治疗性的验证，而且是很有分量的验证。［……］这无疑不是弗洛伊德喜欢诉诸的术语，因为弗洛伊德始终坚称，他带来的不是一种新的、总体性的世界哲学，而是某种得到明确界定并有其根据的东西。它立足于一个受到严格限定而又全新的场域，即对若干尤其具有精神病理性质的人类现实的探索；这些是次常态现象，也就是普通心理学没有研究的现象：梦，以及主体某些所谓高级功能中的障碍、失误和口误。弗洛伊德清楚感觉到，现在提出的问题正是精神病的结构：怎样依据一般的力比多理论来阐发精神病结构。

荣格提出的解决办法是：精神病中表现出来的现实之深刻转变，源自弗洛伊德在神经症问题上已经隐约看到的某种东西，即力比多——这个已经得到区分的术语——所发生的这种转变、严格说来的这种变形。力比多内倾到主体的内在世界之中，而这个内在世界在本体论上

一直极其含混；正是它要为现实在该主体那里沉入某种暮色负责。这样，我们便能够在一种完整连续性中构想精神病与神经症的机制。

弗洛伊德始终紧守从经验中得出的、数量极少而精确的机制，极为关注自己的经验参照，因此看到了这种问题把握方式带来的危险。他看到这一切会变成某种庞大的心理泛神论：一系列想象性的领域——无疑也同样是虚构出来的——彼此包裹；它们显然有助于把个体生活中的内容、事件与 Erlebnis［亲历经验］一路分类，直至荣格所谓的“原型”。

人们清楚感觉到，若要继续对研究对象作一种尤其临床性、精神病学性的构想，就不能走这条道路。因此，弗洛伊德这时试图批判下列驱力彼此之间可能具有怎样的参照关系：

- 一方面，是性驱力；他之所以给予它们如此重要的位置，是因为它们曾遭隐藏，也因为正是分析揭示了它们；
- 另一方面，是他此前一直留在阴影中的自我驱力，而现在受到质询的恰恰正是它们。

也就是说：

- 它们究竟是不是这样一种关系：其中一方在某种意义上只是另一方的影子？
- 全部现实是否都由这种普遍的力比多投射构成，而它正处在荣格理论的根基？
- 抑或确有这样一种差异、这种对立——它构成弗洛伊德神经症构想的全部价值——也就是自我驱力与力比多驱力之间的对立关系、冲突关系？

弗洛伊德以其一贯的诚实明确说出：

- 归根到底，他之所以坚持维持这一区分，是以其神经症经验为根据；
- 归根到底，这只是一种有限的经验；如果考察更广泛的事实总体，它的价值很可能发生变化。

正因如此，他也同样明确地说，在原初阶段……

即在我们严格说来的精神分析探索所能深入的范围以前的阶段

……至少必须说，两者处在——这是他的明确说法——ununterscheidbar［不可区分］的状态中；以我们的分析经验，还无法对它们作出充分分析或剖分。

[Endlich folgern wir für die Unterscheidung der psychischen Energien, daß sie zunächst im Zustande des Narzißmus beisammen und für unsere grobe Analyse ununterscheidbar sind und daß es erst mit der Objektbesetzung möglich wird, eine Sexualenergie, die Libido, von einer Energie der Ichtriebe zu unterscheiden.]

[最后，就心理能量的区分而言，我们推断：最初在自恋状态中，它们处在一起，对我们粗略的分析来说不可区分；只有随着对象投注发生，才有可能把一种性能量——力比多——同一种自我驱力能量区分开来。]

这里仿佛存在一个阶段：以我们目前的手段，无法辨认这两种不可解地混合在一起的根本倾向。它们 beisammen［处在一起］，最初混同于自恋状态中；对我们粗略的分析而言，并非 unterscheidbar［可区分的］：不可能把 eine Sexualenergie［一种性能量］即力比多，同 Energie der Ichtriebe［自我驱力能量］区分开来。

[Wir würden dann sagen: Der Kranke zieht seine Libidobesetzungen auf sein Ich zurück, um sie nach der Genesung wieder auszusenden. »Einzig in der engen Höhle«, sagt W. Busch vom zahnschmerzkranken Dichter, »des Backenzahnes weilt die Seele.« Libido und Ichinteresse haben dabei das gleiche Schicksal und sind wiederum voneinander nicht unterscheidbar. Der bekannte Egoismus der Kranken deckt beides. Wir finden ihn so selbstverständlich, weil wir gewiß sind, uns im gleichen Falle ebenso zu verhalten. Das Verscheuchen noch so intensiver Liebesbereitschaft durch körperliche Störungen, der plötzliche Ersatz derselben durch völlige Gleichgültigkeit, findet in der Komik entsprechende Ausnützung.]

［那么，我们就会说：患者把自己的力比多投注撤回到自我之上，以便在痊愈以后再次把它们发出去。W. 布施谈到一位牙痛的诗人时说："灵魂只栖身于臼齿那狭窄的洞穴里。"在这种情况下，力比多与自我兴趣有着同样的命运，二者又一次无法相互区分。患者那种众所周知的利己主义覆盖了二者。我们认为它如此不言而喻，因为我们确信，自己在相同情况下也会采取同样行为。身体障碍会驱散哪怕极其强烈的爱之准备，并突然以完全冷漠取而代之；喜剧也相应地利用了这一点。］

因此，他把整个问题集中在精神病问题的层面。但从一开始，他就要告诉我们，为什么仍试图维持这项区分。第一个问题以神经症经验为基础。他提出的第二个问题则是：当时、在那个阶段，自我驱力与性驱力的区分尚不清楚；依他所说，这或许只能归因于一点——我们在经验中以自我驱力和性驱力之名开始阐发的东西，归根到底正是我们理论最后的参照点，也就是那些著名的驱力。

它们并非真正处在我们构造的基础，反而处在最高处。也就是说，他本人强调，驱力、Triebe　这个观念本身就是一个高度抽象的观念，也是他后来会称作我们的神话学的东西。当然，他以自己力求具体的精神——无论这是否符合他的个人倾向——始终把自己那些思辨阐发准确安置在应有位置；他深知它们的有限价值，也明确指出这一点。他把它们同物理学中同样最为高阶的观念相参照；他非常清楚地说，在物理学史上，物质、力、吸引等观念也只是在历史演化过程中才得到阐发，最初都具有某种不确定、甚至混乱的形式，而后才达到使其能够得到完全精确运用的纯化程度。

[Diese Ideen sind nämlich nicht das Fundament der Wissenschaft, auf dem alles ruht; dies ist vielmehr allein die Beobachtung. Sie sind nicht das Unterste, sondern das Oberste des ganzen Baues und können ohne Schaden ersetzt und abgetragen werden. Wir erleben dergleichen in unseren Tagen wiederum an der Physik, deren Grundanschauungen über Materie, Kraftzentren, Anziehung und dergleichen kaum weniger bedenklich sind als die entsprechenden der Psychoanalyse.]

[事实上，这些观念并不是科学赖以安立的基础；唯有观察才是这样的基础。它们不是整个建筑的最底层，而是最高处，可以毫无损害地被替换和拆除。今天，我们又在物理学中经历着同样的事情；物理学关于物质、力的中心、吸引等的基本构想，并不比精神分析中与之相应的构想少受质疑。]

因此，他明确指出，在维持自我驱力与性驱力的对立时，所涉及的无非也是这种情况。他将在这篇文章——《论自恋：一篇导论》（Einführung des Narzißmus），也就是“为引入自恋观念”——中致力于阐发并深入探究这些观念。正是在这里，当他明确说所要做的是阐发这些观念时，也为我们正在做的工作留下了开放入口。我们不是跟随在他身后，而是陪伴他推进；因为某些观念即使存在于弗洛伊德著作的某处，也不等于人们后来运用、传播和重复它们的方式始终真正恰当，始终符合弗洛伊德所指示的研究精神。我们自己也正试图在这个研究方向中服从他的口令、他的风格。

这时，他引入一个根本观念作为参照：生物学本身——至少生物学在他那个时代已经达到的演化阶段——向我们表明，当时“本能理论”中

令我们惊讶的东西，不能不考虑下列二者之间某种扩散、某种根本二分：

- 保存个体的目标或目的；
- 以及延续物种的目标或目的。

可以肯定，这里作为背景存在的无非就是——而且文本还明确提到了——你们理应熟悉的那些理论；哲学课那一年，你们想必还留有一点印象：魏斯曼的理论。因为魏斯曼的理论仍未得到最终证明：性细胞具有一种不朽的物质；在它们生成之际，便已从谱系中前一个体之性细胞的细胞核里直接分化出来，由此构成一条绝对连续的生殖谱系。细胞持续繁殖，其中一部分沿着谱系分化成性细胞；［……］原生质因而成为某种从一个个体到另一个个体不断延续、持存的东西。

相关知识卡 魏斯曼的种质连续性与种系—体细胞区分

相比之下，体细胞原生质的总体，即魏斯曼明确所说的 soma［躯体］，则表现为一种个体寄生物：它从物种繁殖这一点侧向生长出来，唯一目的就是运载永恒的种质，通过个体的相继更替将它传给物种。弗洛伊德在这里立即以如下限定支撑自己的参照：他的构造无疑不是、也不声称是一种生物学理论。这个参照对他具有怎样的临时价值并不重要；在另有新证以前，他仍愿意依靠它，但要保留复核。倘若分析探索自身领域中的事实在不断展开后，使生物学参照变得无用，并且能够在其探索得以界定的事实场域内奠定某种东西，从而使这一外部参照不仅无用而且有害——［……］他把这个参照明确规定为取自另一场域的极限参照——那么，他会毫不犹豫地放弃它。

相关知识卡 魏斯曼的种质连续性与种系—体细胞区分

不过，他说，这仍不是一个理由，让我们把他迄今一直追踪其路径与道路的这种 Sexualenergie［性能量］、这种力比多，淹没在尚未得到探索的心理事实场域里，淹没在它同我们所能看到的一切心理表现之间某种普遍亲缘关系中。依他说，若要继续分析具体事实，这样做的结果会同下面的情形完全相仿——他给出的参照尤其典型：仿佛我们必须裁定一桩遗产案件，某人需要在公证人面前证明自己的继承权，却为此援引那种无疑把所有人彼此联结起来的普遍亲缘关系——至少在单一起源假说下确实如此。

这个类比似乎非常典型地体现了弗洛伊德在这个题目、这个关节点上的思想。不过，我想围绕这个参照引入一项简单评论；它的性质不同于我们通常就这个题目所作的评论，或许会令你们感到突兀。

但你们会看到，它终究会立刻触及我们问题的核心；我们的问题恰恰是要给弗洛伊德持续进行的这项阐发——更准确地说，这场讨论——带来更多清晰性。单单通过对开头几页的评注，你们已经看到，它的晦暗与死路在这里没有受到任何掩饰或缓和。不能说这篇文章带来了一项解答；相反，它带来的是一系列开放问题。

而我们正试图置身于这些问题之中。既然已经被带到这个领域，我们就稍停片刻，向自己提出几个问题。这些问题更有意义，因为——你们马上会看到——它们今天并不完全悬在空中，毕竟本能理论从那以后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

正如弗洛伊德在某处告诉我们的，在他写作的年代，我们遗憾地没有一套现成的本能理论，没有一套 ready-made［现成品］、prête-à-porter［成衣］。它在当时并非可以直接穿用，直到今天仍然没有真正达到

这个程度。不过你们知道，从洛伦兹的工作到廷伯根，我们毕竟迈出了几步。这正是我下面要向你们提出的评论——或许略带思辨性——之所以有理的地方。让我们紧紧跟随生物学家，更准确地说，跟随生物学观念向心理学家和人类学家显现的方式。

如果我们承认魏斯曼关于种质不朽的观念有效，会得出什么结果？假如我们这样思考这个发展着的个体：他同构成种质的根本生命物质彻底分离，而后者并不死亡；那么，在种质传播生命的过程中，这种个体寄生物发挥什么功能？

非常清楚，在这个语域、这种把握生命现象的方式中，严格说来，个体作为个体所扮演的角色，同这种传播确实毫无关系。从物种的观点来看，这些个体可以说已经死了。在每个个体的层面，这个个体同隐藏在其体内的那种不朽物质相比什么也不是；只有这种物质不断延续，才有权真实而实体性地代表作为生命而存在的东西。

我再把自己的想法说得明确些。现在我们从心理学观点出发：这个个体将受到那个著名的性本能驱动；他要传播什么？无非是包含在严格说来的种质原生质、生殖器官中的这种不朽物质；在脊椎动物层面，它由精子和卵子来代表。

但得到传播的正是它，而且只有它。事情到此为止吗？当然不是。实际传播的是一个具有这种功能的个体。一个具有这种功能的个体是什么意思？这是一个进行繁殖的个体，但他不是作为个体繁殖，而是作为类型繁殖。本能理论实际上把我们带向的正是这一点。

也就是说，承载性本能、构成其具体心理动力、决定那套庞大机制开始运作的东西——洛伦兹之后，廷伯根称它为触发物——根本不是一

个现实个体，不是活着的存在即性伴侣的现实性；现在就直呼其名吧。它恰恰是同我刚才所谓“类型”关系最密切的东西，也就是一个意象。

行为学家对求偶动作机制的阐发向我们证明，这里占据绝对优势的是意象；它如此重要，以至会构成、形成，并以一种暂时性表型的形式显现：在大量物种中表现为特殊着色或外观变化。这个表型以其模型作用，能够充当某种甚至可以称作信号的东西；但它是一个被构造出来的信号，是今天所谓的一个 Gestalt［格式塔］。

归根到底，从生物学观点来看，我们看到显现的是这样一点；已有一些哲学家对此思考过。假如要区分人的世界的不同层面，就必须认识到，这个层面的独特之处恰恰在于：它属于一个由所谓遗传支配的世界。在时间的三个时态所形成的节奏中——我们今天暂且采用通常的三分：过去、现在与未来——预先形成的要素、过去的要素，绝对决定了所发生的一切，只有一种完全谜一般、被称作成熟的要素例外。我们暂且把它搁在一边。

在所谓物种的正常传递中，个体无非是在再现其整个祖先谱系已经实现的类型。总之，从严格的动物观点来看，正如我曾告诉你们的，这个个体终究不仅是有死的，而且是某种已经死去的东西，严格说来没有未来。从物种的观点看，他无非是某种东西的化身和支撑；这东西不是一匹马、这匹或那匹马，而是“马这个类型”。物种概念本身恰恰就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物种概念之所以成立、自然史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不只有一匹匹马，还存在“马这个类型”。

这一点在心理层面表现为：真正属于机械秩序的东西——性本能的接合与触发——之所以开始运作，其决定因素本质上结晶在意象关系中。我现在抵达你们都在等待的术语：结晶在一种想象关系中。这一点已经得到了充分指示。在我看来，这也为我们自然地引入了Libidotriebe［力比多驱力］、Sexualtriebe［性驱力］同 Ichtriebe［自我驱力］之间的关系问题；整篇文章都将从这个并不新颖、已在许多地方得到表达的观念出发，展开这个问题。你们由此得到了我们应当用来提出问题的框架。

对你们而言，问题难道还没有从一开始就处在这样一个层面吗：力比多驱力同我们不断使用、却又滥用的两个领域——想象界与实在——之间有怎样的关系？如果你们到现在还没有看到，力比多问题恰好围绕想象界的功能而提出并以它为中心，那么你们当然什么也无法理解！这里不是对分析学说作某种唯心主义和道德化的移置；人们曾想让我们相信，它要朝某种理想而想象的生殖器性状态推进，仿佛该状态会成为实在之确立的验证与最终动力。

这篇文章已经足够清楚地指示了这一点；你们还会在后文看到。我们必须从这里出发，也只有从这里出发，ego［自我］在心理经济中实际发挥何种功能的问题才真正得到提出。

您愿意再往下推进一点吗？

塞尔日·勒克莱尔

准确说来，我原本想提出几个问题，或者作出一些回答：阅读这篇文本的某些部分时，我有一种感受，而且并非只有我一个人如此；我在开头已经提到它。既然是在评注文本，我们总能抓住若干特别牵动人

的段落。我们看到，弗洛伊德在插入语中提出的第二个问题里——他先确立这个根本区分，然后提出两个问题——说了下面这些话。

- 如我们所说，他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是：在原初自体性欲与自恋之间，必须有一种中介性的心理行动。

- 对第二个问题，他这样回答：必须对它作出明确回答这一要求，会使每位精神分析家都产生显著不适。人们抵御着这种感觉，觉得自己正把注意力耗费在毫无成果的困难上；但仍不能放弃寻找解答。

第二个问题涉及根本心理能量：如果只有一种根本心理能量，岂不更简单？阅读这篇文本时，在某些时刻，我们仿佛抓住了一些看起来并不那么富有成效的观念。

而且，沿着您刚才所说的思路，我的感觉是，把力比多根本二分为两种——Ichlibido［自我力比多］与 Objektlibido［客体力比多］——无疑具有实用价值……

这也是弗洛伊德在本文中承认它具有的唯一价值；其他说法只不过前来加以确认

……正如您所说，它对于神经症研究具有实用价值。但神经症研究本质上揭示了什么？恰恰是那些曾遭隐藏的性驱力。

在我看来，既然二分总要有两项，全部困难便产生于另一项被称作“自我力比多”“Ichlibido”或者最初所谓“自我能量”这一事实。它并不是非这样称呼不可。

这种“自我能量”仿佛是他时时唤起的那种根本能量的一项分化。每当谈到这种“自我能量”时，我们都会感到一点不适；尤其当人们建立一种系统构造，试图表述并明确二者的关系时更是如此，因为这种自我力比多恰恰提出了自恋问题。

我们还会看到——依我看，是在第三部分——当他把自我理想观念引入以后，问题开始稍稍变得清晰。在我看来，着手研究这项二分中的第二项，即自我能量或自我力比多，多少类似于我们着手研究“原初能量”时可能作出的那种无果努力。

奥克塔夫·曼诺尼

可以请求发言吗?

一段时间以来，有一个同此略有关联的问题一直使我为难；它似乎既会使事情复杂化，又会使之简化。也就是说，力比多对对象的投注归根到底是一个实在论式的隐喻，因为它所投注的只是对象的意象；相反，对自我的投注可能是一种心理内部现象，在那里受到投注的是自我在本体论上的现实性。如果力比多已经成为客体力比多，它所能投注的就只有某种同自我意象对称的东西。

这样一来，我们就会有两种自恋：一种是力比多在心理内部投注于本体论的自我；另一种则是客体力比多前来投注某种或许就是自我理想、至少是某种自我意象的东西。由此，我们便会在原初自恋与次级自恋之间得到一个非常扎实的区分。

拉康

显然，曼诺尼以一次优雅的 jump［跳跃］，很快就把我们引到这样一个地方：你们已经感觉到，我这样一步步带领你们，正是想把你们带到那里。我们的推进并非完全冒险，尽管我随时准备接纳沿途会有的发现。当然，归根到底，问题说的就是这一点。我很高兴看到我们的朋友曼诺尼这样做：讨论题目时，偶尔必须跳上一步。

我回到自己刚才的最后一步。你们已经明白，它趋向何处吗？它要汇合于如下东西：由于文本援引了生物学，当前本能理论的阐发便向我们提供一项根本经验。也就是说，在触发力比多、使性行为循环开始运作时，那个触发性的"客体"要素，是某种使我们可以说主体在本质上能够受诱骗的东西。

因为鱼类学家的表述向我们显示：一方面，雄性三刺鱼必须在腹部或背部呈现鲜艳色彩，整套游戏、整套舞蹈才会开始建立；在其他场合，我已经或多或少向你们讲过这些，以后有机会还会再讲。反过来，这意味着，我们完全可以制作任意一种"剪影模型"——它究竟应当怎样还须明确；整体上可以是某种相当粗糙的东西——只要它带有某些特征、某些标志，即 Merkzeichen［标志性特征］，就会对主体产生完全相同的作用。

我们绝不能忽略位于我们所追踪的过程之核心的这些完全根本的要素。它们代表了性秩序中的本能循环起初何以因一些极其特殊的性质

而得到区分。正如我第一次讲述实在界、象征界与想象界[注1]时所强调的——那还只是一番粗略勾勒——尤其包括：

> [注1] 雅克·拉康：1953年7月8日 S.I.R. 讲座《象征界、想象界与实在界》，法国精神分析学会的活动由此开幕。

- 性行为特别容易受到诱骗，而且这种性质出现在生物谱系之中；
- 移位现象；它支撑着倒错与神经症的发展中一切独创性事物的根本特征。

W. 格拉诺夫

关于动作姿态，您刚才所说的——我手头没有那篇文本，但《元心理学》里有一段或许更加明确——其中有这样一句话：

“正是这样，遗传的自身（Soi）容纳了无数个体阻抗……//……在《自我与自身》以及《自我与超我》中……”

还有大量同曼诺尼刚才所说同样明确的表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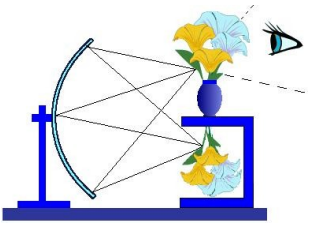
拉康

既然我们已经谈到这里，而且评注文本时我们拥有一切权利，那么在分开以前，我要引入一个东西：补充我三个研讨班课次以前给你们的那个图式；当时，我就所谓“想象界的局部论”给你们上了一小课。我颇费了一番力气，好让你们切实感到，可以从某个模型中提取什么；而且我已经充分指明，它符合弗洛伊德本人所表达的愿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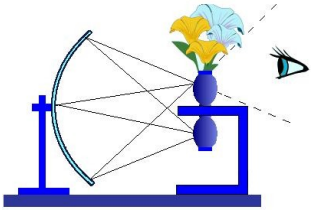
因为他曾在某处、而且不止一处非常明确地说——我特别向你们指出过《梦的解析》和《精神分析纲要》——他引入的那些根本心理机构，大多应被构想为代表照相机中所发生的东西，也就是装置运作所产生的那些图像，无论是虚像还是实像。

有机装置准确代表机器本身的机制，而我们所把握的恰恰是那些图像；它们的功能并不均质，因为实像与虚像并不是同一种东西。他所阐发的心理机构，应当通过这类图式得到解释；不能把它们当作某种实体性的东西，当作相对于装置自身变化而出现的附带现象。弗洛伊德曾多次指出这一点，却从未真正把它实现出来。

如果你们还记得我画过的图式，我现在就在黑板上简要重画一遍：借助凹面镜产生倒置花束现象：



……为了方便，我们自己把它改造成了倒置花瓶实验：



这里有一只花瓶；光线在足够宽阔的球面上反射，它将在这里被再现为一个实像，而非虚像，眼睛可以对它调焦。假定我们已经摆放了几朵花，只要眼睛准确地在花的层面调焦，花瓶的实像便会环绕它们，赋予它们这种样式、这种统一体和这种统一化；它反映着身体自身的统一性。当然，这只是一个模型，用来帮助你们理解某种东西。

我一面向你们展示光线的运行，一面指出：图像若要具有某种坚实性，就必须真正成为一个图像。光学怎样定义图像？对象的每一点都必须对应图像的一点；所有发出的光线都要在某处重新交会于唯一一点。光学装置也只能这样界定：从对象上的一个点发出的光线，以公理学所谓单值或双单值的方式，会聚于另一个精确的点，图像恰恰在那里构成。光学所处理的就是这个。假定凹面装置位于这里，而我们魔术师的小装置放在前方；要使这个图像可见……

可以肯定，只有在足够清晰地看见图像时，它才会产生现实幻觉……

这种极其特殊的幻觉被称作一种实像幻觉——它不同于你们在镜中看见的图像：

后一种图像并不在你看见它的地方；实像则就在你看见它的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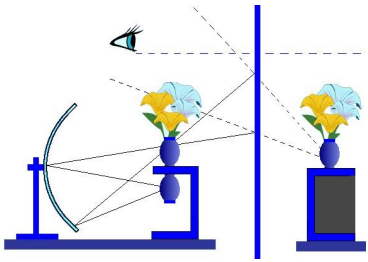
……你们必须处在某个角度内，相对于整个装置处在由一个圆锥规定的某种延伸线上。于是我曾告诉你们，观看整套装置的眼睛处在不同位置时，我们大概可以区分出若干情况；它们或许能帮助我们理解主体相对于现实的位置之间的某些差异。当然，主体并不是一只眼睛；我曾向你们说过。但这个模型之所以适用，是因为我们处在想象界，而眼睛在这里非常重要。

既然有人引入了“两种自恋”的问题，你们应该已经感觉到，这里所涉及的正是现实的构成，同某种以身体形式为对象的关系——曼诺尼用未必完全恰当的方式称它为“本体论的”关系——二者之间的联系。

那么，请你们这样设想：我在这里，姑且把我放在对象与那个构造之间，幻觉性的实像将从这个构造中形成；它就是这项趣味物理实验的基础。姑且把我背靠凹面镜放置。我曾告诉你们，在我们的模型中，可以从现在起就在这面镜子上投射各种具有有机意义的东西；我还说，它极有可能就是皮层。

不过，我们自己不要过快把它实体化；因为——后面你们会看得更清楚——这并不只是对“人里面的小人”理论所作的简单阐发。假如只是为了重新造出“人里面的小人”，我就看不出自己为什么还要始终批评它。然而，这套理论也有它存在的理由；它属于学院派心理学家时时屈从的那种幻象。如果他会屈从，其中必定有某种理由。

让我们暂时处在我刚才谈到的那只假想眼睛的位置。我们把这只眼睛放在这里，凹面镜与对象之间的某个地方。那么，要使位于这里的眼睛准确获得倒置花束——在这个实验里是倒置花瓶——的幻觉，也就是在最优条件下看见它，条件同坐在教室后排的人一样最优，只有一件事既必要又充分：在教室中部的这里放置一面镜子。



换言之，这项实验完全具体，而且确实能够成功，你们知道：人们会在花束并不存在的地方看见花束，在花瓶并不存在的地方看见花瓶。我贴近凹面镜站立；为了让我像教室后排的人一样清楚地看见它们，尽管出于种种理由，以我所处的位置无法直接看见实像，借助放在教室中部的这面镜子，我便被安置到了同后排观察者相同的位置。

因为在我看来，光线仿佛正是从那个位置发出。那么，我会在镜中看见什么？

- 第一，我自己的形象，出现在它实际并不在的地方。
- 第二，在这里，在实像所在点的一个对称点上，我会看到这个实像以虚像形式出现。

你们跟上了吗？这并不难理解；回家以后，站到镜子前，把手伸到自己面前……这个小图式只是一次非常简单的阐发。我多年来通过镜像阶段试图向你们说明的同一件事，使我们能够看到许多东西；后面你们会看到。因为刚才曼诺尼谈到“两种自恋”：其中一种自恋同身体图像有关。身体图像出于最充分的理由被铭刻在主体机制的总体中，并同这个总体相同一；它赋予人的 Umwelt［周围世界］以形式，使之成为人的而非马的周围世界。这个图像构成主体的统一体，并以千百种方式得到投射，其中包括我们所谓象征作用之想象性来源的源头和起源；象征作用由此同感受、同人类——Mensch［人］——对于自身身体所具有的 Selbstgefühl［自身感］相联结。

如果你们愿意，有某一种自恋可以安置在这里，即我这个图式的实像层面；它使现实总体能够在若干预成框架中组织起来。动物的情况当

然完全不同：它依照自身的形式构成而形成，并适应一个均一的 Umwelt［周围世界］。

这些想象性的结构要素，同这个 Umwelt 中唯一使动物感兴趣的东西之间，会存在若干预先确立的对应关系；那些唯一有意义的结构服务于个体的延续，而这些个体自身又以物种之典型延续为功能。

但对于人——几乎只有对人——而言，存在着：

- 当然，不仅存在镜中的这种反映。你们理解，这个现象极其重要，以至长期以来，我始终认为必须对它作根本性的照明；它显示出一种严格说来是人所独有的智性认识的可能性；

- 事情当然还远不止于此，因为你们感觉得到，这里所涉及的无非就是这个 pattern［模式］；它直接而立即就是同另一个人的关系。

因为事情显然总要通过另一个人作为中介；这个另一个人具有一种极为特殊的价值。我已在镜像阶段理论中阐明、突显并展开这种价值：镜中所感知的统一图像，或者人在任何相似者现实中所感知的统一图像，都代表一种预期；正因如此，另一个人具有这种攫获性价值。人正是通过这个另一个人、通过这个 alter ego［另一个自我］——在人生的不同阶段，它会以不同程度同本文不断援引的 Ichideal［自我理想］混同——来映照自己、同它认同。但你们看到，如果不加区分、整块地使用“认同”一词，它就毫无用处。这里是自恋性认同，也就是曼诺尼所说第二种自恋的认同；正是在正常情况下，这种同另一个人的认同，使人能够准确定位自身存在中同一般世界具有根本想象性力比多关系的东西。换言之，它使人能够在那个位置上“看见”，并依据那个位置来结构化他的世界，结构化严格说来属于其存在的东西——

既然曼诺尼刚才用了“本体论”一词，我也愿意这样说——也就是其力比多存在。他在这次映照中，相对于另一个人、相对于这个 Ichideal［自我理想］“看见”它。

你们由此看到，自我的功能得到区分：

- 一方面，同所有其他生物一样，自我功能在现实的结构化中发挥根本作用；

- 另一方面，在人这里，这些功能必须通过一种根本异化作为中介；这种异化发生在自身的镜中图像里，而这个图像同时又是 Ur-Ich［原自我］、Ichideal［自我理想］的原初形式，以及同另一个人的关系。

这对你们来说足够清楚吗？你们是否明白，这个小图式首先必须得到准确理解？以后，我们会使用它。此前我给过你们一个要素，今天再给你们另一个：把它同对另一个人的反射关系结合起来。然后你们会看到它有什么用途。你们当然想得到，我画这个图式并不是为了在这里消遣于一些或多或少有趣的构造。它会极其有用。

借助这个图式，你们将能够提出几乎所有实践性、临床性和具体的问题；这些问题都涉及怎样运用想象界的功能，尤其涉及那些力比多投注——人们反复操弄它们，到最后已不再理解它们究竟意味着什么。你们会看到它会有什么用途。关于梦理论的元心理学补充，我已经专门让人作准备了：格拉诺夫？

W. 格拉诺夫

这显然会通向自我、自身以及催眠。可以按下面的方式推进：例如提到疼痛的作用；他在一个句子中引入疼痛，而句子结尾是：

“这让我们得以把握，我们一般怎样上升到对自身身体的表象……”

还有另一个句子：

“它只表象我们的身体……我想说的是，爱恋状态建立在一种共存之上……吸引人的对象吸取自我之自恋力比多的一部分；这种状态限于自我与对象。催眠类似于爱恋状态……//……但它主要建立在目的受阻的性趋向之上，并把对象置于自我理想的位置。”

在这两个句子中，可以重新找到整个光学图式。

拉康

在爱恋关系中，对象与自我理想严格等价的观念，是最根本的观念之一；它遍见于弗洛伊德的整个著作。你们不可能不向自己提出这个问题——因为每一步都会遇见它：那么，如果被爱对象归根到底在爱恋投注中、在主体遭爱恋对象攫获时，确实是某种同这个自我理想严格等价的东西……

也正因如此，才会有：

- 暗示和催眠中如此重要的这种经济功能；
- 这种依赖状态，这种对现实的真正倒错、着迷，以及对被爱对象的高估；
- 这一整套爱恋生活心理学。弗洛伊德已经极其精细地展开它；这里摆在我们面前的是其中重要的一块，而且如此庞大，以至你们看到，今天我们还只是稍稍刮到它，刚刚“graspons［抓挠］”了一下。

不过，关于这些同他所谓对象选择的根本关系，这里什么色彩、什么样式都有。

塞尔日·勒克莱尔——这同您刚才所说的完全对应。有一点使我印象深刻……

拉康

先让我把这句话说完，好吗？你们不可能看不出，这一点同某种始终被说成“情感成熟的完成”的东西之间存在怎样的矛盾；后者出现在关于精神分析之力比多苦修的某些神话式构想中。也就是说，在生殖器性发展的最高阶段，我们会成为某种我也不知道是什么的东西，会达到某种融合、共融，严格说来实现某种被安置在生殖器性与实在之构成之间的关联。我并不是说，其中没有某种对现实构成至关重要的东西；但我们仍须理解它怎样发生。

因为二者必居其一：

- 要么爱就是弗洛伊德所描述的东西：就其根基而言是想象性的；
- 要么爱是另一种东西：世界的根基和基础。正如有两种自恋，也必定有两种爱：一边是 ἔρως［érôs，爱欲］，另一边是 ἀγάπη［agapè，阿伽佩之爱］。

勒克莱尔

有一点使我印象深刻（第47页）：他第一次使用我们所谓自我理想这个术语时，用的并不是这个词，而是理想自我。这表明，这里确实涉及一个已经实现的对象。而且，他只使用这个词两次，后来使用的都是 Ichideal［自我理想］。

拉康

你们看到，今天我只是把这个小装置交给你们。事情就是这样出现的。我们是在研讨班中，不是在作 ex cathedra［权威讲坛式］或系统性的教学。我们正在探索怎样辨明方向、怎样理解并最大限度地从一篇文本中获益；尤其是从一种仍在发展的思想中获益。请你们相信，它正围绕这一切展开，而且天知道，材料已经怎样一点点积累起来。

其他人——而且包括其中最出色者，如阿布拉罕与费伦齐——曾怎样试图处理 ego［自我］发展同力比多发展之间的关系问题，是纽约学派最近一篇文章的主题。我们先停留在费伦齐和阿布拉罕这里。

如果我们对这篇文本作批判性评注，就会看到，弗洛伊德不断援引、甚至依靠费伦齐1913年发表的那篇关于现实感的文章[注2]。它很贫

乏。显然，正是费伦齐开始把那些著名的“阶段”放进大家脑中；后来一切都混在了一起：从原初全能，到动作全能的时期和词语全能的时期［……］。于是就出现普遍混乱。人们简直会以为［……］发明了全部词语。弗洛伊德援引了它。

> [注2]　桑多尔·费伦齐：《现实感的发展及其阶段》，载《精神分析全集》第2卷：1913—1919，巴黎：帕约出版社，1970年，第51—65页。
>
> 德文版参见：Entwicklungsstufen des Wirklichkeitssinnes, Bausteine zur Psychoanalyse I Theorie（1927），国际精神分析出版社，第63页。

弗洛伊德第一次尝试把严格说来推动实在构成的机制表述出来，这些尝试在理论中形成一个涌现点；可以肯定，在这个关口，他于对话中听到这一回答，对他颇有帮助：别人把某种东西带给他，他便拿来使用。但天知道，费伦齐这篇文章尽管施加了决定性影响，归根到底却就像遭压抑之物一样：人们越不了解，它们的重要性反而越大。

同样，一个家伙即使写出一通漂亮的蠢话，也不会因为无人读过就停止产生效果；因为大家即使没有读，也都在重复。确有若干东西就这样被传播，并作用于一些无人留意的层面混杂。例如，分析中关于实在构成的第一种理论，无疑受到当时支配性观念的浸染；这些观念用某种多少带有神话色彩的“人类心智演化阶段”来表达。这个观念到处游荡，也或多或少在荣格那里浮现：人类心智仿佛只在最近才取得决定性进展，此前仍处在一种前逻辑混乱中。

仿佛亚里士多德先生的思想同另外某些人的思想之间不存在任何结构差异这一点，还不够清楚似的。这些观念随身带着制造混乱的力量和毒素；它们唤起问题，却没有澄清问题。

从弗洛伊德本人援引费伦齐文章时所表现的不自在，也能清楚看到这一点。谈到“原始人”或所谓“原始人”以及精神病患者时，一切看起来都很顺；但演化观点到了儿童这里，事情便复杂起来。在这里，弗洛伊德终究不得不说：

“儿童以同一种方式进入世界——弗洛伊德补充说——但他们的发展对我们远没有那么透明。”

[Wir erwarten eine ganz analoge Einstellung zur Außenwelt beim Kinde unserer Zeit, dessen Entwicklung für uns weit undurchsichtiger ist.]

[我们预期，当代儿童对外部世界具有完全类似的态度；但他们的发展对我们来说远为晦暗。]

因此，归根到底，或许最好不要援引那些虚假的演化论观念；富有成效的演化观念大概不在这里。我们应当阐明的是始终在发挥作用的结构机制；它们在分析经验中完全可以被感知。我们的经验最初以成人为中心，又使我们能够追溯性地阐明儿童那里可能以多少带有假设、多少可以控制的方式发生什么。

沿着这种结构观点前进，我们走在正确道路上，因为弗洛伊德最终抵达的正是这里。他理论的最后发展已经远离那些类比性的、“演化论式的”漫游；它们建立在对某些口号的肤浅运用上。弗洛伊德始终强调的恰恰相反：在所有层面上，任何可被视为不同阶段的东西都得到保存。

下次，我们会尝试再往前迈出一步。今天，请把这一切都看作一些开端。

你们会看到，它同我们可以视为转移现象的东西有着紧密而直接的关系：转移就其本质性质而言是想象性的。

S. 弗洛伊德：《论自恋：一篇导论》（1914）课次目录

I

“自恋”一词源自临床描述。P. 奈克于1899年选用这个词，用来指称这样一种行为：个体以通常对待性对象身体的方式对待自己的身体；也就是说，他带着性快感观看、抚摸、爱抚自己的身体，直至通过这些行为获得完全满足。发展到这种程度，自恋便具有倒错的意义：它吸收了此人的全部性生活，因而也符合我们研究一切倒错时所抱有的预期。随后，精神分析观察发现，许多患有其他障碍的人身上也能见到自恋行为的个别特征；例如，萨德格在同性恋者身上发现过这些特征。最后，人们自然会作出推测：一种应当称作自恋的力比多安置方式，可能在远为广泛的范围内发挥作用，并有资格在人的正常性发展中占据一席之地（原注：O. 兰克，1911年）。对神经症患者开展精神分析工作时遭遇的困难，也把人们引向同一推测，因为神经症患者的这种自恋行为仿佛构成了他们可受影响程度的一项界限。在这个意义上，自恋不是倒错，而是自我保存驱力之利己主义的力比多补充；我们有充分理由认为，每个生物都具有一部分这样的利己主义。当人们试图把对早发性痴呆（克雷佩林）或精神分裂症（布洛伊勒）的理解纳入力比多理论的前提之下时，便产生了一个迫切动机，要求我们研究原初而正常的自恋观念。我曾建议把这类患者称作妄想痴呆患者；他们表现出两个根本特征：夸大妄想，以及把兴趣从外部世界——人和事物——撤回。由于后一种变化，他们不再受到精神分析影响，对我们的治疗努力也变得不可治愈。不过，妄想痴呆患者背离外部世界

这一点还需要得到更准确的说明。癔症患者和强迫神经症患者，在其疾病影响所及，也放弃了同现实的关系。然而，分析表明，他绝没有取消同人和事物的爱欲关系；他仍然在幻想中牢牢维持这些关系。也就是说，一方面，他用记忆中的想象性对象替代真实对象，或者把二者混合起来；另一方面，他放弃发动运动行动来抵达自己在这些对象上的目标。只有对于这种力比多状态，才应当采用荣格不加区分地使用的“力比多内倾”一语。妄想痴呆患者则不同。他看起来确实已经从外部世界的人和事物上撤回了力比多，却没有在幻想中以其他对象取而代之。后来即使发生这种替代，它看来也是次级的，属于一种试图把力比多重新导向对象的治愈尝试（原注：关于这些论断，参见《施雷伯主席个案分析》中对“世界末日”的讨论，1911年；另见阿布拉罕，1908年）。

于是便产生一个问题：在精神分裂症中，从对象撤回的力比多命运如何？这些状态中的夸大妄想为我们指明了道路。它大概是以客体力比多为代价而形成的。从外部世界撤回的力比多被导向自我，由此产生了一种我们可以称作自恋的行为。不过，夸大妄想本身并不是一项全新的创造；正如我们所知，它放大并鲜明呈现了一个早已存在的状态。由此，我们不得不把吸收对象投注而形成的自恋理解为次级自恋；它建立在原初自恋之上，而后者曾受到多种影响的遮蔽。我要再次指出，我在这里无意澄清或深入探究精神分裂症问题；我只是把已经在其他地方说过的东西汇集起来，以说明引入自恋观念的理由。

在我看来，我们对儿童与原始民族之心理生活的观察和理解，为力比多理论这项正当的进一步发展带来了第三股支流。在原始民族那里，我们发现了一些特征；倘若孤立出现，它们本可被归入夸大妄想：高估自身欲望与心理行动的力量，相信“思想全能”，相信词语具有魔

力，以及一种针对外部世界、被称作“巫术”的技术；它表现为对这些夸大妄想式前提的贯彻运用（原注：参见《图腾与禁忌》中的相应章节，1912—1913年）。我们预期，当代儿童对外部世界具有完全类似的态度；但他们的发展对我们来说远为晦暗（原注：参见费伦齐，1913a）。由此，我们形成了关于自我之原初力比多投注的表象：后来，其中一部分被交给对象；但从根本上说，对自我的投注依然存留。它同对象投注的关系，犹如原生质生物的身体同它发出的伪足之间的关系。我们从神经症症状出发展开研究，因而力比多安置的这个部分起初必然对我们保持隐蔽；只有这种力比多的流出物——可以发出又可以重新撤回的对象投注——引起了我们的注意。粗略看来，我们还看到自我力比多与客体力比多之间存在对立：其中一方耗用得越多，另一方就越贫乏。在我们看来，客体力比多所能达到的最高发展阶段是爱恋状态；它表现为主体为了对象投注而放弃自身人格；其对立面则见于偏执狂患者关于世界末日的幻想（或自我知觉）。最后，就心理能量的区分而言，我们推断：最初在自恋状态中，它们处在一起，对我们粗略的分析来说不可区分；只有随着对象投注出现，才有可能把一种性能量——力比多——同一种自我驱力能量区分开来。

在继续以前，我必须触及两个直通主题困难核心的问题。第一，我们现在讨论的自恋，同我们描述为力比多早期状态的自体性欲有怎样的关系？第二，如果承认自我受到原初的力比多投注，那么还有什么必要把性力比多同自我驱力的非性能量分开？假如在理论基础中只设定一种统一的心理能量，岂不能省去区分自我驱力能量与自我力比多、自我力比多与客体力比多的一切困难？关于第一个问题，我要指出：必须作出这样的假设，即个体中从一开始并不存在一个可与自我相比的统一体；自我必须发展起来。不过，自体性欲驱力自始便已存在；

因此，必须有某种东西加入自体性欲，即一种新的心理行动，才能塑造自恋。要求对第二个问题作出明确回答，必定会使每一位精神分析家感到明显不适。人们抗拒这种感觉，仿佛自己正为了毫无成果的理论争论而离开观察；但我们仍不能逃避澄清问题的尝试。诚然，自我力比多、自我驱力能量等表象，既不特别容易得到清晰把握，也没有足够丰富的内容；关于这些关系的思辨理论首先会希望以一个得到严格界定的概念为基础。不过，我认为，这恰恰就是思辨理论同建立在经验解释之上的科学之间的差别。后者不会嫉妒思辨享有一种平滑而在逻辑上无懈可击的奠基特权；它甘愿暂时满足于朦胧、稍纵即逝、几乎难以表象的基本观念，希望在自身发展过程中更清楚地把握它们，并准备在必要时以其他观念取而代之。因为这些观念并不是科学中承载一切的基础；唯有观察才是这样的基础。它们不是整个建筑的最底层，而是最高处，可以毫无损害地被替换和拆除。今天，我们又在物理学中经历着同样的事情；物理学关于物质、力的中心、吸引等的基本构想，并不比精神分析中与之相应的构想少受质疑。“自我力比多”与“客体力比多”这些概念的价值，在于它们来自对神经症和精神病过程之内在特征的阐发。把力比多区分成自我所固有的一部分与附着于对象的一部分，正是第一项假设不可或缺的延续；该假设曾把性驱力与自我驱力彼此分开。至少，对纯粹转移神经症——癔症和强迫神经症——的分析迫使我作出这一区分；我只知道，所有试图以其他手段说明这些现象的尝试都彻底失败了。在完全缺少一套能够提供任何方向的驱力理论时，我们可以——更准确地说，我们必须——首先贯彻检验任一假设，直到它失效或得到证实。除了有助于分析转移神经症以外，还有不少理由支持性驱力同其他驱力即自我驱力从一开始便彼此分离的假设。我承认，单凭实用性这一点仍然不够明确，因为也可能只存在一种无差别的心理能量，它直到对象投注这一行动发生以

后才成为力比多。不过，第一，这项概念区分对应着通俗语言中如此常见的饥饿与爱之区分。第二，生物学考量也支持它。个体确实过着双重生活：既作为自身的目的，又作为链条的一环；他不得不服务于这条链条，这违反、至少并不依照其意愿。个体本人把性视作自己的目的之一；但从另一种观点来看，他不过是自己种质的附属物，为种质支配而投入力量，并以此换取一份快感酬金；他是一种或许不朽之物质的有死载体，恰如限嗣继承财产的领有者，只是一个会比自己存续更久的制度之暂时持有人。性驱力与自我驱力的区分，无非反映了个体的这种双重功能。第三，我们必须记住，我们在心理学中的一切临时构想，终有一天要被安置在有机载体的基础上。于是，特定物质与化学过程很可能产生性的作用，并在物种生命中促成个体生命的延续。我们以特定心理力量替代这些特定化学物质，正是把这种可能性考虑在内。

正因为我通常努力把一切异质的东西——包括生物学思想——排除在心理学之外，所以我要在这里明确承认：关于自我驱力与性驱力彼此分离的假设，也就是力比多理论，至少没有奠基于心理学，主要受到生物学的支撑。因此，如果精神分析工作本身产生另一项关于驱力的前提，而且它具有更好的运用价值，我也会一以贯之地放弃这项假设。迄今为止，这种情况还没有发生。或许在最深根基和最遥远之处，性能量即力比多，只是通常在心理中发挥作用的能量所产生的一项分化结果。但这样的断言并不重要。它涉及的东西离我们的观察问题已经如此遥远，所含知识又如此稀少，以至反驳它同利用它一样无益。这种原初同一性同我们的分析兴趣之间，或许没有比所有人类种族的原始亲缘关系同下面这件事之间更多的关联：向遗产管理机关证明自己同遗产被继承人的亲缘关系。所有这些思辨都无法使我们前

进。我们不能等到另一门科学把驱力理论的裁决赠送给我们；更合宜的做法，是尝试考察心理现象的综合能够给那些生物学根本谜题投下怎样的光。让我们习惯于自己可能出错，但不要因此停止贯彻最初选定的假设：自我驱力同性驱力之间存在对立。这一假设由转移神经症分析强加给我们；我们要看看，它能否得到没有矛盾而富有成果的发展，又能否用于其他疾病，例如精神分裂症。当然，倘若已经证明力比多理论在解释最后这种疾病时失败，事情就会不同。C. G. 荣格提出了这一断言（1912），从而迫使我作出前面最后那些本来很愿意省去的论述。我原本更愿意沿着施雷伯个案分析中已经踏上的道路走到底，而对其前提保持沉默。但荣格的断言至少过于仓促，其论据也很少。他首先援引我自己的证词，说我本人面对施雷伯分析的困难时，已经不得不扩展力比多概念，也就是放弃其性内容，使力比多同一般心理兴趣重合。为了纠正这种误解，需要说的话，费伦齐已经在对荣格著作的透彻批评中提出（1913b）。我只能赞同这位批评者，并重申自己从未宣布这样放弃力比多理论。荣格的另一个论据是：不能假定正常现实功能的丧失能够单单由力比多撤回引起。这不是论据，而是一道法令；it begs the question［它预设了待证结论］，预先作出裁决，从而省去了讨论，因为本来应当研究的恰好是，这件事是否可能、又如何可能。在下一部大型著作中（1913），荣格几乎触及了我早已指出的解答："不过，这里当然还应考虑一点——弗洛伊德在施雷伯个案著作中也曾提到——Libido sexualis［性力比多］的内倾会导致对'自我'的投注，这可能产生现实丧失的效果。以这种方式解释现实丧失的心理学，确实是一种诱人的可能性。"然而，荣格并没有沿着这种可能性继续走多远。几行之后，他就以一句评论把它打发掉：从这种条件出发，"会得到一位禁欲遁世者的心理学，而不是早发性痴呆"。这个并不恰当的类比何等不能作出裁决，下面的说明足以表明：这样

一位“力图根除性兴趣的一切痕迹”的遁世者——这里的“性”只取通俗含义——甚至不必表现出一种致病性的力比多安置。他完全可以从人身上撤回性兴趣，却把它升华成对神圣事物、自然事物或动物的强化兴趣，而不至于使力比多内倾到自身幻想中，也不至于让它返回自我。这个类比似乎从一开始就忽略了来自爱欲来源的兴趣同其他兴趣之间可能存在的区别。此外，让我们记住，瑞士学派的研究尽管贡献卓著，却只澄清了早发性痴呆图景中的两点：其中存在我们从健康人与神经症患者那里熟知的情结，以及它的幻想构成同民族神话相似；除此以外，它们没有给疾病机制投下任何光。于是，我们便能够驳回荣格的断言：力比多理论未能应对早发性痴呆，因而对于其他神经症也已经失效。

II

在我看来，直接研究自恋受到一些特殊困难的阻碍；分析妄想痴呆大概仍是进入这一问题的主要道路。正如转移神经症曾使我们能够追踪力比多驱力冲动，早发性痴呆与偏执狂也将使我们得以洞察自我心理学。我们仍须从病理状态的歪曲和粗化中，猜测正常状态那种表面的简单性。不过，为了接近关于自恋的知识，我们还有其他几条道路；现在我将依次加以描述：考察器质性疾病、疑病症，以及两性的爱恋生活。在评价器质性疾病对力比分布的影响时，我采纳了 S. 费伦齐口头提出的一项建议。众所周知、也显得不言而喻的是，受器质性疼痛与不适感觉折磨的人，会放弃对外部世界事物的兴趣，只保留同自身痛苦有关的兴趣。更细致的观察表明，他也从爱恋对象上撤回力比多兴趣；只要仍在受苦，他就停止去爱。这个事实虽然平淡，却不妨碍我们把它翻译成力比多理论的表达方式。于是我们会说：患者把自己的力比多投注撤回到自我之上，以便在痊愈以后再次把它们发出去。

W. 布施谈到一位牙痛的诗人时说：“灵魂只栖身于臼齿那狭窄的洞穴里。”在这种情况下，力比多与自我兴趣有着同样的命运，二者又一次无法相互区分。患者那种众所周知的利己主义覆盖了二者。我们认为它如此不言而喻，因为我们确信，自己在相同情况下也会采取同样行为。身体障碍会驱散哪怕极其强烈的爱之准备，并突然以完全冷漠取而代之；喜剧也相应地利用了这一点。同疾病相似，睡眠状态也意味着把力比多位置自恋性地撤回到自身，更准确地说，撤回到睡眠这个唯一欲望上。梦的利己主义大概也属于这种关联。在这两种情况下，即使看不到别的，我们至少看到了由自我改变引起的力比分布变化。疑病症同器质性疾病一样，表现为令人苦恼而疼痛的身体感觉；它对力比分布所产生的作用也同器质性疾病一致。疑病者从外部世界的对象上撤回兴趣与力比多——后者尤其明显——并把二者集中于令他困扰的器官。于是，疑病症同器质性疾病之间显出一项差别：后者的苦恼感觉以可以证实的变化为根据，前者则没有。不过，假如我们决意这样说，也完全符合我们对神经症过程的其他理解：疑病症必定是对的，其中也不可能没有器官变化。那么，这些变化由什么构成？让经验来决定我们：在其他神经症中，同疑病症相似的、具有不快性质的身体感觉也不会缺席。我以前曾表示，倾向于把疑病症同神经衰弱、焦虑神经症并列，视为第三种现实神经症。把事情表述成下面这样，大概并不为过：其他神经症通常也会一并发展出少量疑病症。或许在焦虑神经症及建立于其上的癔症中，这一点表现得最清楚。我们熟知一种器官范型：它疼痛而敏感，以某种方式发生变化，却没有在通常意义上患病；这就是处于兴奋状态的生殖器。此时，它充血、肿胀、湿润，并成为多种感觉的所在地。我们把身体某个部位向心理生活发送性兴奋刺激的活动称作它的性感性。性理论的考量早已使我们习惯于这种看法：某些其他身体部位——性感带——能够替代生殖器，并

以同它相似的方式活动；因此，我们现在只须再向前冒险一步。我们可以决定把性感性视为一切器官的普遍属性，继而谈论它在身体某个特定部位的增强或降低。器官性感性的每一种变化，都可能同自我之力比多投注的变化平行发生。我们必须在这些因素中寻找疑病症的基础，也要寻找那种能够像器官物质性疾病一样影响力比分布的东西。

[注]

> [注] 本段德文底本写作 exogenen Zonen，而本课后附法译作 zones érogènes；结合上下文，译文采用“性感带”，同时保留这项底本差异。

继续这条思路，我们会注意到，所触及的不只是疑病症问题，还有其他现实神经症，即神经衰弱与焦虑神经症的问题。因此，让我们在这里停下；一项纯心理学研究无意如此深入地越界到生理学探索的领域。这里只须指出，从这里可以作出一个推测：疑病症同妄想痴呆的关系，类似于其他现实神经症同癔症和强迫神经症的关系；也就是说，疑病症依赖自我力比多，正如其他现实神经症依赖客体力比多；疑病性焦虑是自我力比多一侧同神经症性焦虑相对应的东西。此外，我们已经熟悉如下构想：在转移神经症中，把患病机制和症状形成机制——即从内倾向退行的推进——同客体力比多的淤积联系起来（原注：参见《神经症患病类型》，1912c）。因此，我们也可以靠近自我力比多淤积的构想，并把它同疑病症和妄想痴呆现象联系起来。

当然，我们的求知欲会在这里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自我中这样的力比多淤积必定会被感受为不快？我愿意暂且满足于下面这个回答：不快通常是张力升高的表达；也就是说，物质过程的一个量，在这里同其他地方一样转化成不快这种心理性质。不过，对于不快的产生，起决定作用的或许并不是那个物质过程的绝对量，而是该绝对量的某种

函数。从这里出发，我们甚至可以冒险接近另一个问题：究竟是什么迫使心理生活超出自恋的界限，把力比多安置到对象之上？依照我们的思路得出的回答仍然是：当自我受到的力比多投注超过某种限度时，这种迫力便会出现。强烈的利己主义能够保护人免于患病；但归根到底，人必须开始去爱，才不致患病；如果因挫折而无法去爱，就必定会患病。这大致符合 H. 海涅对世界创造之心理发生所作的设想："疾病大概曾是 / 全部创造冲动的最终根由；/ 我能以创造求得痊愈，/ 我在创造中恢复健康。"我们首先认识到，心理装置是一种手段；它负责处理那些否则会被感受为痛苦或产生致病作用的兴奋。对于无法立即向外排出、或者暂时不宜这样排出的兴奋，心理加工在内部引流方面能够完成非凡工作。不过，对于这种内部处理来说，它首先发生在现实对象还是想象对象上，并无差别。差别到后来才会显现：当力比多转向非现实对象——即内倾——造成力比多淤积时，差别便出现。在妄想痴呆中，夸大妄想允许主体对已经返回自我的力比多作类似的内部处理；或许只有当这种处理失败以后，自我中的力比多淤积才会致病，并启动那个在我们看来表现为疾病的治愈过程。我在这里尝试稍稍深入妄想痴呆机制，把一些在今天看来已经值得注意的构想汇集起来。我把这类疾病同转移神经症的差别安置在如下事实上：因挫折而获得自由的力比多并不停留于幻想中的对象，而是撤回到自我之上。于是，夸大妄想便对应于对这一力比多量的心理处理，也就是对应于转移神经症中对幻想构成的内倾；这种心理工作一旦失败，妄想痴呆的疑病症便由此产生，并同转移神经症的焦虑相同构。我们知道，这种焦虑可以由进一步的心理加工所替代，即由转换、反应形成和保护性形成——恐惧症——所替代。在妄想痴呆中，占据这个位置的是复原尝试；那些引人注目的疾病现象正是由它产生。由于妄想痴呆经常——即使不是大多数时候——只使力比多部分脱离对象，因此

可以在其图景中区分三组现象：一、得到保存的正常状态或神经症，即残余现象；二、疾病过程，即力比多脱离对象，以及夸大妄想、疑病症、情感障碍与一切退行；三、复原过程，它以癔症的方式——早发性痴呆、严格说来的妄想痴呆——或强迫神经症的方式——偏执狂——把力比多重新系于对象。这种重新发生的力比多投注来自另一个层面，并在不同于原初投注的条件下发生。由它形成的转移神经症同正常自我的相应构成之间的差别，应当能够使我们最深入地洞察心理装置的结构。人的爱恋生活，以及它在男性与女性那里以不同方式发生的分化，为研究自恋提供了第三条进路。正如客体力比多最初遮蔽了自我力比多，使之不被我们观察到，我们在儿童——以及成长中的人——选择对象时也首先注意到，他从自己的满足经验中取得性对象。最初的自体性欲满足，依托于维持生命、服务于自我保存的功能而得到体验。性驱力起初依托于自我驱力的满足，后来才脱离后者而独立；不过，这种依托关系仍表现为：负责儿童营养、照料和保护的人，成为最初的性对象，也就是首先由母亲或其替代者充任。除了这种可称作依托型的对象选择类型和来源以外，分析研究还使我们认识了第二种类型；我们原本没有准备好会发现它。尤其明显的是，在力比多发展受到干扰的人——例如倒错者与同性恋者——那里，我们发现，他们后来选择爱恋对象时，所依据的并非母亲这个范型，而是自己本人这个范型。他们显然把自己当作爱恋对象来寻找，表现出一种应称为自恋型的对象选择。在这项观察中，可以看到迫使我们假定自恋的最有力动机。不过，我们并没有推断说，人类依照依托型或自恋型的对象选择而分成两个界限分明的群体；我们更愿意假定，每个人都有两条对象选择道路，只是可能偏爱其中一条。我们说，人有两个原初性对象：自己，以及照料他的女人；这也预设了每个人的原初自恋，而它有时会在对象选择中占据主导地位。比较男性与女性以后可

以看到，他们同对象选择类型的关系存在根本差异，尽管这些差异当然并非没有例外。严格说来，依托型的充分对象爱具有男性特征。它表现出引人注目的性高估；这种高估大概源于儿童的原初自恋，因而相当于把原初自恋转移到性对象之上。性高估使那种独特的爱恋状态得以产生；它令人想起神经症性的强迫，并可追溯到自我为了对象而在力比多上的贫乏。最常见、很可能也是最纯粹、最真实的女性类型，则沿着不同道路发展。在这里，随着青春期发展，直到这时仍潜伏的女性生殖器官开始形成，原初自恋似乎随之增强；这不利于形成一种正常而带有性高估的对象爱。尤其当女性发展出美貌时，她会形成某种自足；这补偿了社会对其对象选择自由的限制。严格说来，这类女性只爱自己，其强度类似于男性爱她们的强度。她们的需要也不是去爱，而是被爱；能够满足这个条件的男性才会得到她们的欢心。这类女性在人类爱恋生活中的重要性应当受到高度评价。她们对男性具有最大的吸引力；这不只是出于审美理由——因为她们通常也是最美的女性——还源于一些有趣的心理配置。一个人的自恋显然会对另一些人产生巨大吸引力；后者已经放弃自身自恋的充分程度，正在求取对象爱。儿童的魅力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其自恋、自足与不可接近之上；某些仿佛根本不在乎我们的动物，如猫和大型猛兽，也同样如此。甚至在诗性表现中，伟大的罪犯和幽默家也以其自恋的一贯性迫使我们关注他们：他们懂得把一切会贬低自身自我的东西拒之门外。情形仿佛是，我们嫉妒他们保存了一种幸福的心理状态、一种不受侵扰的力比多位置，而我们自己后来已经放弃它。不过，自恋型女性的巨大魅力也有其反面：处于爱恋中的男性所感到的大量不满、对女性之爱的怀疑，以及对于女性本性之谜的抱怨，都根植于对象选择类型之间的这种不相称。

或许有必要保证，在这段对女性爱恋生活的描述中，我丝毫没有贬低女性的倾向。除了我通常远离各种倾向以外，我也知道，朝不同方向形成的这些类型，对应着一个极其复杂的生物学关联中各种功能的分化。此外，我愿意承认，有数量无法确定的众多女性依照男性类型去爱，也会发展出相应的性高估。即使对于那些始终自恋、对男性冷淡的女性，也有一条通往充分对象爱的道路。在她们生下的孩子那里，自身身体的一部分作为陌生对象出现在她们面前；她们由此能够从自恋出发，把充分的对象爱给予这个对象。另一些女性无须等到孩子出生，就能完成从次级自恋到对象爱的这一步发展。青春期以前，她们曾感觉自己是男性，也曾沿男性方向发展过一段；女性成熟出现后，这种趋向中断，但她们仍保留着渴望某个男性理想的能力。严格说来，这个男性理想延续了她们自己一度具有的男孩式存在。下面简要概览通向对象选择的道路，以结束这些提示性评论。人会爱上：一、依照自恋型：a）自己现在所是的东西，即自己；b）自己过去所是的东西；c）自己想要成为的东西；d）曾是自身一部分的人。二、依照依托型：a）喂养自己的女人；b）保护自己的男人，以及从这两个系列延伸出来的替代人物。第一种类型中的 c 项，要到后文才能得到说明。男性同性恋中自恋型对象选择的重要性，须留待另一语境加以评价。我们所假定的儿童原初自恋，是力比多理论的一项前提；与其通过直接观察把握它，不如从另一点反推确认它来得容易。只要考察温柔的父母对待子女的态度，就必须把它认作父母早已放弃的自身自恋之复苏与再现。众所周知，高估这个鲜明特征支配着这种情感关系；在对象选择中，我们已经把它评价为自恋的标志。因此，父母受到一种强迫，必须把一切完美品质都赋予孩子，尽管清醒的观察没有提供任何根据；还要遮掩和遗忘孩子的一切缺点——对儿童性欲的否认也同此相关。父母还倾向于为了孩子暂时取消一切文化成就；他们自己

的自恋曾被迫承认这些成就，如今又要在孩子身上恢复对早已放弃之特权的要求。孩子应当比父母过得更好，不应服从人们已经认识到支配生活的那些必然性。疾病、死亡、享乐的放弃以及自身意志的限制，都不应适用于孩子；自然与社会的法则都应在他面前止步；他应当再次真正成为创造物的中心和核心，成为父母一度想象自己所是的His Majesty the Baby［婴儿陛下］。他应当实现父母未曾实现的愿望之梦：代替父亲成为伟人和英雄，嫁给一位王子，作为对母亲迟来的补偿。自恋系统中最为脆弱的一点，是受到现实严酷逼迫的自我不朽；它在对子女的避难中获得了保障。感人的、归根到底如此幼稚的父母之爱，无非是父母重获新生的自恋；它虽然转化成对象爱，却仍无可误认地显露出自己从前的本质。

III

儿童的原初自恋会遭受哪些扰动，他以怎样的反应抵御这些扰动，又由此被推上哪些道路——我想把它作为一项尚待处理的重要工作材料留到一旁。其中最有意义的部分可以单独提出，称作“阉割情结”——男孩的阴茎焦虑和女孩的阴茎嫉羡——并联系早期性恐吓的影响加以处理。精神分析研究在其他地方使我们能够追踪力比多驱力同自我驱力分离、并同后者相对立时的命运；在这个领域，它则使我们得以反推到一个时期、一种心理处境：两类驱力尚且一致地发挥作用，不可分地混合为自恋性兴趣。A.　阿德勒从这个关联中提取出他的“男性抗议”，并把它抬高到近乎唯一推动性格形成与神经症形成的力量；但他没有把它奠基于一种自恋性的、因而仍属力比多的趋向，而是奠基于社会评价。从精神分析研究的观点看，“男性抗议”的存在与意义从一开始就得到承认；不过，与阿德勒相反，我们坚持它具有自恋性质，并源于阉割情结。它属于性格形成，在性格发生中同许多其他因素一

道发挥作用；但它完全不适合用来阐明神经症问题，因为阿德勒在神经症中只愿注意它们服务于自我兴趣的方式。即便阉割情结在男性抵抗神经症治愈的阻抗中可能极为强烈地突显出来，我仍认为，绝不可能把神经症的发生建立在阉割情结这个狭窄基础上。最后，我还知道一些神经症病例；在其中，“男性抗议”——或者用我们的说法，阉割情结——并不发挥致病作用，甚至根本没有出现。观察正常成人可以看到，他从前的夸大妄想已经缓和，而我们曾据以推断其幼儿自恋的心理特征也已经淡去。他的自我力比多发生了什么？难道我们应当假设，它的全部数量都耗尽在对象投注中？这种可能性显然同我们整个讨论方向相矛盾；不过，我们也能从压抑心理学中取得指向另一种回答的线索。我们已经知道，力比多驱力冲动若同个体的文化观念和伦理观念发生冲突，便会遭遇致病性压抑这种命运。这里所谓的条件，从来不只是说此人对于这些观念的存在具有纯粹智性认识，而总是说，他承认这些观念对自己具有规范作用，并服从由此产生的要求。我们说过，压抑从自我出发；还可以说得更准确些：它从自我的自尊出发。同样的印象、亲历经验、冲动和愿望冲动，一个人会在自身中允许它们存在，至少在意识中对其加以加工；另一个人却会满怀愤慨地拒绝它们，或者在它们成为意识内容以前就加以扼杀。然而，构成压抑条件的二人差异，很容易用一些可以由力比多理论处理的术语来表达。我们可以说，其中一人在自身内部树立了一个理想，并以它衡量自己的当前自我；另一人则没有这样的理想形成。因此，从自我一方来看，理想形成就是压抑的条件。童年时现实自我所享有的自爱，如今转向这个理想自我。自恋仿佛已经移置到这个新的理想自我之上；后者同幼儿自我一样，拥有一切有价值的完美品质。在这里，如同力比多领域中的每一次情形一样，人都表明自己无法放弃曾经享受过的满足。他不愿失去童年时的自恋性完美；在成长过程中受到告诫

的干扰，判断力又被唤醒，他无法继续保留这种完美，于是便尝试以自我理想这种新形式重新获得它。他投射到自己面前、作为自身理想的东西，正是其童年时期已经丧失的自恋之替代物；在童年，他自己曾经就是自己的理想。由此自然会考察这种理想形成同升华之间的关系。升华是一种发生于客体力比多之上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驱力转向另一个远离性满足的目标，重音落在偏离性目标。理想化则是发生于对象之上的过程；通过这个过程，对象在自身性质没有改变的情况下被放大，并在心理上得到抬高。理想化既可能发生在自我力比多领域，也可能发生在客体力比多领域。例如，对对象的性高估就是对该对象的理想化。因此，只要升华描述的是驱力所经历的过程，而理想化描述的是发生于对象的过程，二者在概念上就必须彼此分开。

人们经常把自我理想的形成同驱力升华混为一谈，损害了清楚理解。一个人即使以崇敬崇高的自我理想取代了自己的自恋，也未必因此成功升华其力比多驱力。自我理想固然要求这种升华，却无法强制实现它；升华仍是一个独立过程，其启动可能受到理想的促进，但其完成完全独立于这种促进。恰恰在神经症患者那里，自我理想的发展程度同原始力比多驱力的升华程度之间，可以看到最大的张力差；通常，要说服理想主义者承认其力比多仍停留在一个不适宜的位置，比说服一个要求不高、始终安于朴素生活的人困难得多。理想形成与升华同神经症致因之间的关系也全然不同。正如我们已经听到的，理想形成会提高自我的要求，并且是最有力地促进压抑的因素；升华则提供了一条出路，使这些要求能够得到满足，而不致引起压抑。假如我们发现一个特殊心理机构，负责看守来自自我理想的自恋满足是否得到保障，并为此不断观察当前自我、拿它同理想衡量，那也不足为奇。倘若这样的机构存在，我们不可能偶然发现它；我们只能把它认作这样

的机构，并告诉自己，我们所谓的良心正符合这种特征。承认这个机构，使我们能够理解所谓“受注意妄想”——更准确地说，受观察妄想。它在偏执性疾病的症状学中表现得极其鲜明，也可能作为一种孤立疾病出现，或者零星插入转移神经症中。患者抱怨说，别人知道他们的一切思想，观察并监视他们的一切行动；有些声音把这个机构的统治活动告知他们，而且很有特征地用第三人称同他们说话——“她现在又在想那件事”；“他现在走了”。这种抱怨是有道理的，它描述了真相：确实存在这样一种力量，它观察、知悉并批评我们的全部意图，而且在正常生活中存在于我们每个人身上。受观察妄想以退行形式呈现这个力量，并由此揭示其发生过程，以及患者反抗它的理由。促使主体形成自我理想的，是父母通过声音传达的批判性影响；良心受命成为这个理想的守护者。随着时间推移，教育者、教师以及周围环境中其他一切人数无尽而无法确定的人群，都加入了父母的行列——其他人和公众舆论。大量本质上属于同性恋性质的力比多，由此被吸引来形成自恋性的自我理想，并在维持它的过程中获得引流和满足。良心这个机构，归根到底首先是父母批评的化身，后来又成为社会批评的化身；当压抑倾向源于最初外在的禁令或障碍时，同一过程也会重复。疾病如今使那些声音以及保持不确定的人群显现出来，从而以退行方式再现良心的发展史。而主体之所以反抗这个审查机构，是因为他依照疾病的根本特征，想要摆脱所有这些影响——首先是父母的影响——并从中撤回同性恋力比多。于是，他的良心以退行形式作为来自外部的敌意作用同他对峙。

偏执狂患者的抱怨还表明，良心的自我批评同它赖以建立的自我观察，归根到底彼此重合。因此，承担良心功能的同一种心理活动，也开始服务于内省研究；后者为哲学的思想操作提供材料。这一点或许

同偏执狂特有的思辨性体系建构冲动不无关系（原注：我只以推测形式补充一点：这个观察机构的形成与强化，或许还包含了主观记忆以及时间因素的晚期发生；而时间因素并不适用于无意识过程）。

如果我们还能在其他领域认出这个批判性观察机构——它已经提升为良心和哲学内省——活动的迹象，那对我们无疑很有意义。我在这里要援引 H. 西尔伯勒描述的“功能现象”；这是对梦学说少数几项价值无可争议的补充之一。众所周知，西尔伯勒表明，在睡眠与清醒之间的状态中，可以直接观察思想向视觉图像的转化；但在这种情形下，出现的往往不是思想内容的表象，而是那个正同睡眠搏斗的人所处状态——准备状态、疲倦等——的表象。他同样表明，梦的某些结尾和梦内容内部的某些段落，无非意味着主体对睡去与醒来的自我知觉。由此，他证明了自我观察——取偏执性受观察妄想的意义——参与梦的形成。这种参与并不恒定；我大概正因它在自己的梦中没有发挥重要作用而忽略了它。在具有哲学才能、习惯内省的人那里，它可能表现得非常鲜明。

让我们回想一下，我们曾发现，梦的形成处在一种审查的统治下；它迫使梦的思想发生变形。不过，我们并没有把这种审查想成一种特殊力量，而只是选用这个词，指称那些支配自我并实施压抑的趋向朝向梦之思想的一面。如果进一步深入自我的结构，我们就可以在自我理想和良心的动力表现中认出梦的审查者。假如这个审查者即使在睡眠中也保持些许警觉，我们就会理解，它的活动所预设的自我观察与自我批评，会以“他现在困得无法思考”“他现在正在醒来”之类的内容，为梦内容作出贡献（原注：这个审查机构同自我其余部分的分离，是否能够在心理学上为哲学所作的意识与自我意识之区分奠定基础，我无法在这里作出裁决）。

从这里出发，我们可以尝试讨论正常人与神经症患者的自尊感。自尊感首先向我们显现为自我之大小的表达，而这种大小由哪些要素构成，暂且不予考虑。一个人所拥有或已经取得的一切，原始全能感经由经验确认后留下的每一份残余，都会帮助提高自尊感。倘若引入我们对性驱力与自我驱力的区分，就必须承认，自尊感尤其紧密地依赖自恋力比多。这里所依据的是两个根本事实：在妄想痴呆中，自尊感升高；在转移神经症中，它降低。在爱恋生活中，不被爱会降低自尊感，被爱则会提高它。我们已经指出，对于自恋型对象选择来说，被爱就是目标与满足。此外，很容易观察到，对对象的力比多投注并不会提高自尊感。依赖被爱对象会降低这种感受；陷入爱恋的人谦卑而顺从。可以说，去爱的人已经损失了自身自恋的一部分，只有通过被爱才能得到补偿。在所有这些关系中，自尊感似乎始终同爱恋生活中的自恋部分保持关联。由于心理或身体障碍而知觉到自己的无能、知觉到自己没有爱的能力，会极大降低自尊感。依我判断，转移神经症患者如此乐于表露的自卑感，其中一个来源应当在这里寻找。不过，这些感受的主要来源，是异常庞大的力比多投注从自我撤回所造成的自我贫乏，也就是不再受控制的性趋向给自我造成的损害。A. 阿德勒正确地指出，当一个有能力的心理生活知觉到自身器官缺陷时，这种知觉会发挥鞭策作用，并通过过度补偿提高其成就。不过，如果效仿阿德勒，把一切良好成就都追溯到原初器官缺陷这个条件，那就完全夸大了。并非所有画家都有视觉缺陷，并非所有演说家最初都会口吃。许多卓越成就也以出众的器官禀赋为基础。在神经症的病因中，器官缺陷与发育不良只发挥微不足道的作用，大致相当于当下知觉材料在梦形成中发挥的作用。神经症像利用其他一切可用因素一样，把它们当作借口。当我们刚刚相信一位神经症女患者的话，认为她之所以必然患病，是因为自己不漂亮、畸形而缺乏魅力，以至无人可能爱

她；下一位神经症女患者就会纠正我们。后者始终停留在神经症和对性的拒绝中，尽管她看起来比普通女性更令人向往，事实上也更加受到追求。多数癔症女性都属于其性别中富有吸引力、甚至相貌美丽者；反过来，在社会较低阶层中大量出现的丑陋、器官发育不良与残疾，也丝毫没有提高该群体中神经症疾病的发生频率。

自尊感同爱欲——即对对象的力比多投注——之间的关系，可以用下面的公式表达：必须区分两种情况，即爱恋投注是符合自我的，还是相反已经受到压抑。在第一种情况下——力比多以符合自我的方式得到运用——爱同自我的其他一切活动一样受到评价。爱本身作为渴望与匮乏，会降低自尊感；被爱、得到爱的回应、拥有被爱对象，则会使它重新提高。当力比多遭到压抑时，爱恋投注被感受为自我的严重缩减，爱恋满足不再可能；只有从对象撤回力比多，自我才可能重新变得丰富。客体力比多返回自我、转化成自恋，仿佛重新呈现出一种幸福的爱；反过来，现实中幸福的爱也对应于客体力比多与自我力比多尚不可相互区分的原初状态。研究对象的重要性和难以总览，或许可以允许我以较为松散的次序再补充几项命题。自我的发展在于远离原初自恋，并产生一种重新获得原初自恋的强烈趋向。这种远离通过力比多向外部强加的自我理想发生移置而实现；满足则通过完成这个理想而实现。与此同时，自我已经发出了对对象的力比多投注。它为了这些投注和自我理想而变得贫乏，又通过对象满足和理想的完成重新变得丰富。自尊感的一部分是原初的，即幼儿自恋的残余；另一部分源于得到经验确认的全能——即自我理想的完成；第三部分则来自客体力比多的满足。自我理想对同对象有关的力比多满足施加了严苛条件，让自己的审查者把其中一部分作为不相容之物予以拒绝。这样的理想如果没有发展起来，相关性趋向就会原封不动地作为倒错进入

人格。再次像童年时那样成为自己的理想——而且在性趋向方面也是如此——这就是人想要获得的幸福。爱恋激情在于自我力比多漫溢到对象之上；它有力量取消压抑并重新建立倒错，把性对象提升到性理想的地位。由于这种激情在客体型或依托型中，是以满足幼儿爱恋条件为基础而发生的，所以可以说：凡满足这种爱恋条件的东西，都会被理想化。性理想可以同自我理想形成一种有趣的辅助关系。当自恋满足遭遇现实障碍时，性理想可以用来提供替代满足。此时，主体依照自恋型对象选择来爱：爱自己过去所是而如今已经失去的东西，或者爱拥有自己根本不具备之优点的东西。与前面命题平行的公式是：凡拥有自我为了达到理想而欠缺之卓越品质的东西，都会被爱。这种权宜办法对于神经症患者具有特殊意义；他因过度的对象投注而在自我中变得贫乏，又无法完成自己的自我理想。他把力比多挥霍在对象上以后，会尝试寻找返回自恋的道路：依照自恋类型，为自己选择一个性理想；后者拥有他无法达到的那些完美品质。这就是通过爱来治愈；他通常更偏爱它，而非分析性治愈。事实上，他无法相信还有其他治愈机制，通常会把对这种机制的期待带入治疗，并把它指向治疗他的医生。当然，由于患者广泛压抑而产生的无爱能力，会阻碍这套治愈计划。治疗在一定程度上使他摆脱压抑以后，人们往往会看到一种并非预期的结果：患者此时逃离后续治疗，转而作出爱恋选择，把余下的康复工作交给同被爱者共同生活。假如这种结局没有同时带来对这位救助者沉重依赖的一切危险，我们本可以感到满意。从自我理想出发，有一条重要道路通向对群体心理学的理解。这个理想除了个体面，还具有社会面；它同时是一个家庭、一个阶层和一个民族的共同理想。除了自恋力比多，它还束缚了一个人大量的同性恋力比多；后者通过这条道路返回自我。未能完成这种理想所造成的不满，会释放同性恋力比多，而它会转化为罪疚意识——社会性焦虑。罪疚意识

最初是对父母惩罚的焦虑；更准确地说，是对失去父母之爱的焦虑。后来，父母的位置由数量不定的同伴群体取代。这样一来，偏执狂何以经常由自我受损、由自我理想领域中的满足受挫引起，就变得更容易理解；同样更容易理解的还有：理想形成与升华在自我理想中汇合，升华在妄想痴呆疾病中发生退行，以及理想可能在那里得到重塑。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论自恋：一篇导论》1

I

“自恋”一词源自临床描述。P. 奈克于1899年选用这个词，用来指称这样一种行为：个体以通常对待性对象身体的方式对待自己的身体；也就是说，他带着性快感观看、抚摸、爱抚自己的身体，直至通过这些行为获得完全满足2。发展到这种程度，自恋便具有倒错的意义：它吸收了此人的全部性生活，因而也符合我们研究一切倒错时所抱有的预期。随后，精神分析观察发现，许多患有其他障碍的人身上也能见到自恋行为的个别特征；例如，依萨德格所说，可以在同性恋者身上发现这些特征。最后，人们自然会作出推测：一种应当称作自恋的力比多安置方式，可能在远为广泛的范围内发挥作用，并有资格在人的正常性发展中占据一席之地3。对神经症患者开展精神分析工作时遭遇的困难，也把人们引向同一推测，因为神经症患者的这种自恋行为仿佛构成了他们可受影响程度的一项界限。在这个意义上，自恋不是倒错，而是自我保存驱力之利己主义的力比多补充；我们有充分理由认为，每个生物都具有一部分这样的利己主义。当人们试图把对早发性痴呆（克雷佩林）或精神分裂症（布洛伊勒）的理解纳入力比多理论的前提之下时，便产生了一个迫切动机，要求我们研究原初而正常的

自恋观念。我曾建议把这类患者称作妄想痴呆患者；他们表现出两个根本特征：夸大妄想，以及把兴趣从外部世界——人和事物——撤回。由于后一种变化，他们摆脱了精神分析的影响，我们的治疗努力也无法抵达他们。不过，妄想痴呆患者背离外部世界这一点还需要得到更准确的说明。癔症患者和强迫神经症患者，在其疾病影响所及，也放弃了同现实的关系。然而，分析表明，他绝没有取消同人和事物的爱欲关系；他仍然在幻想中牢牢维持这些关系。也就是说，一方面，他用记忆中的想象性对象替代真实对象，或者把二者混合起来；另一方面，他放弃发动运动行动来抵达自己在这些对象上的目标。只有对于这种力比多状态，才应当采用荣格不加区分地使用的“力比多内倾”一语。妄想痴呆患者则不同。他看起来确实已经从外部世界的人和事物上撤回了力比多，却没有在幻想中以其他对象取而代之。后来即使发生这种替代，它看来也是次级的，属于一种试图把力比多重新导向对象的治愈尝试4。于是便产生一个问题：在精神分裂症中，从对象撤回的力比多命运如何？这些状态中的夸大妄想为我们指明了道路。它大概是以客体力比多为代价而形成的。从外部世界撤回的力比多被导向自我，由此产生了一种我们可以称作自恋的行为。不过，夸大妄想本身并不是一项全新的创造；正如我们所知，它放大并鲜明呈现了一个早已存在的状态。由此，我们不得不把对象投注回收5后形成的自恋理解为次级自恋；它建立在原初自恋之上，而后者曾受到多种影响的遮蔽。我要再次指出，我在这里无意澄清或深入探究精神分裂症问题；我只是把已经在其他地方说过的东西汇集起来，以说明引入自恋观念的理由。在我看来，我们对儿童与原始民族之心理生活的观察和理解，为力比多理论这项正当的进一步发展带来了第三股支流。在原始民族那里，我们发现了一些特征；倘若孤立出现，它们本可被归入夸大妄想：高估自身欲望与心理行动的力量，相信“思想全能”，相信

词语具有魔力，以及一种针对外部世界、被称作“巫术”的技术；它表现为对这些夸大妄想式前提的贯彻运用6。我们预期，当代儿童对外部世界具有完全类似的态度；但他们的发展对我们来说远为晦暗7。由此，我们形成了关于自我之原初力比多投注的表象：后来，其中一部分被交给对象；但从根本上说，对自我的投注依然存留。它同对象投注的关系，犹如原生质生物的身体同它发出的伪足之间的关系。我们从神经症症状出发展开研究，因而力比多安置的这个部分起初必然对我们保持隐蔽；只有这种力比多的流出物——可以发出又可以重新撤回的对象投注——引起了我们的注意。粗略看来，我们还看到自我力比多与客体力比多之间存在对立：其中一方耗用得越多，另一方就越贫乏。在我们看来，客体力比多所能达到的最高发展阶段是爱恋状态8；它表现为主体为了对象投注而放弃自身人格；其对立面则见于偏执狂患者关于世界末日的幻想（或自我知觉）9。最后，就心理能量的区分而言，我们推断：最初在自恋状态中，它们处在一起，对我们粗略的分析来说不可区分；只有随着对象投注出现，才有可能把一种性能量——力比多——同一种自我驱力能量区分开来。在继续以前，我必须触及两个直通主题困难核心的问题。第一，我们现在讨论的自恋，同我们描述为力比多早期状态的自体性欲有怎样的关系？第二，如果承认自我受到原初的力比多投注，那么还有什么必要把性力比多同自我驱力的非性能量分开？假如在理论基础中只设定一种统一的心理能量，岂不能省去区分自我驱力能量与自我力比多、自我力比多与客体力比多的一切困难？关于第一个问题，我要指出：必须作出这样的假设，即个体中从一开始并不存在一个可与自我相比的统一体；自我必须发展起来。不过，自体性欲驱力自始便已存在；因此，必须有某种东西加入自体性欲，即一种新的心理行动，才能塑造自恋。要求对第二个问题作出明确回答，必定会使每一位精神分析家感到明显不适。

人们抗拒这种感觉，仿佛自己正为了毫无成果的理论争论而离开观察；但我们仍不能逃避澄清问题的尝试。诚然，自我力比多、自我驱力能量等表象，既不特别容易得到清晰把握，也没有足够丰富的内容；关于这些关系的思辨理论首先会希望以一个得到严格界定的概念为基础。不过，我认为，这恰恰就是思辨理论同建立在经验解释之上的科学之间的差别。后者不会嫉妒思辨享有一种平滑而在逻辑上无懈可击的奠基特权；它甘愿暂时满足于朦胧、稍纵即逝、几乎难以表象的基本观念，希望在自身发展过程中更清楚地把握它们，并准备在必要时以其他观念取而代之。因为这些观念并不是科学中承载一切的基础；唯有观察才是这样的基础。它们不是整个建筑的最底层，而是最高处，可以毫无损害地被替换和拆除。今天，我们又在物理学中经历着同样的事情；物理学关于物质、力的中心、吸引等的基本构想，并不比精神分析中与之相应的构想少受质疑。“自我力比多”与“客体力比多”这些概念的价值，在于它们来自对神经症和精神病过程之内在特征的阐发。把力比多区分成自我所固有的一部分与附着于对象的一部分，正是第一项假设不可或缺的延续；该假设曾把性驱力与自我驱力彼此分开。至少，对纯粹转移神经症——癔症和强迫神经症——的分析迫使我作出这一区分；我只知道，所有试图以其他手段说明这些现象的尝试都彻底失败了。在完全缺少一套能够提供任何方向的驱力理论时，我们可以——更准确地说，我们必须——首先贯彻检验任一假设，直到它失效或得到证实。除了有助于分析转移神经症以外，还有不少理由支持性驱力同其他驱力即自我驱力从一开始便彼此分离的假设。我承认，单凭实用性这一点仍然不够明确，因为也可能只存在一种无差别的心理能量，它直到对象投注这一行动发生以后才成为力比多。不过，第一，这项概念区分对应着通俗语言中如此常见的饥饿与爱之区分。第二，生物学考量也支持它。个体确实过着双重生活：既

作为自身的目的，又作为链条的一环；他不得不服务于这条链条，这违反、至少并不依照其意愿。个体本人把性视作自己的目的之一；但从另一种观点来看，他不过是自己种质的附属物，为种质支配而投入力量，并以此换取一份快感酬金；他是一种或许不朽之物质的有死载体，恰如限嗣继承财产的领有者，只是一个会比自己存续更久的制度之暂时持有人。性驱力与自我驱力的区分，无非反映了个体的这种双重功能。第三，我们必须记住，我们在心理学中的一切临时构想，终有一天要被安置在有机载体的基础上。于是，特定物质与化学过程很可能产生性的作用，并在物种生命中促成个体生命的延续。我们以特定心理力量替代这些特定化学物质，正是把这种可能性考虑在内。

正因为我通常努力把一切异质的东西——包括生物学思想——排除在心理学之外，所以我要在这里明确承认：关于自我驱力与性驱力彼此分离的假设，也就是力比多理论，只有极小部分奠基于心理学，主要受到生物学的支撑。因此，如果精神分析工作本身产生另一项关于驱力的前提，而且它具有更好的运用价值，我也会一以贯之地放弃这项假设。迄今为止，这种情况还没有发生。或许在最深根基上，性能量即力比多，只是通常在心理中发挥作用的能量所产生的一项分化结果。但这样的断言并不重要。它涉及的东西离我们的观察问题已经如此遥远，所含科学知识又如此稀少，以至反驳它同利用它一样无益。这种原初同一性同我们的精神分析兴趣之间，或许没有比所有人类种族的原始亲缘关系同下面这件事之间更多的关联：向遗产管理机关证明自己同立遗嘱人的亲缘关系。所有这些思辨都无法使我们前进。我们不能等到另一门科学把驱力理论的决定性论据赠送给我们；更合宜的做法，是尝试考察心理现象的综合能够给那些生物学根本谜题投下怎样的光。让我们习惯于自己可能出错，但不要因此停止贯彻前面提

到的假设：自我驱力同性驱力之间存在对立。这一假设由转移神经症分析强加给我们；我们要看看，它能否得到没有矛盾而富有成果的发展，又能否用于其他疾病，例如精神分裂症。当然，倘若已经证明力比多理论在解释最后这种疾病时失败，事情就会不同。C. G. 荣格提出了这一断言10，从而迫使我作出前面最后那些本来很愿意省去的论述。我原本更愿意沿着施雷伯个案分析中已经踏上的道路走到底，而对其出发前提保持沉默。但荣格的断言至少是一项仓促判断，其根据也不充分。他首先援引我自己的证词，说我本人面对施雷伯分析的困难时，已经不得不扩展力比多概念，也就是放弃其性内容，使力比多同一般心理兴趣重合。为了纠正这种误解，需要说的话，费伦齐已经在对荣格著作的彻底批评中提出11。我只能赞同这项批评，并重申自己从未宣布这样放弃力比多理论。荣格的另一个论据是：不能承认单单撤回力比多就会造成正常现实功能的丧失。这不是论据，而是一道法令；it begs the question［它预设了待证结论］，预先作出裁决，从而省去了讨论，因为本来应当研究的恰好是，这件事是否可能、又如何可能。在下一部大型著作中12，荣格几乎触及了我早已指出的解答："不过，这里当然还应考虑一点——弗洛伊德在施雷伯个案著作中也曾提到——libido sexualis［性力比多］的内倾会导致对'自我'的投注，而我们所说的现实丧失可能正是它的效果。以这种方式解释现实丧失的心理学，确实是一种诱人的可能性。"然而，荣格并没有沿着这种可能性继续走多远。几行之后，他就以一句评论把它打发掉：从这种条件出发，"会得到一位禁欲遁世者的心理学，而不是早发性痴呆"。这个并不恰当的类比何等不能作出裁决，下面的说明足以表明：这样一位力图根除性兴趣一切痕迹的遁世者——这里的"性"只取通俗含义——甚至不必表现出一种致病性的力比多安置。他完全可以从人身上撤回性兴趣，却把它升华成对神圣事物、自然事物或动物的强化

兴趣，而不至于使力比多内倾到自身幻想中，也不至于让它返回自我。这个类比似乎从一开始就忽略了来自爱欲来源的兴趣同其他来源的兴趣之间可能存在的区别。此外，让我们记住，瑞士学派的研究尽管贡献卓著，却只澄清了早发性痴呆图景中的两点：其中存在我们从健康人与神经症患者那里熟知的情结，以及它的幻想构成同民族神话相似；除此以外，它们没有给患病机制投下任何光。于是，我们便能够驳回荣格的断言：力比多理论未能应对早发性痴呆，因而对于其他神经症也已经失效。

II

在我看来，直接研究自恋受到一些特殊困难的阻碍；分析妄想痴呆大概仍是进入这一问题的主要道路。正如转移神经症曾使我们能够追踪力比多驱力冲动，早发性痴呆与偏执狂也将使我们得以洞察自我心理学。我们仍须从病理状态的扭曲和夸张中，推测正常状态那种表面的简单性。不过，为了接近自恋，我们还有其他几条道路；现在我将依次加以描述：考察器质性疾病、疑病症，以及两性的爱恋生活。在评价器质性疾病对力比分布的影响时，我采纳了 S. 费伦齐口头提出的一项建议。众所周知、也显得不言而喻的是，受器质性疼痛与不适折磨的人，会放弃对外部世界事物的兴趣，只保留同自身痛苦有关的兴趣。更细致的观察表明，他也从爱恋对象上撤回力比多兴趣；只要仍在受苦，他就停止去爱。这个事实虽然平淡，却不妨碍我们把它翻译成力比多理论的表达方式。于是我们会说：患者把自己的力比多投注撤回到自我之上，以便在痊愈以后再次把它们发出去。W. 布施谈到诗人牙痛时说：“他的灵魂缩进臼齿狭窄的孔洞”[13]。在这种情况下，力比多与自我兴趣有着同样的命运，二者又一次无法相互区分。患者那种众所周知的利己主义覆盖了二者。我们认为它如此不言而喻，因为我

们确信，自己在相同情况下也会采取同样行为。身体障碍会驱散哪怕极其强烈的爱之准备，并突然以完全冷漠取而代之；喜剧也恰如其分地利用了这个主题。同疾病相似，睡眠状态也意味着把力比多位置自恋性地撤回到自身，更准确地说，撤回到睡眠这个唯一欲望上。梦的利己主义正好嵌入这种关联。在这两种情况下，即使看不到别的，我们至少看到了由自我改变引起的力比分布变化14。疑病症同器质性疾病一样，表现为令人苦恼而疼痛的身体感觉；它对力比分布所产生的作用也同器质性疾病一致。疑病者从外部世界的对象上撤回兴趣与力比多——后者尤其明显——并把二者集中于令他困扰的器官。不过，疑病症同器质性疾病之间显出一项差别：后者的苦恼感觉以可以证实的变化为根据，前者则没有。不过，假如我们提出下面这个命题，也完全符合我们对神经症过程的一般理解：疑病症必定是对的，其中也不可能没有器官变化。那么，这些变化由什么构成？让经验来引导我们：在其他神经症中，同疑病症相似的、具有不快性质的身体感觉也不会缺席。我以前曾表示，倾向于把疑病症同神经衰弱、焦虑神经症并列，视为第三种现实神经症。把事情设想成下面这样，大概并不为过：其他神经症通常也会一并发展出少量疑病症。或许在焦虑神经症及建立于其上的癔症中，这一点表现得最清楚。我们熟知一种器官范型：它疼痛而敏感，以某种方式发生变化，却没有在通常意义上患病；这就是处于兴奋状态的生殖器。此时，它充血、肿胀、湿润，并成为多种感觉的所在地。我们把身体某个部位向心理生活发送性兴奋刺激的活动称作它的性感性；性理论的考量早已使我们习惯于这种看法：某些其他身体部位——性感带——能够替代生殖器，并以同它相似的方式活动。因此，我们现在只须再向前尝试一步。我们可以决定把性感性视为一切器官的普遍属性，继而谈论它在身体某个特定部位的增强或降低。器官性感性的每一种变化，都可能同自我之力比多投

注的变化平行发生。我们必须在这些因素中寻找疑病症的基础；它们能够像器官所受的物质性损害15一样影响力比分布。

继续这条思路，我们会注意到，所触及的不只是疑病症问题，还有其他现实神经症，即神经衰弱与焦虑神经症的问题。因此，让我们在这里停下；一项纯心理学研究无意如此深入地越过生理学探索的边界。这里只须指出，从这里可以作出一个推测：疑病症同妄想痴呆的关系，类似于其他现实神经症同癔症和强迫神经症的关系；也就是说，疑病症依赖自我力比多，正如其他现实神经症依赖客体力比多；疑病性焦虑是自我力比多一侧同神经症性焦虑相对应的东西。此外，我们已经熟悉如下构想：在转移神经症中，把患病机制和症状形成机制——即从内倾向退行的推进——同力比多的淤积16联系起来17。因此，我们也可以靠近自我力比多淤积的构想，并把它同疑病症和妄想痴呆现象联系起来。当然，我们的好奇心会在这里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自我中这样的力比多淤积必定会被感受为不快？我愿意暂且满足于下面这个回答：不快通常是张力升高的表达；也就是说，物质过程的一个量，在这里同其他地方一样转化成不快这种心理性质。不过，对于不快的产生，起决定作用的或许并不是那个物质过程的绝对量，而是该绝对量的某种函数。从这里出发，我们甚至可以尝试接近另一个问题：究竟是什么迫使心理生活超出自恋的界限，把力比多安置到对象之上？依照我们的思路得出的回答是：当自我受到的力比多投注超过某种限度时，这种迫力便会出现。强烈的利己主义能够保护人免于患病；但归根到底，人必须开始去爱，才不致患病；如果因挫折18而无法去爱，就必定会患病。这大致符合 H. 海涅对世界创造之心理发生所作的设想：“疾病正是全部创造冲动的最终根由；我能以创造求得痊愈，我在创造中恢复健康”19。我们已经认识到，心理装置首先是一

种手段；它负责处理那些否则会被感受为痛苦或产生致病作用的兴奋。对于无法立即向外排出、或者暂时不宜这样排出的兴奋，心理加工在内部引流方面能够完成非凡工作。不过，对于这种内部处理来说，它首先发生在现实对象还是想象对象上，并无差别。差别到后来才会显现：当力比多转向非现实对象——即内倾——造成力比多淤积时，差别便出现。在妄想痴呆中，夸大妄想允许主体对已经返回自我的力比多作类似的内部处理；或许只有在夸大妄想失败[20]以后，自我中的力比多淤积才会致病，并启动那个被我们误认作疾病的治愈过程[21]。我在这里尝试稍稍深入妄想痴呆机制，把一些在今天看来已经值得注意的构想汇集起来。我把这类疾病同转移神经症的差别安置在如下事实上：因挫折而获得自由的力比多并不停留于幻想中的对象，而是撤回到自我之上。于是，夸大妄想便对应于对这一力比多量的心理掌控，也就是对应于转移神经症中对幻想构成的内倾；这种心理行动一旦失败，妄想痴呆的疑病症便由此产生，并同转移神经症的焦虑相同构。我们知道，这种焦虑可以由进一步的心理加工所解除，即由转换、反应形成和保护性形成——恐惧症——所解除。在妄想痴呆中，占据这个位置的是复原尝试；那些引人注目的病理表现正是由它产生。由于妄想痴呆经常——即使不是大多数时候——只使力比多部分脱离对象，因此可以在其图景中区分三组表现：一、对应于正常状态或神经症得到保存的表现，即残余表现；二、疾病过程的表现，即力比多脱离对象以及随之发生的夸大妄想、疑病症、情感障碍与一切退行；三、对应于复原的表现，它们以癔症的方式——早发性痴呆、严格说来的妄想痴呆——或强迫神经症的方式——偏执狂——把力比多重新固定于对象。这种重新发生的力比多投注来自另一个层面，并在不同于原初投注的条件下发生。它所形成的转移神经症同正常自我的

相应构成之间的差别，应当能够使我们最深入地洞察心理装置的结构。

*

人的爱恋生活，以及它在男性与女性那里以不同方式发生的分化，为研究自恋提供了第三条进路。正如客体力比多最初遮蔽了自我力比多，使之不被我们观察到，我们在儿童——以及青少年——选择对象时也首先注意到，他们从最初的满足经验中取得性对象。最初的自体性欲满足，同维持生命、服务于个体保存的功能一道得到体验。性驱力起初依托于自我驱力的满足，后来才脱离后者而独立；不过，这种依托关系仍表现为：负责儿童营养、照料和保护的人，成为最初的性对象，也就是首先由母亲或其替代者充任。除了这种可称作依托型的对象选择类型和来源以外，精神分析研究还使我们认识了第二种类型；我们原本没有预料到会发现它。尤其明显的是，在力比多发展受到干扰的人——例如倒错者与同性恋者——那里，我们发现，他们后来选择爱恋对象时，所依据的并非母亲这个范型，而是自己本人这个范型。他们显然把自己当作爱恋对象来寻找，表现出一种可称为自恋型的对象选择。正是在这项观察中，可以找到迫使我们假定自恋的最有力动机。不过，我们并没有由此推断说，人类依照依托型或自恋型的对象选择而分成两个界限分明的群体；我们更愿意假定，每个人都有两条对象选择道路，只是可能偏爱其中一条。我们说，人有两个原初性对象：自己，以及照料他的女人；这也预设了每个人的原初自恋，而它有时会在对象选择中占据主导地位。比较男性与女性以后可以看到，他们同对象选择类型的关系存在根本差异，尽管这些差异当然并不具有绝对规律性。依托型的充分对象爱尤其具有男性特征。它表现出引人注目的性高估；这种高估大概源于儿童的原初自恋，因而

相当于把原初自恋转移到性对象之上。性高估使那种独特的爱恋状态得以产生；它令人想到神经症性强迫，并可追溯到自我为了对象而在力比多上的贫乏。最常见、很可能也是最纯粹、最真实的女性类型，则沿着不同道路发展。在这里，随着青春期发展，直到这时仍潜伏的女性生殖器官开始形成，原初自恋似乎随之增强；这不利于形成一种正常而带有性高估的对象爱。尤其当女性发展出美貌时，她会形成某种自足；这补偿了社会不许她享有的对象选择自由。严格说来，这类女性只爱自己，其强度大致类似于男性爱她们的强度。她们的需要也不驱使她们去爱，而是被爱；能够满足这个条件的男性才会得到她们的欢心。无论怎样估计这类女性在人类爱恋生活中的重要性，都不会过高。她们对男性具有最大的吸引力；这不只是出于审美理由——因为她们通常也是最美的女性——还源于一些有趣的心理配置。一个人的自恋显然会对另一些人产生巨大吸引力；后者已经放弃自身自恋的全部程度，正在求取对象爱。儿童的魅力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其自恋、自足与不可接近之上；某些仿佛根本不在乎我们的动物，如猫和大型猛兽，也同样如此。甚至伟大的罪犯和幽默家，在诗性表现中也以其一贯的自恋迫使我们关注他们：他们懂得把一切会贬低自身自我的东西拒之门外。情形仿佛是，我们嫉妒他们保存了一种幸福的心理状态、一种不受侵扰的力比多位置，而我们自己后来已经放弃它。不过，自恋型女性的巨大魅力也有其反面：处于爱恋中的男性所感到的大量不满、对女性之爱的怀疑，以及对于女性本性之谜的抱怨，都在很大程度上根植于对象选择类型之间的这种不相称。

或许有必要保证，在这段对女性爱恋生活的描述中，我丝毫没有贬低女性的偏见。除了我通常远离一切偏见以外，我也知道，朝不同方向完成发展的这些道路，对应着一个极其复杂的生物学关联中各种功能

的分化。此外，我愿意承认，有许多女性依照男性类型去爱，也会发展出这种类型特有的性高估。即使对于那些始终自恋、对男性冷淡的女性，也有一条通往充分对象爱的道路。在她们生下的孩子那里，自身身体的一部分作为陌生对象出现在她们面前；她们由此能够从自恋出发，把充分的对象爱给予这个对象。另一些女性无须等到孩子出生，就能踏上从次级自恋通向对象爱的这一步发展。青春期以前，她们曾感觉自己具有男性性，并曾沿男性方向发展过一段；女性成熟出现后，这些趋向中断，但她们仍保留着渴望某个男性理想的能力。严格说来，这个男性理想延续了她们自己一度具有的男孩式存在。下面概览通向对象选择的道路，以结束这些评论。人会爱上：一、依照自恋型：a）自己现在所是的东西；b）自己过去所是的东西；c）自己想要成为的东西；d）曾是自身一部分的人。二、依照依托型：a）喂养自己的女人；b）保护自己的男人，以及从这两个系列延伸出来的替代人物。第一种类型中的 c 项，要到后文才能得到说明。男性同性恋中自恋型对象选择的重要性，须留待另一语境加以评价。我们所假定存在的儿童原初自恋，是力比多理论的一项前提；与其通过直接观察把握它，不如从另一点反复推理来确认它更为容易。只要考察温柔的父母对待子女的态度，就必须把它认作父母早已放弃的自身自恋之复苏与再现。众所周知，高估这个鲜明特征支配着这种情感关系；在对象选择中，我们已经把它评价为自恋的标志。因此，父母受到一种强迫，必须把一切完美品质都赋予孩子，尽管冷静的观察并不允许这样做；还要遮掩和遗忘孩子的一切缺点——对儿童性欲的否认也同这种态度有关。父母还倾向于为了孩子暂时取消一切文化成就；他们自己的自恋曾被迫承认这些成就，如今又要在孩子身上恢复对早已放弃之特权的要求。孩子应当比父母过得更好，不应服从人们已经认识到支配生活的那些必然性。疾病、死亡、享乐的放弃以及自身意志的限

制，都不应适用于孩子；自然与社会的法则都应在他面前止步；他应当再次真正成为创造物的中心和核心，成为父母一度想象自己所是的His Majesty the Baby［婴儿陛下］。他应当实现父母未曾实现的愿望之梦：代替父亲成为伟人和英雄；她则要嫁给一位王子，作为对母亲迟来的补偿。自恋系统中最为棘手的一点，是受到现实不断攻破的自我不朽；它在对子女的避难中重新找到了安全处所。感人的、归根到底如此幼稚的父母之爱，无非是父母重获新生的自恋；它虽然转化成对象爱，却仍无可误认地显露出自己从前的本质。

*

儿童的原初自恋会遭受哪些扰动，他以怎样的防御反应抵御这些扰动，又由此被迫走上哪些道路——我想把它作为一项尚待处理的重要材料留到一旁。其中最重要的部分可以单独提出，称作“阉割情结”——男孩对阴茎的焦虑和女孩的阴茎嫉羡——并联系早年性恐吓的影响加以处理。精神分析研究在其他情况下使我们能够追踪力比多驱力同自我驱力分离、并同后者相对立时的命运；但在阉割情结这个领域，它则使我们得以反推到一个时期、一种心理处境：两类驱力尚且一致地发挥作用，不可分地混合为自恋性兴趣。A. 阿德勒从这个关联中提取出他的“男性抗议”，并把它抬高到近乎唯一推动神经症形成与性格形成的驱力；但他没有把它奠基于一种自恋性的、因而仍属力比多的趋向，而是奠基于社会评价。从精神分析研究的观点看，“男性抗议”的存在与意义从一开始就得到承认；不过，与阿德勒相反，我们坚持它具有自恋性质，并源于阉割情结。“男性抗议”属于性格形成，在性格发生中同许多其他因素一道发挥作用；但它完全不适合用来阐明神经症问题，因为阿德勒在神经症中只愿注意它们服务于自我兴趣的方式。即便阉割情结在男性主体抵抗神经症治愈的阻抗中可能极为强

烈地发挥作用，我仍认为，绝不可能把神经症的发生建立在阉割情结这个狭窄基础上。最后，我还知道一些神经症病例；在其中，“男性抗议”——或者用我们的说法，阉割情结——并不发挥致病作用，甚至根本没有出现。观察正常成人可以看到，他从前的夸大妄想已经缓和，而我们曾据以推断其幼儿自恋的心理特征也已经淡去。他的自我力比多发生了什么？难道我们应当假设，它的全部数量都已经进入对象投注？这种可能性显然同本段阐发的整个方向相矛盾；不过，我们也能从压抑心理学中取得指向另一种回答的线索。我们已经知道，力比多驱力冲动若同个体的文化表象和伦理表象发生冲突，便会遭遇致病性压抑这种命运。这里所谓的条件，从来不只是说此人对于这些表象的存在具有纯粹智性认识，而总是说，他承认这些表象对自己具有权威，并服从由此产生的要求。我们说过，压抑来自自我；还可以说得更准确些：它来自自我的自尊22。同样的印象、经验、冲动和愿望冲动，一个人会在自身中任其存在，至少在意识中对其加以加工；另一个人却会满怀愤慨地拒绝它们，或者在它们成为意识内容以前就加以扼杀。然而，构成压抑条件的二人差异，很容易用一些可以纳入力比多理论的术语来表达。我们可以说，其中一人在自身内部树立了一个理想，并以它衡量自己的当前自我；另一人则没有这样的理想形成。因此，从自我一方来看，理想形成就是压抑的条件。童年时现实自我24所享有的自爱，如今转向这个理想自我23。自恋仿佛已经移置到这个新的理想自我25之上；后者同幼儿自我一样，拥有一切完美品质。在这里，如同力比多领域中的每一次情形一样，人都表明自己无法放弃曾经享受过的满足。他不愿失去童年时的自恋性完美；成长过程中他人的告诫扰乱了他，自己的判断力又被唤醒，他无法继续保留这种完美，于是便尝试以自我理想26这种新形式重新获得它。他投射到自

己面前、作为自身理想的东西，正是其童年时期已经丧失的自恋之替代物；在童年，他自己曾经就是自己的理想。

由此自然会考察这种理想形成同升华之间的关系。升华是一种发生于客体力比多之上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驱力转向另一个远离性满足的目标，重音落在偏离性目标。理想化则是发生于对象之上的过程；通过这个过程，对象在自身性质没有改变的情况下被放大，并在心理上得到抬高。理想化既可能发生在自我力比多领域，也可能发生在客体力比多领域。例如，对对象的性高估就是对该对象的理想化。因此，只要升华描述的是驱力所经历的过程，而理想化描述的是发生于对象的过程，二者在概念上就必须彼此分开。人们经常把自我理想的形成同驱力升华混为一谈，损害了清楚理解。一个人即使以崇敬崇高的自我理想取代了自己的自恋，也未必因此成功升华其力比多驱力。自我理想固然要求这种升华，却无法强制实现它；升华仍是一个独立过程，其启动可能受到理想的促进，但其完成完全独立于这种促进。恰恰在神经症患者那里，自我理想的发展程度同原始力比多驱力的升华程度之间，可以看到最大的张力差；通常，要说服理想主义者承认其力比多仍停留在一个不适宜的位置，比说服一个要求不高、始终安于朴素生活的人困难得多。理想形成与升华同神经症决定因素之间的关系也全然不同。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理想形成会提高自我的要求，并且是最有力地促进压抑的因素；升华则提供了一条出路，使这些要求能够得到满足，而不致引起压抑。假如我们发现一个特殊心理机构，负责看守来自自我理想的自恋满足是否得到保障，并为此不断观察当前自我、拿它同理想衡量，那也不足为奇。倘若这样的机构存在，我们不可能偶然发现它；我们只能把它认作这样的机构，并告诉自己，我们所谓的良心正符合这种特征。承认这个机构，使我们能够

理解主体认为自己处于他人注意中心的妄想观念——更准确地说，受观察妄想27。它在偏执性疾病的症状学中表现得极其鲜明，也可能作为一种孤立疾病出现，或者零星插入转移神经症中。患者抱怨说，别人知道他们的一切思想，观察并监视他们的一切行动；有些声音把这个机构的统治活动告知他们，而且很有特征地用第三人称同他们说话——“她现在又在想那件事”；“他现在走了”。这种抱怨是有道理的，它描述了真相：确实存在这样一种力量，它观察、知悉并批评我们的全部意图，而且在正常生活中存在于我们每个人身上。受观察妄想以退行形式呈现这个力量，并由此揭示其发生过程，以及患者反抗它的理由。促使主体形成自我理想的，是父母通过声音传达的批判性影响；良心受命成为这个理想的守护者。随着时间推移，教育者、教师以及周围环境中其他一切人数无尽而无法确定的人群，都加入了父母的行列——其他人28和公众舆论。大量本质上属于同性恋性质的力比多，由此被吸引来形成自恋性的自我理想，并在维持它的过程中获得引流和满足。良心这个机构，归根到底首先是父母批评的化身，后来又成为社会批评的化身；当压抑倾向源于最初外在的防御或障碍时，同一过程也会重复。疾病如今使那些声音以及保持不确定的人群走到前台，从而以退行方式再现良心的发展史。而主体之所以反抗这个审查机构，是因为他依照疾病的根本特征，想要摆脱所有这些影响——首先是父母的影响——并从中撤回同性恋力比多。于是，他的良心以退行形式作为来自外部的敌意作用同他对峙。偏执狂患者的抱怨还表明，良心的自我批评同它赖以建立的自我观察，归根到底彼此重合。因此，承担良心功能的同一种心理活动，也开始服务于内省29；后者为哲学的思想操作提供材料。这一点或许同偏执狂患者构建思辨体系的特有倾向不无关系30。如果我们还能在其他领域认出这个进行观察与批评、并已提升到良心和哲学内省之地位的机构之活动迹象，那对

我们无疑很有意义。我在这里要援引 H. 西尔伯勒描述的“功能现象”；这是对梦学说少数几项价值无可争议的补充之一。众所周知，西尔伯勒表明，在睡眠与清醒之间的状态中，可以直接观察思想向视觉图像的转化；但在这种情形下，出现的图像通常不是思想内容的表象，而是那个正同睡眠搏斗的人所处状态——准备良好、疲倦等——的表象。他同样表明，梦的某些结尾和梦内容内部的某些段落，不止一次无非意味着主体对睡去与醒来的自我知觉。由此，他证明了自我观察——取偏执性受观察妄想的意义——参与梦的形成。这种参与并不恒定；我大概正因它在自己的梦中没有发挥重要作用而忽略了它。在具有哲学才能、习惯内省的人那里，它可能表现得非常鲜明。让我们回想一下，我们曾发现，梦的形成处在一种审查的统治下；它迫使梦的思想发生变形。不过，我们并没有把这种审查想成一种特殊力量，而只是选用这个词，指称那些支配自我并实施压抑的趋向朝向梦之思想的一面。如果进一步深入自我的结构，我们就可以在自我理想和良心的动力表现中认出梦的审查者。假如这个审查者即使在睡眠中也保持些许警觉，我们就会理解，它的活动所预设的自我观察与自我批评，会以“他现在困得无法思考”“他现在正在醒来”之类的内容，为梦内容作出贡献[31]。从这里出发，我们可以尝试讨论正常人与神经症患者的自尊感[32]。自尊感首先向我们显现为自我之大小的表达，而这种大小由哪些要素构成，暂且不予考虑。一个人所拥有或已经取得的一切，原始全能感经由经验确认后留下的每一份残余，都会帮助提高自尊感。倘若引入我们对性驱力与自我驱力的区分，就必须承认，自尊感尤其紧密地依赖自恋力比多。这里所依据的是两个根本事实：在妄想痴呆中，自尊感升高；在转移神经症中，它降低。在爱恋生活中，不被爱会降低自尊感，被爱则会提高它。我们已经指出，对于自恋型对象选择来说，被爱就是目标与满足。此外，很容易观察到，对对象的力比

多投注并不会提高自尊感。依赖被爱对象会降低这种感受；陷入爱恋的人谦卑而顺从。可以说，去爱的人已经损失了自身自恋的一部分，只有通过被爱才能得到补偿。在所有这些关系中，自尊感似乎始终同爱恋生活中的自恋部分保持关联。由于心理或身体障碍而知觉到自己的无能、知觉到自己没有爱的能力，会极大降低自尊感。依我判断，转移神经症患者如此乐于表露的自卑感，其中一个来源应当在这里寻找。不过，这些感受的主要来源，是异常庞大的力比多投注从自我撤回所造成的自我贫乏，也就是不再受控制的性趋向给自我造成的损害。A. 阿德勒正确地指出，当一个富有能力的心理生活知觉到自身器官缺陷时，这种知觉会发挥鞭策作用，并通过过度补偿提高其成就。不过，如果效仿阿德勒，把一切良好成就都追溯到原初器官缺陷这个条件，那就完全夸大了。并非所有画家都有视觉缺陷，并非所有演说家最初都会口吃。许多人的卓越成就也以出众的器官禀赋为基础。在神经症的病因中，器官缺陷与发育不良只发挥微不足道的作用，大致相当于当下知觉材料在梦形成中发挥的作用。神经症像利用其他一切可用因素一样，把它们当作借口。当我们刚刚相信一位神经症女患者的话，认为她之所以必然患病，是因为自己不漂亮、畸形而缺乏魅力，以至无人可能爱她；下一位患者就会纠正我们。后者始终停留在神经症和对性的厌恶中，尽管她看起来比普通女性更令人向往，事实上也更加受到追求。多数癔症女性都属于其性别中富有吸引力、甚至相貌美丽者；反过来，在我们社会较低阶层中大量出现的丑陋、器官发育不良与残疾，也丝毫没有提高该群体中神经症疾病的发生频率。

自尊感同爱欲——即对对象的力比多投注——之间的关系，可以用下面的公式表达：必须区分两种情况，即爱恋投注是符合自我的，还是相反已经受到压抑。在第一种情况下——力比多以符合自我的方式得

到运用——爱同自我的其他一切活动一样受到评价。爱本身作为炽烈渴望33与匮乏，会降低自尊感；被爱、得到爱的回应、拥有被爱对象，则会使它重新提高。当力比多遭到压抑时，爱恋投注被感受为自我的严重缩减，爱恋满足不再可能；只有从对象撤回力比多，自我才可能重新变得丰富。客体力比多返回自我、转化成自恋，仿佛重新呈现出一种幸福的爱；反过来，现实中幸福的爱也对应于客体力比多与自我力比多尚不可相互区分的原初状态。研究对象的重要性和难以总览，或许可以允许我以较为松散的次序再补充几项命题。自我的发展在于远离原初自恋，并产生一种重新获得原初自恋的强烈趋向。这种远离通过力比多向外部强加的自我理想发生移置而实现；满足则通过完成这个理想而实现。与此同时，自我已经发出了对对象的力比多投注。它为了这些投注和自我理想而变得贫乏，又通过对象满足和理想的完成重新变得丰富。自尊感的一部分是原初的，即幼儿自恋的残余；另一部分源于得到经验确认的全能——即自我理想的完成；第三部分则来自客体力比多的满足。自我理想对同对象有关的力比多满足施加了严苛条件，让自己的审查者把其中一部分作为不相容之物予以拒绝。这样的理想如果没有发展起来，相关性趋向就会原封不动地作为倒错进入人格。再次像童年时那样成为自己的理想——而且在性趋向方面也是如此——这就是人想要获得的幸福。爱恋激情在于自我力比多漫溢到对象之上；它有力量取消压抑并重新建立倒错，把性对象提升到性理想的地位。由于这种激情在客体型或依托型中，是以满足那些决定幼儿爱恋的条件为基础而发生的，所以可以说：凡满足这种决定爱恋之条件的东西，都会被理想化。性理想可以同自我理想形成一种有趣的辅助关系。当自恋满足遭遇现实障碍时，性理想可以用来提供替代满足。此时，主体依照自恋型对象选择来爱：爱自己过去所是而如今已经失去的东西，或者爱拥有自己根本不具备之完美品质的

东西。与前面命题平行的公式是：凡拥有自我为了达到理想而欠缺之卓越品质的东西，都会被爱。这种权宜办法对于神经症患者具有特殊意义；他因过度的对象投注而在自我中变得贫乏，又无法完成自己的自我理想。他把力比多挥霍在对象上以后，会尝试寻找返回自恋的道路：依照自恋类型，为自己选择一个性理想；后者拥有他无法达到的那些完美品质。事实上，他无法相信还有其他治愈机制，通常会把对这种机制的期待带入治疗，并把它指向治疗他的医生。当然，由于患者广泛压抑而产生的无爱能力，会阻碍这套治愈计划。治疗在一定程度上使他摆脱压抑以后，人们通常会看到一种并非预期的结果：患者此时逃离后续治疗，转而作出爱恋选择，把余下的康复工作交给同被爱者共同生活。假如这种结局没有同时带来对这位救助者沉重依赖的一切危险，我们本可以感到满意。从自我理想出发，有一条重要道路通向对群体心理学的理解。这个理想除了个体面，还具有社会面；它同时是一个家庭、一个阶层和一个民族的共同理想。除了自恋力比多，它还束缚了一个人大量的同性恋力比多；后者通过这条道路返回自我。未能完成这种理想所造成的不满，会释放同性恋力比多，而它会转化为罪疚意识——社会性焦虑。罪疚意识最初是对父母惩罚的焦虑；更准确地说，是对失去父母之爱的焦虑。后来，父母的位置由数量不定的同伴群体取代。这样一来，偏执狂何以经常由自我受损、由自我理想领域中的满足受挫引起，就变得更容易理解；同样更容易理解的还有：理想形成34与升华在自我理想中汇合，升华在妄想痴呆疾病中发生退行35，以及理想可能在那里得到重塑36。

1　《弗洛伊德全集》德文版第10卷。这个题名并非确切意指“导论某个已经阐发完成的概念”，而是把这个观念引入精神分析理论并对它加以阐发。——法译者注

2 Befriedigung。satisfaction［满足］是常用术语，对应于驱力得到“平息”。我们最终舍弃了 gratification［满足、奖赏］一词，因为它会过于不可避免地引出后弗洛伊德心理学家的“挫折—满足”词对。——法译者注

3 O. 兰克：《对自恋的一项贡献》（Ein Beitrag zum Narzissmus），《精神分析研究年鉴》第3卷，1911年。

4 关于这一点，参见《施雷伯主席个案分析》中对“世界末日”的讨论，《年鉴》第3卷（《弗洛伊德全集》德文版第8卷），1911年；另见阿布拉罕：《癔症与早发性痴呆的心理—性差异》（Die psycho-sexuellen Differenzen der Hysterie und der Dementia Praecox），《精神分析临床论集》，1908年，第23页及后续页。

5 文本多处提示我们继续沿用经济学、甚至银行业务的隐喻。——法译者注

6 参见我的《图腾与禁忌》中的相应段落，1913年（《弗洛伊德全集》德文版第9卷）。

7 S. 费伦齐：《现实感的发展阶段》（Entwicklungsstufen des Wirklichkeitssinnes），《精神分析国际杂志》第1卷，1913年。

8 Verliebtheit = 爱恋激情。这个词在两种语言中都很常用，其共鸣也可相互比拟。——法译者注

9 这种“世界末日”有两种机制：或者全部力比多投注汇入被爱对象，或者返回自我。

10 《力比多的变形与象征》（Wandlungen und Symbole der Libido），《精神分析研究年鉴》第4卷，1912年。

11 《精神分析国际杂志》第1卷，1913年。

12 《精神分析理论表述之尝试》（Versuch einer Darstellung der psychoanalytischer Theorie），《年鉴》第5卷，1913年。

13“灵魂只栖身于臼齿那狭窄的洞穴里”（Einzig in der engen Höhle. Des Backenzahnes weilt die Seele），载《巴尔杜因·贝赫拉姆》（Balduin Bählamm）。——法译者注

14 Ichveränderung。Veränderung 一词在本文中多次出现；为了维持统一译法，法文只能采用 modification［改变］。不过必须指出，Ichveränderung 在弗洛伊德那里经常具有更专门的含义，即一种对自我能力产生不利影响的改变；因此，法文在这种情况下选择 altération du moi［自我受损］作为对应词。——法译者注

15 Erkrankung［患病、疾病损害］。——法译者注

16 Stauung［淤积］。Stase［淤滞］是相应的医学术语。——法译者注

17 参见《神经症患病类型》，1913年，《弗洛伊德全集》德文版第8卷。

18 Infolge von Versagung［由于 Versagung］。尤其受到当时学习心理学研究的影响，frustration［挫折］一词逐渐被用来指有机体客观缺少愉快刺激的条件。但无论在一般德语还是在弗洛伊德那里，Versagung 都具有更多含义：它带有“拒绝”的色彩——词根 sagen 意为“说”——而且使实施挫折的行动者保持不确定；行动者有时正是主体本人，他可能“宣布退出”或“拒绝自己”。下文中，我们把 das Versagen 译作“失败”。作出这些保留以后，由于找不到在所有情况下都有效的其他译法，我们仍保留法文 frustration，但赋予它在弗洛伊德那里更宽泛的含

义：主体的一项驱力要求所寻求的满足遭到拒绝，或者主体自己拒绝这种满足时所处的状态。——法译者注

19 《新诗集·创世歌》（Neue Gedichte, Schöpfungslieder）第七首。——法译者注

20 Nach seinen Versagen［在其失败以后］。——法译者注

21 医学行话，用来指一种症状或综合征被误认成另一种症状或综合征的情形。——法译者注

22 Selbstachtung［自尊］。——法译者注

23 Idealich［理想自我］。——法译者注

24 Das wirkliche Ich［现实自我］。——法译者注

25 Dieses neue ideale Ich［这个新的理想自我］。——法译者注

26 Ichideal［自我理想］。——法译者注

27 Das Verständnis des sogenannten Beachtungs- oder richtiger Beobachtungswahnes；直译即："我对所谓受注意妄想——更准确地说，受观察妄想——的理解。"这段话很难翻译。弗洛伊德在此所指，是德国精神病学家称作 Beachtungswahn 的现象；法国精神病学文献中没有与它完全对应的术语，因而很难不借助迂回说法来翻译，因为 Beachtung 指别人对主体所给予的注意。最后，Beachtung 与 Beobachtung 具有相同词根，而后一个词又增加了一层含义：受到注意的对象被设定为观察对象。——法译者注

28 Die Mitmenschen［与我们共同生活的人；其他人］。——法译者注

29 Innenforschung［内在探究；内省］。——法译者注

30　我再加上一个简单假设：这个观察机构的形成与强化，很可能把（主观）记忆以及时间因素的晚期发生包含在内；而时间因素并不适用于无意识现象。

31　我无法在这里判定：这个审查机构同自我其余部分之间的区分，是否足以从心理学上奠定哲学在意识与自我意识之间所作的区分。

32　Selbstgefühl。即自尊感，或者法国人通常所说的“自尊心”（amour propre）。我们更愿意采用前一种译法，因为这段论述的走向，正在于最终把一种表面看来并非爱欲性的自尊感——“优越感”或“自卑感”——追溯到力比多。——法译者注

33 Sehnen［炽烈渴望］。——法译者注

34 Idealbildung［理想形成］。——法译者注

35 Rückbildung［退行］。——法译者注

36 Umbildung［重塑］。——法译者注

第12课 · 1954年3月31日

勒克莱尔

奥克塔夫·曼诺尼

在瓦莱里的《纳喀索斯残篇》（Fragments du Narcisse）中，可以看到原初自恋和次级自恋，诗中还阐述了一套小小的理论：

> 梦我吧，梦我吧！……没有你们，美丽的泉水，
>
> 我的美、我的痛苦，对我都将无法确定。
>
> 我会徒然寻找自己最珍爱之物，
>
> 它朦胧的温柔会令我的肉身惊诧；
>
> 我悲伤的目光，不知自身的魅力，
>
> 会把泪水投向我以外的人……

［保罗·瓦莱里：《纳喀索斯残篇》，收入《魅力集》（Charmes）］

因此，他便转向了次级自恋。

拉康

勒克莱尔曾为我们研读这篇困难的文本；今天，他将继续围绕 Zur Einführung des Narzißmus（《论自恋：一篇导论》），向我们提出他的思考，必要时也提出问题。

塞尔日·勒克莱尔——我想，我们关于这篇文本已经说了不少；它包含的东西实在很多。

拉康

如果您愿意，就从第二部分重新开始，也尽量引用原文。我们确实必须让大家认识这篇文章，因为许多人手头没有文本，读不到它；这很遗憾。

塞尔日·勒克莱尔

我来概述一下。其实它无法概述：几乎必须全文引用，再把第二部分中同我们有关的段落重新提出来。你们还记得，第一部分确立了力比多的根本区分，其中也有一些重要论据；您正是据此提出了关于生殖质的那些考量，是吧？

在第二部分，他继续告诉我们：研究早发性痴呆——也就是他称为妄想痴呆的那一组疾病——无疑仍是研究自我心理学的最佳进路。不过，他在第二部分并不沿这条道路前进，至少不会继续考察它；他首先还会列出另外几条道路、另外几项能够引导我们思考自我心理学的考量。

他从器质性疾病对力比分布的影响出发；这可以看作通向心身医学的一篇极佳导论。他提到自己曾同费伦齐谈过这个问题，并从下面这项观察出发：患病、受苦时，患者把自己的力比多投注撤回到自我之上。他认为这是一项平常的考量，却仍需要加以考察。患者把力比多投注撤回到自我之上，以便在痊愈以后再次把它释放出去。在这个阶

段，他从对象撤回自己的力比多投注，力比多与自我兴趣便再次混合在一起，再次有着相同的命运，无法相互区分。

拉康——您查过威廉·布施那条引文了吗?

塞尔日·勒克莱尔——哪一条？“在狭窄的地狱里”那一句吗?

拉康

不，不。那不是 Hölle［地狱］，而是 Höhle［洞穴］；是一个洞，不是地狱。威廉·布施是一位你们本该熟读的幽默作家。他有一部令人难忘的作品，叫作《受阻的诗人巴尔杜因·贝赫拉姆》（Balduin Bählamm, le poète entravé）。主人公的遭遇令人动容。这里提到的是一场牙痛；它使［……］那些理想主义、柏拉图主义式的遐想和爱的灵感全部暂停。非常有趣。他忘记了股票行情、税收和乘法表；一切平日里显得真实而重要的惯常存在形式，突然都失去吸引力，并且被归于虚无。此刻，灵魂栖居在臼齿的小洞里——不是地狱里；这是一种对世界之痛的投注，而股票行情和乘法表正是这个世界的象征。

勒克莱尔

我想，他接着先转到另一个问题：睡眠状态。在这种状态中，力比多位置同样发生自恋性的撤回。

拉康——［对佩里耶说］您研读过这篇文章吗？今晚就开始吧；这是一篇困难的文章，也是我们这组课程的一部分。

塞尔日·勒克莱尔

随后回到疑病症，考察它同器质性疾病之间的差异与共同点。他［弗洛伊德］由此触及一种看法：二者之间的差别，是有没有器质性损害；而这种差别或许并不具有任何重要性。至少，他在某一点上得出了这项考量。不过，对疑病症和器质性疾病的研究，首先使他进一步明确：疑病症患者那里无疑也会出现器质性变化，属于血管舒缩障碍和循环障碍的层次。他还阐发了身体任一区域的兴奋同性兴奋之间的相似性，并引入性感带的“性感性”概念；他说，性感带能够：

> “……替代生殖器并像它那样活动，也就是说，成为各种表现与释放的所在地。”

他告诉我们：器官性感性的每一种此类变化，都可能同自我中力比多投注的变化平行发生。这再次提出了心身问题。无论如何，经过这项关于性感性以及身体任一部位都可能发生性感化的研究，他作出如下假设：疑病症或许可被归入依赖自我力比多的神经症，而其他现实神经症则依赖客体力比多。

不过，我的印象是：这段内容在第二部分总体中只是一个段落，不如第二部分的第二段重要；后一个段落中，他为我们界定了两种对象选择类型。

拉康

不过，这时最关键的评注是……

你们知道，Verarbeitung 很难翻译；élaboration［阐发、加工］并不完全贴切。

……对于力比多的这种“加工”来说，它发生于现实对象还是想象对象上，几乎没有差别。只有后来，当力比多转向非现实对象时，差别才会显现。这一点取得了他刚刚说出的含义：它导致一道堤坝——libido-dämmen——即对力比多筑坝；这种阻滞［……］。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所涉及的是自我的力比多，它由此立即把我们引向自我恰恰具有的想象性特征。

奥克塔夫·曼诺尼

这个德语词应当表示修筑堤坝。它似乎具有一种动力学含义，同时意味着水位上升，因而也意味着力比多能量越来越强。英语的 damming［筑坝、阻塞］很好地传达了这一点。

拉康

甚至是 damming up［筑坝蓄积］……顺便说一下，这里有一小段海因里希·海涅的引文，出自通常同《歌集》（Lieder）一起收入的《创世歌》（Schöpfungslieder）。这是非常奇特的一小组七首诗，讲的是对造物主所作的某种极为奇特的［……］。透过这些诗的反讽与幽默，显然可以看到许多同我们的形成心理学（Bildung）有关的东西。

它们向我们表明，上帝把若干东西成双创造出来，尤其是：

“我的荣耀创造出牛和太阳……”

［起初，上帝创造了太阳，　随后创造夜间的群星；　接着他又创造出牛，用的是自己额头的汗水。

后来他创造出野兽， 还有利爪凶猛的狮子； 他照着狮子的形象， 创造出漂亮的小猫。

为了让荒野住满生灵， 此后人类得到创造； 他又照着人优美的形象，造出了有趣的猿猴。

撒旦看着这一切，笑道： “嘿，主在复制他自己！ 他照着自家牛的形象， 末了还要再造出牛犊！”

海因里希・海涅： 《创世歌》第一首]

起初，上帝创造了太阳，
随后又创造了天上的星辰；
然后，上帝用额头的汗水，
创造出牛。

后来，他创造出野兽，
又造出利爪凶猛的狮子；
随后以狮子为范型，
创造出漂亮的小猫。

为了让大地住满生灵，
此后人类得到创造；
猿猴正是照着人
优美的形象塑成。

撒旦看着他，笑道：
“这种抄袭实在可耻；

主竟照着自家牛的形象，
塑造出牛犊！”

“真正有趣的，是猿猴”；上帝仿佛为了自己的乐趣而这样称呼它们［……］。在前一段里，魔鬼还非常和气地说，上帝是在尝试模仿自己！这些诗写于1839年，早于《物种起源》问世；当时，人们还可以十分自由地把猿猴说成上帝的一项奇想。

不过，他所进行的这类游戏仍然相当深刻……走得相当远。值得注意的是，弗洛伊德在这里引入了一个问题，或者说此刻提出了从自恋中走出的意义问题。因为归根到底，问题正在这里：人为什么会不满足？在科学论证的一个真正关键时刻，他只借助一项诗性参照给出回答，说道：

［疾病大概曾是
全部创造冲动的最终根由；
我能以创造求得痊愈，
我在创造中恢复健康。
——海因里希·海涅：《创世歌》第七首］

疾病是第二个理由，
它促使我创造；
创造拯救了我，
创造使我痊愈。

“疾病——在这里说话的是上帝——正是全部创造冲动的最终根基；我能够在创造中痊愈，我在创造中恢复了健康：wurde ich gesund。”

塞尔日·勒克莱尔

也就是说，他提到的那种内部工作——对于它，现实对象与想象对象是等价的——我补充这一点，是为了定位……

拉康

他没有说二者等价。他说，起初，把它视作发生在现实对象还是想象对象上，是无差别的。他说，在我们当前讨论外部世界形成的这个位置上，把二者分别视作现实对象和想象对象，并无差别；只是到后来，筑坝造成的效果出现时，差异才显现。因为整段论述都在把他那时仍称为"现实神经症"的产生同另一种产生并列起来；这个说法一直保留到很晚，直至他着手以略有不同的方式阐发《抑制、症状与焦虑》前夕。

那时，他把疑病症看作［……］自我力比多的扰动。因此，在偏执性疾病和疑病性疾病中，［……］占据着同焦虑在转移神经症中相同的位置。这也留下了一个尚未解决的问题；等到我们讨论［……］施雷伯主席个案分析时，还会重新处理它。与此同时，这也是围绕精神病发生问题的一种［……］。

塞尔日·勒克莱尔

那么，我来谈第二部分的第二小节。他告诉我们，研究自恋还有另一条［……］，即第三条道路；它存在于男性和女性爱恋生活方式的［……］差异中。他由此区分出两种选择类型，可以译成依托型与自恋型，并考察它们的发生。于是，他说出下面这句话；我们可以从这里出发：

“人有两个原初性对象：他自己，以及照料他的女人。”［我们说，人有两个原初性对象：他自己和照料他的女人；这里，我们预设每个人的原初自恋，而这种自恋最终可能在其对象选择中占据主导并表现出来。］

拉康——“他自己”，也就是说，他自己的图像；这一点非常清楚。

塞尔日·勒克莱尔

不过，他更详细地阐述了这种选择的发生及其形式本身：他观察到，最初的自体性欲满足在自我保存中具有一项功能。接着，他指出，性驱力起初依托于自我驱力的满足，后来才变得自主。因此，儿童最初爱的是满足其自我驱力的对象，也就是照料他的人。最后，他界定了自恋型对象选择：

“它尤其清楚地见于——他说——力比多发展受到扰动的人。”

拉康——也就是说，神经症患者。

塞尔日·勒克莱尔

这两种基本类型对应于——正如他先前向我们预告的——男性和女性这两种基本类型。

拉康——两种类型：自恋型与 Anlehnung［依托型］。

塞尔日·勒克莱尔——Anlehnung 带有依靠、支撑的含义。

拉康

它同后来得到发展的依赖概念并非毫无关系，但它是一个更广、更丰富的概念。很清楚，他此刻向我们列出了一份清单——可以说，是各种不同的爱恋固着类型；它排除了对所谓"成熟关系"的任何参照，而后者正是精神分析关于爱恋生活心理学的一则神话。他此时显然并未陷入这则神话，因为他列举的类型完整覆盖了爱恋固着、即 Verliebtheit［爱恋激情］的场域。自恋型由下面这些项目得到规定：人所爱的是：

1）自己现在所是的东西——他在括号中明确写道：自己本人；

2）自己过去所是的东西；

3）自己想要成为的东西；

4）曾经是自身一部分的那个人。

这就是 narzißtischer Typus［自恋型］。

［下面简要概览对象选择的各条道路，可以为这些提示性评注作结。人所爱的是：

1）依照自恋型：a）自己现在所是的东西（自己本人）；b）自己过去所是的东西；c）自己想要成为的东西；d）曾经是自身一部分的那个人。

2）依照依托型：a）哺育自己的女人；b）保护自己的男人；以及由他们延伸而来的一系列替代人物。］

你们会看到，依托型并不更少具有想象性，因为它同样建立在认同的倒转上：主体认同于一种原初情境。这时，人所爱的是哺育自己的女人和保护自己的男人。

塞尔日·勒克莱尔

到这里，我们就触及他给出的概述；前面略作展开，我想这里便是总结。他提出若干考量，作为支持儿童原初自恋构想的间接证据；他主要从父母看待子女的方式中发现这些证据——这样说来还颇有趣。

拉康

这里所涉及的是自恋施加的诱惑；文本把它描写得非常形象。对于任何人来说，完整意义上把握一个呈现出自恋型特征的存在——一个封闭、自我闭合、自足的世界——都会令人着迷并得到满足；他指出了这种根本而完整的把握，又把它同任何美丽动物所发挥的那种至高诱惑相提并论——“诱惑”这个词蕴含在文本之中。

塞尔日·勒克莱尔

他说：“孩子陛下。”孩子又稍有不同：父母把那种理想投射到他身上，孩子由此成为父母造就的东西。

拉康——“His Majesty, the baby［婴儿陛下］。”

塞尔日·勒克莱尔

必须把它认作父母早已放弃的自恋之复苏与再现。这里还引入了若干新概念。他说，自己将把儿童原初自恋所受的扰动暂置一旁；尽管这

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题目，是一块值得专门处理的材料，因为阉割情结问题恰恰同它相连。他趁此机会更准确地定位阿德勒的男性抗议概念，把它放回恰当的位置……

拉康——不过，这个位置并不小……

塞尔日·勒克莱尔

是的，它非常重要。不过，他把男性抗议同原初自恋的这些扰动联系起来。我们可以在这里停一停，但它似乎并不处在本文的主线上。于是，我们触及下面这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正常成人的自我力比多后来怎样了？难道我们应当承认，它已经全部汇入对象投注之中？

他排除了这项假设，并指出——或者说提醒我们——压抑存在，而且归根到底具有一种正常化功能。我们可以这样概括他的话。

“然而，这种压抑——他说，这也是其论证的关键——来自自我……”

拉康

“……来自自我的伦理与文化要求。”

［我们已经知道，力比多驱力冲动若同个体的文化表象和伦理表象发生冲突，便会遭遇致病性压抑这种命运。］

这又一次得到了强调。

勒克莱尔

我想准确引用他的原话，以给出一个非常确切的例子：

“同样的印象、同样的事件，同样发生于某个个体的冲动和兴奋——例如，一个人允许它们在自身中产生，或者至少在意识中加以加工；另一个人却对同样的冲动和兴奋满怀愤慨地予以拒绝，甚至在它们成为意识内容以前便将其扼杀。”[同样的印象、亲历经验、冲动与欲望冲动，一个人会允许它们在自身中存在，或者至少在意识中加以加工；另一个人却满怀愤慨地予以拒绝，或者在它们成为意识内容以前就将其扼杀。]

这里存在一种因个体、因人而异的行为差别。他试着这样表述这项差别：

“我们可以说，一个人在自身内部树立了一个理想，并以它衡量自己的当前自我；另一个人却没有这样的理想。因此，从自我一方来看，理想形成就是压抑的条件。童年时真正自我所享有的自爱，如今转向这个理想自我。自恋仿佛已经转移到这个新的理想自我之上；后者同幼儿自我一样，拥有自我的一切珍贵而完美的品质。正如在力比多领域中始终发生的那样，人表明自己无法放弃曾经获得的满足。”[德文原文依次写作：自爱如今朝向这个理想自我（Idealich）；童年时享有这种自爱的是现实自我（das wirkliche Ich）。自恋仿佛已经移置到这个新的理想自我（dieses neue ideale Ich）之上；后者同幼儿自我一样，拥有一切珍贵的完美品质。正如在力比多领域中始终发生的那样，人表明自己无法放弃曾经享受过的满足。他不愿失去童年时的自恋性完美；成长过程中的告诫扰乱了他，他自己的判断力又被唤醒，因而无法继续保有这种完美，于是便试图以自我理想（Ichideal）这种新形式重新获得它。他投射到自己面前、作为自身理想的东西，正是其童年

时期已经丧失的自恋之替代物；在童年，他自己曾经就是自己的理想。]

正是在这里，他第一次使用理想自我这个术语。童年时真正自我所享有的自爱，如今转向这个理想自我。这里有两个术语：Idealich［理想自我］和 Ichideal［自我理想］。个体不愿放弃童年时的自恋性完美，因而试图以一种新形式重新获得它；到这里，他使用的是自我理想这个术语。

相关知识卡 Idealich 与 Ichideal：理想自我和自我理想

拉康

不是吗！考虑到弗洛伊德行文的严谨性，这正是本文的谜团之一。勒克莱尔非常准确地指出：两个术语以一种十分显著的方式共同出现在同一段落中。

塞尔日・勒克莱尔

我刚刚引用过：

“我们可以说，其中一人树立了一个理想，并以它衡量自己的当前自我；另一人则没有这样的理想。因此，从自我一方来看，理想形成就是压抑的条件。”

拉康——那是下一段。

勒克莱尔

不过，他把理想说成一个参照项，这一点仍然很重要，因为他写道："……树立了一个理想，并以它衡量自己的当前自我。"接下来的段落是：

"童年时真正自我所享有的自爱，如今转向这个理想自我。"

拉康——是现实自我，不是"真正自我"；原文是 das wirkliche Ich。

勒克莱尔

"自恋仿佛已经转移到这个新的理想自我之上；后者同幼儿自我一样，拥有自我的一切珍贵而完美的品质。正如在力比多领域中始终发生的那样，人表明自己无法放弃曾经获得的满足。他无法放弃童年时的自恋性完美，因而试图以自我理想这种新形式重新获得它。"

［自恋仿佛已经移置到这个新的理想自我之上；后者同幼儿自我一样，拥有一切珍贵的完美品质。正如在力比多领域中始终发生的那样，人表明自己无法放弃曾经享受过的满足。他不愿失去童年时的自恋性完美；成长过程中的告诫扰乱了他，他自己的判断力又被唤醒，因而无法继续保有这种完美，于是便试图以自我理想这种新形式重新获得它。他投射到自己面前、作为自身理想的东西，正是其童年时期已经丧失的自恋之替代物；在童年，他自己曾经就是自己的理想。］

注意这一点很有意思……

拉康——完全正确！

塞尔日·勒克莱尔——可以说，"形式"取代了"自我"。

拉康

而在这里，他使用的是 Ichideal［自我理想］，词的构成次序恰好相反。这标志着弗洛伊德此刻所指的是两种不同功能；这也正是今天向我们提出的问题：这究竟是什么意思？我们稍后会试着加以明确。

塞尔日·勒克莱尔

我现在注意到的是：当他以“理想自我”取代“自我理想”这个术语时，他又在“自我理想”前面加上了“新形式”。

拉康——当然！

塞尔日·勒克莱尔——他的自我理想的新形式，也就是他投射到自己面前、作为自身理想的东西。

拉康

下一段立刻阐明了这一点。在那里，弗洛伊德罕见地——在他的著作中几乎是例外——把话说得非常清楚，说明升华究竟是什么，以及升华与理想化之间的区别；这一区别极其重要。您译得很好，继续吧。

塞尔日·勒克莱尔

那么，他已经向我们提出了这一点：存在着这个理想自我；后来他又称之为自我理想，或自我理想的形式。他说，从这里进一步考察这种理想形成同升华的关系，只有一步之遥。于是，他恰恰提出了自我理想同升华之间的关系问题，并这样说道：

“升华是客体力比多的一个过程。相反，理想化涉及对象；对象由此得到放大和抬高，但其本性并未改变。理想化既可能发生在自我力比多领域，也可能发生在客体力比多领域。”［升华是发生于客体力比多之上的过程；它意味着驱力转向另一个远离性满足的目标，重音落在偏离性目标。理想化则是发生于对象之上的过程；对象通过这个过程得到放大和心理上的抬高，其本性却不发生改变。理想化既可能发生在自我力比多领域，也可能发生在客体力比多领域。］

拉康——也就是说，他又一次把二者准确地放在同一个平面上。

塞尔日·勒克莱尔

自我的理想化可以同失败的升华并存；意思正在这里。自我理想的形成提高了自我的要求，并且最大程度地促进压抑。

拉康

一者属于想象界平面，另一者属于象征界平面；因为文本已经明确指出，Ichideal［自我理想］的要求处在法则的全部要求之中。

相关知识卡 Idealich 与 Ichideal：理想自我和自我理想

塞尔日·勒克莱尔——因此，升华提供了一条迂回道路，使这项要求能够得到满足，而不致引起压抑。他以此作结。

拉康——成功的升华。

塞尔日·勒克莱尔

他以此结束这段讨论自我理想与升华之关系的短文。

“如果我们不得不找到一个特殊的心理机构，负责看守来自自我理想的自恋满足是否得到保障，并为此不间断地观察和监视当前自我，那也不足为奇——他接着说——。归根到底，假设存在这样一个承担警戒和保障功能的特殊心理机构，会把我们引向超我。”[如果我们发现一个特殊心理机构，负责看守来自自我理想的自恋满足是否得到保障，并为此不断观察当前自我、拿它同理想衡量，那也不足为奇。]

他以一个取自精神病的例子支持自己的论证；他说，在那里：

“这个机构在受影响综合征中格外清楚可见。患者抱怨……”

在谈到受影响综合征以前，他说，如果这样一个机构存在，我们就不可能发现它，只能把它假定为这样的机构。[倘若存在这样一个机构，我们就不可能偶然才发现它；只能把它认作这样的机构，并且可以告诉自己：我们所谓的“良心”正符合这种特征。]

我觉得这一点十分重要，因为在以这种最初方式引入超我时，他说它并不存在，说我们不会发现它，只能把它假定出来。他又说，我们所谓的良心承担这项功能，具有这项特征。他说，承认这个机构——他没有再作更多说明——恰恰使我们能够理解所谓受影响综合征；这个综合征在偏执性症状学中清楚显现：

“患者抱怨自己受到监视，抱怨听见声音，抱怨别人知道他们的思想、观察他们。他们是有道理的；这种抱怨有其根据。确实存在这样一种力量，它观察并批评我们的意图，而且在正常生活中存在于我们每个人身上。”

［患者抱怨说，别人知道他们的一切思想，观察并监视他们的一切行动；有些声音把这个机构的统治活动告知他们，而且很有特征地用第三人称同他们说话（“她现在又在想那件事”；“他现在走了”）。这种抱怨是有道理的，它描述了真相：确实存在这样一种力量，它观察、知悉并批评我们的全部意图，而且在正常生活中存在于我们每个人身上。］

拉康

它的意思并不完全是那样：

“如果存在这样一个机构，它就不可能是某种我们尚未发现的东西。”

他把这个机构同审查认同起来，不是吗？他通过若干例子使它显现出来：例如被影响妄想，也就是那个命令主体行动的机构；又例如梦的若干功能、“功能现象”中所界定的那些功能现象。这一点很重要，但我们完全无法在这里展开，否则会走得太远。不过，你们知道西尔伯勒的功能现象是什么：他突出了一种东西在梦中的形成作用；梦里的这种东西转译出主体对自身状态、自身机制——也就是主体滑入梦境时，把自身心理机制作为功能——所具有的某种内在知觉。

梦会立刻把它作一次象征性换位；这里的“象征性”只表示“图像式的”。西尔伯勒突出这项重要现象，是因为它显示出主体相对于自身自发分为两重的形式，而且这种形式在深处积极发挥作用。弗洛伊德没有特别强调这一点；他对西尔伯勒的功能现象始终抱持一种含混态度：一方面说它非常重要，另一方面又说，同最重要的东西——也就是我本人、弗洛伊德所揭示的机制：欲望在梦中的显现——相比，它终究是次级的。或许我没有同样强调它，是因为我本人的禀性使这类现象在

自己的梦中，没有像在其他人的梦中那样重要。原文确实就是这样写的。我已经记不起具体在哪一处；以后给你们找出来。

此外还有这种自我的警觉；弗洛伊德强调，它在梦中始终在场。它是睡眠的守护者，在梦的活动边缘显现，而且这个机构本身也常常随时准备对梦作出评论。主体自我仍然参与其中的这份残余显现为在场；同弗洛伊德此处以审查之名谈到的所有机构一样，它就是实施审查的机构。这个机构会说话；它是一个象征性机构。

塞尔日·勒克莱尔——接着，他从这里出发作出一种综合尝试，开始讨论……那里的自尊感。

拉康——Selbstgefühl。

塞尔日·勒克莱尔

……讨论正常人和神经症患者的自尊感。稍后还可以重新处理这部分；不过，我们可以先作概括，因为这种自尊感最终被追溯得很远，承认有三个来源：

- 原初的自恋满足；
- 成功这一标准，也就是全能欲望的满足；
- 以及从爱恋对象那里得到的满足。

他似乎保留这三项作为自尊感的根源。不过，这里对于自尊感还有更充分的讨论。我想，我们没有必要在此处理其中细节。就我而言，我更愿意回到这些补充评注中的第一项：他结束有关自尊感的段落时

说，幸福的爱对应于一种原初状态；在这种状态中，客体力比多与自我力比多不再能够相互区分。紧接着，他引入几项涉及整篇文章的补充评注。他这样说；我觉得这极其重要：

“自我的发展在于远离原初自恋，并产生一种重新获得原初自恋的强烈努力。这种远离通过力比多向外部强加的自我理想发生移置而实现；满足则通过完成这个理想而产生。”

［自我的发展在于远离原初自恋，并产生一种重新获得原初自恋的强烈趋向。这种远离通过力比多向外部强加的自我理想发生移置而实现；满足则通过完成这个理想而实现。］

这段关于自我发展的简短概述表现出一个运动：它经过某种远离，以理想为中介项，随后又返回原初位置。在我看来，这正是发展本身的图像。

奥克塔夫·曼诺尼——结构化。

拉康——对，正如曼诺尼说得很准确：结构化。

塞尔日·勒克莱尔

因为恰恰在这里，这种向一个理想的力比多移置，在我看来仍需要得到明确；两种可能必居其一：

- 要么力比多又一次移置到一个图像上、一个自我图像上，也就是一种自我形式上；之所以称它为理想，是因为它不同于自我现在的形式，也不同于自我过去的形式；

- 要么我们把自我理想——这个概念毕竟确实存在，贯穿整篇文本——称作某种超出自我形式的东西，也就是某种严格说来属于理想、更接近理念或形式秩序的东西？

拉康——同意。

塞尔日·勒克莱尔

我觉得，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既看到这句话的全部丰富性，也看到某种含混。因为一旦说到结构化，我们便把自我理想理解为自我理想的形式。不过，我认为仍不应忘记：这篇文本并没有在这里把问题明确下来。

让·伊波利特——您能把弗洛伊德的句子再读一遍吗？

塞尔日·勒克莱尔

“自我的发展在于远离原初自恋，并产生一种重新获得原初自恋的强烈努力。”[Die Entwicklung des Ichs besteht in einer Entfernung vom primären Narzißmus und erzeugt ein intensives Streben, diesen wiederzugewinnen.]

让·伊波利特——这里的“远离”是 Entfernung 吗?

拉康——对，准确说就是 Entfernung。

让·伊波利特——但我们是否应当把它理解成自我理想的产生?

塞尔日·勒克莱尔

不。他在前面已经谈过自我理想。

“这种远离通过力比多向外部强加的自我理想发生移置而实现；满足则通过完成这个理想而产生。”[Diese Entfernung geschieht vermittels der Libidoverschiebung auf ein von außen aufgenötigtes Ichideal, die Befriedigung durch die Erfüllung dieses Ideals.]

显然，只要这个理想能够得到完成……

让·伊波利特——它不可能完成，因为归根到底，它是超越性的起源：既具有摧毁性，又具有吸引力。

塞尔日·勒克莱尔

这并没有明说。不过，他第一次谈到理想自我，是为了说明自爱如今朝向这个理想自我。

奥克塔夫·曼诺尼

在我看来，这里有个问题。我们经常觉得彼此像在说不同语言。我想——这只是一项假设——或许应当区分人的发展与自我的结构化。类

似这样的区分可以让我们彼此听懂，因为进行结构化的确实是一个自我，但结构化毕竟又发生在一个正在发展的人身上。

拉康

对，我们讨论的就是结构化；确切说，正处在整个分析经验展开的地方，处在想象界与象征界的接合处。正如勒克莱尔刚才提出的问题：我们要知道，图像在这里发挥什么功能，而他所谓的理念又发挥什么功能。我们很清楚，理念从来不会独自生存；在这里，它同所有其他理念共同生存。柏拉图早已这样教导我们，谁也不能忘记。

让我们重新拿起这个小装置；几节课以来，我一直在想象界中把它展示给你们。我们先借它稍稍固定这些观念，再让它开始运作。我想，这终究会使问题清楚一些。我再提醒一次：它具有什么价值、意义和长处。

让我们从研究动物本能出发；这里的动物本身也是理想的，也就是成功的。所谓成功的动物，就是我们已经能够把握、其机制与运作令我们满意的动物。这个动物恰恰向我们提供……

我们眼前这篇弗洛伊德文本本身已经指出了这一点

……一种完满的景象：一个已经完成的世界，Innenwelt［内部世界］与 Umwelt［周围世界］彼此完美嵌合，甚至相互同一。正因如此，在我们看来，诱惑成为一种活生生的形式，和谐地展开其外观。

在本能运作中，发展向我们显示什么？它显示了所谓“图像”的极端重要性。雄刺鱼与雌刺鱼那种互补行为由什么启动？由各种 Gestalten

［格式塔］！让我们简化问题，只考察它们在某个特定时刻的运作。无论从雄性还是雌性一侧来看，动物主体都可以被视为受到某种东西捕获；这个东西本质上就是这种 Gestalt，一种［……］机制。

“触发”刺激是主体在字面意义上与之认同的东西。一旦雄鱼被卷入之字舞现象，整个机制就会由雄鱼自身同那个图像之间的某种相互关系在字面意义上发令启动；这套机制嵌入刺鱼的性行为循环。雌鱼同样被卷入这种相互呼应的舞蹈。归根到底，这不过是某种始终具有舞蹈性质之物的外部显现，是两个物体的引力运动——迄今为止，这仍是物理学中最难解决的问题之一；但自然世界却通过成偶关系和谐地实现了它。主体此刻同那个发令启动某种完整运动行为的图像完全同一；这项运动行为本身又以特定形式产生某种风格，把这道命令送回伴侣，并使伴侣继续舞蹈的另一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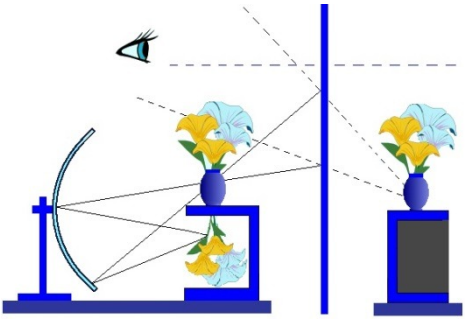
这个二者世界的封闭性，恰恰以最简单的状态向我们呈现出客体力比多与自恋力比多在同一种自然表现中的混合与结合；因为每一方对另一方的依附，正是由某种对这个图像的自恋性固着构成。它等待的恰好只是这个图像。这正是下面这项事实的根本基础：在生物秩序中，唯有同种伴侣——这一点总是太少受到注意——能够触发这种叫作性行为的特殊形式。只有少数例外；这些例外恰恰应当被看作自然表现中开启的某种误差通道。

这就是我们的出发点。可以说，在动物世界的性行为循环中，想象界支配一切。另一方面，甚至在动物层面，我们也正是在这里看到最强的移置可能性。我们已经在实验中利用它：向动物呈现一个诱饵，也就是一个假图像——例如一个并非真正雄性伴侣、只是带有主要特征的影子。许多物种到了生物学上要求发生性行为的时刻，会表现出相

应表型；此时，只须呈现这幅图像，便足以触发完全相同的行为。它仿佛同时突出了：

- 移置的可能性；它对于一切属于性行为秩序的东西都至关重要；
- 另一方面，还有其中显现的想象性特征；它就显现在我们以实验方式诱发之物的幻觉性质中。

这就是我们的出发点。那么，在人那里是不是也一样？归根到底，你们看到，我们刚才谈到的 Idealich［理想自我］，也可能就是这个图像。为什么不呢？然而，人们并不会想到把它称作 Idealich。它必定被安置在别处。我的小装置的长处正在这里介入。它的作用是什么？



我已经向你们解释过实像这一物理现象：球面镜可以产生实像；人能在现实对象所在之处看见它，它能嵌入现实对象的世界，并同现实对象一起得到调焦。为什么不可以进一步说：它甚至能够赋予现实对象某种想象性秩序，也就是以某种方式纳入、排除、定位、排列并补全这些对象？

到这里，你们看见了什么？无非还是我刚才在动物那里详细说明的想象性现象。归根到底，发生了什么？几乎恰恰是这样：动物让一个现

实对象［伴侣］同自身内部的那个图像发生重合。我甚至还要说得更多：正如弗洛伊德文本中某处指出的，图像同现实对象的这种重合，会强化图像，赋予它身体与化身。正是在图像得到强化的这个意义上，此刻会触发若干行为；这些行为以图像为中介，把主体引向、导向它的对象。

人那里发生的也是这样吗？

我们知道，人的性功能表现以显著的紊乱为特征；也就是说，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彼此适配。我们分析家围绕着学习、活动的这个图像——无论在神经症还是倒错中——恰恰向我们显示出这幅图像的一种分裂、爆裂与碎裂，显示出它的不适配与不相称，显示出这幅图像同其正常对象之间的一种捉迷藏、一种无法重合的游戏——只要我们还采纳性功能存在某种规范这一理想。

问题正是在这里向我们提出：我们怎样才能表象这套机制，说明这种紊乱的想象活动最终仍能设法完成自己的功能？为了让你们清楚跟上思路，我尽量使用简单词语；我们当然也可以采用更复杂的说法。

归根到底，我们仍在围绕这样一个问题打转：分析家们当着所有人的面使劲挠头，心急如焚地提出这个问题。随便拿起任何一篇文章就能看到；例如，我为了给你们讲解而读的最近一篇，是我们亲爱的迈克尔·巴林特写的。我预先告诉你们，他很快会来访并到我们的学会。归根到底：治疗的终点究竟是什么？

也许吧，我还不知道，这要看我到时有没有灵感……不过，我希望在本季度这组课程的最后一次课上，向你们谈谈分析的终结；显然，这会构成某种跳跃。我们对阻抗机制和转移的考察，或许还不足以让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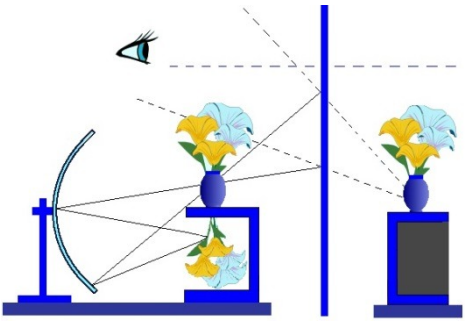
们这样做。不过，既然分析的终结是我们知识中最具神话色彩的概念之一，不妨从一开始就把它提出来。

这里提出的问题是：治疗的终点究竟是什么？我们是否应当把它视作一个自然过程的终点、一个自然结局？

所谓达到生殖器层面，那种著名的“生殖器之爱”——据说它不仅是向分析家许诺的黄金国，也是我们相当轻率地向患者许诺的黄金国——究竟是一个自然过程，还是一系列文化性渐近的结果，而后者只能在一定数量的病例中实现？

这样一来，分析及其终结便取决于各式各样的偶然条件。我们仍处在问题的中心。归根到底，所涉及的是什么？是要看另一个人、人的他者，在这种想象与现实的适配中严格说来发挥什么功能。归根到底，我们抵达的正是这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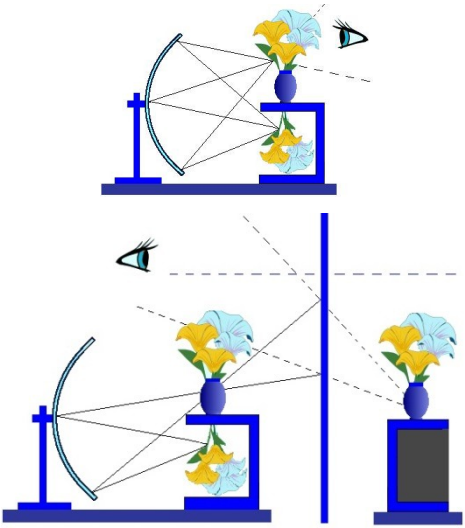
那么，这个小图式有什么长处？



上次课，我对它作了一项改进；这项改进也是我试图论证之事的一个关键部分。我已经向你们说明：只有在装置现实空间中的某个场域

内，才能稳定地看见这个实像。这个场域位于装置前方，由球面镜以及被倒置的花束构成。

只有在某个特定场域内，眼睛才能进行调焦——也就是产生深度与空间的视差运动、眼睛的这些轻微位移。由于光线反射定律，如果观察者离得太近或处在装置后方，能看见的东西就更少。不过，一个被安置在很远处的理想观察者，可以由镜中的虚主体充分替代。



换言之，我们知道：主体在镜中看见一个图像，与下面这种情况完全等价——相对于一个假设的观察者，现实对象会形成怎样的图像；这个观察者位于镜后，恰好处在主体看见自身图像的那个位置。因此，我发明的这套装置意味着：即使处在非常靠近实像的位置，人仍可以望向镜子，在更远处看见它。也就是说，你们以虚像状态看见这个实像。人那里发生的正是这种情形。只要你们准确理解这一点并能够简化图式，事情就会变得非常有意思。

这里只须画一面镜子、神话之眼，以及这里的想象对象［实像］。由于神话之眼所处的位置，它在这里看不见这个对象；但依照眼睛无疑属于理想的那个位置——也就是神话之眼在镜中的反射位置——它会在镜中以虚像状态看见这个对象。由此会产生什么？一种非常特殊的对称。这里所涉及的是什么？

归根到底，神话之眼的反射［自我理想］，也就是我们所是的那个他者，位于我们最初看见自己 ego［自我］的地方：位于我们之外的人形之中。这里的人形并不是为了捕获性行为而形成的，而是同某种直到弗洛伊德后来的著作中才会出现的东西相连：它从根本上同人类原初的无助有关，也同人看见自身形式——已经实现的完整形式、自身的幻影——位于自身之外这一事实有关。

这就是某一种自我功能的轨道；它使我们能够在自我功能中区分出若干项。你们由此看到：随着这面镜子的倾斜，那个并不存在的人物——为了让我们随时理解，他充当观看者——会发生变化；我们因而知道，真正存在的主体将在镜中看见什么，也就是一幅清晰或碎裂、不一致、残缺的图像。

这取决于什么？取决于最初那项评注所说的条件：观察者必须相对于实像处在某个特定位置，不能越出这个位置；过于靠近边缘，就看不清楚。这只须通过镜子的特定入射角就能实现；也就是说，为了看见这幅图像，一切都会如同观察者被置于场域之外。只有在某个特定圆锥内，人才会形成一幅清晰图像。

你们所看见的东西完善到何种程度，取决于镜子的倾角。

你们看见的图像会或多或少完善。这是镜中所见、而且只有在镜中才得到实现的实像；依照照到镜面各个构成区域上的入射角——也就是依照镜子的倾角——你们会或清楚或模糊地看见它。

充当观察者的这个人物——可以说，他是“理想的”［虚拟的神话之眼］——是你们借助镜子这一虚构而替代出来、用以看见实像的人物。只须让镜子产生某个倾角，他便会落入一个看得很不清楚的场域。单凭这一点，你们也会很不清楚地看见镜中图像。这里始终有某种很能发挥表象作用的反射；它呈现了人那里想象调焦的困难。

我们只须假定，镜子的倾斜——在镜像阶段所处的层次和时刻，它所代表的东西尚不存在；但此后，它由我们同他人的整体关系得到体现和实现，而这种关系在整体上对人至关重要，也就是象征关系——由他者的声音以及这个声音所说的话来支配；正是它控制着镜子的倾斜。

也就是说，在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模型中，你们只须假定：

- 镜子的这个入射角会对声音作出响应，你们便能理解这里所涉及的是什么；

- 装置的控制、对想象界的调节，可以取决于某种处在完全超越位置上的东西——用伊波利特先生的话说。就目前而言，在我们所处的层面，这里的超越无非是人与人之间的象征纽带。

这是什么意思？它指的是下面这些方式：

- 说得再明确些，指我们怎样通过某种称作法则和符号交换的东西，在社会层面彼此界定；也指我们怎样使各自不同的自我相互定位；

- 还指您——曼诺尼——和我——雅克・拉康——怎样处在某种关系中。这种关系依照我们所在的不同平面而相当复杂：我们可能一起待在警察局长那里，一起待在这间教室里，或者结伴旅行；所有这些都在某种象征关系中得到界定。

换言之，是象征关系界定了主体作为观看者的位置。正是言说、象征功能——图式为我们形象地呈现了这一点——能够界定想象界或多或少完善、完整和接近的程度。

这幅表象在 Idealich 与 Ichideal、即理想自我与自我理想之间作出了区分。自我理想控制着一套特定的关系游戏；同他人的全部关系都取决于它，而想象性结构化令人满足到何种程度，又取决于这种同他人的关系。从这样的图式中可以看到，想象的东西与现实的东西在同一层面、同一平面上运作。

相关知识卡 Idealich 与 Ichideal：理想自我和自我理想 ・ 倒置花束实验与拉康的光学图式

为了理解这一点，只须再对装置稍作改进：设想这面镜子像通常的镜子一样，其实是一块玻璃；也就是说：

- 你们既能在玻璃中看见自己；

- 又能看见玻璃另一边的对象。

这里所涉及的恰恰是某些图像同现实之间的重合。当我们谈到口腔现实、肛门现实、生殖器现实时，谈的就是这个：它显示出我们的图像与那些图像之间的某种关系。如果你们愿意，这些图像无非是人体图像，是世界的人化，也就是依照若干同身体结构化相连的先天图像来知觉世界。所涉及的正是这一点，也就是同时通过这面镜子、又穿过这面镜子发生的事情：现实对象同想象对象处在相同位置；归根到底，也就是：

- 图像本身所特有的东西；
- 所谓力比多投注；
- 一个对象由何成为可欲的；
- 它又由何同我们在自身内部携带的那幅结构各异、程度不一的图像相混合。

这个图式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便于操作的图式，使你们能够表象弗洛伊德始终谨慎区分、但对许多读者来说一直成谜的那项差别，也就是下面二者之间的差别：

- 局部论意义上的退行；
- 发生学退行、古老性退行，也就是人们所说的历史中的退行。

不过，下面这种情形完全可以设想——我们能够把它想象出来：球面镜中的这幅不完善图像，会依其位于中心还是边缘而形成或多或少成功的图像；随着镜子倾角改变，图像也会发生变化，而且不只是变得模糊不清，而是会遭到变形。也就是说，原初之口怎样转化为终端菲

勒斯；与其真正制作这样一套趣味物理学的小模型，设想这个过程或许反而更容易。

不过，你们看到，这一切所呈现的是：从人的层面说，任何真正有效而完整的调节，都只能通过一种相对于主体的介入才能建立；这项介入触及主体自身存在的物化——可以这样说——也触及分析至少以神话方式追求的某条道路所给出的东西。

我的欲望是什么？我在想象性结构化中处在什么位置？只有满足下面这些条件，才严格说来能够设想这个位置：

- 在它以外、在象征平面的层次上，有一个向导；它位于合法交换的层次，而这种交换除人与人之间的言语交换以外，不可能有其他体现；

- 有某种位于这个自我理想以外的东西控制着它，使它可以说能够以对立方式到来。

这项区分绝对关键；与此同时，它还使我们能够准确设想分析中在想象平面发生、并被称作“转移”的事情。要理解这一点——这正是弗洛伊德文本的长处——就必须理解 Verliebtheit［爱恋激情］是什么、爱是什么。

爱恰恰是发生在想象界层面的现象；相对于象征界，它会引起象征界的真正沉陷，引起严格说来所谓自我理想功能的某种取消和扰动。弗洛伊德在这篇文本中毫不含糊地写道：爱重新打开了通向完美的大门。

爱恰恰就是这样：当这个 Ichideal［自我理想］——作为说话者的他者，同我具有某种象征关系、某种升华关系的他者——当这种严格说来属于人的交换出现时；这种交换在我们的动力学处理上既同想象性力比多相同，却又不同于它，它恰恰叫作象征交换，也就是把人与人联结起来的东西，使言说成为这种纽带的东西。言说因而能够以一种不只是隐喻的方式认同人；甚至可以说，正如黑格尔所言，它孕育出有智慧的存在。

这个作为说话者的 Ichideal，来到对象世界中，定位于 Idealich［理想自我］的层面，定位于那种自恋性捕获能够发生的层面——弗洛伊德在整篇文本中一直对此不厌其烦地反复强调。你们可以想见，当这一切混合起来时，装置便不再可能得到任何调节。换言之，正如日常语言所说，一个人一旦陷入爱恋，便会发疯。

我想用一个小例子说明这一点：一见钟情的心理学。回想一下维特第一次看见绿蒂正在照料一个孩子：在 Anlehnungstypus［依托型］或依托关系的平面上，这是一个完全令人满足的图像。对于歌德笔下的主人公来说，对象同其根本内在图像的这种重合，触发了一种致命依恋——因为我们还必须阐明，这种依恋为什么从根本上说是致命的……

我们下次再处理它。

此刻，这个现象已经实现：爱就是这样；人在爱中所爱的，是自己的自我，是此刻在想象层面得到实现的自身自我。

我讲快一些，只为向你们指出下面这点：人们为了这些问题伤透脑筋。这些神经症患者在爱的层面受到如此彻底的阻碍，却怎样可能发

生转移？很清楚，问题正在于转移以一种绝对普遍、真正自动的方式发生；相反，爱的要求——人人都知道——却极其特定。

人并非每天都能恰好遇见那个为自己而成的图像，它同时向自己呈现最令人满足的欲望图像……我暂且撇开这次相遇的致命面向；我无法同时把一切都说出来。不过，突出这一面同样至关重要，我把它留到下次。

那么，在分析关系中，这种具有相同性质的东西，怎么会……

弗洛伊德在我交给格拉诺夫梳理的《论转移之爱》中，已经告诉了我们

……可以说，甚至在分析开始以前就发生？不过，在分析开始以前和分析进行过程中，它也许终究并不完全是同一件事。

我看时间已经不早；正如我一直向你们保证的，我不能把大家留到一点四十五分以后。我会从这个确切位置继续，也就是：分析情境的前提本身，怎样以一种绝对数学式、几乎自动的方式触发某项功能？甚至在分析尚未开始以前，由于分析家的在场与功能，这项功能便在被分析者—分析家关系中取得一个位置；它又怎样使我们能够让 Idealich［理想自我］的这项想象功能运作起来？从现在起，已经有某种东西定位在那里，并为分析家定位；这究竟是怎样发生的？

第13课 · 1954年4月7日

佩里耶

拉康

……这个想象界受某种印刻方式支配。我们可以把实在的特征呈现在图像上。阿兰先生曾强调：人无法在自己关于先贤祠的心理图像中数清柱子。我很愿意这样回答他：先贤祠的建筑师除外；整场游戏恰恰就在这里。借助这扇侧面的小门，我们进入了某种东西；你们很快会看到，今天将大量涉及实在、想象界与象征界的关系。

让·伊波利特

我们能否就光学图像的结构向您提一个问题？先问得粗略些，因为您刚才讲得有点快；我想请您说明一些物质层面的细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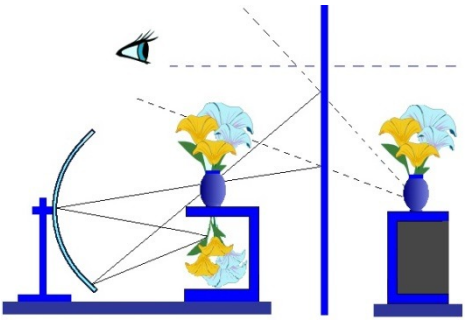
拉康——我很高兴您提出这些问题；正好让佩里耶喘口气……

让·伊波利特

也许是我理解得不太好；如果再谈一两次……请允许我向您提问。或许我在物质构造上没有理解清楚。

拉康

那么，如果连您都没有理解清楚，在座的其他人就更……



让·伊波利特

如果我理解得没错，这涉及物质构造：有一面球面镜；置于镜面中心的对象，会在镜面中心形成一个倒立的实像。这个图像本来可以落在屏幕上；不过，它没有落在屏幕上，我们也可以直接用眼睛观察它。

拉康

完全正确。因为它是一个实像；只要眼睛对某个平面调焦——这个平面又由现实对象标示出来——就能看见它。在实际实验中，一个倒置花束的图像来到现实花瓶的瓶颈处。只要眼睛对实像调焦，便会看见这个图像。当所有光线会聚于虚空间中的同一点时，它就能清楚形成；也就是说，对象的每一点都对应图像的一点。

让·伊波利特——眼睛处在光锥之内，就能看见图像；否则便看不见。

拉康

实验证明，要感知这个图像，观察者就不能过度偏离装置——也就是球面镜——的轴线；他必须处在镜面开口某种延长线的范围内。

让·伊波利特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放置一面平面镜，平面镜就会把被当作对象的实像变成一个虚像。

拉康

当然。凡能直接看见的东西，也都能在镜中看见；这恰如看见一个由现实部分与虚拟部分构成的整体，二者相互对称并逐项对应。虚拟部分在其中构成同对面的现实部分相对应的现象，反过来也是如此。因此，在镜中看见的东西——镜中虚像——呈现出来，就仿佛此刻充当对象的那个实像，正被镜内处于对称位置的一个想象的、虚拟的观察者看见。

让·伊波利特

我又像准备中学会考或医学预科 P.C.B.［物理、化学、生物：医学院一年级前的预备年］时那样，重新画了一遍光路：现实对象的实像、一个虚像，等等。不过，还有一只眼睛望向这面镜子，才能看见实像所形成的虚像。

拉康

只要我能够看见这里本会形成的实像，在中途放上一面镜子以后，我就会从自己所在的位置——这个位置可以在实像与球面镜之间变化，甚至可以位于后方——看见同一个实像显现在镜中，只要镜子安放得当，也就是垂直于刚才那条轴线。它的轮廓会衬在一片模糊背景上；这片背景是球面镜的凹面在平面镜中形成的。

让·伊波利特——我看向这面镜子时，会同时看见虚像状态的花束和自己的虚眼。

拉康

对，只要我的现实之眼确实存在，而且本身不是一个抽象点。因为我已经强调过，我们并不是一只眼睛。这里，我开始进入抽象层面了。

让·伊波利特——那么，我已经理解这幅图像了；剩下的是象征对应关系。

拉康——我接下来会试着向您稍作解释。

让·伊波利特

尤其是这种对应：现实对象、花朵、实像、虚像、现实之眼和虚眼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对应游戏？不妨从现实对象开始：在这个图式的象征对应中，现实的花朵对您来说代表什么？

拉康

这个图式的意义，当然就在于它有多种用途。弗洛伊德已经为我们构造过某种类似的东西；他尤其在《梦的解析》（Traumdeutung）和《精神分析纲要》（Abriss）中指出，心理机构必须以这种方式——作为形式、想象性现象——来设想。他在《梦的解析》时期已经这样说过。他画出一个由多层构成的图式，知觉与记忆由此分别铭写在这些层面上：一些构成意识，另一些构成无意识；它们同意识一起得到投射，并最终可能闭合成刺激—反应的形式——那是当时人们试图用来理解生命回路的平面。在这些不同层面中，我们可以看到某种仿佛由

若干摄影胶片叠合而成的东西。这个图式显然并不完善。我们必须始终假设……

让·伊波利特——我已经用过您的图式；我是在寻找最初的对应关系。

拉康

原初的对应关系吗？为了固定观念，我们可以在实像层面赋予它这样一种含义：实像具有容纳并同时排除若干现实对象的功能；例如，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自我的界限，并在某种辩证法中看见这些界限在实像层面形成。因为这一切无非是对关系的运用。如果你们赋予模型的某个要素一项功能，另一个要素就会取得另一项功能。让我们从这里出发。

让·伊波利特

例如，我们能否承认：现实对象意指 Gegenbild［对应像］，也就是自我的性对应物？我的意思是，在动物图式中，雄性找到 Gegenbild，也就是它在结构中的互补对应物。

拉康——既然必须有一个 Gegenbild……

让·伊波利特——这是黑格尔使用的词。

拉康

Gegenbild［对应像］这个术语本身，就意味着它同一个 Innenbild［内在图像］相对应；这也就是所谓 Innenwelt［内部世界］与 Umwelt［周围世界］的对应。

让·伊波利特

这使我能够这样说：如果现实对象——花朵——代表同感知着的动物主体相关联的现实对象——从动物角度说——那么，花瓶的实像便代表这个现实结构反映出来的想象性结构。

拉康

说得再准确不过。起初只涉及动物，装置也只涉及球面镜所产生的现象；也就是说，图像还只取我最初赋予它的那项定义、那种最初构造。球面镜产生实像之所以是一项有趣现象，正因为一个实像来到现实事物之间，同它们混合起来。

如果仅限于此，我们确实可以借它表象这种 Innenbild［内在图像］；内在图像使动物能够准确地寻找自己的特定伴侣——就像钥匙寻找锁，或者锁寻找钥匙——并把自己的力比多导向它应当投注的地方，从而繁衍物种。我曾经提醒过你们：在这种视角中，相对于类型，我们已经能够鲜明把握个体本质上的过渡性质。

让·伊波利特——物种的循环。

拉康

不只是物种的循环；个体还被类型捕获得如此彻底，以至相对于这个类型，它归于虚无。它——借用黑格尔的话，我不知道他是否真这样说过——已经死了：相对于物种的永恒生命，它已经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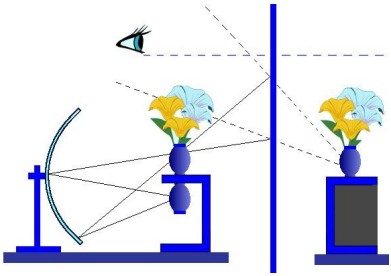
让·伊波利特

在评注您的图像时，我曾让黑格尔说出这句话："知识——也就是人性——是性行为的失败。"

拉康——我们在这里走得有点快了！

让·伊波利特

这只是那个循环……对我来说，重要的是：现实对象［依不同情形，是花朵或花瓶］可以被理解为现实个体在物种秩序中的现实对应物。不过，随后会在想象界中发生一种发展：这项对应物仅凭球面镜也变成一个实像；可以说，哪怕投射到想象界中的现实对象已经不在场，这个图像本身仍会发挥迷惑作用，吸引并捕获个体，一直延伸到平面镜那里。



拉康

例如，这已经使我们能够以图像方式把握某种东西：相对于外部世界的知觉，力比多捕获本身表现为某种增厚、凝缩和不透明化。至少在动物被卷入一种本能型行为循环时，可以说，它向外部世界开放到这样的程度……

你们知道，要测量动物感知到什么、没有感知到什么，是多么微妙而复杂。动物的知觉范围看来也远远超过我们从若干实验性——也就是人工性——行为中能够显现出来的范围。我们可以看到，它能够借助某些我们先前根本没有想到的东西作出选择。

……不过，我们同样知道，动物一旦卷入本能行为，便会深深陷在若干想象性条件里；结果恰恰是在它看来最不应犯错的地方，我们反而最容易用诱饵欺骗它。

换言之，对某些项目的这种力比多固着，在我们面前呈现得像一个漏斗。这就是我们的出发点。不过，对人来说必须构造一套稍微更复杂、更巧妙的装置，因为人那里发生的并不是同一回事。那么，如果你们愿意，这里……

既然我们已经从这里出发，既然是您今天好心地重新把我引到这里

……我看不出为什么不在这里重申黑格尔的根本主题：人的欲望是他者的欲望。我们怎样在模型中找到它？平面镜所表达的恰恰就是这一点。

也正是在这里，我们再次找到雅克·拉康那“经典的”镜像阶段——至少在一个小圈子里，它已经算得上经典。我们在这里重新找到它，因为发展过程中会出现一个转折、一个拐点：在某个时刻，个体对镜中

自身图像表现出某种胜利，仿佛以胜利姿态操演自身。根据他行为中的若干相关迹象，我们能够理解：主体第一次在这里提前把握某种东西，取得某种掌控。

在这里，我们具体触及另一种东西，也就是我所谓的 Urbild［原型］；不过，它的含义也不同于您刚才使用 Bild［图像］一词时的含义。这是某种东西的最初模型：人的这种迟滞、脱离与裂隙，正是在其中相对于自身力比多得到标记。因此，欲望得到满足，同主体追逐欲望的完成，二者之间存在根本差异；后者在本质上是另一种东西：

- 一种并非在特别原初、而是在关键转折时刻引入的否定性；
- 一种被引入欲望本身的否定性。欲望首先在他者中得到把握，其形式最为根本、也最为混乱，但此后又不断发展。

因为人的欲望相对于他者欲望的这种相对性，见于一切具有敌对和竞争的反应中，甚至贯穿文明的全部发展——包括那种亲切而根本的“人对人的剥削”。我们还远远看不到它的终结，因为它绝对是结构性的；黑格尔一劳永逸地承认，它构成劳动概念本身的结构。这里已经不再是欲望，而是活动作为严格意义上的人类活动所发生的完整中介化；它走上了人类欲望的道路。我们在这里找到的，就是二元起源。

关于图像的这种价值，我们看到：人的欲望如果原初就已经在严格属于人的想象界中得到定位和承认，那么这恰好发生在一个特定时刻；因为它不只通过主体自己的图像，还通过同类者的身体发生。人的意识正是在这时分离出来，成为自我意识。我们还会再回到这里。主体恰恰是在他者身体中认出自己的欲望，交换由此发生；只要他的欲望

已经越到另一边，他就会把他者身体同化于自身，并认出自己是一个身体。

不过，有一点无疑仍须完全保留为问号；没有任何东西允许我们肯定或断言：动物会拥有一种同自身身体本身相分离的意识，或者说，动物的身体性会成为一个能够对象化的要素，能够被安置在某处并被定位为身体。

让·伊波利特——既是定型的，也是雕像式的——取双重含义。

拉康

正是如此。相反，有一点对我们来说无疑是根本材料，甚至先于“苦恼意识”语域的任何涌现；像刚才一样赋予它最初的突现，它就位于我们的意识同身体之间的这种区分中。这项区分使我们的身体成为某种人为构造的东西：我们的意识固然无力同它脱离，却仍把自己设想成有别于身体的东西——也许这些词并不是最恰当的。

意识与身体之间的这项区分，发生在镜像经验涉及他者时那种突然的角色交换中。换言之，正如我们昨晚所说，也许所涉及的就是这一点：曼诺尼在谈到机制时向我们提出，在人际关系本身中，始终会引入某种人为因素，也就是把他人机制投射到我们自己身上。同样，我们之所以把自己认作身体，是因为那些对于认出我们的欲望不可或缺的他者也有身体；更准确地说，是因为我们像他们一样拥有身体。

让·伊波利特——与其说我不理解自身与身体的区分，不如说我不理解的是两个身体的区分。

拉康——当然。

让·伊波利特——既然自身被表象成理想身体，而我所感受到的又是另一个身体，所以这里有两个……？

拉康

绝不是！因为弗洛伊德经验的发现及其维度，正是在这里取得根本意义：在人最初的阶段，他绝不可能一开始就达到一个已经统合的欲望。他起初是一个碎裂的欲望。他在他者的这幅图像中认出并固定下来的，是一个碎裂的欲望；而镜像表面上的掌控，则至少以虚拟方式作为一种完整的、理想化的掌控给予他。

让·伊波利特——这就是我所谓的理想身体。

拉康

对。这就是 Idealich［理想自我］。而主体自己的欲望恰恰尚未构成；他在他者那里首先找到的，是自己欲望的一系列含混平面与异化形式，而欲望本身仍然是碎片状态的欲望。我们关于本能发展的全部知识都为此提供了图式：弗洛伊德的力比多理论，正是由若干部分驱力的保存与逐步组合构成；这些驱力可能成功，也可能无法成功地形成一个成熟欲望。

让·伊波利特

我想，我们确实意见一致。您刚才说“不”，不过我们确实意见一致。我说“两个身体”，只是指：我在他者那里、或者在自己的镜中图像里看到的那个已经构成的东西，实际上并不是我，而是超出我的东西。

我把它称作理想身体，既定型又如雕像一般；正如瓦莱里在《年轻的命运女神》（La Jeune Parque）中写道："但我的雕像同时战栗"——原句是这个词吗？也就是说，它发生解体。我所谓另一个身体，就是它的解体。

拉康

作为碎裂欲望的身体不断寻找自身，而作为自我理想形态的身体又被重新投射到主体一侧，成为碎裂的身体；与此同时，主体却把他者看作完美身体。对他来说，碎裂身体是一幅本质上可以被肢解的自身身体图像。

让·伊波利特

二者彼此重新投射，意思是：主体既把自己看作雕像，又同时发生肢解，把肢解投射到雕像之上；这是一场无法终结的辩证法。请原谅我为了确认自己理解无误，又重复了一遍您说过的话。

拉康

如果你们愿意，我们稍后再向前一步。总之，实在当然仍在这里，位于镜子这一边；那么，镜子之外有什么？我们已经看到，那里存在着同他者的镜像辩证法所构成的原初想象界；它绝对根本。顺便强调一下：我们可以从两个意义上说，它已经引入死亡本能的致命维度，也就是 destrudo［毁灭力比多］的维度：

1）它参与力比多捕获秩序中的一切事物对于个体那种无可挽回的致命性，因为这种捕获归根到底服从于永恒生命这个 x；

2）我认为，这正是弗洛伊德思想所突出的关键点，也是在《超越快乐原则》中尚未得到彻底区分之处：死亡本能在人那里取得了另一种意义，恰恰因为人的力比多从起初便可以说被迫经过一个想象性阶段。

此外，如果你们愿意，这个“图像之图像”恰恰由此得到说明：它为主体的力比多达到成熟、达到现实与想象的适配提供全部导引；我们原则上假设动物那里具有这种适配——不过，归根到底，我们又知道什么？——而且它似乎始终：

- 显得远为明显；
- 以至伟大的 natura mater［母性自然］幻想、乃至自然这个理念本身，都由此产生；
- 相对于这种适配，人以千百种方式表象自身原初的不适配；这种不适配甚至能够在其存在中得到完全客观的呈现，也就是他从生命起点便具有的特殊无助。

出生时的这种过早成熟并不是精神分析家发明的。至少从组织学角度看，这套在有机体中发挥何种作用尚有争议的神经装置，出生时显然尚未完成。正因为主体必须先使自身力比多达到完成，才能抵达其对象，才会引入这种特殊断裂；它延续在主体同另一个人的关系中，而这种关系对他来说远比对任何其他动物更为致命。他把这幅“主人图像”——归根到底，就是他在镜像形式中看见的东西——以一种完全本真的方式同死亡图像相混合，而且能够把它说出来。无论有没有人教过他，他从起初便面对“绝对主人”，因为他已经服从于这幅图像。

让·伊波利特——动物交配时也服从死亡，但它对此一无所知。

拉康——人却知道。他知道，而且亲身感受到。

让·伊波利特——甚至可以说，是他让自己走向死亡；他通过他者欲求自身的死亡。

拉康——我们都同意：爱是自杀的一种形式。

朗医生

您曾反复强调一个要点，但我没有充分理解它的作用，至少不理解您为何这样强调：观察者必须相对于这套装置处在某个特定场域中。从光学角度看，这不言而喻；但我看到您多次强调它。

拉康

确实！看来我泄露得还不够明显。您已经看见了一点端倪，却还没有看见它接在哪里。这里所涉及的东西同样可以在多个平面上运作：我们可以从结构化、描述或治疗操作的层面来解释。不过，你们看到，采用这样一个图式尤其方便：主体——也就是我的图式中的观察者——始终停留在同一位置，而这个图像在某个特定时刻呈现出的全部外观，却可以取决于某个反射平面的移动。

因为，如果只有从某个虚拟观察点才能足够完整地看见图像，而你们又能任意改变这个虚拟点，那么很清楚：镜子转动时，改变的不只是背景——也就是主体在深处能够看见的东西，例如他自己或自己的回声，正如伊波利特先生指出的。实际上，移动一面平面镜时，会有一些对象在某一刻离开视野；显然，离镜面最近的对象最后才离开。

这已经可以帮助解释 Idealich［理想自我］相对于另一个东西的若干定位方式；我暂且把那个东西保留为谜，并称它为观察者。你们当然可以想到，这里并不只涉及一个观察者。归根到底，它恰恰涉及象征关系，也就是言说从何处发出、话语从何处被说出的那个点。

但改变的不只这些。只要倾斜镜子，图像本身也会改变；也就是说，即使实像没有移动，单凭镜面改变，处在球面镜一侧的主体在镜中看见的图像，也会——我以为自己已经指出——从口的形式变成菲勒斯的形式，或者从或多或少完整的欲望，变成我刚才所谓的碎裂欲望。换言之，这使我们能够把局部论意义上的退行，同弗洛伊德所谓 zeitlich-Entwicklungsgeschichte［时间性的—发展史的退行］结合起来，显示二者可能存在的相关性——这也清楚表明，他本人在处理时间关系的一切问题时多么为难。

他说 zeitlich，也就是“时间性的”；然后加上一道连字符，再写“发展史的”。你们很清楚，Entwicklung［发展］与 Geschichte［历史］这两个词之间存在怎样的内在矛盾。他把三个词全部连接起来，然后就让你们自己想办法！不过，当然，如果我们已经无须再想办法，也就没有必要待在这里了；那反倒非常可惜。

继续吧，佩里耶。

弗朗索瓦·佩里耶

弗朗索瓦·佩里耶——是的，这篇文本[注1]……

> [注1]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梦学说的元心理学补充》（Metapsychologische Ergänzung zur Traumlehre，1915）；法译《梦理论的元心理学补充》（Compléments métapsychologiques de la théorie des rêves），收入《元心理学》，伽利玛出版社，1968年。

拉康——您觉得这篇文本有点恼人吗？

弗朗索瓦·佩里耶

确实！我想，最好的做法无疑是先勾勒文章的图式。我到现在所做的，无非就是这件事。我想，您接下来希望更准确、更细致地进入文本。这篇文章开头，弗洛伊德告诉我们：在某些疾病症状与使我们能够研究这些症状的正常原型之间建立平行关系，是有意义、有益而且富有启发的；例如哀悼、忧郁、梦、睡眠以及某些自恋状态。

拉康

顺便说，他用的是 Vorbild［范型］一词；这同 Bildung［形成］一词的方向十分一致，用来指"正常原型"。

弗朗索瓦·佩里耶

他接着研究梦；他的目的要到文章结尾才会显现，即深入研究自恋性疾病——例如精神分裂症——中所见的某些现象。

拉康——疾病状态的正常预示性范型：Normalvorbilder krankhafter Affektionen。

弗朗索瓦·佩里耶

接着，他告诉我们：睡眠是一种心理上的脱卸状态，使睡眠者返回一种类似于原初胎儿状态的情形。它同样使人脱去自己心理组织的一整个部分，就像入睡前摘下假发、假牙并脱去衣物。

拉康

很奇怪，也很有意思：谈到主体自恋的这幅图像——它被说成睡眠的根本本质——时，弗洛伊德作出了一项似乎并不太符合生理学方向的评注……这并不适用于所有人。睡前脱去衣服固然是常见习惯，但人们还会换上另一些衣服。

他突然向我们抛出这幅图像：摘下眼镜——我们中有些人有幸具有使眼镜成为必需品的缺陷——还要摘下假牙和假发。这是一幅存在者逐渐解体的可怕图像。恰恰由此，我们可以进入人的自我在何种程度上能够部分分解、特别容易拆卸，而且界限不准确的语域。因为归根到底，假牙当然不属于我的自我；但我的真牙又在何种程度上属于自我？毕竟它们如此容易替换。这里从一开始就把某种含混与不确定放到了最前面：严格说来，什么属于自我，自我的界限在哪里？这构成梦的元心理学研究导论的门廊；而门廊首先就是睡眠的准备，同时也是睡眠的含义。

弗朗索瓦·佩里耶

下一段中，他触及某种仿佛是后文全部研究之缩写的东西。没有读过余下部分时，它有些难懂。他提醒我们：研究精神病时可以看到，我们每次都会面对时间性退行，也就是每个病例都会返回自身发展的某

些阶段。他告诉我们，可以看到两种这样的退行：一种发生于自我发展，另一种发生于力比多发展：

- 他说，梦中同这一切相对应的力比多发展之退行，会使原初自恋重新建立；
- 梦中自我发展之退行，同样会导致欲望得到幻觉性满足。

从表面上看，这并不十分清楚，至少对我来说如此。

拉康——借助这个图式，也许会清楚一点？

弗朗索瓦·佩里耶——是的，先生；不过，我还没有进展到把这篇文本同您的图式相互对照的阶段。

拉康

正因为如此，我才请您今天停留在所有人都能跟上的层面。准确标出严格说来属于谜团的那些点，做得非常好。

弗朗索瓦·佩里耶

我们已经可以预感到一点：他从时间性退行、从主体历史中的退行出发；因此，自我发展之退行将抵达一种极其初级、原始、未经发展和加工的状态，也就是欲望的幻觉性满足。

他首先会带领我们同他一起重新走过梦过程的研究，尤其是研究所谓睡眠的自恋，以便根据实际发生的事情——也就是梦——深化我们对

它的认识。他先谈到梦的利己主义——这个术语稍微有些刺耳——并把它同自恋比较。

拉康——他怎样证明梦的利己主义？

弗朗索瓦·佩里耶——他说，在梦里，睡眠者本人始终是中心人物。

拉康

而且扮演主要角色。谁能告诉我 agnoszieren 的确切含义？这是一个我没有查到的德语词，但它的意思并不可疑：这个人物始终必须被认作本人——"als die eigene zu agnoszieren"。［因此我们知道，梦绝对是利己的；在其场景中扮演主要角色的人物，始终必须被认作本人。］谁能告诉我这个词怎样使用？安德烈［莱曼］？

他恰恰没有使用 anerkennen［承认］；这个词会引出我们在自身辩证法中不断赋予"承认"的那个维度。睡眠者本人是在什么层面上被认出来？是在我们的解释层面，还是在我们的占卜术层面？这并不完全是同一回事。anerkennen 的平面与 agnoszieren 的平面之间，我们理解的东西与我们知道的东西之间，恰恰存在全部差别；无论如何，这仍带有一种根本含混的印记。

因为可以肯定，弗洛伊德本人在《梦的解析》中分析那个著名的梦时，以最动人的方式向我们标示了［……］；我们越向前推进，就越能看到，最初这些接近梦之意义及其脚本的尝试何等富有天才。

［对 X 女士说］——也许您能说明一下这个 agnoszieren？

X 女士

弗洛伊德有时会使用当年维也纳通行的词；这个词在今天的德语中已经不用了。不过，您刚才给出的含义是正确的。

拉康

这种来自维也纳语境的含义确实很有意思。弗洛伊德在这里使我们极其深刻地把握他同兄弟式人物、同那位亦友亦敌者的关系。他告诉我们，这个人物在其存在中绝对根本，而且始终必须有一个这样的人，被这种 Gegenbild［对应像］所覆盖。

不过与此同时，正是通过这个人物——这里由他在实验室的同事体现——

我们在这些研讨班开始时曾提到过此人；当时，我们略微谈到弗洛伊德进入科学生活的最初阶段

……正是围绕、并通过这位同事及其行动和情感，弗洛伊德在梦中投射并赋予生命的，才是梦的潜在欲望，也就是他自身攻击性与野心的深层诉求。

因此，这个 eigene Person［本人人物］极其含混。我们必须在他者那里，在梦的意识内部——更准确说，在梦的幻影内部——寻找那个扮演主要角色的人物，也就是睡眠者本人。不过，他恰恰不是睡眠者，而是他者。

弗朗索瓦·佩里耶

于是，他追问自恋与利己主义是否其实是同一件事。他告诉我们，“自恋”一词只是为了更清楚地标示并强调利己主义的力比多性质；换言

之，自恋可以被视为利己主义的力比多补充。接着，他插入一段旁论，谈到梦的诊断能力。他提醒我们，梦里经常会显现某些器质性变化；这些变化在清醒状态中完全不显眼，却能使人可以说提前诊断出某种尚未在清醒状态中显现的东西。疑病症问题由此出现。

拉康

这里有点巧妙，也更需要功力。仔细想一想这意味着什么。刚才，我曾向你们谈到一种交换：在想象情境中，他者图像得到力比多化、自恋化。正如我刚才所说，它由此也变得不透明；动物世界的某些部分也曾以这种方式变得不透明并取得迷惑力。

因为归根到底，如果我们能够在梦里以纯粹状态 agnoszieren［认出］睡眠者本人，那么在清醒状态下——如果他没有读过《梦的解析》——［……］。不过，恰恰在这种程度上，颇令人惊讶的是：睡眠中，他作出细微区分与认识的能力反而增强；而他的身体，那些预告内部变化、属于身体内感受、能够在睡眠中向人发出信号的感觉，他在清醒状态的自足中反而无法感知。

恰恰因为梦中的力比多不透明化发生在镜子的另一边，主体的身体不是被感受得更差，而是被感知得更好、认识得更清楚。你们把握这套机制了吗？而在清醒状态下，恰恰因为他者身体被返送给主体，主体自身的许多东西才遭到误认。同样，自我是一种误认力量，这正是全部分析技术的根基。

不过，这一点走得很远，一直延伸到结构化和组织，因而严格说来也延伸到盲点化——我认为这里很适合使用这个词——以及各式各样的

信息：这些信息可能从我们自身来到我们自身。事实上，正是这种特殊游戏把这同样源于异域的身体性返还给我们。它甚至延伸到：

“他们有眼却看不见……”［《耶利米书》5:21］

暂且把它放到一旁。《福音书》里的句子始终必须按字面来理解；否则显然什么也理解不了，只会以为那是反讽。

弗朗索瓦·佩里耶

梦也是一种投射：一个内部过程的外在化。他提醒我们，内部过程的这种外在化，是一种防止醒来的防御手段。同癔症性恐惧症的机制一样，这里也有同一种投射；投射本身是一种防御手段，用来替代一种内部功能要求。不过，他说，睡眠意图为什么会遭到阻挠？原因可能是来自外部的刺激，也可能是来自内部的兴奋。内部障碍的情形更有意思，也是接下来要研究的情形。

拉康

必须仔细跟随这段论述，因为它使我们能够更严格地在分析中使用“投射”一词。这当然不等于我们始终严格使用它——远非如此！相反，我们总是用得极其混乱。尤其是，我们不断滑回经典用法，也就是日常所谓把我们的情感投射到同类者身上。但你们会看到，当系统一致性的法则迫使我们在分析中使用“投射”一词时，所涉及的并不完全是这个。我还会多次回到这里。因为，如果下个季度我们能够讨论施雷伯个案和精神病问题，就必须对“投射”一词可具有的含义作出最后的明确规定。

如果你们跟上了我刚才所说的，就应当清楚看到：这里所谓的内部过程，始终首先来自外部；它首先通过外部中介得到认出。

弗朗索瓦·佩里耶

那么，接下来要问的是，怎样可以说打破完美睡眠所具有的总体自恋；也就是看怎样解释梦，因为梦本身要求总体自恋的建立存在某些例外。换言之，为了让梦发生，各种投注不可能全部彻底撤回。

他首先告诉我们，众所周知，梦的促动者是日间残余。换言之，这些日间残余并未遭到投注撤回：剩下的东西至少仍得到部分投注——这已经在睡眠的自恋中构成一项例外。这些日间残余仍保留一定数量的力比多兴趣或其他兴趣，并以梦的潜在思想形式向我们显现。他说，鉴于总体情形并依照这些思想的本性，我们必须把它们视为属于前意识系统。

还必须解决另一项困难，可以概括如下：如果日间残余在梦中强行进入意识，这究竟是否依靠它们自身的能量？事实上，他说，很难承认日间残余到了夜间会获得足够能量，足以突破意识的张力；我们更倾向于认为，它们的能量其实来自无意识驱力。这个看法更容易接受，因为一切迹象同样表明，睡眠期间，无意识与前意识之间的堤坝大幅降低。

但他又说，这里出现了新的困难：如果睡眠意味着撤回无意识与前意识的投注，无意识又怎能投注前意识？为回答这个问题，必须承认，无意识的一部分——恰恰是遭压抑之物不服从由自我发出的睡眠欲望的那一部分——相对于自我保持某种独立性。由此立刻产生一个后果：驱力危险毕竟仍然存在。既然存在驱力危险，就仍然需要一种反

投注。因此，实施压抑的能量在睡眠期间也必须得到维持。它无疑有所降低，却仍须维持，以应对这种驱力危险。

他援引一种情形支持这项论点：睡眠者恰恰因为害怕自己的梦、因而害怕这些驱力要求而放弃睡眠。他又重新考虑某些日间思想保持投注的可能性；不过，只要这些日间思想可以说是驱力要求的替代物，事情仍然一样。总之，必须承认，能量会从无意识传递到前意识。最后，他给出如下公式：首先，前意识的梦之欲望形成；它使无意识驱力能够借助前意识日间残余的材料表达出来。

这里我也遇到了一项困难；昨晚，贝尔纳特神父和安德烈·莱曼帮助我时，我们共同遇到了这个问题：前意识的梦之欲望究竟是什么？

拉康——他所谓“梦的欲望”，就是无意识要素。

弗朗索瓦·佩里耶

正是如此。他说：首先形成前意识的梦之欲望——我猜是在清醒状态中——使无意识驱力得以借助材料、也就是前意识的日间残余表达出来。接下来便出现对这个梦的欲望的提问和研究；这让我为难，因为他在使用“前意识的梦之欲望”以后，立刻又把它称作梦的欲望，并说它无须曾在清醒状态中存在，而且可能已经具有一切无意识事物所特有的非理性性质。人们用意识的术语把它译出来。

拉康——这一点很重要。

弗朗索瓦·佩里耶——他说，必须谨防把这个梦的欲望同一切属于前意识秩序的东西混为一谈。

拉康

正是！请注意，我们可以用两种方式接受这点。通常，人们读过以后就这样接受：事情就是如此，有显在的东西，也有潜在的东西。但这样一来，我们会进入一系列复杂问题。显在的东西是某种组合，是梦的工作为了形成某种东西而达到的结果——它非常巧妙地偏转了第一种回忆形态，也就是主体能够向你们唤起的东西——这就是显在内容。

而构成它的东西，则是我们必须寻找、也首先会遇到的东西。这才真正属于无意识：我们或者找到它，或者没有找到；但我们始终只看见它从后方显出轮廓，可以说，它像一种具有导向作用的形式，迫使所有 Tagesreste［日间残余］——那些朦胧清醒的投注——以某种方式组织起来，最终产生显在内容。归根到底，显在内容是一幅幻影，同我们重建的东西、也就是无意识欲望，毫不相应。怎样才能用我的小图式来表象这一点？

伊波利特先生适时迫使我在本节课开始时，可以说把一切都稍稍投注进去。显然，我们今天无法解决这个问题，不过可以看看它会把我们带到哪里；总要前进一点。这里必须引入所谓装置的控制部件，也就是装置的可移动部分——那面著名的［平面］镜。

这一点已经确定：主体通过他者图像，在他者中意识到自己的欲望；这个图像向他提供自身掌控的幽影。归根到底，我们始终可以进行这种游戏。正如科学推理中经常把主体缩减成一只眼睛，我们同样可以把他缩减成一个瞬时人物：脱离自身发展，在同这幅关于自身的提前图像之关系中存在。

不过，他终究是一个人，出生时处在某种无助状态；词语和语言在极早的时候就已经对他有所用处，这一点毫无疑问。它们被他用来呼唤；当他的食物取决于哭喊时，那还是最悲惨的呼唤。人们已经充分突出这种原初养育关系，并把它同依赖状态联系起来。不过，这终究不应遮蔽：

- 主体同样从极早时候起，便已经命名这种同他者的关系；
- 某个人拥有一个名字，无论这个名字多么含混，它都指称一个确定的人；
- 人向人的状态之过渡，很快就确切发生在这里。

也就是说：应在什么时刻界定人开始成为人、成为一个人？就在他哪怕只以极小程度进入象征关系之时。我已经告诉并强调过：象征关系是永恒的；这不只因为实际上必须始终有三个人物，还因为符号从一开始便引入第三项——一个中介要素；它凭自身就能定位并改变在场的两个人物，使二者转到另一个平面。

我想再一次从远处重新说明这一点，哪怕今天不得不中途停下。你们知道，凯勒先生是一位格式塔哲学家；因此，他自认为远比机械论哲学家高明，并围绕刺激—反应主题作出各式各样的讽刺。他说：收到纽约某书商订购一本书的委托，事情实在很有趣。如果我们处在刺激—反应语域，我的反应便会接踵而来：我受到刺激，别人向我提出委托，我就会作出反应。但凯勒诉诸亲历直觉，极其有理地说：“哎呀，事情可没这么简单！”我不只是对这项邀请作出反应；我还处在可怕的紧张状态中。

写完这篇文章，同时也意味着格式塔的平衡概念只有在这种紧张取得相同形式——即文章得到实现的形式——时才会重新建立。收到这项呼唤以后，会出现一种动力性失衡状态；它并不只是一种反应。只有当这项呼唤得到承担、当完整回应的圆环——呼唤本身已经提前勾勒出它——得到闭合时，这种失衡才会得到满足。

很清楚，这绝不是充分的描述。它假设主体内部已经预先形成了正确反应的模型，也就是引入一个已经在场的要素；如果满足于此，就几乎等于用“催眠力量”给出一个近乎万能的回答：只要主体尚未实现或填满早已完整铭写在自身内部的模型，一切行动便只由这套生成关系产生。这无非是在更复杂的层次上转录机械论的答案。真正恰当的公式不能忽视象征语域，因为人正是经由它才构成其自身。

因为，从凯勒先生收到委托、回答“是”并签下承诺的一刻起，他已经不再是同一个凯勒先生。现在出现了另一个凯勒，也出现了另一家出版社——一家多了一份合同、多了一个符号的出版社；正如凯勒不再是从前那个凯勒，现在有了已经承担义务的凯勒先生。

我采用这个例子，因为它可以说十分粗糙而具体，直接把我们带入劳动的辩证法。不过，单凭我相对于某位先生把自己界定为“他的儿子”，又把他界定为“我的父亲”，就已经出现某种东西：它尽管看似非物质，却同把我们联结起来的肉身生育具有同样分量；在人的秩序中，它实际上更有分量。甚至在我能够说出“父亲”与“儿子”这些词以前，哪怕他本人已经糊涂得无法再说出这些词，周围的整个人类系统也早已把我们界定为父与子，并带来这一界定的一切后果。

因此，从自我到他者的辩证法，早已得到超越并被提升到更高平面：

- 通过我刚才谈到的这种同他者的关系；
- 通过语言系统本身的存在与功能；这个系统或多或少具有同一性，却从根本上同我们所谓规则、更准确说法则相连。

这条法则：

- 每次介入都会创造某种新东西；
- 几乎无论怎样介入，每个情境都会随之转变——除非我们说话只是为了什么也不说。

不过，即便如此——我在别处解释过——它也有自己的含义。

这种语言实现如今只能充当“……一枚磨损的硬币，人们默默地把它传来传去……”；我在自己的《报告》[注2]中引过这句话，它出自马拉美。这再一次表明语言的纯粹功能：它恰恰向我们保证我们存在，除此以外什么也不保证。说话可以什么也不说，同通常说话是为了某件事一样富有意义。值得注意的是，即便为了什么也不说，人们在许多情况下仍会开口，尽管完全可以保持沉默；而真正需要功力的，恰恰是沉默。

> [注2] 雅克·拉康：《罗马报告》（1953），即《精神分析中言说与语言的功能和场域》，收入《文集》，第251页。

我们由此进入语言的这个层面：语言立即贴合最初经验，而且在这里确实构成生命必需，以至人的生命环境就是这个象征环境；自我与他者的关系便处在其中。这个小模型的意义在于：我们只须假设，正是

在这些语言关系的介入中，会发生这些离解、这些镜面的转折；它们会在他者、在绝对他者中，向主体呈现其欲望的不同形象。

正是在象征系统同主体历史的这种连接中——主体历史尤其铭写于其中；它并非 Entwicklung［发展］的一面，而严格说来是 Geschichte［历史］的一面，主体由此相关地在过去和未来中认出自己。我知道自己说得很快，所以先说出这些词，以后还会更慢地重新处理——我们才能看到这个过去与这个未来怎样彼此对应。它们不是随意对应，也不是按照你们可能以为、而分析所指示的方向对应，即并非从过去走向未来。

恰恰相反，在分析中，正因为技术是一种有效技术，事情才沿正确次序展开：从未来走向过去。你们可能以为自己正在垃圾桶里寻找患者的过去；事实恰恰相反，正因为患者拥有未来，你们才可能朝退行方向前进。我现在还不能告诉你们为什么。

我继续：恰恰依照主体历史的这种象征构成……

也就是说，依照符号的总体和宇宙；所有人都参与其中、被纳入其中并承受它，人远比构成符号更受符号支配，也远比充当符号的行动者更像符号的支撑者

……恰恰依照这一点，才会产生并决定这些变化；在其中，主体可能取得关于自身的各种易变、破碎、碎裂，甚至有时尚未构成、发生退行的图像。严格说来，这正是我们在主体日常生活的这些正常 Vorbilder［范型］中看到的东西，也是在分析中以更有导向的方式发生的东西。

那么，在这一切之中，无意识和前意识是什么？

今天，我不得不在这里停下，让你们意犹未尽。不过，至少要知道我们能够给出的第一项近似规定。在今天接近问题的视角中，我们会说：它们是同主体历史相连的某些差异，更准确说，是某些不可能性；而主体恰恰把自身发展铭写在这段历史中。

由此，我们应当重新评价弗洛伊德刚才那个含混公式：zeitliche-Entwicklungsgeschichte［时间性的—发展史］。先只谈历史：正因为主体历史具有某些特殊性，实像的某些部分或者某些突变阶段［……］。无论如何，这是一种可移动关系。

这里已经有一种最初可能的时间展开：它发生在瞬时状态中、分析内部的游戏中。让我们不妨玩一下词语：实像的某些阶段（phases）或某些面（faces），永远无法在虚像中得到呈现。凡是能够通过镜子的简单移动而在虚像中抵达的东西，凡是你们能够在虚像中看到的实像内容，都属于前意识方向。而那些永远无法看见的东西——如果你们愿意，就是装置卡住、阻塞的地方；既然已经走到这里，我们不妨把隐喻再推远一点——会造成一项确切差别：实像的某些部分永远不会被看见；这就是无意识。

如果你们以为自己已经理解，那肯定错了。因为从这里出发，你们会看到这个概念带来的困难。我没有别的抱负，只想向你们表明：只要我这样界定无意识，这个概念所带来的困难就在于：

- 一方面，它是某种否定性的、在理想状态下不可抵达的东西；
- 另一方面，它是某种近乎实在的东西；
- 再一方面，它又是在象征界中得到实现的东西；更准确地说，借助分析中的象征性推进，它“将已经是”。我会依据弗洛伊德的文本向你们表明，无意识概念必须同时满足这三项规定。为了说明第三项——它或许显得突然闯入——我现在就再向前一步，告诉你们自己的看法。不要忘记：弗洛伊德对压抑的解释首先是一种固着。不过，在固着发生的时刻，还没有任何东西构成压抑；例如《狼人》个案中，压抑远在固着以后才发生。Verdrängung［压抑］始终是一种 Nachdrängung［后继压抑］。

那么，你们怎样解释遭压抑之物的返回？今天我就告诉你们：无论听起来多么悖谬，要解释遭压抑之物的返回，只有一种方式——它并非来自过去，而是来自未来。为了正确理解症状中遭压抑之物的返回，必须重新采用同一个隐喻。这个隐喻是我从控制论专家那里捡来的，免得自己发明；不应发明太多东西。它假设两个人物的时间维度朝彼此相反的方向运动；当然，这本身毫无意义。

然而，毫无意义的事情突然会在另一个完全不同的领域取得意义。因此，如果一个人向另一个人发送一条消息，例如一个方形，那么沿相反方向运动的人，首先会看到方形消失；如果它是一个信号，他会先看见信号正在消退，然后才看见信号。归根到底，我们看到的也是这

样。我们在症状中看到的东西，起初呈现为一道痕迹；它永远只会是一道痕迹，并且始终无法理解，直到分析推进得足够远，直到我们实现了它的意义。

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正如 Verdrängung［压抑］始终只是 Nachdrängung［后继压抑］，我们在遭压抑之物的返回名下看见的，也是一件东西已经被抹去的信号；它只会在未来取得自身的象征实现、历史价值，并被整合进主体。严格说来，它始终只是这样一种东西：在某个特定的完成时刻，它"将已经是"。

你们会看到，我正在尝试［……］这个小装置的条件。我向你们透露一件事：一边讲它，我也一边把它削减得更精细；每天都再加上一小块。我没有把它作为现成成品交给你们，不像密涅瓦从朱庇特脑中一跃而出——而我也并不是朱庇特。我们会跟着它走很远，直到有一天它开始令我们厌烦，那时就把它放下。

在此以前，它仍能用来向我们表明：我们可以从中相当清楚地看到一种构造，以鲜活而确定、不再呈现矛盾的方式——至少不再像佩里耶在文本中不断遇到的那些矛盾——看到无意识概念为使我们能够理解它而必须具有的这三个面向。

今天就讲到这里。

我还没有向你们说明分析家为什么处在虚像的位置；但等到你们理解分析家为何处在那里，便会大致理解分析中发生的一切。

《梦学说的元心理学补充》（Metapsychologische Ergänzung zur Traumlehre，1915） 课程表

［原注］下面两篇论文［本文以及《哀悼与忧郁》］出自一组文章；我原本打算以《元心理学准备》（Zur Vorbereitung einer Metapsychologie）为题，结集出版。它们承接《国际医学精神分析杂志》第三卷刊载的文章：《驱力及其命运》《压抑》《无意识》。这个系列旨在澄清并深化一套精神分析体系可能据以建立的理论假设。

我们会在各种场合体验到：把某些能够视作疾病状态之正常范型的状态和现象引来比较，对我们的研究多么有益。这里包括哀悼和爱恋等情感状态，也包括睡眠状态和做梦现象。

我们通常不会对下面这件事多加思考：人每天夜里都会脱下覆在皮肤外面的包裹，还会卸下身体器官的补充部件——只要他已经成功用替代物弥补器官缺陷——也就是眼镜、假发、假牙等等。还可以补充说，入睡时，他也会对自己的心理进行完全类似的脱卸，放弃大部分后天取得的心理成果；因此，他从身体和心理两方面都极大接近生命发展起点的处境。从身体方面说，睡眠重新激活了子宫内的居留状态，满足静卧、温暖和隔绝刺激等条件；许多人在睡眠中甚至会重新采取胎儿姿势。睡眠者的心理状态则表现为：他几乎完全从周围世界撤回，并停止对它的一切兴趣。

研究心理神经症状态时，人们会被引导去突出其中每一种状态里所谓的时间性退行，也就是它以自身特有的幅度回到发展过程中的较早阶段。可以区分两种这样的退行：自我发展的退行和力比多发展的退行。在睡眠状态中，后者一直返回到原初自恋的重新建立，前者则返回到欲望之幻觉性满足的阶段。

我们对于睡眠状态之心理特征的认识，当然来自对梦的研究。梦固然向我们展示人没有睡着的那些方面，却仍不得不同时泄露睡眠本身的特征。我们通过观察认识了梦的若干特性；起初无法理解它们，现在却可以轻易把它们归入相应位置。我们知道，梦绝对是利己的；在其场景中扮演主要角色的人物，始终必须被认作本人（als die eigene zu agnoszieren）。现在很容易理解，这源于睡眠状态的自恋。自恋与利己主义在这里重合；“自恋”一词只是为了强调，利己主义同样是一种力比多现象；或者换一种说法，自恋可以称作利己主义的力比多补充。梦那种得到普遍承认、却被视作谜团的“诊断”能力，也同样变得容易理解：刚刚开始的身体疾病，常常在梦里比清醒时更早、更清楚地被感觉到，而当下的一切身体感觉都会以巨大化形式出现。这种放大具有疑病性质；它以一切心理投注都从外部世界撤回自身自我为前提，从而使人能够及早认出那些在清醒生活中原本还会暂时不受注意的身体变化。

一个梦向我们表明：曾经发生某种试图干扰睡眠的事情；梦还使我们得以洞察这种干扰怎样受到防御。最后，睡眠者做了梦，并且能够继续睡下去；原本试图占据他的内部要求，被一种已经得到处理的外部体验取代。因此，梦也是一种投射，是内部过程的外在化。我们记得，自己已经在别处把投射列入防御手段。癔症性恐惧症的机制同样在这里达到顶点：个体能够通过逃避尝试，保护自己免受一种已经取代内部驱力要求的外部危险。至于对投射的彻底讨论，我们暂且留到分析那种使这一机制发挥最显著作用的自恋性疾病时再进行。

不过，睡眠意图怎样会受到干扰？干扰可能来自内部兴奋，也可能来自外部刺激。我们先考察较不透明、也更有意思的内部干扰。经验向我们表明，梦的促动者是日间残余，也就是没有服从投注总体撤回的

思想投注；它们逆着这一撤回，仍保留一定程度的力比多兴趣或其他兴趣。因此，睡眠的自恋从一开始就不得不容许一个例外，梦的形成也由此开始。分析使我们把这些日间残余认识为潜在梦思；依照其本性和整个情境，我们必须把它们看作前意识表象，即属于 Vbw［前意识］系统的表象。

要进一步说明梦的形成，就必须克服若干困难。睡眠状态的自恋意味着从一切对象表象撤回投注，包括表象的无意识部分与前意识部分。因此，如果某些“日间残余”仍得到投注，就很难承认：它们会在夜间取得足够能量，迫使意识注意自己。我们更倾向于认为，它们所保留的投注远弱于白天原有的投注。分析使我们无须在此作更多思辨，因为它证明：日间残余若要成为梦的形成者，就必须从无意识驱力冲动的源泉取得强化。这个假设起初并无困难，因为我们必须相信，睡眠期间，Ubw［无意识］与 Vbw［前意识］之间的审查大幅降低，两个系统之间的交流因而更加容易。

[注]

> [注] 本段德文底本把审查两侧的系统缩写均写作 Vbw；依全段论证及前后文，译文作 Ubw［无意识］与 Vbw［前意识］。

不过，另一个疑虑不能隐瞒。如果自恋性的睡眠状态导致 Ubw［无意识］与 Vbw［前意识］两个系统的一切投注都被收回，那么，前意识日间残余也就不可能从无意识驱力冲动那里取得强化，因为后者自身的投注已经交给自我。梦形成理论在这里陷入矛盾；要挽救它，就必须修正有关睡眠自恋的假设。

后来会看到，在早发性痴呆理论中，同样无法回避这样一项限制性假设。它只能这样表述：Ubw［无意识］系统中遭压抑的部分，不服从

由自我发出的睡眠欲望；它全部或部分保留自己的投注，而且由于受到压抑，已经取得一定程度的自我独立性。进一步说，与此相应，一定数量的压抑消耗——也就是反投注——也必须整夜维持，以应对驱力危险；尽管通向情感释放和运动性的一切道路均不可通达，可能会大幅降低所需反投注的强度。因此，我们可以这样描绘导向梦形成的情境：睡眠欲望试图收回自我发出的一切投注，并建立绝对自恋。它只能取得部分成功，因为 Ubw 系统中遭压抑之物不服从睡眠欲望。因此，一部分反投注也必须保留，Ubw 与 Vbw 之间的审查虽然不再具有全部强度，却仍继续存在。凡自我统治所及之处，一切系统都被清空投注。无意识驱力投注越强，睡眠就越不稳定。我们还知道一种极端情形：自我放弃睡眠欲望，因为它感到自己无力抑制睡眠期间得到释放的遭压抑冲动；换言之，它之所以放弃睡眠，是因为害怕自己的梦。

以后我们会认识到，关于遭压抑冲动具有抗拒性的假设会产生重大后果。现在，让我们继续追踪梦形成的情境。

作为对自恋的第二次闯入，我们必须重视前面提到的另一种可能：某些前意识日间思想同样表现出抵抗，并保留一部分投注。这两种情形归根到底可能完全相同：日间残余的抵抗，或许可以追溯到它们在清醒生活中已经同无意识冲动建立的连接；也可能稍微复杂一些，即没有被彻底清空的日间残余，直到睡眠状态中才借助 Vbw［前意识］与 Ubw［无意识］之间较为容易的交流，同遭压抑之物建立关系。无论哪一种情形，梦形成现在都会取得同一个决定性进展：前意识的梦之欲望形成；它“以此前意识日间残余的材料，表达无意识冲动”。必须把这个梦之欲望同日间残余严格区分；它无须曾在清醒生活中存在，而且当人把它翻译进意识时，它可能已经显出一切无意识事物所具有

的非理性特征。梦之欲望也不能同那些可能——但绝非必然——存在于前意识（潜在）梦思中的欲望冲动混为一谈。不过，如果确实存在这样的前意识欲望，梦之欲望就会作为最有力的强化同它们结合。现在要考察的是，这个欲望冲动接下来会有怎样的命运；它在本质上代表一种无意识驱力要求，并在 Vbw 中形成梦之欲望——即愿望实现的幻想。思考告诉我们，它可以沿三条不同道路得到处理。第一条，是清醒生活中的正常道路：从 Vbw 向意识推进。第二条，是绕过 Bw［意识］，直接取得运动释放。第三条，则是采取一种出乎意料的道路，而观察使我们能够实际追踪它。在第一种情况下，它会变成内容为愿望实现的妄想观念；但这种事情从不在睡眠状态中发生。（我们对心理过程的元心理学条件所知甚少，也许可以从这项事实得到提示：一个系统如果完全清空投注，就不容易再受到兴奋。）第二种情况——直接运动释放——应当被同一原则排除，因为通向运动性的入口通常比意识审查还要更远一步；不过，它在例外情况下会以梦游形式得到观察。我们不知道什么条件使之成为可能，也不知道它为何不更频繁地发生。梦形成中实际发生的，是一项极为奇特、完全出乎预料的决定：在 Vbw 中开始编织、并由 Ubw 强化的过程，沿倒退道路穿过 Ubw，走向强行进入意识的知觉。这项退行是梦形成的第三阶段。为便于总览，我们再重复前面两个阶段：Ubw 强化前意识日间残余——梦之欲望形成。

我们把这种退行称作局部论意义上的退行，以区别于前面提到的时间性退行或发展史退行。二者不必始终重合，但在眼前这个例子中恰好重合。兴奋过程从 Vbw［前意识］返回，经过 Ubw［无意识］走向知觉；与此同时，它也返回到欲望得到幻觉性满足的早期阶段。

《梦的解析》已经说明，前意识日间残余在梦形成中怎样发生退行。思想由此转化成图像——主要是视觉图像；也就是说，词语表象被还原成与其对应的事物表象。整个过程仿佛受到可表现性考量的支配。退行完成以后，Ubw［无意识］系统中还会留下一系列投注，也就是对事物记忆的投注；心理初级过程会作用于这些投注，直到通过凝缩以及投注在它们之间的移置，塑造出显在梦内容。只有当日间残余中的词语表象，是新鲜、当下的知觉残余而不是思想表达时，它们才会像事物表象一样得到处理，并直接承受凝缩与移置的影响。因此，《梦的解析》提出、后来得到无可置疑之确认的规则是：梦内容中的词语和话语不是重新创造的，而是对做梦当天的言语——或者其他新鲜印象，也包括阅读材料——的仿造。梦的工作多么不执着于词语表象，十分值得注意；它随时准备把词语彼此调换，直到找到最便于形成造型性表现的表达。［原注］我同样把西尔伯勒所强调、而且或许被他高估的一项事实归于可表现性考量：有些梦容许两种同时成立、却在本质上彼此不同的解释；西尔伯勒把一种称作分析式解释，另一种称作上升式解释。在这些情形中，所涉及的始终是性质极为抽象的思想；它们必定给梦中的表现造成了极大困难。不妨设想一项可供比较的任务：用插图取代一份政治报纸的社论！在这种情况下，梦的工作首先必须用较为具体的思想文本取代抽象思想；前者通过比较、象征、寓意性暗示同后者发生某种联系，最好还具有发生学联系，并作为后者的替代物成为梦工作的材料。抽象思想产生所谓上升式解释；在解释工作中，我们比真正的分析式解释更容易猜出它。O. 兰克正确指出，接受分析治疗者的某些治疗梦，是理解这类具有多重解释之梦的最佳范型。

梦的工作与精神分裂症之间的决定性差别，正是在这里显现。在精神分裂症中，前意识思想原本借以表达的词语本身，成为初级过程加工的对象；在梦中，接受加工的不是词语，而是词语被还原成的事物表象。梦具有局部论意义上的退行，精神分裂症则没有；在梦中，前意识的词语投注同无意识的事物投注可以自由交流；精神分裂症的特征则是这种交流被封闭。我们在精神分析实践中进行的梦解释，恰恰削弱了这项差别所造成的印象。梦解释追踪梦工作的进程，沿着潜在思想通向梦要素的道路前进，揭示对词语多义性的利用，并指出不同材料圈之间的词桥；因此，它有时给人诙谐的印象，有时又给人精神分裂症式的印象，使我们忘记：对于梦而言，一切针对词语的操作都只是向事物退行的准备。

梦过程的完成在于：经过退行性转化、被加工成愿望幻想的思想内容，以感觉知觉形式成为意识内容；在此过程中，它还会经历一切知觉内容都要经历的次级加工。我们说，梦之欲望得到幻觉化，并作为幻觉取得对其实现之现实性的信念。最强烈的不确定性恰恰集中在梦形成的这个最终环节；为澄清它，我们准备把梦同与它相近的病理状态相比较。

愿望幻想的形成及其向幻觉的退行，是梦工作最本质的部分，但并非梦所独有。它们同样见于两种病理状态：急性幻觉性错乱，即迈内特所谓 Amentia［精神错乱症］；以及精神分裂症的幻觉阶段。精神错乱症的幻觉性谵妄是一种很容易辨认的愿望幻想，往往像一个美好的白日梦那样组织得完全有序。我们可以一般地谈到一种幻觉性愿望精神病，并把它同等归于梦和精神错乱症。还有一些梦完全由内容极其丰富、未经歪曲的愿望幻想构成。精神分裂症的幻觉阶段研究得较少；通常看来，它具有更为复合的性质，但在本质上大概对应于一种新的

复原尝试，意在把力比多投注重新带回对象表象。［原注］在《无意识》一文中，我们已经把词语表象的过度投注认识为第一种这样的尝试。　至于各种病理性疾病中的其他幻觉状态，我无法把它们引来比较，因为自己在这里既没有直接经验，也无法利用他人的经验。

让我们明确一点：幻觉性愿望精神病——无论在梦中还是在别处——完成了两项绝不相互重合的工作。它不只把隐藏或遭压抑的欲望带入意识，还在充分信以为真的状态下把它们呈现为已经实现。我们必须理解二者为何相遇。绝不能断言，无意识欲望一旦成为意识内容，就必定被当作现实；众所周知，我们的判断完全能够把现实同无论多么强烈的表象和欲望区分开。相反，我们似乎有理由假设，对现实性的信念同感觉知觉相连。一个思想一旦沿退行道路抵达无意识的对象记忆痕迹，并从那里抵达知觉，我们便把对它的知觉承认为现实。因此，幻觉会随之带来对现实性的信念。现在的问题是：幻觉形成需要什么条件？第一个回答会是：退行。这样一来，关于幻觉如何发生的问题就被替换成关于退行机制的问题。对于梦，我们很快就能回答后一个问题。前意识梦思向事物记忆图像的退行，显然源于无意识驱力表征——例如遭压抑的亲历记忆——对这些已经用词语表达的思想所发挥的吸引。不过，我们很快会注意到，自己走上了错误道路。如果幻觉的秘密同退行的秘密完全相同，那么，每一次足够强烈的退行都应当产生一种伴随现实信念的幻觉。然而，我们非常清楚，有些情形中的退行性沉思会使极其清楚的视觉记忆图像成为意识内容，我们却一刻也不会把它们当作现实知觉。我们同样完全可以设想，梦的工作会一直推进到这类记忆图像，使迄今无意识的图像成为意识内容，并向我们呈现一种愿望幻想；我们会怀着渴望感受它，却不会承认它就

是欲望的现实实现。因此，幻觉必定不只是对本来属于无意识的记忆图像作退行性激活。

还应记住：把知觉同无论多么强烈地被记起的表象区分开，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我们同外部世界、同现实的全部关系，都取决于这项能力。我们曾构造一种拟定：我们并非始终拥有这项能力；在心理生活开始时，每当感到需要某个满足对象，我们确实会以幻觉方式呈现它。但在这种情况下，满足并没有发生；失败必定很快促使我们建立一套机构，借助它把这种愿望知觉同现实实现区分开，并在此后避免前者。换言之，我们很早便放弃了欲望的幻觉性满足，建立起一种现实检验。现在出现的问题是：这种现实检验由什么构成？梦和精神错乱症等幻觉性愿望精神病，又怎样成功取消它并恢复旧有满足方式？

只要我们现在着手更准确地规定三个心理系统中的第三个——Bw［意识］系统；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把它同 Vbw［前意识］严格分开——就能给出答案。在《梦的解析》中，我们已经不得不作出决定：把意识知觉看作一个特殊系统的工作。我们曾赋予这个系统若干奇特属性，而且有充分理由继续给它添加更多特征。我们使那里称作 W［知觉］的系统同 Bw 系统重合；意识化通常依附于这个系统的工作。不过，意识化这个事实仍没有同系统归属完全重合；因为我们已经看到，有些感觉性记忆图像能够受到注意，却不可能被赋予 Bw 或 W 系统中的心理位置。不过，对这项困难的处理仍可推迟，直到我们能够把 Bw 系统本身置于兴趣中心。就当前关联而言，可以允许我们作出如下假设：幻觉在于对 Bw（W）系统的一次投注；不同于正常情形，这项投注不是从外部，而是从内部发生。它的条件是：退行必须走得足够远，抵达这个系统本身，并在此过程中越过现实检验。

在此前的关联中（《驱力及其命运》），我们曾认为仍处于无助状态的有机体能够借助自身知觉，在世界中取得最初定向：它依照知觉同肌肉行动的关系来区分“外部”与“内部”。如果一项知觉能够通过行动而消失，它就被认作外部知觉、认作现实；如果这种行动无法改变它，知觉便来自自身身体内部，它不是现实。有机体能够拥有这样一种现实标志，对个体十分有价值；这个标志同时也为应对现实提供一种补救。个体也希望针对自己经常毫不留情的驱力要求拥有类似力量。因此，它竭力把从内部给自己带来负担的东西移置到外部，也就是加以投射。

现在，经过对心理装置的深入分析，我们必须把这种通过区分内外而在世界中定向的工作，只归于 Bw（W）系统。Bw 必须拥有一种运动神经支配，借此确定知觉能否通过行动而消失，还是始终保持抵抗。现实检验无须是别的东西，只须是这套机构。[［原注］关于现实性检验（Aktualitätsprüfung）与现实检验（Realitätsprüfung）的区分，参见后文。] 我们无法作出更详细的论述，因为对于 Bw 系统的性质和工作方式仍知之太少。我们将把现实检验同已经认识到的心理系统之间的各种审查并列，把它视为自我的重大机构之一；并期待对自恋性疾病的分析帮助我们揭示更多这样的机构。

相反，我们现在已经能从病理学得知，现实检验可以怎样被取消或停止工作；而且，与梦相比，我们会在愿望精神病、即精神错乱症那里更加明确地认识这一点。精神错乱症是对某种丧失的反应：现实坚持这项丧失，但自我想把它否认掉，因为它无法承受。于是，自我中断同现实的关系，从 Bw 知觉系统撤回投注；或者更准确说，撤回某种性质特殊、尚待研究的投注。现实检验随着这种对现实的背离而被取消；没有遭到压抑、完全属于意识的愿望幻想由此能够进入这个系

统，并从那里被承认为更好的现实。这种投注撤回应当同压抑过程并列；精神错乱症向我们展示了一幅有趣景象：自我同自己的一个器官发生分裂，而这个器官或许曾经最忠实地为自我服务、同自我结合得最为紧密。［原注］从这里出发，可以冒险推测：中毒性幻觉症，例如酒精性谵妄，也可以用类似方式来理解。现实强加的无法承受之丧失，在这里正是酒精的丧失；重新摄入酒精便会取消幻觉。

精神错乱症通过“压抑”完成的事情，在梦中由自愿放弃完成。睡眠状态不愿知道外部世界，不关心现实；只有当离开睡眠状态、也就是醒来成为问题时，它才会关心现实。因此，它也像从其他系统——Vbw［前意识］与 Ubw［无意识］——撤回投注一样，从 Bw 系统撤回投注；撤回会达到怎样的程度，取决于这些系统中的位置是否服从睡眠欲望。随着 Bw 系统不再得到投注，现实检验的可能性也被放弃；那些不依赖睡眠状态而已经走上退行道路的兴奋，会发现道路一直畅通到 Bw 系统，并在那里被当作无可争议的现实。［原注］不受投注的系统不具有可兴奋性这一原则，在这里对于 Bw（W）系统似乎失效。不过，所涉及的可能只是投注的部分取消；而且，对于知觉系统，我们将不得不假设若干兴奋条件，它们同其他系统的兴奋条件有很大差异。——这些元心理学讨论所具有的试探性和不确定性，当然绝不应受到遮掩或粉饰。只有进一步深化，才能使它取得某种程度的可信性。 关于早发性痴呆的幻觉性精神病，我们将从以上考量推断：它不可能属于疾病的起始症状。只有当患者的自我已经瓦解到现实检验无法继续阻止幻觉时，它才成为可能。

关于梦过程的心理学，我们得到如下结论：梦的一切本质特征都由睡眠状态这一条件决定。古老的亚里士多德那句看似平常的话——梦是睡眠者的心理活动——在各方面都是正确的。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说

明：这是一份心理活动的残余；它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自恋性的睡眠状态无法毫无例外地贯彻自身。这听起来同心理学家和哲学家向来所说的并没有太大差别，却建立在对于心理装置结构和工作的完全不同看法上；这些看法胜过旧有看法之处，在于它们还使梦的一切细节都更接近我们的理解。

最后，让我们再看一眼：压抑过程的局部论对于洞察心理障碍机制取得了怎样的意义。在梦中，投注——力比多与兴趣——从一切系统同等撤回；在转移神经症中，撤回的是前意识投注；在精神分裂症中，撤回的是无意识投注；在精神错乱症中，撤回的是意识投注。

第14课 · 1954年5月5日

我们开始第三学期了，谢天谢地，这一学期会很短！问题是，我们要用它来做什么。原先我曾打算在今年分别以前讨论施雷伯个案。我本来很乐意这样做，尤其是——你们知道——为备不时之需，我已经让人翻译了施雷伯庭长的原著，也就是弗洛伊德研究过并要求读者参阅的文本。到目前为止，这项建议一直没有什么实际用处，因为这本书根本找不到；据我所知，欧洲只有两册。我设法借到了一册，并把它制作了两份缩微胶卷：一份自用，另一份供法国精神分析学会图书馆使用——这个用途如今已经成为现实。我要告诉你们，我们已经有了一个会址，条件很优厚，可以让我们拿出经费购置图书。除这些缩微胶卷以外，还会加入我们能够征集到的各种捐赠。

让我们回到施雷伯庭长。读这份译文非常引人入胜。完全可以据此写出一部真正完备的偏执狂论著，并围绕精神病机制，为施雷伯的文本作出极其丰富的评注。伊波利特先生曾说，我的认识是从偏执性认识出发的：既然它从那里出发，我希望它没有一直停留在那里。

那里有一个洞。我们暂且不马上掉进去，因为我们可能会像伊波利特先生所担心的那样，被困在里面。既然我们已经深入讨论了弗洛伊德的《技术著作》，我认为就不能不进一步展开我始终在暗中所作的比较：把这些表述同当前的分析技术，也就是可以加上引号称作它的“最新进展”的东西相比较。

我一直以多少有些隐含的方式这样做，所参照的是你们在自身经验中能够接触到的东西，是你们在督导中实际得到的教导：例如阻抗分析

演变所趋向的方向，以及把分析理解为对自我防御系统的分析这一观念。尽管如此，这一切仍然没有获得妥当的中心，因为我们在这里暗中参照的，是一些具体却未被系统化、有时甚至未被表述出来的教导。

我认为，尽管人人都指出分析文献十分稀少，我们仍可以讨论它：确实有一些作者就技术本身发表过意见。他们即使没有写出一部严格意义上的技术著作，也留下了一些文章，其中有些只是片段，另一些则颇为奇特地半途而废，而后者恰恰又属于最有意思的作品。虽然要让你们每个人都拿到这些文献并不容易，我们仍不至于完全无法在其中向前推进一点。

困难在于：首先，这些汇集了最重要材料的著述构成了一个相当庞大的文献整体，要通读并不容易。我希望能得到在座若干位的协助；我会把其中一些文章借给你们，作为我们讨论的基础。但我们不可能把它们全部纳入考察。

首先，在1925年的柏林专题讨论会上，出现了萨克斯、亚历山大和拉多的三篇重要文章；如果你们认真翻过费尼谢尔的书，就应当知道它们。到了马里安巴德大会，又有一场关于分析“成果”——他们是这样说的——的专题讨论；其实讨论所涉及的，与其说是成果，不如说是通向这些成果的程序。

在那里，你们已经可以看到我所谓“分析中的语言混乱”以相当充分的形式发端：也就是说，不管人们愿不愿承认，对于什么才是分析过程中“起作用的路径”，各位作者的看法极其纷杂。显然，分析家心中远

没有确立一个精确的定义；他们的表述呈现出十分鲜明的分歧。第三个时刻，就是当前这个时刻。

在这里，应当首先考虑人们近来试图赋予自我理论的种种定义或阐发，例如美国“三驾马车”——哈特曼、勒文斯坦和克里斯——所作的工作。必须承认，这些著述有时相当令人困惑：概念不断增殖，复杂到了这种地步——当他们没完没了地谈论去性化的力比多时，我们几乎就要把它说成被除去力比多的力比多；或者谈论被解除攻击性的攻击性。

在弗洛伊德第三时期的著述中，自我的这项功能越来越扮演着那个难题重重的角色。我把这些著述留在了我们的范围之外，因为我以评注《技术著作》的形式所作的尝试，是要让你们把握1910至1920年的中期阶段。正是在那里，随着自恋概念的形成，弗洛伊德最终通向自我的方向开始展开。不过我仍建议你们阅读或重读法文版名为《精神分析论文集》（Payot出版社）的那一卷；你们应当读其中的《超越快乐原则》《群体心理学与自我分析》和《自我与本我》。

我建议你们读，是因为我们无法在这里分析这些文章。但要理解我刚才提到的那些作者如何发展治疗理论，这些文章不可或缺。1920年以后提出的各种治疗表述，始终都是围绕弗洛伊德最后的表述组织起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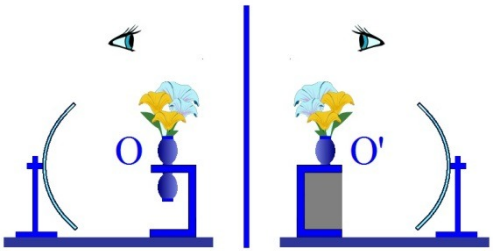
而且，这些表述多半显得极其笨拙；其根源在于，如果没有深入探究自恋概念本身的生成——也就是我借《技术著作》中的阻抗分析与转移分析试图向你们指出的东西——就很难准确理解弗洛伊德在那三篇真正堪称丰碑的文章中说了什么。

这就是我们的计划在严格意义上的位置。今天，我想尝试在某些时刻采取一条并非我根本上所遵循的路径。你们知道，我根本上采取的是一条论述的、甚至是讨论的路径：从文本出发，把你们带到问题面前。我在这里努力呈现给你们的是一套问题构形。

但是，我们有时仍须把某些观点、某些透视集中成一种教学公式；分析史上不同作者围绕这些明确问题提出的、差异十分显著的各种表述，便可以据此相互接合并得到讨论。可以说，我采取一种折中的办法，试着向你们呈现一个模型：它并不自诩为一个体系，而是一幅图像，其中标出若干可以充当参照的点。

这正是我逐步把你们引向那幅带有光学色彩的图像时所尝试做的；我们已经在这里开始构造它。现在，我希望它已渐渐为你们的头脑所熟悉。围绕着这个根本的窥镜，即同他者之关系的根本镜面，你们已经看到，我们可以定位那个著名的实像——如果你们愿意，今天我们就借此标出问题所在的各个点。

我曾向你们说明，可以如何设想它在主体的某一点呈现并形成，我们把这一点称为0。主体在平面镜中把握它的地方，是虚像$0'$：主体在那里看到位于0的实像，因为借助这面镜子，他被安置在这里的某处——也就是那面反射性的球面镜的虚拟对称点上；正是凭借这面球面镜，那个位于0的实像才会在主体内部的某处形成。



我们要试着看看如何使用它，并向你们解释它对应着什么。皮若尔，你皱起眉头了。有什么不对吗?

罗贝尔·皮若尔——这一个月来，我一直很难重新跟上。

拉康

为了接着说下去，我们可以说，这里给出了0和0′两个点。有一个小姑娘……

一个虚拟的女人，因此单凭这一点，她显然就比男性更多地卷入实在。

有些人就是具有特殊的天赋！

……忽然说了一句十分俏皮的话：“啊！可别以为我的一生会在0和0′之间度过……”

可怜的小宝贝！她的一生也会像所有人一样，在0和0′之间度过！不过，她毕竟怀有这种向往！如果你们愿意，我就为了向她致意，把这两个点称为0和0′。此外，还有一个A点，以及另一个我们称作C的

点。为什么叫C？因为这里还有一个B点，我们必须留待以后再说。有了这些，我们总还是得设法应付下去。

显然，无论如何、不顾一切，我们都必须从0和0′出发。你们已经知道，在0以及0周围、0′周围发生了什么。它从根本上涉及理想自我（Idealich）的构成，而不是自我理想（Ichideal）的构成。换句话说，涉及自我的生成在本质上是想象的、镜像的形式，亦即它从根本上具有想象性的起源。如果你们没有从我们在这里试图分析、传达并使人理解的若干文本中看出这一点——其中最主要的是《论自恋：一篇导论》（Zur Einführung des Narzißmus）——那我们的工作就白做了。

相关知识卡 Idealich 与 Ichideal：理想自我和自我理想

你们应当已经理解，在弗洛伊德《论自恋：一篇导论》的论述层面，对象的形成与自我的形成之间存在着密切关系。正因为二者严格相关，真正同时出现，自恋的问题才会出现：在弗洛伊德当时的思想中，在其著作的发展过程中，力比多由此显得服从于另一种辩证法——我会说，是对象的辩证法。

这里所涉及的不只是生物个体同其“自然”对象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如何以不同方式变得复杂、丰富。还存在一种自恋性的力比多投注的可能；换言之，力比多投注在某种只能被构想为自我之形象的东西上。我在这里把事情说得十分粗略；我本可以用一种技术上更精细、更具哲学意味的语言来表述，但我想让你们明白应当如何看待它。

可以完全肯定的是，从弗洛伊德经验发展的某一时刻起，注意力便集中在自我的这项想象性功能上。此后，精神分析的全部历史都可以归结为：问题的这次重新定向带来了种种含混和某种倾向，继而发生了

一次滑移，回到了把自我设想为“综合功能”、设想为心理学功能的那种学院式观念——我不说“传统观念”，因为它其实并没有那么传统。

然而，正如我将向你们说明的，这里所涉及的某种东西，固然在人类心理学中有其发言权，却只能在超心理学的层面上构想；或者用弗洛伊德白纸黑字的说法——因为弗洛伊德虽然在表述上遇到困难，却从未丢失线索——只能作为“元心理学”来构想。这个词是什么意思？不正是说，它是某种超越心理学的东西吗？现在，让我们试着从问题实际提出之处出发。

当你们说“我（je）”时，那究竟是什么？它与我们所说的自我、作为分析概念的自我（ego），是同一回事吗？我们必须从这里出发。我想，这个问题无疑已经摆在你们许多人面前，也应当摆在每个人面前。当你们使用“我（je）”时，不可能不看到，它首先并且根本上属于心理学的指称——这里所谓心理学，是指观察人身上发生的事情，观察人如何学会说出这个“我”。

“我（je）”是在对他者的某种指称中学会使用的一个言语词项，但这种指称是被说出的。“我”诞生于对“你（tu）”的某种指称之中。人人都知道，心理学家围绕这一点搭建出了多少著名说法：一种互反关系得以建立——或者未能建立——并由此决定儿童内在发展的某个阶段之类。

仿佛人们仅凭语言使用就能对此确信，并从中作出推论。其实我们看到的，不过是儿童最初还不会灵活处理三个人称代词：当别人用“你”对他说一句话时，他先只是照搬并重复那个“你”，而要正确复述，就必须把它反转为“我”。

这确实表明儿童在掌握语言时存在某种迟疑，但我们只能由此推出这些，不能越出这一步。不过，这已经足以提醒我们："我（je）"本身就是一种接近方式，它在语言经验中构成，在对"你"的这种指称中构成，也在这样一种关系中构成：他者在那里显露出什么？显露出儿童必须承认的命令与欲望——来自父亲、母亲、教育者，或同龄人和伙伴的命令与欲望。

话虽如此，很清楚的是，在起初，他要让自己的欲望得到承认，机会少之又少，除非采取最简单、最直接、最即时的方式；而且，至少在起源处，我们显然对那个确切的共鸣点一无所知——个体的特异性和差异性，或者说这个小主体的观念，究竟定位在什么地方。

这正是使他如此不幸的原因：说到底，他怎么可能让自己的欲望得到承认？很简单，因为他自己对此一无所知。我们也许完全有理由认为，他对自己的欲望一无所知；不过，我们这些分析家所拥有的理由并非任意的理由，而是从我们的成人经验中产生的理由。我甚至会说，这正是我们的职能：我们知道，他必须去寻求并找到这些欲望。否则，他根本不需要分析。

因此，这已经足以表明：凡是关涉他的自我的东西，也就是他能够让别人从自身那里加以承认的东西，都被某种东西同他隔开了。分析在这里教给我们的东西——你们必须回想伊波利特先生围绕弗洛伊德那篇极其珍贵、题为《否认式否定》（Verneinung）的文本所作的报告——本身已经极有意义，并且必须以某种方式得到阐明。

我说"他对此一无所知"，这是一个极其含混的公式。分析是逐级、分阶段地教会我们这些事情的；这也正是追随弗洛伊德著作的发展何以

如此重要。分析教给我们的是：这里并非单纯的无知。我们本来就应当想到这一点，理由很简单：无知本身是一个辩证的词项，因为严格说来，只有在追寻真理的视角中，它才会作为无知被构成。

如果主体不把自己置于同真理的关联中，就不存在无知。如果主体不重新向自己提出“我是什么、我不是什么”的问题——当然，他完全没有义务这样做，许多人一辈子都不提出如此高远的问题——那么也就没有理由区分真与假，甚至也没有理由作出更进一步的区分，即现实与表象之间的根本区分。

在这里，我们已经完全进入哲学了。无知是相对于某个有待达到的真理之虚拟位置，以两极相对的方式构成的：它是主体作为说话者时的一种状态。我还会说，当主体的话语开始漫游，寻找正确的语言——也就是说，从“不知道如何看待事物”这一类状态出发——我们才开始把无知构成起来；这始于我们让主体进入分析之时，换言之，始于我们哪怕仅以隐含方式让他投入对真理的追寻之时。

但是，这只是一种处境、一种位置，是我们创造出来的某种处境所对应的纯粹虚拟状态；当我们说自我对主体的欲望一无所知时，所指的并不是这一既定状态，而是经验教给我们的某种东西。我们是在第二个阶段，即弗洛伊德思想对经验的进一步阐发中学到它的。因此，这不是无知，而恰恰是某种在否认式否定（Verneinung）的过程中得到具体表达、并且在主体的静态总体中被称作“误认”的东西。可是，误认并不等同于无知。

误认体现为一定数量的肯定与否定，体现为某种结构、某种组织。主体依附于其中。若没有一种与之相关的认识，这一切便无法构想：无

论我们以何种方式谈论误认，它始终意味着，既然主体能够误认某种东西，他就总得以某种方式知道——如果可以这样说——这种误认功能是围绕着哪一个总量运作的。

也就是说，在这种误认背后，必然存在着对那个有待误认之物的某种认识。当一个妄想者活在对某位亲人之死的误认中时，如果以为他只是把死者同活人混淆了，那就完全错了。他误认或者拒绝承认亲人已经死亡，但他的全部行为都表明，他所展开的活动以这样一种认识为前提：他知道有某种东西是自己不愿承认的。

这意味着什么？在自我的认识功能——从根本上说，它就是一种认识功能——背后所牵涉的这个误认，究竟是什么？这正是我们可以借以接近自我功能的关节点。我认为，这是我们经验中一个具体而实际的点，再怎么强调都不为过，因为它会构成第一步，也就是这种经验本身的起源。也就是说，至少面对我们感兴趣并且可以分析的东西时，我们会倾向于进行一整套占解操作；换言之，进行翻译和松解，试图触及主体语言之外的某种东西——而这种语言本身在认识层面呈现于一种含混的关系之中；我说的正是“含混”。

要从这里出发并在这个语域中向前推进，就必须追问：这种为误认定向并加以引导的认识究竟是什么。在这里，我们发现了一种平行参照、一种类比性的阐发，它所比照的是可以称作动物认识的东西：只要动物那里存在认识与共适，存在想象性的共适，世界就会被结构化为一种周围世界（Umwelt）。

这种结构化通过对应关系完成，即把一定数量的关系和格式塔（Gestalten）投射到世界之上；这些格式塔构造这个世界，并针对每

一种动物，把它规定为动物在其中活动的环境。它们从动物所面对的、混沌不分的现实中编织、区分并分离出若干优先的接近路径，动物的行为活动便循这些路径展开。动物那里存在的正是这种东西。动物行为心理学家，例如动物行为学家，把这些格式塔规定为先天的；我们可以把它们称作先天的结构化机制，或动物先天的释放路径。那么，人那里又如何？我们的全部经验都十分清楚地表明，人那里并不存在任何类似的东西；所谓人的基本驱力处于无政府状态，恰好展示了这一点，而分析经验也向我们证明了这一事实。

人的局部行为、他同对象以及力比多对象的关系，都受制于种种偶然变故；在我们的大多数经验中，综合都会失败。这向我们表明，人同构成其世界的诸图像之间的关系具有一种完全特殊的事实。对于人来说，有什么东西与那种先天认识相对应——毕竟，在生命体的平衡中，我们可以把先天认识称作“生命的向导”？

这里有某种极其特殊的参照。它一方面不同于动物的想象性功能，另一方面也使人就同这一图像的活生生关系而言，处在一种不同的关系中。这个东西同图像在动物那里的功能又不可能相距太远；它就是人自己身体的图像——这种图像在动物那里同样极其重要。

我在这里稍稍跳跃一步，因为我假定我们已经共同走过了通向它的各个步骤，而你们可以把我现在概括的东西当作一个定理来接受。镜像阶段这一构想是说：儿童在某个年龄区间——六个月至十八个月——面对一面反映其自身形象的镜子时，我们从他的态度中看到的东西，从根本上揭示了人类个体作为生物、作为动物时所具有的关系。在整个时期，儿童表现出的这种兴奋和欢欣，我去年曾借热塞尔先生拍摄

的一部影片向你们展示过[注1]。请相信我，他从未听说过我的镜像阶段，也从未产生过任何分析性质的问题。

> [注1] 阿诺德·卢修斯·热塞尔（1880—1961）；热塞尔的影片《镜前的自我发现》是在雅克·拉康的报告《行动中的镜像阶段》（巴黎精神分析学会1953年5月19日科学会议）期间放映的。

但这并不妨碍——反而使事情更有价值——他在这个括号般的时期中分离出了那个意义重大的时刻，尽管他本人并未突出其真正的根本特征：在一个界限分明、规定明确的时期和范围内，主体面对镜子时的现实行为具有那种令人兴奋、显然具有刺激性、甚至可以说令人忘形的特征。最重要的并不是这种行为在六个月时出现，而是它在十八个月时衰退。

也就是说——我去年已经展示过——这种行为如何突然完全改变；此后，镜像只成为一种表象、一种显现（Erscheinung），成为诸多事物中的一物，人们可以围绕它进行控制、试验和工具性的游戏，而它显然已不再带有这一时期所具有的那些极其纯粹、极为鲜明的标志。这一点应当有助于我们：我们已经习惯这些事情，也掌握了若干尚被含混使用的词项；它们至少为我们对应着某种心智图式，而这里要做的正是把这个图式精细化、界定清楚并加以阐发。

为了说明发生了什么，我现在就参照某种你们至少应已从一些阅读中熟悉的事情，并无不妥：即俄狄浦斯情结衰退时所发生的事情。那里会产生某种我们称作“内摄”的东西。我恳请你们不要急于给这个词赋予过分明确的意义，因为我在接下来的课程——甚至已经在本课——所要质疑的，恰恰就是这一点。

“内摄”这个词是什么意思？那里发生了某种事情、某种倒转：

- 原先在外部的东西变成了内部；
- 原先作为父亲的东西变成了超我。

某种事情恰恰发生在那个看不见、无法思考、从未被如此命名的主体层面。人们会问：这是发生在自我层面，还是本我层面？是的，就发生在两者之间，所以才叫作超我（super-ego）。于是，人们便构造出整套半神话式的专门说法，我们的头脑惯常就在其中耗费精力。我们在这里试图做的，是赋予它一种更可接受的形式，因为我们总是生活在一些无法接受的图式之中［……］

如果有人问一位精神分析家：“你真的相信，儿童会在那时把父亲吃掉，让父亲进入自己的胃，并在那里变成超我吗？”——我们却仍像这一切不言自明似的继续操作。等到分析治疗功能时，我会向你们说明：治疗所涉及的是什么，什么操作在其中发生，它如何能够实现并推进；也会说明人们如何天真地使用“内摄”一词，而这种用法究竟走得有多远！假定一个从未听说过这种该死的分析的国家突然派来一位民族学家，他来到这里，听见分析中发生的事情，一定会说：“非常奇怪！这些受分析者真是一群奇怪的原始人，他们一小块一小块地吃掉自己的分析家……”

我把巴尔塔萨·格拉西安视为一位根本性的作者；尼采和拉罗什富科同他相比都显得渺小。他的《领圣体的艺术》（El Comulgatorio）以一种具体而有效的方式构想圣餐。既然相信圣餐，就没有任何理由认为自己没有吃下基督，因而也没有吃下他那柔嫩的耳垂。于是，也没

有理由不把圣餐概念发展成一种“按菜单点取”的圣餐。对于相信实体转化的人而言，这再合适不过。

可是，我们这些重视科学而又通情达理的分析家，却可以在施特克尔先生或其他作者笔下看到所谓对分析家按剂量进行内摄的东西。一个外部观察者只能把它转置到神秘主义的圣餐层面，而这毕竟同我们的真实思想相去甚远。

就我们思想而言……不过——谢天谢地！——我们并不思想，这就是可以为我们开脱的地方。总以为人会思想自己说出的东西，这是一个大错误！所以，我们并不思想。但这毕竟不能成为不去理解这些话意味着什么、不去理解人们为何说出显然荒谬之言的理由。

那么，让我们重新回到目前所处的时刻。镜像阶段结束的这个时刻，体现了某种类似于心理发展中特定时刻所发生的翻转。这个翻转时刻很可能从若干角度而言极其重要并具有根本性；我们可以从儿童这一发展阶段后来表现出的人类现象中确认这一点。

我们可以从一些非常有意义的现象中确认它，也就是儿童在两种本来如此不同的事情——他人的行动与自己的行动——之间建立的等值现象；还可以从儿童的传递主义行动中确认它：明明是他打了弗朗索瓦，他却在这个语域中说“弗朗索瓦打了我”。这种儿童传递主义，是儿童与其同类者之间一面不稳定的镜子。

我们由此确切看到发生之事的功能；任何对人际行为的理论化都绝对需要它。曾有这样一个时刻：儿童把我所说的对掌控的欢欣承担寄托在这幅图像中，尽管他还没有实际获得这种掌控；主体却完全能够

——如果可以这样说，我今早是故意用粗略的方式表述——在内部承担它。

当然，他只能以空形式的状态来承担它：这种掌控形式、这种包覆形式是如此确凿，以至于弗洛伊德虽然从完全不同的路径，即力比多投注动力学的路径抵达这里——我恳请你们阅读《自我与本我》中关于这一点的论述——却也无法用别的方式表述。

弗洛伊德谈到自我时，根本不是在谈某种尖锐、决定性、命令式的自我，仿佛自我会借此重新获得学院心理学所谓的高级机构。他用意义再清楚不过的几行文字强调：自我必然同身体表面有极为密切的关系。不过，这并不是会感受、会感觉、会留下印象的表面，而是这个表面在一种形式中得到反映时的样子。这里始终关乎一种形式的定义：没有哪一种形式会没有表面；形式由表面规定，而同一之中的差异就是表面。正是当他者形式的这幅根本图像被承担并以这个表面的形式被置于内部时，内与外的关系才会从根本上进入人类心理学；主体也正是由此把自己知道并认识为身体。不过，对此我们并没有任何其他证据。

这就是人类心理学与动物心理学之间唯一真正根本的差异：人知道自己是身体；归根到底，他既然就在身体之内，原本没有理由知道这一点，而这正构成了他同动物行为的差异。动物就在其中，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认为动物会表象自己。人则会表象自己。在他学会把自己当作身体、当作身体的空形式来认识的这个翻转中，发生了如下交换：当时在他自身之内以纯粹欲望状态存在的一切——就是我们起初谈过的那种尚未构成、混乱不清，并在婴儿啼哭中表达出来的欲望——都倒

转到了他者之中，而他将学会在那里认出它。我说“将学会”，因为只要我们还没有谈到另一种东西，也就是沟通，他就还没有学会。

到那时为止，欲望处于一种在先的时刻；这种在先不是时间性的，而是逻辑性的，因为这一切都发生在一个极为集中的时期，我们在这里所作的只是推演。不过，这个推演又具有绝对的根本性：正是凭借它，我们才能区分象征、想象与实在这几个不同的层面；若没有这些区分，就无法在分析经验中向前推进，只能诉诸几乎落入神秘主义的言语形式。你们也将看到，维持一种连贯论述会带来怎样的益处，因为它甚至会影响我们在分析中有方法地运用言说介入时应当采取的论述。

在这个欲望学会——现在让我们说出这个词——通过象征，也就是在语言中认出自身以前，它只能被感受到、被看见为投射在他者之中；从一开始就已经异化，而且单就镜像阶段的这种想象性关系而言，它就存在于他者之中。

但在这个时刻，它所能引发的严格说来只能是最无出路的紧张，也就是没有其他出口，只能——正如黑格尔高度发展的思想所教给我们的——等同于对他者的毁灭。这种紧张根本不存在任何解决，因为恰恰是主体欲望中投射出来的这个他者的欲望，只能在围绕欲望所趋向之对象的竞争、一种彻底的敌对中集中并得到确认。每当我们接近人类欲望结合处的这一想象性根源，接近这一原初异化时，所能产生的便只有最为彻底的攻击性；也就是说，相对于他者而言，唯一可能的中介就是：欲求他者消失，因为他者所承载的，恰恰是主体的欲望。

换句话说，我们在这里重新遇到了心理学家仅凭观察主体行为也会发现的东西：最具破坏性、最肆无忌惮的嫉妒。圣奥古斯丁在那句我经常复述的名言中指出的正是它——幼儿对其同类者所体验的那种绝对毁灭性的嫉妒，不论后者是否依附在什么地方，尤其当他正依附在母亲乳房上时；而母亲的乳房，正是对他而言至关重要的欲望对象。

那么，这个绝对居于中心的功能究竟是什么？它是主体同这个原型（Urbild）、这个理想自我（Idealich）之间的想象性关系；理想自我正是第一步，主体由此在那个对他而言承担想象功能的东西中，首先学会把自己认识为一种形式。而这种翻转或逆转的可能性会始终存在，直到最后：每当主体把自己把握为形式、把握为自我，并在其地位、体态与静态构造中构成自身时，每当这种事情发生，他的欲望就会投射到外部；而谢天谢地，他身处的是一个有着会说话的他者们的世界。

因为正是凭借这一点，这个欲望才可能在象征的世界、语言的世界中获得某种中介、某种承认。若非如此，人类的全部功能——欲望本身

正是如此——可以说都只能耗尽在一种对毁灭他者的无尽愿望中。反过来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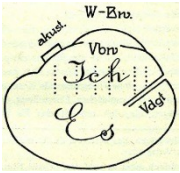
- 每当他者那里有某种东西出现，每当他者的显现和现象中有某种东西使主体能够再一次重新投射、重新补全并——借用弗洛伊德在某处的说法——滋养这幅理想自我（Idealich）的图像；

- 每当那种我称作欢欣承担的镜像现象，能够在另一个层面以类比方式重新发生；换句话说，

- 每当主体以足够有意义的方式被某个同类者所捕获——稍后我们会看到这个"足够有意义"是什么意思——反过来，欲望便可以说返回主体之中，但它是以被言语化的形式返回的。

换言之，每当发生这种理想自我对对象的认同时，所出现的最具范例性的现象是什么？从一开始，当我们借先前提出的问题来展开这番论述时，我就已经把你们的注意力引向它。

那就是一切爱恋激情（Verliebtheit）：爱恋激情与转移之间的相遇并非随意发生。爱恋激情同转移的区别在于，爱恋激情不会自动产生；它需要由主体演变所决定的若干特定条件。我们将看到，在这里"演变"是什么意思。正如弗洛伊德也强调的，爱恋激情是、决定了……因为不要忘记，在那篇常被误读的文章中，人人一读就只想到那个该死的著名图式：什么阶段、小透镜、两侧，还有那个钻进去并被他称作超我的玩意儿；大家觉得有了它就足够了……他怎么会想到把这个图式拿出来，他肯定还有别的图式！



必须读这篇文章，并且知道弗洛伊德说：自我是通过同其所爱对象的一连串认同构成的，正是这些认同使它获得了自身形式。它像洋葱一样由多层构成；我们可以把它一层层剥开，并从中看到构成它的一连串认同。这些话就写在我刚才提到的那些文章里。

欲望向形式、形式向欲望的不断逆转……

换句话说，是意识与身体的不断逆转，是局部的欲望向所爱对象的逆转——主体在那里逐字意义地迷失自身，并与之认同——

……这就是一切与自我有关之物围绕着运转的根本机制，但有一个条件：我们必须清楚，这种游戏实际上会成为火焰与烈火的游戏；主体一旦能够有所行动，它就会导致即时的相互消灭——相信我，主体很快就具有这种能力。

我刚才提到的那个小姑娘并没有什么格外凶残之处，但我在她身上观察到的最早活动之一是：她还几乎站不稳，在避难居住的乡间花园里，却十分平静而专注地拿一块相当大的石头往邻家小伙伴的脑袋上砸；而那个小伙伴正是她最初围绕着进行认同的人。

该隐的动作不需要达到多么完整的运动能力，就能以最自发的方式——我甚至要说，以最得意扬扬的方式——实现。因为她没有任何罪疚感：“我，砸破某某的头……”她说得既笃定又平静。不过，我并不

因此预言她将来会成为罪犯。她只是显露出人之存在在想象层面最根本的结构：摧毁那个异化寄居其上的人。

格拉诺夫，你刚才想说什么？

弗拉基米尔·格拉诺夫

那么，严格说来，在镜像阶段，我们应当如何理解这种受虐狂式的出路？

拉康

请给我一点时间，我正是在这里向你们解释这件事。因为一旦开始把它称为“受虐狂式的出路”，事情恰恰就从此刻开始变得……连猫都找不到自己的崽了。围绕受虐狂的东西如此繁多，所以我们恰恰必须设法把它弄清楚。

这种受虐狂式的出路……

既然你追问了，我从不拒绝回头说明和重提，哪怕这会稍稍打断我的展开；那么，我就告诉你一件事——

……如果没有象征这一维度，它便无法构想，也不具有本质的、根本的、结构性的意义，我们根本无法理解它。通常所谓的原初受虐狂，其结构性、根本而未经偏转的形式，就位于想象与象征的接合点上。换言之，它是所谓死亡本能在这个特殊角落中的显现，构成人类主体的根本位置。

不要忘记，弗洛伊德分离出这种原初受虐狂时，恰恰把它体现为一个童年游戏。我今早还没有谈到这个游戏，但现在正好可以在这个年龄阶段的出口处谈它，因为我们所说的那个儿童恰好是十八个月大。

弗洛伊德告诉我们，在这个游戏中，儿童用一种游戏来替代由一项绝对无法避免、不可逃脱的经验事实——所爱对象的在场与缺席——所产生的痛苦紧张；在游戏里，他亲自操纵并乐于支配缺席与在场本身。据我记得，他借助的是一个系在线端的小球，把它扔出去，再拉回来。

不过，这个例子以最明显、最根本的方式显露出来的东西……

——因为亲自推进一种辩证法，同处在我现在的位置上并不是一回事；我在这里是试图回应弗洛伊德，阐明这套辩证法的基础——

……弗洛伊德没有加以强调、却以最明显的方式存在于那里的东西是：他的观察一如既往地使我们能够补全这个情境。

这一切伴随着一种发声，而这种发声所特有的东西，正是语言本身的基础——从语言学家的观点看，我们可以由此把握语言系统的问题，即一种简单的对立。关键不在于儿童多少近似地说出了“Fort-Da”；在他的母语中，这两个词相当于“远了”“在这儿”。况且，他的发音本来就只是近似的。

关键在于，从一开始，这已经是语言的最初显现，并采取一个配对、一种对立的形式；而且恰恰在这种对立中，他超越了在场与缺席的现象，把它们本身提升到象征层面：他由此成为物的主人，恰恰因为他摧毁了它。

说到底，既然我们偶尔会读一小段弗洛伊德的文本，这一次我们就首次转向拉康的一篇文本：

“正是这些游戏……

我曾在一篇文本里这样写道——最近我重读了一遍，觉得它是可以理解的；当然，我处在一个有利位置。不过，我想鼓励你们去看看，它确实读得通： [《精神分析中言说与语言的功能和场域》，载《文集》，第318—319页]

“正是这些隐现游戏，被弗洛伊德凭借一种天才的直觉呈现在我们眼前，使我们从中认出：欲望人化的时刻，也正是儿童诞生于语言的时刻。如今我们可以从中把握，主体不只是在承担剥夺时掌控了自己的剥夺——弗洛伊德说的正是这一点——而且把自己的欲望提升到了二次方。因为他的行动摧毁了那个对象；它在挑衅中使对象出现又消失——这里取“挑衅（pro-vocation）”一词的本义，即通过声音来召唤——以预先召唤的方式唤起对象的缺席与在场。行动由此否定化欲望的力场，从而以自身为自己的对象。这个对象随即在两个基本呼声——“Fort！”和“Da！”——所构成的象征配对中取得身体，并在主体那里预告了音素二分的历时性整合……

这句话的意思很简单：仅凭这一事实，他便获得了进入某种已经存在之物的入口，

即构成一门语言的音素序列。

……而现存语言则向他的同化提供这一音素二分的共时结构；儿童也因此开始进入周围环境的具体话语系统，他在自己的“Fort！”和“Da！”中，多少近似地复现了从这一环境接收到的词语。”

因此，这一点并没有那么重要；不过，他确实是从外部接收到这些词的。

“在‘Fort！’‘Da！’中，人的幼儿即使独处，其欲望也已变成另一个人的欲望，变成一个支配他的另一个自我（alter ego）的欲望，而这个另一个自我的欲望对象从此就是他自己的痛苦。无论儿童现在面对的是一位想象的还是真实的伙伴，他都会同样看到对方服从于自己话语的否定性；他的呼唤……

因为别忘了，当他说“Fort！”时，对象在场；而当他说“Da！”时，对象缺席。

……而他的呼唤既然会使对象躲开，他就会在一种放逐性的肯定中寻找……

他很快就会学会拒绝的力量。

……那种唤回对象、使对象返回这一欲望的挑衅。”

这是对单纯呼唤的否定化；它先于“不”的引入——在后者那里，主体随着他者的拒绝，学会构成伊波利特先生日前向我们展示的东西。在

此以前，单凭一对象征面对在场与缺席这两种彼此对照的现象而被引入，象征的引入就已经颠倒了二者的位置：

- 缺席在在场中被唤起，
- 在场也在缺席中被唤起。

这些话听起来像是废话，仿佛不言自明。但我们仍然必须把它说出来，并认真思考！正因为象征的世界使这种倒转成为可能，也就是把现存之物取消，它才随之开启了整个否定性的世界；这个世界既构成人类主体的话语，也构成其世界作为人类世界时的现实。

原初受虐狂就围绕着这第一次否定化，甚至说到底围绕着起源处对物的谋杀。我们总得说几句作为结论。今天没有走到我原先希望达到的地方。

不过，如果你们把握了这一点：正是以欲望为中介……

欲望是异化的；这个欲望一旦被言语化，便通过把理想自我（Idealich）重新投射到外部，而不断地重新整合进来——

……你们就可以理解，两种倒置关系之间的摇摆游戏如何发生。一方面，是自我的镜像关系，主体承担并实现自我；另一方面，是那种随时准备在理想自我中重新发生的投射，而理想自我为主体提供了一切情色关系得以可能的根本框架。也就是说，情色关系固然超越了这一原初关系，却又成为欲爱对象此后必须服从的条件；换言之，对象关系必须始终服从它要在其中得到铭写的这个自恋框架。它当然超越这个框架，但在主体的想象层面上，这种超越完全不可能实现。

这就使得主体必然要同一个造物建立我称作爱的关系，并参照某种超越语言之物，参照那个盟约、那项承诺；严格说来，这项承诺把这个造物构成为一个他者。它把对方创造为一个他者，把他纳入人际象征的一般体系——更确切地说，是普遍体系。也正因此，在人类共同体中，不存在任何可以在功能上实现的爱，除非通过某种总是处在不同层次上的盟约；无论盟约采取何种形式，它总倾向于在某个既位于语言之内又位于语言之外的功能中把自己分离出来。这就是所谓神圣的功能，不过它超越了这种想象性关系。我们还会回到这一点。

今天我也许说得有些快。我只想告诉你们，这段起源故事连同格拉诺夫的问题所引出的补充，显明了日前我称作镜子的那个东西如何运作：主体借它在他者那里或清楚或不清楚地看见总体性。但由于光学隐喻很容易呈现的那些原因，他始终只能看见其中一部分；图像从来不会完全合焦。

可是，这个“我（je）”同他者的关系、这种同他者的镜像关系，连同象征性命名和欲望的承认，连同欲望只能以言语形式重新整合这一事实，正是弗洛伊德所谓“自我的言语核心”。这使我们能够理解整个分析技术。我们以某种方式松开了言说关系的一切系缆，把主体抛入一种尽可能在宇宙中移动的方式；这些系缆，也就是礼貌、尊重和服从他者的关系，以某种方式被斩断。我们把这一切称作“自由联想”，但这个名称极不准确，因为我们试图在若干点上割断的，其实是同他者交谈时的系缆；主体由此相对于我们使他进入的语言宇宙，获得某种可移动性。

这时，在想象层面上便可能出现这种展开、这种镜子的摆动，使主体得以在某种同时性或若干对照中，遇见那些通常不会为他共存的想象

之物与现实之物；也就是遇见他如何在他者面前调适自己的欲望。你们可以看出，这里开启了多少问题。

首先就是：

- 这种“斩断系缆”究竟是什么？
- 它产生什么结果？
- 就它在语言层面造成的后果而言，我们能说些什么？

换言之——我下次会展开这一点……——这里有一种根本含混的关系：

- 在分析中，我们试图向主体展示什么？
- 我们试图在本真的言说中把他引向何处？

我已经告诉过你们，当我们把自己置于转移现象中时，是在存在的表述层面。然而，我们抵达那里所取的悖论性路径，恰恰在于从语言中抽取言说。因为说到底，当我们释放主体的话语时，我们的一切尝试与指令，目标都是要从主体的话语中剥除言说的一切真正功能。

那么，我们将通过怎样的悖论重新找到言说？而在此间发生的现象又会因此具有怎样的全部意义？这就是我试图在你们面前展开的问题之视域。下次我会向你们说明：这种脱缆的话语经验会产生什么结果，什么东西必然由此推演出来；也就是在镜子的这个摆动层面上究竟发生什么，什么使0与0′之间的摇摆游戏成为可能，以及为何正确进行的分析……我说“正确进行”：我要请某个人来批判这句话。

巴林特给了我们一个轰动性的定义。这个定义有其根据，而且出自少数能够正确并真正切身体会地说明如下事情的人之一：人们通常“在少数可以视为已经完成的分析结束时”会获得什么。这是巴林特自己的说法；他是少数知道自己在说什么的人之一。我向你们保证，他描绘所发生之事的方式相当令人沮丧。这篇文本值得特别提出。然而，这里谈的还是正确进行的分析。我们应当由此推出什么？首先，就是这一点！其次，还存在通常实行的分析，而我已经向你们说明，它严格说来是错误的分析。以“阻抗分析”为主题的分析，作为标题是正当的；但作为实践，我认为这个图式会使你们能够明确说出：它令人痛切地表明，自己通向的并不是分析前提中所包含的那些目的。

这又是第二个问题。今天，就让它们暂且保持原样。

第15课 · 1954年5月12日

让我们重新画出这个小图式。有没有人能提一个问题，帮助我们从上次停下来的地方重新开始？

罗贝尔·皮若尔

只是一个简单的问题：您说“他者的欲望”。这是存在于他者那里的欲望，还是我对他者怀有的欲望？两者是一回事吗？在我看来，并不是一回事。但您每次都说“他者的欲望”。

拉康——这取决于说到哪一点。假设我们谈的是……

罗贝尔·皮若尔

您上次最后谈到的是存在于他者那里的欲望，自我可以通过摧毁来重新取得它。但同时，这也是他对他者的欲望。

拉康

这难道不正是同他者之关系的完全原初的镜像基础吗——只要这种关系扎根于想象之中？欲望的第一次异化同一个具体的现象相连。对于儿童来说，游戏之所以获得全部价值，是因为它构成一个反映平面：他在那里看到他者显露出一种先于他自己的活动；这种活动比他的活动略微完善一些、掌控得更好，是他自己的活动之理想形式。正因此，这最初的对象获得了价值。

这一点十分重要，因为它在一个完全原初而同时发生的层面——不仅同儿童最初的发展同时，甚至同儿童的前发展同时——规定了人类对象的条件。人类对象并不只是直接的内感受器，不只是动物欲望的补充物；它从一开始就经过敌对关系的中介，而这种敌对关系带有竞争对手之关系中一切最强烈、最突出的特征。也就是说，凡是威望与仪态的关系，都已经属于异化的秩序，因为主体首先正是在那里把自己把握为自我。

主体把身体总体理解为同某种不可言说的亲历之物相同。食欲与欲望最初的冲动，必须通过这个形式的中介；这个形式首先是他看见被投射在外部的。而他最先以特别明显、意义特别重大的方式，在自己的映像中看到它。

第二件被吸收进来的事情是：他知道自己是一个身体，尽管他身在其中，从来无法完整地知觉它，但他确实知道。这幅图像成为一道狭口、一个环；欲望与需要那一整束混乱的东西，为了在其想象结构中成为他本人，都必须从这里穿过。你们跟上了吗？所以，当我说“人的欲望是他者的欲望”时，这是一条公式；它像所有公式一样，必须在恰当的位置使用。它总会引发一些需要澄清的含混，因为它不只在一种意义上成立。

我们之所以停在这里，是因为这是引导我们理解技术的最关键点之一。我们从这种想象性捕获的层面出发。不过，正如我在上次课程结尾已经告诉、解释、提示并表述给你们的——我至少想在那里留下一个开端——事情绝不止于此。

我曾以一种神话式方式指出，若非如此，人际之间所能有的便只有黑格尔所谓诸意识共存时相互而彻底的不宽容。也就是说，每一个他者从定义上、从本质上，都是使人受挫的人；他使人失去的并不是对象，而是其欲望的形式本身——因为如果恰恰是他者在实行这一欲望，那么他者就已经在潜在意义上成为剥夺主体这一对象的人。

这里存在着一种人与人之间相互毁灭、招致死亡的关系。事实上，这正是始终潜藏在人际关系之下的东西。政治神话作为人际关系的一种特殊风格，即围绕生存的敌对，曾被用来塞进不少东西。达尔文先生之所以这样塑造它，是因为他属于一个海盗民族，而种族主义正是这个民族的基础产业。

你们知道，“生存竞争”这个观念在政治层面上多么值得质疑，因为一切事实都反对所谓最强物种的存续。这同明摆着的证据完全相反。它是一种逆事物本身而行的神话。

我们从不同生命形式的扩展区域和范围中能够确立的一切，反而证明：每个物种都有其特有的稳定点和平衡点；如果不知道其他与之共同生活的物种所具有的相同平衡点和扩展范围，这些平衡甚至无法构想。哪怕是“捕食者”与“被捕食者”，也处在某种协调之中。事情从不会走向这种彻底的毁灭主义，理由很简单：那只会使“捕食物种”本身灭绝，因为它将无物可食。相反，在生命层面上，存在着密切的相互共适，它完全不处于争斗的层面；这一点再明显不过。

这一点在人类层面极其重要，因为我们在粗暴运用攻击性概念而没有深入考察它时，常常暗含这样的想法：攻击性就是同一秩序中的某种东西，攻击性就是攻击。它们完全不是一回事。攻击性在虚拟的极限

上可以解决为一次攻击，但这次攻击恰恰同生命现实无关；它是一种存在性的攻击，同一种想象性关系相连。这是绝对根本的真理，也是一把钥匙，使我们能够在一个完全不同的语域中重新思考各类问题，而且不只是我们自己的问题。

我刚才请你们提一个问题。你这个问题提得很好。现在满意了吗？不过，我们上次毕竟还走得更远。如你所说，人类主体的这个欲望在他者那里实现——既在他者那里，也在他者之中、通过他者实现——这发生在我们可以称为第二时刻的地方，也就是镜像类型的时刻，即主体已经整合了自我形式之时。

不过，他之所以能够整合它，只是因为最初发生了一次翻转或倒转的游戏：他恰恰用这个自我交换了自己在他者那里看到的欲望。这个作为人的欲望的他者欲望，由此进入语言的中介。正是在他者之中并通过他者，这个欲望将被命名、得到承认，并进入“我”与“你”的象征关系；这种关系包含了承认、互反与超越，仅仅因为欲望已被命名，因为它进入了一种信诺的秩序——而这种秩序早已准备好把每个个体的历史容纳进来。

我曾向你们谈过“Fort”和“Da”：这是儿童如何自然进入这一游戏的一个例子。他从一开始便进入其中：也就是说，他开始仅仅围绕对象的在场与缺席来同对象游戏。这个对象已经转化，成为具有象征功能的对象；换言之，对象已经是一个符号，已经被抽除生命。当它在场时，他把它赶走；当它不在场时，他又呼唤它。

对象从最初的游戏起，借助一种我们必须看着它浮现的自然入口，便进入了语言、象征的层面，而象征变得比对象更重要。如果你们不把

这一点牢牢记在心里——我已经重复过这么多次了！它总该开始被你们整合了，但仍不妨再重复——对于人而言，词或概念无非就是处在其物质性中的词；而当我说“对于人”时，你们会看到这会走得多远：它就是物本身。务必明白，它并不只是物的一种影子、气息或虚拟幻影：它就是物本身。

你们稍加思考便会看到，在实在中，对于大象——我是指活着的大象——所遭遇的一切来说，人类语言中存在“大象”这个词，比其他任何事情都更具决定性。正是借助这个词，无论门有多窄，我们都真的把大象带进了这里的讨论。也就是说，正因为“大象”一词存在，人类还没有碰到大象，就已经围绕它们作出了某些决定；这些决定对于世界上的大象后来遭遇的一切，其决定性远远超过大象历史中发生过的任何事情——渡过一条河或一片湖、一片森林的自然荒芜，或任何类似事件。仅凭“大象”这个词以及人类谈论大象的方式，还没等人举起枪或弓箭，就足以使有利或不利、吉祥或有害——无论如何都是灾难性的——事情降临到大象身上。

好了！还是把大象放到一边吧！显然，只要我谈到它们，它们无须实际在场，就已经借“大象”这个词在场了；它们在一种比个别大象的偶然现实更大的现实中在场。好！

让·伊波利特——我刚才说：这是黑格尔式逻辑。

拉康——它因此就可以受到攻击吗?

伊波利特——不，它无可攻击。曼诺尼刚才说：“这是政治。”

奥克塔夫·曼诺尼

从广义上说，人类政治正是从这一侧插入的；因为人如果不像动物那样行动，正是由于他们通过语言交换自己的认识。因此，这是政治。围绕大象的政治之所以可能，靠的就是这个词。

伊波利特——但不只是如此。受到触及的是大象本身；这就是黑格尔式逻辑。

拉康

这是前政治的。我只是想让你们切身感受到名称的重要性。当然，我们在这里仅仅处于命名的层面，甚至还没有句法。但很清楚，句法也同时诞生；尤其是儿童——我已经向你们指出过——会在音素之前就说出公理性结构的要素。

“万一……”有时会单独出现。这并不容许我们严格断言某种逻辑上的先在性，因为所涉及的只是现象上的浮现。不论怎样，下面一点都可以确定：这种根本的发音连接从一开始就已经处在象征层面。随着儿童的欲望通过那个当然不只发生一次的翻转游戏得到重新整合，它们也正是在这一层面被连接起来。

在这种镜面游戏中，图像的投射不断继之以欲望的投射，并伴随着图像或欲望的重新内摄。儿童的欲望经过这个镜像的他者之后，将在象征层面重新被主体承担；在这个他者层面上，它们受到他者的赞许或责难、接受或拒绝。儿童从一开始便由此学会构成象征秩序之基础的东西，即一个已经是法的秩序的东西。

你们跟上了吗？这也有实验上的对应证据。例如苏珊·艾萨克斯曾在一篇文本中指出——她并不是唯一指出这一点的人，克勒学派也曾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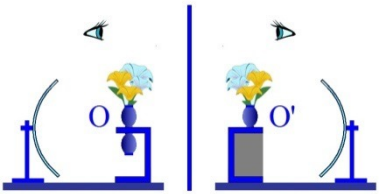
它显示出来——儿童在极早、仍处于不会说话（infans）的年龄，大约八至十二个月之间，对于下面两类事情的反应已经完全不同：

- 一次意外碰撞，可以说由笨拙所致的机械性粗暴；
- 一次摔倒、一个对象的移动，甚至某个人没有留意自己的动作而伸出手臂；
- 以及同它们极为相似的另一种事情，即一记带有惩罚意图的耳光。

在语言外显以前，我们已经能在一个很小的儿童身上区分出两种完全不同的反应。不过，我们知道，也必须承认：甚至在这种外显以前——恰恰考虑到它外显时所采取的形式与方式；我无法同时走遍所有路径——儿童已经初步把握了语言的象征作用，尤其是语言作为盟约与法的功能。

那么，我们恰恰必须在这里努力把握分析中的这项言说功能，即言说作为这个象征秩序之显现的功能。你们可以把它想成一个磨盘：人的欲望借此不断受到中介，并重新进入语言系统；随着经验展开，他通过越来越宽广的具体路径进入这个系统。

这里正是我所强调的一个语域，因为它最常被搁置、最容易被遗忘；人们在分析中背离它，尽管它本应成为我们永远不可丢失的参照。说到底，我们通常在分析中谈论什么？



我们谈论的只是——而这也说明我为什么有理由首先借O与O′ 的关系、借同他者的想象性关系向你们解释这个图式——在分析中被我们显示出来、被我们不断参照的东西；尽管这种参照经常混乱，甚至没有在这一层面上明确说出，但正是在这里，它才会进入一套连贯理论并得到定位。这就是主体同其自我构造之间的种种想象性关系。

我们不断谈到主体在这个自我构造层面所经历的危险、震荡与危机。另一方面我们知道，随着本能逐渐演变并趋向结构各异的对象，关系也逐步发展；其中，生殖器对象的最初浮现具有特别鲜明的标记，而且它同儿童发展的其他一切一样早熟。某种重大的事情，也发生在这次最初浮现及其失败之中。究竟是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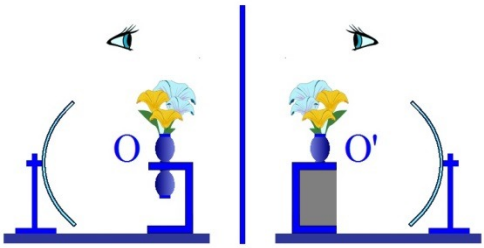
正是这里出现了某种彻底的新事物：把对象固定在自身图像上的力比多，同这股早熟力比多的涌现之间，存在着层次差异。我围绕这一现象的结构化反复强调的一切，是说儿童以一种早产状态出现在世界上——从结构上、自上而下、彻头彻尾都是如此——正因为如此，才会出现同自身图像的这最初力比多关系。在这里，力比多带有你们通常并且合理地赋予它的那些回响，即严格属于爱（Liebe）秩序的力比多；我想，我已经充分向你们说明，爱恰恰是整个分析理论中的大X。

如果你们认为把它称作大X未免过分，我不费什么力气就能从文本中给你们举出例子，而且是最优秀分析家的文本。因为若要作出有效证

明，就不能去那些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的人那里寻找范本。适当时候，我会请某个人到巴林特那里查一查。

所谓已经完成的生殖器之爱究竟是什么，这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而它究竟是一种自然过程，还是一种极难取得微妙平衡的文化实现——巴林特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分析家尚未解决这个问题。这种含混居然被留在一种在我们之间看似得到最公开接受的东西之核心，实在有些惊人。

不论如何，仍有一点不可否认：在吸引层面涌现的这股力比多，其性质至少必须被我们假定为——为了使理论站得住脚、使经验可以得到解释——不再处于不成熟或生命早熟的层面，而是超出这个层面，并至少对应着欲望的第一次成熟，成为一种生命性的欲望；原则上，我们没有理由拒绝这一点。它显然彻底改变了人同图像的关系，也改变了他同他者的根本关系。我们必须承认这一点，因为它正是所谓成熟的枢纽，而整个俄狄浦斯戏剧就围绕这个枢纽发生。它是俄狄浦斯戏剧在情境层面所发生之事的本能相关项。那么，究竟发生了什么？



事情发生在成熟力比多的这一结合之中；借用弗洛伊德最后时期［1939］的词汇，在爱欲（Éros）层面，同自恋图像的关系转入爱恋激情（Verliebtheit）的层面。正是在这个时刻，自恋图像作为想象层面

上具有捕获性与异化性的图像，严格说来成为由爱恋激情这种特殊关系加以投注的图像；而在现象学上，它正是我们从爱的语域中认识到的最明显之物。

这样解释事情，就是说，某种内部成熟——它在这里同主体的生命发展和演变相连——决定了如下过程：迄今为止容纳在未成熟主体之原初力比多裂口的含混状态中的东西，得到一种填充、补全，甚至满溢。我们此刻称作前生殖器力比多的东西，就是人在其虚弱、自然弱点与某种自然实现之间展开游戏的敏感点。

正是在这里，爱欲（Ἔρως）与死亡（Θάνατος）、爱与恨之间的幻景关节点发挥作用。我认为，更简单地说，这是表达并让人理解、感受下述关键问题的最简明方式——这不是我的发明：在我们对于力比多之作用的构想中，自我扮演什么角色？所谓自我的“去性化”力比多如何使恨瞬间翻转为爱、爱又瞬间翻转为恨？对于弗洛伊德来说，这是最难解决的问题；你们可以参阅他关于《自我与本我》的著述。

甚至到了这样的地步：在我所说的文本中，他似乎把这个问题当成了一种反对把死本能与生本能区分开的理论的异议。其实，它远非异议；我反而认为，只要我们拥有关于自我之想象功能的正确理论，这一点就会同该理论完全一致。

这些话此刻也许令你们觉得有些困难？我还会回来讨论。如果你们觉得过于困难，我现在就可以给出一个说明。对于俄狄浦斯式敌对的攻击性反应，恰好同这种层次变化之一相连：正是在俄狄浦斯情结衰退时，最初曾经实现了……

这一点也完全符合弗洛伊德的表述——

……在想象层面上最显著的理想自我（Idealich）形象之一的父亲，曾经作为这种形象受到一种爱恋激情的投注；弗洛伊德已经把这种激情清楚地分离、命名并描述出来。也恰恰是在主体于俄狄浦斯阶段——即三至五岁之间——达到的力比多位置发生某种退行时，后面的事情才发生。

正是由于这股力比多的层次发生退行，针对父亲的攻击或敌对感——说得直接些，就是恨——才会出现。也就是说，相对于某一阈值，力比多层次只需在临界处发生很小的变化，就会导致：

- 原本是爱的东西变成恨，
- 而且——同样也始终如此——它还可以在一段时期内在这两种现象之间摆动。

现在，让我们重新回到上次停下来的地方。我已经向你们指出，在我们阐述分析理论本身的方式中，想象性关系在哪个层面发挥作用：它具有完全根本的地位，可以说，它以确定的方式给出了此后一切严格意义上的力比多波动将在其中发生的框架。

你们知道，上次我把问题开放在象征功能的层面，并立刻告诉你们：如果想对治疗中发生的事情说出一些有组织、有坚实基础的话，我们就必须从这里出发。这是什么意思？就是从我们在治疗中如何使用语言与言说出发。

如果我没有记错，我曾规定我们在治疗中使用语言的这种方式；而这种语言就是言说，因为那里有两个由一项盟约联结起来的主体。这项

盟约起初建立在许多不同、甚至极为混乱的层次上，却从根本上仍然是一项盟约；我们一开始便竭力确立它的这种性质。

这为我们给分析关系规定的各类规则与预先条例提供了理由。在这种关系内部，我们竭力松开言说的一整套系缆：在说话方式、风格以及面向听话者的方式上，主体从一系列限制与联结中得到解放；这些限制不只来自礼节与客套，甚至来自连贯性的要求。言说的一些系缆由此被松开。

如果我们认为，主体表达自身并使自身得到承认的方式，同其欲望关系中切实而亲历的动力之间始终存在密切联系，那么就必须看到，单是这种松解就会引入我们实际看到的结果：主体同他者的镜像关系发生某种脱嵌、某种漂浮，并获得摆动的可能。

这就是我的小模型之所以存在的理由。你们知道，我们已经很好地构想出：主体同他者之关系的入射角发生摆动，如何使那幅图像变动、闪烁、时而完整时而残缺，以各种方式来回摆动；而主体永远无法接近本应在这种完整性中被看到的图像，理由很简单，这个模型正好让你们想象出：装置本身做得并不好。

要让主体真正认出其欲望的所有阶段、认出曾经为这幅图像赋予一致性、养分和充分化身的一切对象，从而使主体能通过一系列重新取得和连续认同，构成其自我的历史——

在同分析家的这种漂浮的言说关系中，会发生某种其他经验中都不会发生的事情：变化会充分反复，即使每次变化微乎其微；摆幅也足够广阔，即使有时受到限制。主体由此能够看到比在其他情形下多得多

的东西，也就是重新占有那些构成其自我之基础的捕获性图像的一系列过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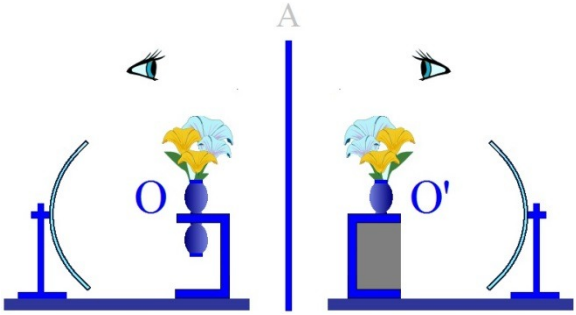
我谈到了“微小的摆动”与“这些摆动受到的限制”。此刻我无须详细说明是什么造成了它们的微小和受限。显然，其中存在制动和停顿。你们知道，技术教我们越过、填补、有时甚至重建的，正是这一切；弗洛伊德已经在这个意义上指出过它。

但你们应当开始隐约看到，为什么这种技术会在主体那里产生某种需要重建的东西——无论重建的程度多么微小：主体同自身的这层想象性幻景关系被推进到日常体验能够达到的一切界限之外，因而倾向于以人工和幻景的方式创造出恰恰构成一切爱恋激情之根本条件的东西。

换言之，正因为这幅实像——你们知道，主体从自己所处之地只能在镜中看见它，而且总是或多或少地模糊；正因此，它只在若干点上清晰——正因为松开言说的系缆至少使主体能够依次看到这幅图像的不同部分，简言之，获得我们可以称作最大限度的自恋投射，事情才会发生。就其整体性质而言，它仍然相当粗糙——你们已经感到事情会走向这里——说穿了，就是把一切都放开，先看看会产生什么。

事情本来可以、现在也可能以别的方式进行，并非不可设想。不过，你们可以理解，借助这些小模式、小图式所倾向于最大限度产生的东西，若有其一，恰恰就是这种发生在想象层面的自恋性显露；而它正是我们所谓爱恋激情的根本条件。

恋爱状态实际发生时，方式完全不同：它要求一种惊人的巧合。恋爱状态不会面对任何一个伙伴或任何一幅图像都出现；某些条件必须得到实现。我曾提到维特一见钟情的最大条件。



恰恰在分析中，随着并依据这种言说系缆的断裂——而且仅仅由于这一点——主体在自恋图像层面的认同原先聚焦于A点；这就是所谓转移。这里取转移的第二种意义：并不是我借朵拉个案向你们解释的那种辩证意义，即产生所谓负转移的东西——况且，那并不是负转移，而是弗洛伊德的一个错误——而是通常所谓作为想象现象的转移。就是这个。

我们今天没有前进多少，但我认为必须非常缓慢，一步一步地前进。不过，在离开你们以前，我还想让你们看看，事情会推进到怎样尖锐的程度，抵达技术中一个真正的分水岭。我只想作一点说明。接下来我将评注巴林特的一篇文本。

我已经告诉过你们，巴林特是说明自己所作之事时最自觉、最清醒的人物之一。同时，他也最好地示范了分析技术逐步卷入的那种倾向如何构成一套完全连贯的构想。许多其他作者把同样的东西缠绕在一套

繁琐、混乱得连猫都找不到幼崽的经院论述中；巴林特不过比他们说得稍微更连贯、更公开一些。

巴林特准确地说了下面这番话。第一，分析的一切进展都在于主体趋向重新找到他所谓的“原初之爱”（primary love），也就是：需要成为另一个对象的爱、照料、情感与关注之对象，而自己根本不顾那个对象的需要，甚至不顾它是否存在。这就是分析的动力。

相关知识卡 迈克尔·巴林特的原初之爱与分析终结

巴林特把它明确说了出来。我感谢他这样说，但这不表示我赞同。把分析的全部游戏都放在这种倾向和这个层面上，不作任何修正，也不加入其他要素，本来已经足以令人惊讶；不过，它确实沿着分析的一条演变路线前进：越来越强调依赖关系、本能满足，乃至挫折——这些其实是同一回事。

另一方面，他也借此描述人们在分析结束时观察到的东西。他说，在少数分析完成、真正终结的个案中——比例不超过25%——结局的标志是主体的一种自恋状态；他说的就是“主体的自恋”。它走向欲望的一种不受约束的亢奋，给主体一种陶醉般掌控现实的感觉；这种感觉仍然完全是幻觉性的，但主体在一段可以说“终结之后”的时期需要它，以便随着事物本性逐渐复位而获得解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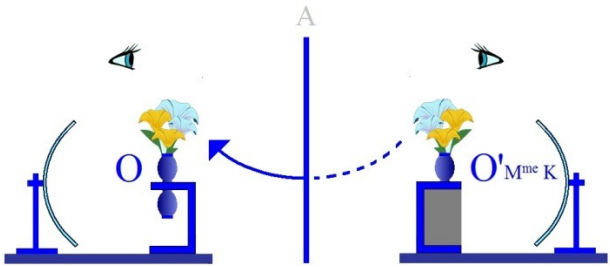
他还写道，在最后一次会谈中，两位伙伴都怀有最强烈的哭泣冲动。你们难道没有看到，这一方面具有极其珍贵的见证之重要性与价值——它所描述的不只是极端情形，也是分析中整套操作方式的尖端；但另一方面，归根结底，它难道不也给我们留下了对这场游戏极不令人满意的印象吗？

我们自己所能设想的也许会是一种乌托邦式理想，而这个结果无疑令我们心中的某种东西失望。难道我们不能理解，某种理解分析的方式——或者更确切地说，某种没有理解分析中若干绝对关键要素与动力的方式——如何必然不只导向这种构想，也像你们看到的那样导向这种结果吗？我把这个问题暂且悬置起来。

我想告诉你们的是……我要选取一个你们已经十分熟悉的例子，因为我已经反复讲过二十次了：朵拉个案。我直接说要点。遭到忽略的显然是言说功能——言说作为承认功能，作为主体的欲望由此在象征层面得到本真整合的维度。

我们似乎应当如何正确构想并定位这样一个点：主体得到承认的欲望，必须在那里同面对他者的表述、这种命名结合起来；严格说来，借此建立的并不是欲望的满足，也不是什么原初之爱，而是对欲望的承认——无论欲望是什么，也无论它处在主体构成中的哪一层面？我要告诉你们这条界线、这个分界位于何处；在我看来，我们围绕技术所要说的一切，最终都必须为它带来根基与基础。

请回想弗洛伊德如何对待朵拉。朵拉是一位癔症患者。弗洛伊德当时还没有充分认识……他自己承认过，并一写再写、反复重申，到处塞进脚注，文本的每个角落也都写了……他所谓的同性恋成分——这个说法本身没有什么意思，归根到底只是一个标签。它实际意味着，他恰恰没有察觉朵拉的位置，没有察觉什么才是朵拉的对象。说到底，他没有察觉，在O′那里的人正是K夫人。



弗洛伊德通过自己的介入做了什么？他在自己所谓“阻抗”的层面上接近朵拉。这是什么意思？

我已经向你们解释过：弗洛伊德让自己的自我介入其中——这一点再明显不过——也就是让他对于“一个女孩生来是为了什么”的构想介入：我已经告诉过你们，女孩生来就是要爱男孩的。显然，这里有某种不对劲、折磨着她、并且遭到压抑的东西；在弗洛伊德看来，遭压抑的东西“简直刺眼”：她爱K先生。她也许顺便也有一点爱弗洛伊德；一旦沿着这条路线走下去，这一点就十分明显。

由于同样同错误出发点有关的一些原因，弗洛伊德甚至没有向她解释那些针对他的所谓转移表现；换言之，他没有机会对她说，她开始针对他——弗洛伊德——显露出某种转移虚构，从而在这里犯错。他只是同她谈K先生。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恰恰在主体必须承认自身欲望的这个层面上，［他对她说话］所处的却是他人经验的层面；而当［她的欲望］没有得到承认时，它们本身也就遭到禁止，压抑正是从这里开始。

朵拉在她已经可以说学会了什么也不理解的通常层面上，遭遇了分析家的介入；这种经验同她迄今全部经验中那种混乱甚至流产的承认经验完全同质。弗洛伊德站在那里，对她说：“你爱K先生！”

此外，他说得相当笨拙，朵拉立刻中断了分析。但如果他当时已经受过所谓“阻抗分析”的训练，也可以把这句话切成小口，让她慢慢品尝：先教她认识自己身上的这一件、那一件东西都是“防御”，继而一点点剥除整套小防御。这样，他所做的会恰恰是严格意义上的暗示性行动：也就是向她的自我［朵拉的自我］中引入一个要素、一项补充、一个额外动机。

弗洛伊德曾在某处写道，转移就是这个；从某种角度说，他是对的：就是这个！不过，我们必须知道它处在哪个层面。他本可以充分渐进地改变朵拉的自我，让她借此机会同K先生成婚——像任何一桩婚姻一样不幸。

相反，我们应当把本应发生的事情构想成什么？弗洛伊德的言说本不应在O′那里介入；因为它在那里是作为弗洛伊德的自我介入，因而成为一次重新揉塑、重新改造并向朵拉的自我添加补充成分的尝试——当然，这种尝试同任何其他尝试一样也有其价值。它本应通过向朵拉指出O′那里的人恰恰是K夫人本人，来采取另一种介入方式……

事实上，他介入的时刻，恰逢朵拉的欲望通过翻转游戏来到O′，也就是朵拉欲望K夫人的时刻。朵拉的故事本身就处在这样一种摆动状态里：她不知道自己所爱的究竟——

- 是她自己，是她在K夫人那里得到放大的自身图像，
- 还是她对K夫人的欲望。

正因为这种摆动、这种持续的翻转不断发生，朵拉才始终无法脱身。恰恰当欲望来到O′时，弗洛伊德必须命名它：就在那个时刻，它才

会切实实现；只要介入反复得足够多、足够完整，那份遭到误认的爱恋激情便可以真正实现——它曾经破碎，并像水面上始终无法把握的图像那样，不断发生折射。在这里，朵拉确实能够认出自己的欲望，并认出自己所爱的对象确实就是K夫人。

你们可以看到，这正说明了我刚才所说的事情：如果弗洛伊德向朵拉揭示她爱上了K夫人，她便真的会爱上K夫人。分析的目的就是这个吗？不是，这只是第一步！如果错过了这一步，你要么像弗洛伊德那样使分析中断，要么去做另一件事：你做的是自我的矫形术，而不是分析。

相关知识卡 Orthopédie：矫形术的词源与拉康的教育隐喻

你们是否明白，把分析构想为逐步剥皮、削皮——像给水果削皮一样逐层剥去防御系统——为什么完全可以奏效？分析家把这称作“在主体的自我中，或如他们所说，在其健康部分中找到自己的盟友”。也就是说，他们确实成功地把主体自我的一半拉到自己一边，接着再拉来这一半的一半，如此类推。既然自我在人的存在中本来就是这样构成的，为什么同分析家就不能这样运作？

不过，问题在于：弗洛伊德向我们表明，言说本来就清楚可见，已经体现在历史本身之中；如果主体没有把它体现出来，换言之，如果这句被堵住嘴的言说潜伏在主体的症状中，我们究竟应不应当像解救“睡美人”一样把它释放出来？

如果不应当释放它，那我们就去做一种以阻抗分析为基础的分析。但弗洛伊德最初谈论分析阻抗时，所指的并不是这个。我们还会看到，应当赋予“阻抗分析”这个词什么样的正当意义。

因此我们看到，如果弗洛伊德在那里、在O′介入，如果他使主体能够命名自己的欲望——并不需要由他替主体命名——那么O′那里就会产生爱恋激情的状态。还有一点不应忽略：另一方面，主体也会十分清楚，正是弗洛伊德给了她这个爱恋激情的对象。

过程并不在那里结束。当这次翻转发生时，主体在重新整合自己言说的同时，也重新整合了作为镜子的分析家之言说［A］，由此得以承认自己的欲望。这并非一次完成。主体看到某种与这种逐渐逼近、作为目标走近的完整性同样珍贵的东西，它越来越多地显现在这些“蜕变”本身之中……

请记住这个词，我们还会回来讨论。它不是我发明的，人们已经谈过“致变性解释”。

……在这些“蜕变”中，主体如同在一幅幻景里重新征服自己的理想自我（Idealich）；正是在这个限度内，弗洛伊德才能在自我理想（Ichideal）的层面上占据他的位置。今天我们就停在这里。

分析家同自我理想的这种关系，提出了有关超我的整个问题。你们知道，自我理想有时甚至被当作超我的同义词。你们可以感到，我是从一端来处理事情的，就像攀登一座山。当然，我们也本可以沿另一条下山的小径来处理，直接提出问题：“超我究竟是什么？”

这个问题看似不言自明，其实并非如此。迄今为止给出的所有类比——援引“绝对命令”、良心——都极为混乱。不过，超我毕竟不同于这些东西，否则人们也就不会谈论超我了。

那么，让我们把事情暂时留在这里，也把后续演变悬置起来。你们已经看到了可以被视为分析第一步、第一阶段的东西：某种处在O的东西——也就是主体的自我，它已经构成，却不为主体所知，位于他内部、处在他能够承认之物的这一边——逐渐转移到O′；主体在那里可以认出自己一连串的想象性投注。

你们也已经看到，这个过程同主体把自己的欲望付诸行动并重新整合进这幅图像的可能性彼此相关。每当这幅投射出来的图像重新唤起他最初在镜像经验中已经体验到的东西——无拘束的亢奋感、掌控感以及一切出路皆有可能的感觉——他同时又能够命名这一切；毕竟从那时起，他已经生活了相当时间，也学会了说话，否则他不会来到这里接受分析。

这是第一步。我甚至会说，这第一步同巴林特先生留给我们的那个点高度相似。因为这种“不受约束的自恋”、这种“欲望的亢奋”究竟是什么？它不正是朵拉也已经可能抵达的那个点——我已经把她带到的那个点——吗？

我们要把她留在这种“凝视”中吗？在个案记录的某处，一男一女正像这样怀着崇拜，站在圣母像前。接下来的过程应当如何构想？今天我把你们留在这里，因为要迈出下一步，就必须深入研究理想自我（Idealich）的功能（见[注]）；你们看到，当分析家在正确地点、正确时刻、正确位置作出介入时，他会在某一时刻占据这个位置。他将如何运用自己所占据的这项功能、这个位置？

> [注] 本段法文底本作 Idealich“理想自我”；上文第103—104段谈分析家占据的则是 Ichideal“自我理想”的层面。此处依底本保留两者差异，留待全期二次校验结合后文复核。

这就是转移运用的下一章；今天我把它作为一个开放的问题留在这里。

第16课 · 1954年5月19日

随着我们在这一学年里前进，它顺着下行的斜坡渐渐接近尾声，也终于开始呈现为一个完整学年。令我感到欣慰的是，我从若干回响中，更直接地从别人向我提出的问题中，得到了这样一个回应：你们当中已有一些人开始明白，我正在教给你们的关乎精神分析的“全部”，也就是你们行动本身的意义。

我说的正是那些已经明白以下一点的人：对于“分析意义”的构想，是一切技术规则唯一能够由之出发的关节点。任何运用都取决于你们从哪个维度把握它、在其中移动，从而理解自己行动所针对的主体究竟是什么。

当然，在我逐步为你们拼读出来的东西中，并非一切都已经为向我提问或自己思考这些问题的人显得绝对清楚透明。不过，至少看起来，这里所涉及的绝不亚于围绕若干观点采取一种根本立场；这个立场以后将赋予他们的行动与介入以生命，也将决定他们如何理解分析经验的存在位置及其目的，即人们试图通过这种行动获得什么。

据说上次……虽然我并不觉得自己让你们向前迈了很大一步；更确切地说，我只是把你们放到某个中心点，至少让你们理解一种游戏。它应当顺带为某种在分析介入方式中始终令人费解的东西提供一幅具象化图像，也就是英文所谓 working through［修通］。法语很难用“加工”或“工作”把它译出来。这个维度乍看颇为神秘：为了同患者完成某种进展、跨越和根本的主体性过渡，我们必须把自己的作品放回机杼上百次，一遍遍重新做起。

如果说有什么东西能在两支箭头——从O到O′ 、再从O′ 到O——表达的这种磨盘运动中得到表述、取得化身，从而显明往返与映照的游戏；如果一幅主体的图像借此不断从镜子的这一边走向另一边，再返回来，那是因为其中关乎：

- 这幅图像在分析过程中的补全；
- 另一方面也关乎主体的欲望：主体重新整合它，看到它以紧张形式在自身之中显露并涌现；而每当这幅图像的补全迈出新的一步时，紧张都会变得格外尖锐。当然，这项运动不会在转过一圈以后就停止；为了使想象性、自恋性、镜像性认同——在理论呈现中，这三个词彼此等价——的各个阶段得以实现，为了使这幅图像得到实现、清楚显现并分离出来，它需要转过多少圈，就必须转过多少圈。

我并没有告诉你们，现象到这里就穷尽了；因为如果没有我上次在技术说明结尾引入的第三项介入，一切都无法构想。第三项就是主体之言说的结合。这不是任意结合，而是它在欲望涌现的那个意义重大时刻同欲望结合；欲望在同图像的这种对峙中涌现，也就是一般欲望的涌现。在图像得到补全的时刻，它会采取一种格外令人焦虑的形式；毕竟，图像之所以先前残缺，想象的一面之所以没有得到整合，遭到压制或压抑，想必并非没有理由。

正是在主体感受到这个欲望时，言说同欲望结合——因为没有这种言说的结合，欲望就无法被感受到，而且它原本只是纯粹的焦虑，除此以外什么也不是——这个时刻正是富有成效的时刻，也是斯特雷奇等作者试图加以明确的一切所围绕的富有成效的点。

斯特雷奇曾试图以最充分的精确性[注1]，规定、命名并圈定他所谓的“转移解释”，更确切地说，是“致变性解释”。他强调，只有在一个规定、界限特别清楚的时刻，解释才能具有推进与改变的价值，才能在分析中成为决定性的东西；这种机会既不频繁，也不能靠大致接近来把握。

> [注1] 詹姆斯·斯特雷奇：《精神分析治疗作用的性质》（“The Nature of the Therapeutic Action of Psycho-Analysis”），《国际精神分析杂志》第15卷，1934年，第127—159页；德译《精神分析治疗作用的基础》（“Die Grundlagen der therapeutischen Wirkung der Psychoanalyse”），《国际精神分析杂志》德文版第21卷第4期，1935年；C. David 法译《精神分析治疗作用的性质》，收入《解释 I：一个致变过程》，巴黎：PUF，1999年，第33—64页（另见前注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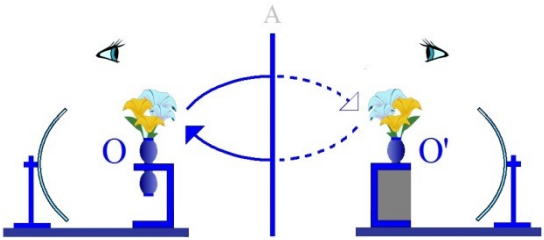
相关知识卡 斯特雷奇的致变性解释

这种解释不应在那个时刻周围、附近、之前或之后给出；必须恰好在即将于想象中绽出、涌现的东西，同时也在分析中、在同分析家的言语关系中出现之际给出。只有解释落到这个确切时刻，它的决定性价值与致变功能才能发挥作用。

这是什么意思？无非就是我正在向你们解释的事情：在一个分析情境的想象与现实相互混合的时刻，主体的欲望同时既在场又无法表达。

分析通过命名提供某种补充与支撑；它以命名式介入说出情境本身之中存在的东西。按照斯特雷奇的说法，这构成了一个关键的连接点；分析家的介入必须局限于此，因为只有在这个真正富有成效的点上，分析家的言说才需要加入患者在这场漫长独白、这种话语磨盘般的反复研磨过程中酝酿出来的言说。图式中箭头所表示的旋转呈现，确实足以为这则隐喻提供根据。

相关知识卡 斯特雷奇的致变性解释



为了说明这一点，上次我曾提醒你们注意弗洛伊德在朵拉个案中的解释功能，包括其不适当之处，以及由此在那堵对应于分析第一阶段的心理之墙上造成的停顿。

你们当中有人听过我两年前对《狼人》的评注吗？希望有人听过……看起来并不多！我想请其中一位——贝尔纳尔神父？——不妨在下次以前找点乐趣，重读一遍《狼人》。你们会看到，例如《狼人》的个案记录及其全部讨论，如何被弗洛伊德组织在这场童年神经症的各项要素周围——《狼人》德文版的标题正是这个；也会看到，这个图式何等具有解释力和根本性。

我想，即便其他人也至少大致知道《狼人》的故事。《狼人》是今天所谓的性格神经症，也可称作自恋性神经症。这种神经症本身对治疗产生很强的阻抗。弗洛伊德选择——而且是有意选择——只向我们呈现其中一部分。

弗洛伊德分析他时，这名男子大约二十五岁。他选择向我们讲述童年神经症，是因为在当时，这对提出若干问题极有用处；这些问题构成弗洛伊德论述中围绕创伤价值展开的表面轴线。这里涉及的是创伤功能的理论。

当时是1913年前后。因此，它的确处在弗洛伊德思想发展这一时期的核心，并属于一个我们可以、也必须置身其中的整体，才能评注《技术著作》：1910至1920年的场域正是我们今年评注的对象，而《技术著作》无法从中割离。

同样，《狼人》对于理解弗洛伊德当时在技术过程中阐发的东西也不可或缺：创伤理论在那个时刻因荣格的坚持和意见，以及［……］而受到质疑与动摇。

在《狼人》这份个案记录中，我们看到什么？既然这里涉及童年神经症，我就提醒你们注意这篇惊人文本的一个突出特征：弗洛伊德在其中带给我们的一切，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没有给出，在纯理论著述中就更找不到。

这里有对其理论的若干补充；我所谓"补充"，是指压抑理论构想中绝对关键的部分。不要忘记，弗洛伊德在这篇文本中以最明确的方式明说并反复强调：《狼人》个案中的压抑，同观看一场交媾所造成的创伤经验相连……

弗洛伊德的展开和评注使人得以重建——只能重建，因为患者从来不能直接唤起或回忆这一场景——

……他父母之间的交媾。从主体行为的后果反推，这场交媾似乎采取了从后方（a　tergo）的姿势；而主体的历史——这里所涉及的确实是历史——乃至那项令人十分惊讶的耐心的历史重建［……］。看看人们能围绕历史方法突出哪些特征，应当很有意思。

这种重构把我们带向一种汇集，它近似于人们所谓的遗迹、档案文献，以及文本批判与释义的全部要素。这些要素都同下面一条原则相连：如果某一要素在某处以更发达的形式出现，那么虽然发展程度较低、却已包含其某项成分的形式，必定在它之前。

例如，人们最终能够确定……弗洛伊德毫不含糊、以绝对严密的确信，把事件日期确定为“n＋1/2”岁。而n不可能大于1，因为出于我们不得不接受的一些理由，在两岁半时已经不可能发生；这些理由来自这场惊人显现给幼小主体带来的某些后果。

他排除了六个月。事情并非绝不可能发生在六个月；不过，他排除了它，因为在当时、在那个年代看来，这个日期毕竟显得有些过于大胆。我想顺带指出，他并没有真的排除事情发生在六个月的可能。说实话，我也不排除；而且必须说，如果可以对这份个案记录提出一点异议，我反而倾向于相信事情发生在六个月，而不是一岁半。我也许稍后会顺带告诉你们为什么——如果我没有忘记。

弗洛伊德向我们明确说明的是：这场景造成的想象性闯入，其创伤价值绝不能定位在事件刚刚发生之后；它出现在下面两个时点之间：

- 三岁三个月时，某种具有重大影响、在主体历史中充当关键转折的事情发生；

- 与四岁时。我们知道这个日期，因为主体出生于圣诞节——这个巧合在其历史中也具有决定性。他期待圣诞节发生的事情；对他和所有儿童而言，圣诞总伴随着礼物的到来，而礼物被认为来自某个从天而降的存在……正是在这个时刻，主体第一次做了那场焦虑梦，而它正是整份个案分析的枢纽与中心。

因此，这场焦虑梦是我们看到的第一项显现，显示我刚才所谓“想象性闯入”已经取得创伤价值。如果你们愿意，我们可以从本能理论借用一个词——这套理论今天的发展显然比弗洛伊德时代更深入，尤其在鸟类研究方面［参见康拉德·洛伦兹］——即 Prägung［铸印、印痕、印刻］；这个词带着铸压的回响，如同钱币受到铸压：起源性创伤事件的 Prägung［印刻］。

弗洛伊德极为清楚地向我们说明，恰恰由于这种 Prägung……

起初定位在某种我们还无法从理论上命名的东西中；我们暂且满足于这项初步近似，以后也许会为它给出更精确的技术规定——

……由于这种 Prägung 定位在一种未经压抑的无意识中……

也就是说，它尚未以任何方式被整合进主体已经言语化的系统，甚至还没有上升到言语化；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它甚至尚未达到意义——

……这种严格局限于想象领域的 Prägung，才会随着并通过主体的发展进程，在一个越来越有组织、越来越象征化的世界中重新涌现。

弗洛伊德向我们叙述主体的整个故事，说明的正是这一点。这个故事来自主体当时的陈述和观察，发生在原初的x时刻与四岁这个弗洛伊德用来定位压抑的时刻之间。压抑之所以有机会在那里发生，是因为主体早年的事件从历史上说已经足够动荡。

我无法把整个故事都讲给你们：

- 他受到姐姐的诱惑；姐姐比他更为阳刚，同时又显然是敌对与认同的对象；
- 面对这种诱惑，他退缩并拒绝；在这么小的年龄，主体自己既不掌握这种反应的动力，也不具备相应要素；
- 随后，他自己尝试采取主动的诱惑行为；这种诱惑沿着最初的俄狄浦斯式生殖器演变方向展开，根本上完全朝着规范方向。但女家庭教师娜尼娅拒绝并排斥了他，这对他构成一场戏剧；
- 最初的阉割威胁也同时出现。

因此，他进入了俄狄浦斯辩证法，但这次进入受到姐姐最初那场捕获性诱惑的扭曲。他由此被逐出自己投入其中的场域，退向施虐—受虐位置；弗洛伊德为我们给出了这些位置的整个语域和全部要素。我在这里只标出这两个参照点。

主体正在等待把自己整合进一个象征世界；而这个世界会在此后的整个发展中继续发挥引导性的吸引力。你们知道，他后来会有若干顺利解决的时刻，而且恰恰是在严格意义上的教导性要素介入其生活时发生：某位富有威望的教师介入后，他同父亲之间令自己被动化的敌对辩证法会在某一时刻完全松弛；更早以前，整个宗教语域的引入也会对其发展产生影响。弗洛伊德向我们说明，主体严格地说正是在自己的戏剧被整合进一个具有广泛、甚至普遍人类价值的神话时，才得以实现自身。只有引入象征辩证法，我们才能期望一切出路，包括最有利的出路。

然而，在那个时刻发生的事情，使我们能够感到：这一时期——三岁一个月至四岁之间——发生的事情，最明显地可以同这个图式，并因而同分析过程相提并论。也就是说：

- 主体学会把自己生命中的事件整合进一种法、一个象征意义的场域、一个使意义人类化并普遍化的场域；如果你们愿意，童年神经症在当时、在这个日期最初形成时所做的，恰恰同一场精神分析所做的是同一件事——至少在我们于这个日期和时期把握它时如此；

- 正因为它同精神分析发挥相同作用，即重新整合过去，使 Prägung［印刻］本身进入象征游戏；人们只能在极限处通过一种追溯性游戏、即弗洛伊德此刻严格写出的 nachträglich［事后地］触及它。正因为事件的游戏使它以象征形式、以历史形式被主体整合，它才来到几乎要重新涌现的位置；

- 又恰恰由于这第一次象征整合对主体具有格外震撼的形式，它才真正涌现。严格依照弗洛伊德的理论，它是在进入主体生命两年半以后——或者根据我刚才所说，是三年半以后——才事后地、nachträglich 取得自身价值。它原先只介入主体生命的想象层面，此时才获得创伤价值，也就是创伤发挥压抑作用时的价值。

换言之，在这个时刻，某种东西可以说从主体正在整合的象征世界本身之中脱离出来，并成为：

- 某种不再属于主体的东西；
- 某种主体不再说出、不再整合，却仍留在某处的东西；
- 某种将继续被“说出”的东西——如果可以这样说，是被一个主体已无法整合或掌控的东西说出——并将成为后来所谓主体症状的第一个核心。

你们跟得上吗？换言之，我向你们描述的分析时刻，同铸印和象征性压抑之间的中间时刻，在本质上没有差异。唯一差异在于，当时没有任何人在那里为他给出那个词；于是压抑开始了，构成它的第一个核心，也因而构成了一个中心点：此后的一切症状、连续的压抑都会围绕它组织起来；同时——因为压抑与遭压抑之物的返回是同一回事——遭压抑之物的返回也会围绕它组织起来。

佩里耶，遭压抑之物的返回与压抑是同一回事，这不会使你惊讶吗？

弗朗索瓦·佩里耶——噢，已经没有什么能让我惊讶了！

拉康——尽管佩里耶告诉我们已经没有什么能使他惊讶，还是有人会对此感到惊讶。

曼诺尼——这样是否取消了人们有时所说的“成功的压抑”？

拉康

不，并没有取消。但要向你们解释，就必须进入遗忘的整个辩证法。任何成功的象征整合都包含着某种正常的遗忘——不过，这会把我们带到远离弗洛伊德辩证法的地方。

奥克塔夫·曼诺尼——那么，其中没有遭压抑之物的返回？

拉康

是的，没有遭压抑之物的返回。整合进历史显然意味着，一个由未被带入象征性存在的阴影所构成的完整世界遭到遗忘；如果这种象征性存在充分成功、得到主体承担并能够为主体所承担，它背后便不留下任何重量。我们在这里已经落到这样一个地方：必须引入海德格尔式概念。存在每一次通过并进入其言词居所时，都会留下遗忘的边缘；每一种真理（ἀλήθεια，alétheia）都伴随着相应的遗忘（λήθη，lēthē）。

伊波利特——遗忘并不是什么也没有。它本身包含在象征表达中。

拉康——是的，完全正确。

伊波利特

我不理解的是曼诺尼公式中的“成功”一词。“成功”是什么意思？我不明白。

拉康——这是治疗者的表达。这里有一种绝对关键的遗忘（λήθη，lēthē）。

伊波利特——因为“成功”恰好也可能意味着最根本的遗忘。

拉康——我说的正是这个，条件是要按照你刚才所说的意义理解“根本”。

伊波利特

那么，从某些方面说，这个“成功”反而意味着最为失败的东西：归根到底，你们成功让存在得到了整合；可为此，它必须忘记最根本的东西。这种成功就是失败。

拉康

我不能确定，这就是海德格尔指出的那种 Irre［迷误、漫游］的意思；它是一切存在的时间性化身——“时间性化身”不是他的说法——所固有的根本现象。

伊波利特

我针对海德格尔提出的是另一个问题。他不会接受“成功”这个词：“成功”只能属于治疗者的观点。

拉康

是的，就是这样，这是治疗者的观点。不过，海德格尔似乎始终把存在的任何实现中都会出现的这种误差边缘，保留给一种根本的隐匿（Verborgenheit），也就是真理的阴影。

伊波利特

在海德格尔看来，治疗者的成功是最糟糕的事情，它就是对遗忘的遗忘。对于不采取治疗者观点的海德格尔来说，最严重的正是对遗忘的遗忘。反之，海德格尔式本真性恰恰在于不沉入对遗忘的遗忘。

拉康

是的，因为海德格尔把这种返回存在源头的运动变成了某种哲学法则。我们暂时把这个问题悬置起来。我之所以在这里引入它，不让曼诺尼的介入轻轻放过——我本来也可以把它撇开——是因为我认为，我们将不得不提出下面的问题：

- 对遗忘的遗忘能在多大程度上“成功”？
- 每一场分析在多大程度上都必须通向我刚才所谓返回存在的源头，或者通向主体相对于自身命运在存在中取得的某种退距？

换言之，我总是顺势接住抛来的球，于是稍微提前触及了以后可能提出的问题，也就是：

- 主体从这里、从O这个起初混乱而无辜的点出发；而从C那里到来的欲望之象征性重新整合辩证法，还会提出其他问题：这一切最终将走向哪里？
- 或者，只要主体以某种方式命名自己的欲望，获得命名它们的许可，分析也就完成并结束了吗？

这恰恰是我也许会在本次课末尾提出的问题。你们会看到，我不会停在那里。不过，在分析最终的终点，在转完一定数量的圈、使主体的历史得到完整的重新整合以后，主体仍然会待在这里、待在O吗？还

是会稍稍走向那边、走向A？换言之，在被称作主体自我的那个黏着点上，最终还会留下什么主体性的东西吗？

分析是否只同一种被视为——至少看起来被视为——既定事实的东西打交道，即主体的自我？仿佛自我只是一种内部结构，可以通过练习使之完善？你们会看到，我以后几次课将要评注的巴林特以及分析中的整个倾向，正是走到了这种看法：自我要么强，要么弱，而这种含混一直保留下来。

若自我是弱的，人们通常便会相当为难！但一种内在逻辑把他们带到这个立场：既然它弱，就必须加强它。

一旦认为自我别无其他补充，只是主体对自身所作的一种掌控练习，而且以某种方式定位在主体内部的某个地方；也就是说，一旦维持自我是一种现成掌控力、位于神经功能等级顶端某处的观念，人们就会径直走上这条路：问题在于教会自我变得强大。这样一来，人们进入了以练习进行教育、进行学习（learning），甚至——如巴林特这样清醒的人所写——追求绩效（performance）的观念。

谈到分析过程中对自我的这种加强，巴林特甚至指出了自我可以得到何等完善。他说，不过几年前，某项练习或运动中的世界纪录，如今仅仅是选出一名普通运动员所需的标准。因此，人类自我同自身展开竞争时，能够达到越来越惊人的绩效——事情必定就围绕着这一点发生。人们于是被引向如下推论……

我们对此没有任何证据，而且本来也不可能有！分析这样的练习凭什么会构造自我、引入自我的功能？这类学习难道不是要使自我能够耐

受更大的兴奋总量吗——分析中谈论自我强弱时，人们所说的正是这个。

分析本身是一场言语游戏，它凭什么能为这类学习提供任何帮助？问题只在这里！如果我们没有在做这种事——而这正是我正在教给你们的——如果我们没有看见这一点，如果我们对分析带给我们的根本事实视而不见，即自我是一项想象功能，那么当今全部或几乎全部分析一步踏上的道路，同我教给你们的东西之间，差别就在这里：一种自我构想，同把自我视作想象功能的构想之间存在着根本差别；我正向你们展示后者的形式、动力、各个面向和阶段。

因此，一旦我们把自我视为想象功能，它便远不能同主体混为一谈；从一开始，它就不同于主体。因为我们所谓的主体是什么？恰恰是在客体化发展过程中处于对象之外的东西。在一定限度内，一切科学的理想都是把对象还原为某种能够在一个力量相互作用的系统中闭合并自我封闭的东西；在那里，对象归根到底只是科学的对象。

其中只有一个主体：观察总体的科学家。他希望某一天能把一切还原为一套确定的象征游戏，由它包容对象之间的全部相互作用。不过，在某一领域中，他仍不得不始终暗含某种从系统中出来的东西，也就是行动。面对一个有组织的生命体时，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考察它；但只要还在谈论它，只要仍然维持并多少隐含地预设它作为有机体的价值，我们便把它是一个主体的观念引入了它。

同样，对于一种本能行为，人们可以——而且在分析发展的整个时期都曾经可以——排除或忽略这种主体位置；但是，有一个领域绝不能忽略它，那恰恰是说话主体的领域。为什么？因为我们必须把说话主

体本身承认为主体，理由很简单：他能够说谎，也就是他不同于自己所说的东西。而弗洛伊德在无意识中为我们发现的，正是说话主体的这一维度，是说话主体作为欺骗者的维度。

也就是说，在那里……

因为迄今为止，在科学中，主体最终不再……人们最终只在意识层面保留并维持主体。那当然是因为，我已经告诉过你们，归根到底，主体就是在自身之中拥有科学体系的科学家；科学家正是在这里维持主体的维度：只要他是对象世界中一切事物的映像、镜子与载体，他就是主体——

……从弗洛伊德向我们表明下述事情的那一刻起：在人类主体中，不只有某种东西在说话，而且它以“说话”的完整意义说话；有某种东西明知故犯地说谎，却不需要意识提供材料。于是，主体这一维度便得到重新整合——这是该词明白无误、无法回避而且具有实验根据的意义。

但主体的这个维度也就从此完全不再同自我重合。人们再也不能说……自我由此从其在主体中的绝对位置上跌落；自我同其他东西一样只是一幅幻景，是主体对象关系中的一个要素。你们跟上了吗？

正因如此，我才顺带接住曼诺尼的介入：问题在于，分析是否只要扩大同某个被视为完全既定的自我相关联的客体化？仿佛自我只是一个或多或少狭窄的中心——安娜·弗洛伊德夫人用的正是这个说法；“或多或少狭窄”是她所用德文词的确切意思——而我们所要做的只是把它扩大？

弗洛伊德写下“本我所在之处，自我应当到来”时，我们应当把这句话理解为扩大意识的场域吗？还是说，那里涉及的是一次移位？也就是说：本我原来所在之处……况且不要以为它只在那里！它位于许多地方。在我的图式中，主体从A点观看镜子的游戏；我们暂且把主体同本我等同起来，并说本我曾经位于A。那么，“本我所在之处，自我应当到来”，是否意味着自我应当来到A？

也就是说，自我已经移位；在一场理想分析最终的终点，它根本不应再留在原处。这完全可以构想，因为那里的一切都应当在主体从自身那里承认的东西中得到实现。在整套辩证法中，我正在把你们引向的正是这个问题。它是否已经足以向你们指出一个方向？问题还没有穷尽……

曼诺尼，你跟得上吗？提出问题的曼诺尼跟得上，这已经算有所收获了！

不论如何，在我借《狼人》那番说明抵达的地方，你们都能看到这个图式的用途：它依照最好的分析传统，把症状的原初形成、压抑本身的意义，同分析运动中发生的事情统一起来；而分析运动本身至少在其开端被视为一个辩证过程。

有了这个简单的开端，我就把重读《狼人》个案的工作交给贝尔纳尔神父，请他从容准备，有一天为我作一份简短概述；他也可以在把这些要素同《狼人》中的材料相互参照以后，突出其中可能提出的某个问题。眼下我们就把《狼人》留在这里；我想稍稍推进一些问题。它们不仅同这个图式有关，也同图式所根本瞄准的东西有关：理解治疗

程序，理解分析中治疗行动的动力。问题恰恰位于我为你们标出的地方：欲望抵达O点时，对它的命名和承认意味着什么？

一切是否应当以某种方式停在这里？还是我们有理由要求再向前一步？为了让你们理解这个问题的意义，我现在就向前迈一步。

很清楚，人人早已注意到，相对于我刚才提醒你们的那个绝对关键的功能，相对于主体对自身历史所作的象征整合，分析家占据了某种位置、某个场所。这个功能被称作超我。它最初在弗洛伊德理论史上以什么形式出现？以审查的形式。为了说明刚才的论点，我本来也可以立刻进一步指出：从一开始，当我们谈到症状，也同样谈到日常生活中分析意义上的全部无意识功能时，我们就处在言说的维度中。

如果审查发挥作用，它的根本目的恰恰就是撒谎，它的任务就是欺骗。弗洛伊德选择“审查”这个词并非偶然：这个机构把主体的象征世界劈开、切成两半……

- 一部分可以接近、得到承认；
- 另一部分则无法接近、遭到禁止。我们在超我语域中重新遇到同一观念，只是它稍有发展、转化并改变了重音。如果不追溯其起源，就绝不可能理解超我概念是什么。我现在就要突出——人总得先让听者看到自己将走向何处——我刚才提醒你们的超我之一个面向，同通常使用的超我观念之间的对立。

通常，人们总是在一种紧张的语域中思考超我，几乎把这种紧张还原为纯粹本能性的参照，例如原初受虐狂。弗洛伊德甚至一度走得更远——恰恰在《自我与本我》（Das Ich und das Es）中——他作出一项

惊人的说明：主体越压制自己的本能，其行为在某个语域中越可以被视作“道德的”，超我就越加重压力，变得越严厉、专横而苛刻。这是一项并非普遍成立的临床观察。

弗洛伊德受到自己研究对象——神经症——的牵引，甚至把超我设想成某种有毒产物：一些生命体在生命活动中释放一系列毒性物质；人们看到这些物质的作用，它们会在一定条件下终结生命体自身的繁殖周期……必须看看这个类比被推到了多远！它很有意思，因为事实上，它隐含在分析领域围绕超我占支配地位的一整套潜在构想中。……不过，我们仍应当提出另一项东西与这种构想对立：超我严格属于无意识领域，是主体所整合的象征系统的一次分裂；而这个系统作为总体形式，规定了主体的历史。

因此，无意识是象征系统为主体造成的分裂、限制与异化，只在它对主体有效的限度内如此；超我则是在相似机制中产生的某种东西。在哪里产生？同样在象征世界中，不过这个世界并不只限于主体。因为主体的象征世界实现于一门作为共同语言的语言之中；只要它对主体所属的某个共同体行使支配，这门语言就是普遍的象征系统。

超我恰恰就是这种分裂，只要它不只发生在主体及其同我们所谓法的关系中。我将用一个例子说明，因为分析教学使你们太不习惯这个语域，以至于你们会以为我越出了分析的界限。完全没有。我将参照我的一位患者。

他来找我以前已经同别人做过分析。他在手部活动领域有一些十分奇特的症状；手是某些消遣活动的重要器官，而分析已经把这些活动照得很亮。一次沿经典路线进行的分析曾徒劳地竭力把他的不同症状不

惜一切代价组织在童年手淫史，以及这些活动在患者周围引发的禁止和压制行为周围。当然，这些事情确实存在，因为它们总会存在。不幸的是，这种解释既没有说明什么，也没有使人理解什么，更没有解决什么。

这名主体信奉伊斯兰教——尽管在教学中报告具体个案总是一件微妙的事，我们无法隐去他历史中的这个要素。在他的主体性发展史中，最引人注目的要素之一，是他对《古兰经》之法表现出的某种疏远和厌恶；这种厌恶体现为抽离和漠不关心。你们知道，对于身处这种文化的人来说，《古兰经》之法是一个根本语域；它所具有的总体性，远超我们在自身文化时代中能够设想的程度——我们的文化由“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这句话规定。

伊斯兰文化区域绝不是在这种基础上建立的；相反，那里的法具有总体性特征，完全不容人们规定、区分并分离法律层面与宗教层面。由此，这名主体对《古兰经》之法产生某种误认。对于一个凭借祖先、职能和未来都属于这一文化区域的主体，这一点十分突出。我秉持一种自己认为相当健全的想法：我们不能忽视主体的象征归属。这件事顺带引起了我的注意，并把我们直接带到真正的症结。

《古兰经》之法对犯有盗窃罪的人作出这样的规定：砍去其手。而主体童年史中的一件特殊事件，使他卷入了一场私人和公共的风暴。事情大致是：他听别人说——这里有一整场戏剧，他的父亲是一名公务员并且丢了职位——他的父亲是个小偷，因此应当被砍手。当然，《古兰经》的这项规定早已不再执行，正如《摩奴法典》所说“同母亲乱伦者应割下自己的生殖器，手持它向西方走去”也不再执行！不过，

这些规定仍存在于人际关系的象征基础秩序之中，而这个秩序就叫作法。

恰恰由于法的这一部分以特殊而根本的方式从其余部分中分离出来，它才在那个时刻进入了这名主体的症状。也正因如此，他的其余象征参照世界——即那些原初奥秘，特定主体同象征宇宙最根本的关系围绕它们得到组织——也遭到某种贬黜。这项规定对他取得了完全个体性的优先地位；他的一整套症状性无意识表达都同它相连，而童年经验从一开始就具有无法接受、充满冲突的性质，恰恰造成了这种联系。

换言之，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意味着什么？我曾向你们呈现：随着分析推进，症状之所以发生变动，是因为人们接近了这些创伤要素。它们建立在一幅从未得到整合的图像之中；主体历史的统一与综合正是在这里出现孔洞、断点和破裂点，而主体本来可以在使他成为一个具有历史之主体的各项象征决定中，重新汇集自己的整个存在。

同样，这种机制也发生在主体同某种更广大之物的关系中；它对每一个人的存在都具有绝对根本性，即主体所归属的法。主体可能遭遇的一切个人的、特殊的、个体的事情都定位在其中；主体正是通过说自己属于某个规定的象征宇宙之结构性、基础性背景，来统一自己的历史，而这个象征宇宙并非人人相同。

传统与语言在这里介入，使主体的参照发生象征性分化。当法中的某种东西不协调、遭到忽视、必须被取消，或者相反，由主体历史中的一场创伤事件推到前景，法便简化为这个尖端；这个尖端变得无法接

受、无法整合，成为某种盲目而重复的东西，也就是我们通常以超我一词规定的东西。

我希望，我放到前景的这则简短个案足以令你们印象深刻，使你们想到一个我们的思考不常进入、却不可或缺的维度。若想理解某种东西，我们就不能忽略它；因为在全部分析经验的意义中，这就是法的维度。我们永远无法把它彻底去除：一切都已经相当清楚，所有分析家都作证并肯定，不论分析调动的古老事件如何千变万化，如果这一切最终没有围绕一个本质上受那条合法律化的坐标支配的把手打结，就不可能得到任何解决；这条坐标就叫作“俄狄浦斯情结”。

这一点对于分析经验本身的维度如此关键，以至于俄狄浦斯在弗洛伊德著作之初就已经作为坐标系统，在整个建筑中取得优先地位；直到弗洛伊德著作的最后，这一地位始终得到维持。这意味着，“俄狄浦斯情结”在我们文化目前的阶段、在西方文明当前极为复杂的状态中占据一种特权位置；在那里，人面对着传统的演变，以及个体相对于多个［层面］的位置。

刚才我提到，在我们的文化区域中，法的语域分成多个层面；天知道，这种层面的多样性根本不会让个体生活得更轻松：我们不断面对不同语域之间的冲突。不过，在个体发展中最频繁、最占主导的东西，以某种方式说，就是严格的弗洛伊德理论；它把根扎在最古老、最根本的形式中。

因为随着一种文明在其不同语言的复杂性中演变，它同法之更原始形式的连接点，便成为俄狄浦斯情结这个根本却极为缩减的点；神经症

的表达把它推向前景，使它成为我称作法的语域在个体生命中的回响。

不过，不能因为它是最恒定的交点、最低限度上必不可少的点，就说它是唯一的交点，也不能说下述事情处在精神分析范围之外……

即让主体恰恰能够在这个极其复杂、受到结构化与组织、甚至包含内在矛盾的世界中找到自己的参照；主体在其中的个人位置取决于他的社会层次、未来、最充分的存在意义上的计划，以及他的教育与传统——

……也不能说，我们可以不再负责把主体欲望在O点发生的这种承认，同主体本人以该词的完整意义被“召唤”着在其中取得位置的整个象征系统联系起来。

如果忘记这一点，我们就可能像在这个临床个案中一样，对主体历史真正涉及的东西产生一种纯粹而简单的误认。俄狄浦斯情结的在场与结构固然始终必不可少，却并不免除我们注意：在某个特定个案中，法的层面上还有其他同一级别的东西，可能发挥同样决定性的作用。

因此你们清楚看到：当主体转过了必要的圈数，使其对象中显现的想象性历史补全得以实现以后，一切并没有随着在图像面前依次命名那些欲望而在此结束——这些欲望也被连续重新整合，并始终带着紧张、悬而未决而且严格说来令人焦虑的性质。工作还没有因此完成。

那么，最初处于O、接着来到O′、然后又返回O的东西，是否必须重新转到它所来自之处？那是从分析家的沉默中涌现的言说，也就是一个得到补全的象征系统——只要分析的出路要求如此。它应当停在哪

里？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必须把分析介入推进到有关正义和勇气的根本对话，像伟大辩证传统所作的那样？

这是一个问题，而且并不容易解决，因为说实话，当代人已经变得格外不善于接近这些重大主题。他更愿意用行为、适应、群体道德以及其他蠢话来解决问题！当然，这也提出了另一个严肃问题，即分析家的人文养成。

好了，已经到了我们通常结束的时间。今天就把你们留在这里。

第17课 · 1954年5月26日

格拉诺夫

拉康

……我们将采取我在前两次研讨课中已经预告、甚至已经实行过的方式来确定方向：努力在某位分析家对自身经验所作的理论理解之中，弄清若干能够让我们大致看到他如何引导这项经验的观点。

说到底，声称理论与技术是一回事，固然很好；那么就让我们利用这一点吧！当每个人的理论观念已经得到充分阐明，使我们至少可以作出一些推断时，就努力理解他的技术。说正事！当然，这也许并不适用于所有人：在许多情形中，一些头脑——甚至包括我们的“才子”——推到前景的理论观念，并不能在这个意义上使用，因为操纵理论概念的人并不总是很清楚自己在说什么。不过，在某些情形中，人反而强烈感到，理论表达了经验中某种极为直接的东西。

我认为，我们的朋友巴林特正属于这种情形。我更愿意选取一位在许多方面同我们接近、甚至令我们感到亲切的人作为依托；毫无疑问，他表现出的某些方向，会同我们在这里围绕分析中的主体间关系应当是什么而提出的若干要求汇合——你们会看到。不过与此同时，他的表达方式又会让我们感到——你们也会看到——他承受着［……］。有意思的正是这一点。若只是挑选那些很容易用来展示我所谓相对于根本分析经验的某种偏离主义的人，便没有意思；我不断参照这项经验，也把这种偏离主义标在视域上。

我们没有必要抓住那些粗糙、显眼甚至明显具有妄想性质的地方不放；有意义的是那些细微的地方，它们掩盖的与其说是一种彻底的谬误，不如说是某种错失目标的方式。我想借此检验教学应当具有什么效力：也就是说，它应当有人跟得上。正因为如此，我信任格拉诺夫；他看来是最感兴趣、也最受我试图引导你们走上的道路所定向的人之一——至少我得到的见证如此。我请他依据自己在这里学到的东西，以及他对自身经验的感受，今天向我们传达阅读巴林特《原初之爱与精神分析技术》一书所得的材料。这本书收录的文章横跨大约……

按照巴林特自己的说法，他约在1920年开始职业生涯——

……这里所说的文章始于1930年，止于近年的1950年。

这是一本很有意思、读起来格外愉快的书；你们知道，它清楚、明晰，经常大胆，充满幽默。等有时间时，你们人人都值得把它拿来读读。

这是一本适合度假阅读的书，就像年终要颁发的奖品。你们自己把它奖给自己吧，因为学会今年还没有富裕到能给你们每人发一本。

弗拉基米尔·格拉诺夫

这本书[注1]确实有意思到了这种程度：读着它，我觉得自己真的在度假，而且一直留在这种度假气氛中。图书馆也会购入它，因为它确实很值得读。

> [注1] 迈克尔·巴林特：《原初之爱与精神分析技术》（Primary Love and Psychoanalytic Technique），Maresfield Library，1985年重印；法译 Amour primaire et technique psychanalytique，Payot-Rivages，2001年。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要概述这本书吗？"在我看来，这不可能；因为它更像一部文章和报告的合集，是巴林特——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最初的巴林特夫妇，即巴林特与其第一任妻子爱丽丝——在不同大会上发表的作品。这些文章从1930年延伸到1952年。要在其中找到一条主线并不总是容易；更准确地说，即便文章的方向也严格说来并不一致。要为你们概述它是不可能的。

因此我想，我们只能从中提取一些总体印象。至于把这些印象同我们研讨班目前抵达的关节点联系起来，我想还是交给拉康医生来做，因为人在这里很容易产生误义。

不论怎样，为了稍稍延伸这段开场说明，这本书极其有趣，因为它让人感到：并不是说我们的开拓性工作因此失去了价值和锋芒，而是我们远远不是某种倾向中孤立无援的一群人。

巴林特在书中展示出一种思想……很难这样说；归根到底，我倒认为他显露出一种心境。人不免会问——我也这样问过自己——您为什么让我考察这本书。它是用来说明分析中应当做什么，还是不应当做什么？整本书最终都围绕这一点转动。直到某个不能封闭的关口以前……可一旦越过某个里程碑，就绝对不能［……］。在我们之间，"正确"是指"符合我们所要的东西"。

第一条路线上的内容极其正确，使他进入了一条通常应当把他带得很远的道路；这条路宽阔而畅通，在离他抵达之处很近的地方已经铺展开来。可他一到那里，就猛打方向盘，翻进沟里。接着，他仿佛还在问自己："我为什么会在这里？"这就是其可悲的一面。

巴林特如何构想精神分析和自己的职业？本书的基础还包含某种自我心理学。简要说来，他告诉我们：出于某些理由，弗洛伊德直到某一年以前让若干词项和研究进路进入了流通：

- 在某一时期，大致是1920至1926年之间，研究进路主要是动力学的、功能性的；

- 从那以后，它变成了结构性的，更确切地说是局部论的。第一时期为我们留下了整套词项，它们在使用中逐渐磨损。今天，我们面对的处境之所以具有戏剧性，是因为——用他的话说：

"我们完全可以为拥有一种极其有效、十分恰当、打磨得非常精细的技术而自豪……

况且他后面还会回来讨论这一点，即它如何治疗若干精神疾病——

……可是，我们的理论同这项技术已经完全不相称。我们最需要的就是理论。我们拥有、而且不得不制造出来的理论是……

他用英文说得非常强烈，尽管这是一本写给同行的书——

……笨拙、蹩脚而扭曲。精神分析只有一种，就是弗洛伊德确立了方法的精神分析。话虽如此，为了实行这项操作，最终存在数不清的手段；有多少实践者和患者，就有多少种手段。"

沿着这条进路走下去，他似乎恰好忠于我们自己一度采取的精神。因为他在严格遵守分析方法本身的同时，也重新质疑我们的全部日常实践。这里体现了他的一项特殊性质，也构成他某种令人失望的一面：他在某处要求悬置一切确定性。这是本书最关键的句子之一。他当然也说，自己大概对推理结束时我们会找到什么抱有一点个人看法；不过，在那以前，我们必须悬置自己的确定性。他甚至说，我们把某些事情留在一边。

拉康——出处在哪里？

弗拉基米尔·格拉诺夫

“我们为什么会陷入这种处境？因为——他非常明确地这样说——弗洛伊德为了方便而选择了生物学、甚至解剖学的意象。我们不断加重这套词项，结果陷入这样一种处境：这套解剖学图式使我们的实践无法起飞，把我们引向为一个身体建立理论基础，或者建立一种‘单体心理学（one body's psychology）’；然而，我们的实践中最明显的事实是，我们并不独处，而是有两个人……”

拉康

他没有说“我们有两个人”。他说的是：“我们必须建构一种‘双体心理学（two bodies' psychology）’”，这个词借自里克曼。

弗拉基米尔·格拉诺夫

在一篇多少带着焦虑的后记中，他又把注意力转向反转移、群体心理治疗、集体精神分析等当代运动。

拉康

那是在附录《变化》［《精神分析治疗目标与技术的变化》（Changing Therapeutic Aims and Techniques in Psychoanalysis）］中。

弗拉基米尔·格拉诺夫

在摘出这些文章中若干特别有代表性的句子以前，我们可以尝试从高处滑翔而过，大致看看巴林特目前的立场。他以一种极其悲怆的方式说：

“我们正在驶入死胡同，必须做些别的事，以另一种方式理解事情。怎样才算另一种方式？如果按照你们的说法，只取主体所说之言的字面价值，就会错过经验中最根本的东西。”

他的岔道口就在这里，他选择驶进沟里。因为他虽然对我们决定称作想象语域的东西十分敏感，却似乎受到自身发展中某种东西的限制，无法进入象征语域；于是，他以令人目眩的速度陷入对想象语域是什么的误认。

他一方面说必须赋予语言——括号里说，是精神分析家所说的语言——最大的重视，并用整整一页讨论它。他说：

“既然关键不在这种字面价值，就必须尽可能追踪患者。最终，我们进入这种相互嗅探：必须闻他的气味，监视他最细小的动作、姿态、思想和叹息；因为显然，我们必须在他所说的话背后找到象征。”

唯一的问题在于，他并不在唯一可以找到这个象征的语域中——即患者的话语中——寻找它。这一点把他推入自己的死胡同，而且带得很

远，远远超出他的自我构想；尤其是他同妻子共同阐发的自我构想。若不是这个戏剧性的错误，这套构想本应把他沿直路带向一些同我们的目标相当一致的目的地。

因为他究竟怎样谈自我？他没有明确表态，结果使自己同“性格”这个问题纠缠得难解难分。他极其接近自我是误认功能这个观念，最终却仍远远停在它之前。他怎样构想自我？爱丽丝·巴林特的一段文字谈到自体性欲，我认为这段相当重要。它应当同您围绕镜像阶段所写的东西并置起来看（第123页）。爱丽丝·巴林特在一篇题为《对母亲的爱与母亲的爱》——即母亲指向儿童的爱——的文章中，作了一段有些软弱的引言以后说：

“众所周知，当其他释放方法无法使用时，不同的自体性欲可以彼此替代；母子本能相互依赖的解体，也会影响自体性欲功能。可以说，这就是自体性欲在儿童时期的心理作用。在随后那个充满爱的挫折的时期，自体性欲取得替代性满足的意义。于是——我认为，接下来这句话说的就是镜像阶段的衰退——自体性欲由此成为次级自恋的生物学基础，而次级自恋的心理前提是同背叛了自己的对象认同。”

“背叛了自己的对象”，也就是母亲。我认为，爱丽丝·巴林特正是在这句话中最接近我们对于自我构成的看法。

巴尔居斯——您能再说一遍这句话吗？

弗拉基米尔·格拉诺夫

“自体性欲由此成为次级自恋的生物学基础，而次级自恋的心理前提是同背叛了自己的对象认同。”

最重要的当然是最后一个命题："背叛了自己的对象"。这句有些突兀的话出自她笔下，似乎令人意外。但她是通过说明一些临床个案抵达它的。这里不可能一一复述；不过，她概述的一个临床个案，在我所知的文献中显示出极为罕见的深度、洞察力与大胆，除非我们回到弗洛伊德 Fort！Da！ 的例子；在弗洛伊德的语境中，这种游戏属于儿童，而不是成人。

她谈到自己分析的一位女性。在分析的第一年，用她的话说，工作主要是分析"她的男性气质感受"。治疗显然取得了进展（第110页）：她发展出了比开始时更强的性高潮能力。一切都进展得很好，可是什么也没有真正动起来，因为她对母亲怀着强烈的恨。

拉康——表面看来，是非常强烈的依恋。

弗拉基米尔·格拉诺夫

深入考察以后，人们很自然地发现，这名年轻女性对母亲怀有死亡愿望。爱丽丝·巴林特说："恨根本不是这些死亡愿望的第一推动者，它只不过为一种远为原始的态度充当次级合理化……"她在这里说了一些不常见于文献中的话。"按照这种更原始的态度，患者只是要求母亲依照自己的愿望在场或不在场。想到母亲死亡，会使患者充满最温暖的感情；这种感情的意义不是悔恨，而近似于：'您愿意死去，真是太好了；我爱您，因为您愿意消失。'她对母亲态度的深层，是一个小女孩的态度；在她看来，母亲应当迅速死去，好让她——女儿——嫁给父亲。这完全不表示她恨母亲，她只是认为好妈妈在恰当时刻消失再自然不过。理想母亲没有自己的利益。真正的恨与真正的矛盾情感，更

容易在同父亲的关系中发展；儿童从一开始就认识到父亲有自己的利益。”

按照爱丽丝·巴林特的看法，第三个人物——父亲——登上舞台，对应着对现实的学习；父亲的角色以及主体在俄狄浦斯情境中的位置，开始赋予主体结构及其对现实的黏附。也就是说，在俄狄浦斯观念以外，没有任何东西具有形成作用。读过这篇文章以后，人很难抵抗诱惑，因为它很会自我宣传，想谈谈那幅漂亮的画面……

拉康

也许你可以就刚才说的内容立即作出更清楚的阐明。这是巴林特夫妇以及第三个人提出的观念；他们三人当时都在布达佩斯。我先说一句：我很高兴你刚才把它称作一种思想，而不只是一种心境，尽管这套思想当然还需要解释。它就是“原初之爱（primary love）”、爱的原初形式这个观念。我之所以在这里引入它——请原谅我打断你——正是因为你将要讨论生殖器之爱（genital love）。

因为在这些作者、本卷作者的思想中，两种爱的模式彼此对立。一种是前生殖器模式。有一整篇题为《前生殖器之爱》的文章，其中心、定义与轴线都在于一条根本观念：对于这种爱来说，对象完全没有自身的利益，即绝对无私（absolute unselfishness）。主体不承认对象具有任何自身的要求或需要。“凡是对我有益的……”——这是他给出的公式，也是主体通过行为与潜在要求隐含表达的公式——“凡是对我有益的，对你来说就是正确的（right）。”

这当然就是你应当做的事。巴林特夫妇把“原初之爱”与生殖器之爱之间的根本差异，建立在这种完全同一个只为满足主体而存在的对象相

连的爱之关系上。原初之爱当然会随着发展而稍有结构化，却始终被规定为拒绝一切现实、不承认伙伴要求的爱。此刻我并不是在界定这套构想的边界。你们会看到，我今天或下次将提出极其重大的异议；我想，你们当中已经有人看得出来，这种组织事情的方式简直把分析带来的一切都消解掉了。除此以外，没什么大问题！不过，它确实就是这样得到阐明的；这里谈的就是它。

相关知识卡 迈克尔·巴林特的原初之爱与分析终结

弗拉基米尔·格拉诺夫

而且，在他们理论的发展中，这一点同您在黑板上画的O与O′光学图式有关。

拉康——但它恰恰没有关系。

弗拉基米尔·格拉诺夫——从构造的时间顺序来看……

拉康——这是中心，是的，就是这样……继续吧！

弗拉基米尔·格拉诺夫——况且，正是这一点把他们带向沉船……

拉康——你本来想谈生殖器之爱，为什么不继续？

弗拉基米尔·格拉诺夫——genital love，也就是生殖器之爱。

拉康

我们通常称它为“生殖器成熟”，即最终达到生殖器性；至少在理论上，它被视为分析的目的。

弗拉基米尔·格拉诺夫

这篇文章似乎——当然实际上不是——多少旨在回应弗利斯所设计的那类图式。这些图式极其图式化——它们当然会如此——最终一切都在那里顺利解决，抵达分析的目的和正常性的试金石。也就是说，主体必须有能力——人们最终多少会据此决定是否暂停分析——证明自己能够以生殖器方式去爱，也就是：

- 爱一个能够满足自己、自己也能满足的伙伴；
- 持久地爱对方，也就是排除所有其他人；
- 以这样一种方式爱对方：既尊重自己的利益，又不遮蔽伙伴的利益；也就是处在某种温柔、理想化的气氛与某种认同形式中。这些就是生殖器之爱的特征；我要赶紧告诉你们，巴林特写这篇文章，就是为了拆解它。

拉康

他写得充满幽默。不能说他真的拆解了它。他只是以十分鲜明的方式提出问题，表明自己并没有掩饰实现这一理想的困难。文章写于1947年。

弗拉基米尔·格拉诺夫

他逐项考察这种爱的不同特征，并说，为了避免任何误解，他设想了一个理想个案：生殖器之爱中这种后矛盾情感状态已经实现，客体关系中不再能发现任何前生殖器矛盾情感的痕迹：

- 其中必须不再有贪婪、暴食、永不满足，不再有吞噬对象或吞噬对象之存在的欲望；因此，不得具有任何口腔期特征——他会在另一篇文章中回来讨论自己如何使用“口腔期”一词。

- 接着，其中必须没有伤害、羞辱或支配的欲望，也就不得具有施虐特征；不得有鄙视伙伴、鄙视其性欲望与快乐的欲望；因此，不会有厌恶这个伙伴的危险，也不会受到其某项令人愉快或不快的特征吸引；也就是说，不得具有任何肛门期特征。

- 同样，人也不得倾向于炫耀自己拥有阴茎，不得害怕伙伴的性器官；因此，不留任何菲勒斯期、从而也不留阉割情结的痕迹。

“我们知道，实践中并不存在这类个案。不过，要开始更准确的考察，就必须排除全部负面材料（negative staff）。”

单看他如何排除这些“负面材料”，就知道他毫不含糊；因为这是我们第一次正式读到有人这样说：事情并不是那个样子。这种说法本来就不太常见！

“那么，除了没有以上列举的前生殖器特征，生殖器之爱究竟是什么？我们必须爱自己的伙伴，因为她能够满足我们；我们也必须满足他或她，并且两人能够在同一时刻、或者几乎同一时刻体验性高潮……

英文原句非常有趣：

“这看起来会是一场极其平稳的航行：very plain sailing……

也可以译作“仿佛在台球桌上顺畅击球”，但不幸的是，事情并非如此。

“让我们考察第一个条件：伙伴能够满足我们。这个条件确实可以得到满足，但它完全是自恋性的……

他在这里使用 egoist［利己的］一词。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的构想把他们带到一个暗礁：谈论原初之爱时，他们没有使用我们学着使用、虽然有时显得并不简单的词汇，最终却走向一套更令人迷惑的词汇。不论是否情愿，他们不得不使用一个纳入了 ego［自我］的词，并称之为天真利己主义；这个说法至少显得笨重，操作性也很差。他们仿佛受到某种无法逃脱的宿命推动，不得不引入这个词。

［对让·伊波利特］顺便让你高兴一下，谈到“成功的压抑”，巴林特在某处说：

“压抑不可能成功。没有什么比成功的压抑更失败。”

他逐项审查这些条件，并说，在绯闻逸事或文学作品中，人们可以发现大量恰好满足全部条件的关系：相互满足、同时达到性高潮，可我们仍不能说其中有爱。“这些人在彼此怀中找到某种安全与快乐。”他顺便引用了莎士比亚的一首十四行诗。

拉康

这一点恰恰很重要，因为不久以后，我们学会中的某个人会深入地为你们讲解莎士比亚十四行诗，她就是勒韦尔雄—茹夫夫人。

弗拉基米尔·格拉诺夫

“此外，经常还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即使所有这些条件都已实现，两位伙伴至少在一段时间内也毫无再见面的欲望，却又并没有真正相互厌恶；他们以后仍可能事后重新回到这段关系。”

所以，他说其中还必须有“某种额外的东西”。这个“额外的东西”是什么？

“在真正的爱之关系中，我们会发现温柔的理想化，以及一种特殊的认同形式——这里发生了某种偷换——既然弗洛伊德已经谈过对象与本能的理想化问题，我只须复述他的发现。”

接着，他颇有说服力地表明，这种理想化并非绝对必要；即使没有它，也可能存在良好的爱之关系。至少可以说，在他此刻为弗洛伊德思想所作的这份简短摘要中［……］，这个问题已经在这里得到大量讨论。第二个现象，即温柔，也许可以用另一种方式解释：

“它是在目标方面受到抑制：原初欲望指向某个特定对象；但出于某种原因，它只能满足于局部满足，而——这里使用的是法语——‘退而求其次（faute de mieux）’最终通向完全满足。按照另一种观点，即弗洛伊德另一篇文章中的观点，温柔是一种古老性质；它同原初的自我保存倾向一道出现，除去这种平静而没有激情的满足，不具有其他目的。因此，激情之爱是一个次级现象，叠加在古老的温柔之爱上。”

他认为，主观材料与人类学可以支持这个想法。他简要描绘了中世纪的爱情宫廷，乃至印度文学中的一些事情［……］；其中情况复杂，丰盛的性诗歌与爱情诗歌会被某种对温柔的欣赏截断。这种温柔被呈

现为文明的人工产物，是教育过程中所受挫折的系统性结果。他说得颇为有趣："词源学似乎支持这个想法。"接着，他极其贴切地列举了一大串英语和德语词，发现"温柔"同一些词黏在一起，而从词根来看，这些词意味着："傻乎乎、老糊涂、有趣、不太严肃、脆弱、相当受抑制……"

他就在这里停下来：

"有些地方不对劲。生殖器之爱这种成熟的爱之形式，怎么会混进疾病、虚弱、不成熟等如此可疑的一群东西之中？"

他在这个时刻可以说接上了自己的结论：

"人类似于猿的胚胎。通常，猿的胚胎继续发育，只有经过一段发展才达到生殖器成熟；人却仍在胎儿阶段就取得这种发展。况且，有些生物的胚胎会取得双性生殖功能，它们被称作幼态延续的胚胎。生殖器之爱是同这些结构完全平行的形式。人不仅在解剖学上、也在心理学上是一种幼态延续的胚胎。况且，解剖学家比我们更早发现这一点。"

因此，我们称作真爱、生殖器之爱的东西仍然没有得到界定；它只是回到一种绝对原始的爱之形式，主体与其所爱对象凭借绝对的本能互反，在其中相互混合。

那么，生殖器之爱是什么？它是一门艺术……它是这样一种幸运情形：若干本能条件与文化条件在那里汇合。按照他的说法，我们可以说，真爱最终是原初的同性之爱，即把原始群体中的兄弟联结起来的爱；而异性之爱则限于最简单的表现，只是纯粹的交媾。今天被我们

视为成功情形的东西，正是通过把这种同性之爱的气氛移置进异性关系的框架而诞生的。

拉康——看到他最终走到这里，非常有意思！

奥克塔夫·曼诺尼——他无法避开“成功”这个词，而它提出了全部问题。

弗拉基米尔·格拉诺夫——这个词是我说的。他没有这样说。按照他的看法，这件事几乎永远不可能成功。

拉康

作为这套理论的回响，你完全有理由把重心从根本上放在一套关于爱的、不只是规范性的而且道德化的理论上……

让·伊波利特——是“正常的”，不是“规范性的”……

拉康

……一套道德化的爱之理论——不是吗？不过，你刚才突出的一点仍然成立：他最终走向这样一个问题，我们视为“正常”的东西，归根到底究竟是：

- 一种自然状态，
- 一种人工或文化的结果，
- 甚至是他所谓的 happy chance［幸运机缘］？

他把这个问题转置到一个涉及整个问题、也因而关乎我们的问题上：谈到分析的终结时，他偶尔称作“健康”的这种正常究竟是什么？

就此而言，分析治疗是一种自然过程还是人工过程？换言之，他提出分析目的的问题，并追问：健康是一种自然的平衡状态吗？也就是说，心灵中是否存在某些过程，只要不受阻止或扰乱，就会把发展正常地引向这种平衡？还是相反，健康是这种幸运机缘，甚至是一场难以发生的事件，因为它的条件如此严格、紧迫、苛刻而繁多，以至于机会十分渺茫？

这最终使他提出下面这个问题；它显然暴露了出发点，因为这个出发点通向一个在他看来令整个分析合唱团完全分裂的问题：会有同样多的人回答“是”与“否”。这个问题本身应当使人怀疑，也许问题从一开始就没有被正确提出。那么，我们继续！

弗拉基米尔·格拉诺夫

在报告接近末尾时，这同时导致治疗目标和技术发生改变，也触及治疗的终结。若把文章包括进来，最终只是为了走向下面一点：

“治疗的发展会带来一次重生；也就是说，它绝不是修补或复原……

这里仍然很难说清。

拉康——请说得准确些。

弗拉基米尔·格拉诺夫

它是不是一种完整复原（restitutio in integrum）？它是解除主体能力上的阻塞，让主体能够不羞愧、不害臊、不害怕地回到原初之爱，也就是“天真利己主义”，即主体与其对象的本能目标在同一性和互反性中相互混合的阶段。这使他把分析结束构想为：在一片蜜月气氛中突然瓦解这种状态。我不知道，这是否符合您对它的理解？

相关知识卡 迈克尔·巴林特的原初之爱与分析终结

拉康——是的。

弗拉基米尔·格拉诺夫——接着，他在那里又被“性格”问题弄糊涂了……

拉康——继续，说说他如何谈“性格”。

弗拉基米尔·格拉诺夫

“性格继承了我们习惯上多少归给自我的一部分东西。性格使个体最终不必体验现实最令人焦虑的要求，使他不至于沉入一种可能在其中迷失、甚至毁灭自己的爱。它是对主体能力的一种幸运限制。”

于是他提出如下处境：

“改变主体的性格是否有根据？”

他由此谈到分析性截肢那一套“陈词滥调”……

拉康——在关于性格的段落中，他甚至提出下面这个问题……

弗拉基米尔·格拉诺夫

“改变主体的性格是否合法？限制或增大性格，也就是加强或削弱它，是否合法？”

图式大致如下：

“强性格会使个体成为一个相当乏味的人，既不能强烈地爱，也不能强烈地恨。弱性格注定过着极不幸的生活，却富有各种可能性；它更有趣、更富诗意，但对主体本人没有那么有利。幸好——他说——最终，来分析的主体不会怀有这种顾虑，不会追问自己在这方面将变成什么。因此——他最终得出结论——性格只不过是教育错误所施加的偶然限制之结果；在这方面为主体提供修复服务，是完全有根据的。”

拉康

你也许说得有些快。我得说，你大概是想继续推进、尽快说完，因而没有突出一个十分有意思的东西，即性格的定义：

“性格控制着人同其对象的关系。性格总意味着或多或少的限制，意味着爱与恨的各种可能性受到范围或大或小的限制。因此——我把斜体的文字全都译出来——性格意味着爱与享受的能力（capacity for love and enjoyment），即爱与喜悦的能力受到限制。”

我认为这里不能排除“喜悦”这个词。它以一种值得注意的方式被引入；喜悦这一维度走得很远，超出了“享乐”的范畴。喜悦所包含的主体充盈，值得单独展开。这里正好提出了它！人不可能不感到震动！

如果文章不是写于1932年，我几乎会说，这里受到了某种我称作“清教徒式”道德理想的影响。因为即使在匈牙利，也有新教的历史传统，而

且这些传统同英国新教史具有相当明确的历史分支联系。费伦齐这名学生的思想同其命运之间出现了一种奇特汇合：费伦齐曾把他引向我今天带你们追随的这些踪迹，而他的命运最终又把他如此彻底地整合进英国共同体。人不能看不到，他仍然把强性格——也就是带有这一切限制的形式——视为比所谓 weak character［弱性格］“更可取”；弱性格对他而言，从根本上说就是一个任凭自己被淹没的人。

弗拉基米尔·格拉诺夫——他说“更可取”，但说得很遗憾。

拉康

按照一种极为专门的教育来塑造个体，这个范畴已经隐含在有关进步的最根本指导本身之中。他谈性格的方式非常引人注目。无须补充，这会在他所谓“性格分析”与他毫不迟疑地在同一语境中冒险提出的“逻辑性格”之间，造成完全的含混。他似乎没有看到，其中涉及的是完全不同的性格：一方面，性格是对主体力比多发展的反应，是这个发展受到捕获和限制的经纬；另一方面，则是先天要素——为了表达我在这里指出的差异，性格学家凭借这些要素，把个体划分为若干体质性的类别。他认为，分析经验因为更接近经验，会围绕这一点给我们更多材料。

这毫无疑问是对的。我自己也相当倾向于这样认为，但条件是经验必须看到：我们从什么关节点、在何种界限内抵达这个根本而最终的总量。在这里涉及的游戏中，也就是分析深刻改变或能够改变性格的地方，显然所涉及的是另一种东西：即自我的构造。他正是在这个层面，以最生动的方式重新碰到它。你还有什么要补充吗?

弗拉基米尔·格拉诺夫

接下来谈谈他如何走到第十四篇文章。因此，要完成他所谓的良好分析，就必须把自己置于那个唯一能够理解儿童发展的视角中：

“如果我们试图用自己不得不用的那些词来分析儿童的原初之爱，就走不了多远。况且，我们被这套解剖学图式缠住，不得不看到，在当代出版物中，本能的来源、本能目标等词项正逐渐退让并从理论考量中消失。甚至‘在目标方面受到抑制’一词，虽然还能听到，却越来越少。谈到本能对象时，‘同一项本能对象的关系’这条公式越来越少见；其次，‘肛门期’‘口腔期’‘生殖器期’这些熟知的词，也越来越少被用来标明本能来源。取而代之、越来越常见的是——他在这里试图作出结构性接近，却没有成功——特定的客体关系——他的大沉船正发生在这里——口腔期贪婪、肛门期支配欲、生殖器之爱……一切施虐性词项都越来越过时（out of fashion）；在我看来，这是因为它们的应用带有过多力比多色彩，同本能目标和满足联系得太紧。取代这些词项的是攻击性风格、毁灭性风格等词，它们同客体关系之间具有不可能误认的亲缘性。”

拉康

是的……也许你说得还没有完全越过舞台脚灯。不过，你所说的十分准确。你突出了巴林特对某种词语淤塞所作的说明：从某个时期（1938—1940年）起出现的论文和文章，把分析情境转向客体关系。他标出并指出了若干征兆。他特别在有关本能来源、方向与满足这一语域的整套词汇消失之中，看到这种变化——我没有说这作为事实一定成立，我们还会考察他的解释价值。他以许多方式指出这一点，其中最突出的一个面向是，“施虐性”一词几乎不再使用。他补充说：“它的内涵过于力比多化。”我要说，这番坦白本身很有意义，因为这里确实

涉及分析气氛的某种清教徒化；它非常引人注目，值得被突出，至少可以让我把它用作某种演变的汇合性征兆。这句话完全具有症候意义。

弗拉基米尔·格拉诺夫——如果可以说得稍微无礼一点，他患的是想象功能障碍。

拉康——不是他本人，是他的理论。

弗拉基米尔·格拉诺夫

他陷入了某种捕获。他突出这些命题并不奇怪；因为在下一段中，如果从他所谓客体关系出发，他以一种颇令人瞠目的方式告诉我们：

“现在请注意，我们必须停一停，不要忘记分析家在精神分析情境中的行为究竟是什么。”

首先，他驳倒了那些循规蹈矩的研讨班教给我们的东西：分析家处在那里，完全置身事外——不是说分析家实际上应当如此，而是说他仍以为自己如此。巴林特展示出分析家被缠在一种二元关系中，却又否认这一点，否认自己身处其中。

他还说：

“友好的超然态度、理解、节奏恰当的解释等所有说法，都不应使我们忘记：如果患者同分析家的关系是力比多性的，分析家同患者的关系也以同样方式具有力比多性。”

不过，这并没有阻止他；也就是说，甚至到论述末尾，他似乎都没有产生谈论主体与主体之关系的念头。这是他始终顺带地在误认中完成的一项绝技。

拉康

说实话，他没能避开它，却也没有抵达它。这样，我们通过以下说明重新回到出发点：既然在场的是两个主体，那么两个主体之间必定有某种东西存在。可是，他完全缺少用来说明这一点的概念装置……

尽管这套装置已在别处得到广泛阐发，更宽广地向我们关于中介之物的认识开放，

尤其涉及语言的真正功能——

……因此，为了引入主体间关系，他被迫谈论双体心理学（two bodies' psychology）；这不只是一次类似口误的语言滑动，而真正对应着他对事情的构想。他以为只要说“我们来建立双体心理学”，就能走出单体心理学。

然而，很明显，双体心理学仍然是一种对置，仍然是客体与客体的关系。客体关系这个词的含混，就在于它意味着这一点。如果这不在同主体进行的具体治疗交换中带来技术后果，那么理论上倒不严重；可这里并不是客体与客体的关系。你刚才说得很好：“……被缠在一种二元关系中，却又否认它……”要表达通常人们如何努力向我们解释分析关系应当是什么，再也找不到比这更贴切的公式了，我要祝贺你。

弗拉基米尔·格拉诺夫

这里有一句极有希望的话：

“我们用属于单人情境的语言，来描述双体、双人经验和分析技术，却没有意识到自己错过了什么。”

拉康——这正是我刚才所说的。然而，他并没有因此察觉自己仍在继续……

弗拉基米尔·格拉诺夫

他不只继续，还加强了它：“那么，应当怎么办？”他没有找到使自己逃出那个以惊人速度跳进去的死胡同的钥匙，于是说道——从此，他对患者的客体化变得极其猛烈：

“首先，必须营造气氛，不要把自己封闭起来，也不要忘记——他在这里突然飞奔起来——人们只把口腔期贪婪同嘴联系起来，但这不对。它还涉及皮肤、表皮、温度、摩擦……”

这变成了一串枚举。他真的绕着个体转了一整圈，试图在客体关系框架内扩大自己的位置。接着，他同自己先前的说法相反，最终说道：

“如果像我们这样做没有奏效，那就使用双倍剂量，也许最终会奏效。”

他最终走到了这里！

拉康——我不会像你一样，从客体化的意义来规定这个面向……

弗拉基米尔·格拉诺夫——他本人没有这样规定。

拉康

我也不会这样规定。我会把它视为某种显然在移动的东西——我想下次会向你们说明——严格说来，是某种申诉；它完全不是向我在这里维护并告诉你们的那个客体化语域提出的申诉。知识的全部进步以及一切技术，都有理由把那些能够客体化的部分客体化。

但这里涉及的是同主体之关系中的客体化倾向：也就是借助介入和技术本身，推动主体把自己客体化，把自己当成一个对象，并相信进展来自对自身所是之物的客体化——他之所以相信，是因为分析看起来确实这样推进。

问题并不在这里。我所谓的这种申诉，是向实在提出的申诉。正如你刚才所说，它发生在象征语域因误认而被抹除的限度内；象征在客体关系中完全消失，因为它在那里根本没有位置。正因为如此，客体才取得绝对价值；也正是在它不再把想象功能作为第三项的限度内如此。

他接着说，我们在分析中的操作功能如今具有什么意义。他说，要“营造一种气氛”，一种“恰当的气氛（a proper atmosphere）”。这就是他能说的一切；事情由此变得极不确定，在不可言说之处来回迟疑，继而调动整个现实、他所谓的事件——因为分析恰恰不是要我们扑到患者脖子上拥抱，也让患者扑到我们脖子上。

他所拥有的手段受到限制，而问题恰好在于：这种限制发生在哪个层面？但他无法根据这些手段来构想自身经验在哪里得到规定并受到限制，于是只得大声呼吁唤醒实在的全部语域。这个实在层面始终处在背景，我在我们这里评注的一切中从未直接向你们指出它，这并非偶

然。严格说来，它被排除在外，也并非偶然。而巴林特同其他任何人一样，无法把它重新纳入。

不过，他的申诉恰恰投向那里；理论的失败正对应着技术的这种倾斜与偏离。下次我会试着让你们准确指出它的方向和确切意义。

把话说完吧！

弗拉基米尔·格拉诺夫

现在只剩两句话。对于这种向实在的申诉，他投入得如此之深，以至于在职业生涯的另一个时刻，仿佛他曾短暂地察觉自己思想中的某些暗礁，至少想说出什么不属于其中；他给出了文献中独一无二的描写实例：那是唯一一处明确提到小纸巾、靠垫、躺椅等物的地方。这出现在早得多的时期。

拉康——是的，在《转移与反转移》一文中。

弗拉基米尔·格拉诺夫

但他想到这一点也许并非没有原因。他以一些有关分析终结的悲观思考收尾。我们应当以此结束。他还顺便对我们当今的学会作了颇为切中要害的审判，并把一项事实纳入评价：在某个历史时刻（约1930年），一批分析显然没有完成的分析家进入了行业。

于是人们形成了两套标准，他称之为“A标准”与“B标准”；这体现了人们无法确定，应在何时把一名分析家适时投入实践。这种思考更加悲观，因为按照他的说法，每十场治疗只有一两场能够结束。既然每年

有数千场治疗告一段落，其中毕竟会有数百场真正完成。人们总可以费点心去仔细考察，看看其中发生了什么。

不过，在我看来，更悲观的不是这一点，而是他的理论。他说：

“我很少完成治疗，十个个案中只有一两个。”

这本身在我看来并不那么悲观。他所说的话中真正令我非常焦虑的是：

“在其他个案中，我后来完全明白错误发生在哪里。”

但也许最令人沮丧的还不在这里，而在于：

“当我明白以后，即便已经明白，也再没有什么可做。一切已经永远搞砸了。”

一旦犯下某种错误，失败就不可避免；在我看来，这正是其视角的最终结局。

拉康

听着……现在已经很晚了。我不想超过一点四十五分。我不知道，对于你们每个未能阅读这篇文本的人来说……

我认为，可以给格拉诺夫记上一功。他完全回应了我的召唤，做到了我期待他做的事。我认为，他已经很好地向你们呈现了巴林特这本书提出的全部问题。说到底，这无疑是巴林特唯一的一本书，也是他思考与职业生涯共同结出的成果。如果它能为你们提出若干问题，这就

是我们可以期待的一切。下次我会按照格拉诺夫引入它们的顺序，重新讨论并作出补充。

我在开头已经告诉过你们，自己想在这里突出的是一篇你没有谈到的文章，即《情感的转移》（Transference of Emotions）。这已经包含了我们的整个问题：被转移的是情感吗？这样的标题似乎没有使任何人感到震惊。这篇文章写于1933年。你们会在其中看到十分值得注意的东西，包括他如何向我们引入转移。

对于当时的读者……

而且，这篇文章并非专门写给分析家，也有一部分面向非分析家，以便让人把握转移现象；他说，这个现象造成大量误认，当时整个科学界对它的认识不如对阻抗现象的认识充分——

……他举了一些例子。你们会看到，非常有趣。

我将从这里出发。这就是格拉诺夫使用的那篇文章。我们将从巴林特报告中心留下的这个洞出发，重新照亮其余部分；文章原本要让毫无准备的读者感受转移现象是什么。你们会看到，恰恰因为缺少对象征的正确定义，象征才不得不无处不在。

分析家无法利用它，因为这个定义缺失。你们会看到，这把他带到什么地方：当他想对外部作出一种通俗表述时，他走得比自己以为的更远，也就是给转移下了一个同转移毫无关系的定义。为了向我们引入转移，他谈的是移置。他给出的所有例子都是移置的例子。

在同一篇文章中，他还告诉我们，分析家通常借以解释自身经验和行动的工作，其结果自然是“一套关于分析家本人的心理学或性格学”。所以，这不是我说的，而是他自己指出的。作者本人向我们坦白并作证：可以从这个角度分析，把作为理论家的分析家本人加以精神分析，从而严格定位理论与技术中当今的某些倾向。

这意味着，我们必须知道可以在哪里锚定一套技术理论，使自己摆脱客体关系的这种相对化；我们必须拥有一套参照系统，走出分析家与受分析者严格个体性的这种主体间心理学。

这并不新鲜，你们也清楚感到，这恰恰就是我们从十月以来、甚至更早以前在这里所做之事的意义。这也许——而且肯定——会给我一个机会，让我在这里重新做我在别处、在另一群听众面前连续两个星期三已经做过的工作：重新明确我们在这里提出的分析理论之根本关节点与基础，并说明它如何使我们摆脱这种没有出路的相对化。

下星期三见！

第18课 · 1954年6月2日

谁愿意就格拉诺夫上次所说的内容提一个问题？他的报告很出色，你们应当已经能够了解这本书代表什么。有没有人愿意稍微努力一下，说说围绕巴林特这本书显现出了什么、问题如何提出？它为你们当中的某个人带来了什么最重要的结果？

奥克塔夫·曼诺尼

这样提问让我有些为难。我正在把碎片汇集起来，恰恰还缺少整体。在我看来，格拉诺夫对巴林特最根本的批评是：他没有表达出分析中发生的某种东西，即分析家与受分析者之间的关系类型。

分析家的角色似乎是在某种阶梯旁，见证主体在进展与退行中上下移动。他以某种方式见证主体如何沿退行的阶梯上上下下；而问题在于，我们凭什么说主体在退行或进步。我认为困难如下：

- 如果力比多之爱是一种进展，那么过去那些阶段会变成什么？
- 反之，如果只有通过深度退行才能抵达力比多之爱，那么我认为巴林特的困难就在于，他没有成功处理退行问题。还有一个困难：分析家同主体的关系。这些话有些混乱，因为您突然让我回答，我毫无准备。

拉康

这已经有所收获，可以由此出发。让我们看看所谓巴林特的构想。它首先属于一项非常特殊的传统，即匈牙利传统，只要这项传统受到费伦齐人格的支配。以后我们一定会借许多逸闻式、有趣的小切面，顺带触及费伦齐与弗洛伊德的关系。

在1930年以前，费伦齐显然多少被视为精神分析的可怕孩子。相对于分析家组成的整个合奏，费伦齐保持着：

- 行事上的极大自由；
- 一种提出问题的方式；即使在当时，它可能也不太担心是否以“正统”的方式表达。

他多次引入一些问题；在一种肤浅的看法中，人们可以把它们汇集在“积极精神分析”这个词周围。只要说出这个像钥匙一样的词，人们便以为自己理解了什么，仿佛问题已经被归入某种混乱光晕而得到解决。其实，这片光晕大致从费伦齐围绕一个自己很早就提出的问题所作的说明延展开来：在分析的某个时刻，下面两项应当发挥什么作用？

- 首先是分析家的主动行动，
- 其次是分析家的存在本身。

他开始提出这些问题，但我们必须看看他使用什么词，不能把所有种类的介入都混在“积极”一词之下。这些介入可以包括禁止，就像你们昨晚围绕摩根医生报告的个案听到的问题。我昨晚提醒过你们，弗洛

伊德《技术著作》已经提出、而且他始终视为完全显然的一点是：在某些个案中，人必须知道如何通过提出若干禁止来积极介入：

“如果你继续从事某项活动，你的分析就无法继续；因为这种活动以某种方式使情境饱和，严格说来，使分析中可能发生的一切失效。”

我们将从目前所在之处出发，如果你们愿意，可以借巴林特向上追溯，看看费伦齐那里这是什么意思，也看看历史留在他名下、由他引入的“积极精神分析”概念到底是什么。顺带告诉你们，费伦齐本人一生中曾多次改变自己的态度和立场。他重新考察过一些尝试，宣称经验已经表明它们过度、少有成效，甚至有害。

总之，巴林特属于这项匈牙利传统。它十分自然地围绕受分析者与分析家的关系开花并充分展开；分析家被构想为一个卷入人际情境的人，而这种卷入本身意味着关系中存在某种互反性。

换言之，我们可以合理地把费伦齐传统追溯到一种提出问题的立场；如今，这些问题以被置于分析关系前景的“转移”与“反转移”来表述。巴林特从1930年以后进一步推进这项发展，因而属于当代时期。我们可以把费伦齐个人影响的结束大致定在1930年；此后显现的是追随者及学生的影响。

我现在无法讨论弗洛伊德与费伦齐的私人关系。这件事很有意思，值得我们以后再回来谈。不过，我们必须直奔主题。巴林特属于从1930年延续至今的时期，其特征是“客体关系”概念逐步上升。我认为，这是巴林特、他的妻子以及那些对动物心理学感兴趣的合作者整套构想的中心点。

这套构想显现在一本书中。虽然它只是跨越二十年的文章合集，因而可能令人眼花缭乱、彼此参差，却仍具有显著的统一性。我们可以把这种统一性提取出来。就从这里出发，作一次全景环视。我假定你们已经完成了这项工作，因为在我看来，格拉诺夫的报告已经足够清楚，使你们能够看出巴林特提出的不同问题总体上处于什么位置、采取何种立场。

那么，我们假定事情已经得到定位，从“客体关系”出发。你们会看到，它位于巴林特提出的一切问题的中心和核心。让我们直接进入问题，并进入我们将不得不作出的区分。我们会看到，他阐发“客体”或“客体关系”概念时的透视中心如下：在他的构想中，客体首先是一个满足客体。这不会令我们惊讶，因为分析经验使我们身处力比多关系、欲望关系的秩序中。但以人际客体经验为出发点，并把客体从根本上视为满足、使一项需要达到饱和的东西，这意味着什么？

这是一个我们能够由之出发的关节点吗？它是一个有效的起点吗？我们能够从中发展、汇集并解释经验向我们表明、教导我们在分析中会遇到的东西吗？问题就在这里。我们将看看经验中发生什么，也就是巴林特如何被引向围绕这个概念重新组织分析经验。

对他而言，根本的客体关系满足一种可以称作完整形式、典型形式的东西。客体关系把一项需要同使它达到饱和的“客体”结合起来。我们能否认为这已经足够？这就是我提出的问题。他在所谓“原初之爱（primary love）”中得到了这种关系的典型形态，即儿童与母亲的关系；《母亲的爱与对母亲的爱》（Mother's Love, and Love for the Mother）一文表达了它。

这篇关键文章出自爱丽丝·巴林特，是她对共同工作的主要贡献。文章带来的核心观念是：儿童同母亲的这种关系，其特征在于母亲本身满足儿童的一切需要。当然，这并不是说，事情总能实现，而是说，它是儿童处境内在的结构性规定。这意味着该处境拥有完整的动物性背景；而文章还添上了重要的一笔，尽管对人类幼儿来说，这似乎有些多余：

- 像一切幼小动物一样，儿童在一段时期内同母亲的陪伴相互共适；这种陪伴使生命世界最初几步中的某种关键、原始需要达到饱和；

- 但他的共适程度远超过其他动物，因为其发展迟缓；正因此可以说，人在发展中带着胎儿化特征出现，也就是源于早产。这一点只在边缘被稍稍触及。巴林特确实指出了它，而且有充分理由。

不论如何，被呈现为根本之物的一点已经得到充分标记。他不断坚持并返回它，仿佛感觉到这是论证中的一个连接件、一项关键要素与关节。他如此看重的这个要素其实证明的比他所想的更多——你们将会看到。他强调一项在他看来具有强烈意义、而且确实如此的事实：这样规定的儿童—母亲关系从根本上正如他所说；只要它继续存在并顺利完成，没有意外，任何障碍都只能偶然发生。这种偶然也许会成为常态，但它相对于所考察关系的本质性质仍然只是意外。因此，只要关系以其本质形式实现，整个情境就会发生蜕变。

如果满足实现，这种被称为原初之爱的原初关系之欲望甚至无须出现，什么都不会显现。因此，任何实际显现都只是一场被构想为根本封闭的二人关系情境中的破损。由于我必须沿某条道路展开问题，不能在这里久留；不过，爱丽丝·巴林特把这套构想一直发展到我所谓

的“英雄式”后果。我会向你们说明，这个词应当在什么意义上使用。她说：

“对于儿童来说，母亲带来的一切好处都理所当然。甚至不必有任何东西短暂涌现，来暗示这名伙伴具有自主性、作为另一个主体存在。不，一切理所当然；需要提出要求。在儿童看来，客体关系中的一切都理所当然地朝向对这项需要的满足。在这种预先建立的和谐构想中，人最初的客体关系形成一个封闭整体，在其本质关系中趋向完美满足；如果确实如此，那么严格说来，另一侧也必定完全一样。”

爱丽丝·巴林特展开论证时的严密，恰好表现为：她认为自己还没有充分证明这项主张的根本意义和概念广度。她尚未证明，母亲一侧完全相同。形象地说，母亲对自己孩子的爱，在需要层面及其原始阶段具有完全相同的预定和谐性质；也就是说，对于母亲而言，同孩子相连的一切照料、接触、清洁、哺乳以及动物性联系，同样满足着她自身的一项需要，而这项需要同前一项需要绝对互补。

这个情境完全互补。我把这种互补性称作爱丽丝·巴林特论证的“英雄式”极端，因为她极力强调：这项互补同一切生命需要具有完全相同的界限，即：

“当人再也没有东西可给时，那就拿取。”

在她看来，最能证明这个情境的一项要素是：在某个所谓“原始”社会中……在他们的语域中，这种说法与其指这些社会的社会或共同体结构，不如说它们更易暴露于生命需要层面的可怕危机，无论是爱斯基摩人，还是在澳大利亚荒漠中四处流浪、陷入悲惨境地的部落……一旦再也找不到任何可以入口的东西，人就会吃掉自己的孩子。

这也属于同一个系统，处在生命满足的同一语域中；两种活动之间没有任何裂口或断层：人完全属于孩子，而与此同时，孩子也完全属于人。正因如此，一旦没有其他活路，孩子完全可能注定被吞食。这是绝对同质的生命需要之满足，可以一直走向吞并；吞并本来就属于动物之间的关系，也属于客体关系。

在通常情况下，儿童以自己能够做到的程度从母亲那里获得滋养、吸收母亲。反过来也成立：当母亲别无选择时，她就把孩子吞下肚。巴林特深入到一些极有暗示性的民族志细节。我不知道它们是否准确；人们总得警惕那些据说“来自远方”的报告。

不过，一些民族志学者的报告令人想到，例如在极度困苦的时期——那里甚至不能只说是食物短缺……

某些人口群体经常处在这类可怕饥荒的节奏中；他们仍处于十分原始的阶段，

在共同体层面也孤立于我刚才提到的极端地区——

……例如有人报告说，在澳大利亚的某些部落中，可以看到怀孕女性凭借某些原始行为表现所特有的非凡手段与灵巧，让自己流产，以便用由此提前降生的妊娠产物充饥。

因此，儿童—母亲关系在这里被发展为欲望互补性的根本出发点。为了给你们的头脑标出、说明并贴上标签——尽管这不是我最喜欢的方式——我们可以说，在动物层面，它是相互嵌合、彼此环抱的欲望之直接共适。此后发生的其余一切，包括不协调与裂口，都只是意外。这就是出发点。

通过这样规定事情，他明确提出了某种同分析传统中的一个根本要素相矛盾的东西；这个要素涉及所谓本能发展。也就是说，他反对像传统做法那样承认一个被称为“自体性欲”的原始阶段。

这是突出这套构想意义的另一项要素。巴林特夫妇构想的出发点——可以说是起始点，同时将成为并始终保持其全部客体关系构想之枢纽，原因稍后你们会看到——同弗洛伊德大量文本承认并推举的东西之间，存在根本矛盾与区别。当然，弗洛伊德的文本并非没有细微差别；那些十分重要的细微差别始终使事情保持某种含混。姑且把这种力比多发展构想称为“维也纳构想”；恰恰由于缺乏理论与技术手段，人们并不很清楚应当在哪里给它划定界限。

存在一个最初阶段：

- 有人把它限于最初六个月；
- 有人试图把它延伸得很远；
- 还有人也许把它推到更早的界限。

正如巴林特幽默地指出的，总有一个时刻，人们可以用一个界定明确、本质上否定性的特征来说：“此时，客体关系尚未诞生。”

存在这样一个时刻：按照所谓“经典的”维也纳构想——它是一套对力比多发展作出规定的构想——儿童主体只知道自己的需要，而同满足它的客体没有任何关系；儿童只知道自己的感觉，并在刺激—反应层面作出反应。这同前面的构想完全不同。按照自体性欲概念所包含的说法，儿童同客体之间不存在根本、原初、预先规定的关系，只有对

自身快乐或不快乐的感觉。对他而言，世界是由未分化感觉构成的世界；这些感觉支配、统治并引导其发展。他生活在欲望的世界中。我们无须考虑他同某个客体的关系，因为此刻还没有任何客体为他存在。

巴林特的一篇文本通过参照贝格勒的一篇文章[注1]，清楚地标出了这一点。贝格勒维护的这项论题，当时在维也纳圈子中被视为经典，并使维也纳圈子尤其无法接受英国圈子开始涌现的东西；后者以不同于巴林特的形式，突出后来会在克莱因理论中发展的内容，即同“好客体”与“坏客体”概念相连的最初创伤要素，以及所有这些原始投射与内摄。它们的辩证法会在全部英国思想，尤其在儿童精神分析的发展中扮演极其关键的角色。

> [注1] 埃德蒙·贝格勒：《最早阶段》（“Earliest Stages”），《国际精神分析杂志》第18卷，1937年。

这套客体关系构想会产生什么后果？我们首先确定一点：巴林特及其追随者、延续者和先驱者，显然朝向某种真理前进。任何观察过十五至二十天大婴儿的人，都不能说这个仍不会说话的主体对某些选择性对象毫无兴趣。把自体性欲视为力比多的原初命运这一传统观念，必须得到解释。它当然具有价值；但我恰恰想向你们说明，如果我们在生命体同其周围世界（Umwelt）之行为主义关系的层面理解它，事实就证明它是错误的。

只须观察一个出生第一个月的婴儿片刻，就能看到存在客体关系。这并不表示原初自体性欲理论没有对应任何东西；关键恰恰在于，力比多理论把我们置于另一个语域。

弗洛伊德所建构的力比多理论，正是接近这个语域的一种方式。这里给我们的，正是我们应当如何理解力比多理论——尤其相对于这些发展而言。后者可以说是从分析理论上接出的若干派生支流；相对于力比多理论的根本灵感，它们明显构成一次偏离，而目前分析运动中相当大、占多数的一部分已经投入其中。

巴林特对这个出发点的后果说得完全清楚。他把客体关系规定为：某项需要获得一个客体封闭而完全的对应，从而在原初之爱这一形式中得到满足；其第一个模型来自母子关系。这是巴林特自身思想的发展清楚显示的，并非由我们重建或推演；只要踏上这条道路，我们可以直接看到它会产生什么结果。我本来可以从另一个入口把你们带到这里。

相关知识卡 迈克尔・巴林特的原初之爱与分析终结

但无论从哪个入口进入巴林特的思想，你们总会重新遇到相同的死胡同与相同的问题。因为这是一套连贯思想，我们可以［……］从另一个方向重新走完它的回路。然而，只要从这种客体关系出发，就再也无法走出去。生命体发展过程中的力比多关系显然会经历种种进展、阶段、跨越、时期与变形；但如果从这里规定客体关系，那么无论怎样发展欲望的细微差别与性质，无论怎样从口腔期转到肛门期，再转到生殖器期，客体关系必然始终以同一种方式得到规定：无论欲望如何变形，总得有一个客体来满足它，而这个客体的功能也总是使欲望达到饱和。

所有这一切的后果是：生殖器关系在完成形式中、在本能层面实现时，也会以完全相同的方式被构想、思考、记录甚至理论化，而且这是巴林特公开承认的……我可以找出那段文字；感兴趣的人会发现，

他的表述同我现在的表述完全一样……完成的生殖器满足是这样一种满足：一方的满足并不是“关心”另一方的满足，而是在另一方的满足中达到饱和。

在这种根本关系中，另一方当然也得到满足。这恰恰是他构想生殖器之爱与原初之爱的共同轴线。他确实这样写，因为无法用别的方式思考。从客体被规定为满足客体之时起，事情在成人发展层面显然会变得复杂得多；也就是人类主体真正需要运用自己的生殖器占有能力时，显然必须再加上一段延长件——可以这样说——但它始终只是一段延长件，人们根本不明白它从何而来。

很清楚，这意味着主体必须具有某种主动性和兴趣，必须统觉到伙伴的存在，或者如巴林特所说，统觉到伙伴的现实；这种统觉应当制约上述实现。虽然它是理想实现，基本上却仍被构想为属于同一秩序。

主体要抵达那里，必须具有各种目的论式洞见，并以远为精细的方式介入。作为主体，他必须考虑作为主体的另一个主体的存在。显然，这一点并非理所当然。他必须关心并注意的不只是伙伴的享乐，还有围绕它存在的各种要求。

生殖器之爱相对于原初之爱的进展，正是借助把他者视为主体的现实这个概念介入。然而，你们看到，这只同某种既定事实相连：事情就是如此，因为成人比儿童复杂得多。但从根本上说，满足的秩序与语域完全相同：一种封闭的二人满足，理想是每个人都在对方那里找到满足自己欲望的客体。

因此，这里要求主体具备各种评价对方需要与要求的能力；我们必须知道，应当从哪里把这些能力引出来。因为在力比多关系中，没有任

何东西向我们说明：把他人本身承认为他人，如何可能被引入这套封闭的客体关系概念系统。

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引入它，这一点极为醒目。到了生殖器之爱阶段，他所谓温柔、理想化以及围绕生殖器行为的一切——即我们可以称作“爱的幻景”的东西；如果这里所涉及的确实只是欲望与需要本身达到饱和，这个说法在此语域尤其恰当——全都必须从某个地方来到这里。

只须阅读巴林特的文本：当主体抵达生殖器实现阶段时，完成的爱之中同他者关系的全部文明与文化要素，都必须来自某处。不过，客体关系这个根本概念没有发生变化，理由很充分：一旦以这种方式设定它，就无法让它演变。没有任何东西在内部引入一项矛盾，使它在生殖器层面到来时呈现出另一种结构。

因此，我们见证了一个看似悖谬却并不悖谬的事情，因为语言表达本身已经提示甚至强加了它：当人抵达生殖器层面时，我所谓理想化与温柔的幻景要素、爱的整幅“温柔地图”，究竟源自何处？临床事实迫使他承认这些东西，他无法说别的；但正是在这里，他的体系立刻从上到下彻底撕裂，因为他说：“这一切的起源是前生殖器的。”

也就是说，一旦推进到生殖器这一发展阶段，他就不得不回到先前的原初之爱构想那里，去寻找一切在生殖器时刻同生殖器欲望之满足结合、并赋予同他者之关系以完成形式的东西；而这种同他者的关系极为复杂、丰富而精细，正是所谓“爱”——而不仅仅是交媾——这种人际关系通常应当具备的形式。

因此，他不得不把正在发展中的前生殖器构想为：从根本上由原初之爱支配并处于其重音之下；也就是一种完全自我封闭的客体关系，两个客体通过彼此相互满足，却不包含任何主体间性。

接着，当他抵达明显必须要求主体间性的生殖器阶段时，由于客体关系本身无法使生殖器行为提出比客体关系更多的要求，他只得让一切追加进来、共同构成一段丰富而细腻的主体间关系的东西，从前生殖器幻想中重新涌现。

这就是其学说的矛盾：他把前生殖器构想成由一种可以说是动物性的客体关系形成；在那里，客体处于绝对的无私（unselfishness）之中。这正是他在最初展开中为原始客体关系规定的一切所具有的特征。

客体并不自利（selfish），也就是说，它不是主体。这个词虽未被明说，他使用的公式却清楚表明了这里涉及什么。主体性就是自利（selfishness），就是认为他者是一个自身（self）。他说，在前生殖器阶段，除正在生活的那个自身以外，绝不存在另一个自身；客体在那里只为使其需要达到饱和。

抵达生殖器关系层面时，由于无法走出如此规定的客体关系概念，就没有任何办法使它取得进展；因为无论欲望如何改变，客体永远都是某种同欲望互补的东西。

于是，他被带向一个任何东西都无法填补的裂口，却又不得不把它纳入体系，因为分析经验清楚显示并暴露了这一事实：凡是使经验作为主体间经验而变得丰富、把他者的自利（selfishness）考虑在内的东西，恰恰都来自他先前把这些要素排除在外的前生殖器阶段。经验迫使他这样做，因为事实表明，这些要素确实源出那里；可他无法解释

这个矛盾。仅在理论陈述层面，人们就能看到：一旦从某种语域把握客体关系，会陷入怎样的死胡同。

朗医生

在我看来，还存在另一个矛盾；从您刚才报告使用的词中也能看到。巴林特起初描述的封闭世界——原初之爱——内部存在一个同样显现出来的矛盾：他彻底而系统地混淆需要与欲望。况且，为了明确他的思想，您自己也交替使用了这两个词。也许只要把注意力放到这一点上，我们就会看到裂缝在哪里。我想提出一个问题：他自己是否也不加区别地使用需要与欲望这两个词？因为您在开头强调过，在这个封闭世界中，欲望无法出现，不存在欲望的涌现点。

相关知识卡 迈克尔·巴林特的原初之爱与分析终结

拉康

他交替使用两个词。思想的基础是 need［需要］；只有偶然出现缺失时，need 才以 wish［愿望、欲望］的形式显现。而这里的问题恰恰就在于：人的 wish 是否只是 need 遭受的缺失？欲望是否只来自挫折？问题正是如此。

这里有某种东西会把人带得如此之远，使人几乎用挫折来说明分析中发生的一切的致病机制。从视域的各个方向，人们已经把下列东西推到我们面前，而且其连贯性远不及巴林特的思想：

- 依赖情结等等；
- 原初、次级、原始、复杂的挫折等等；
- 以及作为我们思考分析之根本语域的挫折性要素。这些说法已经如此强烈地占据前景，以至于我们必须暂时摆脱这种迷惑，提醒自己一些绝对根本的事情，才能重新站稳脚跟。

这就是我现在仍要努力提醒你们的东西。分析教给我们一件事：如果说我们在力比多发展秩序中作出了一项发现、取得了一项积极成果，那恰恰是我们所谓儿童是一个倒错者，甚至是一个多形态倒错者。在最初围绕俄狄浦斯情结勾勒出来的生殖器规范化阶段以前，儿童听任一整系列被称作或被标示为“部分驱力”的阶段支配；它们是同世界发生力比多关系的最初类型。

我们现在正把客体关系概念运用于这个初步轮廓；在整个语域中，它都被隐含地放入挫折或没有挫折这个概念的最广大范围内。朗在这里提出的观念极有成果。倒错经验究竟是什么？说到底，如果我们把儿童称作多形态倒错者，这个说法总该具有某种意义。我们的出发点是一项经验，它为“倒错”这个词提供了最初意义。

我们必须回到这样一点：分析经验始于若干临床表现，倒错就在其中。当人们把倒错引入前生殖器时，就必须回想这意味着什么。在倒错表现得清楚而独立的地方——

- 就这个例子同前生殖器阶段相关而言，我们是在倒错现象学中看到它吗？
- 我们甚至是在两个主体之间最为令人满意的爱之现象学中看到它吗？
- 适用的是不是我们刚才通过巴林特的论述所突出说明的客体关系概念？

在这里，事情显然恰好完全相反。首先，没有任何一种倒错表现不需要这种主体间关系来维持自身结构——我是指在其体验的每一个时刻。

窥视与暴露的关系先放到一旁，因为它们太容易证明。我们来取施虐关系为例。无论把视野限制在怎样特殊的个案上，无论以何种形式进入施虐经验——想象形式也好，某种悖论性的临床形式也好——有一点完全可以确定：严格意义上的施虐关系只有在他者恰好停留于仍然是主体的边界上时才能维持。

也就是说，一旦痛苦溢出，抵达他者不再是别的、只剩下一块会反应的肉，像一只边缘受到撩拨便会搏动的软体动物时，施虐关系便不复存在。此后可能产生的东西，取决于施虐主体能够实现之事的本真程度与广度；它会突然以空虚、裂口和凹洞的形式停在那里。

施虐关系却意味着，两名主体的关系中所操纵的东西，必须钩住伙伴的同意——这里的同意取最广义的接受。它所涉及的是伙伴的同意、自由，以及对自身受辱的承认。

在可以称作良性的形式中，这一点表现得更加明显。事实上，大多数施虐表现与其说一路走到极端，不如说都停在实行的门口。其中涉及的，恰恰是各种可以被描述为等待他者、害怕他者、施加压力与威胁的要素；主体观察我刚才所谓他者同意及参与游戏时采取的或多或少隐秘的形式。

你们知道，在我们认识的临床材料中，倒错形式有多大一部分停留在某种游戏性实行的层面；它要求主体那里存在某种呼应。这不是一个服从需要的主体所作的对应，而是一个通过同主体认同来参与游戏幻景的主体所作的对应，正如前一主体也在游戏中同他者认同。主体间性是根本维度。

这一点已经得到表述……我不能不援引那位最出色地描写了它的作者。他的相关论述属于一部在哲学上可以遭受各种批评的作品，但至少在现象学的这个部分，凭借其才华与光彩，确实达到了格外令人信服的程度……我指的是让—保罗·萨特《存在与虚无》第二部分中那段关于把握他人认识的现象学。那里对这个问题作出了极好的突出说明。

作者让整套论证围绕他所谓"凝视"的根本现象运转。人类客体以完全特殊的方式在我的人类经验场中取得独特性；从根本上、从一开始（ab initio），它就绝对不同于我经验场中的其他一切，不能同任何其他可知觉对象同化，因为它是一个会凝视我的客体。

萨特围绕这一点作出了各种极其细致的强调：这里所说的凝视绝不能同我看到对方眼睛这个事实混淆。我可以感到某个我连眼睛、甚至连外表都没有看到的人正在凝视我，只须有某种东西向我表示他可能在那里。例如这扇窗：如果天色稍暗，而我有理由认为后面有人，那里便已经存在一道凝视；作为主体，我据此改变自己的形态。从这道凝视存在的那一刻起，我已经变成另一种东西：在同他人的这种关系中，我感到自己在他人的凝视下成为一个客体。

不过，在这个具有互反性的位置上，对方也知道我是一个知道自己正被看见的客体。萨特极好地描述了羞耻、羞怯与威望的整个现象学，也描述了他人的凝视所产生的那种特殊恐惧。我建议你们参阅他的著作；对于分析家来说，这是绝对关键的读物。

尤其在我们已经开始遗忘主体间性语域的今天；它在这里逐字编织于某个经验语域之内，你们应当立刻认出，它正是我在这里始终教你们区分的想象层面。请注意，如果我们悬停在一系列所谓倒错表现所处的这个层面，就会得到一整套细微差别；它们远不能同我教你们放在象征关系枢纽上的东西相混合，即承认的层面。

我们还应强调，这个围绕作为凝视的他者之枢纽形成的关系区域具有哪些特征。你们已经可以看到，它们都是极其含混的形式：我刚才谈到羞耻，绝非偶然。

如果沿威望的方向推进，更细致地分析事物以后就会看到：只要严格停留在他人凝视的单独作用这个层面，我们遇到的只会是可笑的威望形式——例如儿童身上表现出的风格，以及某种兴奋形式……

一位朋友给我讲过一则逸闻，涉及西班牙斗牛赛前让笨拙者参加的那种闹剧。他描述了一个非常精彩的场面：人群陷入某种集体施虐状态；你们将看到，这类表现中的含混能走到多远。

人们让一个半傻子沿场巡行。在这类场合，会给他们穿上斗牛士最漂亮的服饰；他就在那些小公牛入场前沿竞技场巡行。游戏要求参加者跳到这些小动物身上，而它们也并非完全无害。

人群高喊："可是看他，多漂亮啊！"这个半傻的人陷入某种恐慌，颇有古代西班牙宫廷大游戏的传统色彩，开始拒绝。伙伴们说："去吧，你看，大家都想要你上。"人人都参与游戏。那个人越来越恐慌，不断拒绝，想要躲开。人们把他推出围栏。

最终，摇摆与翻转以完全彻底的方式发生了：那个人突然挣脱那些推他入局的人；在民众呼喊那种压倒性的坚持之下，他拨开所有人，突然取代自己原来的位置，成为一种滑稽英雄。他被裹入情境的结构，以献祭态度的一切特征迎着野兽走去——只不过事情毕竟仍停在滑稽闹剧层面。随后，他立刻被彻底撞倒在地，人们把他抬走！

在我看来，这个极为震撼的场面规定了这种以主体间性为根本的关系之含混区域。你们几乎可以说，象征要素——呼喊的压力——在这里扮演了关键角色，却又被它此刻所采取的群众现象性质近乎取消。整个现象被带回我正在努力为你们规定的主体间性层面；我们暂且把一系列倒错表现标记为处于这个层面。

不过，我们还能走得更远。萨特——我提出这位作者并非没有理由，因为我认为萨特在这里的分析走得很远——进一步对爱之关系本身的现象学作出了一种展开与结构化，在我看来完全无可反驳。我无法为

你们重做整套论证，因为那样就必须走过“自为”与“自在”辩证法的全部阶段。你们得稍微费点力气，自己去读这些作者。

萨特试图在爱的尖锐、具体而完整形式中把握爱之辩证法的那个层次，他极其恰当地指出：在爱的亲历经验中，我们对那个希望其爱我们的客体所要求的，并不是所谓完全自由的承诺；我们并不满足于只因最初的盟约、只因我谈到象征语域时经常援引的“你是我的妻子”或“你是我的丈夫”而得到爱。

可以肯定，以这种高乃依式抽象形态存在的东西，根本无法使我们的现实而根本的要求达到饱和。萨特在“自在”与“自为”的辩证语域中指出的，尤其是自由同一种身体黏着状态的关系；当欲望被参照到自由层面时，它的性质就在这种黏着中表达。这里涉及的正是这一点。

我们想要为他者成为一种客体；相对于他者的自由，这个客体应当具有他者自己的身体相对于其自由时同样的限制价值。我们想为他者成为这样一种东西：他者的自由不只在其中异化。毫无疑问，自由必须介入；承诺当然是我们要求得到爱时的关键要素，但它必须远远超过简单的自由承诺。它必须是一种同意自我放弃的自由，从此真正受限于这样的全部道路：我们自身作为客体对它产生捕获，把它带上这些道路，而它们可能具有被捕获、任性、不完善甚至低下的一切性质。

我认为，任何人都不能看不到这是绝对关键的事实：凭借我们的偶然性、我们的特殊存在，凭借其中对我们自身和我们自己的自由最为肉身化、最具限制性的东西，成为他者自由同意接受的界限与自我放弃形式。正是这一点在现象学上规定爱的位置，呈现出爱在具体亲历中

能够要求的形式——就像我们的好朋友巴林特刚才所说的生殖器之爱。

这恰恰把爱安置在象征与想象之间的中间而含混的区域。不过，它也完全受到想象领域的捕获并黏着其中，处在我想借此让你们集中注意的想象性主体间性之中。与此同时你们也看到，爱在其完成形式中何等要求象征语域的参与；这正是我所谓自由向盟约的转换，因为这个层面体现为什么？体现为已经给出的言语。

因此你们看到，整个区域分成了不同层级；你们可以在那里区分我们以经常不够精确的语言称作“认同”的不同层面，以及在想象与象征之间发挥作用的一整套细微差别和形式谱系。我们的全部经验都在这个层面中移动。

不过，你们同时也看到，我们只能……

这同巴林特的透视恰好相反，也更符合我们的经验——

……从一种根本而彻底的主体间性出发，也就是从一个主体把另一个主体本身完全承认为主体出发，才能追溯性地——我是说 nachträglich［事后地］——从当前的成人经验一直回溯到我们能够假设的一切原初经验，把不同程度的降格依次排列；而我们同巴林特一样，永远无法走出主体间性的领域。

换言之，只要我们停留在分析语域中，就必须承认主体间性一直延伸到起源。两个语域之间没有过渡：

- 一边是动物欲望辩证法中的两个极端词项，即客体与客体的关系；
- 另一边则是另一个语域，即对欲望的承认，它严格说来属于第二层级。

如果从这里出发，我们就必须从一开始知道：这种根本主体间性的属性会降格到什么程度，同时又从哪里开始。如果最初假设中没有主体间性，就不可能让它在后来某个时刻涌现。必须知道主体间性在起源本身——在它尚未显露之处——位于哪里。不过，它必然从开端就在，因为它最终必须存在。

经验显示的正是这一点。如果分析理论把儿童的某种行为方式或症状称作多形态倒错，那恰恰是在这个语域中，也因为它包含我刚才试图让你们把握的想象性主体间性维度：这是一种双重凝视——我看到他者在看我，而某个介入的第三者又看见我被看见。这里从来不只是两个词项的简单成双。不只是我看见他者，我还看见他在看我；我既看见他在看我，这就意味着存在第三项，即他知道我在看他。圆环由此闭合。即使现场没有三个词项，也始终存在三项。

那么，这意味着什么？我们所谓儿童的多形态倒错，是否也带着我们可以借成人倒错说明的那种丰富而敏感的体验？

- 倒错是否归根到底是一种特权式探索方式，探索人性的一种存在可能、某种内部撕裂——象征界整个超自然世界也得以从这个裂口进入？

- 我们是否应当像人们所说的那样，把成人倒错亲历经验中构成其质性价值的一切投射到儿童身上？

这意味着这种事情吗？当然不是。换言之，我向你们提出的问题是：如果这种根本主体间性确实构成了我们在成人倒错中看到的东西，我们是否应当在儿童那里寻找它？不！当相关作者谈论儿童时，有一个事实令他们十分震动，也是他们用来说明那种完全不考虑他者自身利益（selfishness）的原初之爱的根据：儿童说出的这类话早已为人熟知，即使最爱母亲的孩子也会冷冷地对她说："妈妈，等你死了，我就拿走你的帽子。"或者其他任何东西……又如："等外公死了……"

儿童话语中如此轻易地把他者化为乌有[注]，会让我们成人感到惊讶。我们处在一种误解中，把儿童视为一种几乎无法构想的神圣存在；当我们遇到这类悖论现象时，儿童的感情便从我们手中逃脱，于是人们试图以一贯而古老的方式解决问题：人面对超越性问题时，只要不再理解，就会把它想成神或动物。人们又太把儿童当作神，不愿承认这一点，于是转用动物性词汇理解他们。

> [注] 底本异文说明：Staferla 转录此处作 adulation，字面是"赞美、崇拜"；米勒整理、John Forrester 英译本第 218 页也没有按"取消"处理，而是把这一段理解为儿童这些话引起成人对儿童的赞叹。现译"把他者化为乌有"则依据紧接在前面的"妈妈，等你死了……"等语境，把此处视为疑似 annulation（取消、抹除）的转

> 录异文。现有版本证据不足以确定哪一种读法是拉康原话，故正文保留语境性译法，并在此标明这项校勘选择。外部出处：Staferla S1 Word 底本，米勒整理、Forrester 英译本第 218 页。

巴林特所做的正是如此：他认为，除非相对于自身需要，儿童根本不会对另一个客体作出任何承认。这完全是错误的。儿童如此轻易地说“等你死了……”这个简单例子，恰好向我们表明：我们必须从起源处重新找到的根本主体间性在儿童那里确实有所显现，因为他能够使用语言。

这恰恰也是格拉诺夫日前说过的事情；人已经可以隐约感到我向你们……儿童在最初的对象隐现游戏中显露出他刚才提到的那种能力：我不说在缺席中呼唤在场，而是把对象从在场中排除出去。不过，巴林特恰恰没有认识到：这是一种语言现象。他只看到一件事：儿童不顾及客体，并认为这才重要。可真正重要的并不是儿童不顾及客体，而是这个人类小动物能够运用象征功能；借助它，正如我向你们解释过的，无论门有多窄，我们都能把大象带进这里。

主体间性首先以最鲜明的重音，在操纵象征的语域中被给出，而且从起源处就是如此。正是从这里开始，象征越来越复杂地体现到想象经验中，并以某种方式塑造成人经验中想象性捕获承诺——包括捕获、固着的一切——可能发生的所有转折；这些东西最初都源于命名的可能性，而命名同时是：

- 对物的毁灭；
- 也是物向另一个层面、即象征层面的过渡；严格意义上的人类语域由此建立。

这种关系从根本上是主体间的。忽视这个维度，就会落入那种再也无法走出的客体关系语域，并因此陷入理论与技术的死胡同；我正试图向你们说明这一点。今天上午我至少把这个环闭合得足够好，可以把你们留在这里了吗？这不表示后面没有内容。对于想要一份粗略图式的人，可以这样概括：与人们通常相信的相反，对儿童来说，首先存在的是象征与实在；而我们看到在想象语域中组成、丰富并分化的一切，都必须从这两极的根本优先地位出发。

如果这令你们惊讶，如果你们认为儿童比受到其他东西更容易受到想象捕获，那么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会说你们是对的，因为想象当然在那里。但它恰恰对我们完全不可接近。我们只能从它远为后期的成人实现出发来接近它。

当我们试图看到能够唤起什么、能够借什么以正确的分析方式真正抵达主体的过去、亲历与历史时，在分析中应被视为儿童式行为的，并不是你们昨晚听见的那个人极其混乱、笨拙地向我们呈现为主体在分析中打瞌睡、乱摸的行为。如果我们必须从中提取某种东西——不论是否自知，我们确实会这样做——那就是成人身上的儿童语言。

下次我会向你们证明这一点。在费伦齐的那篇文章中，你们会看到，他极为出色地看到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

- 在分析中，是什么使成人内部的儿童参与进来？
- 我们应当赋予他什么位置？
- 从中能够产生什么可用的东西？

答案十分清楚：就是在分析中以闯入方式被言语化的东西。

第19课 · 1954年6月9日

上一回，我把你们留在了原初之爱（primary love）、二元关系那里。依照巴林特极其严谨的说法，这种关系本质上构成一种双体心理学（two bodies' psychology）；而这套理论所强调的，恰恰就是分析关系本身中的这种关系。

我想，你们已经理解我向你们展示的东西。我把它概括一下：如果把这种想象性关系……

即同一个满足客体的关系，并把它当作自然欲望在本质上能够达到饱和的和谐配合

……当成这种二元关系的中心概念，我们会走入怎样的僵局。

我曾试图通过严格意义上的倒错关系之现象学向你们证明这一点。我着重讲了施虐与窥视癖。同性恋关系则被我留在一旁，因为若依照这些说明、在这一层面上加以考察，它要求一项细致得多、几乎无穷无尽的研究。事实上，恰恰是通过深入探究想象性的主体间关系这一面……

正如我上回已经向你们展示、现在又要重复的：它本质上由它的不确定性、不稳定的平衡以及根本上的危急性质构成

……同性恋关系现象学的整个一面才可能得到阐明。但这值得专门研究。我在想象界层面考察这种主体间关系时，曾使整个研究围绕一个点旋转；我把这个点置于严格意义上的凝视之功能、凝视之现象中。

我已经对你们说过，凝视并不只是位于眼睛层面的东西，并不只是某个人看着你。它是一种构成关系本身的维度，甚至未必需要眼睛显现出来；眼睛完全可以被遮蔽，只由凝视假定出来。恰恰在凝视中，出现了我们所看见的那个 X：它未必是我们同类的脸，也同样可以是那扇窗户——我们设想他正躲在窗后窥伺自己。

在他所是的客体中，越过他并不是的那个客体，反倒显现出这样一个客体：他在它面前成为客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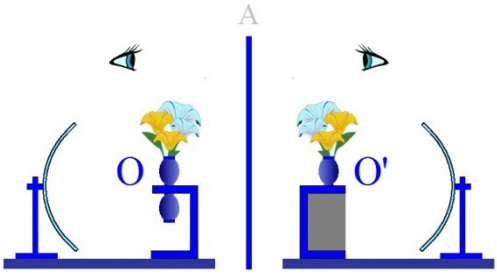
为了向你们证明这一维度，我选取了施虐，并把你们引入这一关系的经验之中。我向你们表明：在被我折磨者的凝视中，我归根到底必须以每一刻的挑战（challenge）来支撑自己的欲望。

如果这一欲望不能凌驾于情境之上，不能——容我这样说——保持荣耀，它便会坠入羞耻。窥视癖关系也是如此。我再提醒你们萨特的那项分析：一个正在偷看的人突然被撞见，由于这一撞见，整个情境的色调都改变了。在这个转折时刻，情境发生彻底翻转；这一翻转恰恰取决于这样一个几乎微不足道的条件：我没能以某种必须强加于人的凯旋姿态支撑“我被撞见”的情境。正因情境发生这种翻转，我才变成一件纯粹的物、一名癖嗜者。

倒错并不只是相对于社会标准而言的非典型、偏离或异常，也不只是违背善良风俗——这一层面当然也存在——或者相对于自然标准而言，或多或少偏离两性结合的生殖目的。就其本性而言，它还是别的东西。人们把若干倒错倾向称作“不敢说出自己名字的欲望”，并非毫无缘故。

我们在这里触及一个根本性的层面。事实上，正是在承认的边界上，承认才把它固定、定位并烙印为倒错。但从结构上、从其内里来看，我在想象层面为你们勾勒的倒错，只能在一种岌岌可危的状态中实施并维持：主体每时每刻都从内部质疑它；它难以维持、脆弱不堪，随时可能遭逢我刚才说的翻转与颠覆。这令人想到某些数学函数附带的那种符号变换：当变量从一个值过渡到紧接着的值时，其相关项会在顷刻间从正无穷跳到负无穷。

倒错关系根本上的不确定性，使它无法在任何令人满足的行动中确立；这恰恰构成同性恋悲剧的一面。我再说一次：今天无法详细展开，只能点到为止。它处在自恋辩证法中从根本上联结并展开的三个层面的三联组中：窥视癖、施虐与同性恋。但也正是这一结构，使倒错成为一种深入探察的经验，让我们能够触及完整意义上的人的激情：用斯宾诺莎式的说法，人正是在其中经历着、并向某种自身分裂敞开——这里的“敞开”并非世界向真理敞开的丰产意义。这一自身分裂构成了在 O 与 O′ 之间指向镜像关系的想象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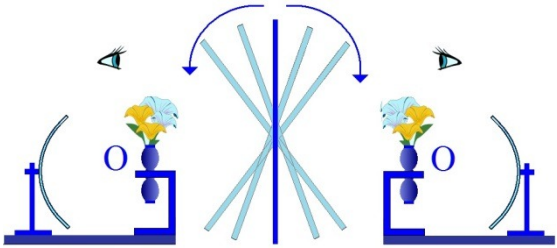


它确实具有深入探察的作用，因为在人的欲望这一裂隙中，所有细微色调都会显现出来——上一回我已经提到其中若干：从羞耻到威望，从滑稽到英雄主义。正是这些色调，使人的欲望在某种意义上完全暴

露于——就这个词最深的含义而言——他者的欲望；并且在这种想象性的主体间欲望层面……

请记住普鲁斯特通过阿尔贝蒂娜神话展开的那项惊人的同性恋分析。这个人物是不是女性并不重要，关系的结构具有鲜明的同性恋性质

……这种欲望样式的要求竟会走得如此之远：它只有通过对他者欲望无穷无尽的捕获才可能得到满足；如果你们还记得，这种追逐甚至经由他者的梦，一直追进他的梦中！这意味着主体每时每刻都要彻底放弃自己的欲望。



正是在这种闪烁的镜映中——我取的是捕鸟镜那种不断自转一整圈的含义——正是在这种翻转中……这种翻转每时每刻持续并自行维系；它是对他者欲望的一场耗竭性追逐，而那欲望永远无法被把握为主体自身的欲望，因为主体自身的欲望无非就是他者的欲望……普鲁斯特分析得如此出色的嫉妒激情之悲剧就寓于其中；这也是想象性主体间关系的另一种形式。

那么，在这种关系深处究竟有什么？它仿佛只有在边界处、在这些翻转本身中才能被短暂把握，其意义只在闪光中一现。这种关系一方面只有在主体对主体之间才能维持，却又预设每一刻的极端不稳定；它只能靠消灭他者或消灭作为欲望的自己来维持。

也就是说——请仔细想想——无论在他者那里还是在自己这里，这种关系都消解主体之存在，既消解作为他者之主体的存在，也消解这个主体自身的存在；其形式是：在他者那里，把他化约为唯一余下的主体所使用的工具；而对自己而言，则把自己置成一尊献给他者欲望的偶像。

倒错欲望有这样一种性质：走到极限，它最终以一个无生命客体为理想。但它不仅无法以已经实现的理想为满足，而且一旦实现这个理想，就在抵达它的同一时刻失去客体。因此，它的满足从结构上便注定在拥抱发生之前，以如下方式完成：

- 要么是欲望熄灭，
- 要么是客体消失。

我之所以强调“消失”，是因为在这样的分析中，你们可以找到某种东西的钥匙，甚至隐秘的钥匙。有些分析家颇有价值、也不乏严谨；从他们试图接近的东西中，人们甚至感到某种厚度。正是因为需要补充分析中关于客体消失的某些词汇层面，他们才提出这一东西。这就是琼斯所说的 ἀφάνισις（aphanisis，消隐）：他试图越过阉割情结，把握自己在某些童年创伤经验中触及的东西。

我们在这里迷失于某种神秘之中。我们没有把它重新安置到那个结构性的、根本性的要素里；这一要素界定了主体间关系的一个区域、一个层面，即严格意义上的想象界层面。归根到底，分析经验的一整个部分无非是对想象性经验这些死胡同的探索。其延伸并非不计其数，而是数量有限；它们只依托躯体结构本身的若干维度，依托身体显现为身体并由此界定出的具体拓扑。

我今天特别提到三个层面并非偶然，正如另有三个维度。反过来，某些丰产时刻是在主体的历史中——更确切地说，是在“历史”一词的边界，即其发展中——显现出来的时间化时刻：它们是可能的不同阶段、不同样式的挫折。它们得到界定，同时又像发展的负片那样界定发展，而不是构成严格意义上的发展；这些发展中出现的凹陷、断裂与裂隙，也界定了这些丰产时刻。弗洛伊德本人正是在一种发展性的历史层面上写到并标示了它们……

同样，只有深入到这里，我们才会看见：每当分析话语谈论挫折时，总有某种东西落空。由于语言里某种说不清的自然主义倾向，人们恰恰总让它漏掉。观察者即使是在为自己的同类撰写自然史，也会遗漏这样一点：无论主体多么早熟，当他感受到一个坏客体时，那并不只是我们在主体那里客体化出来的某种东西，并不只是把连接主体与这个动物性厌恶客体的行动偏转开来……坏客体本身被感受为挫折；挫折是在他者那里被感受到的……

我们可以称作“致死关系”的概念，正是由欲望熄灭或客体消失这两面、这两个深渊构成的。这种关系由相互消灭的关系所构成。因而，“主奴辩证法”这一参照对我们才有用。你们看，在许多转折处，我都不得不：

- 要么援引它、重新解释它，
- 要么在某种程度上重新引入它。

仅仅因为我未能在你们面前选取并展开它，并不表示它已经被穷尽。你们中有些人希望有一天能听到一场深入展开的讲解，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而且我相信，它的确能使你们获益良多。但你们也看见，它

处在我当前论述的边界上。我并不是告诉你们，黑格尔向你们解释的这种想象性关系就是“主奴辩证法”；因为黑格尔从另一些问题、从具体结构的另一些面出发，而我此刻从分析经验中孤立出来的只是一个例子——甚至可以说是一个极限例子。事实上，这个想象层面只在我们经验的边界上出现；我们的经验并不是总体的，而是被界定在另一层面上。今天我要带给你们的，正是这一点。

这个层面就是象征层面。这种关系在何种意义上构造于象征层面？这正是我今天在向你们解释的。不过，我先在“主奴辩证法”这里停留片刻。黑格尔说明了什么？说明人与人之间纽带的一个方面、一种方式；从总体上看，这一方式具有根本地位：

- 它不仅必须说明社会，还必须说明历史；
- 它不能忽略其中任何一个方面；
- 他很清楚，其中一个根本方面并不只是人与人之间的协作、契约、爱的纽带，也不只是无疑确实存在的这一切；
- 但它也不能被置于整个推演的中心……

在那种于激情、斗争与劳动之严肃性及否定性中展开的建构里，黑格尔将把中心置于这个层面。为了把它构造成一种原初神话，他把这一根本关系放在自己称作否定的、打着否定性印记的层面上。他自身论证发展的必然性把他推向这里——即我们可以称为人对人的现实利用关系。在某些昆虫那里，我们也看得到这类——为什么不呢？——社会形态；“社会”这个词并不令我害怕。但动物社会与人类社会的差异

将在这里显现。任何对可客体化的个体间纽带之分析，都无法标示或设想人类社会。

恰恰是主体间性这一维度本身必须进入其中。因此，问题并不在于人对人的驯化；这并不足够。在奠定主奴关系时，黑格尔必须引入某种东西。他称之为的并不是死亡恐惧；关系并非由它奠定。主奴契约的基础，也不是奴隶或承认失败者求饶、喊叫。真正奠定它的是：主人“出于纯粹威望的理由”投入了斗争，“出于纯粹威望的理由”作出选择，并且冒了生命危险。

这才是他的优越之处。奴隶承认他为主人，依据的正是这一点，而不是他的力量。也正因如此，这一情境——和想象性情境完全一样，这也使两者得以相互参照——从一个僵局开始。

因为，如果奴隶依据这项风险、依据“出于纯粹威望的理由”承担的风险而承认主人是主人，那么这种承认对主人毫无价值：承认他的是奴隶，而主人依照同一个风险层面，恰恰不承认奴隶为人。

因此，情境本应无路可走，始终停留在想象界层面。请你们顺带注意：黑格尔那里主奴辩证法的最初构造，同这一想象性情境具有亲缘性。它正是作为这种情境展开的。主奴关系的这一僵局通向……这就是它同想象层面相近的一面；另一面则使它能够由此继续展开。整个历史辩证法由另一种东西构成，它把我们引入象征层面，也就是这一情境的一切延伸。

你们知道这一情境有哪些延伸：正是由于这些延伸，我们才会谈论主人与奴隶。从那个最初的、归根到底因为具有想象性而属于神话的时

刻开始，享乐与劳动的关系确立了，也就是说，一项行动由此组织起来。

规则恰恰是强加于奴隶的法则：他的职能是满足作为他者的那个人的欲望与享乐，而这一职能只有在得到组织和界定时才可设想。因为奴隶只是求饶还不够，随后还必须去干活。要去干活，就有规则、有工时。我们由此进入象征界的领域。如果仔细看，你们会发现，这个象征领域并不是单纯接续在情境的想象性纽结或枢轴之后；这一枢轴由致死关系以及这项想象性关系本身的定义构成。

我们在这里并不是随着契约和象征，经由某种从先到后的跳跃而完成过渡。只要深入这则神话，你们便会看见：只有当它被象征界层面彻底环绕时，才可能被设想。理由就在于我刚才向你们指出、强调并着重说明的东西：这个情境不可能奠基于某种生物性惊慌，仿佛人接近了一种从未被经验、从未成为现实的东西——死亡。人所害怕的始终只是想象性的恐惧；冒死风险中的死亡，是一种想象性的死亡。

但还不止如此：我已经强调过，它在这里甚至不是被构造成对死亡的恐惧，而是被构造成死亡的风险，说到底，是赌注。在主奴神话最初的构成中，一开始便已有一项游戏规则。今天我不再详述。我把它说给那些最为开放、最愿意理解的人听。这一点至关重要。主体间性从头至尾都浸在这个层级、这个层面里，甚至当我们试图在想象界的某种展开中支撑它时，也是如此。

任何主体间关系，只要它构造了一项人类行动，就总会或多或少隐含地牵涉一项游戏规则；它只有作为这样的关系才可分析。让我们从另

一面重新考察我同凝视的关系：凝视依附于窗户或林边，而我在平原上前行，并设想自己处于某道凝视之下。

如果我假定有一道凝视正窥伺着我，那么在具体辩证法中，问题并不主要在于我害怕某种立即发生的行动、敌人的显露或其进攻的表现；因为一旦如此，情境反而缓和下来，我知道自己在同谁打交道。只要我维持着“被设想为受到观察”这一情境，对我最重要的就是知道：他察觉到了什么，对我的意图作了什么假定、什么想象。既然假定我处在战争情境中，我就必须向敌人隐匿自己的行动；问题在于机巧。

凝视的主体间辩证法正是在这个层面上得到维持。因此，重要的并不是他看见我在哪里，而是他看见我要去哪里；也就是说，确切地讲，他看见了我不在的地方。任何对相互的、主体间关系的分析，总会偷换掉这一点：构造情境的并不是已经在那里、已经被看见的东西，而是不在那里的东西。

所谓博弈论，只要它是研究这种主体关系的一种根本方式，就足以说明我们的论点：仅仅因为它是一种数学理论，我们便已经处于象征层面，不必再多说。你们可以打开任何一本所谓博弈论的现代著作；这个标签并不恰当，因为它绝不限于你们可能想到的那些多少带有约定性的游戏——无论是市场上的垄断与双头垄断之博弈，还是跳棋或国际象棋。

对这些结构的分析，对于主体间性的任何展开都绝对必不可少。无论你们把主体间性的场域界定得多么简单，这种分析总会以某个数量的数值性材料为起点；而这些材料作为数值，正是象征性的。

如果你们阅读我前几天提到的萨特，就会发现他显露出某种极其令人不安的东西：在如此出色地界定了他所设想的主体间关系之后，他似乎暗示，假如这个由想象性相互关系组成的世界里存在复多性，那么这种复多性并不是数值性的，因为每个主体按照定义都是唯一者，并居于整个参照系统的中心。

这一点在他对出发点的分析——即对“自在”与“自为”的分析——中可以成立：他始终停留在严格的现象学层面，因而没有看见主体间场域反倒必然通向一种数值结构，通向这个三和这个四。自从我们开始在这里界定分析经验，我便一直教你们以三和四来定位。

这种无论多么原始的象征系统，通过一定数量的坐标和数目在情境中得到构造；它同语言层面的关系，使我们立即而准确地进入语言层面。不存在其他可以设想的计数方式。我一直在为你们寻找一些例子、支点和说明，以阐明我在这里展开的内容。刚好想到一件事，我便告诉你们——这仍是我讲授中的一个小插曲。就在三天前，我读到一本世纪初的旧书：《所谓美洲的新世界史》（History of New World Called America）。其中谈到一个问题：从语言发生的角度看，它吸引了许多语言学家的注意，甚至令他们困惑；这个问题根本上关系到我们如何设想语言的起源与发生。

一切有关语言起源的讨论，始终沾染着某种无可救药的幼稚。每当人们试图让语言产生于某种说不清的思想进步时——这里有一个被次级加工彻底弄得愚蠢的循环——他们便设想：某种思想进步开始从整体情境中分离出细节、特殊之处和组合要素，并给它们划定边界。

怎么能够假设，思想恰好把握了组合要素，越过标志着动物智能的迂回阶段，并由此进入象征阶段？难道这里不是首先要有象征——即人类思想的结构——才可能用“象”这个词来替代象，甚至用一个圆形的符号来替代太阳吗？

我不知道你们是否意识到这里必须跨越怎样的深渊。太阳这一东西，就其本质和现象而言，恰恰是贯穿现象世界之事物的中心，是光的统一；却突然从它的一个特殊面向把握它，把它做成一个圆——这已经是必须跨越的深渊！难道还要相信，这只是因为太阳看起来像盘子或碟子吗？若真如此，相较于动物智能又进步了什么？什么也没有。太阳偶尔以圆形得到指称时，这个圆本身恰恰毫无价值；它的价值在于，这个圆同一系列其他形式化发生关系，并同它们一起构成象征性的“整体”。太阳在其中占据自己的位置——比如世界的中心，或边缘，这并不重要——并在一个象征的世界中得到组织。

谈到那些思索语言起源、试图在对整体情境的把握与象征性碎分之间建立过渡的人，有一种东西始终令研究者惊异，即所谓整体句（holophrase）。在某些民族的用法中存在整体句；而且你们可以确信，无须到很远的地方去找，在我们的日常通用语言中也会遇到：它们不可分解，确实指向一个作为整体把握的情境。人们仿佛由此捕捉到一条界线，一边是经过情境却不构造情境的动物世界，另一边是作为象征世界的人类世界。

相关知识卡 Holophrase：整体句与不可分解表达

于是，我们仍像在分析中那样行事，把自我象征作用的问题提出来；西尔伯勒正是这样称呼它的。当主体进入疲倦、半睡眠状态时，他刚

才还在追随的思想，可能立即在最初出现的入睡前意象中获得形象化。

分析家们便来说，在具体情境里并不只有这些，这种形象化始终具有意义：人们在其中重新发现冲突、超我和主体的历史。分析家们说得完全正确；但他们似乎没有看到，西尔伯勒并未说相反的话，他只是展示了某个转折，即具象现象的出现。

我在刚才引用的著作中遇到了一种类似现象，即斐济人使用的一条整体句。斐济人用下面这个并非其语言中的句子、也无法再还原为任何成分的表达来指称若干情境：“ma mi la pa ni pa ta pa”。

相关知识卡 Holophrase：整体句与不可分解表达

我并不是说，若按照英语特有的发音去细分，它不会听起来有所不同；但书中没有用音标记录，我只能依照书上给出的拼写大致这样念

给你们听。接下来我来读作者的说明——你们马上会看到，这条整体句所指的东西同我的讲授有多么直接的关系：

- state or events：状态或事件
- of two persons：两个人的
- looking at the other：每个人都看着另一个人
- hoping that other will：每个人都希望另一个人会
- offer to do something：主动提出做某件事
- which both parties desire：双方都想做这件事
- but are unwilling to do：却都不愿意去做。

我们在这里看到一种状态得到了界定——那位民族志学家当然不是主体间性理论家，却极其天真地以堪称典范的精确度把它拆解、界定出来：这是相互凝视的状态，每个人都等着另一个人先决定去做一件必须由两人共同完成的事；事情横在两人之间，但谁也不愿先进去、不愿把自己卷入。恰恰是在这个边界上，某种东西出现……你们看，这完全是相反的情形。

我们必须像往常一样倒转视角的中心。问题并不是发生，不是某种中间阶段，仿佛先有一种把情境作为整体的原始承担——也就是动物行动的层面与方式——随后才通过某种把情境最初黏结进言语方式的中介而发生象征化。恰恰相反，问题在于：属于象征组合层面的东西，正是在边界、在周缘处得到界定。你们不妨替我找一些日常使用的句

子或整体句；相信我，这样的表达不止一个。仔细听你们同时代人的谈话，你们会发现其中包含多少整体句；也会看见，它们总以或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同哪些边界情境相连——在这些情境中，主体悬置于彼此的镜像关系里。

相关知识卡 Holophrase：整体句与不可分解表达

经过这项分析，我们已经倒转了某种视角：那种视角把客体间关系设想为建立在心理学所谓两个客体（two objects）之间自然、互补的满足上。我们走到了哪里？走到巴林特的文章《情感的转移》（On Transference of Emotions）。仅仅标题便预告了文章将在哪个层面展开——我可以真正称之为妄想式层面，取“妄想”一词在技术上和原初上的意义。

文章谈的是转移，而且一开头就告诉了我们：第一段援引分析的两大根本现象——阻抗与转移。人人都知道阻抗是什么。作者也把它同语言现象关联起来，对它作了很好的界定：凡是阻滞、改变、延缓话语流动，或使之完全中断的东西，都是阻抗。但他没有再往前走，没有由此得出结论，转而讨论转移现象。

像巴林特这样敏锐、细致、临床实践精妙，甚至可以说文笔出色的作者，怎么会以一个心理学式的出发点来界定转移，并从这个定义出发展开一篇足有十五页的研究？依照这个出发点，必定先有某种东西存在于内部；于是它必定是某种说不清的东西：感受、情感……

“情感”这个词总是更容易唤起形象，于是人们便谈情感

……而他认为重要的是展示：人的情感如何在某种显然同它们毫无关系的东西中体现自身、投射自身、受到规整，最后——总得说出来——得到象征化。

于是我们谈起国旗、英国的狮子与独角兽、军官的肩章，以及你们想得到的一切——去读一读两个国家与两种不同颜色玫瑰的故事——它们都浮在英国或任何其他共同体的生活表面。这里不乏有趣的例子，例如法官佩戴假发，确实可以令人沉思。但问题究竟是什么？

象征领域在这里被引入，但不是依照它的一般结构、也不是依照它之所以对我们重要的方式被引入……

等作者带来具体实例时，我们将看到应当怎样考察象征问题

……而仅仅被当作一种移置来引入。因为一开始，人们便依照定义把两样东西平行并置：一边是所谓情感，即本来在那里、被当作现实的心理涌现现象；另一边是情感从中找到表达与实现的某种东西。因此，整个问题都从移置角度得到处理。

当然，象征本身在一切作为移置而实现的东西中发挥作用。但全部问题在于：这就是象征的功能吗？是否应当在这种垂直层面上，把它界定为移置？我们很容易看出这是一条歧途、一条错误的道路，因为从这些本身并无错误的根本说明出发，真正显现出来的只是：道路恰好横着走了；它没有朝必须前进的方向展开，而是朝一切都停下来的方向伸展。

随后，辩证法与分析继续援引“山的正面”“桌子的脚”等比喻。我们仍然一直处于语言现象之中。它最后通向什么？人们以为这样就能理解语

言的本性吗？不！它只是要说，转移操作的典型形式归根到底就是：你在生气，却一拳砸在桌上！仿佛我当真是在殴打桌子；这里存在根本错误。然而，作者关注的正是如下问题：

- 行动怎样在其目标上发生移置；
- 情感怎样在其客体上发生移置；
- 现实结构与象征结构之间这种含混关系，怎样沿垂直方向建立起来，即两个世界之间逐点对应的关系；只不过作者并没有世界这一概念，所以也根本无法把它引入。

这一立场因此贯穿全文。按照他给出的分析，转移本身被理解为情感的转移；而在所有例子中，情感转到的都是一个无生命客体。他幽默地提出问题：我并不问你们那个无生命客体有什么想法。事实上，我有意选择无生命客体，因为这种情境更清楚、更简单。否则，倘若我们不把它设定为无生命的——请注意，“无生命的”这个词刚才已经出现在想象性辩证关系的边界上——倘若我们认为他者也是主体，我们便进入一种再也无法脱身的复杂局面，他这样说道。

如果无法脱身，就无法进行分析。事实上，我们近来正一步步走到这里。人们围绕反转移概念大肆铺陈，带着一副英勇气概许下承诺；这种虚张声势的风格本身却流露出某种说不清的窘迫。归根到底，这个顶点、这种延伸与强调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最后没有办法脱身。

我们在双体心理学（two bodies’ psychology）这里面对著名的难题，即物理学中那个尚未解决的表述——二体问题。事实上，只要停留在双体层面，就无法给出令人满意的象征化。

问题在于：事情是否真是如此？是不是沿着这条道路前进，并且首先把转移说成本质上的移置现象，就能实际把握转移现象是什么？相反，一旦巴林特转而用我们的经验——也就是临床经验，分析中在我们这里发生的事情，而不只是黑板上的推演——举例，他便讲出第一个漂亮故事。

有位先生来见他，已经站在接受分析的门槛上。我们很熟悉这种情境：他迟迟下不了决心，已经见过好几位分析家。最后，他来见巴林特，给他讲了一个很长、很丰富、很复杂的故事，里面有许多细节，讲到自己的种种感受和痛苦。就在这里，我们的巴林特……

我眼下正在诋毁他的理论立场，天知道我这样做多么不情愿；

但这至关重要，因为问题在于知道我们正走向哪里

……显露为这个故事里活生生的绝妙人物。这里显露出来的，并不是我们在那套令我们日渐腐朽的暗语中所谓的反转移——那套暗语把憎恨某个人叫作“矛盾情感”，把自己是个蠢货叫作“反转移”。

巴林特并不是蠢货。他听这个人说话。他已经听过不少事、接触过不少人；他成熟老练，是个有分量的人，是一个人、一个存在者。他听不懂……就是这样！有些故事就是听不懂。你们听不懂一个故事时，先别马上责怪自己，不妨想：“我听不懂这件事，一定有它的意义。”巴林特不仅听不懂，还像一个听不懂的人那样行事，并且认为，既然自己听不懂，他就有权听不懂；而且其中必定有某个原因。他没有对来访者说什么，只让他再来。那人回来，继续讲自己的故事，还不断加码；巴林特仍然听不懂。显然有什么地方不对：这些事情每一件都像其他事情一样可信，可它们就是拼不到一起。

这是一种临床经验，我们会遇到这种事情，而且必须始终极为重视。有时，它会把我们引向某项诊断，即在某些病例中或许恰好存在器质性因素。弗洛伊德就是这样教我们在某些病例中作诊断的。但这里并非如此。在这段复杂故事的视野中，没有出现任何异样的东西。于是，巴林特对他说：

> “真奇怪，您给我讲了许多非常有趣的事情，但我必须坦白：您的故事，我一点也听不懂。”

这时，那个人眉开眼笑，脸上绽开灿烂笑容，说道：

“您是我遇到的第一个诚实的人，因为我刚才告诉您的这一切，我已经讲给您的若干同行听过；他们立刻从中看出了某种有趣、复杂、精巧的结构之迹象……但我把这些都告诉你们，只是为了测试，看看您是不是和其他人一样，是个江湖骗子、一个撒谎者。”

这个例子很有意思，因为你们应当能感受到以下两个层面之间有多么宽广的音域：

- 一边是黑板前的巴林特，他向我们说明英国公民的情感如何移置到英国狮与两只独角兽上；
- 另一边是履行职能时的巴林特，他以聪明的方式谈论自己亲身经历的事。

你们意识到了吗？当我们只是作出一句毫不相干的评论，说“这一切都很好”时，难道不是已经开始步入歧途了吗？说到底，这个人有权这样做。但这难道不是一种不经济的方式吗？难道不是绕了很长的路吗？

这样一来，我们便在一个毫不相关的层面上重回歧途。问题并不在于它经济还是不经济。这种做法在自身层面上完全成立，而且意义重大。因为说真的，如果转移中确实牵涉某种东西，而巴林特把它恰好定位在分析经验开端，是完全正确的，那么这就是言说在其中撒谎的层面；并且恰恰是：

- 因为言说会撒谎，
- 因为它确立谎言，把谎言引入现实，也就是引入某种并不存在的东西，
- 正因为它引入了并不存在的东西，它也能够引入确实存在的东西。

因为在言说之前，没有任何东西“是”或“不是”。一切无疑都在那里；但只有随着言说，才会有“是的东西”——真的或假的、确实是的东西——以及“不是的东西”。正是随着言说这一维度，真理才在现实中被挖出；在言说之前，真理毫无理由进入现实，因为那里没有真的、也没有假的，一切都处在情境之中。在言说能够进入并把某种东西带入以前，根本没有任何真或假。那么它带入了什么？

我刚才谈谎言，是因为这里确实涉及谎言，但还有另一些层面。在今天分别以前，请你们设想：我们把这些层面标示在一个有三个顶点的三角形里：

- 一个顶点上，恰好放置谎言；
- 另一个顶点上，放置一种并非谎言、却同样由言说引入的东西：误认（méprise）。我有意说“误认”，而不是“错误”；以后我会再谈。
- 还要放什么？歧义。我们以后也会再谈它。

言说恰恰奠定了真之层面，而且是以自己的行动奠定它；正因如此，在这项真理奠基背后，言说总会留下某种超出这项行动的东西——它在奠基这一事实背后，重新提出言说究竟凭什么完成了奠基。言说依其本性不仅注定具有这种歧义；如果它在本质上不再歧义丛生，就不再是言说。

正是随着言说领域的确立，现实中才被挖出——可以说是对称地——这个孔洞、这道存在的裂口。你们很清楚，一旦我们试图置入“存在”这个概念，它就显得同言说一样难以把握。因为存在——“道”本身——只存在于言说的层面；言说把存在的这个凹空引入现实的纹理。二者彼此维系、相互平衡，完全互为相关项。

巴林特带来的另一个例子……它的意义丝毫不亚于第一个。人不禁要问：他怎么能够提出这些例子，甚至还把它们同移置的层面相连——转移本身正是在这个移置层面被放大的。这是另一个故事：有位可爱的女患者，呈现出某些英国影片里所谓 chattering 的典型形象，也就是为了什么也不说而说个不停。她的治疗时段就是这样度过的。还有一

件事使这个案例更有意义：她也已经接受过分析，而且曾在另一位分析家那里做过很长时间的分析。最后，她落到巴林特手里。巴林特听着她说，而且很清楚——患者自己也承认——每当有什么事情令她烦恼，她就随便说些什么把空档填满。

故事的决定性转折点在哪里？有一天，患者又以同样的方式艰难地度过一个时段以后，巴林特终于点中了当天真正存在的东西，也就是她不愿说出的东西。她不愿说的是：一位与她先前分析毫无关系的医生朋友，给她写了一封求职推荐信，信里说她是个完全［……］的人。我们由此走得更远，进入劳动的辩证法，因为劳动已被嵌入象征、嵌入法。

这一天，他使主体绕着自己转了一圈，并找到了整个分析将围绕其转动的枢轴时刻；分析终于可以从这里真正进入某种东西。他之所以找到这个时刻，是因为他让患者承认：对她而言，问题始终正在这里——绝不能让所有人最终知道，人们把她看成［……］，也就是一个要对自己言说负责的人。

因为，如果她的言说会约束她，她就必须——如同刚才那个例子——着手工作，进入劳动世界，进入同质的成人关系世界。她始终关心并且非常明白的，是人们对待儿童言说的方式……

当然，这一切并没有完全照我此刻的说法表述出来；

但已经足以使我着重指出的东西获得正当性

……同人们对待成人言说的方式之间有何差异。她不愿被迫作出承诺，不愿被定位在这里或那里——成人世界就是这样显现的，人们在

那里多少会沦为奴隶。她为了什么也不说而喋喋不休、用空无、凹空和空气填充治疗时段，同这一点之间正有这样的关系。

此外，我们可以停下来片刻，想一想儿童也拥有言说。儿童的言说与成人言说之间的差异，绝不在于儿童的言说是空的。儿童的言说同成人的言说一样充满意义；甚至正因为它如此富有意义，成人才一直为之惊叹：

“这个小宝贝多聪明啊！你们听见他前几天说什么了吗？哎呀，亲爱的！……”

但关键恰恰全在这里！正如刚才在想象性关系中介入的偶像化要素一样，这种令人赞叹的言说是一种超越性的言说，是来自天上的启示，是小神谕示！然而它显然不会对儿童构成任何约束；而一旦事情不顺，人们便会费尽力气从他口中逼出能够使他负责的言说。

天知道，成人的辩证法在这里会设法滑向何方！我们太清楚不过了！但问题就在这里：言说的价值在于它进入一种辩证法，也就是说，人们把主体系于他自己的矛盾，并告诉他，我们是在让他签署某种东西。

到了分析情境更深入、发展得更充分的一点，也就是转移情境中……

这并不是我说的，而是他说的；我只是在评论文本，而且他说得对

……他把这件事当作转移的例子。你们看到，这里涉及的显然是完全不同于移置的东西。

这里又一次涉及言说的价值；这一次不再把言说视为根本歧义的创造者，而是把它视为契约的严格象征性功能。契约把主体彼此约束、联结起来，使他们进入一种最典范的人类行动；这种行动最初、从根本上奠基于象征世界的存在，即法与契约。

巴林特作为分析家置身具体实践时，正是在这个层面定位、察觉，并使自己与主体之间的情境发生转动。从这一天起，他便能够向患者指出各种事情：

- 她在自己的各个职位上怎样行事：每当开始取得所有人的信任，她便会设法做一件小事，让自己被扫地出门；
- 她找到的工作形式本身也很有意义，细节十分有趣：她在电话里接收信息，再派别人去做各种事。这些调度工作使她感到自己置身情境之外；但最后，她总会设法让自己遭到解雇。

转移关系正是在这个层面，以某种方式围绕如下事项发挥作用：

- 或者是象征关系的确立，
- 或者是它的延伸，
- 或者是对它的支撑。

我们看到，转移本质上在言说功能及其属性的领域内展开：其中有属于想象界秩序的各种牵涉、投射与接合，但这一切都完整地定位在象征关系之中。

今天，我只是借助对巴林特一篇格外有意义的文本所作的这点评论，把你们带到这里。这意味着什么？这个言说的世界并不只有一个平面。依照定义，言说始终带着暧昧的背景，并一直伸展到不可言说之处——在那里，言说不再能够把自己说成言说，也不再能够把自身奠立为言说。我们在这里抵达一个彼岸。但你们看到，这个彼岸并不同于我们在主体心理学中寻找的彼岸。

它就在言说自身的维度里。相较于人们习惯到主体某种表情、痉挛或躁动中寻找的那个［另一个］彼岸——即言说在心理和情感层面的相关项——言说的这个彼岸反倒处于另一侧，是一种此岸。问题正是在这里。分析所实现的根本成就，也正是沿这个方向被挖掘出来的。我们谈论主体的存在时，并不是指朝其心理属性的方向深入，而是指深化言说经验——分析本来就位于这项经验之中；这也让我们能够更好地认识分析情境究竟是什么。如果一定要把分析情境同某种东西相比，它恰恰属于我刚才援引的秩序：言说的交换、象征关系；某种从一开始就由一项游戏规则构成的东西。

分析经验被限定在某些受规则制约的用法之中，这些规则确实十分醒目而且悖论重重：

- 它是一场对话，却是一场尽可能接近独白的对话；
- 它在其中展开的整项游戏规则，都处在象征秩序中。

你们跟上了吗？这就是我今天想借一种反差加以举例说明的东西：一边是巴林特给出的具体例子，以及他正确辨认出的典型转移现象；另一边则是他对这些现象给出的说明。当然，故事结束时，在他看来，

情境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这两个人对言说的运用与使用，仿佛那才是情境真正的动力。

你们看到，这是一种过度外推。事情完全不同于儿童进入劳动世界以前可以使用的那种既得意又无辜的言说，也不同于一个人身处劳动世界，却有意维持一套毫无意义的话语。

只有从某种已经建立的关系作出推论，才能把两者联系起来；二者的基础并不相同。它不只是童年情境的异位，而是在尝试维持一种非典型情境：人们以某种方式在我们不断谈论的原初之爱层面构造它，并试图用下述设想替它辩护，认为这里涉及某种探求［……］

从某些角度看，这是真的，但并非从所有角度都如此。倘若把自己限制在这个角度，就可能踏入错误的视野，并促使我们作出令主体迷失方向的介入。未必应当告诉主体："这就是某某童年关系。"事实已经证明这一点：让情境发生转动的，并不是巴林特之前那位分析家的做法——告诉患者她正在重现童年的某个情境。巴林特使事情围绕一项具体事实发生转动：这位女士当天早晨手里有一封可以帮助她获得职位的信。这件事恰好位于言说功能的层面，涉及通过替某个人负责而给出的保证。

恰恰因为巴林特没有把它理论化、也并不知道，却实际置身这一层面，他才产生了效力。你们由此看到，正确定位事物何等重要。不过，在结束以前我仍想指出：这套理论本身发生了错位和降格；我们这里要考察的，正是理论为何发生这样的移置，它有什么意义。下一次，我们将通过这个言说的小三角，连同它的功能及其在存在中的回响来处理这一点。这将是下次讲授的主题。我甚至会毫不迟疑地借助

空间图式，在黑板上为你们画出某种小型金字塔式的表示。另一方面，我也会指出：如果阅读文本，就会发现——正如刚才这些例子所显示的——极其明亮而富有解释力的实例。巴林特当然是一位出色的临床家，不可能认不出自己实际活动的维度。

参考文献中有一处引到一个被他称为"我们的一位同行"的人写的对句——天哪，为什么不能这样称呼呢？——作者是约翰内斯·舍弗勒。十七世纪初，他曾接受相当深入的医学教育；那种教育在当时大概比今天更有意义。他以安格鲁斯·西莱修斯之名写下若干极其惊人的对句，讨论［……］与神性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概括这些对句的总轴线，却不能简单说它们是神秘主义作品。它们涉及神性，涉及人的言说功能周围那种本质上的创造性——人的言说无论把自身的深化推进到多远，甚至最终归于沉默，仍环绕着这种创造性。

巴林特引用的两行诗很美；它们所讨论的不啻是存在，只要存在同主体实现过程中的偶然性、偶发性相连。巴林特竟能找出这样的东西，很有意义，因为这表明他熟悉这些文本……安格鲁斯·西莱修斯的作品在所谓"神秘主义"文本中格外惊人——姑且用这个加上引号的称呼，事实上它或许并不十分准确。他的观点始终不大正统，给所有宗教思想史家都提出了极其震撼的谜题。这绝非偶然。他是所谓德国思想周期中一个具有标志性的人物，这一周期从［……］一直延伸到［……］。他的身影出现在巴林特的文本中，当然不是偶然。我这里只向你们指出这一点，同时也是为了告诉你们：正是在深化言说行动的视角里，我们才可能设想彼岸；它不仅是［……］，而且完全是这一进展的根本维度。照巴林特及其他作者的理论去相信、去追随，这一进展最终会通向我曾在一次谈话中向你们展示的那种自恋性重新整

合或喷发；那些作者，尤其是巴林特，似乎把它看作分析进展的最终项。

我曾在黑板上用一支箭向你们标出这种东西——O 点仿佛向后退到某处。对我们而言，它必须使弗洛伊德那条通常依照一种极其粗糙、草率的空间化来理解的公式获得完全不同的意义："本我所在之处，自我应当到来。"只有朝深化言说行动的方向，我们才能真正找到它的意义。若没有认识到这一维度，就不可能摆脱那套图式：它最终把对本我的重新征服变成一场幻象行动。自我在一个"自身"中看见自己；这个"自身"不过是比它此前经历的一切更加完善的最终自我异化。倘若我们不努力形成关于言说行动本身如何具有构成作用的观念，你们就无法看见事情真正是什么：这里涉及的不是某种扩大，不是自我重新征服某块场域、某个斜面或未知的边缘，而是一次真正的翻转、移位、位置变换，是自我与本我之间上演的一小段小步舞。

相关知识卡 Wo Es war，soll Ich werden 的译法与伦理读法

安格鲁斯·西莱修斯《基路伯朝圣者》第二卷第三十对句[注1]：

> [注1] 安格鲁斯·西莱修斯：
>
> 《基路伯行旅者》，Rivages 口袋本，2004年，第140页："人啊，成为本质性的：因为当世界消逝，偶性随之消失，本质则留存。"
>
> 《基路伯朝圣者》，Albin Michel，1994年，第51页："人啊，回到你的本质；因为当世界过去，诸偶性便消失，而本质仍然存续。"
>
> 《基路伯朝圣者》，PUF，1964年，第147页："成为本质性的！任世界死去；偶性消失，本质仍然存续。"
>
> 《基路伯朝圣者》，Aubier，1946年，第115页："人啊，成为本质性的：因为当世界过去，偶然性消失，本质仍然存续。"

“人啊，在本质上成为你所是者；因为当世界衰落……”

这里所涉及的，确实是一种暮色、世界在想象中的衰落；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位于人格解体边界的经验。神经症患者或正在接受分析的主体，从这种关系出发……

……“就在这时，偶然之物、偶发之物、创伤与历史中的断裂都会坠落；而存在便由此构成。”

为了尽可能贴切，大致可以给出以上这种带有评注的翻译。

我极力建议从事分析的人找来安格鲁斯・西莱修斯的作品。篇幅并不很长，也已有法译，可以在 Aubier 出版社的《基路伯朝圣者》中找到。你们还会在那里看到许多其他适合沉思的东西：

- Wort（言词）与 Ort（地点）的关系——这得益于德语中可能形成的双关；
- 以及有关时间性的极度凝练而且完全准确的格言。

下一次，我也许还会有机会触及一些极其封闭、却又能打开道路的公式；它们是首要而非凡的沉思对象。我们显然面对一种经验，它同安格鲁斯・西莱修斯写作这些作品的生命阶段相连，也就是他学习医学的时期。他的晚年受到宗教改革与反宗教改革的教义战争扰乱，采取了极其激烈的立场。但《行旅者……》发出的声响透明、晶莹。它无疑是人类沉思存在的某些时刻中，最具标志性的例子之一。

这确实是一项重要的东西；对我们而言，它激起的回响比人人都读、却无人理解的圣十字若望《灵魂的暗夜》更加丰富。

对于想进入这一层面的人，我怎么推荐这部卓越文本都不为过。

第20课 · 1954年6月16日

格拉诺夫

拉康

我们的朋友格拉诺夫有一份报告要向我们宣读；它看来正接续我们最近和当前的论述。我很高兴看到这样的主动提议，它完全符合我希望在这里保持的对话精神——别忘了，这首先是一场研讨班。我不知道他今天上午会带来什么。现在立即请他发言；随后我们再看，是由此分出一条新路线，还是回到上一回正在展开的主线。

W. 格拉诺夫

我今天想提交给各位的东西，也许根本没有什么好理由。倒有若干坏理由，得从我某种喜欢拉人入伙的倾向中去找；这或许是我的缺点。不过，有时我需要弄清楚：我们固然孤单，却是否也同样孤立。我感觉，我们并没有那么孤立。

直到几天以前，巴林特还是议程中的主题。拉康博士谈到他时曾说，自己仿佛感到“一阵小风正在转向”。我现在想向各位提交的，不过

是“风向正在转变”的一项小小迹象。事实上，某些概念目前正因若干理由受到重新质疑。拉康博士提过其中两点：

- 一方面，若干术语的意义在使用中逐渐钝化；
- 另一方面，由此产生的晦暗，又催生出一个次级问题：我们必须重新调准彼此的音调。

几天前，这里围绕巴林特的一篇文章谈到“情感的转移”。我们当时觉得，如果他曾经研究自己讲述的临床案例——即使不完全照我们的方式，至少也以一种能使他在构成我们构想基础的三个层面上解释它的方式——他本可以免于走到如此极端的立场。碰巧就在1954年春天，一本昔日辉煌、如今已经严重衰落的期刊里，有几位不太知名的作者也提出了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并非同我们阐发已经抵达的点相关，而是同它的出发点相关。

分析中某种使问题愈发晦暗的取向，最终把作者们带回一个显然已经结束的循环，迫使他们重新提出根本问题。精神分析运动的历史在这里不过服从了人类活动其他领域的法则：［……］曲线的半径同［……］成比例，把旅行者带回出发之处。为了走出僵局，这些作者同巴林特一样，尝试了不同于我们在这里所熟悉的办法。

在上一回研讨之后，我想通过以下两篇文章，让各位隐约看到这一点：

- 一篇是查普曼·伊沙姆的《情感、本能与痛苦—快乐》（“Emotion, Instinct and Pain-Pleasure”）；
- 另一篇是贝尼特发表于1954年4月《精神分析评论》的《梦的深度研究：其推论与后果》（“A Study of the Dreams in Depth, Its Corollary and Consequences”）。

先作一条简短说明：两位作者都诉诸对梦的根本研究来展开论证，这在我看来并非无关紧要。

伊沙姆的文章从一组术语的混乱出发：Need 是“需要”，Trend 则被译成“驱力”或“本能”。他问：应当怎样理解“情感”（émotion）这个词？他试图沿两条经典路线来接近它，一条被他称作“经验性”路线，另一条称作“表现性”路线。

这两条路线都没有充分考虑梦；梦恰恰说明了情感的另一面，被他称作“观念性”或能指的一面。他由此投入一场辩论，颇令人想起贝纳西有关本能的报告所引发的讨论。他谴责那种为了刺激而回避意义的做法是前科学的——我以不同方式翻译 Meaning。就他本人而言，他更愿意引入客体概念。

弗洛伊德发现，情感不能被移置——尽管他在这一点上曾有矛盾——但客体可以移置、彼此替代、倒置等等。对我们的理解而言，这是一项重大进步，但其应用并不出色。他在这里提到1950年的专题讨论会《感受与情感》（Feelings and Emotions）。

弗洛伊德作出一个表面平淡无奇的“决定”：设想有一种中性的、可以移置的能量，而不设想一种情感（affect）发生转化；伊沙姆认为这个决定格外重要。事实上，在人们证明情感能够直接——甚至可以说自发地——倒转以前，他宁愿坚持自己的构想：情感是症状或表达，不能自主地相互转换。

我认为这项陈述有一项优点：它让我们能够衡量朝相反方向施加的压力；反压力可以显示压力的大小。观念极易转向其反面，驱力也有一种相似却并不类同的倾向；但精神分析从未证明，情感的倒转可以成为独立于需要满足或客体偏离的过程。情感源于需要与客体。恰恰当他的论证愈加晦暗时，他安置了自己整个构想将围绕旋转的枢轴。

他说，弗洛伊德未经任何过渡，便从现实客体跳到作为内在动机的本能。他提到弗洛伊德从费伦齐那里借来的那个令人发笑的梦，梦中有个人出于悖论性理由大笑。按照伊沙姆的说法，弗洛伊德在这个梦中未经任何过渡，便从现实客体跳到作为内在动机的本能；而这项遗漏——这里指遗漏了他所谓的心理客体——使讨论变得晦暗，也使人们把本能安置在本我中，赋予它一个独立起源；这一点很值得怀疑。

本能固然可以从生物性母体中升起，也可以从现实的或心理的、内部的或外部的客体出发。不过，伊沙姆说，有一项事实值得指出：猫在抚摸下发出呼噜声；给它看一只老鼠，它立即变成食肉动物。第二项事实是：给一个孩子看一辆流线型卡车，即使他已经有十二辆，也还会想要它。第二个例子的选择并非无关紧要；它使伊沙姆得以证明，情感并不是本能或 need 的度量。心理快乐不能同心理客体分离；没有有意识心理表象而被感受到的情感，会留下一个心理空洞。

于是，他提出以下最终命题：情感从一次本能释放中取得他所谓的“情感本性”。这项释放由有意识或无意识、现实或心理的客体以及 needs——各种需要——所触发，或者更确切地说，由它们启动。需要可以归为客体，尽管其位置仍然不清楚。这样，他以为自己已经洗净双手、摆脱“本能—驱力”的问题，却在第一个转弯处又重新遇见它。

最后一项命题是：情感因其整合性和综合性本性而无法得到直接理解。心理客体的参与为联想过程打开了门。谈论“情感的表达”没有任何意义。说一种情感产生另一种情感，是一种需要更充分认识“快乐—不快乐”的观点。还必须质疑如下用法：他认为，所谓能够移置的情感，最好以“客体动机”来表达；情感被说成从未得到证明的需要之感觉性知觉；无意识情感或情感等价物——不过对于后者，他要宽容一些……

拉康——说慢一点……

W. 格拉诺夫——……无意识情感或情感等价物。

拉康——您刚才说“所谓能够移置的情感……”

W. 格拉诺夫——最好以“客体动机”来表达；情感被说成从未得到证明的需要。

拉康

这就是人们一直谈论的内心知觉；每当遭遇各种僵局，它都是最后可以诉诸的东西。

W. 格拉诺夫

“无意识情感”或“情感等价物”也是必须加以质询的术语，尽管作者对第二项——即“情感等价物”——较为宽容。最后还有一个用法无法得到辩护的术语：把情感说成对刺激的反应。

第二篇文章出自贝尼特。他以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处理同我们所关心之事并不陌生的问题。他本人注意到，考察梦的两种根本方式之间存在一道裂口：

- 要么把梦看作无视其意义的时代错置过程；
- 要么把梦看作某种有待在另一个现实层面发现的意义之表达；但这同样会使梦自身的维度挥发殆尽。

难道在某种意义上存在两种现实吗？因此，他提出自己所谓“遭忽略的钥匙”，主张直接研究梦与象征。这是什么意思？

我把内容整理如下：

- 梦是一种无意识经验，是最纯粹的无意识经验，同时又是纯粹象征的领域；
- 梦中的象征不同于意识中的象征。

梦的现实性之所以减弱，是因为分析梦时，我们离开了梦自身的领域。即使现实并不具有两个面向，我们首先必须发现的仍然是：象征实际上是什么？事实实际上是什么？到了这里，文章的声调已经开始接近我们在这里看到的东西。

研究越是深入，就越令人相信：谈论象征时，必须排除某些标准。例如，象征的本性未必是主体性的，也未必是客体性的。对主体性或客体性的判定，并不会随着研究层面的深入而改变；象征也不会变得更加或更少物质化。按照贝尼特的说法，我们看到什么？随着象征演变，它变得愈发精细，字面上承载着越来越多的意义。他越来越把它称作“意义形式”（meaning form）。

我插入一条简短说明：英语 meaning 可以有若干含义：

- meaning 是意义、含义；
- 也是意见、所说之意；
- 它几乎等同于德语 Meinung——“Was meinen Sie?”，即“您怎么看？”我之所以沿用这个词，是因为无法在这里停下来给出确定译法。

因此，象征是现实的一个基础面，甚至是现实的首要基础面；这是他的第一项命题。Meaning、意义本身就是一种现实。他说，象征界就是我们凭借自己的装置、自己的 apparatus，对各种意义形式所作的经验。

他说，至于我们为使它现实化而做什么，则完全是另一回事。这是贝尼特的第二项命题。必须说明，我将使用的词是英语 actualisation 的翻译。

拉康——也就是“实现”。

W. 格拉诺夫

然而，在英语中，actual　意味着现实的。我仍保留这套词汇，因为我不知道它是否出现在我刚才所述的部分，但有些地方也确实出现了“实现”一词。他说，“现实性”（actuality）是另一个基础面，是存在的另一个动力面。下面引用原文：

“象征是跨维度的，是意义的统一容器；这构成它的现实。构成它现实的，是它作为一个区别于现实性的焦点——区别于或使它同现实性相区别——事实则是有维度的、分离的、得到分化的；反过来——或者更准确地说，从相反面看——一个纯粹事实将没有意义（meaning）、没有含义。”

贝尼特在自己所谓的“跋”中作了总结。我把开头引给你们；这篇跋不仅必须联系全文其余语境来读，也必须联系分析运动此刻在世界上的整体处境来读。

“然而可叹的是，事情到此为止！它本应在我们的理论与实践中显示出应用，同今日的情形形成完全不同的面貌；本应出现一种心理学，把事实的象征化与象征的事实化承认为存在中最终的、最后的过程！”

他又在结尾段落中回到这一点：

“在显梦及其所揭示的东西背后，我们是否没有充分评价梦的表达本身？我们是否没有‘预先闭除’”——他用了一个奇特的词——“一种正确看待梦之解释的观点？因为从根本上说，如果梦在事实层面是退行的，那么它在象征层面就是前进的。”

我想，有关这两篇文章的报告应当在这里停下。

拉康

有谁想提问题？毕竟，我们的朋友格拉诺夫刚才讲得有些快。这两篇文章篇幅不小，而且具有很高的理论水准；你们请他进一步说明，完全可以理解。

塞尔日·勒克莱尔——他讲得太快了，至少第一部分是这样。

拉康

是的，确实，您讲得有点快。这可不对：既然带来了有意思的东西，就必须好好解释。现在别再照着笔记，重新讲一讲您认为第一篇文章最重要的地方。

这两篇文章同我们所做的工作彼此会合，只是分别把注意力集中在不同的点上。第一篇文章显然着重强调情感所返回、所指向并从中取得规定的东西；作者把它视为我们最终要面对的现实，仿佛是严格意义上超出我们经验的彼岸，同时又是我们经验的对象。他需要在某处把握这个对象，让它尽可能类似于我们在其他层面拥有的对象。他的说明特别集中在哪一点上？

W. 格拉诺夫

集中在这样一点：按照我们的构想，情感不能在生物层面被某种方式操纵；它也不能作为一种自主的、自发可理解的、自身即具表现力的过程，服从分析中通常描述的倒置、移置法则，也不能通过施加刺激来解释。接近它的唯一方法，是把情感理解为处在作者所谓的生物性母体中——眼下由“本能”一词覆盖——但情感的调制、存在与启动都

来自心理客体。这些心理客体就是他所谓的 need；正如弗洛伊德已经表明的，它们可以在意义层面得到理解，也就是可以被凝缩、移置、替代，以种种方式改变和乔装。

奥克塔夫·曼诺尼——这里麻烦的是 need 这个词。

拉康

当然，因为他找不到更好的词。格拉诺夫在分析中立即强调，need 几乎就是我们所谓文本中一个不恰当的词；它在这里的用法，只有通过全文才能把握。这个词只在自身语境中成立。

W. 格拉诺夫

况且，他是绕着这个词做了一连串花式转身才把它引进来的。他说的一切都落在动机层面，处理得十分狼狈。

拉康

不是吗！亚历山大写过一篇重要文章——也许有一天我们可以谈谈——题为《情感的逻辑》（“Logic of Emotions”）[注1]。他凭这个题目无疑已经进入分析理论的核心。不过，无论这个题目本身还是文章的全部展开，都包含着这篇新文章带来的同一项质询：这里纯粹而简单地把一项辩证法引入了我们通常看作情感层面的东西。事实上，亚历

山大的文章正是从那套著名的逻辑—象征图式出发；弗洛伊德曾用它推导妄想的不同形式，即否定“我爱他”的不同方式：

> [注1] 弗朗茨·亚历山大：《情感的逻辑及其动力背景》（“The Logic of Emotions and Its Dynamic Background”，1935），收入《精神分析的范围》（The Scope of Psychoanalysis，1921—1961），纽约：Basic Books，第116页。

- 爱他的不是我；
- 我爱的不是他；
- 我不爱他；
- 他恨我；
- 甚至是他爱我！

由此最终推演出各种妄想形式：嫉妒妄想、激情妄想、迫害妄想、钟情妄想等等。我们在这里看得再清楚不过：这些东西已经构造于一个不仅是象征性的、而且是高度象征化的层面，因为它已经引入语法上最复杂形式的全部展开。只有在这个层面，我们才能把握前意识秩序中所发生之事的不同转化及其新陈代谢本身。

第一篇文章确实有这样的价值：它逆着当前分析理论的一整个倾向而行。第二篇在我看来更加有意思，因为它试图……我要强调，格拉诺夫刚才就“用法”作出了极有意思的说明；这是我第二次援引“用法”一词。

归根到底，我们将在这里看到什么？为了建立正确的象征理论，我们必须始终想到：意义、倾向以及某种思想坡度投入其中的层面究竟是

什么。严格说来，这篇文章是在寻找：意义指向怎样的彼岸、怎样的现实、怎样的事实——按照文章的说法。

然而，这样一来，你们永远什么也理解不了，只会不断走上某种无路可通的道路。目前分析理论抵达的僵局已经把这一点显示得很清楚：一个意义从来只指向它自身，也就是指向另一个意义。因此，“用法”这个词极为重要。

我们从这里出发：

- 从我们眼下讨论之事本身的例子出发——我们通常就是这样做的：从已经发生的东西出发；

- 而且，只有把 need 同它在文本若干段落中的具体用法联系起来，我们才能正确解释这些文章。

同样，meaning 一词在语境中也有一整组参照，由此可以看出它在何种［……］词源学程度上被使用。不过，每当我们在语言分析中寻找一个意义时，唯一正确的方法就是把它的各种用法汇总起来。

例如，如果你们想在法语中把握“main”（手）的意义，就必须列出 main 一词的各种用法。不能只列出表示手这个器官的 main，还包括 main-d’œuvre（劳动力）、mainmise（控制、掌握）、mainmorte（永久管业）……正是这些用法构成 main 一词的全部意义；更准确地说，正是各种用法之和构成这个意义。重要的是看见：分析所处理的正是这种东西；我们根本不必耗尽精力，诉诸某种需要另行解释的现实，来说明所谓隐喻性用法。

在某种意义上，一切用法始终都是隐喻性的。因此，隐喻并不像琼斯在《象征主义理论》一文开头所认为的那样，是某种必须同象征用法区别开来的东西。假如我对世界上某个受造或未受造的存在者说“我心中的太阳”，若说我之所以这样称呼它，是先作了某种比较——“你对我的心，就像太阳对……”等等——那就完全错了；琼斯在那篇文章开头正是这样认为的。

比较只是后来对某种东西的展开；那东西涌现的瞬间，不仅包含一组意义，还使某种关系涌现为存在，而它远比我当下能够阐明的一切丰富。它甚至包含后来可能进入其中的所有东西，以及我以为自己没有说出的东西。首先，仅仅由于作出了这个表述，我、我的存在、我的告白、我的祈唤便进入象征领域；它还意味着这轮“太阳”温暖我、使我存活，并且是我引力的中心。它同样包含瓦莱里先生所说的“阴影中阴郁的一半”[注2]：太阳也会使人目盲，并给一切东西蒙上某种虚假明证与欺骗性的光辉。可以说，最大限度的光明也是一切晦暗的源头。

> [注2] 保罗·瓦莱里：《海滨墓园》：
>
> “……从光明到无情的武器！
>
> 我把纯洁的你伸向最初的位置，
>
> 看着你自己！……然而返还光明，
>
> 须有阴影中阴郁的一半……”

这一切都已经包含在这项象征性祈唤中；它通过象征本身的涌现，逐字地在人类存在者之间创造出一种存在秩序。你们会对我说：“可总有一些不可还原的表达吧”；在它们以外，我们或许可以试着把这次象征呼唤的创造性发出还原到事实领域，并找到更简单、更切近、更有

机、更动物性的公式。你们自己试一试，就会看到：你们永远无法走出象征世界。

即便诉诸有机征象，情形也是如此。《熙德》开头，公主为了向莱奥诺尔表达、传达自己对那位年轻骑士的爱恋之情，说道："把手放在我心上。"显然，有机征象在这里仍然只是被祈唤进告白中，作为一项见证；而这项见证只有在如下言说中才取得重音与价值：

"我记得如此清楚：宁愿流尽鲜血，也绝不自贬身份、否认自己的等级！"[高乃依：《熙德》，第一幕第二场]

也就是说，恰恰因为她禁止自己拥有这种感情，甚至几乎无法相信别人会相信她，她才转而诉诸并祈唤一个事实性要素。但这个要素只有在由这套情感辩证法勾勒出的整个象征世界内部，才真正取得用途、功能与意义——那是拒绝自身的情感，或者是一种暗中遭到拒绝承认的情感。

你们看到，我们又回到了上回论述结束的那个点。每当置身言说秩序，一切围绕它而获得定位与秩序的东西——正是我们在言说边界上遭遇的领域——都按照言说层面取得自身的意义与重音。因此，深入这一层面、看清言说秩序所包含的一切、它所确立的一切，以及它在现实内部确立的整个另一重现实，是如此重要。

因为相对于言说秩序，一系列问题已经得到解决。尤其是情感的这项辩证法问题——情感能够倒转、能够受到抑制——已经由这样一个事实得到解决：象征秩序本身引入了处于它的限度、处于这一象征秩序边界上的整个秩序；其他秩序——想象界与实在界——由此各自取得位置与安排。

我再试一次，让你们感受到这一点。我们来编一则小寓言：有一天，奥德修斯的伙伴们……你们知道，他们遭遇过无数不幸；我想，那趟旅程几乎无人走到终点……由于他们那些糟糕的倾向，他们变成了猪。当然，变形这个主题始终令我们感兴趣，因为人与动物的界限问题恰恰在这里提出。

于是，他们变成了猪，故事继续。必须相信，即使身处猪圈里，他们仍同人类世界保持着某些联系——而猪圈毕竟也是一个社会。在猪圈的咕噜声中，他们彼此传达种种需要：饥饿、口渴，乃至肉欲与群体精神。说到底，我们该怎样看待这些咕噜声——它们是送往另一个世界的某些消息吗？总而言之，奥德修斯的伙伴们说：

“我们想念奥德修斯，遗憾他不在我们中间；我们想念他的教诲，想念他在我们的生命中曾经是什么。”

从奥德修斯伙伴那里传来的咕噜声究竟是什么？猪圈封闭空间内积起一片丝滑的声响，是什么使某种东西最终能够穿过它而抵达我们？这是一项言说吗？你们为什么会说这是一项言说？是因为某种根本上具有矛盾情感的感受在其中得到表达吗？另一方面显然，奥德修斯是个相当令人头疼的向导。既然伙伴们已经变成这样，究竟是什么使这种交流形式毫无疑问地在你们看来是一项言说？

首先，最一目了然的正是这一层意思：这里存在怀疑。说真的，他们既然已经变成猪，这些猪却还在想念奥德修斯的在场。你们由此已经把握到言说的价值。换句话说，变成猪的奥德修斯伙伴想让人相信，他们仍然保有某种人性；此刻表达出的言说以及对奥德修斯的怀念，恰恰是在要求别人承认这些猪仍是奥德修斯的伙伴。事实上，言说首

先就在这里、定位在这个维度：言说本质上是获得承认的手段。它首先处在这里；而在它背后的东西则绝对深不可测：

- 这是真的吗？
- 还是不是真的？

这在某种意义上是一重最初的幻象；它确实向你们保证，你们已经身处言说领域。但仔细看这里涉及什么：言说并不是相对于一种本身无形式、在此本质上尚未构成的现实而出现——每当进入情感与感受的秩序，我们会把这种东西称作矛盾情感。

这项言说的要点、使它即便只是咕噜声也成为言说的东西，在于知道那头代表猪群发言的猪想让人相信什么。而且，恰恰只要听者相信它，这项言说才是言说。没有这一点，交流就只是传递某种东西，其层次大致等同于机械运动。

刚才我提到它们丝滑的摩擦声，以及猪圈内部这些声响的交流；归根到底，这不过如此。咕噜声完全可以用机械术语分析。但从它进入另一个层面、从它本质上开始使人相信某种同化的那一刻起，它便要求承认。言说首先存在于这个层面。因此，在某种程度上，人确实可以谈论动物语言。动物语言恰好只在有人能够理解它的意义上存在。

让我们来看一个例子，它取自农贝格1951年发表的文章《转移与现实》（Transference and Reality）[注3]。他提出的仍是同一个问题：转移究竟是什么？我们同时看到他已经走得多远、又多么为难，着实有趣。对他来说，整个问题恰好位于想象界层面：转移以某种现实中并

不存在的东西之投射为基础。主体要求自己的伙伴成为一种形式、一个模型，比如其父亲的模型。

> [注3] H. 农贝格：《转移与现实》（“Transference and Reality”），《国际精神分析杂志》第32卷第1期，1951年。

他首先讲到一位女患者。她一直激烈地挑分析家的毛病，甚至痛骂分析家，责怪他不是这样、不是那样，从来不够好，从不在恰当时刻介入，老是犯错，而且品位糟糕。她从不满足。农贝格问：这是转移案例吗？颇为奇特、却并非毫无根据的是，他回答：“不，这还不完全是转移；这里毋宁说存在 readiness，即转移的准备状态。”主体按照某种规定形式要求现实在场，并且不断强调现实世界——也就是分析家本人——同实现这一原初要求之间不相符合；这才是转移的首要条件。

从什么时候、从什么东西开始才有转移？当整个“幻象”、那项被要求重新出现的图像统一，对于主体以并置而未加区分的方式被把握时，转移才出现：图像同主体所处的现实发生混淆。这并非绝对混同，而是主体既不分别认识图像，也不分别认识现实，只处在混淆中。分析的整个进展，就是向主体展示这两个平面的区分。这便是所谓分析主体幻觉性行为的经典理论：人们向主体展示，他的行为同当前情境何等不相适应，并由此把想象界与实在界两个层面剥离开来。

但我们自己会遇到各种矛盾，因为我们一直发现，转移根本不是某种幻觉。对主体说：“我可怜的朋友，您对我感受到的东西无非是转移！”绝不是分析它的办法；这样做从来没有解决过任何问题。必须看见，只有摆脱这种简单化观点，情境才能真正得到阐明。

这里也像往常一样：当作者方向正确时，他们对真理有某种感受，可他们的例子却在理论层面驳斥了自己的说法。农贝格正是如此。他作为转移经验之典型所给出的例子，尤其具有启发性。他告诉我们：

“我有一位患者，他确实带来最大限度的材料，以真诚、细致、完整的方式言说并表达；他告白，放弃平常的语调……//……他能够带来的东西实在没有边界。然而，什么也没有移动！直到我们发现：分析情境为他重现了一个童年情境。在那个情境里，他也会作出极为深入、尽可能完整的倾诉，对倾听者抱有全然信任；那位倾听者正是他的母亲，每晚都会坐在他床脚。患者像著名故事中的山鲁佐德一样，以尽可能详尽的方式向她讲述，不只讲自己一天的经历，也讲行动、欲望、倾向、顾虑和悔恨，从不隐瞒任何东西。只不过，整场游戏之所以格外令人愉悦，是因为穿着睡衣的母亲温暖地在场；这本身便是一个得到充分维持的快乐之源与契机，并构成当时亲历情境的结构。也就是说，他能透过母亲的衬衣猜见乳房的轮廓，感受到她身体的在场，并对这位心爱的伙伴作出最初的、格外具有性意味的探索。”

我们应当怎样分析和理解这件事？让我们尽量保持一点连贯性。这意味着什么？这里有两件事。第一，是主体最初通过这场言说交换体验某种满足方式的情境。我们确实可以在其中区分两个从属的象征关系层面；但它们无疑受到一种关系的颠覆——在这里我们可以把它称作想象性关系。因为主体把握并显露了某种同其自身参照相连的东西：他的欲望客体完全浸透在那种根本自恋之中，而我已经向你们表明，这种自恋对于欲望客体本身的构成何等关键。

是的……但接下来发生什么？当主体在分析中以这种完全放弃、彻底善意的方式行事，把规则服从到最后细节时，我们应当怎样理解当下的分析情境？

我们要说，当初体验到的那种满足中，有某种相似的东西实际在这里、当下在场吗？我知道，许多人很容易跨出这一步。他们会说："当然，就是这样；在这套言说背后，主体正在寻找相似的满足。"于是毫不犹豫地谈起重复自动症，以及你们想得到的一切。分析家仿佛展现了某种能力，察觉到这套言说背后当下存在的某种感受或情感——正如刚才所说；这项感受或情感标志着一个被构成、被设想为当前在场的心理学彼岸。人们便把这种做法称作转移分析，仿佛言说彼岸确实存在这样一种现实。

但是，请想一想！当前位置恰好同原初位置相反：分析家并不坐在床脚，而是在身后；至少在最常见的情形中，他绝没有原初客体的魅力，也无法唤起同样的贪恋。既然如此，我们有什么东西可以允许自己跨出那一步？

这些当然都是有些傻乎乎的事情。但恰恰要一点点拼读事物的结构，说出简单的事情，我们才会学会扳着手指，数清自己在其中行动、介入的各种要素。

你们会对我说："如果不给出这个解释，整个结果就无法设想！"但为什么一旦给出并揭示这项解释，分析情境会突然发生彻底转化？为什么从那一刻起，同样的言说会变得有效，并在主体的一般处境与存在中标志出真正的进展？

让我们试着理解……从言说本身的本性，从一组、一个意义世界如何被带到明处，我们知道自己处在语言与言说的运作中。也就是说：

- 言说本身——因为它是言说——把自己确立在语言这个语义世界的结构中；正如我刚才提醒你们的，在它所有意义和用法之中，每次只能有一个意义；

- 这项言说又始终具有一个彼岸。正如刚才突然获得灵感的猪——奥德修斯的伙伴——所说之物背后另有东西，言说总是具有多重功能与多重意义。话语所说的东西背后，有它意欲表达的东西；意欲表达的东西背后，还有另一重意欲表达。任何东西都不能将它穷尽，除非抵达最后一点，也就是言说的创造功能。

也就是言说使如下东西涌现这一事实：

- 某种构成它本质的东西；

- 这种东西叫作概念；

- 正如黑格尔教导并告诉我们的，概念自始以来所唤起的，正是物本身在那里在场。

我们在这里必须借黑格尔作一次跳跃，而这一步并不容易。不过，请只记住黑格尔如何谈概念同物的关系："概念是物的时间。"他沿一条严密的道路抵达这里：与古典理论相反，如果概念就是物本身，那么它必须是物的什么？

可以肯定，它并不是物——容我这样说——在其所是中的样子。理由很简单：概念总是在物不在的地方；而当它到来并替代物时……

就像我前几天借“象”这个词带进来的那头象，它给你们中一些人留下了很深印象。显然，从我们命名它的那一刻起，象就在那里；至少就象的命运所带来的后果而言，它比一头真的象走进教室时更加在场

……那么，物的什么东西能够在那里？

可以肯定，它既不是物的形式，也不是物的现实，因为所有位置都已被当下之物占据。黑格尔说得极其严谨：它是使物虽不在那里、却仍在那里之物。

这种差异中的同一性构成概念与物之间关系的特征；显然，也正是它使物成为物，使刚才所说的 fact、事实得到象征化。也就是说，它使我们谈论的是一件物，而不是某种说不清、归根到底永远无法识别的东西；在世界的流变中，每个瞬间接着另一个瞬间，以无法重现的方式推进，世界之流从不两次经过同一个情境。

赫拉克利特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在这个不断变化、永不重复的世界之绝对无穷流变中确立事物的存在，恰恰是因为差异中的同一性已经在物中得到饱和。［ποταμῷ γὰρ οὐκ ἔστιν ἐμβῆναι δὶς τῷ αὐτῷ καθ' Ἡράκλειτον οὐδὲ θνητῆς οὐσίας δὶς ἅφασθαι κατὰ ἕξιν· ἀλλ' ὀξύτητι καὶ τάχει μεταβολῆς σκίδνησι καὶ πάλιν συνάγει καὶ πρόσεισι καὶ ἄπεισι。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

黑格尔由此推导出：概念是物的时间。这一点很值得提到，因为它把我们置于弗洛伊德不断提出的问题核心：他说，重要的东西处在时间之外。这是真的，也不是真的！它就像概念一样处在时间之外；但恰恰因为概念是物本身的时间，它才能处在时间之外。它是物的纯粹时

间；作为这种时间，它能够在某种调制中再现物，而这项调制的物质载体完全可以是任何东西。

因此，重复自动症在这里介入、并且在言说本身中介入时，所涉及的恰好无非就是这一点！

相关知识卡 重复、移情与“把过去活在现在”

这会把我们带得很远，甚至包括分析实践本身所包含的时间问题。我们完全可以设想，从某一刻起会发生怎样的转化：通过唤起一个过去情境来分析转移情境；在那个过去情境中，主体确实面对一个全然不同、无法同当前客体等同的客体。

这里仅仅发生了如下事情：这项当下言说同过去言说一样，归根到底被置入一个时间括号、一种时间形式之中——容我这样说。

这就是我所谓的“时间调制”；它使这项言说在当下具有同过去言说相同的价值。但这一价值无非是言说的价值。这里当下并不存在任何感受，也不存在任何想象性投射。农贝格先生为了在这个例子中构造想象投射，已经弄得筋疲力尽并陷入无法脱身的处境。勒文斯坦又会说：“这不是投射，而是移置。”他们所谈的神话体系仿佛一座迷宫。但问题恰恰在于：时间维度是属于言说秩序的一切东西中，一项本质而原初的维度。

相关知识卡 重复、移情与“把过去活在现在”

而这种“时间调制”正表明：主体正在分析家面前说出的这项言说，其“最后一句话”——我确切地说“最后一句话”，也就是最后意义——不是别的，也不能同别的东西等同；它就是我所说的这种时间形式，而这一形式单凭自身就已经是一项言说。

如果黑格尔所说的确实成立，即概念是时间，那么这项言说的最后意义也是如此。我们可以逐层分析主体所说的东西，并在字里行间发现各种东西；但最后找到的确实仍是某种东西，而且是同样作为言说的东西。［你是那个……的人。］

这个同样作为言说的东西，恰好就是人的一种根本性、存在性关系：人悬置在严格意义上的欲望客体面前，处于自恋性幻象中。这个幻象在这里无须采取任何特殊形式；它无非是那项关系的渗出。它既存在于我们所谓"前期快乐"中，也就是说，人被悬置在相对于自身欲望客体的孤立中；这项关系本质上是镜像关系，它使全部言说相对于这个纯粹想象性情境处于某种悬置。

但这个情境并不具有任何当下在场、情感性、现实性或感受性的东西。只有当人抵达它以后，它改变了这项言说的全部意义，并向主体表明其言说正是我在那篇报告[注4]中引入"空洞言说"一词时所指的东西，它才是可理解的；而且正是作为空洞言说，它确实曾经在某段时间里毫无效果。

> [注4] 《罗马报告》（1953），《精神分析中言说与语言的功能与场》，发表于《精神分析》第1期，1956年，第81—166页；收入《文集》，第237页。

相关知识卡 拉康"罗马报告"：言语与语言的功能及领域 · 空洞言说与充实言说

这一切并不容易。你们跟上了吗？如果多少跟上了一点，就应当明白：我们被送往的彼岸，始终可以说是一项更深的言说。它一直抵达言说中显然存在的不可言说边界：言说使其全部意义的整个回响得以生成；最终，我们被送回言说行动本身。转移分析所涉及的，正是这个当下行动的价值——言说究竟是空洞还是充实，换句话说，它在何种程度上充满自身的在场。

如果你们觉得这一点多少有些思辨，甚至不正统，那么今天结束以前，我仍要向你们提供……

因为我们就这样边走边来到一些岔路口，它们值得你们停下来，稍作沉思

……一项参照。

因为我在这里是为了评注弗洛伊德的文本，指出这种解释严格正统，毕竟并非不合时宜。如果你们在弗洛伊德全部著作中寻找Übertragung、转移一词最初在何处出现：

- 它并不在《技术著作》中，也不是谈主体同他人之间的现实关系——不管怎样——想象性甚至象征性关系时出现；
- 它也不是围绕朵拉出现，更不是因为据说弗洛伊德没能及时告诉她，她正开始滑向对他产生温柔感情的斜坡，才让她给自己惹来种种麻烦；
- 它出现在《梦的解析》（Traumdeutung）第七部分“梦过程的心理学”中，谈论梦中的愿望实现。

弗洛伊德用整整一本书——也许不久以后我会在你们面前评注它——证明梦的功能根本上包含语义秩序的复多与叠置：可以说，这些秩序从能指材料一直伸展到意义的全部深度与层层叠置。随后他向我们表明：言说，即欲望的传递，可以借任何东西使自己得到承认，只要那东西被组织成一个象征系统；而这恰恰就是梦长期无法得到解读的根源。

正如人们曾长期无法理解象形文字，因为没有把它们组成自身特有的象征系统：看见象形文字中一个小人形时，人们只以为它可以表示一个人，却没有察觉它也可以表示“人”这个音，并作为一个音节被组合进某个词。梦就是这样构成的。

那么，弗洛伊德把什么称作 Übertragung？他说，是：

“这样一种现象：主体的某个遭压抑欲望，不可能得到直接翻译……”

也就是说，它遭到主体话语方式的禁止……

格拉诺夫提醒我，可以把它同贝尼特文章中的罗塞塔石碑相比。当然！

弗洛伊德也引用过商博良完成其发现所依据的那块石碑。

……这个欲望无法使自己得到承认。为什么？必须告诉你们，压抑的要素中也有某种属于这种不可言说之物的东西；其含义是：存在某些根本关系，任何话语都无法充分表达，除非恰恰通过我刚才所谓的“字里行间”。

下一次我们会谈到这里。我会把它同某些秘传作者的写作方式作比较［……］我选择这个主题，因为本来就打算今天谈它［……］《迷途指津》[注5]是一部秘传著作。作者在书中说明自己的写作方法：他如何有意组织话语，使自己想表达却无法说出的东西仍能被理解、仍能显露出来——向谁显露？［……］这些线索不只存在于他说出的内容

中，也存在于某种混乱、有意设置的断裂与不协调中。正是借此，他表达了那些不能说或不应当说的东西。

> [注5] 摩西·迈蒙尼德：《迷途指津》（Le Guide des égarés），Verdier，1983年。

我会向你们表明：容我这样说，他的表达方式本身，恰好是我们在口误、空缺、拘束与重复中阅读无意识倾向的反面。我们所读到的同样是主体借以表达某种东西的方式；但主体是在完全自发而无辜地组织自己的话语，仿佛秘传作者是有意为之。我们以后还会回来，这些文本值得并置比较。

弗洛伊德第一次界定 Übertragung 时告诉我们什么？日间残余（Tagesreste）有什么用？它们是能指材料——当然，他没有完全这样表述。他说，从欲望角度看，它们已经撤回投注；对于梦与做梦状态而言，它们是一些游荡的形式。它们对主体变得不那么重要，仿佛已经被抽空自身意义。每当我们面对能指材料时，实际发生的正是这种事情。

能指材料——无论是音素性的、象形文字式的，还是别的材料——都是一些已经失去自身意义的形式；它们由此被重新纳入一种组织，使新的意义能够经由这项组织得到表达。弗洛伊德把这恰好称作 Übertragung。无意识欲望，也就是无法表达的欲望，能够借已经撤去欲望投注的日间残余之字母表与音素系统找到表达途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发生转移。因此，这是严格意义上的语言现象。符号原有的意义被实现欲望的意义中和了。弗洛伊德最初正是把 Übertragung 这个名称赋予这一过程。只要我们对这个维度稍有更敏锐的认识，就不能看不到：Übertragung 在本质上涉及语言现象。

这里的过程发生在梦中；但在分析中发生的一切里，当然还有一个附加维度：他者在某种程度上当下在场。他者为意义转移的实现带来一个根本维度；这场转移在面向对话者的语言维度中进行。不过，还请注意：从弗洛伊德式分析的角度看，分析进展得越深入，梦就越清楚、越可分析，也就是说，梦越来越对分析家说话。弗洛伊德带给我们的那些最好、最丰富、最美、最复杂且最有意义的梦，都是分析内部的梦，逐字地说，都趋向于对分析家说话。

这也应当使你们看清 acting-out 一词本身的意义。刚才我谈到重复自动症，并且主要是围绕语言本身来谈，是因为任何行动——无论是治疗时段中的 acting-out（行动呈现），还是 acting-in（治疗内行动）——都包含在言说语境中。只要根据具体事实仔细分析，无论治疗中发生什么，都可能被称作 acting-out（行动呈现）。

许多主体在分析期间匆忙作出大量情色行动，例如结婚，以显示如今人们奇怪地称作“奉献性”的东西；这显然是一项朝向分析家的行动呈现，用来显示分析对他们发挥了多么强的作用。正因如此，我们必须分析行动呈现，也必须分析转移；也就是在一项行动中找出它作为言说的意义，找出它作为一项为获得承认而作出的行动的意义。

今天我就把你们留在这里。

第21课 · 1954年6月23日

贝尔纳尔

拉康

我们的朋友格拉诺夫作出了极有意思的贡献，它恰如一枚戒指，严丝合缝地套在上次研讨所开启的进程上。于是，我很自然地继续自己的论述，把你们带到此前一直悬而未决的精确说明；它原来只是一连串摆在你们面前的问题。

只有把这项说明置于象征层面、置于转移功能的场域中，才能理解它；我们看到转移显现的所有表现——一直包括想象界领域中的表现——才能围绕这个中心点取得秩序。为了让你们理解并把握它，我认为最好的做法，就是着重讨论转移的定义，尤其是弗洛伊德最初给出的定义。上回我想已经讲得足够充分，你们应当把握了：转移根本上涉及的，归结起来就是：

- 一套隐蔽话语占据一套表面话语；
- 而这里的隐蔽话语，恰恰就是无意识的话语。

我们暂且悬置这样一个点：这项根本构想如何以某种方式同人们有关转移的通常观念会合。我说“以某种方式”，当然是以不同于通常观念的方式。你们已经可以隐约看到：无意识的这套隐蔽话语会像弗洛伊德在最初定义转移时所说明的梦一样，占据话语中那些多少已经被抽空、可以利用的要素，例如日间残余（Tagesreste），以及前意识秩序

中因投入较少而变得可以利用的一切；它借此表达主体那项根本需要——使自己得到承认。

秘密而深层的话语正是在这片空白、这个凹空中，借助这些由此才严格成为话语材料的材料来表达。我们不仅在梦中，也在口误、《日常生活的精神病理学》的全部现象中，并且在自己聆听来访者话语的方式中，重新遇到这一点。

你们也会感到，我们由此重新找回我刚才所谓的“通常构想”，但它这次被重新把握并得到综合。请想想我一直怎样讲授这套无意识话语的意义：我曾说，它是他者的话语。只要参照我们对无意识的定义，就能看出这种主体内部的转移如何最终在作为对话的言说之充分实现中，真正同主体间性会合。

不过，有一个点使我们停步；上回我们正停在那里：分析揭示中的根本现象，是一套话语以另一套话语为载体。这里显现出语义学的一项根本事实：任何语义单位（sémantème）都指向整个语义系统，指向它多价的各种用法。

上回我向你们解释过：凡严格属于人类语言的东西，只要它是能够在言说中使用的人类语言，象征就绝不可能只有单一意义。任何语义单位始终具有多重意义。由此，我们抵达一项在我们经验所活动的主体性经验主义中完全显然的真理。我们在这里具体看到语言学家熟知的一点——他们当然并不因此就感到安逸，这很好，因为它会给他们提出多少问题！——任何意义都只会指向另一个意义。语言学家也已经接受这一事实，并从此在这个场域内部发展他们的科学。

不要以为事情毫无歧义地进行；即使费迪南·德·索绪尔已经把这一点看得极为清楚，他给出的定义也并非始终完全令人满意。这里存在一种诱饵；而“诱饵”本身在这里又是个彻底含混的词，因为它是一项根本诱饵：每当谈到所指，人们便想到物；可当我们在语言理论内部谈论能指与所指时，所涉及的恰恰不是物。

在语言内部谈能指时，我们所说的是可听材料。我要明确指出：这并不因此就是声音；声音中属于语音学秩序的一切，并不会仅凭这一点进入严格意义上的语言学。这里涉及的是音位，即同另一个声音相对立的声音，涉及一组对立关系；音位在这些关系中才可以被辨认，也就是能够同与它对立的音位区分开来。

在速记打字中，“pou”与“bou”以完全相同的方式记作 pou。通常，语境参照可以确定最初听见的是哪个音位，从而消除歧义；只有极少数情况下会出错。因此，即使符号有这项歧义，速记稿仍然能够得到正确通读。

当我在法语中找不到令人满意的解释时，便考察自己犹疑的那个音位或音位组在英语、德语、拉丁语中是否可能具有意义。如果有，它便取得一个意义；如果没有，我就无法把它写出来。况且，这恰好证实了您在本研讨班中有关语言材料的说法。我们目前谈的是所指：所指就是意义；但意义并不因此就是被意指的物，也不是你们想称作什么都可以的“可意指者”。

不过显然，每当我们通过所指来使用语言时，我们说出的正是可意指者，也就是被意指的物。我说这里有一项诱饵，只是就我们正在建立语言理论并在理论中受骗而言。语言当然不是为指称事物而制造的。

这项诱饵是人类语言的结构性诱饵；从某种意义上说，对任何真理的验证都建立在它之上。

事情甚至到了这样的程度：我最近同法国最杰出、因而完全有资格被称作语言学家的人——本维尼斯特先生——交谈时，他向我指出一件从未得到强调的事情。你们也许会惊讶，因为你们不是语言学家；但它实际上极为深刻。

如果从下面的概念出发：语言内部的任何意义都必须像我上回说的那样，由该术语全部可能用法来界定，那么我们会借已经提到的办法……

上回我随手取了当时想到的 main（手）这个词，包括它在法语中可能进入的各种语境：main-d'œuvre、mainmorte、toutes mains 等等

……圈定一个术语的各种意义。

请注意，这也可以扩展到词组；事实上，语言理论除了词的用法，还必须包含词组的用法，也就是固定表达与句法形式。但这里有一个界限，而且从这个视角看，它从未被如此表述过：如果转向完整句子，句子并没有"用法"。因此存在两个意义区域。我把这一点作为开端交给你们；以后会看到它何等重要。因为这两个意义区域，也许正是我们一直参照的东西；例如，它提供了一种界定言说与语言之差异的方式。像本维尼斯特先生这样杰出的人，也是最近才作出这一发现。由于尚未发表，他把它作为自己当前思考的进路告诉了我。

当我们看见一篇文本时，这无疑很能激发我们无数思考……贝尔纳尔神父使我重新想起了它：

“您刚才就意义所说的一切，是否已经在《论言说意义的讨论》（De locutionis significatione discussio）中得到说明？它构成《论教师》（De Magistro）的第一部分。”[注1]

[注1] 圣奥古斯丁：《论教师（De Magistro）》。

我对他说：“您说得太好了。”这篇文本确实在我的记忆中留下了一些痕迹，甚至留在我上回向你们讲授的内容中。我想，不应忽略：我送给你们的言说获得了这样的回应，甚至这样的“共同回忆”——圣奥古斯丁使用的词，在拉丁语中恰好等同于重新回忆。贝尔纳尔神父这次重新想起它，同格拉诺夫带来的文章一样正合时宜。

无论如何，我认为我们能够看见一件颇具典范性、意义和教益的事情——你们想必也会从贝尔纳尔神父的报告中看到：那些由语言学家……

如果我们真能跨越各时代，把一大家人都归入“语言学家”这个名称

……花了十五个世纪才如重新升起的太阳、初生的黎明一般再度发现的概念，已经陈述在圣奥古斯丁这篇文本里；它是人们所能读到的最卓越的作品之一。

你们当然想得到，我已经借这个机会愉快地重读了它。你们会看到，圣奥古斯丁讨论的是现代语言学最尖锐的问题。我刚才有关能指和所指所讲的一切，都以惊人的清晰度在其中展开；它如此惊人，以至于我担心，那些专门研究它的宗教评论家未必始终看见其全部精微。很明显，面对已经看到、已经承认的东西，评论家觉得这位深邃的教会圣师在一些相当琐碎的事情上迷失了。奇特的是，这些琐碎之物恰好就是现代语言思想最尖锐的点。

贝尔纳尔——我恰好只有六七个小时来稍微探索这篇文本，所以这无疑只是一点导论。

拉康——您怎样翻译 de significatione locutionis?

贝尔纳尔——“论言说的意义”。

拉康——是的，locutio 无疑就是言说。

贝尔纳尔——Oratio 才是话语。

拉康

我们可以说“论言说的意指功能”。后面有一段文本，significatio 本身正是在“言说的意指功能”这个意义上得到很好说明的。这里的言说采取广义，指在发言乃至修辞中投入运作的语言；它既不是充实言说，也不是空洞言说，而是言说的整体。您会怎样把“充实言说”译成拉丁语?

贝尔纳尔

文本有一处出现一个表达：“完整陈述”，即 sententia plena。完整陈述不仅有动词，还有主体、名词；只要只有动词而没有动词的主体，就还不是完整陈述。

拉康

正好，我本来就想谈这一点。他讨论自己所谓 sententia plena 时，这个表达只意味着完整句子，而不是充实言说。

贝尔纳尔——是的，作为动词与主体的完整句子。

拉康

这里要证明的是，所有词都是名称。他使用几种论证，例如：任何词都可以在句子中作为名称使用。“如果”是条件词，但在“我不喜欢这个‘如果’”中，“如果”就作为名称使用。圣奥古斯丁以现代语言学家的全部严谨和分析精神推进；他表明，一个词是否被规定为“词类”，取决于它在句子中的用法。我认为，当我谈充实言说时，sententia plena 并不是我所谓的“充实言说”。您想过怎样把“充实言说”译成拉丁语吗?

路易·贝尔纳尔

我没有想出很好的译法，也许在讲解过程中会遇到。请允许我先定位这篇哲学对话。奥古斯丁于389年、返回非洲几年以后写成它。对话题为《论教师》（De Magistro），有两位对话者：一边是奥古斯丁，另一边是他当时十六岁的儿子阿德奥达图斯。阿德奥达图斯非常聪明；圣奥古斯丁本人这样说，而且说自己放到阿德奥达图斯口中的话，确实出自这个十六岁少年；他显然是一位一流的辩论者。

相关知识卡 圣奥古斯丁《论教师》：符号与内在教师

拉康——罪之子。

路易·贝尔纳尔

整篇对话的中心主题——更确切地说，标示其方向的轴线主题——是：语言通过从外部发声的言词（foras sonantibus verbis）从外部传递真理；门徒却始终在内部看见真理，因为他在内部构想了真理。这是

话语的轴线。不过，在抵达讨论急于奔向的结论以前，对话蜿蜒了很久，并形成某种语言与言说的学说；我们可以从中有所获益。我先给出两大划分，即两个主要部分：

- 我们首先停留的第一部分，是《论言说意义的讨论》（Disputatio de locutionis significatione）；

相关知识卡 Logos、Verbum 与“道”

- 第二部分是“唯有基督是真理之师”（Veritatis magister solus est Christus）。

第一部分又分为两节：

- 第一节总题为《论符号》（De Signis），这里被颇不恰当地译成“论词的价值”。实际涉及完全不同的东西，因为不能把 signum 同 verbum 等同起来，而且原文根本没有“价值”一词；

- 第二节是“符号对学习毫无用处”。

先从第一节《论符号》开始。奥古斯丁问自己的儿子：

- “我们说话时（cum loquimur），想要做什么？”

回答是：

- “我们或者想教，或者想学，取决于自己处于教师还是门徒的位置。”

- “这还不够。”

圣奥古斯丁这样说。他试图表明，即使我们想学习、为了学习而提问，仍然是在教。

- “为什么？”
- “因为人是从自己向其提问的人那里学习。你是在告诉他，你希望沿哪个方向获得知识——因此有一项一般定义——所以，亲爱的，你看到，我们借语言所做的无非就是教。”

拉康

允许我说一句吗？我想，你们已经看出：从一开始，我们便真正置身于我在这里一直试图解释的层面，即信号式交流的通常图式同人与人之间言说交换的差异。我们从一开始就进入主体间性，因为他立即着重指出 docere（教）与 discere（学）无法区分：任何提问本质上都是尝试使两套言说达成一致，而这首先意味着两种语言取得一致。

若非通过两个完整语言宇宙的相互认同，任何交换都不可能发生。一切言说作为言说已经是在教；它不是符号游戏。它恰好位于我刚才所说的更高层意义上，从一开始便不在信息层面，而在真理层面。

路易·贝尔纳尔——“当没有任何人在场学习时，我不认为我们还想教什么。”

拉康——这些答句每一句都值得单独提出来。

路易·贝尔纳尔

在强调“教”以后，他转到一种极好的教学方式——“per commemorationem”，即通过唤回记忆。因此语言有两项目的。我们说话，“或者为了教，或者为了使别人或自己重新想起”。这里的重音放在言说使人重新想起某物的功能上。对话这样开场以后，奥古斯丁提出问题：

- “依你看，言说是否只是为了教或回忆而设立？”

这里不要忘记对话所处的宗教氛围。对话者回答：

- “可还有祈祷。”

- “祈祷时，人同上帝对话。难道能认为上帝从我们这里接受教导或提醒吗？这种对话形式显然不适用上述说法。”

我略过他此刻说的内容。结论如下：人在这种对话中发声，并不是要使对话的对象重新想起或教给他什么，而是要提醒其他人，自己正在祈祷。因此，它不是相对于对话对象，而是相对于那些可能看见我们处在这场对话中的人。

拉康

这很引人注目。祈祷明显被拉向不可言说的方向；他把祈祷排除在言说的根本场域之外，这具有重要价值。

路易·贝尔纳尔

在这种情形中，问题不在于重新想起或学习。说到这里，教是通过词进行的：

- “我们用来教或使人重新想起的词是什么？”
- “它们是符号。”

这里出现了一整套有关 verbum 与 signum 的思考。一个符号始终为了意指某种东西；否则便不是符号。为了展开思想，稍微说明他如何设想符号同可意指者的关系，他向对话者提出《埃涅阿斯纪》的一行诗。

拉康——他此时还没有界定“可意指者”。

路易·贝尔纳尔

是的，还没有：只是说“意指某种东西”。什么东西？我们还不知道。他于是取《埃涅阿斯纪》的一行：

- “Si nihil ex tanta Superis placet urbe relinqui”［《埃涅阿斯纪》第二卷第659行：“如果诸神不愿让如此伟大的城邦留下任何东西。”］

这里将展开一整套助产术；他借此寻找这个 aliquid，即“某种东西”。他首先问对话者：

- “这一行有多少个词？”
- “八个。”
- “所以有八个符号。你懂这句诗吗？”
- “我懂。”
- “现在告诉我每个词意指什么。”

说到“si”（如果），阿德奥达图斯有些为难。他说：

- “我找不到另一个能解释其意义的词。应当找到一个等价词，但我找不到。”

奥古斯丁说：

- “不管这个词意指什么东西，你至少知道它在哪里吗？”

这里完全不涉及物质性的物。

- “这个‘si’表示怀疑。怀疑若不在灵魂中，又能在哪里？”

这很有意思，因为我们立即看到，这个词指向的恰好是精神秩序中的东西，是严格意义上主体的一项反应。

拉康——您确定吗？

路易·贝尔纳尔——我想是的。

拉康——不过，他这里是在谈一种定位……

路易·贝尔纳尔

……不能把它空间化。我说“在灵魂中”，是为了同物质相对立。接着，他转向下一个词，即 nihil，“无”。阿德奥达图斯说：

- “显然，就是不存在的东西。”
- “你说的也许是真的，”圣奥古斯丁回答，“但不存在之物绝不可能是某种东西。因此，第二个词并不是符号，因为它并不意指某种东西。我们先前约定每个词都是符号，或每个符号都是某物的符号，原来是错的。”

阿德奥达图斯陷入为难：

- “如果没有任何东西可意指，我们还说话，那就是发疯。所以，一定有某种东西。”

奥古斯丁给出回答：

- “当灵魂没有看见一个东西，却意识到或自以为意识到这个东西并不存在时，难道不存在灵魂的某种反应吗？为什么不说，‘无’这个词所意指的对象正是这种反应，而不是本来就不存在的那个物本身？因此，这里所意指的是：灵魂面对某种本来可能在那里之物的缺席时所作的反应。”

拉康

第一部分的价值，恰恰在于表明：不可能通过逐词把符号指向物来运用语言。其论证方式对我们具有标志性价值。不要忘记，在圣奥古斯丁的时代，否定性还没有得到阐发；然而，凭符号或事物本身的力量——我们恰好在这里试图弄清究竟是哪一种——他仍在这个 nihil、“无”上绊住了。

首先，他选择了这行很美的诗；我顺带提醒你们，这个选择并非全然无关紧要。弗洛伊德当然极其熟悉维吉尔。这行诗唤起已经消失的特洛伊；而在弗洛伊德另一处试图界定无意识时，它奇特地形成回响。仔细阅读《文明及其不满》，你们会看到：弗洛伊德谈到，我们对罗马历史的认识中，已经消失的罗马之所有遗迹仿佛共同在场；他一面在罗马废墟中散步，也一面在精神中漫游这些遗迹。弗洛伊德正是借这样一则历史隐喻——某些已经消失却本质上仍在那里之物，正如特洛伊城即使所剩无几，也仍处于这种在场—缺席中——在其著作的另一个时刻，即《文明及其不满》开头，给出对无意识的说明。

路易·贝尔纳尔

随后，奥古斯丁转向第三个词，即 ex。门徒给出另一个词来解释 ex 的意义，即 de；他还详细解释说，这个词表示某物同它原来所在之物分离，我们说它“来自”那里。奥古斯丁接着提醒：他只是用词解释词，用 de 解释 ex，以一个非常熟悉的词解释另一个非常熟悉的词。于是，他催促门徒越过自己仍停留的平面，说道：

- “如果可以，请你把这些词作为其符号的那些物展示给我。”

这里出现一个问题。他举例问：

- “比起用言说指称一个物，我们是否更可能在言说以外把握这个物？”

他以墙为例：

- “你能用手指指出它吗？这样我就会看到那个三音节词所指的物本身；而你不用说出任何言说，就把它展示出来。”

于是，这里有一个同三个音节相关、却可以不用任何言说展示的物。身体性质——颜色等等——也是如此。那么，声音、气味、滋味——有别于所见之物——重量、热度，以及同其他感觉相关的对象，也能用手指指出吗？这里由此展开一整套关于手势语言的说明。奥古斯丁问门徒，是否仔细观察过聋人怎样借手势同同伴交流、使用手势。他指出，通过聋人之间这种语言：

- “被展示的不只是可见之物，还包括声音、滋味以及其他东西。”

他还要继续深入……

曼诺尼

这使我想起星期天我们在吉特朗古玩过的小游戏。舞台演员可以不说话，只借舞蹈使人理解并展开整出戏。

拉康

您提到的事情确实很有启发性。在这个小游戏中，人们分成两队，由主持人秘密给出一个词，每个人必须让同伴尽快猜出它；这恰好凸显了圣奥古斯丁在这段话中向我们证明并提醒的东西。我可以给你们看好几个非常直观的例子。因为这里讲的，与其说是手势辩证法，不如说是指示辩证法。他马上选择“墙”，我们不会感到惊讶，因为他即将撞上的，与其说是现实的墙，不如说是语言之墙[注2]。他由此指出，能够得到指称的不只是事物，也有性质；而且指示辩证法显然具有歧义。

> [注2] 参见拉康：《晕厥说》（L’Étourdit），1972年。

因为当一个人指着墙时，接受“指示”这一符号的人未必确定……

论证的全部要点正在这里：即使指示仍然是一项符号，而且是一项完全含混的符号

……他究竟指的是墙，还是墙粗糙、绿色或灰色的性质。同样，在前几天的小游戏里，有人必须表达“常春藤”，于是找来一枝常春藤。别人说：“您作弊了。”这是错误的。那个人拿来的是什么？三片常春藤叶。它可以指叶片形状、绿色，也可以指神圣三位一体等等。

曼诺尼——我正想谈谈直接使用事物本身时的语言。

拉康——您读过这篇文本吗?

曼诺尼——没有。

拉康——那您要重新发明它了！

曼诺尼

人似乎会把事物当作一个词来处理。如果我想使用“椅子”这个词，却突然想不起它，于是举起一把椅子来补完整句话，那么我以这种方式使用的并不是事物，而是词。因此，我们不可能通过事物说话，始终只能通过词说话。

路易·贝尔纳尔

他说：

- “不错，我们并不总是使用词，却总是在使用符号。那么问题……”

拉康

我们在这里触及所谓对“手势或动作”，甚至所谓对主体情感作出的著名“解释”所产生的歧义核心。您的例子极好地说明，我们在分析中对这个层面作出的全部解释，都完全像您刚才使用“椅子”一样：要么是因为想不起这个词，要么是因为正在说一种外语，不知道 Stuhl 怎么说。您把椅子拿在手里，别人就会明白这是椅子。仔细看就会发现，我们对主体当下反应的一切解释，始终以完全相同的方式嵌在话语中；这一点应当使我们走得更远。

路易·贝尔纳尔

没有任何东西能够不借符号得到展示。阿德奥达图斯将试图证明，确实有些事物可以。奥古斯丁问：

- “如果我问：走路是什么？你站起来实际走了一段，难道不是用事物本身而不是言说来教我吗？”

阿德奥达图斯不知所措地说：

- “是的，我承认。我竟没看到如此明显的事情，真令人羞愧。那么，还有很多东西可以不借符号展示，比如喊叫、站立等等。”

奥古斯丁接着问他：

- “如果你正在走路时，我问你：走路是什么？你要怎样教我？”

- “例如，我会稍微走快一点，用提问之后出现的新东西吸引您的注意；但除了作出本来要展示的动作，我什么也没做。”

- “那么你是在赶路，而赶路同走路并不是一回事。该怎样区分赶路和走路？他会以为你通过‘走路’这个动词指的是赶路，以为‘ambulare’就是‘festinare’，这可怎么办？”

拉康

刚才我们通过 nihil 触及否定性；现在通过 festinare 这个例子，人们指出，festinare 可以应用于其他各种行动，因而无法区分指的是赶路还是走路。话语里还有另一个更精确的点：只在某项行动特定发生的时间中展示它，主体就没有任何理由在没有词的情况下概念化行动本身，因为他可能以为所指的只是这个时刻的这项行动。我们又回到：时间就是概念。也就是说，只有当行动的时间被单独把握、同这项特殊行动分开，行动才真正能够被概念化，也就是被保存在一个名称中。我们即将由此抵达名称的辩证法。

路易·贝尔纳尔

他在这里区分不同时间。他说：

- “不过，如果有人问我们一项自己能够作出、但提问当下并未正在作出的行动，我们在提问后才作出这项行动，难道此时不是以事物本身展示事物吗？”（阿德奥达图斯问。）

- “我接受这一点。所以，我们已经约定，不借符号能够展示两类东西：一类是提问时我们没有正在作出、却能够立即作出的行动；另一类是符号本身，因为符号在言说行动中自行展示并显现。当我们说话时，我们制造符号——‘signa facimus’，‘significare’（意指）正由此而来；说话就是‘signa facere’，即制造符号。”

拉康

在这套辩证法中，他刚刚证明了不借符号展示事物会遇到种种困难，但最后为一项行动留下例外：说话。因为无论如何，说话是什么？不管我说什么来教给对方，我都必须说话。从这里出发，我可以继续解释，直到使对方明白自己所问的东西，而不离开他要求展示的事物，也不离开这个事物自身的符号。说话是唯一能够以等价方式展示自身的行动，恰恰因为它本质上就是通过符号展示自己的行动。我们的呼唤只会重新找到意义本身：意义始终指向意义。

路易・贝尔纳尔

他在这里总结已有发现。还记得围绕那行诗提出的问题吗？提问涉及可以用另一些符号展示的符号。另一方面，若问到不是符号的事物，则可以：

- 要么在问题提出以后实际作出它，例如别人问“走路是什么”以后走路；
- 要么给出能够吸引注意的符号，例如墙。因此形成三分。接下来，他将重新采取这项划分，更深入地考察每一部分。先看第一项，即符号通过符号展示。以下是他的思考：
- “只有言词才是符号吗？”
- “不是。”
- “看来，我们说话时以词意指的，要么是词本身，要么是其他符号。”

他选取言说这一事实，表明通过言说可以意指并指称言说以外的其他符号，例如手势、字母等等。

拉康

两个并非 verba（言词）的符号例子是 gestus（手势）和 littera（字母）。圣奥古斯丁在这里比某些当代人更健全；后者会认为手势不属于象征秩序，而处在动物反应层面。手势恰好被拿来反对我们所谓分析全部在言说中进行：“那么主体的手势呢？”他们这样问。人的手势显然是一种语言；它属于语言一侧，而不属于运动表现一侧，这再明显不过。

路易 · 贝尔纳尔

Verbum 可以指向一个现实对象。他具体考察符号指向同一符号或手势以外其他符号的情形，随后又回到词：

- “这些符号就是词。”

他问：

- “它们诉诸哪一种感觉？”
- “听觉。”
- “手势呢？”
- “视觉。”
- “书写的词呢？”
- “它们所指的是以意义接合起来的声音，而这种意义只能由听觉感知。因此，书写的词指向诉诸耳朵的词，后者再诉诸心灵。”

接着，奥古斯丁说出一个特定的 verbum：“nomen”，即“名称”，并问：

- “我们用 nomen 这个 verbum 意指某种东西吗？”
- “是的。我们可以意指 Romulus（罗慕路斯）、Roma（罗马）、virtus（德性）、fluvius（河流）……以及无数其他东西；nomen 只是中介。”
- “这四个名称是否指向别的东西？名称同它意指的对象之间有差异吗？差异是什么？”

奥古斯丁这样问。

- “名称是符号，”阿德奥达图斯回答，“对象不是符号。”

因此，始终处在视野边界上的，是那些并非符号的对象。圣奥古斯丁在这里首次于本篇对话中使用 significabilia 一词。他们约定，为了便于讨论，把那些能够由符号指称、自身却不是符号的对象称作“可意指者”。接着，他回到那四个中介符号：

- “除了 nomen，它们就不能由其他符号指称吗？”

它们首先由“nomen”指称。

- “我们已经确定，”阿德奥达图斯回答，“书写的词是另一些符号的符号，后者由我们的声音表达。既然如此，口头符号 Roma、Romulus 与书面符号之间有什么差异？一类可见，另一类可听。既

然我们承认可听名称是可意指者，为什么不承认书面的名称也是？”

- “当然，”奥古斯丁说，“但我再问一次：我们刚才谈的 Roma、Romulus、virtus、fluvius 四个符号，除了这四个可听符号以外，就不能由其他可听符号意指吗？”

拉康

这里可以快一些。接下来的所有问题都围绕能够指称自身的符号展开。我想，如果你们同我一样理解了它，就会看到，论证正朝深化言语符号的意义推进，围绕 verbum 与 nomen 展开。我们把 verbum 译成“词”，但译者有一处把它译成“言说”。

对于某种语言所使用的音位或音位组，一个孤立音位在这门语言中可能什么也不指称。只有通过用法与使用，即把它整合进意义系统，才能知道。这里的 verbum 显然作为这种东西来使用；而接下来整项证明的要点在于：每个词能否被看作一个 nomen？

这在语法中相当明显；拉丁语对 nomen 与 verbum 的用法也大致彼此对应。你们知道，这会提出重大的语言学问题。即使在动词名词化用法极其罕见的语言中，也不应把动词绝对区分出来。例如法语不会说“le laisser”“le faire”或“le se trouver”，这种说法并不存在。然而，法语中的名词与动词之分，仍比你们以为的更加摇摆。

眼下的问题是圣奥古斯丁所做的事情……贝尔纳尔神父，在我们的词汇中，您会赋予 nomen 什么价值？我们不妨假定，奥古斯丁为说服阿德奥达图斯而展开的漫长讨论已经结束：nomen 与 verbum 虽有不同用

法，却可以被看作彼此指称。每个 nomen 都是 verbum，这一点不言自明；反过来则远非如此明显。

然而可以证明，任何 verbum——包括“如果”“但是”“因为”——都能有这种用法。依您看，整项证明涉及什么？他把 nomen 与 verbum 等同，意在何处？换句话说，他是否在证明中赋予它严格意义上的名称价值？他想说什么？在我们的语言中，他指向什么？您会怎样用研讨班的语言翻译 nomen？

路易·贝尔纳尔——我没有真正找到。

拉康

它恰好就是我们在这里所谓的象征。Nomen 是能指—所指的总体，尤其只要它服务于承认、只要契约与共识以它为基础；这就是契约意义上的象征。Nomen 在承认层面发挥作用。我想，这符合拉丁语的语言精神；我替你们记下了 nomen 的各种法律用法，例如它可以表示“债权凭证”。另一方面，如果参照雨果的文字游戏[注3]——不要以为雨果是疯子——即 nomen—numen，那么 nomen 在语言上处于双重关系中。它的原初形式使它同 numen、神圣者相关；但这个词的语言演变又被 noscere（认识）捕获，并产生了 agnomen 等形式。我们很难相信 agnomen 并非来自 nomen，而是 nomen 被 cognoscere 捕获的结果。

> [注3] 维克多·雨果：《Nomen, numen, lumen》，《沉思集》第25篇。

不过，法律用法已经充分表明：把它理解为在承认、契约及人与人之间的象征功能中运作的词，我们并没有错。

路易·贝尔纳尔

的确，圣奥古斯丁通过整段有关命名的讨论说明了它：“这叫作……”“这被命名为……”。我想，“这叫作……”“这被命名为……”显然都参照主体间性概念：一个事物如此得名。

拉康

他在另一处谈到词的两个价值——verbum 与 nomen——并作出一种奇妙的词源解释：

- verbum 击打耳朵；从意义上说，这对应于我们给予它的概念，即言词的物质性；
- nomen 则使人认识。

不过，圣奥古斯丁那里没有的是……

原因很明确：圣奥古斯丁没有读过黑格尔

……认识（agnoscere）层面与承认层面的区分；承认就是“一项根本上属于人的辩证法”——这句话也必须加上引号，因为圣奥古斯丁自己置身的辩证法并非无神论的……

路易·贝尔纳尔——但是，当文本说“叫作……”“重新想起……”和“命名为……”时，那就是承认。

拉康

毫无疑问，但他没有把它单独分离出来，因为对他而言，归根到底只有一项承认，即对基督的承认。不过，在一套连贯语言中，这一章必

然至少会出现，即使没有展开。就连他以不同于我们的方式解决的章节，也已经得到指示。

路易·贝尔纳尔——您知道，这正是本质所在。

拉康

请转到第二章，也就是您所谓的语言之力量；这会让我们下次有机会接着讨论。

路易·贝尔纳尔——“符号对学习毫无用处。”

拉康——依照他赋予 discere（学习）的意义，它根本就是言说最本质的意义。

路易·贝尔纳尔

也就是说，我们这次不再处理符号同符号的关系，而开始处理符号同可意指之物的关系。

拉康——从符号到教学。

路易·贝尔纳尔——译得不好，更确切地说是到“可学习者”。

拉康——Discendum，即“可学习者”……是的。另一方面，他已经告诉我们，discere（学）就是 docere（教）。

路易·贝尔纳尔

我跳过两三页，直接到他开头提出的断言：听到符号时，注意就转向所意指的事物。也就是说，符号一旦被听见，就指向所意指的事物。这条法则天然具有强大力量：听到符号时，注意转向所意指的事物。圣奥古斯丁对此提出一项从分析角度看很有意思的反对意见——文本中偶尔会遇到这种段落。阿德奥达图斯曾说：

- “不错，词指向所意指的事物。”

奥古斯丁于是说：

- “如果一个对话者开玩笑地作出结论，说某个人一谈到狮子，一头狮子就从说话者口中出来，你会怎么说？他先问，从我们口中出来的是否就是我们所说的事物。对方无法否认，他便设法让这个人说出‘狮子’。一旦说出，他就嘲笑对方；这个没有恶意的人无法否认，自己仿佛吐出了一头凶猛野兽。”

- “从口中出来的是符号，而不是意义；不是概念，而是它的载体。”阿德奥达图斯回答。

此后——不要忘记，他要把我们引向的根本问题是事物知识来自哪里——他将逐步推进，先问：

- “应当更看重哪一个？哪一个更优越：所意指的事物，还是它的符号？是词，还是词所意指的物？”

依照当时一项极为普遍的原则，人们应当认为：

- “所意指的事物比符号更高贵，因为符号以所意指的事物为目的；凡以他物为目的者，都不如其目的高贵——除非你有不同看法。”

圣奥古斯丁这样对阿德奥达图斯说。对方随后找出一个词：

- “例如我们谈到污秽时”——拉丁语是 cœnum——“名称难道不优于事物吗？我们宁愿听见这个词，也不愿嗅到那个东西。”

这很有意思，因为它使文本得以在物质性事物与符号之间，引入对事物的认识，也就是严格意义上的知识。

- “那么，给这个东西安上名称的人目的何在？”奥古斯丁问，“不正是为了让人能相对于它行动、认识它，并得到有关应当怎样对待它的提醒吗？因此，对这个事物的认识应当比词本身更受重视。”

他明确指出，这个符号所给予的知识本身应当更受重视：

- “对污秽的认识应当优于名称本身，而名称又应当优于污秽本身。我们之所以把认识置于符号之上，唯一理由就在于符号为了认识而存在，而认识不是为了符号而存在。”

人说话是为了认识，而不是反过来。接下来还有一系列我略过的展开：“正如人不应为了吃而活，而应为了活而吃……”等等。随后又提出一个问题。此前我们处在物与符号之间，现在已经引入对事物的认识；新的问题是：对符号的认识是否比对事物的认识更值得重视？他提出这个问题，却没有处理。

最后，他对整个展开作出结论：

- “对事物的认识胜过的不是对符号的认识，而是符号本身。”

接着，他回到第一部分处理的问题：

- “让我们更仔细地考察：是否确实有事物能够不借任何符号、仅凭自身得到展示，例如说话、走路、坐下以及类似行动？是否有事物可以不借符号得到展示？”

- “除了言说，没有。”阿德奥达图斯说。

奥古斯丁说：

- “你对自己所说的一切如此确定吗？”

- “我一点也不确定。”

奥古斯丁带来一个不借符号展示自身的事例——这使我想到了分析情境。

- “假如有个人不了解用树枝和黏胶捕鸟的方法，遇见一个带着全套用具、尚未开始打猎而正在赶路的捕鸟人；他看见后一路尾随，惊讶地想知道这些装备是什么意思。捕鸟人发现自己受到观察，为了展示本领便准备好树枝；他发现附近有只小鸟，就借手杖与猎鹰使它不能动弹，制服并捕获它。难道捕鸟人不是未借任何符号、而以行动本身教给旁观者想知道的东西吗？”

- “我担心，这仍和我刚才谈‘走路是什么’时一样：我看不出捕鸟术已经得到完整展示。”阿德奥达图斯说。

奥古斯丁继续说：

- “要摆脱这个担忧很容易。只要旁观者足够聪明，能从所见推知这门技艺的完整知识，就足以证明我们的论点：即使不能不借符号把所有东西教给所有人，至少能够把某些材料教给某些人。”

- “我也可以补充，”阿德奥达图斯说，“如果这个人确实聪明，别人只要走几步来展示，他就会完整把握走路是什么。”

- “我很高兴地允许你这样说。你看到，我们两人都已经确立：有些人能够不借符号学习某些事物。因此，‘没有符号就完全无法教任何东西’这一主张是错误的。”奥古斯丁说。

经过这些说明，呈现于心灵的不再是这一件或那一件，而是数以千计似乎能够不借任何符号自行展示的事物，更不必说无数表演，所有人都在其中展示事物本身。这里有一整项行动取得价值，不借符号展示自己。对此可以回答：无论如何，这些行动仍具有意指作用，因为捕鸟人的全部举动始终是在主体所处的一个宇宙内取得意义。

拉康

贝尔纳尔神父这番极为切中要害的说明，使我无须再提醒你们：严格意义上的捕鸟术只能存在于一个已经由语言或人的言说构造起来的世界。无需再强调。问题不是要使你们回到事物优先于符号的立场，而是让你们怀疑：在“教”这一根本属于言说的功能中，符号是否真的具有优先地位。

Signum（符号）同作为教学工具、作为言说工具的 verbum、nomen 之间，裂口正在这里产生。换句话说，这里诉诸一个维度；归根到底，我们这些心理学家也诉诸它……

心理学家比人们以为的更具有精神性——取这个词在技术上、宗教上的意义。

他们像圣奥古斯丁一样，相信光照与悟性

……心理学家研究动物心理学时也指称这一维度；他们谈本能、谈 Erlebnis（亲历经验）。

这种关系很奇特，我顺带向你们指出。圣奥古斯丁希望把我们引向一种通过光照取得的真理，引向真理自身的维度；恰恰因此，他离开语言学家的领域，接受了我刚才所说的那项诱饵。它被引向另一个方向，同样也是诱饵，却不比我刚才指出的诱饵更虚假：事实上，言说一旦确立、奠定并建立自身关系，就已经在真理领域内活动。

只不过，言说并不知道正是自己制造了真理；圣奥古斯丁也不知道。因此，他试图抵达真理本身，也就是人如何抵达真理。他围绕最初疑问完成了一次彻底翻转。

下一次，我也许会引用他明确指出这一点的段落；它们十分清楚而且引人注目。他最终告诉我们：这些符号当然完全无能为力，因为我们甚至无法独立认出它们作为符号的价值。正如我刚才针对某些物质要素、某些音位组合所指出的，圣奥古斯丁说，只有当我们已经知道它们在一门具体语言中意指什么时，才知道它们是词。因此，完成这次

辩证翻转毫不困难：凡同符号操作及其相互定义相关的东西，始终都不会使我们学到任何东西，因为：

相关知识卡 圣奥古斯丁《论教师》：符号与内在教师

- 要么我们已经知道有关的真理，那么教给我们的就不是符号；
- 要么我们不知道它；而只有知道以后，才能定位同它相关的符号。

他走得更远，精彩地定位了我们的真理辩证法之基础。下一次，我会由此引导你们，让你们看见它如何处在全部分析发现的核心。他说：

- “面对我们听到的言说，我们会处在极为悖论的情境中：例如，不知道它们是真是假，不知道应当认同还是否认其真理，应当驳斥、接受还是怀疑。但任何发言的意义，本质上都是相对于真理而定位的。”

因此，他把言说的整个功能——无论作为所教还是作为施教——置于可能发生错误或误认的根本层面。另一方面，他也把言说的发出或交流置于可能的欺骗与谎言层面。

他走得很远，尽可能接近我们的经验，甚至把它置于歧义的标志下。这里不仅有根本的语义歧义，也有主体性歧义：他承认，对我们说话的主体本人经常不知道自己在对我们说什么，而且他实际说出的比自己想说的更多或更少。文本甚至引入了口误。

路易·贝尔纳尔——但他没有明确说，主体可能借口误说出某种东西。

拉康

完全正确，他正处在边界上。我们得重新读文本。口误被视为有意义，却没有说明它意指什么。他还给出另一个在自身层面上同样惊人的例子：伊壁鸠鲁主义者。在圣奥古斯丁看来，伊壁鸠鲁主义者属于对手一侧；他在论证过程中把我们引向真理的功能。这个人以为自己正在驳斥那些论据；但只要把它们说出来，这些论据本身就带有如此强的真理效力，反而确认了与使用者想激发的信念完全相反的信念。

这是话语歧义的另一个例子。你们知道，在我们可以称作“隐蔽话语”的东西中——容我这样说，即“遭迫害的言说”的话语；这个说法并不是我发明的，而出自一个叫列奥·施特劳斯的人——例如在政治压迫制度下，人能够借对手那项所谓“已遭驳斥的矛盾”传递多少东西。

总之，圣奥古斯丁让整套辩证法围绕三个极点旋转：误认、错误与言说的歧义。对他而言，这是诉诸一个“受造者的真理”[注]；对我们而言，这或许能够引向另一条道路。

> [注] 本项目底本作 vérité d’un créé，语法与语义均不稳定；米勒整理本删去了这句，只从三个极点直接转到“符号无力教导”。这里按底本字面保留，不据猜测改成“非受造的真理”或“造物主的真理”。

无论如何，我们将从这个问题出发：恰恰因为符号无力教人——今天暂且采用贝尔纳尔神父的说法——下一次我们会试图表明，它怎样构成所谓言说真理之奠基辩证法的一个根本时刻。从错误、误认、歧义这个三脚架出发，你们不难认出弗洛伊德在其意义发现中推到前景的

三项主要症状性功能。人的这些“说话部分”远远超出言说，甚至渗入其存在、梦与有机体：

- Verneinung（否认式否定），
- Verdichtung（凝缩），
- 以及 Verdrängung（压抑）。

圣奥古斯丁　课程目录

《论教师》，拉乌尔神父译。

第一章　语言为了教导或唤回记忆而设立

1.　奥古斯丁：你认为，我们说话时想要做什么？——阿德奥达图斯：至少眼下我认为，我们想要教导或学习。——奥：我同意，因为事情很明显：说话时，我们想教；但我们自己又如何想要学习？——阿：怎样？难道不是通过提问吗？——奥：可即便如此，我看我们仍只想教。你向某个人提问，不正是为了让他知道你想要什么吗？——阿：确实。——奥：所以你明白，说话时我们只是在寻求教导？——阿：我还没有完全看清。倘若说话无非是发出言词，那么唱歌时我们显然也在说话。但我们常常独自歌唱，无人在场聆听；这时难道想要教给谁某种东西吗？我不这样认为。——奥：依我看，歌唱属于一种很一般的教导方式，即唤醒记忆；这场谈话将充分说明它。不过，如果你认为唤起记忆既不是教导自己，也不是教导被我们唤醒记忆的人，我不坚持。那么，我们说话已经有两项目的：或者教导，或者使自己或别人重新想起；歌唱时也是如此，你不同意吗？——阿：不同意。我

唱歌时很少为了寻找记忆，更多是在寻求快乐。——奥：我明白。但你没有注意到，歌唱的快乐来自声音的和谐吗？这种和谐既可同言词结合，也可同它们分开，所以歌唱不同于言说。长笛和竖琴可以歌唱，鸟也歌唱；我们自己也会哼出不带言词的曲调。这些曲调可以叫歌，却不能叫语言。你能反驳吗？——阿：完全不能。

2. 奥：所以你看到，语言只为教导或唤起记忆而设立？——阿：只有一件事阻止我接受：我们祈祷时也说话；而不能认为我们是在教导上帝，或使他想起什么。——奥：难道你不知道，命令我们关上房门——也就是关闭灵魂的圣所——以后祈祷，恰恰因为上帝垂听我们，并不需要我们的言词教导或提醒他？说话是借接合起来的声音，把自己的意愿向外显明；而人应当在理性灵魂的深处、也就是内在之人中寻求并祈求上帝，因为上帝把那里称作自己的圣殿。你没有读过使徒的话吗："岂不知你们是上帝的殿，上帝的灵住在你们里面？""基督住在内在之人中。"你也没有注意先知的话吗："在你们心中彼此交谈，在床榻上痛悔；献上义祭，信赖主。"你认为我会在哪里献上义祭，若不是在灵魂之殿和心之圣所？而献祭之处也应当是祈祷之处。因此，祈祷时无须发声，也就是无须制造言词的声响。只有当人像司祭一样，想把灵魂的感受表达给人而不是给上帝，使他们知道，并借唤醒共同情感把他们提升到上帝那里时，才需要如此。你有不同看法吗？——阿：我完全同意。

奥：那么，至高导师教给门徒祈祷用语时，你也不会感到困难吧？他看来只是想教他们祈祷时应当怎样表达。——阿：这对我丝毫不成问题。他当时教给他们的不是言词，而是事物本身；言词只是提醒他们应当向谁说、祈祷时在灵魂圣所中应当求什么的手段。——奥：这是真理，我也这样相信。你还应当不受任何争论动摇地看见如下类比：

不发出任何声音而在心里想着言词，就是在内心对自己说话；同样，当记忆寻找自己保存的言词，并把这些言词所标示的事物本身呈给心灵时，说话也无非就是思考。——阿：我理解并同意。

第二章　要展示言说的意义，言说不可或缺

3.　奥古斯丁：我们已经同意，言词是符号。——阿：完全同意。——奥：一个符号若不意指某种东西，还能是符号吗？——阿：不能。——奥：在这一行 Si nihil ex tanta superis placet urbe relinqui 中，有多少个词？——阿：八个。——奥：所以有八个符号？——阿：当然。——奥：你大概理解这句诗？——阿：我想理解得相当充分。——奥：告诉我每个词意指什么。——阿：我明白 si 的意思，却找不到另一个词来表达它。——奥：你至少知道它所意指的事物位于哪里吗？——阿：我想，si　表达怀疑；怀疑若不在灵魂中，又会在哪里？——奥：我暂且接受，继续说。

阿：Nihil（无）除了使人想到不存在之物，还能想到什么？——奥：你说的也许是真的。但你刚刚承认，没有符号不意指某种东西；而不存在之物不可能是某种东西，因此我不能完全同意。这样一来，诗中第二个词并非符号，因为它没有意指某种东西；我们先前约定所有言词都是符号，或所有符号都指示某物，便是错的。——阿：你逼得太紧了。不过，倘若没有任何东西可表达却仍诉诸言词，难道不是完全没有理性吗？你此刻同我交谈，当然没有徒然发出任何声音；从你口中出来的每个词都是符号，你借它们想使我理解某种东西。如果“无”这个词什么也不表达，你在话语中就不应说它。但如果你认为它在陈述思想、教导或以声音提醒我们时不可或缺，那么你必定明白我想说什么，只是我无法解释。

——奥：那么应当怎样说？这个词所指的，难道不是某个并不存在的物，而是心灵没有看见它、却发现或自以为发现它不存在时所受的印象吗？——阿：这也许就是我试图解释的。——奥：我们先继续，不再深究，免得落入最大的荒谬。——阿：什么荒谬？——奥：被“无”（nihil）拦住，并且停留在无上。——阿：这会很可笑；但不知为何，我觉得它确实可能发生，甚至已经发生了。

4. 奥：若上帝愿意，我们以后会在适当地方更完整地理解这种荒谬。现在回到引诗，用尽全力说明其余词项意指什么。——阿：第三个表达是介词 ex；我想可以用 de 替代。——奥：我并不是要你用另一个同样熟悉、意义相同的词替代一个熟悉的词；何况这里的意义当真相同吗？我们暂且承认。如果诗人没有写 ex tanta urbe，而写 de tanta，我再问 de 意指什么，你无疑会回答 ex，因为依你看，这两个词、两个符号表达同一个观念；而我所寻求的恰好是自己不知道的那个观念。——阿：这个介词在这里似乎意指某物同它原先所在、曾经构成其一部分的另一物分离；另一物如今是否仍存在并不重要。诗中那座城已经不复存在，特洛伊人却可能仍然活着；我们也会说，非洲有来自罗马的商人。——奥：我可以同意，而且不列举你的规则可能遭遇的许多例外。但你很容易发现，你只是用词解释词、用符号解释符号，并且以同样熟悉的符号解释非常熟悉的符号。如果可能，我希望你把这些词作为其符号的那些事物本身展示给我。

第三章　不使用符号，能否展示任何东西？

5. 阿：令我惊讶的是，你不知道——或者更确切地说，假装不知道——在回答中绝对无法做到你所要求的事情。我们正在交谈，而交谈只能用言词回答；你要求我给出事物，但任何事物当然都不是言词，

何况你自己也是用言词向我发问。请先不用言词提问，我也会不用言词回答。——奥：我承认，你说得有理。不过，如果我想知道 muraille（墙）这三个音节意指什么，你不能不用言词，用手指指出并让我看见这个词所表达的事物吗？——阿：我承认可以，但仅限于名称所指的物体当下在场时。

奥：我们会说颜色是物体吗？它难道不是物体的一项性质？——阿：确实。——奥：那么为什么也可以用手指指出颜色？你是否要把身体性质同物体放在一起，说只要它们当下在场，就都能不用说话而得到指称？——阿：我说“物体”时，本来是指一切身体性的东西，也就是物体中可以感知的一切。——奥：不过，再检查一下这里是否还有例外。

阿：你的提醒很恰当。我不该说“一切身体性的东西”，而应说“一切可见的东西”。声音、气味、滋味、重量、热度及属于其他感觉的东西，确实都只能通过身体感知，因此被称作身体的偶性；但它们无法用手指指出。——奥：你没有见过人们用手势同聋人交谈，聋人也用手势向同伴提问、回答、教导或展示几乎一切想表达的东西吗？这难道没有证明，不用说话也能展示声音、滋味等，而不只展示可见物吗？舞台上的演员同样不发一言，只用手势就能陈述并展开整出戏。——阿：我只有一个异议：舞台演员再会打手势，也和我一样，无法不说话就向你解释介词 ex 的意义。

6. 奥：你说的也许是真的。不过，假设他能够做到：无论他用什么手势向我展示这个词的意义，你大概都不会怀疑，手势仍是符号，而非事物本身。因此，他同样不是不用符号，而只是不用词，以一个符号解释另一个符号。单音节 ex 与手势会有同一意义；而我正要求以符号

以外的方式看见这个意义。——阿：可是怎样才能这样展示？——奥：就像墙可以展示那样。——阿：推论已经证明，墙本身也不能不借符号展示；手指的指示不是墙，只是展示墙的符号。所以，我看不到任何能够不用符号展示的东西。

奥：如果我问“走路”是什么意思，你随即站起来走，不就是以事物本身而非言词或其他符号回答我吗？——阿：我承认，也为自己没有看见如此清楚的事情而羞愧。它甚至使我想到成千上万可以通过自身而非符号展示的行动：吃、喝、坐下、站立、喊叫以及无数其他行动。——奥：那么告诉我，如果你本来正在走，我走来问“走路是什么”，你会怎样回答？——阿：我会稍微走快一点来回答你的问题；我所做的仍只是本来应当向你展示的行动。——奥：你知道走路不同于赶路吗？开始行走时未必立即加快脚步，而赶时间时也未必总在走；写字、读书以及无数其他事情也都可以赶。因此，如果你在我提问后把原先的动作做快，我会得出结论，以为走路就是加速；因为你只向我展示了更快的速度，这会使我犯错。——阿：我承认，若提问时我们已经在作某件事，就不能不用某个符号展示自己正在做什么。如果没有作出任何新动作，提问者会以为我们拒绝回答，轻蔑地继续原来的事。但如果他询问一项我们能够作出、提问时却尚未正在作出的行动，我们就可以在问题以后实际作出它，以事物本身而非符号解释。

不过，如果我正在说话时，他问我“说话是什么”，为了使他明白，我无论说什么都必须继续说话。因此，我会一直说到他理解为止，既不停止他想知道其性质的行动，也不借这项行动以外的符号来展示它。

第四章　指示符号是否也需要符号？

7. 奥：这项说明很有洞察力。现在看看我们是否同意：不用符号可以展示两类东西，一类是提问当下没有正在作出、却能够立即作出的行动；另一类是我们当下能够产生的符号，例如言说，它就是制造符号，“意指”一词也由此而来。——阿：我们同意。——奥：那么，如果有人询问某些符号，我们可以用符号解释；如果他询问并非符号的事物，我们可以在问题以后实际作出那些可能作出的事物，或者制造符号来吸引他注意它们的性质，对吗？

奥：请先考察三项命题中的第一项，即符号可以由符号解释。难道只有言词才是符号？——阿：还有别的。——奥：那么我想，说话时我们借词指称的，要么是词本身，要么是其他符号，例如交谈时的手势和书写时的字母，因为“手势”与“字母”这两个词所意指的，也都是某物的符号；或者我们还指称某个并非符号的对象，例如石头：“石头”这个词是符号，因为它唤起一个对象，但被唤起的对象不总是符号。不过，这最后一种使人认识非符号之物的符号，不属于当前讨论。我们已经着手讨论指示其他符号的符号，并根据它们标示同类还是异类符号，分成两部分。你认为清楚吗？——阿：清楚。

8. 奥：告诉我，被称作言词的符号属于哪种感觉？——阿：听觉。——奥：手势呢？——阿：视觉。——奥：书写的言词呢？它们是言词，还是更确切地说，是言词的符号？言词本身是接合起来、具有意义的声音；声音只能由听觉感知，因此写下一个词，就是给眼睛一个符号，使心灵想起击打耳朵的声音。——阿：我完全同意。——奥：你也承认，我们说出一个名称时，是在指称某种东西？——阿：当然。——奥：指称什么？——阿：拥有这个名称的对象本身，例如罗慕路斯、罗马、德性、河流等等。——奥：这四个名称不是意指某些对象吗？——阿：当然。——奥：名称同其所指对象之间没有差异

吗？——阿：差异很大。——奥：是什么？我想听你说。——阿：差异很重要：名称是符号，对象不是。——奥：为了方便讨论，我们是否可以像把能够看见的东西称作“可见者”一样，把能够由符号指称、自身却不是符号的对象称作“可意指者”？——阿：我同意。

奥：但你刚才提到的四个符号，难道不能由其他符号指示？——阿：难道你以为我已经忘了刚刚确认的事情，即书写字符是口头言词的符号？——奥：两者有什么差异？——阿：一类可见，另一类“可听”；既然我们接受“可意指者”，为什么不接受“可听者”呢？——奥：我很愿意接受。不过，你刚才提到的四个符号，是否还能由某个“可听”的符号指称？——阿：我刚才已经说过。您问名称是否意指某物，我以这四个例子证明。但这些例子与“名称”一样，都是声音说出的可听之物，我承认。——奥：那么，一个可听符号同它所指称、同样作为符号的可听词之间有什么差异？——阿：在“名称”同我列举的四个有名称者之间，我看到如下差异：“名称”是可听符号之符号；那四个例子虽然也都是可听符号，却不是符号的符号。它们指称事物本身：罗慕路斯、罗马、河流是可见之物，德性是可理解之物。

9. 奥：我明白并赞同。但你知道，人们把为了意指某物而发出的一切接合声音都称作“言词”吗？——阿：知道。——奥：所以“名称”也是言词，因为它是为意指某物而发出的接合声音。当我们说一个雄辩的人使用了精心选择的言词时，他当然既使用名称，也使用其他词；泰伦提乌斯笔下的奴隶回答老主人“求你说些好话”时，他所指的也包括许多名称。——阿：我同意。——奥：所以你承认，我们说“言词”这几个音节时也指称名称，“言词”是名称的符号？——阿：是。——奥：再回答：言词是名称的符号，名称是河流的符号，河流这个词又是眼睛可见之物的符号。你已指出物同“河流”这个符号以及后者同“名称”这

个符号之间的差异；那么请说，“言词”这个名称的符号，同它所指的名称本身有什么差异？——阿：依我看，差异是：名称所指的一切也都由言词指称，因为“名称”与“河流”一样也是言词；但“言词”所指的一切并不都由“名称”指称。例如您所引诗句开头的 si，以及引领我们走到当前思考的介词　　ex，都是言词，却不是名称。还可以找到许多类似词。因此，所有名称都是言词，却并非所有言词都是名称；“言词”与“名称”的差别由此很清楚：一边是指向一个不会再指向其他符号之符号的符号，另一边则是指向一个仍会指向其他符号之符号的符号。

奥：你承认每匹马都是动物，却不是每个动物都是马吗？——阿：谁会怀疑？——奥：名称同言词的差异，就像马同动物的差异。你是否因为 verbum 还有另一个意义而为难？它也表示随时间变位的那类词，如“我正在写、我写过、我正在读、我读过”；在这种意义上，verbum 显然不是名称。——阿：这正是我的为难。——奥：不必为难。“符号”也既有一般意义，指一切意指某物的东西，所以我们说词本身也是符号；又有特殊意义，例如军号或军旗，此时不包括词。如果我说“正如所有马都是动物，却并非所有动物都是马；所有言词都是符号，却并非所有符号都是言词”，你想不会再有困难。——阿：我终于明白并完全承认：广义的言词同名称的差异，正如动物同马的差异。

10. 奥：你还知道，我们说“动物”时，这个三音节名称是一回事，它所意指的东西又是另一回事吗？——阿：谈符号与可意指者时，我已经承认。——奥：你认为所有符号都像“动物”这个词一样，只表达不同于自身的东西吗？——阿：当然不是；“符号”这个词不仅指称所有其他种类的符号，也指称自身，因为它是词，而所有词都是符号。——奥：三音节的“言词”不也是如此吗？既然它意指一切表达思想的接合声音，它自己也属于这一类。——阿：确实。——奥：nomen、“名称”

不也是如此吗？它指称各类名称，自身也属于一类名称，因为它是中性名词。如果我问“名称”属于哪个词类，你能不回答“名词”吗？——阿：不能。——奥：所以，确实有些符号既指称自身，也指称其他符号。——阿：确实有。——奥：四音节的“连词”也是这类符号吗？——阿：不是，因为它是名称，而它所指的东西却不是名称。

第五章　相互指称的符号

11. 奥：你的回答正确。现在看看是否存在相互指称的符号，即一个意指另一个，后者也反过来意指前者。“连词”这个四音节词同它所指的词并不相互指称；“如果、或者、因为、既然、否则、所以、由于”等类似词，都由“连词”指称，但没有一个反过来指称“连词”。——阿：我明白了，也想知道哪些符号相互指称。——奥：你知道，说出“名称”和“言词”时，我们说了两个言词吗？——阿：知道。——奥：你也知道“名称”和“言词”是两个名称吗？——阿：也知道。——奥：那么你知道，“名称”与“言词”相互指称。——阿：知道。——奥：除了字母和声音的差异，你还能指出其他差异吗？——阿：也许可以，因为我看见先前说过的差异。“言词”指称一切接合起来、具有意义的声音，所以任何名称——尤其说出的名称——都是言词；但并非所有言词都是名称，尽管我们说“言词”时，它本身是名称。

12. 奥：如果有人向你断言并证明，所有言词都是名称，正如所有名称都是言词，你还能指出声音或字母以外的差异吗？——阿：不能，而且我想不存在。——奥：如果一切接合起来、富有表现力的声音同时既是言词又是名称，在一种关系中是言词，另一种关系中是名称，那么言词与名称之间就没有差异吗？——阿：我不明白。——奥：你至少明白，所有有颜色之物都可见，所有可见之物也都有颜色，尽管“有

颜色”与“可见”两个词的意义完全不同？——阿：明白。——奥：那么，即使“名称”与“言词”这两个名称或言词具有不同意义，所有言词同时都是名称、所有名称同时都是言词，又有什么奇怪？——阿：我看得出这可能，但等你说明如何可能。

奥：你无疑注意到，一切接合起来、具有表达力的声音都击打耳朵，使人听见；又进入记忆，使人认识？——阿：注意到了。——奥：所以同时完成两件事。——阿：是。——奥：这两项效果中，一项是否使这些声音被称作“言词”，另一项使它们被称作“名称”？Verbum（言词）来自 a verberando（击打），nomen（名称）来自 a noscendo（认识）：声音因在耳朵中造成印象而叫言词，因在心灵中造成印象而叫名称。

13. 阿：等你向我表明为何所有言词都可以称作名称，我就会同意。——奥：很容易。你应当学过并记得，代词之所以叫代词，是因为它替代名称，虽然指称对象不如名称完整。你曾在语法教师面前背诵的作者，我想这样界定：“代词是话语的一部分；它放在名称的位置上，意指同一事物，但不如名称充分。”——阿：我记得并赞同。——奥：按照定义，代词只能代替名称使用。我们说“这个男人、这位国王、同一个女人、这块金、这块银”时，“这个、这位、同一个”是代词，“男人、国王、女人、金、银”是名称，后者比代词更好地表达事物。——阿：同意。——奥：那么列举几个连词。——阿：“和、但是、以及。”——奥：所有这些（haec omnia）在你看来不是名称吗？——阿：完全不是。——奥：你至少认为我说 haec omnia 是正确的？——阿：完全正确；我甚至明白你多么巧妙地表明，我刚才说出的是名称，否则你不会说“所有这些”。不过，您的说法之所以正确，难道不是因为我不否认这四个连词是“词”吗？Haec omnia 可以指 verba（言

词），也可以指 nomina（名称）。但如果问 verba 属于哪个词类，我仍会简单回答：名称。因此，代词 haec 也许指向“名称”，您的说法才正确。

14. 奥：你虽有洞察力，仍然错了；不过，为认识真理，请更敏锐地注意我接下来要说的——但愿我能如愿表达。因为以词讨论词，就像把手指交叉起来彼此摩擦一样复杂。除了感到发痒的人，谁能分清哪些手指令人发痒、哪些手指在止痒？——阿：我全神贯注；这个比喻使我的注意力极为敏锐。——奥：词由声音与字母构成。——阿：毫无疑问。——奥：那么，我们首先诉诸自己最珍视的权威。使徒保罗说：“基督里没有‘是’与‘否’，在他里面只有‘是’。”我想，我们不应以为“是”这个词的几个字母在基督里面，而应理解为这些字母所意指的东西。——阿：确实。——奥：所以，“是存在于他里面”无非表示：存在于他里面的东西被称作“是”。如果使徒说“德性在他里面”，也应当只理解为：存在于他里面的东西被称作“德性”；不能以为两个音节在那里，而不是音节所意指的东西。——阿：我理解并同意。——奥：你也明白，“叫作德性”与“命名为德性”没有区别？——阿：很清楚。——奥：那么，“在他里面的东西叫作‘是’”与“命名为‘是’”也没有区别。——阿：我同样看不出差异。

奥：你现在明白我想证明什么了吗？——阿：还没有。——奥：你没有看见，名称就是用来命名某物的东西吗？——阿：没有什么比这更清楚。——奥：既然在他里面的东西被命名为“是”，你便看见“是”也是一个名称。——阿：无法否认。——奥：但如果问“是”属于哪个词类，你大概会说它不是名词而是副词，尽管理性也教给我们，副词同样是名称。——阿：完全正确。——奥：你还怀疑其他词类在同一意义上也是名称吗？——阿：不怀疑，因为我承认它们意指某物。如果

您问每一个词类所指的对象叫什么、怎样命名，我只能说出这些词类本身；我们通常不把它们叫名称，却不得不以名称来称呼它们，我现在明白了。

15. 奥：你不担心有人削弱这项推论吗？他会说，使徒的权威应当在教义上而不是措辞上得到承认，所以我们信服的基础并不像自己以为的那样牢固。保罗生活与教导固然完善，却可能在“是存在于他里面”这句话中表达得不准确，尤其因为他自己承认不善言辞。该怎样回应？——阿：我想不出；如果要以权威支持证明，请选择一位公认精通言说艺术的人。——奥：所以你认为，不诉诸某项权威，理性不足以证明每个词类都意指某种可由名称指称、因而本身也有名称的东西。但只要比较若干语言，就很容易确认。如果你问，希腊人怎样命名我们称作疑问代词“谁”的东西，他们都会回答 tis；怎样命名“我想要”？thelō；“好”？kalōs；“已经写下的”？to gegrammenon；我们的连词“和”？kai；ab？apo；“唉”？oi。逐一考察所有词类，谁看不出这些问题表达正确？若这些词类不是名称，这种表达怎会正确？因此，无须诉诸雄辩者的权威，这种办法就证明使徒保罗表达无误；还有什么必要寻找作者来支持我们的看法？

16. 有些人也许因为迟钝或顽固，仍不信服，坚持只有大家公认的语言立法者之权威才能使他让步。那么，拉丁文坛中还有谁比西塞罗更杰出？西塞罗在著名的《维勒斯演说》中，把介词 coram 称作一个“名称”，尽管他当时把它作为副词使用。我也许没有充分理解那段话，别人或我自己也可能另作解释；但以下一点无法反驳。最伟大的逻辑大师教导说，任何能够得到肯定或否定的完整命题，都由名称与动词构成；西塞罗在某处称之为“判断”。大师还说，当动词采用第三人称时，名称必须用主格。他们是对的，你可以同我一起验证。当我们说

“人坐着”“马奔跑”，你无疑承认这是两个判断？——阿：承认。——奥：每个判断都有一个名称：第一个是“人”，第二个是“马”；也各有一个动词：第一个是“坐着”，第二个是“奔跑”。——阿：我看见了。——奥：如果我只说“坐着”“奔跑”，你就会问“谁”或“什么”；我会回答“人、马、动物”或任何别的东西，把名称加到动词上，使判断——也就是能够得到肯定或否定的命题——完整。——阿：我明白。——奥：注意结论！

假设我们远远看见某样东西，不知道是动物、岩石还是别的对象。如果我说“既然它是人，它就是动物”，岂不是冒失？——阿：非常冒失；但若说“如果它是人，它就是动物”，则毫不冒失。——奥：你说得对。所以，我喜欢你句子中的“如果”，你也喜欢；而我们都不喜欢我句子中的“既然”。——阿：同意。——奥：现在看看“‘如果’令人喜欢”“‘既然’令人不快”这两个命题中的判断是否完整？——阿：完全完整。——奥：那么请指出动词和名称在哪里。——阿：动词是“令人喜欢”和“令人不快”；名称显然是“如果”和“既然”。——奥：因此已经充分证明，这两个连词同样也是名称。——阿：证明得很充分。——奥：你能自己把同一规则应用于其他词类吗？——阿：能够。

第六章　指称自身的符号

17.　奥：让我们继续。依你看，是否所有名称都是词、所有词都是名称，正如所有言词都是名称、所有名称都是言词？——阿：我确实看不出声音以外的差异。——奥：眼下我同意，尽管有些人也看见意义上的差异；现在无须考察。你无疑注意到，我们已经抵达相互指称、彼此只有声音差异的符号；它们也连同其他全部词类一起指称自身。——阿：我不明白。——奥：你不明白“词”指称“名称”，“名称”也指称

“词”，而在“名称”取广义时，两者只有声音差异吗？“名称”取狭义时，则被看作八个词类之一，并排除其余七类。——阿：明白。——奥：我所谓词与名称相互指称，正是这个意思。

18. 阿：我懂了。但您说“它们也连同其他词类一起指称自身”，是什么意思？——奥：我们先前不是已经看到，所有词类都可以叫作词和名称，也就是都能由“名称”和“词”指称吗？——阿：是。——奥：如果我问，这个“名称”本身——也就是这个音节产生的声音——叫什么，你不能回答“名称”吗？——阿：可以。——奥：我们用“连词”几个音节表达的另一个符号，也以这种方式指称自己吗？“连词”这个名称不属于它所指称的那些词。——阿：确实。——奥：所以我有理由说，“名称”既指称自身，也指称它包含的其他全部名称；任何“词”也都如此，这一点你无需我帮助便能推知。——阿：现在很容易。不过我想到，“名称”既有一般用法又有特殊用法，“词”却不被用来表示八个词类之一；这就是两者之间声音以外的新差异。

奥：你认为拉丁语 nomen 与希腊语 onoma 除了两种语言中特有的声音差异，还有别的差异吗？——阿：这里看不见。——奥：那么，我们已经抵达这样一些符号：它们指称自身；它们彼此可以具有不同意义，也可以具有相同意义，最后甚至只有声音差异。我们刚刚发现了第四种情形；前三种讨论的都是名称与言词。——阿：我们确实抵达了。

第七章　前几章总结

19. 奥：你愿意总结这场谈话的发现吗？——阿：我会尽力。首先，我记得我们探讨语言为何存在，并同意它为了教导或唤回记忆而设立。

我们向某人提问时，唯一目的就是使他知道我们想知道什么。至于歌唱，它似乎由快乐激发，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语言。我们向上帝祈祷时，不能设想教给或提醒他什么；祈祷言词只有一个目的，即激发我们自己，激发或教导别人。

随后，我们确认言词只是符号，而且没有任何符号不指称某物。您让我说明下面这行诗中每个言词意指什么：

Si nihil ex tanta superis placet urbe relinqui

这行诗的第二个词尽管极常用、看似极清楚，我们却找不到它意指什么。我觉得，我们在话语中使用它并非徒然；它应当教给听者某种东西，或许指示灵魂发现或自以为发现所寻找之物不存在时的印象。您当时用玩笑回应，仿佛要避开什么深刻问题，把说明推到以后。别以为我忘了您的承诺。

接着，我试图解释诗中第三个词；您催促我不要以意义相等的词替换，而要展示这些言词所意指的事物本身。我回答，在话语中做不到；于是我们谈到用手指指示来回答。我原以为一切身体性的东西都可以用手指指出，后来发现只有可见对象可以。不知怎样，我们又谈到聋人和舞台演员；他们不说话，仅用手势便能展示几乎所有能够谈论的东西，而不限于可见对象。不过，我们承认，他们的手势仍是符号。

于是，我们重新考察如何不借符号展示符号所唤起的事物本身。显然，墙、颜色以及一切可以用手指指示的可见物，都借某个符号得到展示。我曾错误地说，不可能找到任何例外；最后我们同意，只要提问时没有正在作出、问题后又能够实际作出，一项行动便可以不用符

号指称。不过，语言的性质是例外：如果有人在我们说话时问语言是什么，显然可以通过语言本身界定它。

20. 由此我们明白：人可以借符号展示符号或非符号之物；也可以在提问后实际作出某事，不借符号使人认识它。在这三项命题中，我们尤其仔细地研究并讨论第一项。我们认识到，有些符号不属于自身所指的符号，例如“连词”这个四音节词；另一些符号则属于。例如，说“符号”时也指称言词，说“言词”时也包含符号，因为“符号”与“言词”既是两个符号，也是两个言词。

我们还看到，在这种相互指称的符号中，有些意义范围较窄或相同，另一些意义完全相同。例如“符号”二字包括一切能够指称某物的东西；“言词”却不包括所有符号，只限于接合声音所发出的符号。因此，虽然“符号”指称“言词”，“言词”也指称“符号”——一词的两个音节使思想转向另一词的三个音节——“符号”的范围仍比“言词”广，前者所指的对象更多。不过，广义的“言词”同广义的“名称”具有相同范围；理性已经表明，所有词类都能成为名称，因为代词天然同名称相连，一切词类都可以充当某物的名称，并且每个词类都能同动词构成完整命题。

然而，当所有言词都被看作名称时，即使“名称”与“言词”的意义范围相同，也不表示它们意义相同。我们认为，不同原因使它们取得不同称呼：言词作用于耳朵，名称应当唤醒心灵的记忆。下面的表达也能证明：“想交付记忆的这个东西叫什么名称？”完全正确；但人不会问：“这个对象是什么言词？”

在那些不仅意义范围相同、意义也完全相同的符号中，我们注意到拉丁语 nomen 与希腊语 onoma。刚才谈相互指称的符号时，我忘了说：我们没有发现任何符号在指称其他同类符号时不也指称自身。这就是我所能记起的一切。我相信，您在这场谈话中没有提出任何自己并不确定的事情；请看我的总结是否妥当。

第八章　这场讨论的用处：回答时，心灵必须转向符号所唤起的东西

21. 奥古斯丁：你的记忆相当忠实地重现了我要求的一切。坦白说，我此刻比我们在讨论中共同从某些幽暗隐处艰难地抽取这些区分时，看得清楚得多。但如此费力的迂回要把我们带到哪里？现在很难说。也许你以为我们在游戏，把心灵从严肃问题引开，转向儿童式问题；或者以为我们只期待一些轻微、平庸的益处。也许你猜到我们应当抵达某项重大成果，因而渴望尽快看到或至少听说它。请相信：我们也许确实在游戏，但不能以儿童方式评价自己的行动；我并未在这场谈话中安排徒然消遣，期待的益处也绝非轻微或平庸。如果我说，我希望在上帝——即真理本身——引导下，通过这些同我们的软弱相称的小步，抵达有福且永恒的生命，你也许会觉得我可笑，并问：既然踏上这条王道，为何不研究事物而研究符号？那么请原谅我同你作这番前奏；这不是为了游戏，而是为了锻炼心灵的力量与洞察力，因为我们需要它们，才能承受并热爱有福生命所在的天上领域之光与热。——阿：请照原来的方式继续。愿上帝永远阻止我把您认为值得说或做的事情视为可鄙！

22. 奥：现在考察那些不指向其他符号、而指向我们所谓可意指者的符号。先告诉我，人是不是人？——阿：这回我真怀疑您在开玩笑。——奥：为什么？——阿：因为您居然要问，人是不是别的而不是

人。——奥：如果我再问，这个名称的第一个音节是否不是“人”的第一部分，第二个是否不是第二部分，你也会以为我在戏弄你？——阿：当然。——奥：把两个部分合起来就是“人”，你否认吗？——阿：谁会否认？——奥：那么听好：你自己就是这两个音节的结合吗？——阿：当然不是，但我明白您要往哪里走了。——奥：说出来，不要以为我要侮辱你。——阿：您想得出结论，说我不是人。——奥：你既然承认了准备这项结论的一切为真，难道不也这样认为？——阿：我先不告诉您自己的想法；我必须先知道，您问“人是不是人”时取哪种意义：是说这个词的两个音节，还是它们所意指的东西？——奥：倒是你先回答，你以哪种意义理解我的问题。既然问题含混，你本应注意到，并在确定我的意思以前不回答。——阿：歧义有什么关系？我在两个意义上都回答了：人确实是人；两个音节无非是这两个音节，它们所意指的也无非就是它所是的东西。

奥：想得不错。但你为什么只在“人”这个词中把握两个意义？为什么没有以同样方式理解其余言词？——阿：您怎样证明我没有？——奥：只说第一个问题：如果你在其中只看见音节，就根本不会回答，我看起来甚至没有问你。但你听到我说出三个词，又在“人是不是人”中重复“人”时，却把另外两个词理解为意义而非符号；证据就是你立即认为能够确定而自信地回答。——阿：确实。——奥：那么你为何只在其中一个词里同时考虑声音与意义？——阿：从此以后，我在整句话中只看意义；我同意，若听见言词时心灵不转向其所意指的东西，话语便不可能。现在请说明，我怎样被那套推论骗到，以至结论变成“我不是人”。——奥：我再问同样的问题，你会自己看见怎样受骗。——阿：好。

23. 奥：第一个问题你已解决，我不再问。更仔细地看：第一个音节是否就是它自身，第二个也是否就是它自身？——阿：我保证看不出别的。——奥：再看，把它们合起来不就是“人”吗？——阿：我绝不承认；因为我们有充分理由约定，看到符号时应当转向它所意指的东西，再予以肯定或否定。两个音节分开说时毫无意义，因此正如我们说过的，它们只是自身发出的声音。——奥：所以你由衷相信，问题以言词表达时，我们只应针对它指示的意义回答？——阿：只要那些确实是言词，我不明白人怎能不信。

奥：我很想知道，你怎样回答那个令人发笑的机灵人。据说他证明一头狮子从对话者口中出来。他先问“我们所说的东西是否从口中出来”，对方无法否认；随后很容易地诱使对方说出“狮子”，立即开玩笑道：“你承认所说的一切都从口中出来，又不能否认自己说了狮子；善良的人啊，你刚刚吐出了一头巨兽！”——阿：要抵挡这场玩笑并不难。我不会承认“我们所说的一切都从口中出来”。说话是表达我们所说之物的符号；从口中出来的不是物本身，而是表达它的符号。刚才讨论的那种指向其他符号的符号除外。——奥：我看你对这位对手已经装备充分。不过，如果我问：“人是名称吗？”你怎样回答？——阿：当然是名称！——奥：怎么？我看见你时，看见的是一个名称？——阿：不是。——奥：要我推出结论吗？——阿：请不要。我自己宣布，我不是人。您问“人是不是名称”时，我怎么能回答是呢？我们不是已经约定，回答是或否时必须注意言词的意义吗？

奥：不过，落入这个错误结论并非对你毫无用处；刻在灵魂中的理性法则战胜了你的警觉。如果问“人是什么”，你会回答“一种动物”；若再问“‘人’属于哪个词类”，你只能回答“名称”。因此，“人”既是名称又是动物：作为符号，它是名称；作为符号所表达的事物，它是动物。所

以当有人问“‘人’是名称吗”，我应当简单回答“是”，因为他已经充分表明，是把它作为符号来考察；当问“人是动物吗”，我更应立即肯定。为什么？如果既没有说“名称”，也没有说“动物”，只问“人是什么”，心灵会依照自然法则转向两音节的意义，回答“人是动物”，甚至给出完整定义：“人是有理性且会死的动物。”这不是真的吗？——阿：我完全相信。但既然承认“人”是名称，我们如何逃避“我们不是人”这个侮辱性结论？——奥：只须指出，结论所取的意义并不是我们肯定回答问题时所取的意义。若提问者坚持两者意义相同，也不必害怕。承认我不是“人”——也就是不是两个音节——有什么可怕？——阿：再真实不过。但既然它是从我们承认的东西推出，为何别人说“所以你不是人”时，我会感到受辱？——奥：因为听到这两个音节时，我无法不把它们表达的意义附着于结论；我服从那条强大而自然的法则：听到表达意义的符号，便转向所表达的意义。——阿：我喜欢这个说法。

第九章　应当把事物或对事物的认识，置于表达它们的符号之上吗？

25. 奥：现在请明白，由符号指称的事物优于符号，因为手段总是而且必然不如目的。你有不同看法吗？——阿：我想不能轻易同意。“泥污”这个名称似乎远胜于它所意指的东西；听见这个词时令我们厌恶的也不是声音。只改一个字母，把 cœnum 换成 cœlum，泥污就变成天空；二者何等悬殊！所以，我不会把事物中令我厌恶的东西归给符号，并有理由把符号置于现实之上；我们宁愿听见前者，也不愿碰到后者。——奥：观察得很明智！那么，“所有由符号指称的事物都优于符号”就是错的？——阿：我想是。

奥：那么告诉我，给这种肮脏、令人厌恶之物安上名称的人受什么引导；我想知道你赞成还是反对。——阿：两者都不敢，因为我不知道

他们受何引导。——奥：至少你知道自己说出这个名称时想要什么吗？——阿：完全知道：我想给出一个符号，使我认为需要知道泥污性质或在场的人能够认识或辨认它。——奥：但这个名称使你给予或接受的教导，不应当比名称本身更可贵吗？——阿：我承认，由这个符号获得的认识优于符号；但泥污本身并不因此优于符号。

26. 奥：所以，我们所说的“所有现实都比其符号更可贵”是错的；但“所有手段都低于目的”并不错。通过名称获得的对泥污的认识，优于我们认为又高于泥污的名称；而这种认识优于符号，唯一原因是它构成终点，符号只是抵达它的手段。下面这个给贪食者的回答正说明这一点。

这个被使徒称作“崇拜肚腹”的人说，自己活着是为了吃。一个节制的人听见后无法容忍，说：“为了活着而吃，岂不是好得多？”前者受责备，是因为说自己为吃而活，把生命置于口腹快乐之下；后者值得赞扬，只因为他区分目的与手段，把手段置于目的之下，并提醒我们应当为活而吃，不应为吃而活。你或其他明智评判者大概也会这样回答一个喋喋不休的人：如果他说“我为了说话而教”，人们难道不会回答：“朋友，你为何不为了教而说话？”

如果这些都是真的——你对此确定——那么你必定看见，言词远远低于我们使用它们所追求的目的。言词的用法已经高于言词本身，因为言词为了供我们使用而存在，而我们使用它们是为了教。教学优于语言多少，语言就优于词多少；因此教学远远高于词。我想知道你有什么异议。

27. 阿：我承认学说高于言词；但“手段从属于目的”这项规则是否完全无可反驳，我不知道。——奥：另找更合适的机会，我们会更仔细考察。眼下，你承认的已经足够。你承认，对事物的认识应当优于符号；在你看来，难道不也由此推出，对事物的认识应优于对符号的认识？——阿：我承认的是对事物的认识优于对符号的认识吗？我只说它优于符号本身，所以不敢接受。难道不能指出：正如“泥污”这个名称比泥污本身高贵，对这个名称的认识也胜过对泥污的认识，尽管名称本身低于对名称的认识？这里有四样东西：名称与泥污、对名称的认识与对泥污的认识。既然名称优于泥污，对名称的认识为何不能优于对泥污的认识？要阻止前者优先，难道就必须让它从属于后者？

28. 奥：我由衷赞叹你既没有收回已经承认的东西，又清楚解释思想。你大概也相信，“恶习”这个名称比它所意指的东西好，尽管对名称的认识远不如对恶习的认识有用。这里同样可以区分四样东西：名称与恶习、对名称的认识与对恶习的认识。在佩尔西乌斯的诗句“他惊讶于恶习”中，“恶习”这个名称毋宁是一项修饰而不是缺陷，尽管恶习本身在任何有恶习的人那里都应受责备；但对恶习的认识不是如此，它远比对名称的认识可贵。

阿：即使它使人如此痛苦，您仍认为它更可贵？同一位诗人不是把一种刑罚置于暴君残酷构想并因激情施加的一切痛苦之上吗——强迫不幸者认识自己无法避免的恶习。——奥：照此说，你也可以否认对德性的认识优于对其名称的认识，因为看见德性却不拥有它，也是一项讽刺诗人诅咒暴君承受的刑罚。——阿：愿上帝阻止我如此愚蠢！最好的教育以认识充实心灵，不能责怪这些认识。不过，我想应当像佩尔西乌斯那样认为：凡这种强有力的认识良药也无法治愈的人，正是凡人中最不幸者。——奥：很好。但无论佩尔西乌斯怎样想，与我们

有什么关系？这类问题不受异教作者权威约束。何况，要说明一种认识是否应优于另一种，在这里并不容易。我满足于已有约定：对事物的认识即使不优于对符号的认识，也必然优于符号本身。

那么，让我们重新仔细考察那些据说能够不借任何符号、仅凭自身展示的事物，例如说话、走路、坐下、躺下等等。——阿：我记得。

第十章　能够不借符号教导吗？——词不给予认识

29. 奥：你认为，凡提问后我们能够立即作出的行动，都能完全不借符号展示吗？有例外吗？——阿：我反复考察各种行动，仍没有发现任何一个真正能够不借符号展示。也许只有语言，以及别人要求解释“教导”是什么意思时可以例外。因为无论别人提问后我怎样实际行动来教他，我清楚看见，他不会从要求展示的事物本身得到启明。例如我原本站着不动或正在做别的事，有人问走路是什么；我立即行走，试图不借符号教他。但怎样阻止他以为，走路就只是走我所走的那段距离？如果这样认为，他便受骗；看见别人走得比我稍多或稍少，他就会认为那不是走路。我对走路所说的，也适用于一切先前被我认为能不借符号展示的东西，只须排除刚才两种情形。

30. 奥：我接受。但你不觉得“说话”与“教导”是两件不同的事吗？——阿：当然不同，否则人就只能借说话教导。但人经常借言词以外的其他符号教导，所以谁会怀疑它们有差异？——奥：“教导”与“指示”还有没有差异？——阿：我想没有。——奥：说“我们指示是为了教导”，表达正确吗？——阿：很正确。——奥：若有人反过来说“我们教导是为了指示”，不是很容易用你刚赞同的说法驳斥吗？——阿：是。——

奥：如果我们为了教导而指示，而不是为了指示而教导，那么教导就不同于指示。——阿：确实，我先前说两者相同是错的。

奥：现在回答：除了借符号，能够教给人“教导是什么”吗？——阿：我看不出其他方式。——奥：那么你刚才所说“当别人询问教导是什么时，可以不借符号教给他”，就是错的。既然你承认指示不同于教导，而一者只能借另一者阐明，就不能像你以为的那样通过自身得到认识。因此，除了能够像解释其余东西一样解释自身的语言，我们尚未发现任何可以不借符号展示的东西；而语言本身也是符号，所以我想，没有任何东西能够不借符号得到教导。——阿：我没有理由反驳。

31. 奥：所以已经证明，任何东西都不能不借符号得到教导，而且认识应当比传达它的符号更可贵；不过，并非所有对象都一定比表示它们的符号更可贵。——阿：我同意。——奥：但我们经过多少迂回，才抵达如此微小的结果！还记得吗？我们以言词彼此交锋许久，试图解决三个问题：一、是否有任何东西能够不借符号得到教导；二、是否有符号应当优于它所唤起的对象；三、对事物的认识是否优于符号。

不过还有第四个问题，我希望你用几句话回答：你认为自己已经理解这些真理，再也不可能怀疑吗？——阿：我本希望经过如此多迂回与曲折，已经抵达确定性；但您的问题似乎有什么令我不安，使我无法肯定。若您没有异议，大概不会问。这里有种复杂性阻碍我平静地看清整体并回答；我害怕在其幽暗褶皱中，还有某物逃过心灵目光。——奥：我喜欢这种犹疑，它证明你不冒失；若想保持平静，不冒失很重要。因为在讨论冲突中，一旦那些被我们欣然握持的信念动摇、仿佛从手中被夺走，我们很难不受扰乱。充分考察并理解理由后让步

固然正当，把未知当已知却很危险。如果我们视为坚定、不可动摇的真理轰然倒下，就有理由担心反冲会使我们憎恨或害怕推理，甚至拒绝相信证明得最充分的真理。

32. 回来用几句话考察你的怀疑是否有根据。假设一个人不知道怎样用树枝与黏胶捕鸟，遇见一个背着用具、尚未布置而正在赶路的捕鸟人。他看见以后加快脚步，理所当然地惊讶，想知道整套装备做什么。捕鸟人注意到他聚精会神，为展示本领便布置树枝；看见射程内有只鸟，就用箭与猎鹰击中、捕捉并带走它。难道他不是未借任何符号、以现实本身向旁观者展示后者想知道的东西吗?

阿：这会不会同我针对“走路是什么”的提问所指出的情况一样？我担心如此，因为在我看来，捕鸟术并未得到完整展示。——奥：要消除担忧很容易。再假设旁观者足够聪明，能够根据所见形成对整门技艺的认识。只要在有限的一些材料上，能够不借符号教给少数人，就足够了。——阿：那么我也能补充：如果我所说的那个人足够聪明，走几步就能使他明白走路是什么。——奥：我允许，而且非但不反对，反而鼓励你这样说。

你确实看见，我们两人都得出了这个结论：有些事物可以不借符号得到教导；我们先前以为绝对没有任何东西能不借这种手段得到展示，是错的。我现在看到，不是一两件，而是成千上万的对象不借符号、凭自身显现出来。我问你，这怎能怀疑？且不说人、人的剧场，以及人在无数表演中不诉诸任何符号便呈现现实；上帝和自然难道不把这一切置于我们眼前吗：照亮并使宇宙万物闪耀的太阳与光，月亮与群星，陆地与海洋，以及它们产生的无数生灵。

33. 但重新仔细考察，你会发现我们究竟能通过符号学到什么？若我不知道一个符号唤起什么，别人向我作这个符号也是徒然，它不能教给我任何东西；若我已经知道，它又教给我什么？当我读到："他们的 saraballes 也没有改变"，这个词并未让我看见所说的对象。如果这个名称表示某种头部饰物，我听到它时，难道才学会什么叫头、什么叫饰物吗？我先前已经知道；而这项认识并非来自听别人说出名称，而是来自亲眼看见它们。我的耳朵第一次受到 tête 这个双音节的声音冲击时，我对其意义的陌生，并不亚于第一次听到或读到 saraballes 时。但随着反复听见 tête 这个词，我发觉它是我通过看见而早已充分认识之物的名称。在我发现这一点以前，它只是一种声音；当我知道它意指什么——也就是我亲眼见过的东西——以后，我才知道它是一个符号。所以，与其说符号教给我们事物，不如说我们先由事物学会符号。

34. 为了更清楚地理解这一点，假设我们第一次听见 tête 一词。我们不知道这个言词只是声音，还是同时也是符号。这时我们想认识的——请记住——不是头本身，而是听到的符号；因为只要不知道它指向什么，我们就不认识这个符号。那么，为满足我们的求知欲，若有人用手指指向头本身，我们便通过看见它，学会了先前听见却不理解的符号具有什么价值。

在这个符号中有两样东西：声音与意义。我们对声音的感知并非来自符号，而是来自声音本身对耳朵的冲击。至于意义，我们则通过看见它的对象而认识。事实上，我的手指这一指示，只能表示它所指向的对象。它指向的是头本身，而不是唤起头的符号。那么，这项指示怎能使我认识头——既然我已经认识它——或认识它的符号——既然我并未把手指指向符号？况且，我并不十分关心这项指示，因为在我看

来，它与其说展示对象本身，不如说只是唤起“有人在展示”这件事。副词 voilà 也是如此。我们说出它时，通常还要加上手指的指示，正是由于担心单独一个符号并不足够。

如果可能的话，我尤其想使你相信：我们没有通过那些称为言词的符号学到任何东西。因为正如我所说，并不是符号给予我们对事物的认识；相反，是对事物的认识使我们知道词的价值，也就是隐藏在声音之中的意义。

35. 我针对头所说的，也适用于饰物与无数其他对象。我认识这些饰物，却直到那时仍不知道人们用 saraballes 这个名称指称它们。如果别人用手势向我指出它们，把它们画出来，或向我展示它们像什么，我不会说自己没有由此认识它们；只须再补充几句话，我便很容易证明这一点。我只说，我不是通过言词认识它们的。但如果我正仔细看着它们时，突然有人对我说：“瞧，这就是 saraballes”，我就会学到先前不知道的东西；然而使我学到它的，不是向我说出的言词，而是对对象的观看，正是这项观看使我理解 saraballes 这个名称的意义。我并非凭他人的见证认识它，而是凭自己眼睛的见证；外来的见证所能做的，只是唤醒我的注意，也就是促使我用目光研究眼前之物。

第十一章　言词响在耳边；真理教导心灵

36. 若说言词所能做的一切，就是激励我们研究而不使我们认识任何东西，这已经是给予它们很高评价。为了使我受到教导，必须把我想认识的东西置于我眼前、某种其他身体感官之前，甚或心灵之前。因此，言词教给我们的只是言词，或者不如说，只是它们发出的声音与响动。因为，既然言词本质上是符号，即使我听见同一个言词，在知

道它意指什么以前，我仍不知道它是一个言词。因此，对事物的认识补足了对言词的认识；听见词时，我们甚至没有学会词。我们并不学习已经知道的词；而在把握不知道的词的意义以前，难道能够断言自己知道它们吗？使人把握意义的，不是冲击耳朵的响动，而是对词所指对象的认识。没有什么比下面这个二难更真实：言词在我们面前说出时，我们或是知道它们意指什么，或是不知道。如果知道，它们与其说使我们认识，不如说唤起我们的记忆；如果不知道，显然它们也唤不回任何记忆，或许只会激励我们去求知。

37. 你无疑会承认：既然我们对这些 saraballes 只知道一个名称，在真正看见它们以前，我们便不可能真实地认识它们；甚至这个名称本身，也不能先于它们得到充分认识。不过你也许会说：关于那三个孩子，我们所知道的一切难道不是通过言词学来的吗？他们的信仰与虔敬怎样战胜君王与火焰，怎样歌颂上帝，又怎样赢得敌人亲自赐予的崇高荣誉？我的回答是：这些言词所意指的一切，我们先前已经知道。我知道所谓三个孩子、火炉、火焰、君王是什么意思，知道免受火焰伤害是什么，也知道其余言词所表达的一切。至于阿纳尼亚、阿匝黎雅和米沙耳，他们对我而言同这些 saraballes 一样陌生；他们的名字没有、也不可能帮助我认识他们。这个故事所叙述的一切当时确实发生过；与其说我知道，不如说我相信。

我们所信赖的圣作者并不忽视这项差异，因为一位先知曾说：“如果你们不信，就不会明白。”如果他认为知与信毫无区别，就不会这样说。我相信自己所理解的，却并不理解自己所相信的一切。而我所理解的，我便知道；所以，我并不知道自己所相信的一切。不过，我并不忽视：即使相信许多我不知道的事情，对我也大有益处，其中就包括

三个孩子的故事。因此，即使我不可能知道大多数事情，至少知道相信它们对我多么有益。

38. 但我们怎样达到理解？不是向外面发出声响的谈话者求教，而是向内在的、居于心灵王座之上的真理求教；我们听见的言词或许会促使我们去求教。人们求教、并且施行教导的这项真理，就是基督本身，也就是上帝不变的力量与永恒的智慧；经上说，他住在内在的人之中。诚然，每个理性灵魂都会向这项神圣智慧求教；但它只依每个人意愿的善恶程度向其显现，而发生错误时，过错并不在所求教的真理。难道身体目光经常发生错觉，要归咎于外在的光吗？我们不是借这光考察可见之物，请它在视力所及的范围内把它们展示给我们吗？

第十二章　基督就是真理，他在内在施行教导

39. 因此，为判断颜色，我们求教于光；为判断感性事物，我们求教于这个世界上的一切、诸身体以及我们自己的感官；这些感官仿佛是心灵为认识物质世界而使用的译者。至于属于理智领域的东西，我们则通过理性求教于内在真理。那么，怎样证明言词教给我们的不只是它们冲击耳朵的声音？我们只通过感官或心灵认识事物。通过感官感知的事物称为感性事物，通过心灵感知的事物称为可理解之物；或者用我们的基督教作者的话说，前者称为肉身之物，后者称为精神之物。人们就前者向我们提问时，如果对象正在眼前，我们便依照感官印象回答。例如，当我们正在观看新月时，别人问它是什么，或它在哪里。若对方看不见，他会相信、甚至常常不会相信我们的回答；但他只有亲眼看见，才真正学到新月是什么。那时教导他的，不是外在的言词，而是事物本身与感官，因为无论他看见与否，言词发出的声音都不会改变。

如果人们问的不是此刻冲击感官之物，而是过去曾经冲击它们的事物，我们展示的便不是对象本身，而是它们留下并托付给记忆的形象。既然这些形象不是现实，我完全不知道我们怎能把它们说成真的。避免说谎的唯一办法，是回答我们不是正在看见或感知这些对象，而是曾经看见和感知过它们。因此，在我们的记忆深处，这些形象犹如感官所受冲击的纪念物；只要我们以正直的意识凝视这些纪念物，我们的语言便不虚假。但这些纪念物是为我们自身存留的：如果听者也感受并看见过我所说的东西，我的言词没有教给他任何东西，他只是在自己同样携带的形象中认出一切；反之，如果他没有看见过，显然他与其说理解我，不如说相信我。

40. 当问题涉及心灵——也就是知性与理性——所见之物时，我们的确表达了自己在内在所见的东西；那真理的内在之光，把光芒与温柔的宁静倾注于内在的人。但这里仍然如此：如果听者在自己的灵魂中清楚看见我们所见的东西，教导他的便不是我们的言词，而是他自身纯粹的沉思目光。当我说出他所见的真理时，我没有教导他；我的言词没有让他学到任何东西。上帝把事物展示给他，他看见它们；若有人提问，他自己也能够回答。既然在听见我说话以前，他就能向提问者亲自解释，若还想象是我的言词教导了他，岂不是极其荒谬？常有这种情况：他起初否认某事，后来又在另一些问题引导下同意它；这应归因于他目光的软弱：他无法在内在之光的照耀下辨明完整真理。为了逐步让他看见真理，接连提出的问题把构成这个对象的各部分逐一置于他眼前，而他起初无法把它看作一个整体。不要惊讶谈话者的言词能把他引到那里；这些言词并不教导他，只是依照他接受内在教导的能力向他提问。举一个例子：

假设我就我们讨论的主题向你提问，问你言词是否不能教给任何东西。起初这在你看来很荒谬，因为你还不能在问题的整体中把握它。因此，我必须使问题同你的力量相称，考虑你能在多大程度上聆听内在的教师，并对你说：你在我的言词中认出的、确信无疑并且断定自己知道的真理，是怎样学来的？你也许回答说，是我教给你的；于是我会接着问：如果我告诉你，我曾看见某人在空中飞翔，我的见证会使你像听见“智者优于愚人”时那样确信吗？你一定会否认，并回答说：对于第一项断言，你不相信，或者只是相信而不理解；对于第二项，你却完全理解。你由此就会承认，我的言词没有教给你任何东西：一方面，它断言了你不理解之事；另一方面，它只唤起你早已知道之事。因为若有人提问，你原本就可以发誓说，第一项断言你不知道，第二项你知道。这时，在起初把我的一般性问题视为荒谬并予以否定以后，你就会给予肯定回答，因为你认出了构成它的这些部分命题所具有的明晰与确定性：无论说出的是什么断言，谈话者或是不知道它们是否为真，或是知道它们为假，或是确信它们为真。在第一种情况下，他相信、持有意见或怀疑；在第二种情况下，他抵抗并否认；在第三种情况下，他作证；所以他从来没有学习。一个人若不知道我说了什么，若认出我所说的是假的，或者若受到提问时本来也能像我一样说出来，他从我这里学到了什么吗？

第十三章　言词甚至不能显明内在情感

41. 因此，就属于心灵领域的事物而言，一个不能看见它们的人听别人谈论它们，本来毫无用处；不过，只要尚未理解，相信它们仍有益处。但能够看见它们的人，在内在是真理的弟子，在外部则是说话者——更确切地说，是其语言——的评判者。事实上，他对听见之物的认识往往胜过说话者本人。假设一个认为灵魂会死的伊壁鸠鲁派，在

一个能够观照精神事物的人面前，陈述智者为灵魂不朽提出的论证。后者判断自己听到的论证是真的，前者却不知道它们是否有根据，或者毋宁说，相信它们完全错误。难道能够认为，他教导了自己不知道的东西吗？然而，他所使用的言词，同他知道时会使用的言词一模一样。

42. 因此，甚至不能断言语言显明了说话者的内在状态，因为我们不知道他是否信服自己所说的。再想想说谎者与欺骗者：你很容易承认，言词非但不总是揭示内心感受，也被用来遮蔽它们。毫无疑问，诚实的人试图、甚至仿佛以显明自己的灵魂为志业；人人都会承认，如果说谎者被禁止说话，人们就会相信他们。然而，我们经常在自己与他人身上注意到，言词并不表达一个人所想的东西；在我看来，这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发生。有时，人们背诵记熟的东西，却并未深入领会，同时想着别的事情，就像我们唱赞美诗时经常发生的那样；有时，不听使唤的舌头违背我们的意愿，以一些词代替另一些词，说出来的并不是我们心中所想之物的表达。说谎者当然也想着他们所说的；即使不知道他们所言是否为真，我们至少知道其心思正被它占据，除非他们遭遇我刚才提到的两种意外之一。若有人坚持说，他们确实偶尔会遭遇这些情况，而且那时别人能够察觉，我也不反对；尽管人们往往察觉不到，我自己也经常因此受骗。

43. 这里又出现了另一项几乎无处不在的错误根源，它造成无数争执与斗争：说话者确实表达了自己的思想，但只有他自己与少数几个人理解，听者与许多其他人却以不同方式理解其语言。有人对我们说，某些动物在德性方面胜过人。这种说法令我们愤慨，我们会极其激烈地驳斥这项既有害又错误的主张。但对方所谓“德性”，指的是身体器官的力量；他用这个名称表示这种思想。他没有说谎，就事情本身而言

也没有弄错；他并非把这些言词托付给记忆，借此试图遮蔽自己的观念；也不是舌头的误说让人听见了他本不想说的东西。他只是以另一个名称表示一项真实思想；如果我们能够看见这项思想，便会很快达成一致，然而言词与解释直到此刻仍未能把它展示给我们。据说，定义是对付这种错误的补救办法；在当前问题中，若界定“德性”是什么意思，就会明显看出：争论不在事情本身，而在一个词。我同意如此；但能找到多少心灵真正善于定义？而且，人们不是也经常反对一般意义上的定义吗？这里不适合讨论这点，而我也绝不同意这种反对意见。

44. 我也没有忽略：我们经常听错，却像已经听得十分准确一样争论许久。最近我用布匿语说出“怜悯”时，就发生过这种情况。你声称从最精通这种语言的人那里得知，我所用的说法意指“虔敬”。我予以反驳，坚持说你完全忘记了自己所学的东西；我以为你说的是“信仰”而不是“虔敬”，因为你离我很近，而这两个词的辅音如此不同，不至于听错。由于不知道你实际上说了什么，我很久以来一直以为，你也不知道自己听到了什么。因为，如果我正确听见了你的话，同一个布匿语词既表示虔敬又表示怜悯，在我看来就绝不荒谬。这类误听经常重演；不过不谈它们了，否则别人也许会以为，我把听者的疏忽或耳聋归咎于语言。更令人痛苦的是，正如我上面所说：即使我们清楚听见对方的言词，而且他同我们使用同一种语言，我们仍不能认识说话者的思想。

第十四章　人在外部说话，基督在内在教导

45. 我承认，正确听见并理解以后，人可以知道语言同思想相符。这里我不讨论这种情形；但正如我们当前考察的，是否由此就能学到这套

说法究竟为真与否？教师们难道自称是在传达自己的感受吗？他们难道不是更希望学生努力理解并记住他们自认为在传授的学问吗？谁会愚蠢地好奇到把儿子送进学校，只为学习教师在想什么？当教师在课堂上讲解他宣称要教的学科，乃至德性与智慧的规则时，弟子们才在自己内在考察他是否说得真实，并在能力所及的范围内求教于内在真理。正是在这时，他们才学习。如果认出教导为真，他们便赞扬教师；但他们不知道，只要这些教师自己理解所说之物，他们就与其说是教导者，不如说也是受到教导的人。我们之所以赋予他们“教师”这个虚假的名称，是因为言词与认识之间大多没有任何间隔；内在真理在话语唤醒我们以后立即施教，于是人们便以为，是响在耳边的语言给了自己教导。

46. 仔细考察就会发现，言词的益处十分重大；若上帝允许，另找一天我们会把它们逐一考察。这里我预先告诫你不要夸大这些益处，是想同你一起不再只是相信，而是开始理解这项神圣见证何以真实：它禁止我们把世上任何人称作自己的教师，因为我们众人在天上只有一位教师。这位天上教师具有怎样的荣耀？他会亲自教给我们。他愿意让人在外部用符号提醒我们，使我们向内收摄于他自身，并在那里受到他的教导。爱他并认识他，就是有福的生命。人人都宣称自己在寻求这种生命，却很少有人品尝到已经找到它的喜悦。不过，请告诉我你对整篇谈话的看法。你是否承认，我所说的一切都是真的？因为如果有人就每一项思想向你提问，你的回答会表明自己早已知道它；由此你也看见，是谁教给了你这些思想：不是我，因为如果我询问，你原本就会把一切告诉我。你是否注意到，我没有说真话？那么，既不是他也不是我教给了你：我没有教，因为我从来不能教给任何东西；他也没有教，因为你还不能接受他的教导。——阿：我从您的言词所给

的提醒中领会到这一点：言词只能激励人去求知；无论说话者怀有什么思想，向我们显现的都极其有限。唯有那一位教给我们，人说出的究竟是否为真；他曾在言词响于耳边时告诫我们，他就住在我们里面。从此以后，蒙受他的恩典，我越能理解他的教导，就会越热烈地爱他。不过，我仍感谢您作了这番连贯论述，因为您预先提出并解决了我本来准备提出的困难；我已不再有任何疑问，对于先前所有疑问，内在的神谕都给了我同您一样的回答。

第22课 · 1954年6月30日

今天，这个忠诚从未动摇过的圈子毕竟开始缩小。到赛程终点，终究还是我把你们熬走了……

上一次，我让这件事保持某种未定状态；不过，我想今天是倒数第二次，除非我们离开时彼此都如此满意，以至于我在结束时告诉你们不必再来了。因为我相信，还会留下足够多尚未解决、含混、有争议、受质疑的问题，使我觉得下次必须稍作回顾，重述结论，至少把今年研讨班的某些要点固定下来。

必须告诉你们：我们的出发点，是既得到最明确表述、又最不确定的东西——弗洛伊德在其技术著作中首次陈述的技术规则。随后，主题自身的性质——不能说是本质——形成一条斜坡，把我们带到一个已经围绕它讨论了一个多季度的问题；讨论从上一个季度中期开始，而当前季度又很短。这就是分析的根本问题，也就是所谓转移的结构。

你们很清楚：大约从我刚才所说的时点以来，我们谈的只有这件事，而且远远没有谈完！我认为，要定位同转移有关的各项问题，必须从一个中心点出发。我们的辩证法已经把我们引向这个中心点。

问题现在以这种方式得到表述：我们的研究运动已经使我们看见，转移的二元辩证法是想象性的，无论你们怎样理解它——从主体把任何一种根本关系幻觉式地投射到分析伙伴身上，直到那些称作“客体关系”的更复杂观念，直到转移与反转移之间的关系。凡仍处在“双体心理学（two bodies’ psychology）”这一总标题之下的东西，都通过千百次

相互印证向我们表明了一点；这些印证不只是理论推演，也是我向你们介绍的作者提供的具体见证……

请记得我谈过巴林特带给我们的见证，谈过他观察到的事情；

他所谓一场分析的终结，并未使我们走出一种特殊类型的主体间关系，

也就是一项自恋关系；我们已经看见，无论采取何种形式，它既给分析施加了界限，

也使人对所涉及之事的理解陷入僵局

……我们由此突出并揭示了深化第三项的必要性；正是它使我们能够设想这种镜像式转移，设想可以称作这种转移之进展动力的东西。第三项就是言说。

我们不应对此感到惊讶。尽管我们可能会竭尽全力……

只因为我们任凭自己被一项运动带走，而我已经试图向你们说明这项运动的深层理由

……尽管我们竭力忘记分析是一项言说的技术，或者把这种言说降为手段的功能，却完全不可能以这种方式颠倒事物的正常关系，看不见言说就是分析在其中活动的环境本身。分析的各种机制，只有相对于言说功能才取得自己的意义与准确位置；仅仅这一事实，便以某种方式支配着我们的介入方式。

我在这里概括的是整个意图，不能重新逐一陈述它的全部机制与论据。以后作为教学展开的一切，都只会以千百种形式重新讨论这一

点，并通过作者们由此陷入的理论僵局，尤其通过治疗者由此陷入的技术或实践僵局来确认它。

我们已经开始阐发这项言说功能；分析中发生的一切都必须相对于它取得意义，才能得到恰当定位，并在某些情况下同某项或某项相关功能区分开来。若不守住这个中心点，这些功能最终便会相互混淆、被压平并彼此重叠。

上一次课使我们在这项进展中必须质询言说功能。我们由一篇讨论言说意义的根本文本丰富了这里的讨论：言说如何同意义发生关系，也就是它如何同符号功能发生关系。看起来，我们只能说这里涉及的是辩证法本身最具原则性、最具起源性的展开之一。

这并不是一个只被纳入近几个世纪才构成的科学体系的观点，也不是一个仿佛同我们领域无关的特殊科学部门——语言学。我们看到，早在语言学于现代科学中诞生以前，已经有人仅仅由于——正如圣奥古斯丁所说——思考言说的技艺，也就是谈论它，而被引向当今语言学进展重新遇到的同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在于：每当我们把握符号功能，每当提出“符号在何时同它所意指者发生关系”的问题，我们总是从一个符号被送回另一个符号。也就是说，我们明白：符号系统在最初以具体方式确立时，自身便形成一个整体、建立一种秩序；而这项秩序——问题初次在这里出现时似乎如此——没有出口。总之，它当然必须有一个出口，否则便是一项荒谬的秩序。要理解它何以抵达这里，我们必须把具体地、此时此地（hic et nunc）建立起来的整个符号秩序作为整体来把握。

换言之，语言不能被设想成从每件事物上冒出的连续萌芽、嫩枝或蓓蕾，仿佛每件事物都长出一点尖头、长出一枚冒出来的芦笋头，那就是它的名称。语言只能被设想成一个网络、一张依靠整体维系的网；它被撒在全部事物的表面、实在的总体之上，在那里带来并铭刻另一个层面、另一项秩序，正是我们在这里所说的象征层面；在我们的行动中，必须把它同实在层面区分开来。

这些都是隐喻、形象；“比喻不是论证”。但它们是为了说明我正在向你们解释的东西，使它进入你们心中或许仍有某些晦暗的角落。

不过，奥古斯丁论证第二部分揭示出的这项僵局、这个悖论式出口——上一次我们并未穷尽它，只是开始讨论——产生了一个结果：符号的协调性、符号的切合问题——我不再说符号切合于事物，而是切合于它所意指者——把我们留在一个谜面前；这个谜无非就是真理。奥古斯丁的护教学也正是在这里等候我们；正如他告诉我们的：

- 要么你们已经拥有这项意义；
- 要么你们没有拥有它。

如果你们理解由这些语言符号表达的某种东西，归根到底，总是凭借符号以外带给我们的一道光，也就是：

- 或者凭借一项在内部把握的真理、凭借内在真理；它从一开始就在某种东西中向我们显现，使我们能够认出符号所承载的真理；
- 或者相反，凭借某种从外部展示给你们的东西：它以反复而执着的方式同符号相互关联。因此，符号从一种同对象在场相联系的光照

> 中，取得它的全部力量与全部真理。于是事情发生了翻转：可以说，真理被置于外部、置于别处。

我们要看清这项辩证翻转，看清奥古斯丁辩证法所带来的立场彻底倒转。它按照对话的样式，朝着认出真正的 Magister、即《论教师》所说的内在真理之师而前进。

相关知识卡 圣奥古斯丁《论教师》：符号与内在教师

我们完全有理由悬置于这场辩证法，并在某一点停下来……这里不是要以某种演绎、逻辑方式给这个主题确定中心；问题不在于此……而是在论证完成双重翻转以后，我们可以正当地暂时止步，并指出：真理问题本身，恰恰已经由辩证进展提出。换言之：

- 一方面，圣奥古斯丁在论证的某个位置忘记了教学中整个能够借示范、借可模仿行动得到展示和传达的面向，例如捕鸟人的技术。他忘记，正如我们顺带指出的，这项技术从一开始就已经得到结构化，已经由言说本身赋予工具形式；只有在一个由言说构造的人类世界中，它才能被设想成复杂的技术、机巧、为捕捉对象——鸟——而设置的陷阱；

- 同样，奥古斯丁在这里似乎忘记：真理问题本身从一开始就以某种方式包含在他的讨论内部；他一旦质询言说，就是用言说来质询；正是借言说，他自己创造了真理维度。每一项作为言说而发出、表述并传达的言说，都把某种新的东西引入世界——断言的新颖性，某个出口、某项意义涌现的新颖性。它最初而且首先与其说把自身肯定为真理，不如说从实在中清理出真理维度。

事实上，让我们仔细观察。当奥古斯丁以“言说可以欺骗人”为论据时，十分明显：这个符号只有置于真理维度，才能从头到尾维持并呈现自身。因为，言说要进行欺骗，就必须把自己断言为真的。这是对听者而言。对说话者而言，欺骗本身不仅必须以有待遮蔽的真理为支点；严格说来，谎言越是展开，就越预设对它所回应的真理作出真正的深化与展开。谎言越是发展、组织起来并伸出触手，越要作为谎言继续铺展，就越需要对一项必须避开的真理作出相应控制；它会在道路的每一个转弯处遇到这项真理。

真正的问题并不在谎言本身。不过，以谎言为出发点仍然极其重要，因为没有其他东西能更好地证明这一点；况且它相当为人熟知，属于道德箴言传统：

“说过谎，就必须有好记性。”

这句话的意思是：要让一项谎言一直维持为谎言，非得知道多得惊人的东西不可，因为没有什么比制造一项能够站得住脚的谎言更困难。如果谎言不是真正的问题，那么真正的问题就是错误。传统上，问题也始终在那里提出。十分清楚，错误只能以真理为条件得到界定。我并不是说，两者的对立仿佛只是黑与白：没有黑就没有白。问题不在这里。不是！

谎言若要维持和延续，就必须真正构造出真理；它以某种方式预设人已在全部严格性中知道真理、甚至使真理稳固确立，还要为了支撑谎言而不断构造更多真理。错误问题比它低一个层级，但两者的联系同样紧密，因为从本质上说，任何错误都必定把自己确立并宣讲为真理。

否则，它就不是错误！总之，可以说，错误是真理通常而日常的化身。如果要完全严格地说，那么只要真理尚未得到完整揭示——依一切可能性，也就是直到世界终结——真理的本性便是以错误形式传播。无需把事情推进得远多少，我们甚至就能在这里看到存在之揭示本身的一项构成结构。

不过，我只是把它指给你们看，像一扇通往我们以后必须重新遇到之物的小门。今天，我们限于考察言说功能的内在现象学。那么，此时此地，我们将遇到什么？

- 我们已经谈过欺骗本身，并看见它只能凭借真理得到维持——不仅凭借真理，而且凭借真理的推进。

- 我们已经看过错误，并看到它在某种意义上正是真理通常的显现。真理的道路从本质上说就是错误的道路。

你们会问："那么，在话语内部，我们怎样……

眼下我们谈的是言说现象学，并不是在谈某种经验所建立的对质

……归根到底，在言说内部，错误究竟怎样才能被察觉？"

要做到这一点，我们所需之物恰恰处在真理之外：或者在对象中，或者在内在明证的光照程度中。圣奥古斯丁在谈话结尾向我们提出后一种视角，不过带着千百项保留。请你们重读这篇文本，就会发觉他完全不认为自己已经解决了话语问题；甚至有一句话明确保留了它：

"只说出我们已经说过的这些，还远未说尽；话语有什么用处这个问题仍然存在。"

我们在他之后重新提出问题：错误问题怎样在话语内部提出？既然错误从本质上把自身确立为真理，那么很清楚，我们既然称它为错误，就也承认它能够被揭穿。在话语内部，请记得语言结构的根基本身：一个物质性能指同某物的关系，也就是我们上一次所谓 verbum 的关系；verbum 是某种“cum voce articulata”——“借接合起来的声音”——并且是“cum aliquo significata”——“具有某种意义”——的东西。把能指与所指逐项、逐一取出来，两者在对应关系中呈现的联系严格说来是任意的；这是它们的根本区别。

换言之，把长颈鹿叫作“长颈鹿”、把大象叫作“大象”，并不比把长颈鹿叫作“大象”、把大象叫作“长颈鹿”更有理由。因此，也没有任何理由不能说长颈鹿长着鼻子、大象长着很长的脖子。这是一个得到系统普遍接受的错误，但正如圣奥古斯丁指出的，这项错误在“定义尚未确立！”以前严格说来无法察觉。而有什么比确立正确的定义更困难？

不过还有另一件事。如果你们延续这套话语，把长颈鹿界定为长着鼻子，把大象界定为有一条长脖子；如果你们在生活中无止境地延续这套话语，就会发生、也可能发生两种事情：

- 或者，你们继续正确地谈论长颈鹿，就像谈的其实是大象一样；那么就会十分清楚：你们用“长颈鹿”一词界定的其实是大象，这里只有你们所用词项同普遍接受的词项如何约定的问题。

圣奥古斯丁在谈 perducam 一词的论证中也提出同样的情况：他突出了两种可能的含义。但这不是人们通常所谓的错误。错误的标志恰恰在于：它会在某一时刻抵达矛盾。例如，我曾说玫瑰是一种通常生活在水下的植物或对象；如果话语随后显然表明这项错误——接下来的话

语显示，我曾在一个有玫瑰的房间中待了二十四小时；另一方面，我的话语又以千百个词项证明，我不可能在水下待二十四小时——那么，十分清楚，玫瑰通常并不生活在水下，因为确有玫瑰同我一起在一个我并未处于水下的地方待了二十四小时。

换言之，把真理与错误分开的，是话语中的矛盾。这也是黑格尔关于绝对知识的构想：绝对知识是整个话语以绝对完美的无矛盾状态闭合于自身的时刻；甚至还包括这一点——话语把自己确立并解释为话语，作为话语为自身提供正当理由。

而在抵达这个理想以前，你们再清楚不过……

事物自身的存在，以及围绕所有主题和问题持续不断的争论已经表明这一点；

在人际行动的不同区域，这种争论带有程度不一的歧义；而组织行动的不同体系——

宗教、法律、科学、政治体系——之间也存在显然的不一致

……你们知道，不同参照之间既不重合也不相接；一连串裂口、断层与撕裂，使我们无法在统一的语域中设想人类话语。

因此，面对任何把自己确立为真的言说立场与言说发出，我们总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某种错误的内在必然性。这样一来，我们表面上又被带回一种历史性的皮浪主义；它：

- 把人声所发出、朝向真理维度的一切悬置起来，并以一种彻底根本的方式给它打上问号；

- 使这一切悬置在对某种未来的等待中；认为这个未来会得到实现并非完全不可设想，因为我们过于清楚地看见了我所谓“不同象征系统之间的斗争”。

而我们知道，这场斗争终究会对人的生活、甚至对事物秩序产生影响。科学的整个当代体系——我说的是物理科学——与其被设想成一种同事物的切合，不如被设想成某种象征系统的推进；事物为这个象征系统的完善提供养料与材料。因此，随着象征系统不断完善，我们看到事物越来越被分解、扰乱和消融；这项象征系统的压力总是朝某种阐发推进得更远。我们不能反过来把它设想成一件由符号系统给予事物、同事物严丝合缝的紧身衣。

科学体系作为符号系统的全部进步——无需我告诉你们——都伴随着某种剧变；你们想怎样称呼都可以：“征服自然”“改造自然”“使行星人化”……这里仍有如此深的歧义，以至于一种“强暴自然”的观念在我们时代以最显眼的方式出现，不能说它没有被呈现出来。我们是否在某种程度上只能这样设想这个象征系统的进展：它越是趋向一种可以说构成科学体系语言的“完善语言”，就越是成为某种被剥夺了声音参照的东西〔一种没有言说的语言〕？

因为奥古斯丁辩证法正把我们带向这里：它剥夺了对象征系统所活动的真理领域的一切参照；可这套系统自身的运动又隐含地在该领域中展开，并且为了活动，每一刻都不能不参照它。正是在这里，人不能不被弗洛伊德的发现震动。这个发现尽管属于经验领域，却给这个看起来处在一切经验彼岸、真正属于形而上学的问题带来一项极其惊人的补充与贡献，以至于它令人目眩，或者使人只想闭眼不看它的存在。

请观察这一点。如果弗洛伊德的发现正如我告诉你们的那样——在人类的一整套表现中，在那些恰恰不属于话语秩序、通常正以此为特征，因而从某种角度被人不再深究而各式各样地称为“非理性”的表现中——真正得到表达的，实际上是一项言说。

请注意，精神分析场域中一切事物的根本机制就在这里；它预设主体的话语通常会展开——我在这里说的是弗洛伊德——在错误、误认、乃至否认式否定的秩序中。这并不完全是谎言，而是处在错误与谎言之间。弗洛伊德体系预设了我刚才提醒你们的这些常识性真理；但我们没有理由不再说一遍。

我们的人类话语——尤其包括分析期间、分析会谈中的话语——在错误语域中展开；但有某种东西发生了，真理借此闯入这套系统。我告诉你们的，就是弗洛伊德所说的；我们必须意识到，弗洛伊德说的正是这件事。这个东西给我们带来真理的消息。对我们这些分析家而言，也就是对进入并知道怎样观看分析场域这一现象领域的人而言，这里发生的某种东西，并不是话语的矛盾。

我们并不需要把主体沿着绝对知识的道路尽可能推远，也不必在所有层面教育他们。仅仅在心理学上教育他们，还不足以使他们看见自己通常生活于其中的荒谬；还必须考察科学体系。我们在这里这样做，是因为我们是分析家；但如果必须对患者这样做，你们可以想象它会把我们带到哪里！

它也不是来自同实在的遭遇——问题恰恰正在这里：我们把主体留在四面墙之间，并不牵着他们的手在生活中前行，也就是不会带他们走进自己"愚蠢"的后果。这里发生的是某种东西；可以说，真理从背后追上错误。而这个东西，本质上可以称为误认（méprise）最明显的代表：它出现在口误中，出现在那些被不恰当地称为"失败"的行动中。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所有的失误行为同所有绊住的言词一样，都是坦承的言词、成功的行动；它们恰好在揭示一项根本上处于背后的真理这个意义上获得成功。

这就是弗洛伊德思想所蕴含的东西。如果弗洛伊德的发现具有一个意义，就是这个意义：真理在误认中揪住错误的衣领。 我说"在弗洛伊德思想中"，因为如果你们不接受我正在告诉你们的东西，马上就会看到后果。在弗洛伊德思想中，一种更真实、更纯粹的意义显现出来；它显现在某种或多或少混乱的东西内部——无论你们把它叫作自由联想、梦的图像还是症状。这个东西是一项言说，因为正是它带来真理；它就在症状中，就在梦的图像序列中。弗洛伊德已经这样表述过。请重读《梦的工作》〔第六章〕开头：

"梦，"他说，"是一句话，是一道画谜……"〔Ein solches Bilderrätsel ist nun der Traum, und unsere Vorgänger auf dem Gebiete der Traumdeutung haben den Fehler begangen, den Rebus als zeichnerische Komposition zu

beurteilen. Als solche erschien er ihnen unsinnig und wertlos.——梦正是这样一道图像谜题；我们在释梦领域的前辈犯下了一个错误：把画谜当作绘画构图来判断。这样一来，它在他们看来就毫无意义、毫无价值。〕

《梦的解析》中有五十页内容会把我们引向这项思考：既然弗洛伊德给出了梦的结构，那么从“凝缩”这项惊人发现中显现的一切也会如此。如果以为凝缩只意味着一个象征同某物逐项对应，那就完全错了。他已经清楚告诉我们；请重读关于凝缩的一章：

“在某一个梦中，梦的全部思想——也就是显然构成梦的全部被意指之物、全部意义的东西——作为一张完整网络被把握；它绝不是逐项得到表征，而是由一系列交叉关系表征。”

我只须取出弗洛伊德的某一个梦，在黑板上画张图。只要阅读就会看出事情正是如此：全部意义由全部能指性要素表征。也就是说，在梦的每一个能指性要素、每一幅图像中，都有一整系列对有待意指之物的各个点的参照；反过来，每一项有待意指之物又由多个能指表征。我们再次找到它所意指者同有待意指者之间的结构与关系。

因此，弗洛伊德的发现把我们引到这里：看见某种作为言说、并且以某种方式穿过主体——甚至不顾主体——而说话的东西显现出来。主体不仅用自己的言说，而且用其他各种主体性表现，把这个东西展示并告诉我们；甚至走得同人所能梦想的一样远：主体借自己的身体发出一项言说。这项言说本身是真理的言说，而主体甚至不知道自己正在把它作为能指性的东西发出。也就是说，主体说出的总比自己想说的更多，总比自己知道怎样说出的更多。

奥古斯丁反对把真理领域纳入符号领域的主要异议是，他说：

“主体常常说出远远超出自己所想的东西；他们甚至能够坦承真理，却并不认同它。”

这里指的是那个主张灵魂会死的伊壁鸠鲁派。奥古斯丁说，他为了支持自己的主张而引用对手的论据；但对那些睁开眼睛的人而言，这些论据反而证明了真理。因为，即使他把对手的论据作为已经遭到驳斥的东西来引述，能看见的人仍会看见，真正的言说就在那里，并认出灵魂不朽学说的价值。这就是奥古斯丁的视角。

事实上，主体借某种我们已经认出其言说结构与功能的东西，见证了一项意义；这项意义比他在错误话语中表达的一切更加真实。如果我们的〔分析〕经验不是以这种方式得到结构化，它就严格说来毫无意义。我来请你们注意这一点。只要有一瞬间，你们不认为我们的经验处在这个视角中——也就是主体在不知情中发出的言说，超出他作为论述主体的界限，却仍处于他作为说话主体的界限之内——只要你们不从这个视角设想我们所做的事，异议就会立即出现。我很惊讶，反对我们的人没有一直更公开地提出这项自然的异议：如果你们不是这样思考，如果这不是分析经验本身，那么，你们在误认语域中辨认出的这套话语，为何不受制于你们加给普通话语的同一项异议？既然它同样是一套话语，你们却声称要越过普通话语，它为什么不也同样沉浸在错误之中？

所以，一切荣格式的无意识构想——以“原型”之名，把无意识变成另一套话语的真实所在地——都被这项异议断然击中，而这正构成了对它的驳斥：这些原型、这些被实体化的象征，被荣格安排在人的灵魂

某种地基中永久居住；它们比那些据称处在表面的东西更真实在哪里？难道只凭这样一个隐喻：地下室里的东西必然比阁楼里的东西更真实？

无意识话语同其余话语完全一样，在话语终结以前始终受到这种悬置、这种括号化。因此，在为我们发现无意识这个场所的弗洛伊德思想语域中，所涉及的必定是另一回事。换言之，我们开始隐约看见：弗洛伊德告诉我们无意识不知道矛盾或不知道时间时，究竟是什么意思。

这种说法并未推进得很远；以话语的措辞来说，甚至不完全准确，因为只要把无意识所发出的东西继续推下去，就可能遇见矛盾。不过，我们也看见这些断言朝向什么：它们并不是指某种真正不可思议的现实。因为现实受制于矛盾；现实意味着，当我站在这里时，X　小姐您不可能同时站在我的位置上。这是现实秩序中的矛盾。我们看不出无意识为何能逃过这种矛盾。

不过，弗洛伊德谈到无意识、谈到矛盾原则的悬置时，意思恰恰是：我们被认为可以辨认出的那项更真实、甚至本真地真实的言说——现在你们已经看见，它不是通过观察，而是通过对话语的解释得到辨认——也就是真理在症状、梦、口误与诙谐（Witz）中的这项揭示，服从于另一套法则，不同于那套在错误中活动、直到遇到矛盾为止的话语。这里涉及另一回事。

这里存在一个言说区域，其中的言说被结构化为揭示真理的言说；它采用的样式与手段，不同于构成推演性话语（discours　discourant）的样式与手段。如果我们想在思考自己所做之事方面取得哪怕最小的进

展，就必须探索这个区域，严格地标定它。当然，没有什么迫使我们这样做。我甚至经常宣称，大多数人都能够免去这项工作，事实上也往往完全免去它，却仍能令人满意地完成自己必须做的事情。我甚至还要说：完全不思考，却把话语乃至辩证法推进得极远，是十分常见的。

然而，十分清楚：象征世界的任何进展与深化——也就是所谓揭示——都至少会在短暂一刻包含所谓思考的努力。分析活动——如果你们理解并跟得上我的意思——完全处在一连串针对每个主体的特殊揭示之领域中；因此颇为可信的是，分析家必须至少对自己行动的意义保持警觉，也就是说，偶尔给思考留下一点小小的参照。

所以，你们看清问题所在了。我们正面对一个问题：这项处在话语彼岸的言说具有怎样的结构？

自圣奥古斯丁以来，有一项新事物被带来：在这些亲历的、主体性的现象点上，一项超出论述主体的言说得到了揭示。无论如何，这相当显眼、相当震撼。我们甚至很难相信，以前从未有人注意到它。为了使人注意到它，也许恰恰需要普通人已经在历史上卷入一套受到严重扰乱、也许有所偏离，而且以某种方式极不人道、极具异化作用的话语一段时间；只有这样，这类话语才会如此尖锐、如此在场、如此紧迫地显现出来。不过，也不应忽略这一点：它出现在人类中承受痛苦的那一部分；这个发现是以病态心理学、精神病理学的形式作出的。

我也以一个问号的形式把这件事留给你们思考：从此我们看见什么？从话语彼岸这项言说的辩证法视角出发，我们看到自己最常使用的术

语以一种引人注目的方式取得意义、得到排列；而我们平常仿佛早已把它们当作不值得进一步思考的既定材料。

我们十分清楚地看见它们的位置。正如我上一次告诉你们的，我们在这项参照中准确看见——甚至可以画出来——那些我们习惯以 Verdichtung（凝缩）等术语指称的含混构形处在哪些区域。Verdichtung 无非就是语言中意义的多价性，就是这些侵叠与交叉：如果你们愿意，可以把事物世界想成这一类场域；它并未被象征世界准确覆盖，而是以这样的方式被重新接合，结果就是，每一个象征都对应事物中的成千上万项，反过来也一样。

Verneinung（否认式否定）则是在话语中维持某种东西的机制；这项东西显示了这种不重合的负面。它既有正面也有负面，因为必须把对象放进孔洞，而孔洞彼此并不对应，于是遭殃的便是对象。

第三个语域是 Verdrängung（压抑），它同样可以在话语这一语域中得到参照[注]。

> [注] 本项目底本作 préférable（“较可取的”），米勒整理本作 référable（“可参照、可归入”）；上下文正在依次定位凝缩、否认式否定与压抑，译文据后者。

请仔细观察：每当我们说起某件事而不作进一步思考……也没有恶意，当然，这并非我们的强项……每当我们谈到压抑……

请在具体材料中观察；这是一个提示，去看，你们就会发现

……每当存在压抑……

而且压抑不是重复，压抑也不是否认式否定；

不能像通常那样，把一切掺在一起、混为一谈

……每当严格说来存在压抑……

而且必须从弗洛伊德最初的实验材料开始，逐字辨认它

……所涉及的总是话语中断。

有一次，我就《日常生活的精神病理学》、就这种名字遗忘向你们展示过这一点。“我想不起这个词了”——这样的说法第一次在文学中出现于何时？知道这些事情颇为重要！“我想不起这个词了”最早由十七世纪诗人圣阿芒使用。我给你们的这项资料见于《贵妇派词汇的语言学关联》。不要因此以为，我为了确定圣阿芒……已经查遍全部法国文学。况且，他并没有把这句话写下来，只是这样说了出来，在一条街上随口说的。

是索梅兹在《贵妇派词典》中把它记录下来，同书还记录了千百项别的东西——那些在你们如今看来已经稀松平常的思想转法与其他形式，毕竟都曾在这个可爱社群的闺房中创造出来；这个社群全心致力于完善语言。你们看见，“柔情国地图（Carte du Tendre）”同精神分析心理学之间可能有一种多么奇特而紧密的关系。总之，“我想不起这个词了”——十六世纪的人绝不会这样说。

也许必须追溯到圣奥古斯丁，才能在口误心理学上走得更远一些。不过，他第一次谈到口误时，毕竟暗示了：口误意指某种不同于主体想说之物的东西——他使用 aliud 一词。总之，这个想不起来的词，就是弗洛伊德在著名的奥尔维耶托教堂主人姓名遗忘中谈到的那个词——西尼奥雷利。我已经向你们展示，它同这一事实联系得多么紧密：此

前的谈话没有进行到底，因为它会径直引向 HERR——绝对的主人，死亡。

终究，对能够说出的东西也许存在内部界限，正如弗洛伊德经常引用的梅菲斯托费勒所说：

“上帝不能把上帝知道的一切都教给自己的孩子。他们还没到那个程度！”

压抑就是这样。每当教师由于对话者自身性质的缘故，在教学道路上停下来，那里就已经有了压抑。如果你们愿意仔细看，我给你们的是一些形象化的东西，为了使观念各归其位：我也在作出压抑，但比起人们通常所做的事情要少一些；人们通常所做的属于否认式否定的秩序。

例如，取弗洛伊德在凝缩一章给出的第一个梦，即植物学专著之梦。它精彩地展示了我正在告诉你们的一切：植物学不只表征花，以及花对弗洛伊德意指的一切——即同许多丈夫一样，他送妻子花的次数少于应有的次数。当然，弗洛伊德不至于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当天，他恰好不得不翻查一本有关仙客来的专著，而仙客来又是他妻子最喜欢的花。

在弗洛伊德那里，人总是径直走向主题。当然，他在这里也从未告诉我们事情的底细；但我们不难猜到。还有其他内容：同眼科医生柯尼希施泰因的谈话，以及它为他唤起的所有未酬抱负与苦涩——那段著名的可卡因故事。不要忘记可卡因这件事；他从未原谅妻子，因为他明确告诉我们：

“如果她没有紧急叫我回来，我本来会把可卡因研究再推进一些，并成为一个名人。”

那场被唤起的谈话中有女患者弗洛拉；紧接着又出现 Gärtner——德语“园丁”——他碰巧同妻子一道经过。弗洛伊德觉得她“bluming”，容光焕发。仔细考察就会看见根本点。首先，这里有一串思想：他似乎对女患者弗洛拉怀有温柔情意；即使对弗洛伊德来说，在某种意义上似乎也不能走得更远。既然不打算同妻子决裂，最好让自己没有像妻子希望的那样经常送花这件事留在某种阴影中。

还要把当时悬系于一场持续、潜在的要求性对话的一切留在某种阴影中：弗洛伊德当时正等待自己被任命为编外教授。这场为使自己得到承认而进行的斗争，多少始终潜藏在他同同事的所有谈话之下；文本又借这样一个事实进一步凸显它：那位 Gärtner 打断了他。

为这个梦提供养料的两项日间残余——当天那场谈话与看见仙客来书籍——之所以恰好被用来形成这个梦，是因为它们作为当天的亲历经验，已经构成某种言说开始围绕其运转的“音位点”；如果可以这样说，这项言说直截了当地表述：

- 例如，“我不再爱我的妻子”；
- 或者，“社会没有承认我，我受到了阻碍”。

正如他本人所说，这一切背后还有他所谓的奢华幻想与品味。我们一位同行曾在某次弗洛伊德课上说：“弗洛伊德是一个没有野心、没有需要的人。”真是的！有些人恐怕从未打开过弗洛伊德的书。弗洛伊德说，自己当年身无分文——求学时期他确实吃尽了苦头——只能依靠

专著从事技术、医学和学生研究；但从那时起，他已经心有所求。只须读读弗洛伊德的生平，了解他对那些满怀热忱、抱着理想主义意图前来找他的人所作的几句著名回答，了解弗洛伊德谈及自身在生活中究竟关心什么时，回答何等直截了当。弗洛伊德去世十五年以后，我们总不至于陷入有关他的圣徒传式描绘[注]！谢天谢地，琼斯先生只进行到一半……通过弗洛伊德的作品，我们仍会保留一点弗洛伊德本人，用来见证这个人的个性。

> [注] 本项目底本及速记本均作 géographie（“地理学”）；结合“弗洛伊德没有野心、没有需要”的理想化描述与琼斯传记语境，这里应是 hagiographie（“圣徒传、圣徒化传记”）的口误或转录误差。译文按语境保留其批评意味。

回到这个著名的梦。如果这里存在压抑、也存在梦；如果无意识王道最先提供给我们的联系就是遭压抑的欲望同梦的联系，那么其根本就在于：当天曾有某项言说只能被悬置；它没有抵达坦承的底部、事物的底部、存在的底部。

今天，我把问题留在这里：归根到底，在人与人的关系处于当前状态时，在分析情境之外，一项说出的言说是否可能成为充实言说？正是在话语中断中、在同一项误认法则的遭遇中——这项法则正是日常谈话的法则——存在着 Verneinung（否认式否定）的机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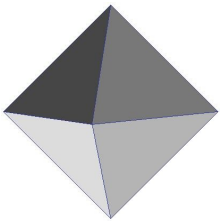
如果你们阅读《梦的解析》——我鼓励你们读，因为我明年不会讲它——就会发现，我们已经从我努力提供的这些线索、从我试图在弗洛伊德思想全文中拉出的这些指引获得了足够引导；你们可以在《梦的解析》中自行辨明方向，看见这一切怎样变得更清楚，甚至看见弗洛伊德有时顽固赋予“欲望”一词的意义，尽管显得含混，却怎样始终得到维持、怎样真实、怎样有效，因为他非常清楚自己想说什么。

不过，他必须在某个转折、某个时刻承认一件事——好吧，对那些什么也不懂的人而言，我可以说，他的话语仿佛带着某种固执，甚至带着颇为惊人的否认式否定——他让步说，终究必须承认存在两类梦：所谓欲望之梦与惩罚之梦。然而，只要理解问题所在，就会看出他十分清楚：梦中显现的这项欲望、这项遭压抑的欲望，等同于我正在缓缓尝试引你们进入的语域——等待得到揭示的存在。

在等待存在显现的这个视角中，“欲望”一词的意义在弗洛伊德那里取得全部价值。它发挥统一作用，也使我们能够理解那些悖论式的梦，例如那位青年时代极其艰难的诗人所作的梦：他永远重复同一个梦，梦见自己是一个小小的裁缝铺雇员。

这里涉及的与其说是惩罚之梦，不如说恰恰是某种东西——我们以后会回到它——它是存在之揭示的一项根本机制，即存在的认同跨越到一条新的存在道路、一个新阶段、一项自身新的象征性化身。

这也赋予竞聘、考试、资格授予秩序中的一切以价值：这些过程揭示的不是测试意义上的考验或其他东西，而是授职。所以，你们已经看到我过一会儿想用来作结的东西。为防万一，我在黑板上画了这个小菱形体，一种有六个面的双面角形。



假定所有面都相同，一些在某个平面上方，另一些在下方。它不是正多面体，尽管所有面都相等；但各个顶点或多面角并不完全相同。其中两个是由三个面构成的三面角，另外三个顶点则各有四个面。现在，我们可以这样设想：中间平面——其中有一个三角形把这个双锥体一分为二——就是实在表面。在这个实在表面中——我说的是最朴素的实在——任何东西都无法穿过；任何位于这里的东西都不能越过它。在这里，所有位置都已被占据；每一时刻，所有位置都已被占据。

而到下一刻，一切都变了。十分清楚，我们借自己的词语与象征世界，在其中引入了另一种东西；如果把实在称作第二维，我们便引入一个凹处、一个孔洞，使各种跨越与相互替换成为可能。正如已经有人指出的，实在中的这种孔洞从不同角度看，分别叫作存在或虚无。我们已经不止一次触及存在与虚无；它们恰恰同言说现象有着本质联系。

正是在存在维度中，出现了我一直向你们强调的三分法；我要借它使你们理解那些基本范畴，没有它们，我们就无法在经验中作出任何区分。这项三分法就是：象征界、想象界与实在。它们是三个，无疑并非偶然。这里必定有某种最小法则，几何学在这里只是把它化为形体：事实上，如果在实在平面上掀起一个折片，让它进入第三维，那么要构成一个立体，至少还需要另外两个折片。可以把下面这点归入这样的图式、这样的表象：第一，只有在存在维度而不是实在维度中，那三项根本激情才能得到铭写。你们也许已经听过它们的列举与所属语域；正因为所涉及的是存在而不是对象，分析才在〔……〕中建立，而我们也才处在人类层面。

相关知识卡 爱、恨与无知：拉康的存在之激情

于是便形成：

- 在象征界与想象界的接合处，是激情——或者如果你们愿意，是断裂，是棱线——它叫作爱；

相关知识卡 爱、恨与无知：拉康的存在之激情

- 在想象界与实在的接合处，是所谓恨；

相关知识卡 爱、恨与无知：拉康的存在之激情

- 在实在与象征界的接合处，是所谓无知。那么，在分析开始以前，我们从一开始就建立某种已经属于转移秩序的东西，这叫什么？在分析这场同居关系的边缘与流苏尚未产生任何能够摆脱出来的东西以前，这个维度已经以骤发而雷霆般的方式存在。既然爱与恨这两种可能性从一开始就已经潜在地在场，而且首先以其极端形式出现，它们便只能在这个语域中得到设想；与它们相伴的，还有一个似乎不言自明、因而没有在转移的原初组成中得到命名的东西，正是作为激情的无知，也就是已经作为这种激情被建立在情境根基上的无知。

相关知识卡 爱、恨与无知：拉康的存在之激情

前来接受分析的主体，就此把自己置于无知者的位置。没有这项参照，就不可能进入分析——人们从来不说，也从来不想它——然而它绝对根本。正是随着言说不断推进……

相关知识卡 爱、恨与无知：拉康的存在之激情

也就是随着上方锥体这个东西逐渐建成；也许下一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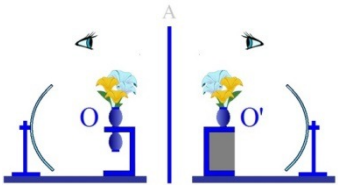
当我们推进得足够远时，我会向你们展示它同这三个面的对应关系；这三个面恰好无非就是

Verdrängung（压抑）、Verdichtung（凝缩）与 Verneinung（否认式否定）的阐发

……这个存在才得到实现；当然，在分析之初，就像在任何辩证法开端一样，它完全没有得到实现。

因为十分清楚：即使这个存在以隐含的、某种虚拟的方式存在，那个无知而天真的人、那个从未进入任何辩证法的人，也根本感觉不到这个存在以任何方式在场；他只是以为自己处在实在中。分析通过揭示这项内含言说而得到深化；这项言说在一套特意由自由联想法则置于怀疑、悬置并加上括号的话语中得到揭示。正是在这套话语中，这个存在得到实现。

分析并不只是我给你们的图式中 O 与 O′ 所表示的东西，并不只是自恋图像的重建，尽管分析经常确实如此。如果我们在分析中做的只是在检验一些或多或少得到领会、或多或少机巧地投射出来的小行为；如果正如人们明白告诉我们的，这里的两个自我相互协作，忙于守候某种不可言说的现实涌现；那么，人们可以对这项现实提出我刚才针对其余所有话语提出的同一项异议：这项现实为什么比其他现实拥有任何特权？



恰恰是由于这套话语使 O 点能够发生如下变化：O 有时确实在 O′ 中得到一幅完整图像，但相对于 O′，O 点在我的图式中走向别处——一个图式毕竟只是图式——走向某个后方的位置；随着主体的言说把它象征化，这个点便在主体的存在中得到实现。

今天就停在这里。凡是对这套话语感到足够有兴趣、甚至受到它搅动的人，我恳请你们向我提出一些措辞简短的小问题，不要太长，因为我们只剩下一次研讨班。我会努力围绕这些问题组织结论——如果还能够谈结论的话——打成一个结，以便明年重新接上新的章节。

我越来越倾向于认为，明年出于某些理由，必须把这个研讨班一分为二：为了不对你们食言，一方面讨论施雷伯主席，展示精神病问题相对于这个语域处于什么位置，以及精神病中的象征世界是什么意思，因为问题就在这里；另一方面——我想会围绕《自我与本我》来做——向你们展示：弗洛伊德引入的结构主义如何在这样一场辩证法内部取得其真正意义。因为，严格说来，如果 ego（自我）、super ego（超我）与 Es（本我）只不过是给激情、自我与无意识这些旧心理实体重新划界、改换名称，我们实在看不出弗洛伊德带来了什么新东西。

如果这些观念确实能够作为概念使用、确实具有价值，那只是因为它们同我认为自己今年已经把你们引到的辩证点直接相连；我们的分析既涉及弗洛伊德的技术著作，也涉及《论自恋：一篇导论（Einführung der Narzissmus）》。你们会看到，Ich、Es、Überich 这三项参照并不是人们通常使用它们时所理解的东西。

第23课 · 1954年7月7日

拉康——谁有问题要问？

奥布里夫人

只要把“接合”理解成断裂，我能够理解为什么在想象界与实在的接合处会找到恨。我不太理解的是，为什么在象征界与想象界的接合处会找到爱？

拉康

我很高兴您问我这样一个问题！它也许会使我为今年最后一次见面营造出我所偏爱的亲切气氛，而不是讲坛式气氛。这是个极好的问题！〔对勒克莱尔〕您也一定有问题要问。上次会谈结束以后，您对我说了一句很像问题的话：“我终究还是很想听您谈谈转移！”他们可真苛刻！我谈的明明只有这件事！可他们还是不满意！

你们在转移问题上总会感到意犹未尽，这有深层原因。不过，今天我们还是会努力谈它。只是为了这样做，我希望您的问题更精确一些，不只是“我希望您谈谈转移”。总之，我们一直在追寻真理时，以三个时刻讨论言说的结构化。如果想借浪漫主义时代盛行的那类寓意画——“德性在悔恨帮助下追捕罪恶”——来表达，我会告诉你们：“错误逃入欺骗，却被误认追上。”

我想，它同转移之间的关系——只要这正是我试图使你们把握的东西——应该始终显得沿着同一条路线：转移表现为言说的坦承在一些可能时刻发生悬置。

塞尔日·勒克莱尔——是的。

拉康

归根到底，究竟什么使您意犹未尽？也许是这一点怎样同通常的转移构想接合，它从哪里开始有所区别，我试图把你们引向哪里？我是否正在向你们展示一种特定的理解方式、并同时是一种处理方式，它导向某些我们无法一致同意的结果？

塞尔日·勒克莱尔

您知道，我们考察关于转移的著述时，总会感到：为了说明转移现象或一般意义上的转移，人们把它归入情感性表现、情绪的范畴，并把它同智性表现、同旨在理解的进路对立起来。然而，当我们试图用日常的普通措辞说明您的视角时，总觉得很为难；它很难装进“情绪”框架。因为归根到底，通常所见的一切转移定义——人们说涉及转移情绪、感受、情感现象——都被同分析中一切可以称为智性的东西直接对立起来。

拉康

不是吗？一门组织成教学的学科有两种运用方式：一是你们听见的东西，二是你们拿它来做的事情。可以说，两者或许会在某些次级符号

上重新会合。终究，我也正是从这个角度看待一切真正教学行动所可能具有的成效。

真正重要的与其说是传递概念——除非我们解释概念，再把填充概念的接力棒和责任交出去——不如说还有某种严格意义上更具命令性的事情，而且也许具有同样重要的价值：向你们指出哪些概念绝不能使用。

如果我在这里的教学中确有这种东西，我想，那就是彻底放弃使用它们，哪怕只是暂时的——让你们每个人在自身的真理探寻中暂时这样做，看看不用它们是否反而有所收获。无论如何，使用它们不断把人引向一连串僵局，这再清楚不过，因此很值得暂时遵循这项指示。

我认为，尤其同分析经验最为对立、最会遮蔽人对它的理解、最为混乱的一件事——这过于明显；而且我会说，各种材料乃至这项对立确立的年代，都使它显而易见——就是我所说的情感与智性之间的对立。

您要求我说明自己的教学，以及它可能遇到的异议。关于言说行动的意义，我已经向你们解释了这一切：言说在自身功能中是安排——如果你们愿意，也就是法则；它的回响携带象征的全部余音，因为我们的解释行动正是在那里活动。言说还具有契约功能；在两个主体对峙时，它构成一个三元组，并成为奠立主体间关系的媒介。这项媒介凭自身追溯性地改变两个主体，并以神话方式把某种最初的言说以前关系纳入自身；在这里，象征取得了另一种意义。

当然，我们也看得出这种说法的界限。人们可以这样想象两个主体；而言说真正创造了某种东西，恰恰把他们安置到一个维度中。直到今

年讲述结束时，我才让你们隐约看见这个不可或缺地必须引入的维度——存在维度。作为人的存在在这里真正得到实现；分析所处理的就是这个存在，而且是在言说维度中处理它。十分清楚，这里不涉及任何智性的东西。如果智性之物位于某处，它就在自我的“想象性”投射中；我还会说，它是“伪中性化的”投射——这里的“伪”取谎言之意。

我们在自我现象层面遇到智性之物。我们很清楚，分析恰恰已经把它揭示成所谓防御、阻抗或你们想怎样称呼都可以的现象。不过，当前的重大争论、关键点，正可以围绕自我的这种处境与功能展开；只要你们愿意听我说，它就在我们试图重新确立的东西中界定精神分析的根基。只要你们跟随我，我们可以走得很远。问题不在于能够走多远，而在于别人是否跟得上。事实上，这正是所谓现实的一项极具判别性的要素。

纵观各个时代，我们在人类历史中见证了种种进步；若把它们想成脑回的进步，就大错特错了。这里涉及的进步是象征秩序的进步。观察数学这样的科学史就会发现：人类曾在一些如今十岁儿童已经理解的问题周围停滞数百年，而围绕这些问题的明明都是强大的头脑！

人们在二次方程的解法面前多停了整整十个世纪！希腊人本来可以找到它；他们曾在极值问题中发现更复杂的东西。只是在某一天，人们发明了若干在数学层面更具象征性的东西，才得以解决这些问题。数学进步不是人类思考能力的进步：从某位先生想到发明 $\sqrt{}$ 或 $\int$ 这样的符号那一刻起，就有人做出了成果。数学就是这样！

我们所处的位置——幸好如此！——性质不同，而且更加困难。这里涉及象征，而且是一种极其多价的象征。只有当我们设法以特定方式

表述自身行动的象征，并以恰当方式理解它们，我们才会向前迈进一步。

我们会迈出这一步；同所有前进一样，这也是追溯性的一步。因此我会说，只要你们跟随我，我们正在这样阐发的，恰恰是精神分析 A。只要我把它称作第一时刻——无论在原则还是运用方面——我就会这样称呼它。同时，它也是向自身起源之抱负的一次回返。那么，问题究竟是什么？确实，它力求更加本真地理解转移现象。

塞尔日·勒克莱尔

我还没有完全说完。我想说的是，我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正因为它始终略微落在后面。很明显，在我们小组中，情感与智性这两个词已经不再流通，但问题仍然有些……

拉康——它们最好不要再流通。还能拿它们做什么？

塞尔日·勒克莱尔——但正是这件事，自罗马以来一直多少悬而未决。

拉康——我想，除了那篇著名的《罗马报告》中“智性化的”这个词以外，我一次也没有使用它们。

塞尔日·勒克莱尔

但它恰恰造成了冲击：既有这些词的缺席，也有那些直接针对“情感”一词的攻击；我想，您正是在直接攻击这个问题。

拉康——我认为，这是一个必须从我们的纸上彻底划掉的词。

塞尔日·勒克莱尔

我是想清理一件一直悬而未决的事情，因为它从未得到明确说明。不过，上一次谈转移时，您在我们刚才重新提出的问题中引入了三项根本激情——对吗？——并把无知纳入其中。我想抵达的就是这里。

拉康

正是如此。这套话语的意义，以及我直到最后一次才让三项根本激情登场的事实，就在于此。你们应当注意：问题是要把空间——如果可以这样说；更准确地说，是人类关系的体积——作为一个根本的第三维引入，而且正是在象征关系中引入。换言之，它意味着：爱作为人的激情，只要我们把它同欲望区分开来；只要欲望被置于人与其对象、任何有机体与其本能目标之间已经建立的根本而极限性的关系中；如果爱是另一种东西，那么，恰恰由于人的现实是言说的现实，只有从象征关系本身存在、所追求的不再是满足而是存在的时刻起，爱才得到建立，我们才可以谈爱。

让我们彼此理解清楚。既然您提出的是这个，我就取爱为例；你们会看到，三者中的任何一个都可以这样讨论。我完全是有意直到上一次才谈这些激情的棱线。正如奥布里夫人通过她的问题十分恰当地强调的，它们是人际关系伸展其中的不同领域——实在、象征界、想象界——之间的接合点与断裂点。

事实上，它们正是处在各领域之间的棱脊。既然我要谈的是爱，我想也会借此含蓄地回答您的问题。我们曾在这里强调，爱的关系作为一种现象，位于什么地方。围绕我向你们评注过的《论自恋：一篇导

论》，我们讨论并充分展开的一件事，就是考察激情之爱在其现象中怎样……

Verliebtheit（爱恋）不同于 Liebe（爱）；使用两个不同的词，并非没有理由

……在人那里从根本上受到一项自恋关系的迷住与捕获。

我们的经验显示了这种现象，而且它恰好位于这项经验的象征意义之边界。正是围绕它，我们最可靠地看见人同这项根本激情发生关系时之所以具有深刻歧义的根基与理由：爱对他具有照明作用，却同时令他如此深刻地迷失、受到扰乱；爱现象的全部尖锐问题恰好都集中在这里。我一直强调的正是这一点。

我想你们毕竟已经记住了一些东西，因此不再从头重做自恋性投注的全部辩证法。我只想谈同他者发生关系的这项功能；它包含在我所谓 Verliebtheit 的幻景之中。分析经验与弗洛伊德的教学……

而且我必须说，那些最充分理解弗洛伊德与我们经验在此教导了什么的分析家，

也给出了最清醒的看法

……把作为激情的爱规定为本质上属于想象层面的东西。主体甚至在激情中也通过某种选择，有意承担它；这种选择具有所谓诱惑的意义，本质上就是使那个我们想从他那里得到爱的人丧失自由。爱在“渴望被爱”的意义上，本质上就是企图把他者捕获到自身之中，把他者作为对象来把握。我之所以强调这一点，是因为我第一次详细讨论这种自恋之爱现象，正是在倒错辩证法的延续中。

渴望被爱的根本在于：让实施爱这个行动的对象本身被抓住、黏住并奴役在自身作为对象的绝对特殊性中。在渴望被爱的这项追求中，有一种东西——这是众所周知的——极少会满足于仅因自己的优点而受到爱。爱的要求是：即使主体被彻底颠覆、缩减到一项最晦暗、最不可思议的特殊性，也仍然受到爱。人希望别人爱自己的一切，不只是爱自己的自我；正如笛卡尔所说，要爱自己的发色、怪癖、弱点，爱自己的一切。

反过来，另一件同样明显的事是：去爱——我会说，它是相关的，而且正由于前一点——恰恰就是爱一个超出其表面所是的存在者。爱的主动馈赠所指向的，不是脱离特殊性的存在，而是处在其存在之中的主体。

奥克塔夫·曼诺尼——说这话的是帕斯卡，不是笛卡尔……

拉康

您知道，笛卡尔有一段文字讨论这一点，讨论自我怎样逐步净化，超越一切特殊性质。我们先把帕斯卡放在一旁，因为那会把我们带向……恰恰从我话语的这一刻起，现在所涉及的是帕斯卡；很明显，只要帕斯卡试图把我们带到受造物彼岸，这里就是帕斯卡。

奥克塔夫·曼诺尼——他直截了当地说过。

拉康

是的。但恰恰是在一项拒斥运动中。爱在其主动馈赠中，总是超越这种想象性捕获，指向存在，指向被爱主体的这种特殊性。爱可以在极

大程度上接受我们所谓的弱点与曲折，甚至能够接纳错误。但有一个点，只能在存在范畴中定位和得到意指；到这个点，爱会停下来，无法再继续跟随。

这个点处在某个地方，恰好位于我所谓对欺骗的某种坚持一侧：当被爱者在背叛自身这件事上走得过远，爱便不再跟随。这是一套在经验中完全能够辨认的现象学；我不再把它推得更远，也不向你们展开它的全部发展与全部辩证法。

我只想请你们注意：爱所趋向的是他者的存在维度，也就是他者的某种彼岸、他者在自身存在中的某种展开；这里说的不是被动承受的爱，而是爱作为三条根本分界线之一——主体在言说中象征性地实现自身时，便投身于这些分界线。若没有言说维度……只要它肯定存在……就会有你们想要的一切：Verliebtheit、想象性迷恋，却不会有爱的维度。

明白了吗？您同意吗，曼诺尼？好吧，恨也完全一样。恨不只是摧毁所发生的一种短路式触发；例如，它以完全结构性的方式出现在想象关系中，表现为两个意识无法共存的僵局。黑格尔向我们表明，这项僵局在主体间关系的建立中具有枢纽性、关键性时刻，而其出发点就是为纯粹威望展开的生死斗争。

即使在那里，只要恨也朝象征关系的方向展开，它就成为一种并不满足于让对手消失的激情。它想要的，恰恰同我刚才就爱谈到的对存在之展开相反：它想要的是贬低对方，使对方迷失、偏离、陷入谵妄、受到颠覆。正因此，恨同爱一样，是一条没有界限的进路；它所追逐的是〔……〕，严格说来，是对它所恨之存在展开而细致的否定。

这也许更难让你们听懂，理由在于：可能出于并不像我们以为的那样令人欣慰的原因，我想，我们对恨这种感受的认识，少于那些人更向自身命运敞开的时代。当然，也不能夸大：就在并不久远的过去，我们毕竟看见过一些在这方面颇为“出色”的表现！不过，这也许恰好使我们隐约理解，为什么我们较难接近并赞同这样的描述。

我要说，这是因为这种奔向摧毁存在的进程，在我们这里已经被开辟得十分顺畅。换言之，正如我们所见，它披上各种借口，也极其容易遇到各式各样的合理化。也许我们处在某种弥散凝絮状态中，这个东西已经充分浸透我们，充分满足了对存在的摧毁。换言之，也许恰恰由于日常话语的某种形式、自我结构同某种把人客体化的方式之间的一些对应，我们早已充分成为一种恨的文明，以至于主体自身发展的特殊性较少在这一切灼热强度中承担和亲历它——如果可以这样表达的话。

奥克塔夫·曼诺尼——西方道德主义。

拉康

完全正确！恨在日常普通对象那里找到某种消费方式；而战争则标记出它在少数特殊主体身上可以怎样得到充分实现。不过，若因此以为问题并不存在，就错了！

但请听清楚：我这样说时，真正指明的是存在得以实现的道路。当然，这些道路并不是存在的实现，因为它们只是道路；但它们毕竟正是通往那里的道路。所谓无知的道路也是一条道路。也许在这一点上，要让你们听懂最为困难。但为了理解我们在做什么、分析是什么，它又如此关键！所以，我仍然必须努力作出解释。

主体之所以投身于对真理本身的探寻，从根本上说，是因为他把自己置于无知维度中；他是否知道这一点完全没有差别。这就是分析家所谓 readiness to the transference（转移的准备状态）的一项要素：主体仅仅由于把自己置于在言说中坦承自身的位置，便形成一种根本敞开，并由此在终点找到自己的真理——这个终点就在分析中。

这是一项根本维度；但不应从主体这一侧考察它，而应从另一侧、即分析家一侧考察：

- 如果分析家没有认识到我所谓无知维度使人抵达存在的力量；
- 如果他不知道，自己必须在无知维度中回应那个通过整套话语质询他的人；
- 如果他没有在每一刻想到：最终留给主体的，恰恰不应是一项 Wissen、一项知识，而应是抵达这项知识的道路；
- 如果他不知道，自己必须同主体进行的本质上是一项辩证操作——不是向主体指出他犯了错误意义上的错，因为他必然处在错误之中；而是向他指出，可以说，他怎样说得不好、怎样在不知道时说话、怎样像一个无知者那样说话。重要的是他走过哪些错误道路。

精神分析是一场辩证法，也是蒙田先生在第三卷第八章中所谓的“交谈的艺术”——我再怎样推荐你们阅读这一章也不为过；这里有一个人很熟悉它。“交谈的艺术”同柏拉图、苏格拉底与那个奴隶之间发生的事情相同，也同黑格尔那里发生的事情相同：就是教主体为自己的言说赋予真正意义。换言之，分析家的位置应当是 ignorantia docta，即“有

学识的无知”；这里不是说知识渊博，而是说它具有形式性，并因此能够对主体发挥塑造作用。[注1]

> [注1] “有学识的无知（ignorantia docta）”这一概念由枢机主教尼古拉·库萨提出。

相关知识卡 爱、恨与无知：拉康的存在之激情

诱惑显然很大，因为它弥漫在时代空气中；而且它同我刚才把无知相对于恨所作的定位，也许并非全无关系：ignorantia docta 很容易变成我早就称作 ignorantia docens 的东西，也就是“施教的无知”。例如，如果精神分析家以为自己懂得一些心理学，那已经是他走向毁灭的开端。理由很简单：人人都知道，心理学中没有人懂得多少东西；准确说来，除非心理学自身就是观察人的一种视角错误。

这就是在言说功能中实现存在的层面引入这项三元组〔爱、恨、无知〕的意义，也正是把它引入我们在分析中使被分析者投身其中的辩证法的意义。必须以各种形式重新处理这一点，并采用绝对关键的例子；这些例子正是为了改变你们每一刻对存在维度中所发生之事作出的定性，因为你们不由自主地从一个错误视角、从虚假知识的视角看待它。

相关知识卡 爱、恨与无知：拉康的存在之激情

必须选取完全平凡、日常的例子。你们毕竟必须注意：人说“我是”“我将是”，甚至“我将已经是”或“我想成为”时，总会发生一次跳跃，出现一个根本裂口要素。相对于现实，说“我是精神分析家”同说“我是国王”一样离奇。然而，两者都是完全有效的断言；一个人承担别人赋予他的东西，依据的是一整套完全逸出所谓“能力衡量”秩序的象征性正

当化，而绝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在能力资格的秩序中证明这项承担正当——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

一个人拒绝成为国王，同他接受成为国王，价值完全不同；两者绝不对称。他正因为拒绝，便不是国王。例如，他仍是一个小资产者。看看温莎公爵：这个人就在即将由王冠的尊位授职之际，说："我要同我所爱的女人生活。"他也就因此停留在国王存在领域的此岸。

但当一个人对自己说——而且他确实是国王，是依据某套象征关系系统而成为国王——"我是国王"时，这并不只是属于接受一项职能秩序的事情。不能在捕获秩序中判断它：它在顷刻之间改变了他所是的一切之意义，如果你们愿意，恰好改变了心理定性的秩序。

它赋予他的激情、计划、甚至愚蠢以完全不同的意义。从他成为国王的那一刻起，一切都成为另外的功能，成为王室功能。他的才智在王权语域中成为完全不同的东西；他的无能也一样，它们成为另一项秩序的根基，并凭自身成为围绕他的一整系列命运的极化与结构化。这些命运的意义受到深刻改变，理由就在于：获得王权授职的人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行使王室权威。

同样的事情每天都以缩小的规模发生。一个素质相当平庸、在某个较低职位上会显出各种麻烦的人，被提升到某种主权式的授职——无论它怎样受到掩饰、领域怎样有限，它始终存在——这会彻底改变他的力量与弱点各自具有的作用范围；只要每天观察，就会发现它甚至能奇特地颠倒两者的关系。

也正因为这样……不知你们是否注意到，它在构成资格授予与考试的世界本身中，以一种淡化而不获承认的方式显现：

- 既然我们早已成为如此高明的心理学家，为什么没有取消过去具有入会门槛价值的各种跨越，例如学位考试与教师资格会考？
- 如果我们一下子彻底取消了这种授职性质，为什么不把它缩减成对已经完成的工作、全年记录的分数或点数作一次汇总，甚至缩减成一套纯粹的测验或考核，用来衡量所谓某个人的能力？
- 为什么这些考试——无论考核还是竞聘——仍然保留某种归根到底很古老的性质？从这个视角看，其中围绕着所有令我们愤慨的要素：我们就像敲击自己亲手建成的监狱墙壁的人；我们反对种种偶然、乃至偏爱，以及随之而来的一切。

原因很简单：竞聘为主体披上一项象征性资格，因此它不可能具有完全理性化的结构，不能缩减成我刚才所谓对若干事物的汇总，仿佛它们只能在纯数量加总的语域中得到衡量。

所以，当我们遇到这种情况时，便有所“发现”；因为我们当然很机灵，会说：“没错，我们要写一篇精神分析长文，说明考试的入会性质。”显然如此！这太明显了！

能够注意到这一点是好事；遗憾的是，精神分析家注意到它以后，解释得并不总是很好。他作出一项局部发现，却不得不以“思想的全能”“魔法思维”等术语解释它。然而，这无非就是象征作为根本项的维度。

我充分回答奥布里夫人了吗？也许有些太快？谁还有问题要问？贝哈拉诺，这位富有创意又机敏的人呢？

安杰洛 · 贝哈拉诺

我想到一个具体例子——朵拉病例，可以在其中看见某种构形……在朵拉病例的某个关键时刻，需要请您向我们展示不同语域怎样得到遵循、怎样相互转换……

拉康

既然您提出朵拉病例，我们在其中还多少停留在这扇门外，但仍可以向您稍作说明。借大家提出的问题，我今天已经把这套话语推进得相当远；我仍想设法在其中为你们定位朵拉病例。

让我们重新拿起这个图式……与其说图式，不如说象征。为了从整体上重新讨论转移问题，并提出一种总结性公式——也就是用另一种方式呈现问题——我们这样说：弗洛伊德最初发现所建立的经验，立在梦、《日常生活的精神病理学》与诙谐这张三脚架上。其中始终有——正如我向你们解释的——一项在话语彼岸得到证实的言说。它包含在某种东西中，而这项东西本质上类似于为三脚架构成第四项的事物：梦、口误、诙谐，以及症状。症状同样是一种以有机体为基础的关系方式；有机体在这里不能充当 verbum——因为它并非由音位组成——却可以充当 signum，只要你们记得奥古斯丁文本中彼此包含的不同领域。

在这个经验内部，弗洛伊德本人曾说，自己迟了一步才感到惊惧。当转移现象被孤立出来——而孤立它，是因为尚未认出它——它便作为

治疗障碍发挥作用；一旦认出它，人们却发现它是治疗最好的支点。也就是说，是弗洛伊德后来注意到这一点；这不等于他此前没有已经指明它。

《梦的解析》中已经有了 Übertragung（转移）的定义，而且恰恰依据言说的这两个层面来界定。你们记得我提过的《梦的解析》段落：正因为话语的某些部分已经撤去意义投注，另一项意义才从背后前来占据它们，那就是无意识意义。

他就梦展示了这一点；在梦中，它甚至更加清楚。我也通过一些极为鲜明的口误例子向你们展示过。遗憾的是，我今年很少谈口误。这是某种十分特殊的东西，因为它恰好是处在一切意义背后的无意义之根本面：必然有一个点，意义会在那里涌现并被创造出来。但在意义得到创造的这个点，人完全可能感到它同时被消灭；甚至正因为被消灭，它才得到创造。诙谐的功能，恰恰就是让无意义闯入一套看似有意义的话语，而且是经过计算的闯入。

奥克塔夫·曼诺尼——言说的脐点。

拉康

完全正确！正如梦有一个极其混沌的梦之脐，反过来，诙谐最终却有一个完全尖锐的脐点——Witz。最根本地表达其本质的，就是无意义。好吧，我们发现，这项转移首先就是我们的支点。

我并没有按照年代与历史顺序展开，而是向你们展示了不同作者理解转移的三个方向。这套三分法带有某种教学性与任意性，但它应当使你们能够辨明方向，也辨明所谓分析的当代趋势——也就是看见情况

并不乐观！总之，我们可以采用自己的划分：想象界、实在、象征界。

有一种方式相对于实在理解转移现象，也就是把它理解成当前现象。人们谈论此时此地（hic et nunc），主张全部分析都应围绕此时此地进行，就以为自己打碎了一整扇大玻璃窗，发现了炫目的东西，迈出了勇敢的一步。不过，我们遇到埃兹里尔这一类人；他们写下一些感人的话，却只是在撞开本来就敞开的门。转移当然就在现场。

问题只在于知道它是什么。如果在实在层面把握它，结果就是：它是一项并非实在的实在。人们称这种东西为幻象。主体确实正在这里同我谈他与杂货商之间的纠纷；这完全是现实的。但他向我谈论并抱怨杂货商时，实际痛骂的却是我。这是埃兹里尔的例子，不是我发明的。好，很好，已经明白了！问题恰恰是向他证明，他实在没有理由因为杂货商而痛骂我。我已经向他展示：这种作为幻象的现实行为，同它在实在中脱离出来的现实情境之间存在差异。

人们最近作出的这项伟大发现，只同一种彻底无力深化弗洛伊德早已在转移现象中指给我们的东西有关。无论人们怎样说，它的确参照情绪、情感、情感宣泄等术语；这些术语确实指称分析过程中发生的一些零散现象。然而我提醒你们，它抵达的仍是某种本质上智性的东西。因为归根到底，以这种方式操作，会极其直接地回到某种同弗洛伊德处理最初病例时那些最早的灌输形式完全等价的东西；它之所以不以原样向我们显现，只是因为看起来多少有些新颖，而那些早期灌输如今令我们如此震惊。我们教主体怎样在现实中行动，向他表明自己没有跟上时代。如果这不是教育与灌输，我真不知道什么才是。

这种从根本上说很表面的处理方式，当然没有触及现象底部。弗洛伊德可以把某种东西视为转移之源，也就是重版——他曾说，是一项缩略的、但经过修改和校正的再版。问题正是从这里开始。

W. 格拉诺夫——您谈的是德·索绪尔[注]的立场吗?

> [注] 此处讨论的是分析技术中的"此时此地"取向；结合雷蒙·德·索绪尔的精神分析家身份，语境应指他，而非语言学家费迪南·德·索绪尔。底本与速记本均仅列姓氏，故正文不补全名。

拉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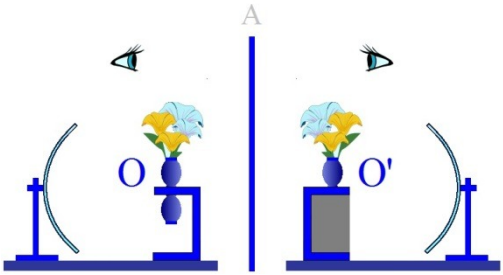
先别管德·索绪尔。他即使在愚蠢的秩序中，也不是如此具有代表性的人物。还有另一种处理转移问题的方式。十分明显，这个层级、这个绝对根本的层面，正是我们在这里一再强调其重要性的想象界。相对较近时期围绕行为——尤其动物行为——积累的全部经验，使我们能够以一种肯定比弗洛伊德所作一切更清楚的结构化来处理它。不过，这个维度甚至已经以原名称出现在弗洛伊德文本中："imaginare"，因为人无法避开它。

这正是我今年让你们研究《论自恋：一篇导论》的理由。生物本身同其所欲求对象的关系，恰恰作为关系而同想象性条件、同格式塔条件相联系；这些条件把想象功能本身置于生物之间的关系中。这一点在分析理论中当然绝未受到误认；它甚至如此普遍地在场，以至于如果只想局限于转移中发生的事情这类狭窄观念，就必须给每只耳朵都拉上两扇百叶窗，才不会突然想到或听见：当人们谈到分析表达中某个绝对根本的东西——认同——时，所涉及的正是这个语域。

不过，问题是不要胡乱使用它，而要看见：在任何一种动物配偶的行为中、在求偶展示中，正是这项想象界使每个个体都被捕获进一个本质上为二元的情境。仅仅考察现象就会看见，借助这项想象关系的功能，会建立某种认同；在动物那里，它无疑是暂时的，同本能周期相联系。在求偶配对（pariade）时刻的一切行动中、在进入性行为周期的个体进行配对时，我们都看见一个展示（parade）语域——至少在那些可以从这一角度观察、并为本能行为研究提供基础的物种中如此。

展示（parade）与求偶配对（pariade）不是同一回事。在其中，我们看见主体在某种想象性斗争中彼此协调；它之所以格外引人注目，是因为始终处在争斗与创造的斜坡上。然而，这项想象性调节大多能够——而且在最鲜明的案例中确实能够——在对手之间建立某种远距离调节，把斗争转化成一段彼此协调的时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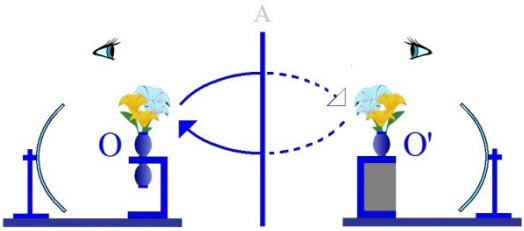
甚至在求偶配对期间发生的雄性争斗行动中，也会在某一时刻出现某种角色选择、对对手支配地位的承认；双方不必真正动手——我不该说“动手”，而是动爪、动牙或动刺。其中一个伙伴会退让，采取被动姿态，接受对手支配并在它面前闪避；它显然依据另一方来采取一个角色，依据另一方在格式塔层面所展示、取得的支配性质来行动。不必一定走向摧毁对手的争斗——当然，这种事情也会发生——就已经有想象性调节在整体情境内部确保某种选择。这项情境是根本的二元情境，建立在生物同他者图像本身的关系中。



这一点对于理解人的想象功能至关重要。由此可以看见，这项功能在人那里既被极大缩减、专业化，又集中于我所谓的镜像；这同时构成了这项想象关系的僵局与功能。我想自己已经对此给予足够强调，因此只须用几个词提醒你们：这幅自我图像仅仅由于是图像，就构成一个在某处形成的理想自我；它概括了人的全部想象关系。它形成于某个功能尚未完成的时刻和时期，因此既具有镜像现象中欢欣承担所充分表达的拯救价值，又同对象关系的某种缺损、某种生命早熟与某种完全原初的致死裂口相联系；这项裂口始终留存在其结构中。

主体只有借助他者，才会不断重新找到这项功能，把它作为自身所有范畴与把握对象世界的框架。他始终在他者那里重新找到这个理想自我、这幅自身图像；他同他者关系的全部辩证法也由此展开。只要他者使这幅图像达到饱和，也就是填满它，他者便积极成为自恋性投注的对象，也就是 Verliebtheit 的对象。

请记得我给你们讲过的维特例子：他遇见夏绿蒂时，她正把那个孩子抱在怀里；这恰好完全落进小说中年轻主人公的自恋性意象。或者反过来——而这其实位于完全相同的斜坡上——他者使主体在自己的理想与图像方面遭受挫折，从而产生最大限度的摧毁性张力。



正是围绕这种只差分毫就会转向一侧或另一侧的东西，我们得到弗洛伊德针对 Verliebtheit 中爱与恨可能突然互相转化所提出问题的钥匙。只须一点微小差异，就会成为其中一方。只要我们看见想象性投注现象在转移中发挥作用，它就围绕这一点旋转。我们应怎样称呼这项作用？它是一项枢纽作用。

如果转移确实如我告诉你们的那样，在言说维度中并通过这个维度建立，那么，它只有抵达同他者——也就是同分析家——进行言说相遇的一些关键点时，才把这项想象关系的揭示纳入自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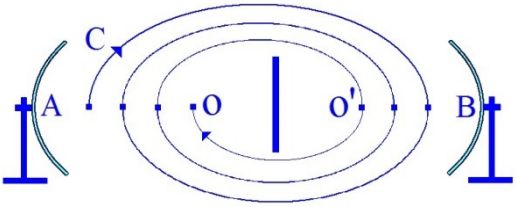
话语在所谓基本规则的法则下，松开了若干惯例的系缆，开始多少更自由地活动——这里的“自由”是相对于日常话语惯例而言——恰恰由此使主体最大限度地向这项丰饶误认敞开；更真实的言说通过它重新接上错误话语。

不过，也正是在这项言说逃避揭示、逃避这项丰饶误认并在欺骗中展开时，另一面才出现。我一直强调：正是这一根本维度，使我们无法从经验中消除主体本身，也绝不能把经验缩减为客体性措辞。我们会看见——取决于误认成功或不成功——那些没有整合、遭到拒绝，或者更确切地说，在主体对自身及其历史的承担中遭到压抑的点得到揭示。

只要主体在那里同自己达成一致，并在分析话语中展开某种属于自身真理、自身整合、自身历史与自身倾向的东西，只要这段历史中存在孔洞，我们会遇到什么？恰恰是某种未被承担、遭到拒绝、受到 verworfen 或 verdrängt 的东西曾经发生的点：

- verdrängt（遭压抑）意味着：它曾在某一时刻进入话语，随后遭到排斥；
- verworfen（遭拒斥）则可以作为原初拒斥而具有完全根本的地位。我曾在提及《狼人》时略微向你们指出这项区别；眼下不再展开。

不过，转移现象之所以遇见想象性结晶，是因为它以某种方式围绕后者旋转，并且必须重新抵达它；问题正在这里。主体在此处〔O′〕、在他者那里，重新找到自身历史中在此处〔O〕、在想象层面发生的各种偶然事件之总体化，也就是我们所谓的想象性捕获或固着；它们无法被言说行动、话语法则及主体历史的象征性展开所同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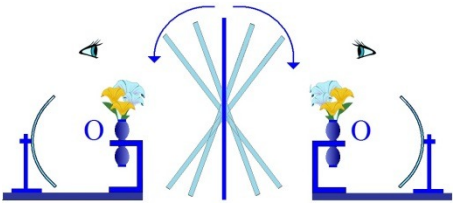
正因为如此，正如弗洛伊德告诉我们的，转移一旦过强，就会从根本上成为障碍。它在爱欲方向上表达什么？或者，它在攻击方向上意味着什么？可以这样说：话语的回声——分布于 O 与镜面 B 之间的区域——过早而太快地接近了 O′ 点，以至于这时在 O′ 与镜面 B 之间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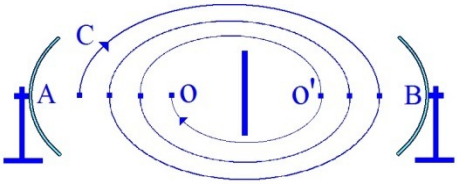
然发生某种完全关键的事情。正如弗洛伊德所说，它最大限度地唤起阻抗；阻抗以我们所能看到的最尖锐形式显现，也就是过强转移的一项相关物——沉默。

不过也必须说，如果这个时刻适时、恰逢其时地到来，这项沉默便取得沉默的全部价值，也就是说，它不只是消极之物，而是处在言说彼岸。因为，我已经向你们充分强调过，转移中的某些沉默时刻还积极表征了什么：真正最尖锐地把握他者本身的在场。等你们离开、开始我祝愿你们愉快的假期以后，请依据这些思考——或者说考量与展开——重读弗洛伊德技术著作中那些珍贵的小文本。重读它们：

- 你们会看到，这些文本将为你们取得何等新颖而生动的意义；
- 你们会看到文本中有关转移的那些表面矛盾：转移既是转移阻抗，又是分析的动力；
- 你们会看到，这一点只有通过想象界与象征界的辩证关系才能得到理解。

这是什么意思？十分明显，一切发出的言词都在那里、在镜面 A，也就是主体一侧。但发出的言词在那里、在 B，也就是分析家一侧得到听见；它不仅让分析家听见，也让主体听见。





话语的回声关系〔主体→分析家→主体〕同图像相对于镜子的关系一样对称。在想象层面发生的事情——我已经向你们解释过怎样设想它——借这个模型得到奠立：镜面发生一些细微移动，便使主体能够在那里、在他者中、在投射到他者身上的位置〔O′〕，补足那幅位于此处〔O〕、而他从根本上依照定义必然误认的结构性图像或自我图像。

无需重新讲解整套光学装置。那些在我把它解释成光学装置配置时不在场的人，只能怪自己！我想，你们几乎都在场……发生了什么？可以这样用图式表示：从 O 到 O′ 的过渡，就是主体实现并补足那些想象性要素；这些要素曾经固定、标定——我会说，“绗缝（capitonné）”——他的想象性发展。“绗缝”同时涉及它在象征秩序中的表达：在某些点上，象征无法同化这些想象性要素，而这正意味着它具有创伤性。

于是发生下面这件事：从 C 来到 O 的东西，是主体在自身话语中承担、并且使他者听见的东西。不过，你们看我画了什么：我从 B 到 O 画了一条曲线，让它来到 O；这是错误的。因为它始终来自 A 与 O 之间的某个点，无论主体是否知道；而且当然比任何其他点更接近 O——也就是更接近主体关于自身自我的无意识观念。问题恰恰就是：这项 ego 的言说承担会在哪里发生？在 O′，随着主体在自己的想象界 O′ 中得到实现而发生。如果你们愿意，这个小图式恰恰相对于这

个语域，能够为你们取得全部意义；我希望你们会听清，因为它将构成我今天所作说明的结论。

一些不乏才干的分析家曾经说明，最现代的分析技术——以阻抗分析自饰——在于从主体的自我中抽取、single out，即孤立出……这个词来自贝格勒，见于他一篇讨论幼儿期最初阶段的文章；我谈巴林特时曾经提到它，当时也给过你们出处……从主体的 ego 中孤立出若干 patterns（模式），并把它们看作防御机制。

请听清楚，这严格说来是对"防御"观念的根本倒错。弗洛伊德在最早著作中引入这项观念，又在《抑制、症状与焦虑》中重新提出；这是弗洛伊德最困难、也引发最多误解的文章之一。借这项操作，当代所谓阻抗分析或自我分析所做的事情，严格说来就是这种智性操作：把若干 patterns 孤立出来，当作主体的防御机制。

主体相对于什么进行防御？相对于在场的分析家；分析家要向他证明，这些模式并非象征，而是某种彼岸得到揭示的障碍。但这个彼岸也只作为彼岸存在；读读费尼切尔就会看见，从防御这个角度同样可以把握一切。当主体在某一时刻以最充分阐发的形式，向你说出性或攻击性质已经得到彻底承认的倾向与驱力时，人们完全可能仅仅因为他把它们说了出来，就在彼岸寻找某种比眼前辩证法所展开之物中性得多的东西。这样一来，一切就彻底颠倒，像让·科克托先生那则著名玩笑：告诉某人，他梦见雨伞是出于性的理由，完全说得通；告诉他或她，一只怀着最明显攻击意图的鹰曾向自己猛扑过来，是因为他或她忘带雨伞，也同样说得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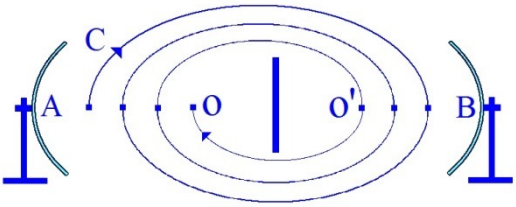
从这个视角看，既然所有首先呈现的东西都被当作防御，那么，一切始终都可以被合理地看成必须处在别处、看成某种遮蔽物。然而，如果把分析介入集中在解除这些 patterns 上，把它们视为遮蔽这个彼岸的东西，我们最终会抵达哪里？

会抵达这里：在这类行动中，规范主体行为的观念只有一项指引，那就是分析家的观念，也就是同分析家的自我保持一致。它始终是一个自我对另一个自我进行塑形；毫无疑问，是用一个更优越的自我塑形——大家都知道，分析家的自我可不是无足轻重的东西！

但这项“并非无足轻重”的事情，甚至得到完全公开的承认。不止一个作者如此——读读农贝格：他对〔……〕功能的整个构想，无非就是把它视为治疗的根本机制，即主体自我的善意应当始终同分析家保持一致，成为分析家的盟友。

这是什么意思？无非意味着，主体的新 ego 就是分析家的 ego。霍弗先生也来告诉我们，治疗的正常终点就是同分析家的自我认同。你们没有看见吗？恰恰因为一切都集中于这种对想象界的实现，我们才会抵达巴林特从主体内在亲历角度动人描述的终点：这里发生的不是向理想自我重新整合，而是对自我理想的重新整合；主体把自我本身作为言说来承担，而这被视为分析的终点。

主体进入巴林特为我们描绘的那种半躁狂状态，进入某种崇高的松脱，让一幅自恋图像自由穿过这个世界；必须真正留给他一点时间来恢复，让他自己重新找到常识的道路。你们没有看见，一切恰恰都在这里吗？



况且，这正是弗洛伊德向我们解释的东西：要以适当节制的方式维持这项旋转的辩证法，而且这种维持同本质上暂时性的功能相关。它使 O 中的东西转到 O′ ，又使 O′ 与 B 之间的东西来到 O；它不应把一切集中带到 O 点——也就是只保持一致，却不让主体在自身存在中取得进展——而应当形成一系列 O_1、O_2、O_3 等你们想列多少都可以的点，以某种方式分布在 O 与 A 之间。

对主体而言，这些点处在象征领域，严格说来组织成历史、第一人称的坦承，并同这里的某种东西保持特定参照。它只能是根本象征关系秩序自身的进展；人正是在其中找到自身位置，也就是解决那些构成超我的停顿与抑制，更充分地重新整合主体身处其中的全部象征系统之法则。

换言之，这就是人们始终以多少有些含混的方式说过、但每个分析家又不得不在经验中看见，因而能够清楚感到的东西：某种对“理解时刻”的铺展……

参加过我《狼人》研讨班的人，会看出我在这里指向哪项参照。

今天不能在此停留太久，但我要把这个“理解时刻”重新引入这里

……你们会在弗洛伊德技术著作讨论 Durcharbeiten（修通）时重新遇见这个“理解时刻”。

这是否意味着，问题属于某种心理磨损的秩序？它是否——正如我在自己有关空洞言说与充实言说的文章中也说过的——属于作为工作之话语的秩序？是的，毫无疑问。因为，只有当这套话语延续得足够久，以至于显得整体落入一项自我建构的括号中，它才可能突然在那个它为之而来的存在者那里得到消解，也就是实际上为主人而来；它同时便失去自身内部价值，只显得是一项工作。不过，在它更远处与背后还有什么？今年我只能接近、触及并让你们隐约看见这项根本视角：概念就是时间。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转移就是分析自身的概念，因为它也是分析的时间。明白了吗？

相关知识卡 空洞言说与充实言说 ・ 重复、移情与“把过去活在现在”

奥克塔夫・曼诺尼——最后那里没有完全明白。

拉康

它恰好就是所需时间的尺度。所谓阻抗分析以提前、过早、始终过于匆忙的方式，把我们刚才参照一位好作者而称作自我的 patterns、防御与遮蔽物揭示给主体；这里说的正是主体要真正取得这些东西所需的时间。

经验向我们表明，这样的分析并不因此使主体向前多迈一步；弗洛伊德在技术著作的一个确切段落中也这样报告，并说：“在这种情况下，必须等待。”如果必须等待，等待的正是主体在象征层面实现有关维度所需的时间。也就是说，主体必须从分析中的亲历——从阻抗分析造成的那种追逐、争斗或紧抱——提取某些重复自动症自身的持续时

间；这项持续时间以某种方式赋予它们象征价值，使它们取得时间维度，因为这〔……〕通向概念维度。

相关知识卡 重复、移情与“把过去活在现在”

奥克塔夫·曼诺尼

我认为这是一个具体问题。例如，有些强迫症者的生活就是等待；他们又把分析变成另一场等待。我恰好想弄清：为什么分析中的这场等待会以某种方式再现生活中的等待，却又改变它？

拉康

是的，完全正确。不过，这同刚才别人问我的事情相同；刚才问的是朵拉病例。说到这里，如果你们去年参加了我围绕《鼠人》所作的展开，就会注意到，我恰恰围绕主奴关系展开了这个病例的辩证法。

强迫症者等待的究竟是什么？主人的死亡。这项等待对他有什么用？它插在他与死亡之间。对他来说，这项等待始终以同一种方式呈现：它会越过主人的死亡而继续。

你们会以各种形式重新遇见这个结构：主人一死，一切就会开始。他是对的：奴隶完全有理由利用这项等待。也正因此——如果可以这样说——我们可以重新采用一句据说出自特里斯唐·贝尔纳的话；他被捕、即将前往但泽集中营[注]那天说：“直到现在，我们生活在焦虑中；从此，我们要生活在希望中。”

> [注] 底本、速记本与米勒整理本均作 Dantzig（但泽）；但法国国家图书馆联合目录所载1943年书信记录表明，特里斯唐·贝尔纳夫妇被拘禁于 Drancy（德朗西）。正文保留拉康的地名，不暗改历史异文。

必须说清，主人同死亡的关系要〔……〕得多。纯粹状态的主人可能处于绝望位置；他除了死亡以外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等待，因为从奴隶的死亡中，除了一些麻烦，他也等不到什么。反过来，奴隶却可以从主人的死亡中等待许多东西；他相信这一点，因为这场死亡尚未发生……因为在主人死后，他终究必须面对死亡——像海德格尔意义上一切充分实现的存在者那样——并承担自己的“向死而在”。但强迫症者恰恰没有承担自己的向死而在；他处于缓期状态。分析必须向他展示的就是这一点，也正是主人图像本身的这项功能。

奥克塔夫·曼诺尼——也就是分析家。

拉康

当然，它由分析家体现。这就是对强迫症世界进行分析时特有的结构。这是一个极好的例子。正是在那些必须于时间维度中展开的运动萌芽中、在朝向出口的运动萌芽中，强迫症者才能实现自身强迫观念的概念，也就是实现它们所意指的东西；而实现的条件是：主体已经数次完成某些切分，让朝着出口、走出主人监狱的那些想象性萌芽取得特定的 timing（时机安排）。

例如，我们在这里发现，严格需要一定数量的这类切分。如果我们知道怎样正确研究这些病例，它们甚至可能表明：每个强迫症病例中都有数值符号。这同〔……〕那则著名的三只圆盘例子完全一样。只要“主体思考他者的思想，并在他者身上看见同自己相同的运动图像与萌芽”，他就能把障碍缩减成同一项运动的统一性，把每次问题所涉及的意义缩减到这一点：他者同自己完全一样；除了绝对主人——死亡——以外，没有其他主人。

不过，他需要一定时间才能看见这一点。因为同所有人一样，他太乐于做奴隶了。

〔分发大象小雕像〕

1953—1954年度研讨班结束

课程目录